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斯基泰时期

[荷兰] 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 著

许建英 贾建飞 译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荷兰] 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 著

许建英 贾建飞 译

斯基泰时期

——一种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印度北部的
历史、艺术、铭文及古文字学的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基泰时期/(荷兰)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著;许建英,贾建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ISBN 7-222-03344-0

I.斯... II.①黎...②许...③贾... III.佛教—宗教艺术—研究—印度—古代 IV.J135.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505 号

根据 1949 年印于荷兰的文本译出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斯基泰时期

著者 [荷兰]J.E.范·洛惠泽恩-德·黎乌

译者 许建英 贾建飞

总策划 林祥 胡廷武

主编 余太山

副主编 张立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00 千字

印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7-222-03344-0/K·313

定价 45.00 元

译者的话

我们知道,古代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不仅是佛教发展与传播的重要地方,而且还是传播广泛、影响久远的佛教艺术的滥觞之地。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和秣菟罗佛教艺术即产生于此地。而为研究此地佛教艺术的产生、发展和衰微,以及它们和希腊古典艺术的关系,曾吸引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家、铭文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解决了许多有关方面的问题,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如约翰·马歇尔、格伦威德尔、阿尔弗莱德·福色尔和科诺等。但是,无庸讳言,仍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陷入了长期的争论,也提出了种种假设和理论,诸如印度北部及西北部佛教艺术的起源,佛像的起源,所形成的艺术流派,印度本土艺术和古希腊艺术的关系及其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以及当地复杂的民族斗争、王朝更迭和佛教发展的关系等。在早期的研究中,关注犍陀罗考古及佛教艺术的较多,而较少研究并注意到秣菟罗佛教艺术及其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关系。有鉴于此,本书作者独辟蹊径,试图通过与犍陀罗佛教艺术同时繁荣的另一个佛教艺术中心——秣菟罗的研究,说明秣菟罗艺术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佛教艺术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用的线索。

作者是通过研究斯基泰统治秣菟罗时期的纪元入手来结构本书的。斯基泰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人认为就是西方史籍中的萨迦,也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典籍中提到的塞种。对于斯基泰人的起源、分布和族属等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有较大分歧。它们的主要起源地似乎在锡尔河以北,西伯利亚以南的广大草原

地带,后来经过四处迁徙,分布地域更广,东到中国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到第聂伯河流域。斯基泰人曾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印度北部及西北部地区,并在此统治了一个多世纪。这一时期的纪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存在较大的分歧,而该期又是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只有确定有关纪元,才能详细判别犍陀罗、秣菟罗佛教艺术在各相应历史时期的特点,弄清其发展史的脉络。作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铭文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纪元系统。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犍陀罗和秣菟罗这两个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进行了研究和对比。

犍陀罗,是一个古代地名,指的是印度河西岸,包括今天的白沙瓦谷地及斯瓦特、巴奈和巴爵尔。犍陀罗地处印度和西亚的边境地区,历史上曾有多民族占领并统治过此地。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它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一部分。在公元前4世纪,它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它被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征服,但是一个世纪之后西方又重新占据了它。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又统治了此地。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斯基泰人进入这一地区,一个世纪之后帕提亚人与贵霜人又接踵而来。从那以后,这一地区不停地被外来民族所征占。公元3世纪,犍陀罗被新兴的萨珊王朝所统治。公元4世纪,占领该地的是寄多罗贵霜。最后,在公元5世纪中叶,哒人或白匈奴席卷这一地区,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哒人的烧杀掠夺,使犍陀罗繁荣受到致命的打击。关于犍陀罗艺术,人们对其中北部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否深受希腊和罗马的影响争论不休。

作者认为,在斯基泰人统治印度北部、西北部的时期,它们从希腊化时期的西方复制并输入了许多艺术品。在输入或复制希腊艺术品的过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当地的艺术获得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使后来著名的犍陀罗艺术蹒跚起步。要准确确

定犍陀罗艺术的始点固然非常困难,而要精确判定犍陀罗艺术的终点同样不易,要弄清楚哪一件雕刻可算作犍陀罗艺术而不再是希腊艺术的输入品或复制品则更为困难。这里肯定存在着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制作复制品逐渐减少,因为犍陀罗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自成一格的图案,尽管它们从希腊经典作品中受益良多。这一过渡期,可能开始于帕提亚诸王时代,而在卡德菲斯君主统治时候得以继续,在迦腻色迦统治时虽然仍有相当强的希腊影响,但是犍陀罗艺术可能已经得到巨大的发展。这种新兴的艺术毫无疑问受到了迦腻色迦的保护和促进,这一过程大约持续半个世纪,最后才形成了一种富有特色的独立的艺术。

作者则认为,犍陀罗艺术在观念上是源于印度本土艺术,而印度本土艺术则产生于巴尔胡特和山奇的先前的阶段。在经过详实的论证后,作者指出:印度本土艺术对犍陀罗的影响比迄今为止一般所认为的更大,西方影响则比一般的推测要小,特别是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犍陀罗艺术的黄金时代,几乎看不到西方的直接影响。

秣菟罗在印度的西北部,和犍陀罗一样,是个古代名字,现在称为穆特拉。它坐落在朱木拿河之滨,同时它又刚好处在从印度西北部到恒河平原的商业通道上。早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初,秣菟罗可能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了。既然此地非常有利于贸易,不久就变得非常繁华,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人们四处经商,但是他们不论在哪儿获得钱财都能用于艺术的奢华。这座商业城镇就这样逐渐成为著名的艺术中心。除此之外,秣菟罗一度是苏罗婆国和般遮罗国的所在地,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望该地区遗存有很早期的印度艺术品。作者认为,在此发掘出的药叉雕像便源自秣菟罗的最古老的印度艺术品。而且该地还发现了巽迦时代及其以后的艺术品。秣菟罗不但是保持商业持续兴旺的中心,而且也

是维持艺术持续繁荣的中心,它的声名远播西方。作者对秣菟罗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对秣菟罗艺术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耆那教圣人像和佛陀像做了对比研究,这为研究佛像的起源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

此外,作者还对公元3世纪的后贵霜的历史、佛教艺术和铭文进行了综合的、深入的考察。这样就使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一度中断的斯基泰时期的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情况。

总之,作者从考古学、历史学、铭文学及艺术史学等多方面,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印度北部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研究秣菟罗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而且也为研究犍陀罗的历史、佛教艺术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

本书作者J.E. 范·洛惠泽恩-德·黎乌女士是荷兰人,先后在荷兰莱顿大学和乌德列支大学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曾师从沃格尔教授、克罗姆教授、库帕教授、弗利德曼教授、博什教授和高恩达教授学习印度考古、梵文、巴利语并获得有关的专业训练,而且在荷兰教育、艺术和科学部及英国大学妇女基金会的资助下得到到奥斯陆、伦敦和巴黎访学,广泛地收集资料,访问所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有关的探讨。同时在有关外文资料的运用上,作者也不拘泥于既有的解释与翻译,例如在汉文和日文资料的利用上,作者就显示出审慎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研究作风。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历史、艺术和考古的研究领域中,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和独有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近些年国内已经译介了不少关于犍陀罗方面的著作,而此书将会为我们从整体上综合地了解印度北部和西北部提供更有益的帮助。

本书译本是根据1949年印于荷兰的文本翻译的,原书名为《“斯基泰”时代——一种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印度北部的历史、艺术、铭文及古文字学的研究》。

本书的汉译是协作完成的:前言、引言、正文的第一章、第二

章、第三章以及译者的话是由许建英承担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是由贾建飞执笔的；附录等是两人联合完成的。本书除了涉及大量的历史、考古、佛教及铭文知识外，还有德语、法语、古希腊语等多种语言的引文，刘文锁博士、张绪山博士等在这些引文的翻译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是由于该书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和复杂，诸多地方仍是我们学力所不逮，加上时间紧迫，参考资料有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1年8月

名誉顾问 季羡林

总顾问 李学勤

学术委员

定宜庄 耿昇 萧德基 韩昇 华沛 蓝琪

厉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迎胜 牛汝极 潘志平

姜新江 芮传明 王邦维 王德 王希隆 夏含华

徐文堪 于志勇 张绪山

总策划 林祥 胡廷武

主编 余太山

副主编 张立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纪元	(3)
第二章 印度西北部的艺术	(71)
第三章 秣菟罗贵霜艺术中的佛陀和耆那教圣人像	(135)
第四章 秣菟罗的后贵霜艺术	(210)
第五章 后贵霜时代的婆罗迷文铭文	(239)
第六章 后贵霜时代的历史	(277)
第七章 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印度北部的历史	(297)
附表一 “斯基泰”时代的诸统治者	(358)
附表二 “斯基泰”时代的铭文	(360)
附表三 婆罗迷铭文中的字符 ku	(363)
附表四 婆罗迷写本中的字符 u	(364)
图版说明	(365)
译名对照表	(368)

引 言

当对印度北部得以熟悉的时候,可见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置身于犍陀罗艺术的学者中考古学家为数良多。特别是佛像的起源及其古代性似乎对这类学者有着持久的魅力。从印度考古需要的观点来看,就这一主题带来的认识似乎是值得推荐的。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对其他的同时繁荣的艺术中心秣菟罗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合适的解决。

和所有这些相联系的第二个要求是纪元问题的解决。从科诺教授的观点出发,在研究中我们被迫进入改变我们观点的资料。蒂尔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正确地评论道:“……年轻的一代总是用不同于他们前一代的眼光看问题”。并且,“……甚至那些著名的、颇多研究的材料仍有新东西,如果研究者知道他正在寻找什么,并能够运用其独立的判断的话。”

不过,即使在将来,我们关于纪元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哪怕如此,我们所表明的纪元序列将仍有其价值;正如我们所勾画出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发展线索一样。

为了避免结论,当我们计算旧纪元的年代时,我们已经循着班纳吉、巴赫霍夫及其他人的体系。不过,我们意识到在基督纪元后的年代上增加一年将会更正确。

关于在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中所讨论的铭文,希望我们对它们的释读和翻译要比已经刊布的有所提高。在我们的翻译中,都是按它们在原文中的情况给出的,置于括号中的则是不确定的;而加个问号则表明是一个补充性建议;万一某处对一个 aksara 有

两种可能的释读,那么第二种就放在括号里,并且加个“或者”。关于汉文文献段落,我们参考了已存在的翻译,但是这些都没有刻板地引用,因为我们对它们进行了重译。

第一章 纪元

关于这些纪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迦腻色迦王(Kaniṣka)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的时期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一纪元,对任何进一步探讨印度北部早期历史问题都一直是个阻碍。明确确定这些纪元的始点,艺术史也会极大受益,因为那样的话,所有被确定为贵霜(Kusāna)和后贵霜(Post - Kusāna)时代的雕刻就会得以详细标明,这样我们能够对秣菟罗(Mathurā)艺术源于贵霜(Kusāna art)艺术,经历后贵霜艺术到笈多时代(Gupta time)的发展有一个相当完整的考察。

不过,不仅秣菟罗和笈多艺术(简言之,印度北部艺术)受益于此,而且如果我们知道所使用纪元的起点的话,我们便能够得出若干关于印度西北部艺术——即犍陀罗(Gandhāra)艺术——年代更为确定的结论,因为所提及的这一流派中的若干雕刻带有年代。迄今为止,有关印度西北部艺术的最为矛盾之诸多假说已广为传播,而没有一个能举出证明其正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我们在下面将会进一步看到,这一问题和迦腻色迦王何年开始其统治的问题密切相关。

直到今天,尚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还没找到能广为接受的解决办法^①”。

1874年,爱德华·托马斯(Edwar Thomas)^②建议把迦腻色迦王纪元看作始于公元前312年的塞琉西纪元(Seleucidian era)(或者看作始于公元前248年的安息纪元(Parthian),迦腻色迦王及其继

任者治内数以百计的日子被略掉了,这样人们肯定会把 3~98 年看成塞琉西纪元的 303~398 = 公元前 9 年~公元 86 年(或者看作安息纪元的 203~298 = 公元前 45 年~公元 50 年)。

卡宁汉姆(Cunningham)最初认为,迦腻色迦王及其继任者时代的那些年代一定要被归于始于公元前 57 年的超日纪元(Vikrama era),后来他同意应归到塞琉西纪元^③。

沃格尔(Vogel)^④认为出土于犍陀罗的不同雕像上的年代,尤其是罗里延·唐盖(Loriyan Tangai)、迦玛尔嘎里(Jamalgarhri)上的那些,以及哈什特纳嘎尔(Hashtrnagar)佛像垫座及斯卡拉·德里(Skarah Dheri)的佛像使用的都是同一纪元。

布勒(Bühler)^⑤则在卡宁汉姆的观点和以下的这种可能性之间拿不定主意:即迦腻色迦王朝的年代和那个出土于坦叉始罗(Taxila)的标有纪元不明的 78 年铜盘一起,要被划归于一个在阿莫西尼的 āyā gapata 上标明的纪元不明的 72 年的纪元中去^⑥。

温森特·斯密斯(Vincent Smith)建议用始于公元前 49 年或公元前 48 年的安条克的恺撒纪元(Caesarean era)确定塔克特-伊-巴喜(Takht-I-Bahi)^⑦铭文年代的可能性。在预先假定略去数百和数千的情况下,温森特·斯密斯也证明使用 Saptarsi 纪元或者 Laukika 纪元^⑧,其中表示 100 和 1000 的数字也省去了^⑨。格罗斯(Growse)已经于 1877 年提出了这种解决方法^⑩。

塞尔文·列维(Sylvain Lévi)认为迦腻色迦纪元大约始于公元前 50 年左右^⑪。

班纳吉(Banerji)^⑫和福色尔(Foucher)^⑬认为可以把始于公元前 322 年的孔雀王朝纪元(Maurya era)作为迦腻色迦“登基”的日期,这样同样地把数百年省去了。

还有许多其他的纪元被引入到所讨论的这一领域。布勒建议一个始点在公元前 137 年和公元前 112 年之间的纪元^⑭;马歇尔据出土于坦叉始罗的铜盘提议一个由毛迦(Moga)可能于公元前 95

年^⑮建立的纪元；班纳吉提出由乌奴你思(Vonones)于公元前100年^⑯建立的一个纪元；拉普森(Rapson)推出一个大约始于公元前150年左右的纪元^⑰；加雅斯瓦尔(Jayaswal)建议一个始于公元前120年的纪元^⑱，塔恩(Tarn)则假定一个始于公元前155年的纪元^⑲。卡宁汉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主张把迦腻色迦王朝和始于公元前57年的超日纪元(Vikrama era)统一起来，对此假定弗里特(Fleet)^⑳、弗兰克(Franke)^㉑、路德斯(Lüders)^㉒、肯尼迪(Kennedy)^㉓和巴奈特(Barnett)^㉔都给予有力支持。道森(Dowson)特地把超日纪元用于塔克提-伊-巴喜出土的铭文上^㉕。马歇尔认为该时代被用于134和136的铭文^㉖中。最近，马嘉姆达(Majumdar)提议这一纪元适用于罗里延·唐盖、喀什特纳嘎尔及斯卡拉·德里出土的铭文^㉗。格什曼(Ghirshman)提议把它作为所有较古老的迦罗西蒂文(Kharosthi)铭文中实际使用的纪元^㉘，他建议把公元144年作为迦腻色迦统治的起点，这是咀叉始罗铭文的一个单独的莫俄斯纪元(Maues era)。

弗噶森(Fergusson)最初同意卡宁汉姆关于迦腻色迦于公元1世纪初兴盛之说^㉙，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把迦腻色迦纪元的始点定于公元78年，以便该时代能因此和塞种(Śaka)纪元重合，二者完全相同^㉚。奥尔登伯格(Oldenberg)赞同他的观点^㉛，但是后来^㉜，他支持博叶(Boyer)，博叶认为迦腻色迦是于公元90年登基的^㉝。

巴恩达卡(Bhandarkar)不仅把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的铭文归于塞种纪元，而且把所有其他迦罗西蒂文铭文都归于塞种纪元。在迦腻色迦“登基”铭文的年代上，他认为始终略去了200，这样迦腻色迦生活在大约公元278年^㉞。他提出乌奴你思^㉟应该是塞种纪元的奠基者；而包·达吉(Bhāu Daji)^㊱、博叶^㊲和弗里特则认为是纳哈帕纳(Nahapāna)^㊳，焦维奥-杜波莱伊尔(Jouveau-Dubreuil)又认为是总督(Castana)^㊴。

科诺(Konow)在他的《印度铭文汇编》中的观点是迦罗西蒂铭

文中并没有使用塞种纪元,而是阎膏珍(Wima Kadphises)^⑩引入了它;根据他的观点,迦膩色迦统治始于公元127~128年。后来,他改变了该日期,而认为应当是公元130年。最近,他认为应更晚一点,甚至在公元138年左右^⑪。

拉普森和加雅斯瓦尔在科诺就此问题发表大量文章后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仍坚持认为迦膩色迦是塞种纪元的奠基者。

就目前而言,在过多的假设和理论中,由于科诺的观点总体上作为最权威的而被接受,因此需对它进行更详细的审查。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主题错综复杂,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科诺并没清楚表明他们的通常有点无可置疑的声明是基于什么之上,关于这些用于基督纪元开始前后几个世纪的纪元,科诺所建构的理论和假说总是互为依赖,(开始时)真正要从这一理论和假说的迷雾中找到路途是困难的。

不过,这一始点在由约翰·马歇尔伯爵在咀叉始罗发现的一个银质涡旋形装饰图等的铭文上。我们在此根据马歇尔的解读、翻译以及后来由科诺对几处修正后的全文引述如下:

1. "Sa 1 100 20 10 4 1 1 ayasa aṣṭasa masasa divase 10 4 1 isa diva(se pradi)stavita bhagavato dhatu(o) Ura(sa) -

2. keṇa (Im) tāvriaputraṇa Bahaliṇa Noachae ṇagare vastavena Tenā ime pradistavita bhagavato dhatuo dhamara -

3. Īe Takshasi(la)e tanuvae bosī[dhi] satvagahami maharajasa rajatarajasa devaputrasa Khushaṇasa arogadakshīṇae

4. Sarva(bu) dhāṇa puyae prach(e) gabhudhāṇa puyae araha(ta)ṇa pu(ya)e sarvasa(tva)ṇa puyae matapitu puyae mitramachanatisa -

5. Lohi(ta)ṇa (pu)yae atvaṇa arogadakshīṇae Nivāṇae hotu a(ya) de samaparichago".

译文为:

"Anno 136, 在第一个月 Āshādha 的第 15 天,在这一天上帝的

遗体由 Urasaka 安置, Urasaka 是 Intavhria 男孩之一, 大夏人, Noacha 镇的居民。由他, 上帝的遗体被安置在他自己的菩萨小教堂中, 该教堂在 Takshasila 的达摩罗吉珂(Dhammarajika)院子中, 为使伟大的王, 万王之王, 上天之子, 贵霜身体健康, 为向所有佛陀表示敬意, 为向 Pratyē Kabudhas 表示敬意, 为向阿罗汉(Arhats)表示敬意, 为向万物表示敬意, 为向父母表示敬意, 为向朋友们、大臣们、族人们和亲戚们, 为了祈健康于他本人。

愿你的这种得当的慷慨通达涅槃^②”。

马歇尔和科诺之间的巨大分歧在于对 *ayasa* 一词的理解。马歇尔把这一词理解为名字阿泽斯(Azes)的所有格, 因为在该铭文中, 提到 *a mahārājā rājatirājā devaputra Kuṣāna*, 而且由于阿泽斯所有头衔都没有, 那么根据马歇尔的观点, 他不可能是当时的统治君主。因此马歇尔解释那则铭文开头出现那个名字是这样假设的: 这则铭文所标年代的纪元是由阿泽斯建立的, 而阿泽斯的所有格并不表示他统治的那个年头, 而是指他所建立的纪元^③。而且, 这一假设的阿泽斯纪元正是超日纪元。

科诺起初同意马歇尔的说法, 只是他认为当该铭文发布时, 阿泽斯仍在行使统治, 就是说他仍是诺阿卡(Noaca)之王^④。后来科诺提出反对, 首先, 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足以证明这样一个阿泽斯纪元。弗里特已经“特别”声明^⑤, 当时肯定有两套纪年系统并用, 它们显然互相重叠, 即所假定的阿泽斯纪元和用于此期其他的迦逻西蒂文铭文的纪元系统。

按照科诺的说法, 主要的异议是如下事实: 在该种情况里, 提到一位君主的名字及其年代, 在此铭文题写之时他并不在位。不过在较古老的迦逻西蒂铭文中, 把某君王的名字以属格的形式附加到该年代上是习以为常的事, 以此表明那人是当时的统治君主^⑥。

因此, 科诺提议以不同的方式译释 *ayasa* 这个字, 实际上把它

认作 *aśadaśa* 一字的形容词。

根据他的解释, *ayasa* 可能是由梵文 *adyasya* 经由 *ajja* 衍变而来的, 其变化如下:

$$\begin{array}{l} > \text{adiyasa} \\ \bar{a}dyasya \text{ via } \bar{a}jja: \bar{a}dyasya > \bar{a}jjasa > \begin{cases} \bar{a}jasa \\ \bar{a}yasa^{⑧} \end{cases} \end{array}$$

这一点的意义肯定是在有异议的这一年有两个月 *Āśādha*, 其中一个被表明作为第一个 *Āśādha*^⑧。这种情况在印度历法中发生的非常少。在科诺的要求下, 范·威克 (Van Wijk) 根据当时可能使用的悉昙多 (*Siddhantas*) 的规则, 在公元 48 年至公元 78 年之间, 此事只能发生在公元 52 年和公元 71 年^⑨。该界限是由科诺给定的。因为根据他的说法这些铭文不会迟于公元 78 年, 所标年代的纪元不会始于公元前 88 年。按科诺的意见, 联系到呾叉始罗的铜盘, 以及阿莫西尼还愿匾上的铭文, 范·威克指出在这两个可能性中, 公元 52 年更合适, 所以用在以较古老的迦逻西蒂铭文中的纪元始于公元前 84 ~ 公元前 83 年。

为确定迦腻色迦纪元的起点, 科诺以同样的方法利用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一些铭文上的几则天文学的说明。

在泽达 (*Zeda*) 发现的铭文注明的日期如下: “*Sam 10 1 asadasa masasa di 20 utaraphagune*”^⑩ (11 年, 在 *Uttaraphālgunī* 的 *Āśādha* 月的第 20 天。) *Āśādha* 的第 20 天和 *nakṣatra Uttaraphālgunī* 相一致是非常偶然的。除此之外, 在乌恩德 (*Uṇḍ*) 铭文中, 提及下列日期: “*Sam 20 20 20 1 cetrasa mahal (sa) sa divase athami di 4 4 iśa kṣunami sa (vi) rana kha …… purvaśade*^⑪” (“61 年, 在 *Purvaśādha Caitra* 月的第 8 天, d. 8.), 这样在此 *nakṣatra Pūrvaśādha* 和 *Caitra* 月的第 8 天又巧合。

范·威克为科诺计算何年为迦腻色迦纪元的第一年, 如果上面

所提及的泽达和乌恩德铭文中的两个条件能满足,他发现 79 年, 117 年和 134 年是可能的年代。

中国史料在公元 125 年后对印度西北部没有记载,也没有关于迦腻色迦的信息,以此为借口,科诺认为迦腻色迦一定是在 125 年后,因此,134 年^⑤作为他纪元的始点最可为人接受。他进一步辩论说,如果卡拉特斯(Khalatse)铭文的年代(他已把卡拉特斯划到 184 年或 187 年的古老的塞种纪元里了,在该纪元里阎膏珍被提及。)应从公元 103~104 年算起的话,那么迦腻色迦的统治无论如何也不会始于该时间之前。另外,卡拉特斯铭文被用作他的观点的证据,即塞种纪元不是由迦腻色迦建立的,而是由阎膏珍本人建立的。“……我们的铭文提供了证据,历史上的塞种纪元不是由迦腻色迦创立的,假如把它和阎膏珍的名字及 187 年或 184 年相联系。因为我们知道阎膏珍是在迦腻色迦之前,甚至可能他被一个间隔所分离。不可能把旧塞种纪元的始点上溯得如此之远以致公元 187 年或公元 184 年,放到公元 78 年之前。”

“它也表明咀叉始罗卷轴的 mabaraja rajatiraja devaputra Kbushana(它的年代被确定要早 50 年)不可能刚好是阎膏珍,因为很难想象他在其父亲八九十岁时继位,还能统治五十年。”

“另一方面,我们的铭文并不影响我关于阎膏珍建立历史上的塞种纪元的划分,因为推算是建立在纪念推翻印度全国王朝(全印度王朝)之上的,全印度王朝是马尔瓦人(Malava)取代塞种人,所以在旧塞种霸权仍炙盛的省份和旧塞种纪元未被废除的省份中没有理由引进全印度王朝^⑥”。

几年后,范·威克根据一个不均衡的时段系统,推测在印度 naksatras 被计算在那些时代里^⑦。按照这一推算,只有公元 128~129 年可被考虑为迦腻色迦纪元的起点,该年代也是科诺在《印度铭文汇编》^⑧中所给定的日期。

过了一些年后,科诺建议卡拉特斯铭文指的是超日纪元^⑨,按

他的建议,这一铭文甚至始于公元 130 年,这一点对他所持的迦腻色迦是在该年之后承位的推测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

所以科诺假定,在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印度西北部有 5 个纪元并用,而且彼此重叠得很厉害。

1. 公元前 84/83 年的旧塞种纪元,所有较古老的迦逻西蒂文铭文均为此期;

2. 超日纪元(Vikrama era),用于阿莫西尼匾^⑤中及塔克提-伊-巴喜铭文中;

3. 阿泽斯纪元(Azes era),也用于塔克提-伊-巴喜铭文中,该时代始于公元前 7~6 年^⑥;

4. 塞种纪元(Saka era),用于西郡太守铭文中的;

5. 始于公元 128/129 年的迦腻色迦纪元,用于所有新的迦逻西蒂文铭文中;

1932 年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在卡拉万(Kalawan)发现一只铜盘,上面刻有一则铭文,该铭文致使科诺修正他关于旧塞种纪元^⑦始点的意见。

铭文在一开始即写出日期,其词如下:“Samvatsaraye 1 100 20 10 4 ajasa śravaṇasa masasa divase treviśe 20 1 1 1 ……”

第二则铭文的发现(该铭中紧接着日期后面写有 ayasa 或者一个同形异义词)打破了科诺关于 ayasa 作为 ādyasya 的解释,因为在公元 134 这一年里,月份 Āṣāḍha 不可能出现两次。因此,科诺收回他的旧塞种纪元始于公元前 84/83 年的假说,同意马歇尔的 ayasa 和 ajasa 肯定是人名阿泽斯(Azes)属格的两种情况;并且说至于在一些旧的迦逻西蒂铭文里,我们必须处理超日纪元,例如出现在阿莫西尼匾中的一则。此外,我们必须假定还有一个较老的年代表,它用于帕提卡(Patika)铜盘,或许也用于其他一些铜盘上,诸如,麦拉(Maira)铭文、沙铎尔(Shahdaur)铭文,法特扬(Fatenjang)铭文,穆差(Muchai)铭文,以及罗里延·唐盖(Loriyan Tangai)、加玛

尔噶里(Jamālgarhī)、哈什特纳喀尔(Hashtnagar)和斯卡拉·德里的铭文组^⑩。

科诺继续辩论如下：“……如果公元 72 年的阿莫西尼匾的日期、公元 103 年的塔克提 - 伊 - 巴喜铭文日期、公元 122 年班吉塔(Panjtar)记录的日期、公元 134 年卡拉万盘、公元 136 年咀叉始罗卷轴的日期均涉及到漏掉的 Kartticādi Vikramd 年头,它们大致分别对应于公元 14 年、公元 46 年、公元 65 年、公元 77 年和公元 79 年。我们据此肯定可以推断出印度 - 帕提亚王冈多法内斯(Gondophernes)公元 46 年在位,他可能于公元 20 年掌权。公元 65 年,贵霜人到达班吉塔,可能也到达了塔克萨西拉(Taksasīlā)。公元 79 年,可能公元 77 年,贵霜人在先前的帕拉瓦王国已建立了一段时间了。似乎紧接着公元 65 年西尔盖普(Sirkap)遭受劫掠的日期,不可能发生在此之前更早的时候,因为印度 - 帕提亚王冈多法内斯似乎已有了继承人。

“题有塞种 191 年[此期为吉霍尼迦(Jihonika)统治]铭文的花瓶发现于西尔盖普,当然该属于前贵霜时期。它相当破旧,可能在西尔盖普遭受劫掠被埋时它已使用了 25 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塞种纪元的近似时代该是 $191 - 40 =$ 约公元前 150 年。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估计,但是由另一方面的论据所支持。

“阿莫西尼匾似乎表明索达萨[Soḍāsa(sic)]是公元 14 年的一个总督。当秣菟罗狮柱建立时他是一个太守(Kṣatrapa)。帕提卡情形也如此,帕提卡在塞种时代 78 年时甚至还不是一个太守。帕提卡在塞种 78 年显然是个年轻人。当然,我们不能说出在索达萨作为太守统治和他升为总督阶层可能经过了多长时间,或者帕提卡变成总督经过了多长时间。可能几年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为了论证起见,我们假设索达萨在公元 14 年是 65 岁,在狮柱建立之时为 25 岁,建立狮柱大约在公元前 25 年。如果帕提卡总督当时约 65 岁,那么他在那只咀叉始罗铜盘题铭文时约 20 岁,铜盘铭文

大约是在公元前 70 年题写的,其日期当为 $79 + 78 =$ 公元前 148 年。”

“如果我们假定旧塞种纪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 150 年,我们希望找到它是如何创立的,至此我们又只能进行推测^⑤。”

当上述两段讨论旧的迦逻西蒂铭文指的是阿泽斯——即超日纪元时,那么科诺^⑥理解的这个“阿泽斯”是作为“阿泽斯统治之时”,而不是“由他所建立”的;他认为阿泽斯一名和后代的超日纪元存在联系。

由于没有任何和阿泽斯之名相关的皇室衔号,这是非常例外的,所以即使科诺的解释——虽然不可能——并不令人满意^⑦。在我们看来,单词 *ayasa* 是梵语 *aryasa*, 这为班纳吉 - 赛斯特里 (Banerj - Sastri) 进一步证实,他指出阿萨达 (*Asadha*) 和斯拉瓦纳 (*Sravana*) 已为许多事件证明特别神圣,而出自 *Abhidhanarājendna* 的一则引文表明这两个月实际上是指 *Āryāśadha*^⑧。

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注意到科诺和各类论据的进展很重要,从这些论据中似乎看出,但叉始罗银卷轴上的铭文 *mahārāja rājativāja devaputra Kuṣāna* 是丘就却 (*Kujūla Kadphises*)。如果根据超日纪元计算年代的话,这段时间源于公元 79 年;如果人们接受丘就却在公元 79 年仍在其位的话,那么,始于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就是由迦腻色迦所创立,而迦腻色迦又成了其子的继承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 187 的迦德菲斯铭文外,其中可能提及阎膏珍,根据超日纪元来计算,年代应始于公元 130 年(科诺在 964 页写为公元 139,但这肯定是个错误),以便迦腻色迦统治的始点和他及其继承者所使用的纪元起点晚于公元 130 年。(始于)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按科诺的意思,是由阎膏珍所引进的,当时他征服了马尔瓦人,由他的当地总督西郡太守 (*Western Ksatrapas*) 管理。

除此之外,科诺的观点是,在部分较古老的迦逻西蒂文铭文中,使用的是公元前 150 年的旧塞种纪元;在另一部分铭文中,使

用的是公元前 57 年的超日纪元；较晚的迦逻西蒂铭文使用的是迦腻色迦纪元，它始于公元 130 年以后。较晚的铭文中的最后一组相当容易和其他区分开来，因为在它们的内容里，它们经常提到迦腻色迦王朝中的一个王族。使用超日纪元较古老一组的铭文和被认为使用旧塞种纪元的铭文二者的区别不清楚。科诺对此也不清楚。根据科诺的观点，这区别更多依赖于这样的事实：铭文内在的证据是否更适合于一个纪元而不是另一个纪元。

在接下来的 1933 年，他出版了一份关于该主题的研究，题目是《印度—斯基泰年表注》(Notes on Indo-Scythian Chronology)⁶⁵。在该研究中，对旧塞种时代的纪元他取公元前 2 世纪中期，即公元前 145 年⁶⁶，同时他接受公元 128/129 年作为迦腻色迦统治的始点⁶⁷。

一年以后的 1934 年，《克·比·帕萨克纪念卷》⁶⁸上登了一篇文章，在该文中，科诺先前认为旧塞种纪元的始点是公元前 84 年的假设变得引人注目。该文在付印前大概已搁置相当长一段时间，同时因 1932 年卡拉万的发现及其铜盘的刊布而被取代。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科诺回到他 1929 年的观点了。

1937 年，马嘉姆达刊布了一则铭文，这是他在查萨达发现的，铭文的年代始于 303 年，纪元不明⁶⁹。后来，科诺又仔细地考察了该铭文⁷⁰，他的看法各方面都和马嘉姆达不一样。关于 303 的年代，科诺在文章中加了一则注释，他宣称，在他看来，这些分别为 318 年、359 年、384 年、399 年和 299 年的出自罗里延·唐盖、迦玛尔嘎里、哈什特纳嘎尔、斯卡拉·德里和秣菟罗(路德斯表第 78)的铭文，根据其年代上的高位数字来看，它们所使用的纪元和查萨达铭文的一样。

科诺继续道：“考虑到上面讨论的查萨达和秣菟罗铭文中所用的纪元，我认为我们可以可靠地假定一个纪元，它和创立于公元前 249 年—公元前 248 年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相一致。同时我也认为我们也有另一个大约始于公元前 90 年的帕提亚纪元

的踪迹。这样接下来是著名的超日纪元、塞种纪元和迦腻色迦纪元。就目前的联系而言,再往后的推算引不起我们的兴趣^①”。

因此,关于 83 年或 150 年旧塞种纪元之说被科诺置之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帕提亚纪元,较古老一个始于公元前 249 年~公元前 248 年,较晚的一个始于公元前 90 年,这些最后显然“由于需要”而被仔细地考虑过了,因为关于帕提喀的咀叉始罗铜盘的纪元使科诺不知所措。

而且,还不清楚科诺认为这一旧的帕提亚纪元是开始于公元前 245 年、公元前 249 年呢,或者认为是开始于公元前 259 年。在他文章的第 115 页,他把公元 249 年作为始点;在第 116 页的第 16 行他也提及公元前 249 年;但是接下来的计算中,他全部把公元前 259 年作为该纪元的起点,这一点他实际上在第 27 行提到^②。在近期的文章中,科诺以公元前 245 年做该纪元的始点^③。

最后,在 1947 年 2 月 3 日的一次讨论会上,科诺教授本人亲自告知我们,他现在把迦腻色迦纪元的起点定在公元 138 年;当瓦苏拉(Vasulā)铭文^④问题摆在他面前后,他进一步提出存在一个第 7 个纪元,它始于公元 1 世纪。

最近,科诺的一篇文章发表,他对迦腻色迦又得出一个年代,即公元 200 年前后^⑤。

科诺被迫不断改变他的观点。因为不时会有和他观点不一致的论点出现,这种情况的确最清楚地证明我们把迦腻色迦确定到如此晚的年代显然偏离正途。而且,按科诺的观点,迦腻色迦就因而成为韦苏提婆(Vāsudeva)的继承人。从所有可得到的风格的、历史的以及铭文的信息来看,这是决不可能的。

按科诺的观点,在公元前 1 世纪和公元 1 世纪间使用了 7 个纪元,即,旧帕提亚纪元、新帕提亚纪元、超日纪元、阿泽斯纪元、始于公元 50 年的纪元、塞种纪元和迦腻色迦纪元。

这 7 个纪元怎样使事情变得特别复杂,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清楚的。这几个纪元中的某几个同时并用,而且当有人需要决定某个铭文肯定属于7个中哪个纪元时,任意的成份就增大了。

在科诺所接受的7个编年表系中,我们现在首先要决定其中哪个能被认作可能已用于迦罗逻西蒂文和婆罗迷文(Brahmī)铭文中了。

我们要划掉始于约公元50年的这个纪元,因为当我们向他提出瓦苏拉铭文问题时,科诺“由于需要”采用了那个纪元。我们会同样处理科诺因坦叉始罗铜盘所提出的后来的帕提亚纪元,而他在其他方面无法解释它。因为一则铭文就设定一个另外的未知纪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⑥。在《印度铭文汇编》中,科诺正确地把坦叉始罗铭文划归到旧的塞种纪元,托马斯(Thomas)对《印度铭文汇编》评论时就这一点强调道:“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批非官方的文件,……使用出自这批数字中的材料肯定是一个纪元……。在这方面甚至帕提喀的坦叉始罗铭文也决不例外^⑦。”在我们看来,从铭文本身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要比发明一个新纪元并把这个第7个纪元加到业已假定的纪元中去要好。为和弗里特保持一致,我们因此建议托马斯和加雅斯瓦尔不要把坦叉始罗铭文中的帕提喀和狮柱上提及的那个人等同,加亚斯瓦建议 Patika Mevaki,第二个名字可能在秣菟罗的一个总督上的铭文中提到^⑧。

至于公元前7年~公元前6年的阿泽斯纪元,我们重述我们反对“由于需要”发明一个纪元的意见。所提及的三个纪元基本为假设性的,仅仅涉及到一则铭文。

超日纪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先验的”,一个非常冒险的假设,因为我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塞种人使用一个由 Gautamīputra Śātakarnī 打败他们后建立的纪元^⑨。托马斯谈到科诺这一假设时说:“参照这个时代,古达法拉(Gudaphara)铭文(该铭文出自塔克提-伊-巴喜附近)应是最后一个依据^⑩。在我们看来,这比超日纪元参照索达萨铭文更不可能。根据索达萨的钱币和铭

文判断,他显然是早期的前贵霜太守之一,太守使他们所有的铭文都显出旧纪元的特征^①。科诺本人在谈及超日纪元时说:“这一纪元对印度来说和塞种人征服的概念联系得过于紧密,而据说在印度西北部塞种人的这一纪元刚刚形成,这在我们看来似乎的确是不可能的。”^②早些时候,克尔霍恩(Kielhom)已经指出,使用超日纪元在时间上限于公元1300年前,在地域上限于由一想象的界线限定的地区:即沿着纳巴德(Narbada),经过伽耶(Gaya)和德里(Delhi),到库奇(Cutch)的茹恩(Runn),折回到海岸线^③。最后托马斯重申道:“……如果没有违反每种可能的结果,我们不能承认超日纪元^④”。

除了两郡太守的铭文外,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任何带低数字的,其年代属于公元78年塞种纪元的铭文。

所以存在公元前249/248年或者公元前259/258年的古代帕提亚纪元——科诺较早期的假设是公元前150年和公元前80年的旧塞种纪元,他假定它为带有其日期的大数字303年-309年的系列铭文的。关于存在一个帕提亚纪元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想引用科诺较早时候的话,这些话我们完全同意,他说“应该牢记的是印度塞种帝国是帕提亚帝国削弱的结果,……并且,后者(即塞种人)在此事件后几乎不可能仍沿用帕提亚纪元。而且,帕提亚统治者自己普遍在其钱币上使用塞琉西纪元,帕提亚纪元在公元前38年只是偶尔和零散地出现,而只有从公元41年起才是有规律地出现^⑤”。

根据我们的观点,最后的论据非常显然地驳斥了科诺所认为的塞种人在公元前201年^⑥就已经普遍使用此纪元的可能性,因为帕提亚人在公元开始之后才正式使用该纪元^⑦。

当寻求使用在这一系列铭文中的纪元时,学者们是按照有两个或更多纪元的原则不断进行的;一个是系列的迦腻色迦王朝,一个是针对自303-399的那套铭文,可能有时还有一个或者更多的

是针对几则较古老的迦逻西蒂文铭文,在解释迦腻色迦纪元和自公元 303 ~ 399 年系列铭文相对应的纪元的关系时,有三种可能性:1. 303 ~ 399 年间的铭文全部或者部分重叠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铭文所延续的那个世纪;2. 迦腻色迦后 303 ~ 399 年间的系列;3. 该系列在迦腻色迦时代之前。

第一种可能性总的说来可以忽略,因为关于纪元重叠的论据被正确地判定是靠不住的。例如考德林顿(Codrington)说:“在同一地方同一时代使用两个纪元是不可能的。”^⑧科诺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不反对这样的重叠。

只能在剩下的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了,那些专注于那套带有高位数字年代铭文纪元的大多数作者,开始声明,在那些铭文中,有几个雕刻因其格外漂亮而证明它们是属于印度西北部艺术繁荣期的。我们对此声明没有异议,虽然根据我们的主张,除非基于坚实的证据或事实之上,审美性的论据宁可不用。

可从这一假设着手:犍陀罗艺术在迦腻色迦统治下达到其顶峰;或者,如沃格尔(Vogel)和其他人所认为的,犍陀罗艺术在迦腻色迦统治前就开始退化了^⑨。从沙-基-科德里的圣骨箱判断,人们不能把那些带有高位数字日期的雕刻放到迦腻色迦王朝之后,就是说,不能放在迦腻色迦王朝后 100 年,犍陀罗艺术在其统治期内已经开始退化了。结果可总结为出自 303 ~ 399 年间的系列铭文的年代应定在迦腻色迦王朝开始之前。

接下来,各种各样的纪元都被接受下来,它们始自如此遥远的时代,以致 387 年和 399 年出现在迦腻色迦登基之前(带有 387 和 399 这最后年代的造像似乎确实如迦腻色迦圣骨盒所意味的那样,表明了犍陀罗艺术有退化的迹象),这经常是人们接受所有那些古代纪元的原因(诸如:孔雀王朝,塞琉西,旧塞种,旧帕提亚)。弗里特在评论其中一个假设时曾说:“在此建议里,我们可简单地提出另一种情况,一种几乎莫名其妙的愿望,总是发现一些新

的估计,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是一种国外的时代^⑩”。

客观地看待此事而不是加入到毫无理由的推测中去,对我们来说似乎更好。通过约翰·马歇尔爵士对咀叉始罗的发掘物判断,我们可以把对那些技艺极高的雕刻品定在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的担心置之一旁,约翰·马歇尔爵士的确已经很清楚地指出造型技术在印度西北部甚至保存到公元 5 世纪。

为标有日期的印度西北部艺术寻找年代似乎全无道理,和比玛兰的圣骨盒进行风格上的比较,正如巴赫霍夫试图作的那样,自从仔细的考虑以后,就这一圣骨盒的年代,我们并不能确定地谈论什么。我们也否认沙-吉-德里圣骨箱可当作迦腻色迦统治下艺术退化的明确证据。这种审美性的观察通常是非常危险的,一些看作接近退化期特征的东西,其他人则把它们描述为原始性^⑪。

最后,在我们看来,最后的、同时又是决定性的证据,即 303 ~ 399 年间的铭文必须被放在迦腻色迦王朝之后的证据可罗列如下:出自西尔盖普的、由约翰·马歇尔爵士刊布出的发现物的整个清单里,没发现一座佛像,甚至没发现一个属于佛陀的头像。至此,如我们在第 7 章里会看到的那样,该镇可能在丘就却之后就遭毁灭,此后西尔苏克(Sirsukh)得以建立。考虑到西尔盖普没有佛陀像,此地当时肯定仍由丘就却居住,他几乎是迦腻色迦最近的前辈,没有一个理由可假定在 303 ~ 399 年间的系列雕像是在迦腻色迦之前制作的,或者把犍陀罗艺术的繁荣期或者退化期划到迦腻色迦统治期,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些带有高位数字的铭文放在迦腻色迦王朝之后^⑫。为了对我们在第二章里所讨论的作出预测,我们补充认为,印度西北部标有年代的雕刻就风格而言似乎属于公元 2 世纪或 3 世纪。因此我们在该例中可以看到历史和艺术形式互为印证。

就我们所知,迦腻色迦纪元在印度西北部的使用不会长于公元 98 年,因此出自 303 ~ 399 年间的系列铭文开始于韦苏提婆死

后不久是有道理的,甚至可能始于他统治的最后几年。

我们同意科诺的观点,即认为秣菟罗铭文(路德斯清单第 78)使用的纪元和出自罗里延·唐盖、斯卡拉·德里、加玛尔噶里、哈什特纳噶和查萨达铭文使用的一样;为预测我们的论证,即秣菟罗(路德斯清单第 78)使用的纪元和年代较早的其他迦罗西蒂文铭文使用的一样^⑨,现在我们声明我们仅能做的事情是接受如下事实:带有高位数字的铭文使用的纪元和较早的迦罗西蒂文铭文使用的一样。

所有出自印度西北部铭文的纪元,除了注明是迦腻色迦纪元的那些以外,都是出自一个相同的纪元,这么简单的结论为什么从未得到接受?其原因是担心导致这样直接的结论,即:这样的话,出自罗里延·唐盖、迦玛尔噶里和哈什特纳噶的非常著名的印度西北部雕像会因此大大晚于公元前 1 世纪,或者,甚至迟于公元 1 世纪。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结论,所有说明这些铭文的单独纪元连同其混乱的结果均被接受下来了;在其他人中,还有科诺的帕提亚纪元。

对我们来说,似乎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由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发布的婆罗迷文和迦罗西蒂文书写的铭文接受一个单独的纪元;还要接受另一个纪元,以满足所有其他迦罗西蒂铭文,出自秣菟罗的 72 年和 299 年的婆罗迷文铭文也包括在内,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出现。

科诺心中一直记着这种两个纪元的方案,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但是,他又不停地增加其他纪元,接受这些纪元是针对那些年代排列困难的特殊铭文的。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本末倒置。在一长串铭文中,所有都可以参照一个同样的纪元,突然出现一则例外的铭文,就采用一个全新的纪元,或者一个全新的纪元仅用于一则铭文,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在我们看来,把这种做法颠倒过来则是更正确的。一旦遇到一则困难的铭文,要从这则铭文本身寻求

解决办法,而不是再进行假设,再假定新的纪元。而且,这将最终意味着将存在这样几个时期,其中同时使用两个或者甚至更多的纪元的情况。而且,显然态度是非常任意的,有时一则铭文只用于一个纪元,有时则用于另一个纪元。这是最不恰当的。人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新的纪年系统被引入后的最初时间里,旧的纪元仍和新的并用,但是人们不能承认这种情况能持续一个世纪之久。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确定旧纪元起点的可能性。此一被寻找的纪元为月支(Yüeh - chih)和塞人所用,因此,一个对这些民族重要的事件必须作为其起点。

我们所知道的旧迦逻西蒂铭文纪元的最早年代是麦拉铭文中的 58 年,从该年以后,我们拥有该纪元中注明年代的相当连续的文献链。正在讨论的这一纪元的 58 年前不久斯基泰人侵入印度,这一推断因此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无法解释在该年以前缺乏其他总体年代。因此,导致一个新纪元建立的重要事件肯定发生在印度以外。

在科诺所推测的把公元前 150 年作为旧塞种纪元起点这一短暂时期内,他推断建立该纪元的动机是和帕提亚人竞争:“斯特拉伯(Strabo)明确地告诉我们,帕提亚人以武力对斯基泰人施加影响,如果塞种纪元是在公元前 150 年左右建立的话,那么它肯定是在和帕提亚人的这些战斗中发生的”^⑧。稍后我们还要转到斯特拉伯的话上来。当斯基泰人处在一个不断受到帕提亚人威胁的时期,斯基泰人建立自己的纪元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斯基泰人战胜帕提亚人,以此获胜之日作为起点,建立一个纪元是非常可能的。《后汉书》是范曄根据班勇的叙述写成的,在《后汉书》中可以读到以下信息,不同于先前诸如《前汉书》中较古老的叙述。“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盼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属宾。丘就却年八十余岁，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⑤”。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接受此处所提及的两个贵霜王朝丘就却（Chiu - chiu - chio）和阎膏珍（Yen - kaochen）就是 Kujūla Kadphises 及 Wima Kadphises^⑥。现在我们掌握一则出自塔克提 - 伊 - 巴喜的铭文，其上提到所推测的丘就却。为纪念救星米拉（Mira the saviour）及王子卡帕（Prince Kapa），巴拉萨米（Balasami）或巴拉斯瓦米恩（Balasvāmin?）及儿女一道在此建了一座小教堂。原文中王子一词是 erihuna，这是一个老的塞种词，其梵文的对应词为 Kumāra。科诺已经表明^⑦年轻的贵霜王子肯定毫无疑问是丘就却，据这则铭文的构词来判断，对我们而言这似乎是有道理的。正如考古发现所表明的那样，他是在印度 - 帕提亚王冈多法内斯^⑧后取得统治的，印度 - 帕提亚王冈多法内斯在塔克提 - 伊 - 巴喜的铭文中也被提及。拉普森对科诺的这种释读抱有疑惑^⑨，但是即使他是正确的，那么下面这些事实仍指出丘就却统治的起点大约是旧纪元的第 100 年。

《后汉书》说：“丘就却年八十余岁，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等等。由这则信息及钱币判定，阎膏珍肯定已经统治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他统治后，钱币上和一则身居高位人的铭文上还提及一个名字，该人据推断是他的一位亲戚吉霍尼迦，又名 Zeionises，作为总督的他铸钱币；而且他在阎膏珍死后可能还统治过该王国，尽管统治的可能只是该国的一部分^⑩。八九十岁的丘就却的统治，连同他儿子阎膏珍的统治，以及吉霍尼迦可能的短暂统治，所有加起来持续了约 100 年。这是为《王事书》

(Purānas) 所证实的。这些使月支王朝出现不同的数字,以及诸王统治总年数也产生了不同的数字。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这些资料似乎基于两个形式出现:

1) 13 或 14 个君主,统治了 104 年半,或者 199 年;

2) 10 或 11 个君王,统治了 103 年,或者 199 年^⑩。

显然这些形式代表两种不同的传统。94 年半或 96 年的误差当然须在君主数的误差中寻找,君主数的误差可能是 3 个(13 - 10, 或者 14 - 11)。这三位君主在印度编年表中常常没被包括在 Tukhāra 君主的总数中,他们无疑是迦德菲斯王,《王事书》在这方面进一步为我们证明了君主的误差数量的确是 3 个的事实。

加雅斯瓦尔注意到两则西方材料,它们也再次证明了上述事实^⑪。穆吉玛尔 - 乌特·塔瓦里克 (Mujmal - ut Tawārikh) 根据印度方面的材料认为和印度历史有关,他告诉我们 Kafand 王 (= 丘就却) 有一个儿子 Ayand (阎膏珍), 他的儿子 Rasal 被某位印度王驱逐^⑫。不过这仍含糊不明,在此我们还用 3 个君主的误差数。在《Ferishta 的历史导言》中,该故事讲得更清楚。在该书中,据称 Kishan (贵霜) 王有个儿子,即 Mahārāji 王,他的侄子 Kaid Rāj^⑬ 继位。在我们看来,这最后一则资料特别值得相信,因为它记载着最后两个王作为叔侄的家庭关系,这一点被 191 年的迦逻西蒂铭文所证实。

不过让我们仍回正题上来,我们已经看到迦德菲斯 (Kadphis-es) 诸王及吉霍尼迦统治时间加起来持续也不到 100 年。现在,我们会进一步看到^⑭, 迦腻色迦在旧纪元 200 年后某几年内登上王位(当我们陈述这一点时,旧纪元 200 年这一年和基督纪元的哪一年对应并没关系)。结果,丘就却大约在旧纪元 200 年肯定开始了其统治,减去约 100 年约等于旧纪元的 100 年。我们因此看到这一计算和塔克提 - 伊 - 巴喜铭文一致,和中文资料也相符。

还有另一个论据是关于出自卡拉特斯 (Khalatse) 187 年的铭

文,托马斯^⑩和拉普森^⑪表示他们对科诺释读的皇族名字“Uvimakavthisa”有疑问。在他发表于《东方资料实录》最后一组文章的一篇中^⑫,根据我们的看法,科诺消除了这一疑问,所以无需进一步讨论,我们能接受他的释读,在此处推测阎膏珍被提及。187年这一年作为阎膏珍统治中的一年非常适合;如果我们假定他八九十岁的父亲登上王位,那么大约在100年这一年,当时他尚是位年轻的王子。那么,按照事物正常的规律,我们也能推测出阎膏珍在187年后并没能统治多久。

提出丘就却在当时使用的纪元的100年左右开始其统治的观点因此有不同的争论。

接下来是重要的信息,其中《后汉书》中说,丘就却取得了统治其他四部翎侯权,并开始了其伟大的事业,此时是在月氏征服大夏后100余年。有些学者认为把大夏划分为5部翎侯发生在大月氏征服该国很久以后,而且所提及的100年应该是从大夏分作5部翎侯开始时算起,而不是从征服大夏之时计算的^⑬。不过,对事情来龙去脉的这种解释似乎是牵强附会的。《后汉书》追溯的是《前汉书》,如果我们查一下《前汉书》中的有关段落,不止一个原因表明大夏分为五部翎侯前大月氏并没有征服该国。相反,认为他们控制该国后立即把大夏分为五部翎侯则是很自然的。列维(Lévi)、哈里(Hari)、查然(Charan)、高什(Ghosh)和加雅斯瓦尔^⑭以同样的方式解释了该段文字,后来,哈楼恩(Haloun)^⑮又解释了该段落,结果他把丘就却放在约公元前20年,这一年代我们能够赞成。值得注意的是加雅斯瓦尔沿着另一条和我们不同的但却非常合适的论证路线,也推出同一日期。从这一对大夏征服的有力记录来看,这一事实即使在中国人眼里看来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把这两则资料联系起来看,我们被迫得出这种结论:月氏所用的这一纪元的起点肯定是他们征服大夏(或者,某一重要事件刚好

发生在此年征服大夏之前或者之后)。有关认为中国人创造了这个长达 100 年的时期的说法是无法接受的,即使此期可能多几年或少几年。我们在该汉文资料中甚至可能看到一种传统的回声,它容易为斯基泰人记住,因为他们是从此次征服之时计算起。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约 100 年,该族开始其第二个繁荣期。

月氏(其中也有塞种人)对大夏的这次征服发生在什么时间?在此,同样又是准确的汉文资料帮助了我们。虽然它们没有写出征服大夏的年份,但是从它们对这些西域人的描述上,我们能重建一些事实。因此,从这些汉文原始材料中我们一定能勾勒出这一远古游牧民族的历史。

月氏原居于大碛(Gobi)西南部(甘肃省西南,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⑧。在公元前 2 世纪的头 25 年里,冒顿(Mao - tun)(公元前 ± 209 ~ 公元前 ± 174 年)是匈奴的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屠杀邻国人民而扩大其王国领地,所以月氏人在公元前 177 ~ 公元前 176 年也为他们征服。在其继承者老上(Lao - shang)(约公元前 174 ~ 公元前 160 年)统治时,匈奴和月氏进行了血腥的斗争,最后老上为匈奴所杀。

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及月氏时说:“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⑨”。

这迫使月氏远离故土。其中一小批离开后逃到西藏东北诸山中,即保南山(the Ríchtshofen range),在以后汉文资料中他们一直被称为小月氏(the Little Yüeh - chih)^⑩。其中大批月氏在此后的汉语文献中被称作大月氏(Ta - Yüeh - chih = the Great Yüeh - chih),向西远去,至北天山,伊犁河上游楚河(Chu)和那林(Naryn)之间,打败塞人(the Sai)。塞人是伊朗人(Iranian)(斯基泰人,Scythian)的概称,在波斯文献中被称为 Sakas,在印度文献中被称作 Śakas。塞人有几个部落,塞人有时被称作塞王(Sai - wang)^⑪,被驱向南方^⑫,

其余的根据《前汉书》的记载则被同化到大月氏中去了^⑩。

但是,大月氏并没享受很长的太平生活,因为另一族乌孙(the Wu-sun),又攻击大月氏,把其中一部分又赶往西方,一部分连同被同化的塞种人则为乌孙征服。《前汉书》详细描述了乌孙和大月氏先前是如何互相攻伐的,乌孙的统治者是缘何死亡的。他的新出生的儿子由他的卫士带至匈奴,并由匈奴王悉心抚养大。长大后,这孩子因军功而闻名。成年后,他父亲先前的臣民又归于他的统治下。昆莫(the K'un-mo)(乌孙王的王号)此时请求为其父报仇,获准向西迁徙,并“击败大月氏,大月氏复西徙,居于大夏之地。昆莫控制了此地的多数人,并在该地居住下来,在此他逐渐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⑪”。

那些大月氏人又继续向西迁移,最后来到其邻国大夏,即 Bactria^⑫并且控制了大夏,但是塞王南下,控制了罽宾(Chi-pin)^⑬。中国使者张骞受命联合大月氏,可能于公元前 129 年到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控制了大夏。

在《前汉书》中,班固叙述了月氏的迁徙情况,“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⑭”。

汉文资料表明,月氏的迁徙可分为两个阶段:1. 他们被匈奴逐出,从原居住地远征到天山北部;2. 遭受乌孙攻击后,从天山北部迁至大夏。

三位日本学者致力于月氏迁徙发生时间问题的研究^⑮。最后,这些资料又被哈楼恩^⑯加以考察,他得出结论是桑原实造和安间矢一郎的观点正确,对此他又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论据。月氏的首次迁徙期,即从甘肃西迁到伊犁河上游的时间为公元前 172 年~公元前 161 年之间;第二阶段,即从伊犁河上游迁至阿姆河(the Amu-Darya)流域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133 年~公元前 129 年之间。

从公元前 129 年至公元前 128 年,张骞居留在月氏^⑧,他描述大月氏已控制了大夏。所以,推测起来大月氏征服大夏肯定是公元前 128 年他离开大月氏前的事。藤田丰桥认为大月氏征服大夏在公元前 160 年即已发生,科诺同意此观点^⑨。该观点是缘于对一则资料的误读,该段资料被叙述为乌孙进攻月氏刚好发生在老上单于去世之时,即公元前 160 年。据哈楼恩称^⑩,该段文字正确释读应为“刚好为单于去世之时”,这并不能表示是老上单于。

而且,当我们考虑提及乌孙对大月氏复仇性进攻的那段资料时,好象发生在公元前 172 年~公元前 167 年的大月氏对乌孙的战争及乌孙新主子成年后乌孙对大月氏的复仇间,其间最少已过去了 20 年。那么,这就使复仇战争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160 年。

这一点及其他论据,即,哈楼恩、桑原实造和安间矢一郎的论述,对我们而言似乎已足够证明汉文文献的确表明在大约公元前 129 年月氏对大夏进行过一次征伐。而且稍后我们也将看到西方资料也记载了那年的这次征伐。所以我们可以把旧的纪元定于约公元前 129 年。

当然,总有学者想回避这些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们声称关于丘就却统治的起点,《后汉书》中的信息不足为凭。但是,即使有人能避开旧纪元开始于公元前 129 年的结论,仍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列举出。而且,回避对大夏的征服是斯基泰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的结论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不同的汉文资料对它的记录,这些资料只是局限于对西域历史进程中最重要事件的记录;再者,就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在此次征服之前或者之后还没有一个单一的事实能够有理由或机会建立一个新纪元。在公元前 129 年,这些人尚是游牧者^⑪,公元前 129 年之后,战争的命运逆转,在密特拉德(Mithradates)二世(公元前 124 年~公元前 88 年)统治的整个时期,斯基泰人不停地被帕提亚人驱逐出来。这的确不是建立他们自己纪元恰当的时候,并以此表明其独立,或者甚至表明一个值

得纪念的胜利,或者建立一个王国。

联系到侵入印度西北部那批人的第一则铭文的年代最早只能在公元前 25 年,因此,要把此纪元的始点推进到我们纪年系统的开始是不可能的;根据科诺的意见,甚至连密特拉二世后,即公元前 84 年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在公元开始的前后,肯定是莫俄斯(Maues)统治。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和赫弥乌斯·左伊拉斯(Hermaeus Zoilus)及尼塞阿斯(Niceas)的钱币相比,他的钱币的风格和字体要远远胜出^⑭。而且,统治印度的最后的希腊诸王在莫俄斯后肯定统治了 3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此时代毫无疑问在密特拉德二世于公元前 124 年登基前肯定就已经开始。

显然这一最后年代接近公元前 129 年,这一时期我们已从所有不同的资料中推测出,并指出作为旧纪元的起点。

另一方面,现在当我们就这一纪元追溯西方资料时,我们发现它们的确令人惊奇地和我们从汉文资料中获得的信息情况一致。如加斯蒂纳斯(Justinus)受特罗哥斯(Trogus)的鼓励所说的那样,大夏的原主人,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受粟特人(Sogdians)、德兰吉亚那(Drangae)和印度人等的进攻,最后被帕提亚人逐出^⑮。

从加斯蒂纳斯论述中我们进一步得知,帕提亚王国在密特拉德一世时(约公元前 171 年~公元前 138 年)大为扩展,以致于其边界甚至从幼发拉底河到兴都库什山^⑯。但是,此时帕提亚遭遇晦运,密特拉德一世的继承者弗拉奥提斯弗拉奥提斯(Phraates)一世(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128 年)卷入一场对叙利亚的战争,最后请求斯基泰人支援,斯基泰人是一个强大的马背上的民族,它在这场斗争中可为决定性的因素。不过,密特拉德一世拒绝为他们付酬谢时,他们便反叛起来,谋杀了费拉斯奥提斯一世^⑰,捣毁了整个帕提亚,然后返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弗拉奥提斯二世的叔父阿尔达班努斯(Artabanus)(公元前 128 年~公元前 123 年),他

同时继承了其侄子的王位,但他同样不走运,因为在对斯基泰人的一场新的战争中,他也死于战场。加斯蒂纳斯对此曾有过论述。^⑭

阿尔达班努斯的儿子密特拉德二世(公元前 124/3 年 ~ 公元前 88 年),绰号“伟大”,能够重建帕提亚王国,并使之大为扩展。如果我们考察西方学者的这一信息,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和中国人告诉我们的完全吻合,不过让我们先看看科诺关于此期是怎样说的。

正如前面所述,科诺的观点是月氏大约在公元前 160 年征服大夏^⑮。这是相当不可能的,因为,这一事件应该发生在强大的帕提亚君主密特拉德一世统治期间,我们上面从加斯蒂纳斯处得知密特拉德一世已经把他的王国的边界扩展到兴都库什山。这和我们刚才引述的加斯蒂纳斯的另一则论述一致,即当大夏被斯基泰人和其他民族削弱(而不是征服)后,帕提亚人征服了大夏。斯特拉伯(Strabo)也提及帕提亚人征服部分大夏人:希腊人刚刚从 Aspioi 和 Turiuan 人手中夺取它并将它分为州区,帕提亚人就从欧克拉提德斯人手中夺取了它^⑯。

因此,我们看到不同作者彼此之间并不矛盾。

为了证明斯基泰人首先占有大夏,密特拉德一世随后从斯基泰人手中夺取大夏的观点,科诺^⑰引述了斯特拉伯的另一段论述,斯特拉伯在此段中述及帕提亚人:起初,它没有力量同这些占领此地的人作战,它的继承者们亦如此,不过,此后以战争夺得附近的领土,以至占领了幼发拉底河。他们战胜斯基泰人,夺得巴克特里亚一部分,就像以前欧克拉提德斯是一样^⑱。

当把斯特拉伯的话(正如科诺所希望的那样)用于密特拉德密特拉德一世时,人们的确得到这样的印象:密特拉德一世从斯基泰人手中取得大夏,而斯基泰人是在公元前 138 年从希腊化时代的君主手中取得大夏后并占有了该地。

从前面可以总结出,科诺把密特拉德一世继承者弗拉奥提斯

二世治下的这段插曲,按加斯蒂纳斯的描述,看作是斯基泰人对先前属于他们的领土的再征服,或者看作是大夏对帕提亚人的一种远征,此时大夏已经又落入月氏之手,尽管在加斯蒂纳斯和斯特拉伯的叙述中如此,但是帕提亚人已经征服了它。

如我们所见,科诺从斯特拉伯引文(11:9.2; C. 515,他提出作为论据)中得出这些结论,似乎是错的,而且加斯蒂纳斯(41,6)和斯特拉伯(11.11.2, C516 - 517)清楚述及帕提亚人对希腊化领土的征服。即使假设月氏人早在公元前 160 年就已经渗透到西方,那么认为他们在公元前 160 年已经夺去诸如大夏密特拉德一世的权位是绝对不可能的^⑧。奥罗西斯(Orosius)和加斯蒂纳斯所确定的那位君主,其王国扩展到兴都库什山(据奥罗西斯的观点,甚至扩展到印度河^⑨),他不会容忍大夏遭到劫掠;相反,毫无疑问正是这位君主是斯特拉伯和特罗格斯·鲍姆培斯(Trogus Pompeius)报告中的主题;加斯蒂纳斯也接过报道,他们说希腊化的大夏诸君主在对粟特那、德兰吉亚那和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后,最终被帕提亚人驱逐出大夏。

而且,帕提亚人打败欧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是在公元前 159 年,所以斯特拉伯谈到斯基泰人的进攻只能发生在那年以后。或许甚至正在提及的关于欧克拉提德斯和公元前 141 年密特拉德一世打败海里奥克莱斯(Heliocles)有关。费拉斯奥提斯二世是密特拉德的继承人,他在对叙利亚人的战争中曾请求斯基泰人(月氏人)援助,他们显然这样做了,因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的斯基泰人有一段时间曾是他的邻居,而且他也还没有和他们斗争的经验。如果他曾请求斯基泰人帮助,那么他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正如科诺所认为的那样,费拉斯奥提斯二世的父亲费尽周折才把他们驱逐出大夏。所以,正是在费拉斯奥提斯二世的统治下,月氏人第一次横穿过当时统治着大夏在内的帕提亚王国边界。然后便有了拒付报酬的插曲,才有公元前 128 年费拉斯奥提斯之死,才有帕提亚的

废弃,才有斯基泰人撤回其本土;而且还可能通过劫掠性的征服,斯基泰人们奴役着大夏的农村居民,因为中国使者张骞把他们描述为大夏的地主和主人,而他们的王庭设在乌浒河(the Oxus)的另一边,即他们由此南下的地方,这和加斯蒂纳斯所报告的一致。

阿尔达班努斯显然想进一步重新获得大夏,它是在其父时即已属于帕提亚王国,但是,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在一场战斗中路臂负伤,于公元前 124 年死去。但此时,幸运之神又青睐帕提亚,在新国王密特拉德二世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一个繁荣期。这个国王能抵挡住斯基泰人的危险,显然他一直把他们驱逐走,还征服了他们中的一部分。我们想到斯特拉伯(11,9,2;C515)的一段话正是指的这位君主,而科诺则错误地把它提出来作为密特拉德一世征服大夏和驱逐斯基泰人的一个证据。在我们看来,该句子因此可作如下理解:“他们(即密特拉德二世统治下的帕提亚人)也夺取大夏的一部分,”迫使斯基泰人,及更早的欧克拉提德斯及其追随者向他们投降(即,在密特拉德一世时)。

塔恩^⑨很清楚地解释了大夏的最后国王海里奥克来斯在公元前 141 年是如何被密特拉德一世打败的。根据拉普森的观点,此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135 年^⑩,因此在此时间前斯基泰人不可能已经征服大夏,也不可能使得帕提亚人在密特拉德一世统治下把大夏人从斯基泰人手中夺走。

出自加斯蒂纳斯的这段话:“*Saraucae et Asiani Bactra occupavere et Sogdianos*^⑪”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因为,虽然一段时间内,对不同的斯基泰族属的特征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是,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则一致认为月氏是吐火罗人(Tocharians);阿色尼(Asiani)又名阿希(Asii),是月氏,或者至少是他们的统治阶层,所以从加斯蒂纳斯提到的阿色尼中可知,密特拉德一世统治的帕提亚王国扩展以前,大夏并未被斯基泰人征服。在科诺看来,而是在此后,当月氏也已经迁抵更西边的地区时。科诺认为斯基泰人早先已经征服了

大夏,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根据斯特拉伯的以下论述而来的:游牧民族的情况是,希腊人退出巴克特里亚后,Asioi、Pasinoi、Tochapoi 和 Sakapauloi 分布在药杀河(Yaxartes)彼岸,处在塞种人和粟特人以下。塞种人控制着药杀河。^⑭

斯特拉伯清楚地说明了 Asioi 等从希腊人手中取得大夏。此事在公元前 160 年前后是不会发生的,或至少在密特拉德一世扩张前是不会发生的,这从提及 Asioi 中又清楚地表现出,因此斯特拉伯一定是指公元前 141 年以后的一件事。不过塔恩^⑮和赫尔曼^⑯都提出斯特拉伯肯定是指公元前 7 世纪的事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不同的斯基泰人的名字只是他从 Appollodorus 那儿简单地移接过来的,毫无疑问 Appollodorus 在此是斯特拉伯材料之源。

塔恩说:“我已讲过张骞(Chang - K' ien)很清楚对大夏(巴克特里亚本土)的征服是月氏人干的。但是,就我所知,几乎每一个现代作者都认为这次征服是由被月氏驱向南方的‘塞种人’(‘Sacae’)干的,并认定月氏人驱逐他们,或者征服他们以前,塞种人已占据在这儿。张骞到那儿时,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丝毫证据存在;此论是由对斯特拉伯一段简单文字的误解产生的,多年来一个作者只是简单地从另一个作者处传抄,直到它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思想。‘塞种’(‘Saca’)的每种形式——萨迦诺卡伊(Sacarauae)、塞王(Sai - wang)、甚至吐火罗(Tochari)——都被迫使用,这种信念所产生的理论在模糊这段历史方面的作用胜过一切。当然斯特拉伯说塞种人占据大夏;但是,只要粗略地读一下这段文字就会明白所谈及的整个时段不是公元前 2 世纪,而是此前的一段漫长时间——他称之为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但是实际上是第 7 世纪——伟大的塞种人入侵的时间,从亚述人的(Asyrian)资料中可以很好地获知,它在尼尼韦人(Nineveh)衰落中起了作用,并且其势力渗透到远至亚美尼亚(Armenia)和卡帕多西亚德的黑海南岸的古王国本度(Pontus)^⑰”。

如果塔恩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用驳斥正在论述的这段话,它是科诺观点的一个论据。不过假设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虽然其他的确很混乱)是正确的,假设它确实意在使月氏战胜希腊人而不是帕提亚人后征服大夏相联系,那么下面这种很有道理的解释成为可能:摇摇欲坠的大夏王国,在西部经受密特拉德一世的扩张政策,在东部饱受游牧民族无休止的进攻,它衰弱得如此厉害,以致帕提亚人最后于公元前 141 年能够征服其大部分;很快在此高峰时,斯基泰人约在公元前 129 年也侵入帕提亚,因此也可说侵入了大夏本土的一部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给远离事件实际舞台的西方史学家的印象是,这是同一个征服行动;对希腊人来说,大夏(就算它是帕提亚的一部分)的陷落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可能亲希腊的阿尔萨西斯王朝(Arsacid)在大夏的希腊城邦中留下了某种独立的市政机关,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也赋予其他希腊城市的自由一样。在此种情况下,斯基泰人征服希腊领土西部的印象就也会得到相当的解释了。

斯特拉伯在其书中论述指的是密特拉德二世,我们的观点和诸事件的历史进程在另一点上十分吻合,正如它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证据一样,即正是来自这位帕提亚君主连续不断的压力,导致月氏人,连同融入其中的民族,为寻找一个新的祖国——此次是印度,最终第三次突围出来。但是,这一点我们稍后讨论。就此刻而言,我们已经能够充分地确定桑原实造,安间矢一郎和哈楼恩从西方资料所获得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所以,可以确定征服大夏的确发生在公元前 129 年,而不会太早。

而且,在前面所谈的帕提亚人和月氏人之间的战斗以后,正如科诺最后的观点^⑧一样,这些民族最终能从其主要敌人那儿接受一种纪元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种在公元纪年就要开始前为帕提亚人有规律地使用的纪元。

塔恩想对公元前 128 年塞种人人侵帕提亚和月氏^⑨对大夏的

单独征服进行区别：“……所推测的塞种对希腊的大夏本土的征服是一个神话。”塔恩由塞种和月氏是不同的民族这一观点出发，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他使自己的观点基于这样的假说：斯特拉伯(11,8,;C511)关于由塞种征服大夏的论述实际上指的是7世纪的一个时期。出自特罗格斯·鲍姆斯的段落(第41章的开头)，根据塔恩的观点也不应解释为塞种人征服大夏。但是，即使说斯特拉伯的论述是混乱的，那么无论什么情况，塔恩立论的起点，他所持的月氏和塞种人之间显著的区别是错误的，即，从源头和本质上说，他们是中亚民族中伟大的斯基泰家族中的不同分支。只是在长期的演变中，由于征服和后来联合劫掠性的远征使他们部分地融合成一个民族，以致西方观察家要区别他们是十分困难的。^④

希罗多德(Herodotus)就此说道：波斯人总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叫作塞种人^⑤。

希罗多德所说的真理为大流士(Darius)时的旧波斯语(Old Persian)岩石铭文所证实，在此铭文中不同类的斯基泰人被作为塞种提及，即，塞种豪玛瓦尔格(Sakā Haumavargā)、塞种提格拉豪达(Sakā Tigrakandā)和塞种泰阿伊塔拉德拉雅(Sakā tyai tara draya)^⑥。

普林尼(Pliny)说：“Ultra sunt Scytharum populi. Persae illos Sacas universos appellavere a proxima gente ……”^⑦作为关于塞种人的观点模糊性的最后一则论据，我们引述斯特拉伯的一段话(11.8.2 ; C511)：在此点上，提到不同的塞种部落，我们认为根据科诺的建议，此段中颇有争议的 xai^⑧没被省去，于是此段文字又成了业已流行的塞种人的模糊观点的又一证据。塔恩从其他方面也得出同样的观点：“对希腊人而言(他们不是科学的人类学者)，此事简单：如果一个游牧民族说塞种语，那么它就是塞种游牧民族。今天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⑨”。

这种有关于塞种到底是什么族的模糊概念是由于不同游牧民族的极大的混合造成的。乌孙人的构成可作为一个例子。乌孙人

对月氏复仇的结果及部分月氏人屈服后,乌孙同化了大量的月氏人。但是,再早些时候,部分塞人(即上文的塞种)被月氏人征服,且被同化,以致我们理解了《前汉书》中所说的是怎么回事。该书中,乌孙人是这样被谈及的:“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⑭。

甚至汉文文献提到塞种人已经四散,而且被不同的民族所吸收。“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⑮这些被接纳的部落之一是大月氏,还有乌孙。特罗格斯甚至在第 42 章开头提到萨迦诺卡伊的毁灭。

在西方资料中,月氏有着吐火罗(Tochari)的名称。这和鸠摩罗什(Kumarajva)把 Tu - k'ia - lo = Tukhara 解释为小月氏^⑯的事实一致。对于这种等同关系,虽然以前存在分歧,但是现在学者们一致同意。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他们被表述为阿希(Asii), Ἀσίοι, 或者阿色尼(Asiani)。没必要进一步论述阿希在其国界之外还被称为吐火罗(Tochari - Tokhara)。一些西方学者对阿希和吐火罗进行了区别,其他的仅仅提到吐火罗,但两批学者都是正确的。塔恩认为阿希的名字和 Ārsi^⑰名称是同一个,后者是西格(Sieg)在相当晚的标明为公元 7 世纪的文献中发现的^⑱。范·温德肯斯持同样的观点,他试图从语言学方面证明这一看法^⑲。他认为词 ārsi 意为“白色的”,它被用来表示吐火罗统治者,后来表示被他们统治的人。考弗莱尔(Couvreur)是最后对阿希身份发表观点的学者之一^⑳,他认为他们是乌孙人。以前查本蒂尔(Charpentier)^㉑和德圭根斯(Deguignes)^㉒提出同样的理论。不过,考弗莱尔否定由范·温德肯斯^㉓提出的 ārsi 和阿希是同一民族的观点。柏雷(Bailey)也持此说,他把 ārsi 解释为梵文 ārya^㉔,阿希作为一个民族和南俄罗斯的 Ossetes 或者 As 相关^㉕。这一最后识别似乎很具说服力。第一种被西格反对^㉖。联系到所有这些,特罗格斯(Trogus)第 42 章的开头“Additae his res Scythica Reges Tocharorum Asiani interitusque Saraucarum”很有意思。哈楼恩^㉗建议把阿色尼改正 Cusani。这种假

设使此段话意思更加清楚,并且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似乎印度语中没有和阿色尼这个名字对应的词,而且所有其他来到印度的部族都有印度名字,只不过显然是其原名的印度化。月氏[Yüeh - chih - Tochari (吐火罗)]在印度被称为覩货罗(Tukhāra)或覩货罗(Tusāra),现在也清楚其国王的名字阿色尼(即 Cusani)的印度语对应是贵霜。

罗列印度西北部不同的野蛮人部落,除了耶槃那人(Yavanas)和安息人(Pahlavas)外,我们发现塞种人和覩货罗人,在史诗性的诗歌中也不断地被一起提到。这些部落名字可能出现的不同内容所有都上溯到一个 Purānic 背景,正在讨论的这些名字并没有给作者传递出多少信息。留下印象的是塞种人和覩货罗人(Tusāras)^⑧这两个名字配对出现。无独有偶,还有以下这些标准的配对词:Utkala - Mekala, 耶槃那人 - 安息人(Yavana - Pahlava), 苏马 - 奔那(Suhmh - Pundra), Anga - Vanga^⑨等等,所有的人在史诗性诗歌和《王事书》中反反复复提到。虽然在文学上它们一起被提及,但是实际上覩货罗人和塞种人之间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情况首先在事实上有其根源,即塞种人的大部分被同化于月氏-吐火罗人中;其次,最后被命名的民族讲的是一种塞种语^⑩;第三,最可能的是印度人称呼月氏-覩货罗人通常是根据印度西北部人最初接触的人的名字,即塞种人^⑪来称呼的。根据阿里安纳斯(Arrianas)^⑫的观点,在亚历山大(Alexander)时代,塞种人已居住在印度西北边境上了。我们从所引述的汉文记录^⑬中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塞种人来到印度西北部要早于月氏-吐火罗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大多数时期命名的进程也是如此,例如,在其他国家中,荷兰人(Dutchman)的总称是Hollanders(荷兰),因为荷兰人最初和外国接触的那部分是适于远洋航行的Hollanders(荷兰人)。

在侵入印度之前,吐火罗人和塞种人已经极大程度地混合了。

据推测,塞种人定居在那儿更早,在加入这些塞种人之后,吐火罗人和塞种人可能更为一元化了。在我们看来,此点加上上面提及的三则论据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根据汉文文献决定为月氏-吐火罗人的原因,因为丘就却和阎膏珍经常在后来的时代里被印度人当作塞种人。例如,从几则事实中,这一点表明 Samuelragupta 在 Allahāhād 铁柱著名的铭文中称其继承人为塞种(Saka) - Muruṇḍas, 同时授予他们典型的贵霜衔号——Daivaputra - Śāhi - Śāhanusāhi^⑩ (也许该 Muruṇḍa 在塞种语中意为“主人”,可以和塞王这一名字中的“王”相比较。)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这一事实:一幅总督的形象(塞种人的西郡太守之一)已在提婆库拉(devakula)或者迦腻色迦家庭小教堂中发现,它表明贵霜人并没有把自己和塞种人作过多的种族区分,这也可以从这两支斯基泰族两个世纪以来的混合得到解释。最后,我们提一下这一事实:由迦腻色迦创立的纪元叫作塞种纪元。

考虑到塞种人这一观念在西方及印度的模糊性,以及月氏和塞种人的混合,当联系到月氏征服大夏时,西方作者也提到塞种人由特罗格斯和斯特拉伯关于塞种人的段落中得出的信息像塔恩^⑪所认为的那样未必是不正确的。

月氏侵入巴克特里亚和塞种人侵入帕提亚没有联系,它是在波斯东部边境禁处发生的,正如塔恩所希望建议的那样,它对波斯其他地区并未发生影响;月氏侵入巴克特里亚并非是个不重要的问题,它对我们来说很清楚,事实是这一征服,要强调的是汉文资料中被提到,而并未记录在西部极远的地方不太重要的迁徙运动。

月氏-吐火罗和塞种人很快为外族所混合,只有中国人还能区分出他们来^⑫,这一事实为许多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所忽略。塔恩在塞种人和月氏间作明显区分时也迷失了路。他的推理如下:在迦逻西蒂铭文中使用的纪元肯定是一个塞种纪元,考虑到这一事实,吉霍尼迦花瓶被划定在一个塞种人纪元里,因为毛迦

(Moga, 塞种人的一支)使用这一纪元,因此对塞种人至关重要的事实一定是该纪元的起点¹⁷。他从公元前 155 年密特拉德一世治下的塞种人所占领的 Sakastana 寻找这一重要的事实¹⁸。

首先,吉霍尼迦花瓶一点也不能确定被划定为一个塞种纪元。迪科斯特(Dikst)和科诺赞同并没看见 Sa¹⁹。而且,对我们而言,也没有地方加以确定,所以,只要它是不确定的,我们就不能对它下任何结论。在沙铎尔铭文上的“塞种”的释读可以作为论据提出,它也不是很确定的²⁰,所以,在我们能够回答莫俄斯是否确为塞种人之前²¹,为什么旧纪元的起点一定是塞种人,我们对历史上的事实并不清楚。最后,月氏连同使用这种旧纪元的邱就却和阎膏珍是另外回事,而且和印度相连的中国主要告诉我们月氏的情况,所以他们在印度西北部一定有个很重要的位置。矛盾的地方是,按照《后汉书》来看²²,很久以前塞种人一部分被吸收到乌孙中,另一部分部分被吸收到月氏中去了。

还有许多反对把公元前 115 年作为一个纪元开始的论述,其中之一如下:也可以假定出自秣菟罗阿莫西尼 ayagapata 上的铭文可划定为旧纪元,或者只能转而求助于在科诺²³和拉普森²⁴看来最不可能的假设,即索达萨总督使用超日纪元,按科诺的观点,它是印度人在一场战胜其自己的部族的胜利后建立的。还有出自秣菟罗(路德斯标第 78)的第二块铭文,从字迹看显然要晚于阿莫西尼 āyāgapata,如果我们看到它(连同上一块铭文)的确被确定是旧纪元的,之后又使用它们自己的编年表,显然我们没有留意此观点。正如所有其他源自印度西北部野蛮种族的铭文一样,这些铭文是旧纪元的可能性仍存在。如这一纪元的确始于公元前 155 年左右,那么我们必须假定斯基泰人在公元前 83 年已经在秣菟罗立稳脚跟,因为(公元前)72 年在索达萨统治时的阿莫西尼匾中提及²⁵。现在,根据在印度的希腊人的信息,塔恩给出斯基泰人征服秣菟罗的可能日期为公元前 60 年²⁶。我们完全同意此点(当然如果有比

塔恩的观点更审慎的更好),因此,显然阿莫西尼 āyāgapata 的日期在公元前 83 年,故该纪元在公元前 155 年并没开始。

因此我们完全不相信月氏和塞种之间会有明确的划分,正如塔恩^⑧所认为的那样,公元前 129 年塞种人侵帕提亚显然只是对巴克特里亚(大夏)一小部分的征服。在我们看来,它是由不同的游牧民族进行的同样的征服,西方作者经常统称这些游牧民族为斯基泰人。加斯蒂纳斯对此有诸多论述。^⑨

这由派索考克斯(Pessoncaux)错误地译为“在一场对 Thogariens 的战争中,阿塔般(Artaban)胳膊负伤,不久就死去了。”^⑩我们认为,正确的翻译应为:“但是,阿塔般纳斯(Artanbanas)在宣布对吐火罗战争后,在战争中胳膊负伤,他同样很快死去。”因此,人们或许可能从所引述的一段文字中推测为不仅弗拉奥提斯,而且阿塔般纳斯在对斯基泰人或者吐火罗人的战斗中死去;所以这段引文同时也是一个证据,证明这些吐火罗人不过是月氏人,这一点哈楼恩^⑪和瓦·温德肯恩斯^⑫据其他信息也已清楚表明。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塔恩的下列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这可能是加斯蒂纳斯在专有名字上经常犯的的错误之一^⑬”。上面所引述的加斯蒂纳斯关于对帕提亚的人侵实际上不过是月氏人或者吐火罗人的进攻,因为斯基泰人只是一个集合名字。斯特拉伯就此也有论述:(他们)被称为玛撒该达人(Massagettaes)和塞种人,另一些部落被称为斯基泰。每一部落以此名见称。^⑭“斯基泰人”既不是人种学、也不是语言学或文化上说的一个单位,而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如果不说西方人所描述的由月氏发起的斯基泰人于公元前 129 年对帕提亚的人侵被看作是月氏对巴克特里亚(大夏)人同一个人侵的话(这从汉文资料中得知),那么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我们认为仅仅因为塞种人和月氏人在一些情况下也被西方作者一起提及就因此引人一个转向是错误的。我们的观点是因为塞种人部分已经被同化,他们和月氏-吐火罗人一起于公元前 129 年征服

了巴克特里亚(大夏),这完全和汉文文献记述一致。第41章特罗格斯·鲍姆培斯在其开场白中也同意这一观点,“塞种人和月氏已经攻占了大夏和粟特”。

但是,我们回到起点:对我们的推理来说,是否有公元前166年(或155年)^⑧萨拉人(Sallas)和月氏人的入侵最终并没有大的区别,因为当我们从中国《后汉书》的记录中了解月氏征服大夏的年代时,这一年代无疑是公元前129年,这和斯特拉伯及加斯蒂纳斯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我们看到旧纪元的开始应在公元前129年。

我们已经说明紧接着旧纪元仍存在一个时代,它是特地由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使用的。不用说将会遇到下列问题:那些相互联系的纪元的秩序是怎样的?就是说,迦腻色迦纪元是在旧纪元后面的呢,或者某段时间内它们相互交替?

科诺最初的概念是它们同时使用。1947年2月,他提出存在一个旧帕提亚纪元,结果,旧纪元的最后年代为公元150年(前249年+399=公元155年)。因为科诺当时认为迦腻色迦统治肯定始于公元138年,这接近同样的情况:较老的纪元被迦腻色迦纪年系统所取代,10年后,后者成为惟一使用的纪元。

科诺最后的观点是迦腻色迦在约公元200年^⑨开始其统治,这在旧纪元末和迦腻色迦纪元开始之间甚至留下了约半个世纪的空白。

对迦腻色迦纪元刚好紧接旧纪元之说有不同的反对意见。

第一,迦腻色迦的登基年代将是大约公元前129年+约400=公元270年,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正如我们上面所表明的^⑩,带有303~399年代的铭文刚好始于迦腻色迦王朝之后,即是说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统治的100年是在303这一年之前。

恰好有许多的论述指出迦腻色迦纪元并不是始于旧纪元停止

使用之时。不过,有一则反对意见,即,关于 299 年的婆罗迷文铭文,科诺正确地认为,班纳吉想把此年代作为我们纪元的起点,这一年代太早了。

正在讨论的 299 年^⑧的这则铭文是由布勒(Bühler)^⑨最早刊布,他认为此年代指的是迦腻色迦纪元。按照他的观点,该时代省去了 200 这个数字,他举例说,以致于使 252 变成了 52。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所使用的纪元这样就会和阿莫西尼表上的婆罗迷铭文的纪元及旧迦罗西蒂文铭文中的纪元(始于公元前 1 世纪前半叶)一样,所以,所讨论的这段铭文是韦苏提婆很晚的法令,其年代当在公元 3 世纪前半叶,即公元 200 ~ 250 年。温森特·斯密斯后来认为 299 这个日期指的是 Laukika 纪元,或者超日纪元^⑩。

在《印度历史的斯基泰人时期》(The Scythian Period of Indian History)^⑪这一长篇文章中,R. D. 班纳吉处理了此期编年表中的几个问题。文中他也讨论了 299 年的这一铭文。根据他的观点(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该铭文肯定比布赫莱尔所推测的要古老得多。为支持这一观点,班纳吉提出了一些古文字学的论据,指出其他铭文中的下列事实:在所讨论的这则铭文中,所增补的 ya 总是三部分之间,而不是两部分之间的,而在迦腻色迦纪元的铭文中,两部分间的形式同时和三部分之间的形式一起使用。他的最后结论是 ya 的这种形式在任何贵霜时期的铭文中都找不到。这种仔细的查证显然证明出自秣菟罗 299 年的铭文,不属于贵霜时代。同样,其年代并不能参照贵霜铭文所在的同一纪元。那么,这铭文中的年代应参照哪个纪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⑫。

1934 年,对于班纳吉的这种陈述,科诺在其文章《关于萨姆瓦特(Samvat)299^⑬的秣菟罗铭文之注释》中作了如下正确评论:“他的结论是‘可以确定的是 299 这个年代肯定指的是一个纪元,这一纪元的起点是在基督纪元前的第 3 或第 4 世纪。在印度仅知道有两个这样的纪元实际在使用。第一个是孔雀王朝纪元,它可能是

从公元前 321 年,或公元前 321 年左右的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加冕典礼计算起……,另一个纪元是在公元前 312 年由塞琉古·尼卡托(Seleukos Nikator)所创立……。如果参照孔雀王朝纪元,299 这一年可换算为 $321 - 299 =$ 公元前 22 年;如果参照塞琉西(Seleukidan)纪元,它就为: $312 - 299 =$ 公元前 13 年。”

引述此文后,科诺继续道:“现在,一个著名的事实是我们没有只言片语有效力的可能证据,证明曾存在一个孔雀王朝纪元,或者不论在何时期印度使用过塞琉古纪元的推测。在印度-斯基泰人来到之前,印度当然不可能已使用某些外国的或者其本国世俗的纪元,但是情况是这样的话,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什么痕迹。只是在印度-斯基泰人的旧迦逻西蒂铭文中我们第一次遇到印度的世俗纪元。每种用世俗纪元运作的理论所基于的不是事实,而是推算^⑧”。

科诺又对班纳吉的理论进行驳斥,铭文的古字体应是重大的文物。引述布赫莱尔的话后^⑨,他说道:“至于细节,下列新方法(即在贵霜时期)值得特别提及:……表示 ā 长度的横线附在下方低处;……kha……大多是处于下方的三角形;da 的较低一端画得更靠右,右边的凸出部分变得更大;na 的水平笔划成了曲形……或成圈形;……va 偶尔在左边变圆……Visarga 首次出现在这些铭文中……”。

科诺继续道:“而班纳吉教授刊布的这个盘子的检查结果,1.C.p.66,表明上面所提及的细节在我们的铭文中发现。”

“在该记录的前 4 行中发现了旧形式;参考最初的 na,特别是 ya 和 Śa。不过,如果班纳吉的盘子是可靠的话,那么当他说下符 ya 总是由三部分之间则是错误的,因为在 mahāvīrāsya 1.2. 中,我们只有较晚期的表示三方面形式。”^⑩

我们必须确实推测,在该种情况下,正文中有一处很危险的印刷错误,因为 ya 的较晚期形式不是表示三部分的,而是表示两部

分的。

但是,甚至当我们假定此印刷错误存在时,遗憾的是我们仍不能同意科诺的观点。在班纳吉的文章中,从所复制的摹拓本中可见,𑀘 肯定不是一个表示两方面的 ya。科诺想象他在磨损的部分见到𑀘,他就也能完成该字为𑀙。因此,最后的推测仅仅是可能性,因为整个片断连续表现出表示三部分之间的 ya,即在第一行的大王(mahārājasya)和王中王(rājatirajasya)中;在第四行的 Śirikasya 和 Śivadīnasya 中。

而且,科诺对正在考虑的 299 铭文和 72 年索达萨铭文之间进行的对比,并得出正确结论:299 铭文肯定较晚。现在,科诺开始假定索达萨铭文应定在超日纪元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主意。他使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他不断地极为强调地指出,这个纪元是个具体的印度民族的纪元,它甚至在传说中的超日王(Vikramaditya)战胜斯基泰人后就已存在。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塞种太守在自己的铭文中使用一个为纪念战胜其本民族而建立的纪元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科诺得出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假设,因为这是他惟一摆脱他的资料陷他于困境的办法,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类推论放在一边,允许索达萨铭文属于该旧纪元,像所有太守其他铭文一样,那么这些困难就会自行解决了。






科诺认为索达萨铭文源于公元 15 年,不过对他来说,此铭文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证明班纳吉关于此 299 铭文年代在公元前 22 年(据孔雀王朝纪元估算)或者在公元前 13 年(据塞琉西纪元计算)的结论是错误的。

299 的铭名不能属于这些时代,根据他的观点,这种事实在“在印度西北部有其并行的纪元,通过西北部地区古字体的考察,使得把罗里延·唐盖、加玛尔噶里、哈什特纳噶及斯喀卡拉·德里铭文归到诸如塞琉西纪元或者假定的孔雀王朝纪元成为不可能^④”。

科诺最后的结论是该片铭文一定和已经划定年代的旧迦逻西蒂文献同属一个纪元：“在我的版本中，根据所采用的起作用的假设的编年表，我们的记录属于公元 45 年，对应于迦腻色迦纪元 88 年，大王王中王 (Mahārāja Rājatirāja) 是韦苏提婆 (Vasudeva)，即贵霜皇帝^⑧”。

除非我们承认此处也有一个严重错误导入，即不是公元 45 年，肯定是公元 215 年，否则这些计算整体上是不可理解的。那样的话，就会和科诺《印度铭文汇编》中的观点一致，即旧纪元始于公元前 84 年。不过，科诺已于 1932 年收回此最后观点。

除了公元 215 年(?)的年代外，出自秣菟罗的铭文源于迦腻色迦纪元 88 年是非常不可能的。对此陈述，可总结许多论据，但是我们将只限制在最显突出的论据上。

首先，第 5 行词 devakulam 中连字 ku 的形式 。u 是一个向上的笔划，没有带边框线标题的符号。ya 仍是圆形 ，还没有较晚期的方形，在这种形式里，中间竖线向后斜，而在该字  左侧有一个小环。例如第 4 行 sīvadīnasya  中的长 ī，在字上仍用两个钩描绘出，而不是如后期的以一个卷曲物  代替。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表示两部分之间的 ya 没有被体现出来；所以还有更多几个论据可以提及。在整个铭文中，没有或者几乎未曾发现带边框的标题，并且整个笔迹至多提醒我们迦腻色迦纪元的诸多铭文，但是，显然不是迦腻色迦统治晚期而仅仅是他统治之初的铭文^⑧。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科诺认为此铭文晚于索达萨铭文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此铭文出自迦腻色迦纪元 88 年则是个错误。对比起来，此铭文和迦腻色迦纪元最早的铭文吻合得更好。

我们看来，班纳吉认为此铭文比布赫莱尔所推测的要晚，是相当正确的，但是他关于一个塞琉西纪元或孔雀王朝纪元的假说，则既杂乱又无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同意科诺对此的评论。





科诺最后的观点是开始于公元前 249 年或 259 年的帕提亚纪元^②,因此,该铭文应划定的年代为:249 年 + 299 = 公元 50 年或者 259 + 299 = 公元 40 年。从古文字来看,这种不可能性也是清楚的;从其和迦腻色迦早期铭文的巨大相似性来看,该铭文一定是在公元 40 年或公元 50 年后写就的。而且,这一理论包括所有年代上为大数字的铭文,均写就于这位最后有名称的皇帝统治之前或统治期间,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而且科诺本人曾指出,那些铭文的古字体表明其年代像出自罗里延·唐盖的 318 年的铭文^③一样晚。这还为福色尔的观点所强调,所讨论的雕像出自一座卒塔婆,其时间不会太早,据推测当在公元 2 世纪^④。


就目前而言,我们有一则 299 年的铭文,正如科诺正确评述并且后来得以证实^⑤的那样,推测它和出自印度西北部的铭文使用同一纪元,即 303 年查萨达的铭文,318 年唐盖的铭文,359 年加玛尔噶里铭文,384 年喀什特纳喀铭文,399 年斯卡拉·德里铭文,所以此铭文年代应在迦腻色迦王朝后。不过,这则 299 年的铭文和迦腻色迦王最早期的铭文在古字体上非常像。而且,没有特别的字,仅提及大王王中王,这使我们想到我们所排列出来的出自迦腻色迦以前纪元的铭文中的那些段落,其中也提及一个大王,但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正像 122 年般竭塔(Panjtār)铭文,136 年刻在银器上的坦叉始罗铭文及 199 年的铭文,它们上面国王的字均未提及,只提到一个“maharajabharata”。


在迦腻色迦王朝中,这是非同一般的,专门的名字总是要附加到大王王中王衔号前。所有这个连同非常清楚的古字体提示应该表明 299 年这则铭文的一个年代,它刚好在迦腻色迦王登基前。


这肯定使我们得出结论:318 年、359 年、384 年和 399 年的铭文,甚至可能还有 303 年的铭文是在迦腻色迦及紧随其后的继承者统治期制做的,而我们已经提出两个决定性的证据^⑥,年代为大数字的这一系列铭文只能是迦腻色迦王朝以后的。考察所有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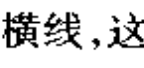
论据,在我们对秣菟罗铭文的推理上肯定隐藏一个错误。无可否认,古字体学表明正在讨论的出自秣菟罗婆罗迷铭文刚好在迦腻色迦之前,因此,我们似乎陷入一个很不合意的位置,因为我们被迫得出以下非常难以接受的结论,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已和这样的事实相协调了:在犍陀罗和阿富汗斯坦,迦腻色迦创建自己的王国并建立自己纪元前,当时风行的旧纪元仍在使用。当贵霜统治者的极权初获实现时,我们认识到犍陀罗和阿富汗斯坦在贵霜人眼里是其王国中远比秣菟罗重要的一部分。除了不同时代重叠部分靠不住外,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迦腻色迦王朝不在这些年代为大数字的系列铭文表明的纪元之间或其后开始。经过对此铭文更详细的分析,幸运地发现,这一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

迄今为止被所有学者释读为 299 年的年代实际为 199 年,这就解决了这些问题^{②9}。但是让我们首先来说明一下释读上的这一变化:就所能见的资料,表示“百”这个字形状如下:。虽然字的附近有石头裂缝,但它仍清晰可见。布赫莱尔在其关于表示数字的字表^{③0}中,并没有贵霜时期表示 100 或 200 的符号,但对太守钱币他则的确给出了这些字。仔细查证后,我们发现创造表示“百”的符号所基于的原则如下:100 写作 a,200 写作 ā(这是一个 a,再在此字的左侧加一条水平线),300 是一个 ā,再在其左侧额外加一笔。我们发现此规则运用到西郡太守的钱币上了;在此,基本符号从一个 a 发展而来:( →  → )。但是在相当晚的时代里,由瓦拉比(Valabhi)王在 6~8 世纪使用的字体也有此符号,在剑桥第 866 的尼泊尔人(Nepalese)的手稿中,我们又发现此规则。在太守钱币上表示“百”的字因此如下^{③1}:



100: 

200: 

300: 

大概出自秣菟罗 199 年的铭文表示百的字总被释读为 200, 因为在此字的顶部, 有一横线折向右边。实际上, 如果它是 200 的话, 那么此符号和出现在该铭文中的另一个 ā 的符号一致, 但情况不是这样。在第 1 行的 ārahāttanam 中, 第 2 行的 ārahāto 中及第 4 行的 ārahātayatāne 中, 我三次发现有一个 a, 在其竖线的中部或底部清楚地有一条横线, 这使它和 ā 相区别: 。现在表示百的字中, 这条横线在竖线的半腰中失去了。可以提出, 在此种情况中右上角的笔画是正在讨论的这个笔画, 它已被稍微上移至此。这还没有解决, 因为我们看到表示百字顶部右边的笔画, 和我们在第 4 行 ārahātayatāne 或许和第 2 行里 ārahāto 里清楚看到较下部的笔画一起, 似乎不时出现, 以致上面这个右边笔画在此字体中经常不是从 a 中区别 ā 的笔画, 因为此处 ā 里, 它经常在竖线的半腰, 甚至更低处^⑧。

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显著的证据, 我们必须把此铭文的年代读作 199。关于第一行的结尾, 布赫莱尔和班纳吉认为应释读为 s(v)avaccharas(v)ate d(u)^⑨, 我们须作如下评论。

首先, 此词很清楚是 svate。布赫莱尔和班纳吉不能确定此字后面是否跟有一个音节 du。在摹拓本中, 刻意辨认, 或许只能读出一个 d: 。但是 U 根本看不见, 因为布赫莱尔和班纳吉所辨认的那个笔画向左下方倾斜太远。在第三行中 vitu, 第 5 行中 devakulam, 所附加的 U 在字的底部右边作为一条横线仍向上伸 , 而不是向下伸。

因为该石头破裂, 对在 svate 以后的词没什么可说的。它可能就是逐字提及一百九十九的完全书写形式。

如果布赫莱尔和班纳吉是正确的, 我们就能释读 s(v)ate du, 甚至这时它是 199 年, 我们只能假设随后的 ekuna 和 200 一起象征

着 199 年, ekuna 紧随着出自斯卡拉·德里的铭文, 其中 399 表示为 ek(u) nacadusatitimae, 在路德斯清单第 35 中, 借助于词 ekuna [即 ekunati(sa)^⑧] 的帮助 29 年也得以表达, 以致使用词 ekuna 表达数字如 199 为“200 减 1”显然成为习惯。

在这两个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是困难的, 因为它取决于这些石头磨损掉多少。如果是一大部分, 那么第一种可能性就大些; 如果仅是一小部分, 那么用 ekuna 来解决的可能性就大些。当从此雕像上方拍摄一幅其顶部的照片供我们使用时, 这才能得到决定, 因为据推测那儿有大雄(Mahavira)雕像双足的痕迹, 通过其铭文判断, 雕像原本站在那儿或坐在那儿。由于雕像的脚总是居中, 找出铭文被损掉多少是可能的。

让我们现在重回起点。这样我们看到释读 199 年代替 299 年就消去了我们的混乱, 因此我们不再被迫假设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在其王国内使用两套编年系统,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明显证据。

那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如出自秣菟罗的婆罗迷铭文那样, 在我们看来, 它比迄今为止所假定的要古老 100 年, 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的一组铭文在古字体和内容上是如此密切相关, 它们上面题写的年代肯定比实际早, 它们应放在出自卡拉特斯 187 年的铭文、出自咀叉始罗 191 年的铭文、正在讨论的出自秣菟罗 199 年的铭文、出自德瓦伊(Dwai) 200 年的铭文之后的编年序列中。迦腻色迦铭文的确紧接着此组铭文后, 因为在出自卡拉特斯的铭文中, 阎膏珍曾被提及, 这一点当 T·W·托马斯后来怀疑时, 科诺曾再一次加以证明^⑨。现在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如果该君主不是迦腻色迦王前一任的话, 他们就相隔几十年。出自卡拉特斯的铭文和所有其他迦罗西蒂铭文一样, 带有旧纪元的年代, 该年代不像科诺以一种特殊方法所推测的那样, 超日纪元的年代, 我们认为显然是在所讨论的一个贵霜所用的超日纪元之后。

除此之外,出自卡拉特斯的铭文是一个证据。证明迦腻色迦及其继承者这组铭文在编年上和上面提到的铭文相联系。现在,值得注意的事实出现了:当我们勾勒出知名的标有迦逻西蒂铭文的体系时,它似乎从 58 年直到 200 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但是从 200 年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大的断层。从那时起,旧时代没有铭文,直到过了 102 年以后,其时,随着出自查萨达的旧时代 303 年铭文的出现,又有一个开端(见表 B.)。

这一自 58 年起非常密集的铭文中最值得注意而且显著的空缺,又因插入该组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的迦逻西蒂铭文而一下子能够理解了,这组插入的铭文从 1 年延伸至 89 年,几乎刚好填充这一长达一个世纪的空档。

一方面,通过秣菟罗 199 年的和卡拉特斯 187 年的铭文所提供给我们的明确资料,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的这一系列铭文的始点,和旧纪元的那批系列铭文突然断裂处联系密切。

另一方面,迦腻色迦系列铭文的结束处又连结到(此连结在上文已经证明可以接受)旧纪元系列铭文的开始处,这些组成年代为 303 - 399 的那组大数字的铭文。

因此,我们的结论必须是:总的说来,迦腻色迦的确在他的整个王国里引入了新纪元,废除了旧纪元;而且犍陀罗在他统治下,仅使用一个纪年系统。当其王朝覆灭后,已在那里扎根的旧纪元在西北部地区又获使用,所以在 303 年,我们又见到旧纪元的出现,并且至少持续使用到 399 年。在秣菟罗(此为该国更印度化的部分),旧纪元显然未曾怎么使用^②,因为太守的统治仅持续短短的一段时间,因此该纪元并未被他们自己所有,所以,该王朝灭亡后,旧纪元并没有重获使用,但是迦腻色迦纪元保存下来了。也许迦腻色迦的继任者在秣菟罗统治的时间要比他们统治得以兴起的西北部地区时间长久。韦苏提婆的印度化可能也指这一点^③。

因此,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我们看到迦腻色迦纪元的 1

年肯定要么是在旧纪元 200 年这一年里,要么在此后不久,换句话说,迦膩色迦在我们的纪年系统 71 年后不久开始其统治。或者,迦膩色迦纪元的 89 年肯定是在旧纪元 303 年这一年,或者此后不久,所以迦膩色迦纪元的 1 年一定是刚好在公元 86 年前。

这和八九十年岁的丘就却的统治连同阎膏珍及吉霍尼迦的统治加到一起不会持续约 100 年以上的事实一致。考虑到丘就却登基是在公元前 1 世纪最后 25 年,那么我们只能指望迦膩色迦继位发生在约公元 1 世纪最后 25 年。

因为科诺希望 303 年至 309 年间的那组铭文应和迦膩色迦在同一个时期,或者甚至在迦膩色迦之前(科诺假定迦膩色迦约在公元 130 或 140 年开始统治),他不能接受这一事实:该组铭文所确定的年代和 103 ~ 187 年的丘就却(及阎膏珍铭文的年代相同,因此他不得不为刚才这些又接受另一个纪元,此纪元比旧纪元的开始晚得多,以致使迦德菲斯诸王的铭文更接近 303 ~ 399 年的纪年系统,更靠近迦膩色迦时期。这解释了科诺是怎样得出非常奇怪的结论:即阎膏珍把他的铭文确定在超日纪元。

关于旧塞种纪元始于公元前 84/83 年之说是基于对 *ayasa* 一词的错误释读。

科诺在发现卡拉万铜盘之后所提出的一个始于公元前 150 年的纪元之说,是依赖以下计算:它把阿莫西尼铭文确定在超日纪元,把帕提卡铭文确定在超日纪元,把帕提拉铭文确定在旧塞种纪元。首先,无法接受的是:正如狮柱上的纪元那样,在索达萨统治下应使用的是另一个纪元,而不是其同族人帕提卡所使用的纪元。其次,在一直用旧纪元题写铭文的同一个秣菟罗,在索达萨统治时,他不会马上批准使用印度人对其族人的一场胜利后引进的纪元来题写铭文的年代。

最后,如我们所见,关于帕提亚纪元的说法似乎也是无法确定的。

回到我们的起点,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使问题可以接受:第一,在迦腻色迦继位前的时期只使用一个纪元;第二,这是一个月氏(又名阿希-吐火罗-靛货罗)所使用的纪元,在这一纪元里塞种人的大部分被吸收;第三,该纪元开始于公元前 129 年;第四,那一纪元的 200 年后不久,即公元 71 年后不久,公元 86 年前,迦腻色迦登上王位。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被居住在乌贾因的西郡太守使用了 300 多年的纪元是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按科诺、^②格什曼及其他人^③的说法,西郡太守是迦腻色迦王朝真正的封臣。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从已发现的未曾中断的钱币系列中得知,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太守和征服这些统治者^④的笈多王朝相联系。吉尔霍恩试图用另外办法证明这一事实^⑤。

科诺希望使我们相信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是由阎膏珍为了纪念他对马尔瓦人(Malava)的胜利而建立的^⑥。因此他的封建领主西郡太守也使用此纪元。不过,按科诺的观点,阎膏珍本人并不使用该纪元,而是使用的超日纪元,他认为此纪元是由一个印度王战胜塞种^⑦的一场胜利后创建的。

这些理论和假设多么无法接受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为什么阎膏珍不也使用由他自己建立的纪元?

如果我们的确可以正确下结论说迦腻色迦在公元 71 年后不久开始统治的话,那么考虑到他在乌贾因的封臣使用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对我们来说开始于迦腻色迦统治第一年的所谓迦腻色迦纪元,正是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进一步的证据和论述见第七章)。

在本章取得的结果在下面各章中将会引导我们,现在,我们要研究在诸如艺术发展、铭文、古文书学,以及该时代总体上在历史不同领域会产生何种结果。

附 录



有一个细节在碑铭学家中引起很大争论,即是不是在索达萨统治时阿莫西尼 āyāgaputa 的年代一定释续为 72 或者 42。路德斯^⑧以前曾触及过这个问题。布勒在他的《印度古文书学》(Indische Palaeography)中已经把这同样两个符号看作代表 40 和 70^⑨。不过,路德斯认为一个符号不可能表示两个数字,他正确地以此观点为始点,在路德斯第 60 的出版物中暗示 X 代表十进制的 70。最后他提到一些铭文,他把其中的 X 释读为 70,但是,此论的弱点是他的观点是基于一则毁坏了的铭文之上,拉普森已向他正确地指出了此点。拉普森建议把该符号释读为 40,因此阿莫西尼 ayagapata 的年代该读作 42^⑩。在一篇题为《查尔斯·洛克威尔·兰德曼的印度研究》^⑪的文章中,他在所有细节上使其观点至为清楚,根据路德斯第 60 中的符号难以辨认的事实^⑫,他反对路德斯把吉尔纳尔(Girnaār)的鲁德拉德曼(Rudradāman)铭文的十进位数 70^⑬及西郡太守钱币上的数字作为论据。

在我们看来,这是拉普森方法不完全正确的第一点。因为即使在乌贾因用完全一样的形式来表示秣菟罗中的数字,我们仍需为这种可能性留下余地:即在印度不同地方使用歧异的书写形式。

拉普森方法中我们不同意的第二点是他使用相当晚的材料来进行比较。西郡太守钱币表明,数字 40 仅仅在 140 ~ 149 年和 240 ~ 249 年里,即,胡韦色迦铭文后一个或两个世纪;在该数字表示 70 的情况中,我们在钱币上发现 170 ~ 179 年和 270 ~ 279 年,其间甚至得加 30 年。


阿莫西尼 ayāgāpata 离进行比较的材料仍相当远,即,如果把它划定在 42 年,就是说,公元前 87 年,那么仍有约 300 ~ 450 年的间隔;如果把它定在 72 年,即公元前 57 年,那么仍有约 275 ~ 400 年^⑭。因此,时间上的平均距离为 300 至 400 年。这种时间跨度太大而不能用作可资精确比较的材料。那么,对我们来说,似乎较好

的是,如果想确定秣菟罗某个符号的价值,那么可以从同一时间同一地区选取例子作为比较的材料。

拉普森实际上承认路德斯正确,即路德斯第 60 带有年代 74,这一点由于提及韦苏提婆的名字而得到证明;但是他反对把石头上表示 70 的符号看成像一个圣·安德鲁的十字架,他说它仅仅也是 。现在,所说的十进位在摹拓本上的确不再清楚可辨,而那块石头现在已失去,石头就是当时可能也有损毁,而且,拉普森说后来有人已试着用铅笔对该摹拓本进行润色。不过,在拉坚卓拉拉·米特拉(Rājendrālala Mitra)^②文章中的图样和多森(Dowson)^③文章中的图样清楚地表明是 X。拉普森在他的文章中评论性地总结 X 是  的一种倾斜形式^④。

路德斯称 X 是表示 70 的数字的论据弱点是破碎的铭文,以及如下事实:他所认为的 X 被用来表示 70 的 7 则铭文中,没提及一个君王,除了一次不幸提及胡韦色迦外,他从迦腻色迦纪元 33 年统治到 60 年,而不是在 70 年代。

在对拉普森研究的答复中^⑤,路德斯指出出自中国新疆的大量棕榈叶手稿证明他的假说的准确性。至此,在 139 读数后,在接下来的数字中人们发现了路德斯希望读作 40 的那个字。并且为了驳斥其他人把圣·安德鲁的十字架可能使用第二种形式观点,他从使用两个字的同一个作者中提出两个部分,因为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此人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表示一个数字,事情似乎由此得以证明。

拉普森并没有就此罢休^⑥,第二年他就作出了回应。作为 X 仅仅是  的一种倾斜形式说法的论据,他提出西郡太守铭文,即,年代被划定为 42 年的拉萨巴达塔(Rṣabhadatta)之纳西克(Nasik)铭文,以及在朱纳尔(Junnar)的 46 年之阿雅玛(Ayama)铭文^⑦。

后来,他承认路德斯及其关于出土于中国新疆手稿是正确的;但是他怀疑该手稿是否是贵霜时期的,建议应该为笈多时期。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有关此问题其他要说的地方。从我们现用的不同材料中,正如所说明的一样,我们宁愿把那些在地理上及编年上和正在讨论中的那个阿莫西尼 āyāgapata 字进行比较,如果后者年代是被划定在 42 或 72 年的话。从地理上说,最近的铭文是迦腻色迦纪元 40~49 这十年(胡韦色迦统治下)秣菟罗的那些铭文,以及迦腻色迦 70~79 这十年(韦苏提婆统治的)那些铭文。

从编年上讲,最近的还是刚才所提及的铭文,以及阿雅玛,拉萨巴达塔及鲁德拉德曼铭文,由于胡韦色迦和韦苏提婆铭文满足了所期望的两项要求,至于用作 40 和 70 的十进位形式我们将进行检查。不过,我们将同时在检查中讨论其内容清楚地表明它们在日期上肯定表示的是 40 或者 70 的字的那些铭文。下面就是当时表示字 40 的 4 则铭文(1-4):

1. 路德斯表第 45, a(摹拓本,《印度铭文》,卷 10,第 112 页,第 5) 𑀘

2. 路德斯表第 149, b(摹拓本,《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8~1909)》,图版 56, a) 𑀘

3. 路德斯表第 46(摹拓本,《考古调查报告》,卷 3,图版 14,第 15) 𑀘

4. 路德斯表第 47(摹拓本,《印度铭文》,卷 2,第 205 页,第 20) 𑀘

表示数字 70 的字,是下列铭文:

5. 路德斯表第 60(摹拓本,《印度铭文》,卷 9,第 242 页) 𑀘

6. 路德斯表第 61(摹拓本,《考古调查报告》,卷 3,图版 14,第

11) X

7. 路德斯表第 62(摹拓本,《考古调查报告》,卷 3,图版 14,第

12) X

8. 路德斯表第 63(摹拓本,《考古调查报告》,卷 3,图版 14,第

13) X

9. 路德斯表第 64(摹拓本,《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卷 39,图版 7,第 18) A

10. 路德斯表第 65(摹拓本,《考古调查报告》,卷 3,图版 14,第 14) X

另外,下列解释或许可资使用:


第一至第三则铭文提及和年代相连的胡韦色迦的名字;所以在此此字肯定有 40 的涵义。







第 4 则铭文(路德斯表第 47)内容表明其年代肯定应被读作 49 而不是 79。其中提及 *Koḷiya gaṇa* 的某个传道士 *Ārya Vṛddhahasti*, 即 *Vajrī sakhā*。在 60 年的一幅肖像上的另一则铭文中(路德斯表第 56), 据说该肖像是在某位传道士(他又是 *Ārya Vṛddhasti* 的一个学生)的要求下制作的。因此不用说路德斯表第 47 的铭文要比路德斯表第 60 的铭文要古老;反过来则肯定不是如此。万一这一内在表示被认为是不确定的,那么仍有一个清楚的外部表示,就是浮雕本身(图 66)。在基座残余的右半部可见一头狮子向外翻转。我们即将看到,这是迦腻色迦时代 51 年前的基座特点。后来它们总是从正面表现。而且这些优雅的崇拜者表明,该浮雕是在贵霜时期第一阶段制作的,当时僵硬的风格尚未进入这些雕刻。

在第 5 则铭文中,十进位肯定有 70 的涵义,这一点因提及和日期相关的名字而得以表明。

第 6 至第 10 则都是题写在柱子上的铭文,因为它们所有都被

卡宁汉姆^⑧一起发现,且内容非常相似,还由于它们所有都被确定在同一年,所以它们肯定是同一批的。第6则和第8则表明了数字 X 一定被读作 70。字 ku 的形式即和我们从迦腻色迦时代第一个世纪下半叶中所获知的字的形式类似^⑨。因此,此字不太可能读作 40。

对我们来说,此事至此已足以得到证明,因为,其中可以确立肯定带数字 40 的 4 则铭文表明十进制符号 , 而应该表明十进制 70 的 6 则铭文表明为符号 X,除了已遭损毁的第9则以外。

这些就是 40 和 70 的例子,它们在地理上和阿莫西尼铭文最近。从编年学上看,最近的是同一组铭文,加上鲁德拉德曼、拉萨巴达塔及阿莫西尼的铭文。在这三则铭文中,第一个肯定有 72 的日期,它在该字背面也用词写出。十进制符号为如下形状: 。拉萨巴达塔铭文表示的一个十进制符号为 , 它和鲁德拉德曼上的并非同一个,但却和我们在秣菟罗通常发现的表示 40 的符号一致,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它读作 40。在阿雅玛铭文中字  或许可以被当作一个圣·安得鲁的十字架,但是,它可能刚好也是和拉萨巴达塔铭文中同样的符号,只是它画得稍微尖些且更为紧凑些,以致于好像斜竖线左上钩和右下钩连成一条。阿雅玛及拉萨巴达塔的铭文比胡韦斯迦^⑩的铭文早 200 年,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说明二者表示 40 的十进制间的这种差别;但是,即使考虑到编年上的差异,似乎地理因素仍是更重要的,因为,表示 40 的这个字已经表明了后来在西郡太守钱币  上表示 40 形式的方向。而且鲁德拉德曼的韦苏提婆铭文中表示十进制 70 的差别不能由编年上不同来解释。它表明鲁德拉德曼铭文表示 70 字  和同期秣菟罗使用的表示 70 的字有些不同。它更近乎西郡太守钱币在后来时代里用以表示 70 的形式 。因此,从地理学角度考虑似乎更

重要。

按照路德斯的观点,秣菟罗表示 70 的十进制源于表示 60 的这个字,是把后者的左边加一条线形成的。从下表来看,我们也愿补充说此原则同样适用于乌贾因(Ujjain)表示 70 的这个字。

	60	70
秣菟罗:	𑀧	𑀨
乌贾因:	𑀧	𑀨 (鲁德拉德曼)
乌贾因:	𑀧	𑀨 (两个世纪后西郡太守的钱币)

在乌贾因钱币上的 𑀨 不能和更为紧凑形式 𑀨 相混淆,后者两个世纪前在秣菟罗曾十分常见。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因此可以说明,经过几个世纪的进程后,在秣菟罗地区和乌贾因地区字的写法是有差别的。铭文证明了这一点,钱币上字体分歧更大,这也是一个确证。

我们得出的结果如下:

在秣菟罗表示 40 的符号是: 𑀬, 表示 70 的是: 𑀭。

在乌贾因表示 40 的符号是: 𑀬, 表示 70 的是: 𑀭。

若干世纪后,在西郡太守钱币上表示 40 的符号是: 𑀬, 表示 70 的符号是: 𑀭。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大约在基督纪元之始,字母系统南北两支的分歧开始出现。

另一个有利于阿莫西尼匾文年代应在 72 年观点的最后一个论据是,雕刻精致的 āyāgapata 可能早于臃肿的狮柱,而且,该狮柱提到索达萨为太守,而 āyāgapata 已经把它称为总督。

注 释:

① S.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2 卷,第一部分“阿育王以外的迦罗西蒂铭文”,加

尔各答,1929年,第83页。

② E. 托马斯:《大夏的钱币和印度的日期》,见《研究院》,1874年12月26日,第686-687页。

③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第2卷,西姆拉,1871年,第68页;《贵霜或大月氏钱币》,《钱币编年》系列3,第12卷,伦敦,1892年,第40-82页,特别是第44页。

④ J. Ph. 沃格尔:《题写有铭文的键陀罗雕刻》,《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3-1904年)》,第259页。

⑤ G. 布勒:《印度古文字学》,斯特拉斯堡,1896年。

⑥ G. 布勒:《秣菟罗的铭文发现》,载《维也纳东方文化杂志》,第10卷,维也纳,1896年,第171-174页。

⑦ V. 斯密斯:《从大约公元前120年到公元100年的印度—帕提亚王朝》,载《德国东方协会杂志》,第60卷,莱比锡,1906,第49-72页,特别是第71页。

⑧ V. 斯密斯:《印度北部贵霜王朝年表》,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杂志》,伦敦,1902年,第175页;《印度历史中的贵霜,或印度—斯基泰人时期:公元前165年—公元320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杂志》,1903年,第1-64页,特别是第7页。

⑨ 见 A. 卡宁汉姆:《附有推算年代表的印度纪元(时代)》,加尔各答,1883年,第6-17页。

⑩ F.S. 格罗斯:《秣菟罗铭文》,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6卷,孟买,1877年,第216-219页,特别是第218-219页;《秣菟罗:一个地区的传记》,第2版,西北诸省及欧得(Oudh)政府出版社,1880年105-106页。

⑪ S. 列维:《印度—斯基泰注解》,第一,传说,载《亚洲学刊》第9辑第8册,巴黎,1896年,第444-484页;第二,史料,第9,第9册,1897年,第5-26页;第三,圣·托马斯,《冈多法内斯和玛兹蒂欧(Mazdeo)》,第27-42页,特别是第42页。

⑫ R.D. 班纳吉:《印度历史的斯基泰时期》,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37卷,1908年,第25-75页,特别是第67页。

⑬ A. 福色尔:《键陀罗亲希腊佛教艺术》,巴黎,1905-1923年,第2卷,第484页。

⑭ G. 布勒:《一则出自斯瓦特的新铭文》,载《维也纳东方文化杂志》,第10卷,1896年,第55-58页及第327页。

⑮ J. 马歇尔:《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杂志》,1914年,第973-986页。

⑯ R.D. 班纳吉:《印度历史的斯基泰时代》,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37卷,1908年,第25-75页,特别是第67页。

⑮ E. J.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第 1 卷,《古代印度》,剑桥,1922,第 570 页。

⑯ K. P. 加雅斯瓦尔:《阎膏珍时期的雕刻及贵霜年表》,载《比哈尔语及奥里萨研究会杂志》,第 6 卷,巴特那,1920,第 12-22 页,特别是第 21 页;见同一作者《塞种 - Satavahana 历史的问题》,第 16 卷,1930 年,第 227-316 页,特别是第 240 页。

⑰ W. W.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494-502 页。

⑱ J. F. 弗里特:《一个迄今尚未被识别的贵霜工》,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3 年,第 325-334 页;《圣·托马斯和冈多法勒斯》,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5 年,第 223-236 页;《塔克特-伊-巴喜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6 年,第 706-711 页;《迦腻色迦的传统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6 年,第 979-992 页;《公元前 58 年纪元的早期使用》,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7 年,第 169-172 页;《毛迦、莫俄斯和乌奴你思》,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7 年,第 1013-1040 页;《希腊安色尔字和草写字传人印度》,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8 年,第 177-186 页;《迦腻色迦的问题》,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3 年,第 95-107 页;《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3 年,第 913-920 页和第 965-1011 页;《评 E·J·拉普森的〈从最早时代到公元 1 世纪〉》,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4 年,第 795-799 页;《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4 年,第 989-992 页;《136 年的咀叉始罗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4,第 992-999 页;《咀叉始罗的涡形饰》,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5 年,第 314-318 页。

⑳ O. 弗兰克:《中国关于突厥人和斯基泰中亚的文稿》,《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论文集》,柏林,1904 年,《哲学及哲学家论集》,第 1 卷,第 99 页。

㉑ L. 路德斯:《佛教戏剧残片》,《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少量梵文文本》,第 1 期,柏林,1911 年,第 11 页。

㉒ J. 肯尼迪:《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3 年,第 11 页。

㉓ 巴奈特:《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3 年,第 942-945 页。

㉔ J. 道森:《对一则帕克特里亚巴里铭文及萨姆瓦特纪元的诠释》,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新系列,第 7 卷,伦敦,1875 年,第 376-383 页,特别是第 382 页;又见《对一则帕克特里亚巴里铭文及萨姆瓦特纪元的进一步诠释》,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新系列,第 9 卷,1877 年,第 144-146 页。

㉕ J. 马歇尔:《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14 年,

第 973 - 986 页。

⑳ N.G. 马嘉姆达:《印度博物馆雕刻手册》,第二部分,“犍陀罗亲希腊佛教艺术流派”,德里,1937年,第 19 页。

㉑ R. 哥什曼:《贝格拉姆(Begram)、贵霜考古、历史研究》,载《法兰西阿富汗考古使团纪念文集》,第 12 册,开罗,1946年,第 105 - 108 页。

㉒ 弗噶森:《论印度编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新系列,第 2 卷,1870年,第 1 - 137 页,特别是第 97 页。

㉓ J. 弗噶森:《论塞种萨姆瓦特和笈多纪元》,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新系列,第 12 卷,1880年,第 259 - 285 页。

㉔ H. 奥登伯格:《关于古代印度钱币和铭文产生的日期》,见《钱币学杂志》,第 8 卷,柏林,1881年,第 289 - 328 页,特别是第 292 页。

㉕ H. 奥登伯格:《关于古代印度年代和历史文献的两篇论文》,1911年。

㉖ A.M. 波叶尔:《迦腻色迦时期》,载《亚洲学刊》,第 9 辑,第 15 册,巴黎,1900,第 526 - 579 页,特别是第 578 - 579 页。

㉗ R.C. 班大卡和 D.R. 班大卡:《从孔雀王朝建立到笈多于朝衰亡的印度早期历史(公元前 322 - 约公元 500 年)》,第 2 版,孟买,1930年。首次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学刊》第 20 卷,孟买,1902年,第 356 - 408 页,特别是第 386 页。

㉘ D.R. 班大卡:《贵霜碑文和塞种时代起源的问题》,载《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学刊》第 20 卷,孟买,1902年,第 269 - 302 页,特别是第 293 页。

㉙ 鲍·达吉:《斯基泰人对印度的侵略及卡拉喀克亚(Kalakacharya)的故事》,载《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学刊》,第 9 卷,1867 - 1870年,孟买,1872年,第 139 - 146 页,特别是第 145 页。

㉚ A.M. 波尔叶:《巴哈帕纳(Bahapana)和塞种时代》,载《亚洲学刊》,第 9 辑,第 7 册,巴黎,1897年,第 120 - 151 页,特别是第 123 页。

㉛ J.F. 弗里特:《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13年,第 965 - 1011 页,特别是第 992 页。

㉜ G. 坎卫 - 达波瑞尔:《德干的古代历史》,庞迪奇里(Pondicherry),1920年,第 26 页。

㉝ 科诺:《文集》,第 67 页。

㉞ 自此观点提出后,科诺又抛弃了此论,又提出了一个更晚的年代,见注 75。

㉟ 科诺:《文集》,第 77 页。

㊱ J. 马歇尔:《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14年,第 973 - 986 页。

④ S. 科诺:《印度斯基泰人的贡献》,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柏林会议》,柏林,1916年,第2卷,第787-827页,特别是第803页。

⑤ J.F. 弗里特:《136年的咀叉始罗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14年,第992-999页。

⑥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72页。

⑦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73页。

⑧ 此观点 A.M. 博叶较早的时候已经在《加罗西蒂铭文》中提出,载《亚洲学刊》,系列11,第5卷,1915年,第281-289页,特别是第287页;D.R. 班达卡《铭文诠释和问题》,第21;《136年的咀叉始罗涡形饰铭文》,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45卷,1916年,第120-122页。

⑨ S. 科诺和 W.E. 范·韦克:《印度加罗西蒂铭文的时代》,载《东方资料实录》,第3卷,莱顿,1925年,第52-91页,特别是第76页。

⑩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145页。

⑪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171页。

⑫ S. 科诺和 W.E. 范·韦克:《印度加罗西蒂铭文的时代》,载《东方资料实录》,第3卷,1925年,第77-79页。

⑬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80-81页。在此引文和其他的引文中,科诺自己在词 Śaka - Saka 的拼写上出现不一致。

⑭ W.E. 范·韦克:《论迦腻色迦时代的年代》,载《东方资料实录》,第5卷,1927年,第168-170页。

⑮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94页。

⑯ 见本书本章下文。

⑰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34页。拉普森也认为该年代指超日纪元时代;作为一则有利于此的论据,他提出该月是以印度的方式出现的,据他的意见,它包括该时代为一个印度时代。我们不明白此论据是否有效,因为,贵霜人(他们是外国人,也用印度的方法表示月)有大量用一种印度字(即婆罗迷文)写的铭文。

⑱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和《印度迦罗西蒂铭文的纪元》,载《东方资料实录》,第3卷,第60页以后。

⑲ S. 科诺:《134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2年,第940-965页。

⑳ S. 科诺:《134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2年,第956页。也见《印度-斯基泰编年诠释》,载《印度历史学刊》,第7卷,马德拉斯,1933年,第4页。

① S. 科诺:《134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32年,第957-958页;也见《印度-斯基泰编年诠释》,载《印度历史学刊》,第12卷,第4页。

② S. 科诺:《134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2年,第953页。

③ 哥什曼力图根据一则论据驳斥该异议,此论据是一则发现于波斯的铭文,上面提到的阿达什尔(Ardashir)和沙普尔(Shahpur)也没有头衔这并不能使我们信服。波斯不是印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其他仅提到君主的名字而没有任何头衔或者进一步暗示的迦罗西蒂铭文或古印度语铭文。R. 哥什曼的《贝格拉姆:贵霜历史的考古研究》,兼《法国考古队关于阿富汗的论文集》,第3卷,1946年,第105页。

④ 班纳吉-赛斯特里:The Aya Months,载《比哈尔语(Bihar)和奥里萨奥里萨(Orissa)研究会学刊》,第23卷,1937年,第261-268页。

⑤ S. 科诺:《印度-斯基泰编年注》,载《印度历史学刊》,第7卷,第1-46页。

⑥ S. 科诺:《印度-斯基泰编年注》,载《印度历史学刊》,第7卷,第19页。

⑦ S. 科诺:《印度-斯基泰编年注》,载《印度历史学刊》,第44页。

⑧ S. 科诺:《萨姆瓦特 299 的秣菟罗铭文注》,载《克·比·帕萨克纪念卷》,普那,1934年,第262-268页。

⑨ N.G. 马嘉姆达:《出自查萨达两个纪念盒上的铭文》及《纪念盒 I 上的 303 年的第一则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20卷,1948年,第107-119页。

⑩ S. 科诺:《303年的查萨达加罗西蒂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20卷,1948年,第107-119页。

⑪ S. 科诺:《303年的查萨达加罗西蒂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20卷,1948年,第115页。

⑫ 而且,根据科诺的推理,卡拉特斯的铭文应该是公元前72年,咀叉始罗银涡形饰当为公元79年。在当时接下来的情况里,他推测这些铭文分别是由阎膏珍和丘就却发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使父子相隔151年的观点是无法接受的。

⑬ S. 科诺:《关于印度铭文中时代的札记》,载《印度古物》,莱顿,1947年,第193-197页,特别是第197页。

⑭ 见本书第4章中有关此问题的部分。

⑮ S. 科诺:《关于印度铭文中时代的札记》,载《印度古物》,第195页。

⑯ 这同样的观点和哥什曼关于毛俄斯的纪元相符,见 R·哥什曼的《贝格拉姆:关于贵霜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第105页。

⑰ F.W. 托马斯:《印度铭文汇编评述》,第2卷,《神学学者通报》,193期,柏林,

1931年,第1-15页,特别是第10页。

⑳ K. P. 加雅斯瓦尔:《塞种 - Satavahana 历史问题》,载《比哈尔语和奥里萨研究会学刊》,第16卷,1930年,第227-316页,特别是第245-248页。

㉑ 见第7章及 K·P·加雅斯瓦尔:《塞种 - Satavahana 历史问题》,载《比哈尔语和奥里萨研究》,第16卷,1930年,第227-316页。

㉒ F. W. 托马斯:《印度铭文汇编评论》,第2卷,《神学学者通报》,193期,1931年,第10页。

㉓ K. P. 加雅斯瓦尔:《塞种 - Satavahana 历史问题》,载《比哈尔语和奥里萨研究》,第16卷,1930年,第227-316页,特别是第245页。

㉔ S. 科诺:《印度 - 斯基泰的贡献》,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1916年,第2卷,第813页。

㉕ F. 基尔霍恩:《和超日纪元相联系的问题的调查》,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20卷,第124-142页和第397-414页,特别是第404页。

㉖ F. W. 托马斯:《印度铭文汇编评述》,第2卷,《神学学者通报》,193期,1931年,第14页。

㉗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134页。

㉘ 201,按科诺的观点帕提亚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49年或公元前259年,塞种留下的最古老的铭文是58年的。

㉙ 塔恩也得出结论说不可能有个帕提亚时代,他认为肯定是个塞种时代。

㉚ K. 德·B. 考德林顿:《从最早时代到笈多王朝——附关于中世纪建筑和雕刻注释》,附威廉·罗森斯泰因关于印度建筑的序言,伦敦,1926年,第38页。

㉛ 详见本书第2章,第99页。

㉜ J. F. 弗里特:《评 E·C·拉普森的〈从最早时代到公元2世纪〉》,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14年,第795-799页,特别是第798页。

㉝ 接下来所谈的这个问题详见本书第2章第89页以后。

㉞ 关于犍陀罗艺术只是在迦腻色迦以后繁荣的更进一步的证据,见第2章。

㉟ 见该章后半部分。

㊱ S. 科诺:《134年卡拉万铜盘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2年,第959页。

㊲ 《后汉书》,第118章, E·查万奈斯《〈后汉书〉中的西欧国家》, T'oung Pao, 系列2, 第8卷, 莱顿, 1907年, 第149-234页。特别是第187-192页。

㊳ 卡宁汉姆已进行了推测,见《贵霜钱币》,载《钱币编年》,第三系列,伦敦,1892年,第40-82页,特别是第41页。

⑨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57-61 页。

⑩ 对该王我们使用冈多法内斯这个名字,因为他名字的这种形式已变得通用;我们遇到的其他拼写形式还有:Guduphara, Gudaphara, Undopherres, Hyndopherres, Gundophare 等。

⑪ E. J. 拉普森:《汇编评论》,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30 年,第 186-202 页,特别是第 188-190 页。

⑫ 关于吉霍尼迦,详见第 7 章。

⑬ K. P. 加雅斯瓦尔:《塞种 - Satavahana 历史的问题》,载《比哈尔语和奥奥里萨研究学会学刊》,第 16 卷,1930 年,第 227-316 页,特别是第 310 页。

⑭ K. P. 加雅斯瓦尔:《塞种 - Satavahana 问题》,载《比哈尔语和奥里萨研究学会学刊》,第 18 卷,1932 年,第 7-16 页。

⑮ H. M. 艾略特:《印度历史学家自己所叙述的印度历史》,伦敦,1867-1877 年,第 1 卷,第 106-110 页。

⑯ 同上书,第 6 卷,伦敦,1875 年,第 547-548 页。

⑰ 见本章后半部分。

⑱ F. W. 托马斯:《印度铭文汇编》,第 2 卷,《神学学者通报》,193 期,1931 年,第 1-15 页,特别是第 4 页。

⑲ E. J. 拉普森:《汇编评述》,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0 年,第 191 页。

⑳ S. 科诺:《303 年查萨达加罗西蒂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 20 卷,第 107-119 页,特别是第 117-119 页。

㉑ 例如, E. 斯派赫特:《迦腻色迦统治时的印度 - 斯基泰时代》,载《亚洲学刊》,系列 9,第 10 卷,1897 年,第 152-193 页,特别是第 158-162 页; V. 史密斯:《印度历史上的贵霜或印度斯基泰时期(公元前 165 - 公元 320 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刊》,1903 年,第 23-28 页。

㉒ S. 列维:《印度 - 斯基泰的诠释》之二《历史学文选》,载《亚洲历史学刊》,系列 9,第 9 卷,1897 年,第 7 页; 哈里·查兰·高什:《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印度历史季刊》,第 5 卷,加尔各答,1929 年,第 49-80 页,特别是第 60 页; K. P. 加雅斯瓦尔:《塞种 - Satavahana 历史问题》,载《比哈尔和奥里萨研究会学刊》,第 16 卷,1930 年,第 227-316 页,特别是第 243 页。

㉓ G. 哈楼恩:《关于月氏问题》,《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 91 卷,1937 年,第 243-318 页,特别是第 259 页。

㉔ 《前汉书》,第 96 章, A. 威勒,《西域注》,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

刊》，第 11 卷，伦敦，1882 年，第 84 页。

⑩ 司马迁：《史记》，第 123 章。F.W. 米勒：《吐火罗和贵霜》，见《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18 年，第一卷，第 566 - 586 页，特别是 571 页。

⑪ 班固《前汉书》，第 96 章 A；J·马夸特，鄂莱恩萨尔(Eransahr)，第 202 页。《前汉书》，第 61 章。

⑫ 在我们看来，该王并非指一个单独的人，可找到此种例子，《后汉书》第 118 卷这样说道：大月氏被叫作贵霜王，所有国家都把他们的王叫做贵霜王，但是汉朝仍沿用其过去的称号，把他们叫做大月氏。（《后汉书》只有 90 卷，作者这里可能有误。——译者）E·查万奈斯，T'oung Pao，系列 2，第 8 卷，莱顿，1907 年，第 187 - 192 页，特别是第 192 页。或许此“王”和古希腊资料中的(Saka-r)auloi 或着(Saka-r)auk(c)ai 相当。

⑬ 《前汉书》，第 6 章 A。该段在下面引用。

⑭ 《前汉书》，第 61 章，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第 10 卷，伦敦，1881 年，第 69 页。

⑮ 《前汉书》，第 61 章；A·威勒，《西域注释》，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刊》，第 10 卷，第 69 页。该段又见马端临的《文献通考》，A·雷姆萨特翻译，显然，是从《前汉书》中转摘过去的。

⑯ 马夸特认为，大夏(Ta-hsia)就是吐火罗，见 J·马夸特，鄂莱恩萨尔，第 204 页。

⑰ 《前汉书》，第 96 章 A；又见 A·威勒，《西域注释》，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第 10 卷，第 34 页。

⑱ 《前汉书》，第 96 章 A，又见 J·威勒，《西域注释》，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第 10 卷，第 41 页。

⑲ 桑原实造：《东西方交流论文集》，1933 年；藤田丰桥：《月氏的原住地及其西迁的日期》，《东洋学报》，第 6 卷，1916 年 10 月；安间矢一郎：《论月氏西迁》，《史学杂志》，第 43 卷，1932 年 5 月，第 657 - 669 页。

⑳ G·哈楼恩：《关于月氏的问题》，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 91 卷，第 247 页以后。

㉑ E.J. 拉普森在《剑桥印度史》第 1 卷第 66 页中确定为 126 年。哈楼恩则认为是 129/8 年，不过他在注释中也留有余地，即认为张骞在一年后到达。

㉒ S·科诺：《134 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2 年，第 958 页和《印度铭文汇编》，第 103 - 104 页。

㉓ G·哈楼恩：《关于月氏的问题》，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 91 卷，第 248 页。

㉔ 反对公元前 129 年仍有一个时代的进一步的证据，见本章后半部分。

㉕ G·噶得纳：《大英博物馆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和斯基泰诸王的钱币》，伦

敦,1886年,第40页。请进一步参考本书第7章。

⑫ 加斯蒂纳斯,416.3。不同的版本不时有分歧。我们使用O·希尔的版本,陶伯纳编辑,莱比锡,1935年。

⑬ 加斯蒂纳斯,416.3。不同的版本不时有分歧。我们使用O·希尔的版本,陶伯纳编辑,莱比锡,1935年。

⑭ 加斯蒂纳斯,42.1.2。

⑮ 加斯蒂纳斯,42.2.1-2。S·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25页。

⑯ S·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25页。

⑰ 斯特拉伯:11,11,2;引述的旧方法C.516-517。我们使用的是H·L·约翰斯所编辑的文本,《斯特拉伯地理志》,伦敦,1928年。

⑱ S·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29页。

⑲ 斯特拉伯,11,9,2或者C.515。

⑳ 哈楼恩说:“那种认为月氏在公元前160年就已经把希腊人驱逐出粟特的假设已被放弃。”见《关于月氏问题》,载于《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91卷,第249页。

㉑ 奥罗修斯编:《C.ZANGEMEISTER》,维也纳,1889年,第5本,第4章。

㉒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271-273页。

㉓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第1卷,第461页。

㉔ 加斯蒂纳斯:第41章引言。

㉕ 斯特拉伯:11,8,2;C.511。

㉖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283页。

㉗ A·赫尔曼:《经典古代科学知识实用百科全书》,第2版,系列1,斯图亚特,1914年,第1770条到1806条,特别是第1788条。

㉘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283页。

㉙ S·科诺:《303年的查萨达迦罗西蒂铭文》,《东方资料实录》,第20卷,1948年,第113页。

㉚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284页和294页。

㉛ 又见L·巴赫霍夫:《论印度的希腊人和塞种人》,载《美国东方学会学刊》,第61卷,第223-250页。

㉜ 希罗多德:《历史》,第7卷,第64页。

㉝ 大流士一世,Naksh-I-Rustam,a,3.;W·嗨恩兹(W·Hinz):《古代波斯词汇》,莱比锡,1942年,第124页以后。

㉞ 普里尼斯:《自然历史》,卷6,50;我们使用C·梅霍夫的版本,陶伯纳编,莱比锡,1906年。

⑮ S. 科诺:《关于斯特拉伯 11.8.2. 的注释》, *Symbolae Osloenses*, fasc. 24, 奥斯陆, 1945 年, 第 148 - 150 页。

⑯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 剑桥, 1938 年, 第 288 页。

⑰ 《前汉书》, 第 96 章 B, A·威勒译, 《西域注》,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 第 11 卷, 伦敦, 1882 年, 第 84 页。

⑱ 《前汉书》, 第 96 章 A, 威勒译, 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 第 10 卷, 第 34 页, 也见第 31 页注 118。

⑲ G. 哈楼恩:《关于月氏的问题》, 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 第 91 卷, 第 243 - 318 页, 特别是第 276 页。

⑳ W. W. 塔恩:《巴克特里亚的入侵者》, 载《塞琉西斯 - 帕提亚研究》, 《1930 年英国研究院记录汇编》, 1930 年, 伦敦, 第 105 - 135 页。

㉑ E. 西格:《吐火罗的一个当地名称》, 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柏林会议人种学图示姿势》, 1918 年, 第 1 卷, 第 560 - 565 页, 特别是第 564 页。

㉒ A. J. 范·温德肯斯特:《白匈奴与 Arçi, 关于“吐火罗人”之称谓》, *Le Muséon*, 第 54 卷, 卢旺, 1941 年, 第 161 - 186 页; 载《吐火罗方言中的词源学词汇》, 卢旺, 1941 年, 第 15 - 27 页。

㉓ W. 考夫罗尔:《吐火罗文字知识》, 《路德斯东方年报》第 10, 莱顿, 1945 年到 1948 年, 第 561 - 571 页, 特别是 563 页。

㉔ J. 查本蒂尔:《吐火罗的人种学图解姿势》, 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 第 71 卷, 1917 年, 第 347 - 388 页, 特别是第 357 页以后。

㉕ 狄吉涅:《若干历史事件研究——关于巴克特里亚希腊王, 尤其是其王国为斯基泰毁灭的历史》, 载《皇家题铭与文学院史》, 第 25 册, 第 2 部, 巴黎 1759 年, 第 17 - 33 页, 特别是第 26 页。

㉖ W. 考夫罗尔:《吐火罗文字知识》, 《路德斯东方年报》第 10, 莱顿, 1945 年到 1948 年, 第 562 页。

㉗ H. W. 柏雷:《Tiangara》, 载《东方研究流派公告》, 第 8 卷, 伦敦, 1935 - 1937 年, 第 883 - 921 页, 特别是第 912 页。

㉘ H. W. 柏雷:《Asica》, 载《哲学学会会报》, 伦敦, 1946 年, 第 1 - 38 页, 特别是第 1 - 3 页。

㉙ E. 西格:《再论“吐火罗人”》, 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柏林会议》, 1937 年, 第 130 - 139 页。

㉚ G. 哈楼恩:《关于月氏的问题》, 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 第 91 卷, 第 253 页, 注 4。

⑩ 《摩诃功德天》，孟买文献版，II，51，1850；III，51，1991；III，177，12350；VI，75，3297；VII，73，3652；VIII，88，4506；VII，65，2429。Harivasa I，5，20(311)；I，14，20(784)，II，57，20；《The Parisistas of the Atharvaveda》，有 G. 麦尔维尔·柏菱和朱里斯·范·耐格莱恩，莱比锡，1909 - 1910 年，第 1 卷，第 351 - 178 页。

⑪ 冈达教授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人名也有联合现象，例如，Sindhur 和 Sauvira，可以推定一个是人名，另一个是他们居住的地域。见 F·E·帕吉塔，《The Markandeya Purana》，译注本，加尔各答，1904 年，第 315 页。

⑫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288 页。

⑬ 温森特·史密斯和我们的观点一样，他说：“古代印度已经习惯于使用塞迦(Saka)这个词，这是一个模糊的方法，用以表示从其他要塞来的所有外国人，并没有很好地区分种族和部落……”，《牛津学生印度史》，1908 年，第 22 页。

⑭ 福里菲斯·阿利亚纳斯：《亚历山大远征》；伊力夫·罗伯森编的《The Loeb 古典文库》，伦敦，1929 - 1933 年，第 2 卷，第 234 页。

⑮ 《前汉书》，第 96 章 A. A·威勒译，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第 10 卷，第 34 页，引述于第 31 页，也见注 118。

⑯ J. F. 弗里特：《早期笈多诸王和其继承者的铭文》，第 3 卷，加尔各答，1888 年，第 8 页。如果欧·梅因巨 - 海尔芬和巴赫霍夫关于贵霜人是塞种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观点就更简单了，《月氏问题再调查》，载《美国东方学会学刊》，1945 年，第 71 - 81 页和注 88。

⑰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283 - 284 页。

⑱ 见本章注 95 中的引文。

⑲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494 - 502 页，特别是第 496 页。

⑳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500 页。

㉑ S. 科诺：《303 年查萨达加罗西蒂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 20 卷，1948 年，第 115 页。

㉒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14 - 15 页。

㉓ 关于此点请见本书第 7 章。

㉔ 《前汉书》，第 96 章 B，《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学刊》，第 11 卷，第 84 页。

㉕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34 页。

㉖ E. J.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第 1 卷，第 575 - 576 页。

㉗ 该年代的版本见本章后的附录。

㉘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325 页。

⑩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294页。

⑪ 加斯蒂纳斯,第42章,2,1-3。

⑫ 《加斯町全集》,摘自《Trogue Pompee 通史》,法文本有朱尔·皮埃尔和E·布瓦塔翻译。M.E.佩索诺重新审定版,巴黎,无日期,第372页。

⑬ G.哈楼恩:《关于月氏问题》,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91卷,第243-318页。

⑭ A.J.范·温德肯斯:《白匈奴和 Ar ç i》,《吐火罗名称考》,载《Le Muséon》,洛温(Louvain),1941年,第15-27页。

⑮ W.W.塔恩:《巴克特里亚的入侵者》,载《塞琉西斯-帕提亚研究》,《英国研究院的活动》,1930年,伦敦,第105-135页,特别是116页。

⑯ 斯特拉伯,11,8.2;CS11。

⑰ 关于此问题进一步见本书第7章。

⑱ S.科诺:《印度铭文时代注》,载《印度古物》,第195页。

⑲ 见本章前半部分。

⑳ 该铭文本是第78,H·路德斯:《从最早时代到公元400的婆罗迷铭文表,阿育王的除外》,《印度铭文及印度考古综述记录》,第10卷,加尔各答,1912年。此后简称路德斯表。

㉑ G.布勒:《秣菟罗的铭文本发现》,载《研究院》,第49卷,1896年5月2号,第367-368页;《秣菟罗的铭文发现》,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896年,第578-581页;《秣菟罗铭文的发现》,载《维也纳东方文化学刊》,第10卷,1896年,第171-174页。

㉒ V.史密斯:《印度历史的贵霜或印度-斯基泰时期(公元前165至公元320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03年,第1-64页,特别是第38页。

㉓ R.D.班纳吉:《印度历史的斯基泰时期》,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37卷,1908年,第25-75页。

㉔ 同上书,第40页。

㉕ S.科诺:《关于萨姆瓦特299的秣菟罗铭文的注释》,载《K·B·帕特哈克纪念卷》,浦那,1934年,第264页。

㉖ S.科诺:同上书,第264-265页。

㉗ G.布勒:《印度古文字学》,载《印度-Arishen 语言学和古代文化概述》,第1卷,第11期,斯特拉斯堡,1896年。

㉘ S.科诺:《关于萨姆瓦特299年秣菟罗铭文的注释》,载《克·比·帕特哈克纪念卷》,浦那,1934年,第265-266页。

㉙ S.科诺:同上书,第67页。

⑩ 同上书,第 268 页。

⑪ 关于婆罗迷铭文的细节,见本书第 4 章和第 5 章。

⑫ 见本章前半部分。

⑬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106 页,又见《关于萨姆瓦特 299 的秣菟罗汇编》,载《K. B. 帕特哈克纪念卷》,第 267 页。

⑭ A 福色尔:《健陀罗希腊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490 页。

⑮ S. 科诺,《303 年的查萨达加罗西蒂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 20 卷,1948 年,第 115 页。

⑯ 见本书本章前半部分。

⑰ 路德斯是惟一似乎觉察到了 299 这个日期的确有问题的,这是通过奥斯陆的乔治·摩根斯蒂格恩的笔记判断的,该笔记是他 1915 年在柏林听路德斯的讲座时记下的。路德斯对此日期表示疑惑,他建议读作 *sam*, 而不是 200。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该日期在此中被放在第 1 行的末尾,其形式为 *svarvaccharasvate*……,这表明无论如何有个数百的问题。我们非常衷心地感谢乔治·摩根斯蒂格恩教授,他惠借给我们他的笔记本,其中就有路德斯在上关于婆罗米铭文课时所作的评论。

⑱ G. 布勒:《印度古文字学》,表 9。

⑲ E. J. 拉普森:《安陀罗(Andhra)王朝、西郡太守、Traikūṭaka 王朝和“菩提”(“Bodhi”)王朝钱币目录》,伦敦,1908 年,第 208 页。

⑳ 在路德斯表第 25 中还能找到一个例子, a 的正上方有——条水平线(不过它不是 a.);拓本在《印度铭文》,第 2 卷,1894 年,在 A 行第 13: *asyā*。

㉑ R. D. 班纳吉:《印度历史的斯基泰时代》,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 37 卷图 3。

㉒ 《印度铭文中的拓本》,第 2 卷,1894 年,第 26 页。

㉓ S. 科诺:《303 年的查萨达铭文》,载《东方资料实录》,第 20 卷,1948 年,第 117 - 119 页。

㉔ 即只是 72 年的铭文(在索达萨统治期间),以及 199 年出自秣菟罗的铭文。

㉕ 详见本书第 6 章。

㉖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70 页。

㉗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考古和历史研究》第 135 页和第 174 页。

㉘ 见卡宁汉姆:《考古调查报告》,第 10 卷,加尔各答,1880 年,附录,第 127 页。

㉙ F. 基尔霍恩:《论铭文中塞种时代的年代》,载《印度考古工作者》,第 26 卷,1897 年,第 146 - 153 页。

㉚ 见本书本章开头。

㉛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117 - 118 页及 138 页;《134 年卡拉万铜盘铭文》,

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32年，第964页。

⑳ H. 路德斯：《三则早期的婆罗迷铭文》，载《印度铭文》，第9卷，1907-1908年，第239-248年，特别是第243-246页。

㉑ G. 布勒：《印度古文字学》，表9。

㉒ E. J.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第1卷，第576页。

㉓ E. J. 拉普森：《秣菟罗阿莫西尼还愿性碑的年代》，载《为纪念查尔斯·罗克威尔·兰曼的印度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1929年，第49-52页。

㉔ 同上，第51页。

㉕ F. 基尔霍恩：《路德拉达曼的鞠纳噶德（Junagadh）岩石铭文》，载《印度铭文》，第8卷，1905-1906年，第36-49页，特别是第44页拓本。

㉖ 从旧纪元的42年到塞种时代的140-279年 = 从公元前87年到公元218-357年，此间有305-414年，就是说有3到4个世纪。如从旧纪元72年算起，那么就少了30年，为275-414年。

㉗ 拉坚卓拉拉·米特拉：《关于出自秣菟罗梵文铭文的诠释》，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39卷，第一部分，1870年，第117-130页，特别是第6则铭文，第15则铭文。

㉘ J. 多森：《出自秣菟罗的古代铭文》，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新系列，第5卷，1871年，第182-196页，特别是第4则铭文。

㉙ E. J. 拉普森：《秣菟罗阿莫西尼的还愿碑的年代》，载《为纪念查尔斯·罗克威尔·兰曼的印度研究》，第52页。

㉚ H. 路德斯：《出自秣菟罗的塞种-贵霜时期铭文中表示70的符号》，载《东方资料实录》，第10卷，1932年，第118-125页。

㉛ E. J. 拉普森：《塞种-贵霜时期铭文中的数字40》，载《东方资料实录》，第11卷，1933年，第260-264页。

㉜ J. 柏格斯：《关于佛教窟庙及其铭文的报告》，载《印度西部的考古概述》，第4卷，伦敦，1883年，第102-103页，图102，第9及图104，第11。

㉝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第3卷，第30页以后。

㉞ 见本书第4章及第5章和表C。

㉟ 关于纳哈般纳的年代及后来阿雅玛和拉萨巴达塔的年代见第7章。

第二章 印度西北部的艺术

当确定犍陀罗艺术年代时,大多数作者要么从风格批评的评论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和罗马艺术被特地用做“中间比较物”;要么从迦腻色迦圣骨箱及比玛兰(Bimarān)圣骨箱的审美欣赏出发,并且一些关于纪元的假说也发挥了影响,从而这些纪元中的一些雕像的年代得以确定。第一种方法是从编年上确定印度西北部这一流派,如果小心使用,在一些情况下无疑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事先肯定要抛弃其他两种方法,稍后我们会看到这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各种观点已经被提出来,我们将按年代顺序对其中主要的给予总结。

亚历山大·卡宁汉姆爵士(Sir Alexander Cuninghām)首先于1871年就犍陀罗艺术年代做出科学性的结构判断^①。根据他的观点,该艺术的黄金时代发生在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即从大约公元前40年到公元100年,而一些雕刻则已确定为约公元前80年。卡宁汉姆辨明这一时代,其中一些君王治内的雕刻被确定为超日纪元。而且,他认为这一时代的奠基者是阎膏珍^②,所以,迦腻色迦的统治开始于约公元前40年^③。为什么卡宁汉姆把繁荣期定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我们在此不予考虑,因为它会使我们陷入太繁冗的讨论中。

1883年,卡宁汉姆用塞琉西斯的纪元辨明迦腻色迦纪元,他省去了数字400,以致使迦腻色迦登基发生于公元80年。接着卡宁汉姆假定印度一斯基泰统治印度北部约终结于公元190年^④。由于观点的这一变化,他关于犍陀罗艺术黄金时代的日期也必须

改变。实际上,卡宁汉姆于1889年1月8日在致温森特·斯密斯的一封信中相应地确定了该日期:“因此,我愿意把所有更伟大的作品——包括雕刻和建筑——归于迦膩色迦、护毗色迦和韦苏提婆治下贵霜的繁荣期,或者说从公元80年到公元200年。”^⑤

1876年,福噶森(Fergusson)提出一个观点,和卡宁汉姆的观点直接相矛盾。为了简洁的缘故,我在此省去,他把犍陀罗繁荣时期定在公元400年,整个流派从公元前1世纪持续到基督纪元的第8世纪^⑥。

1889年,温森特·斯密斯区分出古希腊、罗马对印度西北部的影响。以他的观点,他把此地区的艺术称为“印度-罗马流派”(Indo-Roman School),此流派约于公元200年产生,最迟在公元350或450年衰微^⑦。1903年,斯密斯把繁荣期回推到公元100至300年^⑧。1904年,正如他于1911年所提出的一样,他写道,他认为繁荣期应和迦膩色迦统治一致^⑨:“无论迦膩色迦这位受赞美的犍陀罗之王的年代被确定在何时,古希腊化雕刻最好时期的年代也将会得知。其中很多雕刻无疑和他同时代,虽然一些早些,另一些晚些。不用进行复杂的考古讨论,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在此说这些雕刻中没有晚于公元600年的;如果有迟于公元400年的话,也为数不多;有极少几个是早于基督纪元的。该流派的艺术顶峰时期可能划定在约公元50年至公元150或200年之间。”^⑩

斯密斯关于犍陀罗艺术年代观点摇摆不定,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是由于他对迦膩色迦统治初年的观点的不断的变化。1889年,他假定该君王统治从公元78年到约公元110年^⑪。1903年他又设定此期为从公元125年至公元152年^⑫。1911年他又回到前面的观点^⑬,1919年他则又力持公元120年作为迦膩色迦登基的日期^⑭。

1890年,艾麦尔·森纳特(Emile Senart)指出福噶森试图确定印度西北部艺术年代时所犯的一些错误。由于犍陀罗对公元2世纪

的阿玛拉瓦蒂(Amāravatī)的影响已被说明,森纳特的观点是:“这种艺术的繁荣和大传播时期早于公元2世纪后半期”^⑮,而且“……迄今为止,我们不敢太冒险说在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中大量雕刻重新传入”^⑯。

下一个提出自己观点的是阿尔弗莱德·格伦威德尔(Alfred Grünwedel)。在《印度佛教艺术》(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一书的编年表中,他假定犍陀罗流派的起点约在公元100年左右,他把公元4世纪解释为“犍陀罗的主要建筑时期”^⑰。在该书其他地方,他把该流派的始点提早一个世纪:“就风格上的根据而言,大多数是源于希腊-罗马艺术,其形成的时间大概只应在基督诞生到公元4世纪之间。”^⑱

格伦威德尔之后是福色尔,1894年起,他一直非常深入细致地研究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年代问题。最初,他同意森纳特的观点^⑲,但是后来,根据他自己及其他人的意见^⑳,由于同时发现的沙-吉-柯·德里圣骨箱的颓废风格^㉑,他做出决定说:“希腊佛教艺术流派的形成显然早于迦腻色迦。”^㉒结果,他把印度西北部艺术的起源归于公元前1世纪,把其繁荣期归于公元1世纪,繁荣期后于公元1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衰微^㉓。

1903年,沃格尔宣称,在他看来,一些出自犍陀罗肖像所在的年代,肯定是塞琉西斯时代,他同意森纳特的意见,认为基督纪元后的头两个世纪是其繁荣期,而此后,真正希腊传统就开始退化或印度化了^㉔。

后来,他没有再触及所讨论的这些年代既定的铭文所属时代之事,但是,他同意福色尔的观点,认为由于迦腻色迦圣骨箱,此派的黄金时代在迦腻色迦统治之前即已过去,“就是说,大概在公元2世纪初”^㉕。

1919年,高莱恩噶·纳斯·班纳吉(Gauranga Nath Banerjee)也同意福色尔,只是他对该期的持续时间给定一个更宽的范围,即从公

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④。在他看来,迦腻色迦纪元和超日纪元相同,结果是,当按此推理进行的话,人们不得不下结论说他把犍陀罗繁荣期甚至归到公元前 58 年以前。

接下来的赫金(Hackin)于 1923 年^⑤发表其观点,他把颓废期放得更晚,即作为白匈奴入侵的一个结果,只会在公元 5 世纪。

大多数考古学家同意福色尔下列观点的大部分或全部:在迦腻色迦统治期间,犍陀罗艺术的繁荣期已经结束。仅提下面几位学者:亚当姆(Adam)^⑥、谢尔曼(Scherman)^⑦、格罗塞特(Grousset)^⑧、沃格尔^⑨、班纳吉^⑩和瓦尔德施米特^⑪。

接下来,在编年学上跟踪巴赫霍夫 1925 年在其《犍陀罗雕塑年代考》(zur Datierung der Gandhara - Plastik)中的观点,他 4 年后的《印度早期雕塑》手册几乎是前本书的逐字复制,但是,我们先把对此的讨论放一下,稍后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它。

库玛拉斯瓦米(Coomaraswamy)也假定印度西北部艺术的生命期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或者 4 世纪。不过和福色尔相对照,他把繁荣期放在了迦腻色迦统治期^⑫,据他的观点,迦腻色迦统治期为公元 120 年到公元 160 年。

有近 10 年时间关于此问题没有新观点提出,直到 1936 年,罗兰德(Rowland)在比较罗马艺术和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基础上认定,后者是在公元 1 世纪中期之后产生的,而其繁荣期则是从公元 2 世纪末到公元 4 世纪初^⑬。他否认沙 - 吉 - 柯·德里的圣骨箱是由迦腻色迦供奉的,并把它归于公元 3 世纪。根据他的观点,比玛兰圣骨箱也比迄今为止的假定要晚几个世纪。在某些方面,他的观点很类似于温森特·史密斯和福色尔的观点^⑭,例如,当考虑到从罗马帝国输入工匠时:“考虑到作为古希腊晚期艺术风格发展的一部分,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所谓希腊 - 佛教雕刻的大多数是一种突发性的、深入的群众性生产的结果,其时间不会早于公元 2 世纪,而且全部是从东罗马引人的匠人的作品。”^⑮

1945年,布赫萨尔,像罗兰德一样,基于和罗马时代的艺术进行风格对比之上,提出一个年代。他的观点是犍陀罗艺术从公元2世纪持续到公元5世纪^③。

最后,1946年,哥什曼提出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开始于公元1世纪,鼎盛期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继而是一段稳定期,最终于公元3世纪下半叶颓废^④。

概括起来说,我们因此可见几位较老的考古学家把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兴盛期定在公元2世纪末以前,其原因为该艺术对阿玛拉瓦蒂(Amarāvati)艺术的影响,以及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可能由于该君主已极大地提高了美术的传统地位。在发现该君王的圣骨箱后,福色尔改变了他的观点,大多数考古学家赞成他的观点^⑤。

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是否是由于希腊、希腊化或者罗马的影响,这种讨论已进行多年,且反复掀起新的热情,陷入这种讨论并无益处。致力于此问题的大量文献几乎全部出自原来的古典考古学家,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探寻自己研究领域对邻国的影响的痕迹总是有意思的。同样,印度主义者总是非常感兴趣于印度对东南亚和中亚的影响。不过,和此相联系的危险是人们开始看到“乱七八糟”的影响,它根本不存在,或者影响程度较轻微,这当然是大量探讨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大部分文献的情况^⑥。

不过,虽然关于西方对印度西北部影响的观点不同,但是,在我们看来,无可争议的是,该艺术中的观念常常源于印度本土艺术,而后者又是发凡于巴尔胡特(Barhut)和山奇的先前阶段。我们并不总是能寻找其发展的踪迹,因为对比双方,要么这一方,要么另一方缺乏比较的材料。在犍陀罗,印度观念总是带有希腊化时的外表,但是,有几个例子,不仅其观念,而且某种宗教场景的设计和制作都是简单地复制古代民族艺术。作为例子之一,我们愿意提出诸如佛陀从忉利天宫(Trayastrimsa Heaven)降临(见插图1)。此处场景的整个设计已直接从印度艺术中复制出,因为它看起来

好像印度较古老的艺术样品,其中佛陀尚未被体现出来(见插图2),此图样已存在很长时间了^②。在犍陀罗,我们可见画面中央“面向前方的”三组合式梯子,佛陀站在中间的一个上,在他的右侧和左侧分别是天神梵天和因陀罗。有时两侧还有大量的神^③,但是这也不是一个新主意,因为这些在较古老的印度艺术中也经常出现(见插图3)。如果印度西北部的雕塑家有些创造力,而且想有自己的表现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毫无困难地用种种不同的手法描绘同一场景,例如,给倾斜的梯子一个侧面视角,这就会使画面设计更清楚。另一例子表明,古代印度艺术形成印度西北部艺术之基础是描绘因陀罗拜访佛陀的画面(见图3.9.35及插图7)^④。

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印度对犍陀罗的影响比迄今为止一般所总结的更大。另一方面,西方影响可能比一般的推测要更小,特别是在公元后的诸世纪里。在犍陀罗艺术的黄金时代,几乎没有发现有西方的直接影响;能使人们想到西方艺术的在更大程度上是真正受西方影响时期的那些成分,而非此期的。此期大概接近帕提亚统治印度西北部时期,包括公元1世纪一部分,其时,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权已由帕提亚人转到斯基泰人的手中。这些帕提亚君主可能从希腊化时期的西方复制并输入了许多,以追随帕提亚和阿尔萨西斯诸王的典型。不幸的是我们对阿尔萨西斯艺术所知甚少^⑤,但是,他们无疑感觉到了古希腊化的强大吸引力^⑥,特别是从这样的事实判断:他们的钱币均为希腊型的,上面带有称号^⑦。另一个表明方向性的事实是,在阿尔萨西斯王国,希腊语是官方语^⑧,已经发现此期这些君主的几则希腊铭文。结果是,印度大多数艺术物品和发现于亚历山大城及其他同时代城镇中的艺术品非常相似^⑨,很可能它们是这些帕提亚君王经由阿尔萨西斯王国,或从海路输入印度的,或者是在当地复制的^⑩。在帕提亚统治者以前的印度-大夏诸王时期,这种输入就已经开始的可能性肯定不能排除。



插图1 德鲁夫，提拉鼓形石块上的浮雕，表现的是佛陀从忉利天宫降临。从出自犍陀罗的一件样品上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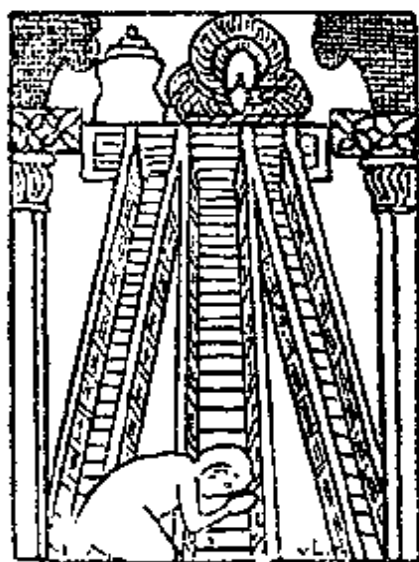


插图2 秣菟罗寇松考古博物馆的浮雕，表现的是佛陀从忉利天宫降临(据J.J. 包伊勒斯的照片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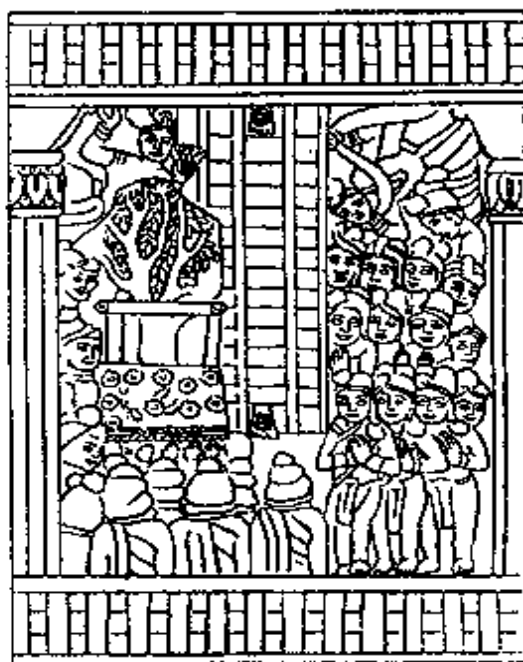


插图3 巴尔胡特扶栏上的浮雕，表现的是佛陀从忉利天宫降临(O. L. 新系列,第16卷)。

比玛兰著名的、充分讨论过的圣骨箱(见图1)迄今为止总是

被归于帕提亚统治时期。在尖形穹窿顶下方的侧边之间有苍鹰遨翔,可见诸多人物,其中之一是佛陀。他的身体姿态闲适,右手呈施无畏印放于胸前,头顶上有一个肉髻,而且胡须引人注目。众人站在他左右两侧,在尖形穹窿顶下面,每个人都面向佛陀,呈明显的崇拜姿态。巴赫霍夫把右侧的那个人称为做杂役的僧侣^⑤,考德林顿倾向于左边的是一个婆罗门苦行者,右侧的是一个王子的观点^⑥。不过,两个次要人物头背后的光环使他们具有神人的特点。而且以下事实使这两个人互相区别开来:右边的一个戴着头巾,身披长袍;而左侧的一个没戴帽子,头发盘成苦行僧式样的发结,留络腮胡子,身体的上身部分裸露,左手提一个小罐。该人物无疑代表梵天,而另一个人物是因陀罗或者释(Sakra),他们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两个神,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他们总是出现在佛陀的两侧。关于该圣骨箱日期最流行的说法是大约在公元前 50 年,因为它出土时在其下面有一些阿泽斯时代的钱币,所以学者们确信该圣骨箱应该是阿泽斯治内的,因此属于帕提亚时期的。

不过,对此说有些非常严肃的反对意见。首先,侧面的壁柱上带有一排尖形穹窿,壁柱的形状并不太古老。它们不仅扁平,而且一个小椭圆体^⑦在一个柱子的表面切出,犍陀罗艺术之初它并未出现在壁柱上,而是稍后出现的^⑧。就我们可以查到的最古老的雕刻并没有这种椭圆形。而且,我们观察到该圣骨箱上的图案,即由壁柱支承的一排尖形穹窿,使我们强烈地想到几个卒塔婆上的装饰,特别是喀布尔的什瓦吉(Shevaki)的卒塔婆,巴赫霍夫把它归到公元 3 世纪,而我们看来它无论如何是源于贵霜时代^⑨。在印度西北部的早期艺术里一排类似的尖形穹窿非同寻常。最古老时期仅有圆形、高而细的科林斯壁柱,在一排里形成两个不同浮雕间的隔离层,而且它们经常被放在一个单独的长方形的隔离部分里。后来的时代里,圆形科林斯柱不时出现,但是这时它们大多数粗短,且一头逐渐变细。

咀叉始罗的西尔卡普(Sirkap)镇出土了一处最引人注目的纪念祠,特别是通过在那儿发现的钱币判断,它是在丘就却统治时废弃的^⑤。马歇尔把它称为“双头鹰圣殿”^⑥。我们在此发现了一座卒塔婆,是置于基座上的,其上饰有科林斯柱,其中两个是圆的,4个是平的,请注意没有一个椭圆形。该建筑可能是在从圆形柱到平柱过渡期建立的。无论如何它是属于印度西北部早期艺术时期的。当该镇废弃时,此卒塔婆保存极好,显然它建筑于不久以前。但是,假定此纪念祠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例如50年,即使那样,该圣骨箱也该属于公元前后。假定此建筑属于公元1世纪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一事实:绘在基座上的4只鸟之一非常清楚是个双头鹰,遗憾的是其他3只鸟则无法辨识出了。按照约翰·马歇尔爵士的观点,它明确表现出斯基泰的影响。由于它是如此一个具体的斯基泰图案,假定帕提亚君主已经使用过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此双头鹰可能也表明该卒塔婆是建立于公元1世纪的事实,可能在丘就却统治时期。把该卒塔婆基座上的壁柱和比玛兰圣骨箱上的壁柱进行比较,我们一定能总结出该圣骨箱较晚,因为后者没有圆形壁柱,并且还由于我们在平体壁柱上没看到著名的椭圆形“压印花纹”。

因此,我们能够假定该圣骨箱最早属于公元1世纪,但可能为此期稍后的,因为伟大的迦腻色迦皇帝不可能订制一个从各方面看都很不精美的圣骨箱(见图2)。毫无疑问他委托的是当时最好的艺术家。但尽管如此,阿吉斯劳斯(Agesilaos)的作品无法和比玛兰的相竞争。而且,迦腻色迦以前的所有圣骨箱都是简单的pyeix,或者是小而圆的浅平盆子。即使王子,例如弥兰陀(Menander)王统治期的Viya kamitra也是非常简单的圣骨箱^⑦。没有发现一件能和比玛兰圣骨箱在各方面相比较的早期圣骨箱。另一方面,镶嵌着宝石过于浮华的背景使人想起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塞种时的粗野的艺术,他们的珠宝饰物上使用很多黄金和宝石。

从他们的菩萨像看到,他们摹仿斯基泰王佩戴无数的饰物和宝石。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尖形穹窿侧边之间鹰的图案也暗示出斯基泰人的影响。最后,我们愿再补充一则论据:如果比玛兰圣骨箱的确是属于公元前 50 年,那么,在接下来直到公元 1 世纪中叶为止的一个世纪里没发现一件佛陀像,这至少是奇怪的。西尔卡普因支持西尔苏克(Sirsukh)而遭废弃,它在丘就却治内仍有人居住;已出土的钱币表明,没有发现一件佛陀像,甚至连一个残片也没有。考德林顿对此难以理解,他说道:“在西尔卡普没有发现迟于阎膏珍时期的钱币,西尔卡普的问题非常大”。^⑧但是,他只是说明一下这一问题,而没有做进一步的工作。上面提及的事实表明,修正流行至今的观点是必要的。提出有利于该圣骨箱年代约在公元前 50 年的论据仅有以下几点:第一,发现一处仓库,其中有放着阿泽斯时期 4 枚铜币的圣骨箱;第二,该圣骨箱风格好;第三,发现圣骨箱的皂石饰瓶上铭文的古字体。特别是第一则论据已被反复强调。最后,R. 勒·梅(R. Le. May)^⑨再次加以强调,他把其日期定在比通常设定的要稍晚些,即在公元 1 世纪。

在我们看来,发现一枚钱币或许仅可用做确定当时年代的一个标准,该钱币当时仍在流通,显然是自然丢失的。发现类似情况的钱币,可用以计算有关钱币得以发现的地层的年代,但是,不能忘记的是钱币在印度保持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当出土一枚钱币,并显然明确此处为一个仓库时,情况大不相同。在此情况下,惟一可下的结论是圣骨箱不会比钱币更古老。不过,可得出一个不太成熟的结论:此仓库里的钱币当和其附近出土的钱币同时代,甚至它们同属一个君王的,磨损不太厉害^⑩。除此之外,作为一处仓库,还有些特殊的、珍贵的,而且肯定非同一般的東西。当然,可能有这样的反对意见,在那些时代钱币为珍贵之物,但是,毫无疑问,和花费的负担相比较,甚至金币也并不是这么有价值。因为,除了制作公众的圣骨箱外,工匠们也还必须使卒塔婆精美,或

者甚至还得施工,这些负担他们都得忍受。因此,一枚对捐献者而言价值甚微的流通着的铜币被用来储藏,这是不确实的。另外,根据已发现的贮藏物,一枚古钱被认为很珍贵,并不是因为其金属价值,而是因为其古老的特性。这是为储藏日期极不相同的窑藏钱财所证明了的。1879年,西姆普森(Simpson)在阿印·珀什(Ahin Posh)的卒塔婆里发现一窑钱币,其中有“特别”钱币,即阎膏珍时期的钱币(约公元1世纪中叶)和一枚略微磨损的 Julia Sabina 钱币^①。假如后面这枚钱币在到达印度并被储存起来前已流通了20年的话,那么应是公元128年 Hadrianas 新婚后马上铸造的,这样它最早是在公元 $128 + 20 = 148$ 年被储存起来的。因此,储存的时代和阎膏珍钱币的年代相差大约是一个世纪,但也可能更长。这最清楚地证明了旧钱币被用于储存。一则更有力的证据是在拉尔查克(Lalchak)一号卒塔婆发现的储藏物。考德林顿就此说道:“在一处毛石深处的地窑里发现了大量钱币,包括安提耳希达斯(Antialkidas)的那些”(约公元前130年),“迦德菲斯二世,印度-萨珊王及萨曼塔提婆(Samanta Deva)的那些”(约公元950年)^②。

所以对我们来说,用一枚出自地窑中的钱币作为断定年代的基础似乎是“特别的”错误,我们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此比玛兰圣骨箱是在阿泽斯时代后制造的。

第二则有利于说明此圣骨箱时间较早的论据是其良好的风格。这使我们又面临第二条准则,它在判定印度西北部艺术时时常使用,而在我们看来,它也是错误的。福色尔强调这一准则最甚,但在他之前和他以后,总是有人重复说“风格越好,年代越早”。甚至连库玛拉斯瓦米也赞成,他本来是经常和一般观点不同的^③。就该准则本身来说,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种很强的主观性评估会影响“好”、“坏”的判断。因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完全要靠所运用之标准。对所有19世纪的考古学家来说,这一“好”的最主要方面适用于所有能从中找到多得令人热爱和敬慕的希腊

艺术,今天许多考古学家们都在运用这条标准。这种希腊美的理念在一段时间里使学者们痴心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他们持这样的成见:世界艺术史上这一确定无疑的辉煌时期远远高出其他艺术,其他任何时期的审美理念罕有能和它相比的,或者更少有能和它相匹敌的。因此,一些学者如此固执,以致他们只欣赏受西方影响的那类艺术,而不欣赏所有其他艺术。其中一些学者,如温森特·斯密斯,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他们连受西方影响的艺术都不再欣赏,并且认为这类艺术远远次于超凡脱俗的古希腊时代艺术。

“犍陀罗或白沙瓦(Peshawar)雕刻……仅仅是三四世纪二流罗马艺术的回声,……在表达人类激情和感情方面,印度艺术已彻底失败了,除了希腊-罗马调教的这段时间外,任何时候,它都罕有对任何神圣的理想赋予有形式的尝试。”^⑥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偏离19世纪希腊的问题以及本世纪前25年,因为那样我们会偏离主题太远。

以“好”或者“坏”进行艺术欣赏是非常主观性的,就其本身而言,这一理由使“越好越古老”这一准则非常危险。但是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事情似乎还有另外一些方面。

如果犍陀罗艺术是希腊化艺术的一个片断,它作为整体突然从地中海盆地东部整个被移至犍陀罗的话,那么该准则坚持得对,因最古老的艺术标本就会有强烈的古希腊性,而古希腊成分的衰微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得以说明,就是说按照这一观点,一种因缺乏充足西方影响的衰亡,或者说地方因素渐居上风。实际上,正是以这种方法,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发展过程或者甚至整个印度艺术的发展过程得以总体上勾画出来。例如福谷森说,“印度艺术史是一部衰亡史。”但是,印度西北部艺术肯定不是古希腊艺术突然从地中海盆地东部移至犍陀罗的。这一具有纯粹印度成份的艺术发端于一个多年来受强烈的古希腊影响起积极作用的国家,在尽可能吸收外国影响的基础上,它开始在本国肥沃的土壤里逐步孕育

自己的生命。起初,这一进程时断时续,以致没有立即取得杰出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在此相遇,不得不缓慢地彼此互相吸收,只是多年努力后,才产生一个和谐的整体,这我们在犍陀罗艺术的最好作品中已经看到了,如西克里的佛陀,沙巴兹-噶里(Shāhbāz - Garhi)、萨尔-伊-巴霍尔(Sahr - i - Bahhol)、塔克特-伊-巴喜及许多其他地方的菩萨像^⑤。

如我们所看到的,强烈的古希腊影响时期可能和帕提亚君主统治期恰好相符。他们的艺术品大部分是输入品或者是这些输入品的复制品,因此,在此短期内,我们的确谈及的是古希腊艺术的一个片断,它是从地中海盆地东部移植而来的。但是,此后不久,在斯基泰时期,印度艺术对西方影响的反应就呈现出来了,这种吸收过程开始了,它宣告了犍陀罗艺术的兴起。

福色尔以下面的话否认这一事件发展过程:“这个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准则对于一个顺其自然演变的画派来说,我们觉得是很有效的;但对于一种一半以上进口的以及完全拥有其技巧的艺术来说,则毫无用处。我们宁愿坚持认为,就总的论点而言,嫁接于印度老树干之上的希腊枝杈中最辉煌的花朵,应该是产生于源头,而且之后它没有走向衰败。在一座浅佛雕或者一座希腊佛教雕像上所显示的所有仿古表象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古老性的一个证据,一个由于主题或者类型越来越多地‘再印度化了’而衰落了标志。”^⑥

我们没有看到福色尔怎么能够把这类思想和如下的事实相结合:正如他自己知道的,出自莫拉·莫拉都教堂精美的、一点也不古老的灰幔雕塑毫无疑问属于犍陀罗艺术后期的。我们愿再次强调迄今所习惯的发展程式(见插图 4)和我们所提供的程式不同。在我们看来,有一个短暂的强烈的希腊影响期,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出其兴起阶段、兴盛阶段和衰微阶段,或者说是一个转变为一种新艺术(见插图 5)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排除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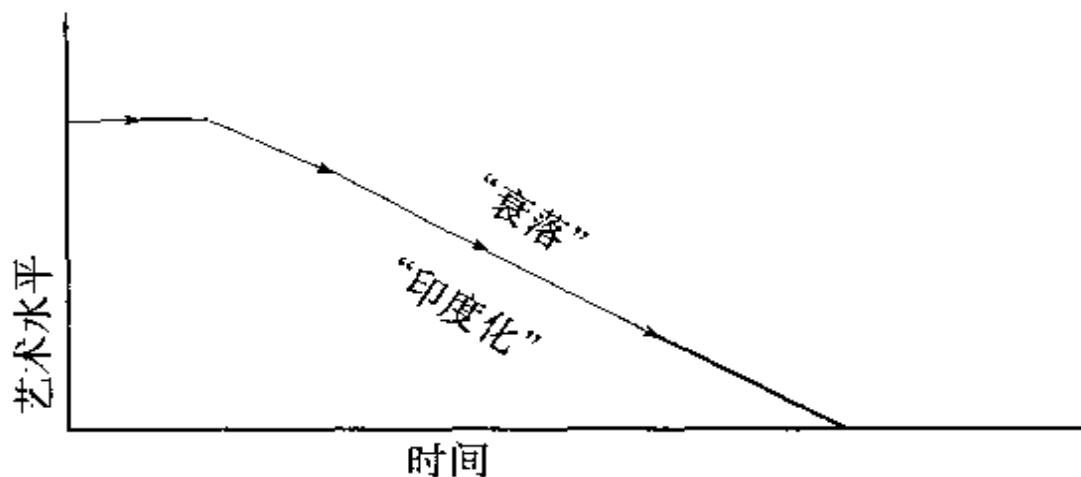


插图 4 该表显示的是根据福色尔及其他人的观点，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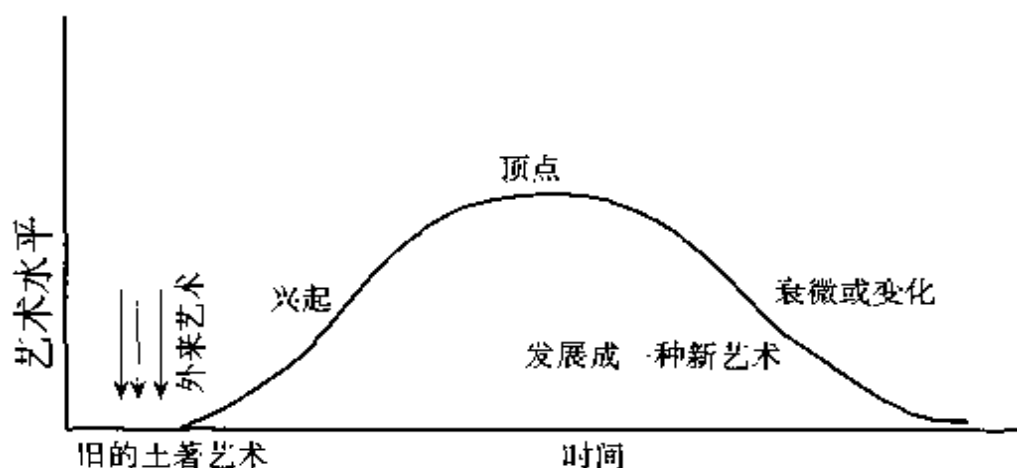


插图 5 该表显示的是根据我们的观点，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发展过程。

陀罗艺术在后来时代里接受周围国家的影响，因为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易受外来影响的。不过，这些并不能改变印度西北部艺术潮流。这些后来的影响被融入这种“自己”的艺术中，正如每种健康的艺术遇到外国影响时那样，仅仅合并那些它理解的成分，能够把它们吸收到图案里，表达于形式中。我们认为印度西北部艺术的这种发展进程很不同于那种把繁荣期的一个部分突然移植过来的发展过程，此说接下来便是缓慢的衰微，正如所有的考古学家所暗示的那样。例如，卡宁汉姆说道：

“每天接受新鲜的证据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雕刻艺术，或者确切地说好的雕刻艺术在希腊人统治喀布尔山谷时突然出现在印度，它在印度—斯基泰人的希腊统治期及半希腊统治期里保持其优势；它离开希腊时代越远，便退化得越多，直到在婆罗门教庙宇木制的虚幻里和毫无理性的猥亵行为中这种退化达到顶点。”^⑥

“越好(就是说越漂亮)越古老”的准则，在我们看来并不怎么对。在犍陀罗艺术繁荣期制作的雕刻更是如此，因为按照亲希腊的品味，这些雕刻肯定该说很好了。如果按照“越好越古老”的准则，那么这些雕刻一定是很早的了，但是，情况不是这样。

而且，考虑到比玛兰圣骨箱上的佛陀像，总的来说，也表明此像的动作昭示出西方影响。作为反对该观点的一则论据，我们愿意只参考相当晚的一则艺术品上表现的动作，即巴特霍克斯(Barthoux)在哈达发现的迈步行走的佛陀^⑦。良好的风格因此并不能用做支持比玛兰圣骨箱古老性的论据。

勒·梅在《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中讨论该圣骨箱时，又为通常的论据补充了一条，在他看来是所有论据中最有力的一条，那就是，根据科诺和托马斯的观点，发现那个金色的圣骨箱的毛石饰物上的迦逻西蒂铭文表明其年代甚早。这样科诺认为其古字体要比坦叉始罗卷轴画上的及塔克提—伊—巴喜和帕迦(Pāja)铭文的古老，大约和狮柱上的铭文同时代^⑧。在致勒·梅的一封信中，托马斯告诉勒·梅，他认为该字的年代约在公元50至公元70年^⑨。这两位权威给出的日期相差100年，显然迦逻西蒂字的古字体在确定圣骨箱的年代上并不是一个非常保险把关者。

所以，要支持比玛兰圣骨箱古老的论据，诸如证明钱币的地窖、良好的风格和古字体都不适用；而支持其较晚的论据又迫使我们下结论说此圣骨箱可能在迦腻色迦前并没制造，根据佛陀的胡须判断，它可能是在迦腻色迦纪元的第1个世纪前半叶而不是后半叶制造的。

1927年,库玛拉斯瓦米提出一些论据,他想据此证明秣菟罗佛陀像至少和犍陀罗佛像同样古老。虽然他相信秣菟罗佛陀像更古老些,但是他无法证明这一点:“总的说来,我倾向于秣菟罗在先,但这不是证据。所有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各地最早的佛陀类型都是呈当地的风格……”^①库玛拉斯瓦米提到6点论据,这些都是那些希望把犍陀罗佛陀像的年代而不是秣菟罗佛陀像划定得更早的人提出的。所谓秣菟罗佛陀就是指:罗里延·唐盖佛陀像、喀什特纳噶尔和斯卡拉佛陀像、比玛兰圣骨箱;迦腻色迦时的圣骨箱,最后还有莫俄斯的一枚钱币(其上据说可见一幅坐佛像)。库玛拉斯瓦米对这些论据的反对意见是:前三个雕刻已被确定为一个远不可知的时代^②;而比玛兰圣骨箱是近一个世纪前发现的,“近90年前的发掘的方法无论如何不像现在这样严格”,而且,“威尔森(Wilson)本人持的观点是阿富汗的卒塔婆无疑都是在基督纪元之后的。”^③

对我们来说,这些似乎都是很微弱的反对意见。虽然该时代不知道,但是,并没有论据反对这些佛像不属于公元前1个世纪或者公元后1个世纪的观点。更甚的弱点是一百年前的发掘方法比现在的缺少严格性的论调。对我们来说,事先假定梅森(Masson)确实没有发现比玛兰圣骨箱中的阿泽斯时代钱币似乎是错误的。最后,威尔森本人所持的所有卒塔婆肯定是在公元以后的观点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当时的学者对那些时代的历史比我们现在知道得更少,并且最富幻想的说法就发表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从某些发现中,当时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没有价值或极少价值的,但在我们看来,严肃地列举所发现的东西,仍不失其价值。因此,我们宁愿在我们的论述中认为这些最后的资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提出这一观点:阿泽斯时代钱币发现本身还并没有把该圣骨箱指定为哪个君主治内。所以,虽然库玛拉斯瓦米对批驳的论据是很脆弱的,但是他的方向是正确的。或许,正像他经常的情况

那样,更是因为他在印度艺术上的若干问题方面的本能的正确感情,基于逻辑推理和论证。

基于第一章里取得的成果,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其铭文年代得以核定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源于一个更晚的时代,因为它们被确定在我们认为始于公元前 129 年的旧时代。因此,它们的年代实际是公元前 129 年 + 318 = 公元 189 年,公元前 129 年 + 387 = 公元 258 年及公元前 129 年 + 399 = 公元 270 年。同时,发现了一些年代更为确定的铭文,现补充于此。比玛兰圣骨箱的年代已经得以充分讨论。最后一则论据,是由支持出自印度西北部的佛像在先的人提出的,它是一枚莫俄斯的钱币,学者们认为从其上可辨识出一个坐佛像^④。库玛拉斯瓦米已经驳斥了我们在前面引述文章中的这一点,但是塔恩显然忽视了这一点^⑤,因为他在其著作《在大夏和印度的希腊人》中把这枚钱币作为一篇长篇论述的起点。在该书中,他用自己的观点解释说,犍陀罗佛像的产生至迟在公元前 1 世纪初,后来存在了约两个世纪;在秣菟罗,人们才刚刚开始石頭上描绘佛陀^⑥。在此点上,格伦威德尔和福色尔关于佛陀像可上溯至阿波罗(Apollo)形象^⑦的说法得以复活:

“我仅关心编年学,我认为犍陀罗佛陀像远远在前,现在已为一则明确的证据所证实,但是,我愿意勾勒出我所认为的事情进程。正如我们所见,希腊人约在公元前 1 世纪初起印度化了,同时产生了犍陀罗流派;该艺术流派从其年代上讲肯定和从大夏到印度来的希腊人的发展是一致的;印度佛教徒受巴克提(Bhakti)的影响,想把佛传故事和因缘故事刻在石頭上,此时,由于希腊人可能不在德米特里(Demetrius)和弥兰陀时代,他们准备做出反应。第一个希腊艺术家必须得决定该如何处理这一永恒重复出现的中心人物。他可能已知道,或者可能不知道,或者关心乔达摩(Gautama)是人或者是神;作为一个希腊人,他也仅知道一种表现方法,随即,在某个不出名的、不引人注意的希腊雕刻家的心中,以人类

的形式表现佛陀的主意产生了。希腊艺术家运用他们自己的阿波罗类型,并且使之印度化;从希腊阿波罗到希腊-印度佛陀转变的步履可经常寻见。但是,他们的佛陀不会比其阿波罗形象更深刻,他只是—一个美男子。想要在其温和的脸庞上寻找这位伟大变革者所应有的精神,那不过是徒劳。”

“所以,一些印度人深深地感觉到了。只是不满意既产生的犍陀罗型佛陀形象,于是在秣菟罗首先产生了印度型的佛陀形象。此时已经认识到除了作为一个人来描绘佛陀外,以任何形式表现都已为时过晚;但是他们想要一个自己的佛陀,而不是一个希腊人的阿波罗。”^⑧

“秣菟罗的印度艺术家抛弃了仅仅通过象征表现佛陀的陈旧陋规,这并不是由于巴克提,而是因为这一陋规已经从印度西北部的希腊-佛教艺术中消失了几代,他们不能落后;要做别的任何事都已为时过晚。”^⑨

关于犍陀罗或秣菟罗谁在先的事,我们将会进一步讨论^⑩。塔恩论述的始点,即莫俄斯的钱币是错误的,这本已为库玛拉斯瓦米所证实,近来巴赫霍夫用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方法又加以解释^⑪。所推测的佛陀形象不过是一位坐着的君王,这种图案经常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钱币的正反面上^⑫。

所以,那些坚持犍陀罗佛陀比秣菟罗佛陀古老的论据不再适用。现在,两个地区最古老的标定年代的文物分别属于迦腻色迦时代的1年和2年,差别如此之小以致目前还无法决定何者在前^⑬。

犍陀罗得以确定的最古老的佛陀形象是在迦腻色迦时代圣骨箱上发现的(见图2)。这一个讨论过很多的圣骨箱是1909年斯普纳(Spooner)在邻近白沙瓦的沙-吉-柯发掘迦腻色迦的卒塔婆期间发现的。它是由镀金的黄铜制作的。旁边小天使拿着一个花环。中间安插几个人物:佛陀及崇拜者,还有一个人物,穿着典型

的斯基泰服装,显然意在表现迦腻色迦皇帝本人,他的右边和左边是拟人化的太阳和月亮。上部边缘饰有飞翔的鸭子,还有一幅图景在赫金于阿富汗发现的象牙制品上也很流行^⑧。在盖子上,一个佛陀呈施无畏印坐在一朵莲花上,头后面是一个大的光环,饰着花瓣。佛陀的右边是因陀罗,左边是梵天,手呈母印手状(anjali),他们俩被达尔曼(Dahlmann)错误地描述为佛陀的弟子^⑨,库玛拉斯瓦米则把他们描述为两个菩萨^⑩。不过,佛陀右边那个人的头饰清楚地表明此人是因陀罗。

现在,最引人注意的是,所有研究此圣骨箱的学者,如沃格尔、斯普纳和马歇尔都把它年代定为印度西北部艺术发展结束时,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已非常退化了:

“……该圣骨箱上的佛陀像就其类型而言,已经远离希腊源头,从那时起就已经表明希腊佛教画派的形成显然要在迦腻色迦之前。”^⑪

当然,每个人都同意该圣骨箱不属于繁荣期,但是,谈到退化和衰微是相当危险的,感情用事地为犍陀罗艺术发展建构一个发展体系似乎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总的说明的惟一事情是,是否有一件作品属于繁荣期;如果不属于繁荣期,那么它是否能确定在繁荣期之前或之后,即在犍陀罗艺术兴起期或衰微期。在处理迦腻色迦圣骨箱时,我们须以同样的方法进行。人人都同意它做工粗陋,因此它可能源于犍陀罗艺术的兴起期或者衰微期。如果此箱是在犍陀罗艺术的最后日子里制作的,那么出自印度西北部的许多精美的作品必须被确定在迦腻色迦以前。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不能提出一个证据证明在迦腻色迦前存在佛陀像;其次,马歇尔在西尔卡普发掘时,并没有发现一个佛陀像,甚至连一个残片都没发现;根据在西尔卡普出土的钱币和别的东西,西尔卡普似乎在丘就却之后即已被废弃。因此,我们的结论肯定是第一批佛陀像最早是在阎膏珍统治期内制作的。这样,

迦膩色迦圣骨箱应确定在犍陀罗艺术之初。从此箱的雕刻品质及风格上还可进一步发现支持此说的一些强有力的论据。首先,小天使或持花者的图案及其上有鸭子飞翔的中楣均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古希腊影响。如此的古希腊装饰成分更该属于印度-大夏和帕提亚时代,在后来真正的犍陀罗艺术中只是非常零星地出现。它们是输入艺术的遗存,它们使犍陀罗艺术得以产生。而且,佛陀头发柔顺地梳向后面,它表明这是佛陀的早期表现方法。因为在西克里(Sikri)卒塔婆浮雕中,人物的头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的,此浮雕是我们所拥有的犍陀罗艺术的早期样品,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而次要人物,如梵天和因陀罗及佛陀两边的那些人物的光环矮小,圆环周围是细细的刻线,这在早期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佛陀头后面的光环饰以一朵盛开的花儿,特别像一朵莲花,这一特性在印度西北部的其他艺术品中没有发现,但是它在印度当地艺术中却很常见^⑧。而且,和尚的长袍几乎呈方形片状,表示衣褶,衣褶又是呈平行状的雕刻,双腿交叉,长袍重罩。后来,雕刻家或制作者正是用此材料块作为表现松散衣褶的技巧的机会。正是在犍陀罗的这一时期,即衰微之前,所讨论中的材料又成为传统了,并失去其典雅^⑨,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下结论说迦膩色迦圣骨箱源于公元5世纪的一个理由。我们在西克里浮雕的小佛陀像上也发现了这种衣褶处理法,这是又一有利于把圣骨箱年代定于犍陀罗艺术之初的论据。作为说明该圣骨箱年代较早的论据,我们最后提出这一事实:这些小佛像被完全包裹在和尚的长袍中,甚至衣袖紧紧地卷着他们的手。这一早期特点在西克里的浮雕中也出现过。

所以,我们看到,迦膩色迦圣骨箱不仅表明最古老的确定了年代的佛陀像,而且还表明它该被置于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开始时期。在此,我们有一个始点,并以此追寻,描述这一艺术的发展。但是在做此之前,我们要首先阐述一下巴赫霍夫的观点。

虽然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著述颇丰,自从科研人员关注这一艺

术那一刻起,第一件严肃的事是对适用的材料进行编年和风格上的分类,此事一直到1925年由巴赫霍夫解决⁹⁶。其观点总的如下:根据阿泽斯钱币的储藏处,比玛兰圣骨箱制作于犍陀罗艺术开始之时,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0年⁹⁷;而在他看来,迦膩色迦圣骨箱因其衰微的迹象而应归属于犍陀罗艺术的最后阶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犍陀罗艺术的标本,其日期的时代不明,巴赫霍夫同意沃格尔的观点,认为是塞琉西斯时代的。这些年代为:罗里延·唐盖318、哈什特纳噶384、沙拉-德里399因此分别对应于公元6年、公元72年和公元87年。在这些艺术品中,第一个非常出色(见图10),因此代表繁荣期,而后者(见图19)根据其极差的制作,显然是衰微时代的作品。属于公元72年(见图11)的这件雕像的长袍仍作为某种结实的東西处理,不过,身体已经有透感,而衣褶变得更具立体感。在出自公元1世纪第三阶段的整个雕刻上,传统的手法中已显示出矫揉造作的风格,这宣告衰微的出现⁹⁸。迦膩色迦圣骨箱表明此期的结束。根据巴赫霍夫的观点该结束点可最后归于大约公元90年,因为不可能把它确定得更早,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出自公元72年的制作仍十分良好的哈什特纳噶雕刻。在此之后的公元2世纪接着的是一个粗糙、土气的艺术时期,其中坦叉始罗达摩罗吉诃(Dharmarajika)卒塔婆浮雕(图5和图6)及出自公元2世纪末的R4卒塔婆的那些浮雕均为样品。接着在公元3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复兴,巴赫霍夫想把此称做贵霜期后的复兴,因为在此时,人们强烈地想到出自公元1世纪的良好艺术,即坦叉始罗小教堂中的第18(见图20)和第16的拉毛泥塑像。在这些拉毛泥浮雕中人们发现了该艺术的终结,它们是马歇尔在坦叉始罗的莫拉·莫拉都(见图21)和憍利安发现的,巴赫霍夫把其日期确定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⁹⁹。所以,简言之,巴赫霍夫关于犍陀罗艺术发展进程的观点如下:

它于阿泽斯统治时的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兴起;约公元初及

公元 1 世纪前半叶是其黄金时代；公元 2 世纪是其衰微时期；公元 3 世纪初是其复兴兴起时；公元 4 世纪末是其具体的衰微时期。

如此的两次繁荣在巴赫霍夫看来是一场“神秘的复兴”^⑤，虽然不是很确实的，但它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此情况下可提出决定性的反对性论据，因为在这两个繁荣期之间，雕刻品仍在制作，但它们都几乎没有留下第一期的任何特质，这是令人非常不能接受的。迦腻色迦圣骨箱是其中一例。该箱表明它和坦叉始罗 L 建筑物上的浮雕（图 5 和图 6）的技术能力是处在一条发展线上的。除此之外，总的可以认为这些浮雕多少仍处于用象征表示场景，且象征是用更精确的象征物表现的，这些浮雕是从此发展线上的开始，因为这种使用象征的习惯源于古老的印度土著艺术，在后来的雕刻中它们并不如此明确地出现。现在，碰巧 L 建筑物上那些浮雕中的确有一个这样雕刻。此处我们看到表现佛在贝纳勒斯（Benares）鹿野苑初次说法：佛陀坐在菩提树下的一个平台上，右手正转动一只大法轮；法轮在佛陀前面，放在一个带三宝象征符号的小柱子上，轮的两侧各有一头鹿。这表示的显然只是使用象征的时代，所以该浮雕无疑是离犍陀罗艺术初期很近的。

但是，其后是一次复兴的这一黄金时代发展线索不仅因已解释的原因是错的，而且巴赫霍夫所列的起止点：即比玛兰的迦腻色迦的圣骨箱作为此繁荣期的开始和结束的界标，是有疑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证明第一只圣骨箱不是在公元前 1 世纪制作的；对后者我们不能像巴赫霍夫追随沃格尔、斯本纳和马歇尔那样感情用事进行判断，这我们也已经解释过了。巴赫霍夫本人用下面的话指出这种感情用事的危险：“……用目前常见的词：良好的制作，次劣的时代，最好时代的雕刻，良好的古希腊传统，已完全无助；在所有这些之间摇摆，缺乏精确的说明。”^⑥

概括说来，我们不能同意巴赫霍夫的观点：即迦腻色迦圣骨箱源于繁荣期之末，而且没提及把它归于公元 90 年这一事实，因为更

早的日期并不适合他关于其风格发展的程序。现在,科诺在《印度铭文汇编》^⑥中对圣骨箱上 1 年的解读又进行了阐述,考虑到年代,显然该雕刻属于公元 78/79 年,另一位一流的铭文学家托马斯赞成^⑦。

在这两个圣骨箱之间,巴赫霍夫又插入了三个阶段,这些年代确定的铭文,分别是出自罗里延·唐盖、哈什特纳噶和沙拉-德里。如果从风格批评的观点来看,我们把这些雕刻和那些确定是源于犍陀罗艺术之初的雕刻,例如出自西克里卒塔婆的雕刻和 I 建筑的雕刻进行比较,显然前两件雕刻是在这些浮雕制作后很久才雕制的。不仅雕刻家的技巧和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而且其装饰成分也得以进一步发展,例如,西克里壁柱仍是圆而细,而罗里延·唐盖地基上的浮雕则平而阔;最后,哈什特纳噶的雕刻则是至顶端变得很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出自所谓巴赫霍夫繁荣期的雕像制作得要远远迟于迦膩色迦圣骨箱,其大部分肯定和那些被巴赫霍夫定为犍陀罗艺术复兴期的雕刻一起被正确地加以分类,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和被他们划到公元 1 世纪的雕刻十分类似。现在,对这两组间的相似性的解释非常简单:它们是一组,是同一组,即犍陀罗艺术的黄金时代。巴赫霍夫可能也为以下的事实所蒙蔽:即比较中的艺术品材料--为石头,另一个为拉毛泥,材料不同其所起的效果不同,还由于灰泥更易于雕塑。

从风格评判上讲,罗里延·唐盖、哈什特纳噶和沙拉-德里出土的那些雕刻属于比迦膩色迦晚得多的时期,这一事实本身就不可能把这些雕刻划为塞琉西斯时代。如需进一步的论据,我们可再参考第一章^⑧。由于这些雕刻无疑属于古老的斯基泰时代,在下面的评述中,它们可作为界标。

我们已经看到,输入或复制的希腊艺术品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内,使当地艺术获得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使得后来著名的犍陀罗艺术蹒跚起步。不久,佛陀的形象即呈现在此艺术中,但正如我们

在上面所看到的,在丘就却统治内还没有。而且,我们想知道这些早期的斯基泰君主是否有其自己的艺术,他们都沉溺于战事中,没有时间关注艺术。在公元开始前后几个世纪里,印度西北部反复为外族入侵所困扰,这决然无助于艺术发展。根据在西克里里的发现,很明显,当时佛陀形象尚未产生,因为没有发现一尊佛像,甚至连雕像的残片都没发现。因此正是迦腻色迦圣骨箱,我们得以从中获得第一个确定的佛陀像;但是,在数十年前表现佛陀已成时尚当然是可能的。在迦腻色迦统治期内,这种习惯得到很快提高,从迦腻色迦的一枚钱币上复制的佛陀也可看出这点,钱币上的铭文是由希腊字 ΒΟΛΛΑΟ 表示的(见插图 6)。



插图 6 迦腻色迦钱币(佛陀小雕像)

最古老类型的佛陀像似乎总是绘有胡须。所有我们从其他理由上认定属于犍陀罗艺术之初的雕刻(迦腻色迦圣骨箱、西克里卒塔婆、咀叉始罗的 L 建筑),都表现出带胡须的佛陀。不过,这并不排除后来有时会出现带胡须的佛陀,但是,总的说来,佛陀似乎脸刮得光光的。除此之外,我们愿在此强调,对后来佛像进行明确说明是很困难的,因为后来的佛像上仍存在着描绘胡须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下面这点总的考虑得很少^④,即,这些佛像不再是其原来的状态,结果很可能只是描绘的一些细节处已经失去。特别是在哈达出土的拉灰泥头像都绘有胡须、眉毛、眼睛和眉间白毛(Uma)^⑤。范·勒柯克在中亚发现一个带有胡须的佛陀头^⑥。所以,我们所能说的是在早期的佛像中,浮雕中总是表现佛陀的胡须。

总的说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输入期小浮雕流行,因为我们有几件出自那时的浮雕,就其风格而言是从地中海地区直接输入

的。例如,我们提及的带有所谓河神的浮雕^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些浮雕,上面信徒常常被安排成三四对一组^⑨。就我们所见,此期没有很大的、独立的佛像。艺术家们严格把自己限制在较小的已经风格化的作品上,如哈尔波克拉提斯(Harpocrates)的小雕像^⑩。现在,由于在帕提亚君主统治的短暂期内,自由雕刻尚未得以怎么进行,但是相反,小的椭圆形浮雕明显已经用做装饰,显然也是在犍陀罗艺术之初这种雕塑就已经相当普通,而孤立的佛像尚未得以流行,其流行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了^⑪。实际上,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孤立的佛陀像,风格上和最早的浮雕像相对应。除了输入期椭圆形浮雕和早期犍陀罗艺术之间风格上似乎存在差别外,就其所表现的主题似乎也有一个差别。在古希腊输入的艺术中,那些表现古典神话的场景,或者表现世俗的和日常生活的场景数量最多,诸如小的家庭场景、男女欢饮场面和盛宴等等。犍陀罗艺术所表现的及后来仍充斥印度西北部艺术的主题是这样的场景:如果不描绘佛陀本人生活,或者其前身之一,或者其前世因缘故事之一的話,它也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要和宗教生活相联系。就我们现在所能判断的而言,就主题的两种艺术风格和时期来说,这种差别似乎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会发现甚至古希腊输入期经常有些内容很无聊的作品,可能也和宗教有些关系。

对我们来说,出自早期犍陀罗艺术的最古老的雕刻是浮雕,它们被作为装饰放在一些卒塔婆的柱形墙壁上,例如西克里的那些(见图3和图4),它们表现佛陀生平的最重要事件:诞生、初次觉悟、出家、菩提树下的沉思、魔罗(Mara)的进攻、内拿勒斯鹿野苑初次说法、涅槃等。这些画的作用可以和罗马天主教堂的十四幅耶稣受难像的作用相比,两者都用来说明教主的生平,同时,在环拜中作为沉思客体。在这些画面中,佛陀总是被绘成身穿厚厚的木质僧侣长袍,裹着整个身体,仅露出两只脚。在其沉思状态里,甚

至连双手也被包在了长袍中,特别是在最古老的样品中,一块方形衣服经常垂罩至地。头发紧紧向后梳着,隆成顶结^⑧,双眼大睁,上嘴唇有一撮胡须。很多情况下,人物被描绘得相当臃肿。关于佛陀生平的这些场景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仍和古代印度艺术阶段的很相近,其中的特殊场景只是通过象征表示。例如:如果我们把西克里的因陀罗拜访佛陀和菩提-伽耶



插图7 菩提-伽耶扶栏上的浮雕,表现因陀罗拜访佛陀(O.Z. 新系列,第14卷)。

同样的内容相对比(见插图7),我

们发现,在这两幅图中,引人注意的事实是雕刻家显然认为作为识别此场景的手段,般遮迦要比因陀罗更重要。在印度西北部艺术里,特别在西克里,象征性语言仍是十分显著的,这和早期印度艺术的情况一样。我们想顺便指出的是这种和印度早期艺术表现同一场景的极为相似性,使得认为在有关神龛崇拜中的古典浮雕里可发现最基本的范例的想法不可能了(布赫特哈尔就是这样认为的)^⑨。佛陀采用的手印是禅定(dhyana)、土触(bhūmisparśa)、vara和施无畏(abhaya)。这些种类各异的场景被用小而圆的科林斯柱分开,有时这些柱子立在单独的分隔间中。我们可以把迦腻色迦圣骨箱及西克里卒塔婆侧边的浮雕看做此早期阶段的代表^⑩。这些无数的论据似乎足够确定这些雕刻是属于印度西北部艺术发展初期的。福色尔第一个就西克里浮雕发表文章^⑪,他也承认在这些浮雕中的各种穹窿形成分,使人们想起山奇和菩提-伽耶,这表明其古老性^⑫;但是另一方面,他把这一准则运用到所有犍陀罗艺术中,他说:“越是希腊的,越古老;越是印度的,越晚。”^⑬他确定了介于犍陀罗艺术兴起和衰微中间的一个日期^⑭。

巴赫特哈尔也认为发展是沿着古风方向进行的,把它描述为菩提-伽耶的早期佛教和前叙述性发展的一个复活^⑮。在我们看来,这使此事颠倒了。其他学者也注意到西克里雕刻中的古体特点,补充上面提及的论据,结果,它使我们决定得和印度西北部艺术最古老的作品之一打交道。

L建筑中的浮雕是属于一个稍迟的时代(见图5和图6)。在此,透视法已运用得非常轻松,佛像头发略呈波浪状。但是,仍有象征物,即权轮和小鹿;也有一个错误,即双手过大,这表明缺乏经验。和后来的佛像相比,光环相当小,且沿着光环周边有一条断断续续的细线。长袍已修改得不那么僵硬。罩衣的边缘从右手腕垂至前面,以一个漂亮的圆弧形又罩至左手腕。不过,左手把罩衣收成一束,有时轻轻地举起,有时只是握在手里放在大腿前面,不过裙摆其他部分则重罩在座上,衣褶满布(见图6)。脖颈处的外套折叠成两个典型的三角形(见图13)。正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佛像成为大约公元130年秣菟罗佛像的模型。我们在第三章中还会进一步看到,秣菟罗雕刻家已拥有出自印度西北部的样品,它们在这方面都和坦叉始罗L建筑的佛像类型密切相关。在这些佛像和出自秣菟罗的大约公元130年的复制品之间,我们随便就可以提出几处明显的相似处:脖颈周围的衣褶在左右两侧带有典型的三角形,右手只是微微抬起,衣服边缘上的曲线,罩着双膝上的衣褶的方向。在后来的时代里,右腕下的长袍更密而且直接地叠在一起,以致看不见腿。最后,佛陀带有胡须,双眼大睁。因为这一阶段是在大约公元130年于秣菟罗复制的(其中仅剩几件,主要局限于一个卒塔婆座基周围的装饰性浮雕),它在此时,甚至更早些时候肯定已存在。

巴特奥克斯在贝格拉姆发现的一件浮雕和坦叉始罗L建筑的这些浮雕密切相关(见图7)。在此浮雕中间,我们看到佛陀坐在宝座上,两侧是两个侍僧;另外在该浮雕的右端,一个人物像毁坏

严重。在第三章里,我们将再谈这些侍僧的情况^⑩。该浮雕又表现出所有已列举的特征:罩衣边缘典型的线条,衣服垂片向上收起,环绕脖子上的三角形衣褶,相当大的手,大睁的双眼,胡须,带有外缘内侧线的小光环。头发拢成顶结,且向后紧梳,有人几乎会倾向于说它比L建筑上佛陀的那种头发梳得更紧。但是,衣服的垂片垂罩着座位,略显雅致。内衣罩着腿,且清晰可见,因为他的右手把上衣提起,上衣以一种典型的衣褶垂着:因为在这些衣褶接触座位前形成了一条优雅的曲线,使整个雕像增加几分高雅。在刊布此铭文前,科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一字体的形式比出自曼玛尼·德里(Mamane Dheri)的迦腻色迦89年(即公元167年)铭文中的字体古老,但比出自哈达的迦腻色迦28年(即公元106年)的铭文要晚^⑪。这和我们的观点一致,就风格批评方面而言,即该件雕刻大约属于坦叉始罗L建筑上浮雕的时代。也许,在内衣的典型衣褶上,我们可从犍陀罗艺术黄金时代的几件雕刻上找到,这表明这一事实:出自贝格拉姆浮雕的年代多少晚于坦叉始罗L建筑上浮雕的年代。

在讨论了出自早期的一些坐佛像后,我们现在讨论一些立佛样品。此期雕刻几乎所有特点在图8的佛陀和福色尔在《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⑫(第1卷,第375页,图189,及第2卷,第775页,图583)中复制的两个佛陀像上得到最好的体现。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人物头顶上大而高的发束。在这两件雕像中,佛陀头后的小光环的外缘内侧带一条内刻线。在第三件中,光环失去了。三件雕像中,人物双眼大睁,脸上有大胡须。其中两件长袍在环绕脖子处形成一个三角形衣褶。他们的右手呈施无畏印举起;左手持一片垂裳,其中两件中手举起,在第三件中手则沿侧身垂下。所以,我们愿把这三件雕刻也确定为犍陀罗艺术早期。在其中两件雕刻中,即分别出自柏林(见图8)和马尔丹(见《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375页),这更可能由于这一事实:它们显示出环绕

脖子的典型的三角形衣褶,这一点我们在带有犍陀罗影响的秣菟罗最古老的雕像上也发现了,因此,这种衣褶于迦膩色迦 51 年前,即公元 129 年前在印度西北部肯定流行;出自秣菟罗雕像中,能确定的最古老的年代是在公元 129 年,雕像显示出受来自犍陀罗的影响。

接下来,从编年方面讲,我们在出自曼玛尼·德里的塞种时代 89 年或公元 167 年(见图 9)的雕像上确定了一个基点。在此,我们显然到达了我们所称的繁荣期。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该艺术快速提高,这并不仅仅从佛陀像本身表现出来,而且从画面中的陪侍人物也可看出,画面显然表现因陀罗拜访佛陀。由于极度喜欢细节,该场面中的动物和各种鸟儿都被表现出来,如小猴子、鹿、鸽子、孔雀等。在所有这些崇拜佛陀的人物生活中,我们也发现因陀罗和他的琴师般遮尸可诃。下方右侧,我们看到因陀罗的大象伊罗婆那(Airavata),大象用鼻子举一顶遮阳罩。我们认识到印度雕刻家借助爱,表现出所有动物生活和自然的细节。在这里艺术家的颖悟力得以表现;山奇漂亮门上所表现的也令人肃然起敬。

人物安排得宽松,神态闲适,悠闲地或站着或跪着,高雅的神态和衣服的垂襞更加强了他们逍遥自在所流露出的闲适。

自从咀叉始罗 I 建筑的雕刻及贝格拉姆的雕刻以后,佛陀像有了极大的提高。当然,长袍仍被表现得相当厚重,佛陀身体不能通过它显现。可以观察到一些差别:头发被处理得很自然且明显呈波浪形,而且在前额线的中间形成一个尖点;光环已变得更大且十分光滑,佛陀似乎没有胡须(除非它被画上),双腿下内衣的褶痕进一步得到强调。我们注意到此种衣褶(沿腿向前折叠)也成为时尚,它们出现在站立或跪着的人物的双腿上。在左侧最下排第四和第六个人物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良好的样品。(出自贝格拉姆佛陀的右侧的人物的衣褶可能也是沿着右腿,但在照片不太清楚。)人物的眼睛都闭合,但这本身并不会导致下结论说此期的佛

陀不再有双眼大睁的类型(虽然这的确可能),因为此件雕刻上佛陀被表现呈沉思状,这意味着佛陀双眼半闭。

接着曼玛尼·德里雕像后的这个发展阶段,是我们从出自罗里延·唐盖的旧时代 318,即公元 189 年的雕像(见图 10)上发现的。此时单独的雕像似乎已经出现。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曼玛尼·德里型站像也被发现。当然,材料仍是很厚的物质,但是身体的有些部位有透的感觉。在垫座上(见图 12),4 个人物中间绘有一个菩萨,4 个人物两侧是两根平柱;不过柱子并没逐渐向上变细,柱顶端仍是拉长了的椭圆¹,这表明其日期当在伟大的繁荣期之初。不幸的是,该雕像本身连同其垫座已遭严重损坏,因此对其风格我们不能下任何结论,虽然垫座上侍僧自然、飘逸的神态表明它出自一位经验丰富的雕刻家之手。

公元 3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出自哈什特纳噶的 384 年(公元 255 年)的雕像即是证据(图 11)。此期雕刻家开始把长袍绘得更薄,身体形状的主要轮廓已经突出,例如,左膝清楚可见。垫座上的浮雕(见图 13)已显出一幅画面:此时画面两侧被两根雅致的科林斯柱封住,柱子的顶端逐渐变细,所以,这是犍陀罗艺术黄金时代及后来雕刻的特点。柱顶端椭圆形已变得更短²。该垫座上的场景最终表明有位雕刻大师在此工作。围绕着菩萨的 3 个人物神态自然,菩萨正对其右侧的一个人讲话。侧转的身态(特别是左侧第二人)被描绘得非常技巧,不过最右边的那个人物也在这方面引起我们注意。因为损坏严重,对最左侧的人物几乎不能谈什么。遗憾的是,已不可能在照片中辨出菩萨两侧的两个人头后面是否有光环。在此种情况下,依靠两个人物的头饰、右边那个人物呈现出的许多珠宝及左边那位人物上没有珠宝,我们仍有把握推测他们代表因陀罗和梵天。

遗憾的是罗里延·唐盖的佛陀及哈什特纳噶的佛陀头失去了,

但是根据这些雕刻我们可形成自己的观点,即经过比较后,这些雕刻属于同一风格时期。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一尊佛像(见图14)表明,它至少和出自罗里延·唐盖及哈什特纳噶的佛像明显相似,该佛雕现保存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⑩。幸运的是,该雕像和罗里延·唐盖的佛雕比较起来损坏甚少,头除了鼻子外完好无缺。“为了问心无愧”,我们首先可以推测该雕像和提到的佛像大约处于同一时期。第一,体态同样肥胖,体格结实;第二,衣服打的褶很相似:通常是薄褶和厚褶交替。这两种情况里,长袍表现得很透,透过长袍其身体几处地方可以推测出:例如特别是腹部和双腿。在他们的右腿上面,出自塔克提-伊-巴喜和哈什特纳噶的佛陀均在其长袍较下的边缘上显示出一个非常典型的V-型结。而且,第一个佛陀左肩及上臂的衣褶很近似于出自罗里延·唐盖佛陀的,而右胸上的衣褶和出自哈什特纳噶佛陀上的一样。后一尊雕像的左肩和左臂失去,所以它们不能用来对比。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内衣的衣褶(从其上衣下可以显示出),这种衣褶在罗里延·唐盖的雕像中出现在同样的雕像上。在哈什特纳噶的雕像上,这一部分不幸被毁掉。该衣褶很特别,在腿的一个特定部位,即膝盖处突然宽出身体,这是如此显著,以致它成为这两件雕刻之间相似性的结论性论据。在那件柏林佛陀的照片上,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把内衣在膝盖处握在一起,这是为什么衣褶在底部显得如此宽的原因。如果我们没弄错,该衣褶线确证了此推测。插图8展示的即为我们所想、所见。照片上无法辨识出什么东西在膝盖处把内衣握到一起,但是其他一些站佛像及浮雕道出了答案:在我们见到的几例雕像中,一片材料在膝盖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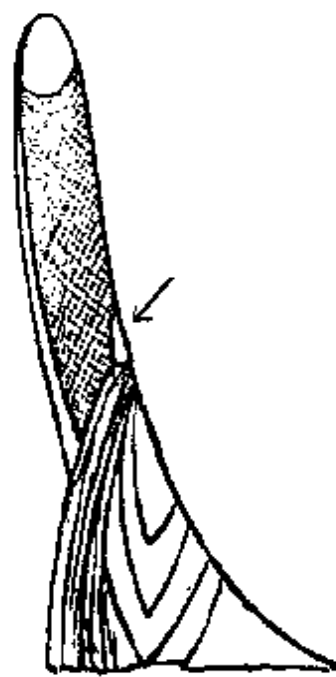


插图8 佛陀穿的比丘长袍的细节

突然结束了^④,可能是一件相当长的衬衫。的确,这些佛陀没有那些使罗里延·唐盖及塔克提-伊-巴喜雕刻颇具特点的显著的宽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从以下事实解释衣褶的源头:衬衫把内衣材料从高至膝盖处即紧拢在一起。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下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佛陀头。考虑到出自同一时期的佛陀头的外表,也许能从中得出一些结论。首先,我们须说明在照片上无法看清佛陀是否有胡须,脸似乎刮得干干净净,但是被描绘上的胡须仍有可能总是保留着,我们看的时候更见如此;像柏林那尊佛陀胸雕^⑤,显然可见胡须;该浮雕右肩裸露,我们在后面会进一步看到,此雕刻是属于公元2世纪中叶后某个时期的^⑥。所以对此胡须我们不能确定。像曼玛尼·德里佛陀雕像一样,头上是波浪形的头发,头发始于额头的顶部,而没有那种我们在后来雕像(见插图9)中所见的尖而清晰的额头线。头发从额头线中间以波浪式向后梳,中间有一深点,正如曼玛尼·德里雕像中的一样。虽然其眼睑被毁,但仍可见其双眼不再像犍陀罗早期的那样是大睁着的。可能在更早些时候的雕像中业已有这种情况,但是正如所说,对曼玛尼·德里的佛陀来说,这并不能得以确定。正如和早期佛陀的光环相比,曼玛尼·德里佛陀的光环大而光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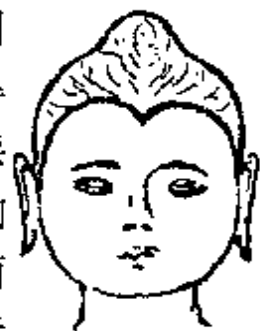


插图9 尖而清晰的额头线,此为后期雕像特点。

柏林还有一件佛陀像^⑦,就风格上讲,它和哈什特纳噶的非常像(见图15)。该雕像显得和哈什特纳噶佛陀一样肥胖。在这两尊雕像中,佛陀身体躯干在长袍下清楚可见,长袍在腹部被描绘得特别紧;事实上,衣服似乎仅仅是一条薄薄的胶片。柏林的这个佛陀在其右腿侧表现出同样的宽褶,只是略少夸张而已。在此,照片上显示出膝盖处似乎有什么东西,颇类似于衬衫的边缘。在这两尊佛像中,我们从其右胸及右腿又看到同样的衣褶。关于佛陀的

头,我们注意到头发从前额处也以同样的波浪形向后梳。光环大而光滑。胡须也没有了,所以佛陀像上的胡须可能已不合时尚(就浮雕上所表明的),但是我们在菩萨像中可以有规律地发现胡须。

所以我们看到,犍陀罗艺术的黄金时代是从公元2世纪中期向后延续。森纳特所观察到的犍陀罗艺术对阿玛拉瓦提的影响该不至于产生这样的结论:结果在公元2世纪末,犍陀罗的繁荣期已经过去,而不是刚刚开始。在阿玛拉瓦提发现的古希腊影响大概是来自秣菟罗,秣菟罗大约于公元130年复制犍陀罗早期艺术品。

诸如出自沙尔-伊-巴霍尔(见图17)及柏林坐佛雕像(见图16)属于印度西北部繁荣期,而且,出自沙尔-伊-巴霍尔^⑧(见图18),仅提到几件附属的雕刻。

巴赫霍夫看到这些雕刻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即出自沙尔-伊-巴霍尔的佛陀和他所说的出自较晚时代的拉灰泥佛雕,如坦叉始罗N.18神龛中的那些(见图21),使他决定在公元3世纪中镶嵌一个复兴期。如今,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解释这两组雕像间的相似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们的确属于同一个时期,即犍陀罗黄金时期,就是说,自从公元2世纪中叶直至包括公元3世纪在内,甚至可能还包括公元4世纪初^⑨。所以,巴赫霍夫所认定的公元1世纪单独的繁荣期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说在黄金期并不是所有的雕刻都臻完善;能力较低的匠人在所有时代都有,不过这不至于因此得出结论说艺术性较低的雕刻品就组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时代。按巴赫霍夫的观点,矫揉造作的风格是此期的特点,它的确在印度西北部的许多雕刻中可以辨识出来。风格造作是一个特质,其萌芽已存在很久了。我们提醒读者注意出自曼玛尼-德里佛陀腿下方的衣褶,这在较早期的雕像中较少。

约翰·马歇尔爵士在莫拉-莫拉都寺院里发现的拉毛泥雕像

表明,矫揉造作之风已达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可能谈及一种巴罗克倾向。悬挂的垂襞在前面时代里业已流行,特别是菩萨和皇室人员(见图9),这时也出现在佛陀像上。此时的垂襞以带卷纹的V形荷叶边下垂,产生了一种极为自由的感觉,但是当它们被夸张时,我们可能谈到一种骚动的、巴罗克式的过分夸大。约翰·马歇尔爵士把这些发现归属到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混合期。

在莫拉-莫拉都和乔利安(Jauliān)寺院被发现后,大多数考古学家因那儿出土了那么多的拉毛泥雕像,下结论说公元2世纪后,就石头雕刻而言犍陀罗艺术已经完全消失,此后雕像仅为灰泥所制⁶⁶。为支持此说,出自印度西北部的第4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确定其年代为最近的雕像可资证明;我们所指的那尊雕像是出自斯卡拉-德里(Skarah Dheri)的鬼子母像,其年代属于旧时代399年,或者公元270年。大家都一致认为此雕像丑陋,因此,结论是该雕像是犍陀罗艺术衰微期的代表。和此说形成对比,如果石雕仅延续一段时间就衰微,或者如巴赫霍夫认为的那样,后来在拉毛泥雕刻上有一次复兴(由乔利安和莫拉-莫拉都的复合寺院所代表),我们愿提出还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更接近真理。当我们考察莫拉-莫拉都⁶⁷人物时(见图21),几件样品和黄金时代佛陀及菩萨(即出自沙尔-伊-巴霍尔)的那些雕像之间最不引人注意的相似处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迫使我们得出结论:莫拉-莫拉都的这些雕刻和沙尔-伊-巴霍尔等地的那些是同一时代的,至少也是代表一个紧随其后的阶段。

利于此说的一则论据如下:这两种被比较的艺术风格是如此显著,以致不可能认为在出自沙尔-伊-巴霍尔菩萨(总的说来,出自繁荣期的风格即由此雕像所代表)和出自莫拉-莫拉都艺术之间,能够插入出自斯克拉·德里的公元270年的雕像,至少如果此雕像如普遍所认为的那样代表一个衰微期是不能插入的。假如上述所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惟一的结论肯定是:所讨论的出自莫拉

- 莫拉都的灰泥雕刻属于公元 270 年前的一个时期。这样,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和约翰·马歇尔爵士把一个如此晚的年代划归到那一艺术的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惟一可以选择的是,出自斯克拉-德里的雕像不能看做是一个具体艺术时期的代表,而且既如此,也不能看做衰微期的代表,而仅仅是一件孤立的次品,这种情况即使在繁荣期也不止一次出现。

- 一则利于此观点的显著论据是这样的事实:仅仅 15 年前,曾制作出一尊和喀什特纳噶佛陀一样精致的雕像。该艺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这样快地衰退了,而且在一段时间后又制作出像出自莫拉-莫拉都寺院的雕像,它们非常类似于突然衰落前的雕像。结果,我们没有接受在黄金时代和所讨论中的莫拉-莫拉都残片间有一个衰微期,我们认为它们是连成一个整体的。

由此可得出下列结论之一:

1. 所讨论的莫拉-莫拉都雕刻属于繁荣期(公元 2 世纪后半叶或者公元 3 世纪),或者:

2. 黄金时代也包括公元 4 和 5 世纪。

对我们来说,除了这两极之外,似乎最好走一条中间路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第一种可能性来说,约翰·马歇尔爵士已提出反对意见,他因建筑上的原因把莫拉-莫拉都寺院复合体的艺术归于公元 4 至 5 世纪。对第二种观点,我们愿提出反对意见,在对讨论中的出自莫拉-莫拉都的拉毛泥雕像和出自乔利安寺院中的拉毛泥雕像进行比较后,乔利安寺院中的雕像,根据其上迦罗西蒂文铭文的鲜艳程度判断,它们当属于公元 5 世纪。因此,由此看来,当公元 5 世纪白匈奴侵略而使此寺院毁灭时,这些铭文题写的时间不会太长。这些雕像的确是在莫拉-莫拉都出土的,它们和出自乔利安、属于公元 5 世纪的那些雕像相似,但是,就我们所见,这些雕像首先肯定并不和犍陀罗艺术繁荣期的佛陀和菩萨特别类似。这可由此事实说明:即使在黄金时期后,拉毛泥雕像在莫拉-

莫拉都也仍在制作,以致此寺院有公元 3 世纪末或公元 4 世纪初及公元 5 世纪的艺术品。也许该寺院在唎哒(Hephtalites)入侵前并没受毁或被废弃。另一方面,在乔利安有些雕像^⑩,就风格而言,我们认为和莫拉-莫拉都早期的雕像相似。但是,这些雕刻肯定不是公元 5 世纪的那些雕像,这从它们上面所刻的未遭损坏的迦罗西蒂文铭文可知。所以,就我们的观点来看,当我们把出自莫拉-莫拉都^⑪(见图 21)的早期片断和出自乔利安的公元 5 世纪^⑫雕像相比较时,我们能观察到下列风格上的差异,即莫拉-莫拉都艺术属于一个更早的时期。和莫拉-莫拉都的那些雕像相比较,乔利安的雕刻并不很雅致,人物通常是木质的,造型有极强的印象主义特点,例如,头发常常是在头两侧用些小圆痕表示^⑬,或者从前额向后用一排排半圈形的痕迹表示^⑭,这和哈达稍后的艺术中所见的一样^⑮。从远处看,这和莫拉-莫拉都较古老的雕像头一样,有同样的阴暗效果,不过这些雕像经常有着漂亮、规则的弯弯曲曲波浪形头发,像是从尖而整齐的额头线上流出的一样^⑯。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些莫拉-莫拉都雕像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衣褶。而在坐像上,垂髻以雅致的带卷纹的 V 形荷叶边悬罩宝座。另一方面,出自 5 世纪的乔利安雕像的衣褶少得多,仅限于几个大的衣褶,小的则被略去了,而许多悬挂的垂髻不可能见到^⑰,最多我们能注意到一个袋形褶^⑱,但是两边的衣边缘上没有卷纹边,在前一时期的垂髻特点也如此。

所以我们愿把讨论中的莫拉-莫拉都早期雕像定在公元 3 世纪末到 4 世纪,它们和犍陀罗艺术黄金时期的相似。那样的话,一方面,我们建议犍陀罗艺术黄金时代可能持续到公元 4 世纪;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出自莫拉-莫拉都较古老的雕像在公元 3 世纪出现,而不是公元 4 世纪或 5 世纪。最后一点和约翰·马歇尔爵士发掘中获得的年代并不矛盾。他说,从建筑技巧即半圆形的细石判断(见图 20),该寺院是建于公元 2 世纪末,而约 2 个世纪后,做了

增补和修缮工作。此外,出土了许多公元2世纪的钱币,特别是胡韦斯迦和韦苏提婆时的钱币^⑤。因此,该寺院相当古老,是建于繁荣期:大卒塔婆I号属于公元3~5世纪,它装饰的拉毛泥佛陀和菩萨可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马歇尔掌握的资料也是以这种方法确定界限的,而这也十分符合我们对这些较早期拉毛泥雕像所确定的更精确的年代。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莫拉-莫拉都卒塔婆1号的艺术属于犍陀罗艺术黄金期,而且根据佛陀长袍的矫饰风格,可确切地说是犍陀罗艺术黄金期之末。

我们已经用此期结束时的斯卡拉-德里的鬼子母雕像说明了为什么从整体来看石雕的衰微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试图证明繁荣期比我们迄今为止推测的要持续得更长些,莫拉-莫拉都艺术不该被看做是一个复兴。但是,我们仍缺少对此事实的解释:即,为什么有些遗址仅发现拉毛泥雕像。前面已经说过,为这种艺术单独设定一个时期似乎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拉灰泥雕刻部分可看做几乎和其他遗址处发现的石雕同时代。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用编年上的解释来解决,而是用地理上的解释来解决。但叉始罗附近的石头并不很适于雕刻,这是事实。此地石头易于雕凿,也易碎;另一种石头,即坎迦尔(Kanjur)的石头,质地又太柔软^⑥。从斯瓦特(Swat)山谷供给石头又太昂贵,因此,使用的是易于获取的且十分便宜的材料,即“石灰泥”和粘土。前者总是用于雕像和卒塔婆的装饰,因为此材料比较抗风化。对罩顶的雕刻,常常使用更便宜的粘土。

还有几点,也许此时提出更好,它们大多和风格的特性有关,特别在后期犍陀罗艺术中我们已经发现,因此它们被用做确定年代的要素。我们只能偶尔谈及此点,我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更详细地讨论它。

首先,有一类建筑片断,它们把佛陀像置于建筑场景中间(见

图 22)。这大多连同门廊和阳台一起组成了建筑物的正面。许多人物坐在此处,观众包括从普通平民到最高的菩萨、佛陀和神。在这些雕刻中,佛陀常常显示出其特质,这表明是较晚期的。佛陀几乎总是呈法轮手印(dhamacakramudrā)坐着,这又把我们带人第二点。我们已经指出,在犍陀罗艺术开始时以及其黄金期开始时,几乎只用施无畏印和禅宗手印(dhyanamudrā)。法轮手印是在较晚的时期出现的,因为较早的雕刻几乎总是借助轮子(佛陀用手转)^⑩,表示佛陀说法(见图 5)。稍后,轮子仍出现在浮雕上,但是佛陀已经呈施无畏印^⑪。

波什(Bosh)^⑫在柏盖斯(Burgess)^⑬后认为在犍陀罗,只有呈法轮手印或土触手印(bhumisparsamudra)的坐佛像右肩裸露。不过,我们已经有许多右肩裸露的佛陀雕像,呈现另一种手印(mudrā),而不是法轮手印,例如,A. 斯坦因爵士在沙尔-伊-巴霍尔^⑭发现的佛陀即呈禅宗手印,还有加尔各答的一尊佛陀可能呈施无畏印;而且最后还有,保存在拉合尔、加尔各答、柏林^⑮的穆塞(Musea)浮雕上的 5 位佛雕。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呈法轮手印的佛陀双肩裸露^⑯,以致所说的呈法轮手印式的佛陀右肩总是裸露(因为正如有时所推测的这样更舒适)似乎和事实不符。

呈现出这种手印的各种雕像的风格(见图 22 ~ 25)表明这样的事实:法轮手印只是出现在较晚期的雕像上。除了右肩裸露外,它们也常常有呈蜗牛壳状的小卷卷组成的发式(见图 22)。双脚大多裸露。最后衣褶的处理法及其垂襞也总是说明它们是较晚时期的。

第一个特点:卷曲的头发、裸露的双脚和裸露的右肩是出自秣菟罗佛陀的三个典型特征,特别是后两者,甚至可以追溯到此地佛像尚完全没受印度西北部影响的时候。呈蜗牛壳状卷曲的头发,虽然长久以来在印度各处的古老民族艺术中早已习以为常,但此

发式直到公元 130 年后才在秣菟罗佛像中使用^④。所提到的三个特征是犍陀罗呈法轮手印佛像所常有的^⑤，这三个特征可能是由于受秣菟罗的影响，这些影响最早在公元 130 年后确立，但是甚至也可能一个世纪后也还没有得以确定。由于法轮手印相当有规律地伴随着所提及的三种特征，更可能这种手印本身也是从秣菟罗输入的。所提及的呈法轮手印的雕像的这三个特征至笈多时代，即公元 4 世纪初仅仅到达印度西北部并不困难。有利于此说的一则事实是，在犍陀罗蜗牛壳式发卷大多数小，中印度只是在笈多时期有这种情况^⑥。此前，秣菟罗及印度其他地方此种发式的发卷仍相当大。如果法轮手印的确是从小秣菟罗输入的话，因为在秣菟罗这种法轮手印无论如何早期贵霜艺术中不会出现，至于后贵霜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遇到表现这种手印的任何浮雕。所以如果法轮手印是由印度输入犍陀罗的话，那么可推测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笈多时代，但是上面所述的这一时代显然不能充分证明。

不过，所介绍的三个特征，即蜗牛壳式发卷、裸露右肩和裸露双脚运用得并不普遍，即使在明显的使用时代里，某一时期又出现双肩及双脚通常被罩着，头发呈波浪形的情况。作为事实，我们的确发现各种佛陀呈这种波浪形发式，人们可能认为是模仿笈多时期佛像上的蜗牛壳式发卷，如图 23 中的佛陀、查萨达(Charsadda)^⑦的佛陀以及其他几个。但是，显然蜗牛壳式的发型已变成印度其他地方特别规范的佛陀发式，而在犍陀罗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这也是我们所以认为它是由印度传入犍陀罗，而不是相反的原因之一。在印度本土，这儿所提及三个特点被普遍接受，而在犍陀罗，它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有一尊呈施无畏印的佛陀雕像，头发不是小蜗牛壳式的发卷，而是一种非常规范的、习俗化了的波浪形，它从额头的中间分散到四周(见图 26)。这种发式也是相当晚的，是我们在莫拉·莫拉都发现的。后来，我们又在哈达见过，还在中国很古老的佛像上，即

大约为公元 650 年的天龙山佛洞 (the Cave of Tien Lung Shan) 见过^④。

通常呈法轮手印的佛像具有的第 4 个特征是衣褶的线条特殊,虽然一些其他的雕像也有这种衣褶。该特征主要指两个典型的衣褶:首先,在那些袒右肩的雕像上一条衣褶绕着右胸;其次,在那些双脚裸露的雕像上衣褶圈在其右脚下。显然,呈法轮手印的那些雕像仅仅显示出所提及的衣褶和所要求的右肩袒露或双脚裸露相联系,这是大多数的情况。这些衣褶在以下雕像中得以很好展示:图 23、24、25、26 中的雕像,以及 A. 福色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209、501 和 503 页中图 407、482 和 483 的雕像。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种衣褶,因为它的褶痕走向和秣菟罗及印度其他地方的不同。在犍陀罗长袍折两层,即:第一层衣褶贴近右臂窝下方,罩着右胸,又从背上穿过绕回并覆盖左肩;接着又在右臂窝处绕第二层,只是这次相当紧,在已经被罩住的右胸处形成一个松松的衣褶,并裹过左肩;此后衣饰末端从左臂下经过,握于左手中。而且,覆盖胸部的第二次裹绕显示出其特点:衣边处褶痕很强,以致一条质感厚厚的翻边斜绕过胸脯,而身体前面的衣褶并未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从此翻边外流出,而是以一种圆形曲线垂下,然后又弯到左边^⑤。

第二个典型衣褶,即从右腿下突出的环状褶比前一个更具特点(见图 26)。其形成很容易解释,它是第二次绕裹的下缘,又为右腿撑起,这样在两腿间就突出形成环褶。再者,在左腿下部另外的波浪形衣褶值得注意,因为这种扇形衣褶覆盖座位。我们愿把从一些雕像双腿下方显现出的这种扇形衣褶看做是对笈多雕像中同样衣褶的模仿,这种衣褶至少在犍陀罗雕像上已成习俗。为了说明那些罩过胸脯垂至双脚的具体衣褶,我们选取一尊雕像作为例样,该雕像可能属于此现象发展结束时的,因为能从中清楚地看到所讨论的特征:这些特征所坚持的夸张方法使得它们显出拙劣

摹仿之嫌。但是,我们当然能区别出过渡阶段,此时胸脯上的衣褶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是从富于质感的翻边处流出的,而且翻边过厚,双脚下的环形褶没有那么夸张。拉合尔博物馆中的一尊雕像(见图 24)是犍陀罗艺术黄金时代后期的,可作为说明此点的例子,这可从佛陀本人长袍和僧人长袍(也可能是供养人的长袍)衣褶处理方法来进行判断。还有,在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49 页图 481 的雕像上,并没有显示出绕过右胸的第一道裹绕。不过,这最后的是极为例外的一个,它是我们所知的此类例样中惟的一个^⑩。也许我们在此拥有犍陀罗裸肩类型中最古老的例样之一?施无畏印也可以说明此点。这种神态难道不是秣菟罗和犍陀罗最早雕像中的特征之一吗^⑪?

作为呈法轮手印的各种雕像的最后一个特征,我们谈谈衣褶的处理。因为我们在许多其他晚期的雕像中也发现了此点,也许我们最好说,这是证明呈法轮手印的雕像属于犍陀罗繁荣期后半期事实的论据。我们对衣褶的此种处理仍缺乏解释。印度西北部早期雕像已经在恰如其分地表现长袍衣褶上呈现出相当大的程式化。在繁荣期,佛陀雕像在那些衣褶的造型上表现出完美的技艺。透过薄薄的长袍,整个身体已清晰可见。在后来的雕刻中,特别是较小的雕像中,我们发现一种表示衣褶的技巧,叙述如下:衣褶不再是厚厚地放在长袍下的身体上,相反,衣褶的凹处被凿入石头;而且另一个特征是表示衣褶的凹沟成对地平行排列,而在较大的雕像中,衣褶两个凹沟之间细窄的凸脊已被凿去。

我们在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209 页图 407 的浮雕上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属于第一种现象。

我们能列出几个用此种方法处理衣褶的例样,它们大多数出现在那些特别的雕像上,这些雕像因其他原因肯定属于后期发展阶段^⑫。在图 23 和图 26 及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242 页的图 429 及第 501 页的图 482 和第 503 页的图 483 中的佛陀

身上,我们发现了第二种情况的一个例样,即衣褶两个凹沟间凸脊被凿去的那种情况。而且,斯本纳的一篇文章中仍有,见《印度考古调查年报(1907~1908)》图版47,d^⑭。

呈法轮手印的雕像引起对风格的5种特征的讨论,这些特征我们在此种雕像及出自犍陀罗艺术后期的一些其他雕像中也碰到过。

和这些呈法轮手印的雕像相联系的还有一点我们要讨论。福色尔的观点是,描绘佛陀呈法轮手印坐在一朵随茎而起的莲花上,而大梵天和帝释天站立或坐在其两侧的场景可被看做是舍卫城(Śrāvastī)的奇迹^⑮。我们将逐个讨论福色尔所提出的舍卫城奇迹的三个特点。首先讨论第二点,即佛陀用升起的带茎的莲花作座垫。关于此论据似乎有些小小的反对意见。

首先,福色尔所给的舍卫城奇迹的诸例样中的四个,佛陀并没有坐在一朵莲花上。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在舍卫城奇迹中,佛陀并不总是坐在一朵莲花上^⑯,或者并不是所有都呈法轮手印,且由大梵天和帝释天围绕的佛陀都代表舍卫城奇迹。因为所有正宗的书籍清楚地说明奇迹在于佛陀所坐的莲花的增多上,第一种推测似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我们得下结论说并不是所有福色尔所指出的例样都代表舍卫城奇迹。在笈多时期及此后,我们遇到呈各种姿态坐在或站在莲花上的佛陀,甚至有以两只小鹿及一个象征初次说法的轮子,清楚表明其特点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上佛陀呈法轮手印坐在一朵莲花上^⑰。显然至此莲花已变成佛陀之座,更普遍地说来,成为每个神人的座垫。显然,此阶段在犍陀罗黄金时代即已存在,例如因陀罗和梵天被描绘成站在佛陀雕像光环旁边的一朵莲花上^⑱。甚至从秣菟罗早期艺术中,就知道有一尊最古老类型的佛陀站在一朵莲花上^⑲。在笈多艺术的各种站佛像上,我们遇到带茎的莲花,高高地浮出水面。茎的两侧盛开两朵较小的莲花,其上站的侍僧通常手握一枝卡马拉木。如今一些雕像仍手持

金刚,和最初的特征有所不同^④。因此作为座垫的莲花并没有舍卫城奇迹的具体特点。考虑到由福色尔提及的第一个特点法轮手印,我们不得不说不但在笈多时期及此后,我们见到许多呈法轮手印的佛陀,其座上绘有一只轮子,两侧各一头小鹿。这无可辩驳地说明此场景是鹿野苑初次说法。作为一个例样,我们只能提及著名的鹿野苑雕像。舍卫城奇迹的特点变得更弱,而此时在鹿野苑我们甚至能发现初次说法的场景,其中佛陀呈法轮手印式坐着,左、右各有一个侍僧,其中右侧一个显然不同于此场景中最初的特点,左手持金刚^⑤。当我们发现一个呈禅宗手印的佛陀像,而福色尔认为是舍卫城奇迹时,所有此特点变得更加奇怪^⑥。

现在就舍卫城奇迹第一个特点而言,即梵天和因陀罗出现在佛陀两侧。正是福色尔本人在几个佛传故事的场景中,辨识出站在佛陀左右两侧的两个人是印度教的两个伟大的神。

“……我们有机会来指明,这样的传奇场面是如何包含着由介于两尊俗家弟子之间的佛祖所构成的众多组画面中所蕴含的真实意义,以及至此在标题上不加区分地做了分类——‘两尊菩萨间的佛祖’。实际上,当这三幅人像是竖立着的时候,我们已经辨认出它们意味着一种‘下凡’,与其传说图案分离开来(参见《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538~539页,图版7或76上部);或与此相反,佛陀坐于其惯常的宝座上,我们同样可以说是‘说法’,直至那些最一成不变的装饰主题(参见《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26页,图版215)。”^⑦

“……而图版7的主题”(即比玛兰)“明显受‘下凡’的启发”,“此例会使人想起舍卫城大奇迹”——连同那些为转变成圣像组中的一幅传奇场面而具有的必要的特质”^⑧。

因此,梵天和因陀罗的出现似乎并不是舍卫城奇迹的一个特殊特征。而且,我们在秣菟罗最古老的雕像中发现这两个作为侍僧的神,尽管这些场景并没有舍卫城奇迹的具体意义^⑨。在耆那

雕像中也是如此,我们碰到作为侍僧的梵天和因陀罗。在笈多和帕拉斯(Palas)较晚的艺术中,我们在关于佛传的各种场景中见到所说的神处于佛陀两侧,例如,初次说法等,梵天大多是以4个头为其特征,因陀罗则是由金刚(Vajra)为其特征。对我们来说,这种在梵天和因陀罗之间一尊站佛或坐佛似乎更可能是普通的崇拜场景,而缺乏关于地方性和时代特点的进一步痕迹,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秣菟罗也是这种情况,例如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427页图215。如在马尔丹盖斯·麦斯中及亚历山大·斯考特藏品(Alexander Scott Collection)中的那些一样^⑥,其上因陀罗和梵天两个小雕像从其光环上可以辨出,人们几乎不能设想这些大的佛陀雕像表现从忉利天宫中下来。这仍是表现佛陀的,佛陀仍呈其通常的手印,即施无畏手印,印度教的两尊伟大的神在光轮的两侧。

简言之,梵天和因陀罗的出现,似乎不可能成为福色尔所说的把这些浮雕识别为舍卫城奇迹场景的论据。梵天和因陀罗不过是起崇拜者的作用,因此,它似乎是象征印度教对佛陀的谦卑。

但是我们还要比此更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在这些福色尔识别为舍卫城奇迹的浮雕中,佛陀左右的两个神是否真是印度教中的两尊伟大的神。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人物不是如我们所期望的崇拜者那样呈崇拜姿态站立着。他们并没有呈母印状,也没面朝佛陀,而是面朝观察者。他们的右手如果没被毁坏该是呈施无畏印举着。手的这种保护性姿态不是我们从两个崇拜者那里所期望的,而且更多是他们本身拥有很重要的人物所具有的,他们在虔诚的佛教信徒眼中占有独立的位置^⑦。而且,他们的贡物,一本书和一朵长茎荷花,和我们常见的梵天和因陀罗所持的东西,即长颈水瓶和金刚^⑧不同。在一些雕像中,人们甚至发现所提到的贡品莲花也握在另一只手中,或者手放在臂部。有时一只长颈水瓶代替书本(见图25)。

从所有这些特征中可得出以下结论：这两个人物决不是梵天和因陀罗，这为图 25 中所复制的一尊浮雕所证实。此处我们再次看到正在讨论中的三个人物。从垂悬的长茎来看，在我们左手侧的那个人物右手握一只莲花，左手放在臂部。该图中在我们右手侧的人物左手持一只长颈水瓶，可能其右手呈施无畏手印举着，可惜已被毁掉。在这两个人物和佛陀之间，我们又看到两个其他人物居于其间。左侧的一个看起来像个苦行者，穿件简单衣服，其上没有珠宝，头发在头顶系成一个顶结，左手持一只长颈水瓶。右侧的那个人穿着富丽堂皇，佩戴很多珠宝，头冠华丽，装饰珍珠宝石，左手握一金刚。此人物无疑是因陀罗神，因为他拿有此神所特有的象征物，而且其头冠也表明其特有的平圆柱形^⑧。这样另一个人物显然是梵天，其苦行者的外表及婆罗门式的长颈水瓶都已暗示出这一点。

由于这一辨识，再把侧面的较大的人物识别为梵天和因陀罗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是谁呢？在此组雕刻中有一个特点，或许有助于辨识人物。除极少数几个例外，人们几乎总是可见到在这两个人物头顶有一尊小佛陀像，呈沉思状坐着。由于这两个人物对我们显示出独有的、重要的表情，以及其手呈保护性姿态，我们似乎可以把他们辨识为菩萨。在他们头顶呈禅宗手印的小佛陀像可假定是他们尊敬的禅定佛(Dhyani - Buddha)。为了详细辨识这两个菩萨，我们肯定得依靠他们的象征物，一朵莲花和一本书或一只长颈水瓶。可能他们因此可被识作观自在(Padmapāni)和弥勒佛(Maitreya)。

因为有许多其他非常类似的三人组合式的雕刻，其中侧面的两个人物站在莲花上^⑨，这碰巧和图 25 中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再不能把所有这些三人组合式的场景都辨识为舍卫城奇迹，但是肯定得把它们标明为表现佛陀(由梵天和因陀罗相伴)及两个菩萨的场景。

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有两个独立的雕像，福色尔把他们辨识为梵天和因陀罗，事实上他们是菩萨^⑩。这由如下事实所表明：那些人物中之一表明一个小崇拜者或者哀求者站在这个所谓的因陀罗的脚下。如果我们假定所崇拜的不是因陀罗而是菩萨，那么这罕见的表现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崇拜该印度神因陀罗的场景就得到解释了。

菩萨像早在公元 3 世纪就已经制作的事实和大乘佛教 (Mahāyāna) 发展相联系是重要的。

梵天和因陀罗是这两个菩萨的原型似乎是不可能的^⑪。他们是一对(因此不是单个人)出现的,惟一相似性是,观自在总是穿一件长袍,另一个人物的头发被系成一个发结(不过和梵天对照,他佩有珠宝)。如果因陀罗是菩萨的原型,那么很可能他孕育出菩萨金刚(Bodhisattva Vajrapāni),而不是弥勒。

考虑到把所讨论的人物辨识为菩萨,以及前面提出的反对把那些雕像按福色尔所识别的舍卫城奇迹的论据,所以当我们试图把某个场景识别为舍卫城奇迹时,似乎要格外慎重,只有当在同一浮雕像中,许多佛陀同时坐在从中央佛陀所坐的莲花上涌现出的莲花上时,这时我们才敢作此辨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把阿旃陀(Ajanta)第九窟的壁画识别为舍卫城奇迹是错误的。科罗姆(Krom)已证明博罗布都尔(Borobudur)第四个门廊上的浮雕不可能表现伟大奇迹^⑫,博什(Bosch)认为那些浮雕是出自《华严经》(Gaṇḍavyūha)的一段插曲^⑬。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前面证明,由福色尔所辨识出的舍卫城奇迹的其他雕刻并没有表现佛传中的那个特殊场景,除了《舍卫城伟大奇迹》^⑭一书中图版 19、20,可能还有图 21(2)及图 23(1)中的那些浮雕。

和我们所讨论的图 25 相联系,我们愿意再次把犍陀罗金刚(Vajrapāni)问题拓宽。和佛教徒及秣菟罗以及总体上早期印度的

耆那一起,因陀罗和梵天降到了大约和夜叉的同样次要的位置(见图 25,保存在波士顿的浮雕因陀罗的外表)。而且莫噶拉纳(Moggallana)把帝释天(Sakka)叫作一个 Yakkha^⑩。那些保持把这些耆那侍僧的旧名字仍称为梵天和因陀罗的耆那也把他们叫做夜叉。布达高萨(Buddhaghosa)^⑪也把因陀罗描绘为一个手持金刚的夜叉,见他关于 Ambat̥tha Sutta 的评论^⑫。在以前的时候,秣菟罗已经把因陀罗神描绘成一个夜叉,考虑到这点,在出自犍陀罗的带有因陀罗神的浮雕上识别出夜叉金刚(Yaksa Vajrapāni)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不过,把这两个人物看做一个人似乎是有反对意见的,事实上夜叉金刚和因陀罗神同时出现在一件雕刻上只有两三次,福色尔和森纳特因此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⑬。在此思想指导下,科诺甚至推测夜叉金刚比因陀罗神更为古老,可以追溯到手握金刚的那个人物,该人物在吠陀(Vedic)时代孕育出后来的因陀罗^⑭。我们更愿意把犍陀罗的夜叉金刚带回到夜叉因陀罗(Yaksa Indra),正如在早期佛教和耆那教圈内所描绘出的那样:他是佛陀永恒的侍僧、崇拜者、仆人和保护者。当此夜叉因陀罗-金刚(Yaksa Indra - Vajrapāni)开始在犍陀罗艺术中被描绘时,他被赋予一个真实的夜叉形象:粗糙而暴烈。福色尔很聪明地把这一人物原型追溯到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化艺术^⑮。在早期的秣菟罗,人们还生动地记得此夜叉因陀罗-金刚作为印度教神的作用:在犍陀罗艺术中,他的外表呈现出明显的酒神巴克斯(Bacchantic)或海格立斯(Herculeans)的形式,但是在他作为释(诸神之王)拜访或礼拜佛陀的场景中,他被描绘为一个王室之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福色尔和森纳特总结说在犍陀罗艺术中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不过我们肯定要推测,尽管如此,印度西北部的佛教徒知道夜叉金刚实质上不过是因陀罗神。

这就是非常博学的布达高萨所认识到的,他在评论“夜叉金刚”这个词时写道:在夜叉金刚挥舞金刚时,这并不意味着是夜叉

或别的人,而正是因陀罗神。对我们来说,似乎应像科诺那样,由于正统婆罗门教的反应,把此事颠倒过来作为一个次要解释来说明这段话。

在图 25 的浮雕中也出现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佛陀由梵天和因陀罗及两个菩萨陪同。此类浮雕还有几个。该浮雕中一个人物显然是因陀罗,这由一顶冠帽及金刚^⑧所表明。但是,我们已经发现,至少有 4 尊佛像^⑨中这个同样人物清清楚楚地被描绘成有胡须及头发蓬乱的拿金刚的夜叉。一旦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无数雕像中夜叉金刚(因陀罗)站在佛陀一侧,一个不能辨识的苦行者在另一侧。似乎这就是结对的因陀罗—梵天。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稍后要更详细地重谈此事。

最后,我们一定要提及的是,用作佛陀座垫的莲花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莲花由三支小茎支撑。此种情况中,莲花已成为一个莲花宝座^⑩。很可能坐(Padmāsana)的名字即源于此事实。第二种类型,莲花因其尖尖的叶子而非常像一个洋蓐^⑪(见图 22)。第三种类型,出现于莫拉—莫拉都寺院中,花瓣外翻且下垂^⑫(见图 21)。这最后一种类型出现在莫拉—莫拉都的事实再次是利于下述观点的一则证据:呈法轮手印的佛陀直到印度西北部艺术黄金时代后期才出现,并且这也再次表明了呈法轮手印的佛陀直到笈多艺术开始时才出现于犍陀罗的可能性。对印度西北部较晚期雕像的一些特点,我们现在暂不讨论。

和上面相联系的还有一点要处理,即在阿富汗发现的拉灰泥雕塑,特别是由法国考古队发现的那些。斯特兹格斯基(Strzygowski)把该艺术的年代确定在公元 3 世纪前很长的时间里,甚至可能在公元前^⑬。巴赫霍夫也指出了该艺术和公元前 2 世纪的古希腊艺术非常相似,不过他认识到这种巨大相似性的原因不在于这两种艺术同时发生:“这些雕像在风格和特征上现有的相似性是有其原因的,它在处理晚期艺术时有两个界标;相反,重要的是,这些形

式上的相似性使人吃惊,这些艺术的输入和西方相联系。”^⑧

为了或多或少地估计出自哈达的拉灰泥雕像的年代,赫金一方面指出它们和咀叉始罗艺术相似,另一方面又指出和克孜尔的相似,他以此种方法得出其年代在公元3-8世纪的估计^⑨。在我们看来,哈达拉毛泥雕塑部分还和莫拉-莫拉都较晚期的艺术同时代,特别是和部分较晚期的乔利安艺术同为一个时代。在这两组雕刻之间不可能有很大的时间间隔,所以把哈达雕塑看做是一种单独的艺术似乎是很不正确的,例如,像约翰·马歇尔就把它叫做印度-阿富汗流派^⑩。虽然在许多方面,诸如主体的选择及其表现,哈达的雕塑者给人的印象都具有创造性,但是在咀叉始罗发现有极为相似的雕塑,还发现有着斯基泰人外表的士兵和供养人^⑪、和尚^⑫和贝壳花。至于风格的相似性也是很突出的,特别是佛陀的头:椭圆形的脸、直而长的鼻子、拉长了的微闭的眼睛、眉线修饰考究的眉毛,还有清晰的额头线,通常有一条中间深而且尖的曲线,由此细浪般的头发布满头。佛陀头之间的特别相似性可有以下事实解释:佛陀的表现已经有了相当严格的规范。不过,所提到的这些品质太显著了,不能否认哈达艺术部分和4世纪末及5世纪印度西北部艺术同时代,又部分形成了此期印度西北部艺术的一个延续。瓦尔德史密特指出巴特霍克斯发现大量拉灰泥塑的塔帕-喀兰(Tapa Kalan)卒塔婆和乔利安卒塔婆相似^⑬;而且他提请注意钱币窖,该窖是由梅森于10号卒塔婆发现的,此卒塔婆又叫托普-凯兰(Tope Kelen)卒塔婆,所储钱币的年代一直延续到公元474年^⑭。对我们来讲,这些是足够的证据,排除了这些拉灰泥雕塑残片像斯特兹格斯基所说的那样是早期的可能性。

在哈达的这些发现物中,一些并不太引人注意的佛陀头像和出自咀叉始罗的那些拉灰泥雕像类似。在这些头像中,较突出的品质特别表现在下列这些方面:脸的形状较圆,下巴显得特别柔和而且较胖,显得饱满;嘴巴很小,嘴角微凹;双颊显得颇厚;头发的

表现常常颇具印象派手法：用圆线或波浪线勾勒到雕像头上；双眉在额头上绘得很高，呈半圆型^⑨。有此特征的头可能属于哈达后期。无论怎样，它们的特点强烈地表明中亚较晚期艺术中心的方向，显示出如此众多宗教和艺术成分的融合，成为远东佛教艺术的摇篮。不过，我们不敢苟同赫金所提出的晚至公元 8 世纪的年代，除了几个佛陀雕像外，总的说来出自阿富汗的艺术和公元 8 世纪塔里木盆地的艺术品相似处极少；而另一方面和较晚期犍陀罗艺术的相似处颇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谨慎地把这一大致年代划定在公元 400 年直至包括公元 7 世纪在内的这段时间。但是，此处我们很快触及到一些事情，我们据此愿意结束讨论。

事情的核心是，要对印度西北部艺术的兴衰提出一个界定更清楚的年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有时只是把匈奴入侵前的时代作为该艺术衰落的时代。不过，我们不敢把公元 4 世纪时的犍陀罗艺术称作颓废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谈论其衰败是不怎么正确的。而且，这种艺术的一部分在白匈奴入侵后仍保存下来了，即在阿富汗，并没显示出任何衰微的迹象；相反，它甚至常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种崭新的、年轻的艺术流派。在我们看来，最好是避开这两个极端，走中庸路线，即要么把哈达艺术看做自成一派，要么是和犍陀罗艺术同属一派。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哈达艺术部分是和犍陀罗艺术同时代，且是同一流派；另一部分是犍陀罗艺术的延续，是其较晚的发展。同样，正如我们对出自哈达艺术及塔里木盆地较晚期的中亚艺术的了解一样，这两种雕刻之间存在着一个逐渐的过渡。我们倾向于把拉灰泥雕刻划定在哈达艺术的较晚期，在我们看来它表明了这种推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给犍陀罗艺术的终结划定年代相当困难。在发展进程中，每个研究者都能找到某一处，在此处就他个人观点来看犍陀罗艺术成分是如此之少，以致他认为犍陀罗艺术结束了。但是精确确定此点是非常主观的事，完全取决于对残存的图案某种花边或

者别的什么,或者某些风格特点。从福色尔的一则评论中,可见这种由主观设定的点离其始点游离得多么远,既然这样,地中海的古希腊文化就是:

“一个惊人的强烈现象,——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地方僻处海洋,并属于相对晚期的作品(9世纪),在犍陀罗雕刻家之后,这些爪哇雕刻家是亚洲东方未曾有过的,他们这些门徒比那些希腊化的师傅要好。对亚洲东方而言,至少是没有较好地保存下古代画坊中的神灵,并更为娴熟地使用其秘诀。”^⑧

也许要最谨慎说的事情是犍陀罗艺术逐渐发展并转变成中亚艺术^⑨,而犍陀罗艺术的终结即发生在此过程中。

要确定犍陀罗艺术的终点和确定其始点一样困难。在本章开始之时我们已经充分地讨论了此点。既然如此,也不可能准确说出,什么时候第一件雕刻可以算做犍陀罗艺术而不再是古希腊艺术的输入品或复制品。这肯定有一个过渡期,此期制作复制品更少,因为人们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观点和图案,尽管它受益于古希腊经典作品。该过渡期可能早在帕提亚诸王时即已开始,接着在迦德菲斯诸君主统治时得以继续。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可能没有艺术发展的太大空间,而在迦腻色迦统治时艺术可能得以如此巨大的发展,以致一些具体事情能够得以说明,尽管它仍有相当强的古希腊影响。这种新兴的艺术,如传统所说的,实实在在得到迦腻色迦的保护和促进是肯定无疑的。此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在约半个世纪后的咀叉始罗 I 建筑的浮雕上见到一种单独的独立艺术。关于迦腻色迦作为艺术和文学的促进者的传统观点,完全和前一章所论述的犍陀罗艺术的框架相合。基于历史根据之上的传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注 释:

①为简洁的缘故,我们省去较早的考古学家的观点,因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贡献。诸如西姆普森、德尼克和 G.C.M. 柏德伍德的观点也被省去了。

②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第 3 卷,第 39 页和第 41-45 页。

③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第 5 卷,前言第 6 页。

④ 由温森特·史密斯在《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的影响》中刊布,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 58 卷,第 1 部分,1889 年,第 149 页。

⑤ 同上。

⑥ J. 福谷森:《印度历史及东部建筑》,伦敦,1876 年,第 181-182 页。

⑦ 温森特·史密斯:《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的影响》,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 58 卷,第 1 部分,1889 年,第 107-201 页,特别是第 172 页。

⑧ 温森特·史密斯:《印度历史的贵霜或印度-斯基泰时期(公元前 165 年至公元 320 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03 年,第 1-64 页,特别是第 52 页。

⑨ 温森特·史密斯:《印度早期历史》,牛津,1904 年报,第 233 页,第 2 版,1908 年,第 248 页。

⑩ 温森特·史密斯:《印度和锡兰美术史》,牛津,1911 年,第 1 版,第 99 页;第 2 版,第 52-53 页。

⑪ 温森特·史密斯:《印度-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的影响》,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 58 卷,第 1 部分,1889 年,第 107-201 页,特别是第 193 页。

⑫ 温森特·史密斯:《印度历史的贵霜或印度-斯基泰时期(公元前 165 年至公元 320 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03 年,第 1-64 页,特别是第 31 和 61 页。

⑬ 温森特·史密斯:《印度和锡兰美术史》,第 1 版,第 99 页;第 2 版,第 52-53 页。

⑭ 温森特·史密斯:《牛津印度史》,牛津,1919 年,第 127 页。

⑮ 艾米尔·森纳特:《印度铭文之注释》,Ⅲ,《关于几件印度-巴克特利亚雕像》,B,《西克里雕像》,载《亚洲学刊》,1890 年,系列 8,第 15 册,第 130-163 页,特别是第 150 页。

⑯ 艾米尔·森纳特:《印度铭文之注释》,Ⅲ,《关于几件印度-巴克特利亚雕像》,B,《西克里雕像》,载《亚洲学刊》,1890 年,系列 8,第 15 册,第 130-163 页,特别是第 163 页。

⑰ A. 格伦威德尔:《印度佛教文化》,载《柏林皇家博物馆手册》,柏林,1890 年,第 1 版,第 14 页。

⑬ A. 格伦威德尔:《印度佛教文化》,载《柏林皇家博物馆手册》,柏林,1890年,第1版,第81页。

⑭ A. 福色尔:《关于新近的一本书中的印度佛教艺术》,载《宗教史杂志》,第15年度卷,第30册,巴黎,1894年,第318-371页,特别是第328页,及《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第1卷,第42页。

⑮ 1912年,A·福色尔《佛像之希腊起源》,载《吉美博物馆普及图书年鉴》,第38册,索那河沙龙,1912年,第231-272页,英文版。《佛教艺术之初佛像的希腊之源和在印度及中亚考古的其他论文》,巴黎-伦敦,1917年,第111-138页。

1913年,根据F.W. 托马斯的《迦腻色迦的年代》,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13年,第632页。1928年:《佛教艺术研究》,由福色尔于东京 Maison 法-日讲座,题目是“印度佛教艺术研究”。

⑯ 例如马歇尔、斯堡纳和沃格尔,例如:斯堡纳:《在沙-吉-柯-德里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8-1909)》,第38-59页,特别是第50页。

⑰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442页。

⑱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496页。

⑲ J.Ph. 沃格尔:《题有铭文的犍陀罗雕刻》,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3-1904)》,第244-260页,特别是第259页。

⑳ J.Ph. 沃格尔:《乌尔(Voor)-犍陀罗佛教文化》,阿姆斯特丹,1932年,第35页。

㉑ G.N. 班纳吉:《古印度的希腊文化》,第1版,伦敦,1919年,第1-52页。

㉒ J. 海克金:《吉美博物馆分类导读》(佛教藏品),中印度和犍陀罗,土耳其斯坦,中国北方及西藏。巴黎,1923年,第24页。

㉓ L. 亚当:《佛教人物的雕像、起源和造型》,斯图加特,1925年。

㉔ L. 谢尔曼:《慕尼黑民族文化博物馆最古老的佛雕像》,载《慕尼黑造型艺术年鉴》,第5卷,1928年,第3册,第64-80页,以及第6卷,1929年,第2册,第147-166页。《印度民族型最古老的佛雕和众神》,载《艺术之友及收藏者月刊》,1928年,第3册,慕尼黑,1928年,第147-150页,特别是第150页。还可见《福·乌·托马斯卷册》,1939年,第242页,及J.Ph. 沃格尔教授的《回忆录》,载《亚洲研究哈佛学刊》,第8卷,1944年,第227-234页。

㉕ A. 格罗塞特:《东方文明》,第2卷《印度》,巴黎,1930年。

㉖ 见本章注释第24和25。

㉗ G.N. 班纳吉:《古代印度的希腊文化》,第147页。

㉘ E. 瓦尔德斯米特:《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莱比锡,1925年,第15页。

㉙ A.K.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史》,伦敦,1927年,第52页,德语

版第 58 页。

⑳ B. 诺兰德:《修订版犍陀罗雕刻编年》,载《艺术公告》,第 18 卷,芝加哥,1936 年,第 387-400 页。

㉑ A. 福色尔:《关于新近一本书中的印度佛教艺术》,《古美博物馆年鉴》,载《宗教史评论》,第 15 年,第 30 卷,巴黎,1894 年,第 365 页。后来福色尔在《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中又部分地放弃了此说,见该书第 2 卷,第 527 页。

㉒ B. 诺兰德:《犍陀罗及晚期古代艺术:佛像》,载《美国考古学刊增刊》,第 46 卷,1942 年,第 223-236 页,特别是第 224 页。又见同一作者的《犍陀罗及早期基督教文明:佛陀 Palliatus》,载《美国考古学刊增刊》,第 49 卷,1945 年,第 445-448 页。

㉓ H. 布赫塔尔:《犍陀罗雕刻的西方诸方面》,载《英国学术活动》,第 31 卷,伦敦,1945 年,第 16 页。又见同一作者的《犍陀罗雕刻编年的基础》,载《陶瓷研究会学刊》,第 19 卷,1942-1943 年,伦敦,1945 年;《佛教和基督教叙述性艺术的古典同源说》,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亚洲学会学刊》,1943 年,第 137-148 页;《犍陀罗雕刻霍顿藏品》,载《伯灵顿杂志》,第 86 卷,1945 年,第 66-73 页。

㉔ R. 吉尔斯曼:《贝格拉姆:贵霜历史考古研究》,第 153-154 页。

㉕ 进一步见本章稍后福色尔关于该王圣骨箱的引文。

㉖ 有一个很显著的例子,见本章注 38 所引述的布赫塔尔的文章。

㉗ 在巴尔胡特:A. 卡宁汗姆的《印度的卒塔婆》,伦敦,1879 年,图版 17;S. 克拉姆里什:《印度雕刻》,载《印度遗产系列》,伦敦,1933 年,图版 5,人物像 22。在山奇:F. C. 边西的《山奇及其遗址》,伦敦,1892 年,图片 11;J. 马歇尔的《山奇指南》,加尔各答,1918 年,第 56 页,第 3 版,第 61 页。

㉘ C. L. 法伯里:《表现佛陀从 33 神天降凡的亲希腊性佛雕》,载《东方资料实录》第 8 卷,1930 年,第 288-293 页。又见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第 539 页的第 265 图。

㉙ 进一步见本章中部。T. 柏罗赫已经在《受印度崇拜的佛陀:古代印度艺术所偏爱的主题》指出该场景中的印度影响,《孟加拉艺术学会会刊》,1898 年 1-12 月,加尔各答,1899 年,第 186-189 页。

㉚ C. 胡阿特:《古代波斯和伊朗文明》,载《人类的发展》,巴黎,1925 年,第 143-146 页。

㉛ W. M. 马克·噶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和匈奴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查普尔·黑尔,1939 年,第 73 页。

㉜ 从长远的观点看,此名号已经变得陈腐,失去其字面意思。

㉝ A. 克里斯坦森:《萨珊时代的伊朗》,哥本哈根,1944 年,第 49 页;C. 胡阿特:《古

代波斯和伊朗文明》，第 144 页。

④ 我们记得约翰·马歇尔在呾叉始罗所发现的那些物品，他在其著作中公布。见《呾叉始罗指南》，第 3 版，德里，1936 年，第 49 页，图 1，及《呾叉始罗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调查年报》，1912 - 1913 年，第 1 - 52 页，图 20 和 23，人物 a；《呾叉始罗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调查年报》，1928 - 1929 年，图 19，人物 1；图 20，人物 10 和 11。

⑤ 又见 L. 巴赫霍夫：《论印度的希腊和塞种人》，载《美国东方学会学刊》，第 61 卷，1941 年，第 223 - 250 页。

⑥ L. 巴赫霍夫：《犍陀罗雕像的年代》，载《佛教学刊》，第 6 卷，1924 - 1925 年，新序列为第 3 年度卷，慕尼黑，1925 年，第 4 - 29 页，特别是第 26 页。也有单行版本，见该版本的第 25 页。因此我们要给出单行版的页码；见《佛教学刊》，第 6 卷，加一页页码即相同。

⑦ K. 德·B. 考德林顿：《古代印度》，第 52 页。

⑧ 例如，在 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第 465 页浮雕图 234，其建筑的细节表明它是属于犍陀罗艺术繁荣期的；还可见《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87 页图 346，从佛像长袍的褶法及头发的表现方法和其双手的手式，更多的细节见第 124 页以后。考德林顿相信此椭圆形“只是在后贵霜的秣菟罗雕刻中有迹可寻”，故这使该圣骨箱的年代较晚，《古代印度》，第 52 页；诺兰德也把该圣骨箱归于公元 3 世纪；《修定版犍陀罗雕刻编年》，载《艺术公告》，第 18 卷，1936 年，第 387 - 400 页，特别是第 399 页。我们认为判断这些雕刻的年代的准则是：壁柱越短且变得越细（结果椭圆变得越短），该浮雕的年代就越晚。

⑨ L. 巴赫霍夫：《早期的印度雕像》，慕尼黑，1929 年，图 159，人物 1。

⑩ 细节可见第 7 章第 374 - 376 页。

⑪ J. 马歇尔：《呾叉始罗指南》，第 3 版，图 13，第 88 页。

⑫ N.G. 马加姆答：《弥兰陀统治时代的巴爾尔圣骨箱》，《印度铭文》，第 24 卷，1937 年，第 1 - 8 页。

⑬ K. 德·B. 考德林顿：《古代印度》，第 42 页。

⑭ R. 勒·梅：《比玛兰圣骨箱》，载《伯灵顿杂志》，第 82 卷，伦敦，1943 年 5 月，第 116 - 123 页。

⑮ L. 巴赫霍夫是在一个并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建立其假设的，见《关于犍陀罗雕像的年代》，单行本版，第 8 - 18 页，《早期印度雕像》，第 75 - 79 页。在该书第 88 页也可以见其研究方法，他从查萨达佛像下的一枚阎膏珍的钱币的事实而推断该雕像的年代当属于公元 50 - 78 年。见第 7 章。

⑯ 霍尔恩勒博士关于 W·西姆波森在阿因·婆什·陶普(Ahin Posh Tope)的贾拉拉巴

德(Jalalabad)所发现的金币的讲座,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1878年,第122-138页,特别是图版2和图版3。

⑥2 K. 德·B. 考德林顿:《古代印度》,第49页。约翰·马歇尔爵士就该事实希望做出的解释是:“用于使该坟墩隆起的废墟是从有大量早期钱币的较早的遗址处运来的”。这对我们来说远未达到。

⑥3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载《艺术年报》,第9卷,第4号,纽约,1927年,第33页。

⑥4 V. 史密斯:《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的影响》,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58卷,第1部分,1889年,第173页。

⑥5 在L. 亚当的《佛雕》中有复制品,见该书图版6;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卷首;L. 巴赫霍夫的《关于犍陀罗佛像的年代》,图9;L. 巴赫霍夫的《早期的印度雕刻》,图版145和146。

⑥6 A. 福色尔:《(犍陀罗)斯基拉卒塔婆的浅浮雕》,载《亚洲学刊》,系列10e,第2卷,1903年,第185-330页,特别是第320页。

⑥7 A. 卡宁汉姆:《考古调查报告》,第3卷,第100页。

⑥8 J. 赫金在其书中有复制品,该书为《法国考古队在哈达(阿富汗)的调查》,载《亚洲艺术评论》,第5卷,1928年,第66-76页,图版21,人物像11。又见Ph·斯特恩的复制品,见《远古迄今艺术通史中的印度艺术》,路易斯·雷欧编辑,第4卷,第2本,第133页图93。

⑥9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51页。

⑦0 R. 勒·梅:《比玛兰圣骨箱》,载《伯灵顿杂志》,第82卷,1943年5月,第120页。

⑦1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第37页,又见《佛像之印度起源》,载《美国东方学会学刊》,第46卷,1926年,第165-170页。

⑦2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第33页。

⑦3 H. H. 威尔森:《亚洲文物》,伦敦,1841年,第322页。

⑦4 例如,V. A. 史密斯:《钱币学札记和创新 II:古代和中古印度》,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66卷,第1部分,1879年,第298-309页,特别是第300页;M. 楼恩沃斯:《对R. B. 怀特海德关于拉合尔旁遮普博物馆钱币目录的评论》,第1卷:《印度-希腊钱币》,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14年,第791-795页,特别是第793页。

⑦5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第16页和图16。又见《关于印度钱币和符号的诠释》,载《东亚杂志》,新编序,第4卷,柏林,1927-1928年,第175-188页。

⑦6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399-408页。

⑦ A. 格伦威德尔:《印度的佛教艺术》,柏格斯所译之英文版,伦敦,1901年,第164页。A. 福色尔:《佛像的希腊源头》,载《吉美博物馆年鉴》,第38卷,第231-272页,特别是第58页;英语版载于《佛教艺术的起源》,第128页。又见,L. 巴赫霍夫的《贵霜雕像》,Panthana,1931年,慕尼黑,第355-359页和第502-506页,特别是第359页。

⑧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404-405页。

⑨ 塔恩,《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407页。

⑩ 见本书第3章。

⑪ L. 巴赫霍夫:《关于印度的希腊人和塞种人》,载《美国的东方学会学刊》,第61卷,1941年。范·罗伍兹恩-德·莱伍:《“斯基泰”时期》,第223-250页,特别是229-230页。我们有机会观察在巴黎的纪念章陈列馆中的钱币,以检查库马拉斯瓦米和巴赫霍夫的这一观点,它似乎绝对正确。怀特海德持同样的观点,《关于印度-希腊的诠释》,载《钱币编年》,第5系列,第20卷,1940年,第89-122页,特别是第114-115页。

⑫ 塔恩论证说如果在莫俄斯钱币上的这个人物是个坐着的国王的话,那么他该在钱币的正面,在他看来这是国王在钱币上应在的位置。见《巴克特里亚及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第402页。

⑬ 进一步见第3章。

⑭ J. 赫金:《对贝格拉姆的考古研究》,载《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论文集》,第9卷,巴黎,1939年,图205。

⑮ J. 达尔曼:《通过印度古代知识看托马斯-传奇和基督教对远东的古代历史关系》,载《Freiburg》I,布莱斯高(Breisgau),1912年,第105页。

⑯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第54页。

⑰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442页。

⑱ 见本书第3章。

⑲ J·马歇尔:《咀叉始罗的发掘》,《乔利安卒塔婆和寺院》,载《印度考古调查论文集》,第7,加尔各答,1921年,图版5(a)和图版12(c)。

⑳ 即《关于犍陀罗雕刻的年代》。该文重印于他的《印度早期雕刻》,慕尼黑,1929年,第74-88页。正文略有变动,但是,文章的观点没变。

㉑ 见他的文章《论印度的希腊人和塞种人》,载《美国东方学会学刊》,第61卷,1941年,第223-250页,特别是228-229页,巴赫霍夫现在把此日期改到“公元第一世纪的最初的几十年”,其理由是这些钱币是阿泽斯二世的。

㉒ L. 巴赫霍夫:《犍陀罗雕刻的年代》,第26页。他把这组雕像的年代定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见他的《早期印度雕刻》,第2卷,图145和146;但是现在他又把它们定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见他的《论印度的希腊人和塞种人》,载《美国东方学会学刊》,第61

卷,1941年,第223页以后。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这一事实:他现在把随比玛兰圣骨箱一起出土的钱币归为阿泽斯二世而不是阿泽斯一世。结果,整个编年都向后推了一些。

⑳ L. 巴赫霍夫:《犍陀罗雕刻的年代》,第18-20页。约翰·马歇尔把这些寺院归为公元4和5世纪,见《吠叉始罗指南》,第3版,第125页和第130页。

㉑ L. 巴赫霍夫:《早期的印度雕刻》,第93页。

㉒ L. 巴赫霍夫:《犍陀罗雕刻的年代》,第14页。

㉓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135-137页。

㉔ F.W. 托马斯:《对印度铭文汇编的评论》,第2卷,《神学通告》,第193册,1931年,第1-15页,特别是第5页。

㉕ 见本书第1章前半部分。

㉖ 例如,F. 瓦尔特史密德:《印度佛教建筑发展史》,载《东亚学刊》,新系列,第6卷,柏林,1930年,第265-277页,由于“成年男子类型”和“青年男子型”,或者又称为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他想对这两种类型加以区别,见268页。瓦尔特史密德的这种分类是从格伦威德尔《印度佛教艺术》(第126-127页)抄来的。这种理想型的雕像要更古老,因为它和希腊艺术更相似,这种情况是建立在如下的错误前提上的:即越是希腊的就越古老。由这两位学者所划分的这些雕像中的大多数是为这种类型,我们看来它们属于繁荣期(不过是基于其他原因);而那些他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类型且认为其年代较晚的雕像,我们则认为是较早期的样品。

㉗ 见J·J·巴特霍克斯的《哈达的发掘》,《雕像和小雕像》,载《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论文集》,第3卷,巴黎,1930年,图版79(d)。

㉘ A·范·勒克科:《中亚佛教的晚期》,第1卷,《雕刻》,柏林,1922年,图版23(c)。

㉙ 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图126,第247页。

㉚ 例如,可参见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图131,第253页。

㉛ J·马歇尔:《吠叉始罗指南》,图版15;L·巴赫霍夫的《早期印度雕刻》,图版140。

㉜ 布赫特哈尔的观点是,佛陀像首先流行,叙述性的浮雕随后紧接着出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叙述性浮雕自从古代起在印度就十分流行,所以这样的浮雕在很早的时候无疑就为犍陀罗所知。假如布赫特哈尔是对的,那么这种在最古老的浮雕中曾遇到的佛像类型,也应该有许多此类单个的佛像。H·布赫哈尔:《犍陀罗雕刻的西方特点》,伦敦,1945年。

㉝ 偶尔,头发被表现为凸纹状,有些横向的小槽,这可能是最初的把头发表现为波浪型的努力。例如图3中的西克里卒塔婆上的因陀罗拜访佛陀。

㉞ H·布赫塔尔:《犍陀罗的西方特点》,载《英国研究院记录汇编》,第31卷,1945年,第17-18页。

⑩ 其他的属于这一阶段或者下一发展阶段的雕刻有：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259页图136中的，现藏于拉合尔博物馆；第279页图141中的，现藏于拉合尔博物馆（此两尊雕像的头均已失去。）；第299页图151中的，第307页图155中的，及第309页图156中的，所有这些都在于兹·麦斯的赫特·马尔丹；第587页图289中的，藏于拉合尔博物馆；第557页图276中的，为私人收藏；《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97页图447中的，藏于大英博物馆。

⑪ A·福色尔：《（犍陀罗）西克里卒塔婆上的浅浮雕》，载《亚洲学刊》，10(e)系列，第2卷，1903年，第185-330页。

⑫ 福色尔说：“……初步看来，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从 magadhiens 的古代题材向犍陀罗的简单过渡。”见《（犍陀罗）西克里卒塔婆上的浅浮雕》，载《亚洲学刊》，10(e)系列，第2卷，1903年，第325页。

⑬ 见本章前半部分。

⑭ A·福色尔：《（犍陀罗）西克里卒塔婆上的浅浮雕》，载《亚洲学刊》，10(e)，第2卷，1903年，第329页。他所持的佛陀像仅比侍僧大一点，说明是年代较晚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秣菟罗艺术的最早的时期里，大多数情况下佛陀也被表现得比其周围的人物要高大。

⑮ H·布林塔尔：《犍陀罗雕刻的西方特点》，伦敦，1945年，第19页。

⑯ 见本书第3章。

⑰ S·科诺：《在贝格拉姆浅浮雕上的迦罗西蒂铭文》，载《印度铭文》，第22卷，1933年，第1部分，第11-14页，特别是第12页。

⑱ 该雕像在E·瓦尔特史密德的《印度佛教建筑史》中也可见到，载《东亚杂志》，新系列，第6卷，1930年，图版34(a)，和J·伯格斯特德《印度佛教艺术》，伦敦，1901年，图117。

⑲ 民族文化博物馆第I.C.5996，见L·亚当的《佛陀雕像》，图版1；又见J·伯格斯的《印度的佛教艺术》，图122。

⑳ 《古代印度和亲希腊佛教雕刻》，纽约，未标明日期，第24页和第41页；L·亚当的《佛陀雕像》，图版5；A·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465页，图234；A.K.库马拉斯瓦米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90；W·考恩的《东方艺术中的佛陀》，莱比锡，1925年，第5页。库马拉斯瓦米在一篇题为《对佛教雕刻的诠释》的第3部分《犍陀罗的三个浅浮雕》（载《亚洲艺术评论》，第5卷，1928年，第250-252页，图版59，图6）中说，我们在一件浮雕上看到佛陀，他横渡过 Nairanjana。佛陀已脱下外面的袈裟，正站在水中，穿着内衣和内衫。

㉑ 柏林，民族文化博物馆第I.C.32461，见L·亚当《佛陀雕像》，图版2。

⑫ 见本章后半部分。

⑬ 见 A. 范·勒柯克的《中亚佛教的晚期时代》，第 1 卷《雕刻》，图版 5；又见 E. 瓦尔德史密德《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图版 4。

⑭ L. 巴赫霍夫：《犍陀罗雕刻的年代》，图版 10；及《早期印度雕刻》，图版 145，图 2。

⑮ 我们愿提请读者注意诺兰德所得出的几乎完全一样的日期，他是从另一些证据获得的。见本章开头。

⑯ A. 福色尔：《J. 马歇尔，咀叉始罗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论文集》，第 7，第 38 页；B. 诺兰德《犍陀罗及晚期古代艺术：佛像》，载《美国考古学刊增刊》，第 506 页，1942 年，第 229 - 230 页。他说：“有迹象表明在印度和阿富汗石雕总是为拉灰泥雕刻所替代，其时间大概不会迟于公元 4 世纪中期。我们不妨尝试性地把公元 350 年作为一个所有在此后在石头上的雕刻的界标。”在此，作者显然自相矛盾，可能他的意思是把公元 350 年作为此前在石头上雕刻的界标。

⑰ 又见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图版 154，图 1。

⑱ 例如，L. 巴赫霍夫的《早期印度雕刻》，图版 154，图 2。特别是右上臂及右小臂下的褶子。还可见 J. 马歇尔的《咀叉始罗指南》，载《印度考古论文集》，第 7，图版 18(a)。

⑲ 又见 L. 巴赫霍夫的《早期印度雕刻》，图版 154，图 1。

⑳ J. 马歇尔：《咀叉始罗指南》第 3 版，图版 22。

㉑ 见前注图版中的右边的人物，以及约翰·马歇尔的《咀叉始罗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论文集》，第 7，图版 19(a, b)。

㉒ 约翰·马歇尔：《咀叉始罗指南》，第 3 版，图版 22，中间的人物。

㉓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图版 161，人物 1 和 2。

㉔ 同上书，图版 158，人物 3 和 4，以及约翰·马歇尔的《咀叉始罗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论文集》，第 7，图版 2(a)。

㉕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的雕刻》，图版 157，人物 157，人物 1。

㉖ 同上书，图版 156，人物 1。

㉗ 约翰·马歇尔：《咀叉始罗指南》，第 3 版，第 125 页。

㉘ 约翰·马歇尔：《咀叉始罗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论文集》，第 7，第 13 页。

㉙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第 412 页，图 408。

㉚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第 433 页，图 220，以及一件佛雕，见《古代印度和希腊雕刻》，第 28 页，Field 博物馆藏品。

㉛ F. D. K. 波什，Eene Onderscheiding van stande en zittende Buddha - figuren op de Reliefs van de Borobudur en elders, 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 - , Land - en Volkenkunde uit-

gegeven door het Koninklijk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第 57 卷, Batavia, 1916 年, 第 97 - 116 页, 特别是第 108 页。

⑩ J. 伯格:《印度的佛教艺术》, 第 172 页以后。

⑪ M.A. 斯特恩:《萨里 - 巴罗尔的发掘》, 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 1911 - 1912 年, 图版 36, 人物 2。

⑫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 第 2 卷, 第 497 页, 图 481, 及第 1 卷, 第 469, 471 和 499 页的图 237, 238 和 249; E. 瓦尔德史密德的《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 图版 57 - 58 和图版 25(a); H. 哈格里夫斯的《探险和边疆地区》, 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 1921 - 1922 年, 第 57 - 58 页, 及图版 25(b)。

⑬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 第 2 卷, 第 319 页, 图 456; A.K.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史》, 图 91;《佛像之起源》, 图 54; J.J. 巴特霍克斯:《哈达的发掘》,《辛塔婆和遗址》, 载《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论文集》, 第 4 卷, 巴黎, 1933 年, 第 105 页和第 147 页, 图 91 和图 123。

⑭ 见本书第 3 章。

⑮ 并不是所有呈法轮手印, 例如, 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第 1 卷, 第 197 页, 图 79 和第 2 卷第 205 页、207 页、331 页和 501 页的图 405、406、459 和 482 中佛像的头发都呈波浪型; 而图 22, 及《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87 页图 346 中佛像和《佛像起源》中的佛像的双脚都被覆盖着。

⑯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 第 2 卷, 第 209、503 和 578 页的图 407、483 和 578; W. 考恩:《东方艺术中的佛陀》, 莱比锡, 1925 年, 第 7 页。

⑰ 拉合尔博物馆第 1227, 见 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扉页; 另一个例子是《佛像之起源》中的图 54, 或者 W. 考恩的《东方艺术中的佛陀》之第 5 页。

⑱ 例如, 可见莱顿人种学博物馆中的一个头像, 系列 2334, 第 2。在哈达, 可见, J.J. 巴特霍克斯的《阿富汗安特莱恩提斯 (Antlantia) 的希腊佛教艺术》, 第 2 卷, 苏黎世, 1930 年, 第 182 - 191 页, 特别是第 190 页的图。

⑲ 在巴米扬的画中, 和尚的长袍多次呈现出各种颜色, 这表明他们是和另一种颜色一起使用的, 见 A. 范勒柯克:《中亚佛教晚期》, 载《新绘画作品》, 第 2 卷, 柏林 1928 年, 图版 3 和第 3 卷, 柏林, 1933 年, 图版 3。

⑳ 该佛像也可以见于 N.G. 瓦尔德史密特的著作, 及《印度博物馆中的雕像指南》, 第 2 部分, 载《犍陀罗希腊佛教 (艺术) 流派》, 德里, 1937 年, 图版 (a)。

㉑ 该佛像可见 E. 瓦尔德史密德的《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 图版 14, 它的一个肩膀罩着, 给人的印象是它的年代要比右肩裸露的其他雕像的年代要早; 又见于 A. 范勒柯克的《中亚佛教的晚期》第 1 卷,《雕刻》, 图版 7。

⑬ A. 福色尔:《犍陀罗的佛教艺术》,第1卷,第257页,图134;第2卷,第87页,图346;第2卷,第285页,图443;第2卷,第507页,图484;第2卷,第511页,图485。

⑭ D. B. 斯堡纳:《塔克提-伊-巴喜的发掘》,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7-1908年,第132-148页,图版47(d)。

⑮ A. 福色尔:《佛陀舍卫城中的“伟大奇迹”》,载《亚洲学刊》,系列10,第13卷,1909年,第1-78页。

⑯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图76,第192页;第2卷,第207、507和511页的图406、484和485。

⑰ 例如,一件出自那烂陀的浮雕,现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见 W. 考恩德《东方艺术中的佛陀》,莱比锡,1925年,第65页。又见 S. 卡姆力什的《婆罗王朝(Pala)和摩那王朝(Sena)雕刻》,载《Rupam》,第40,1929年10月,第107-126页,图16。

⑱ 该雕像在盖兹·麦斯的霍提·马尔丹,照片见科恩收藏品的犍陀罗代表作。

⑲ 这个石雕纪念像柱现藏于拉克诺博物馆,旧编号可能是第B73;现在的编号是第H24。照片见科恩研究所收藏的秣菟罗代表作选。

⑳ 例如,一件出自鹿野苑的雕像。照片见科恩研究所的鹿野苑代表作。

㉑ 例如,一件藏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浮雕,出自鹿野苑,第4序列;目录册第7页。照片见科恩研究所藏品鹿野苑的代表作,第73。

㉒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507页。

㉓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06页。

㉔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440页。

㉕ 详见本书第3章。

㉖ 见《古代印度和希腊-佛教雕刻》第41页。

㉗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05-209页的图405-407。

㉘ A. 福色尔:《舍卫城的伟大奇迹》,载《佛教艺术的发端和印度及中亚考古的其他论文》,巴黎-伦敦,1917年,第147-184页,特别是图版25。(这些雕像又见于《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92页图76和第2卷第211页图408。)

㉙ 见 A. K. 库马拉斯瓦米:《早期印度肖像学》第一部分《因陀罗,对“因陀罗摆放的特别参考”》,载《东方艺术》,第1卷,费城,1928年,第33-41页。

㉚ 这些照片见科恩研究所收藏品的犍陀罗代表作,第265号,第267号,第268号,第273号,第274号,第277号,第278号。

㉛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15页的第411-412图。

㉜ 沃格尔推测在巴格(Bagh)石窟中遇到的这一对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即慈悲菩萨)和弥勒佛可能是从犍陀罗的佛陀、梵天和因陀罗的三人组合演变而来的。因为我

们已经看到这两个侍者是菩萨的事实,所以这种推测似乎是不可能的。J. Ph. 沃格尔夫的《雕刻和绘画》,《瓜利奥尔(Gwalior)邦的巴格洞窟的肖像学描述》,伦敦,1927年,第36页。

⑫ N. J. 科罗姆:《巴拉布杜尔(Barabudur)的考古描述》,第2卷,海牙,1927年,第85-91页。

⑬ F. D. K. 布什: *Het Awatansakasutra, de Gandawyuka en Barabudur*, 载 *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uitgegeven door het Koninklijk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Batavia*, 第61卷,1922年,第268-303页,特别是98页以后。

⑭ 见本章注第167。

⑮ *Majjhima Nikaya*, 1, 252。载《*Digha Nikaya*》, III, 204-205 Inda (= Indra), Varana 等被叫做帝释天。

⑯ *Sumangalavilasini*, 1, 第264页。

⑰ *Digha Nikaya*, I, 95。

⑱ 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及E·森纳特的《犍陀罗雕刻的金刚》,载《第14次东方学阿尔古尔国际会议会刊(1905年)》,巴黎1906年,第121-131页。

⑲ S·科诺:《金刚-因陀罗的诠释》,载《东方资料实录》,第8卷,1930年,第311-317页。

⑳ 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48-64页。

㉑ 这些照片见科恩研究所收藏品的犍陀罗代表作,第266,271,273和276。

㉒ 这些照片见科恩研究所收藏品的犍陀罗代表作,第267,273和274(关于此点我们至少见到这三件样品。)

㉓ 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192页,图76;第2卷,第205、211、327和331页的图405,408,458和459。

㉔ 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1卷,第197页,图79。

㉕ A·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09页,图407。

㉖ J·斯特兹格斯基:《伊朗的拉灰泥雕塑》,《论坛》,第10卷,维也纳,1931年,第9册,第47-56页。

㉗ L·巴赫霍夫:《哈达的雕塑》,载《东方杂志》新系列,第7卷,1931年,第106-111页,特别是第111页。他在《古希腊的或者晚期犍陀罗的?》一文中也论述了此问题,见《印度-伊朗研究》,莱比锡,1931年,第39-41页。

㉘ J·赫金:《法国探险队在阿富汗哈达的挖掘》,载《亚洲艺术评论》,第5卷,1928年,第66-76页。

⑩ 最后见他对布赫特哈尔的《犍陀罗雕刻的西方诸方面》，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刊》，1946年，第116-122页，特别是第119页。

⑪ 见J. 马歇尔：《义始罗指南》，第3卷，图版23。

⑫ 见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图版154，图2。

⑬ E. 瓦尔德史密德：《犍陀罗流派的拉灰泥雕刻》，载《柏林博物馆：普鲁士艺术收藏品的报告》，第53卷，第1册，柏林，1932年，第2-9页，特别是第7页和第8页。

⑭ H. H. 韦尔森：《亚洲考古》，伦敦，1841年，第119页。

⑮ J. J. 巴特霍克斯：《哈达的发掘：人物雕像和小雕像》，载《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论文集》，第3卷，巴黎，1930年，图版15和28 a，请对比图版25。

⑯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768页。

⑰ 佛陀像是如何强烈地使我们想起我们从犍陀罗和阿富汗知道了什么，这从出自乔特什(Chotsch)的，年代为公元9-10世纪的小雕像上就的确可以看出来；该件小雕像E. 瓦尔德史密德的《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图版65和AT. 范·勒柯克的《中亚佛教晚期》，第1卷，《雕刻》，图版38。

第三章 秣菟罗贵霜艺术中的佛陀和耆那教圣人像

秣菟罗(Mathura),现在叫穆特拉(Muttra),因该镇在 Krsna 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成为 Visnuism 的一个中心,它甚至在古代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主要是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不仅是由于它坐落在重要的河流—朱木拿(Jumna)河之滨,而且还在于它形成了由恒河(Ganges)和朱木拿河所构成的地理环境的中心。还有,它还地处从印度西北部到恒河和西海岸平原的商业通道上。早在雅利安人(Aryans)侵入印度后的最初时代里,其时他们尚没有推进到恒河三角洲,而秣菟罗可能已成为一个相当重要之地了。因为它极利于贸易,肯定在不久后即成为一个繁荣之地。不论何处由贸易获利,人们都能用于艺术的奢华。这不仅为秣菟罗所证明,而且也为诸如维蒂萨(Vidisa)镇[现在的比尔萨(Bhilsa)]所证明,这些商业城镇除了是君主敛钱之地外,还是艺术中心。此地也是从恒河盆地通向西海岸商道上诸商路的枢纽,是一个富商云集,奢华之城。

除了是商业中心之外,正如麦喀斯泰恩斯(Megasthenes)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秣菟罗一度是苏罗婆国(Surasena)的所在地;而且据《大疏》(Mahabhasya)^①所记,也是般闍罗人(Pancalas)^②之所在,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望此地区有出自印度艺术很早时期的艺术品。所以,当我们一看到由耐磨材料制成的第一批雕像从史前时代灰暗的迷雾中出现时,其中一些出自秣菟罗的环境,或者就出自

当地时,一点也不吃惊。这些源自秣菟罗的最古老的印度艺术品是药叉,它们是在帕克哈姆(Parkham)村和巴罗达(Baroda)^③村出土,这两个村子邻近秣菟罗。但是,在此不仅发现有巽迦(Sunga)时代的艺术,而且还发现有稍晚时候的艺术。该城是保持着贸易持续繁荣之中心,也是艺术繁荣中心。它的声名不仅传遍全印度,而且也越过国界,从艾里纳斯(Arrianus)和麦喀斯泰恩斯的有关讨论中,我们也知其名声远播西方。普陶莱米(Ptolemy)^④提及该城是印度西北部的大中心之一:秣菟罗,即“神之”^⑤。此语到底确切意指什么还不那么确定。“秣菟罗,诸神之城”只是最简单的翻译。塔恩认为它意思是“秣菟罗,诸神的女儿”^⑥,其中“女儿”使人联想起其希腊语义中的城市女神之意。难道我们仅仅从中看到它表明此地是一个大的宗教中心的事实?或者如塔恩意见,其后面还有深意?假若如此的话,即使仅仅第一种情况是真的,那么它也确证了我们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情况。

正如在印度其他地方表明的那样,我们在秣菟罗发现的最古老的雕像表明一种药叉崇拜仪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宗教,如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还不为很多人所信奉。不过在最早的时代,这些宗教尚未把雕像用于崇拜,所以我们要确定它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耆那教存在的第一件证据是在女阿莫西尼上的铭文 *āyāgapata*(见图 29)。这些 *āyāgapata* 是由石头制成的浮雕匾,一座卒塔婆上装饰的全部都是。温森特·史密斯在靠近秣菟罗的坎卡里-提拉(Kankali Tila)又发现了许多,同时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耆那教文物^⑦。其中有几个 *āyāgapata* 带有一则信徒铭文,上面提及供养人的名字。

不过,这则由阿莫西尼题写的 *āyāgapata* 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惟一有年代的 *āyāgapata*。它有一位女性人物,由一些仆人陪伴着。在巴赫霍夫(Bachhofer)^⑧看来,她代表女神 *Aryavañī*。我们第一印象是在该铭文末尾,*āryavañī* 被两次提到,并不是不为

人深知的女神 Aryavati，而是指厚石板本身。因为当使用动词 *pratisthāpayati* 时，宾语是某个神像或者佛陀像，总要加上词 *pratimā*。因此我们想要作出的解释是 *āryavati* 是 *ārya(ga)vati* 的较短的形式^⑩，因为较短的音节可以省略，*aryavati* 可能是一个表示卒塔婆周围贴起来的厚石板的词，和词 *ayāgapata* 类似。这种假设现在似乎已经得到确认，因为我们在班纳吉刊发的一则关于一个 *ayāgapata* 的铭文，其中现在所讨论的厚板被称作 *ayapato*^⑪。因此，*aryavati* = *aypata* = *āyagapata*。结果在阿莫西尼厚板上浮雕中的女性人物并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女神 Aryavati。在旧纪元 72 年^⑫（即公元前 57 年）索达萨总督统治时期，该阿莫西尼的 *āryavati* 被奉献出来。所以，证明一个耆那卒塔婆存在于公元前 1 世纪中期之前（从装饰得非常漂亮的残片来判断^⑬）。

顺便提一句，在此可注意到由斯密斯发现的其他 *ayāgapatas* 大多数呈现出装饰性图案，由几个神圣的象征符号所组成，它们经常绘在匾的边沿上（见卷首插图），而样品呈现的卒塔婆都带有或者不带拱门和扶栏^⑭。

虽然玄奘说在他那时阿育王（Asoka）的三个卒塔婆仍在秣菟罗，我们并未有如此古老的佛教艺术文物^⑮，但是，我们从一则铭文中的确得知秣菟罗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就有佛教徒。例如，在狮柱上的沉积物就表明有一片佛陀的舍利和建立的卒塔婆，以及一个为了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s）^⑯ 教派利益的寮（*saṅghārāma*）。狮柱年代在旧纪元 60 年，即公元前 69 年左右。所以，早在公元前 69 年，秣菟罗就已经有佛教徒。可能最古老的佛教艺术品之一是一个 *vedika* 的残片，现在藏于加尔各答博物馆，遗憾的是其出处仍不清楚，不过它可能出自秣菟罗，因为有一则用闪米特族后裔的字母表书写的佛教铭文，提及贵霜^⑰。从古字体学上讲，它和耆那教的 *āyāgapata* 一样，象征性符号也和我们在其上发现的一样，因此，该残片可能是公元前 1 世纪下半叶的。不过我们有这样的印象：

在秣菟罗,和佛教徒比较起来耆那教徒更有社会影响。也许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迄今为止,特别是从贵霜和后贵霜起,更多的出自耆那教堂的艺术品和铭文得以为我们保存下来了^⑩。在这点上,注意这样的事实也许很有意思:中国版的 *Kalpanāmanditika* 说,迦腻色迦从恒河盆地回到印度西北部,就是说这位伟大的皇帝穿过宽广平坦的乡村,在那里他看到一个漂亮的耆那教塔院,他对此深表敬意,因为他把它当作了佛教的卒塔婆。科诺推测此塔院可能和在坎卡里-提拉^⑪遗址发现的那个一样。

所以,秣菟罗甚至那时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耆那教中心。并且从其较晚期的许多耆那教雕像看,它已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与此相比,出自韦苏提婆统治期及此后半个世纪内的耆那雕像的数量,要比佛陀像大得多。当然,此期耆那雕像比佛陀像多可能是个反常现象,但是此现象太显著而无法忽视。在迦腻色迦王统治期内,出自秣菟罗流派的佛教文物数量增多,从该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说法正确性的证据,而迦腻色迦极大地保护了佛教。实际上,在其统治之始,我们碰到第一件标明年代的出自秣菟罗的佛陀像,即在侨赏弥城(Kausambi)出土的那一个^⑫。该雕像和出自鹿野苑^⑬的一样,从其风格及石头种类来看,显然是出自秣菟罗的一个作坊。在过去的世纪里,秣菟罗获得巨大声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鹿野苑的佛陀是由和尚巴拉(Bala)于迦腻色迦 3 年奉献的,侨赏弥城的佛陀是由蜜多罗(Buddhamitra)尼姑于迦腻色迦 2 年奉献的(即分别为公元 81 和 80 年)。还有一些佛陀像,以风格上判断要比这些古老。例如在鹿野苑^⑭的另一个站佛,其衣褶罩过胸脯,显得十分臃肿。

卡特拉(Katra)出土的坐佛(见图 31)和巴拉和尚的站佛比较,从风格和古字体学来看,学者们认为前者和后者大致同期^⑮。出自此期的秣菟罗站佛和坐佛有一定的风格相对应(见图 30 和 31),这我们稍后将进一步讨论,并且它们通常要偏离一点此风格。而

现在卡特拉的佛陀不带年代的事实则是例外,可能说明它是在迦腻色迦登基前制作的,因为,正如我们稍后要进一步看到的,在他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当题有长篇铭文的座垫边缘上没有地方时,通常省去年代。此处则不是这种情况,因为柱基较下面的部分是空的。卡特拉的佛陀使我们注意到这种事实,在迦腻色迦以前秣菟罗已经制作佛陀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注意到下列情况:首先,很显然佛教和耆那教在艺术表现上有多少是一起进行的。这是如此真实,以致在早期艺术中,人们常常不知道所面对的是何种宗教艺术,除非通过铭文公开注明。在此点上一个有趣的例样是由 Kalpanamanditika^②提及的迦腻色迦的错误。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象征符号类似性,但是建筑却是完全一致的。两者建的卒塔婆都是由带拱门的护拦环绕,而且都以同样方式装饰其建筑物。结果,āyāgapatās 从佛教卒塔婆中也可以了解到,即是从 Kistnā 上的阿玛拉瓦提的卒塔婆中了解到的。

但是,即使在此以后,当偶像进入宗教崇拜时,随着耆那和佛陀的一些特点的失去,仍然很难把他们区别开来。所以,我们见到这两种宗教在艺术表现上关系密切^③。其原因在于早期印度艺术并没分宗派。我们在巴迦(Bhaja)^④佛寺里偶像的印度教印象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并且,总的说来,在环绕着巴尔胡特和秣菟罗卒塔婆石头扶栏上,Yaksinis 的表现并没有显示出佛教的痕迹^⑤。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马歇爵士在谈及山奇雕刻时说(在我们看来和所有早期印度艺术雕刻契合得很好):

“像犍陀罗艺术一样,玛尔瓦(Mālwa)的艺术不是教会的艺术,它是在韦蒂萨(Vidisā)和尤迦伊尼(Ujjayinī)富有公民的庇护下发展和持续下来的,而那些富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佛教信徒,它只是用于世俗目的。人们印象中它时常被用于佛教寺院,在这种场合里,它尽可能被装扮起来,穿上佛教徒的服装,饰以信徒们熟悉的神圣的印记和象征,诸如法轮(dharmachakra)、三宝(triratna)和

胸臆(srivatsa)^②,但是其实质的世俗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当我们在这些浮雕中碰到色情的场景时一定要吃惊,当我们见到那些女人们刻意裸露玉体而不是用透明的长袍罩着身体时也不要大惊小怪。这种场景和人物臭名昭著,和释迦的每一条信仰相对立,可能此期佛教教派中有极少数的观点鲁莽或者极不严肃,允许这种世俗艺术进入其寺院。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如果允许它进入寺院,就得像发现它那样接受它;它不可能摆脱其世俗性或者随意删除以适合修道院的虔诚。不论做何妥协,肯定是缘于寺院本身而不是艺术^③。”

或者像库玛拉斯瓦米所说:“作为艺术,山奇艺术并非由佛教创作或提供灵感的,而是早期印度艺术为适应于教诲的目的,因而保留了其内在的东西^④。”

布赫勒谈及佛教艺术和耆那时特地说道:

“……耆那古代艺术在材料上并没有什么和佛教艺术不同处。两派用同样的装饰,有同样的艺术动机及同样神圣的象征,所不同之处仅在细节。这种一致的原因完全不在于一种教派的信徒摹仿另一教派的,而是由于双方都毗邻印度民族艺术,雇用同样的艺术家^⑤。”

所以我们看到早期印度艺术并未按宗教划分,因此在那些很早的艺术流派中谈论耆那教艺术或佛教艺术是不可能的。最多每种宗教有一定偏爱表现或者刻意不表现的主题。但是,就艺术本身而言,各种宗教的雕刻家均有着同样的源头。

至此,诚如前面所说,我们知道在公元前 57 年存在一个繁荣的耆那社会。最早的耆那像也大约源于同期。几个 āyāgapatas 呈一个环形,中间一个小耆那人物坐着(见卷首画及图 28)。这些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及的 āyāgapatas,它们无论如何和阿莫西尼的 āyāgapatas 同期,从古字体学上判断甚至可能稍早一些。

罗福(Laufer)强调这一事实:佛教可能强烈地受耆那教的影

响³⁰，因着那社会的影响大，这是很可能的。但是即使不是如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见，事实上这两种艺术表现仍是相当一致的。所以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除了耆那像以外，佛陀像也可能存在，这似乎并不是太偶然的。在山奇浮雕上，其年代最近的部分在公元前50年左右，上面并没有表现佛陀，所以对此论似乎没有反对意见。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须首先讨论另一点。像图30或者鹿野苑中的那些站式的雕像，它们有着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库玛拉斯瓦米³¹正确地解释了这种类型，认为它们是从中产生并在当时用于表现药叉和另外一些超自然物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们宁愿解释佛陀像是由“王”的类型衍生而来的，但实质上这和库玛拉斯瓦米的解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³²。）

首先，身体的姿态：前面，双腿微微分开；其次，手的姿势：他的右手呈施无畏印，举与肩平，左手紧握着放在臀部；最后，衣服：一件环形物紧束在腰部上，衣结的垂鬘罩在他的大腿处。该环形物把其内长袍束住，使得双腿间呈现出大量细褶。该内袍之外，是一件非常薄的上衣，横过胸部到达其左；而长袍的最下缘则由其左手举起，以致一个厚厚的细褶卷形成，并沿身体垂下罩至他放在臀部处的左手上；在其左肩上，衣服也形成大量的细褶。

当我们把图30中雕像的特点和诸如图38中的药叉及由沃格尔³³和库玛拉斯瓦米³⁴所复制的相比较时，我们就会看到其相似性是多么大，因此我们同意库玛拉斯瓦米所说的佛陀雕像类型是从药叉像类型衍生而来的。但是我们希望指出，这虽和站佛吻合，却只是部分适于坐佛。就我们所知，没有呈坐姿的药叉雕像。当呈坐姿时，佛陀被绘成呈沉思状的苦行者。在此处，自然之造化对雕塑艺术的影响要大于任何传统。呈这种姿势的人物在早期中印度流派中也有表现，例如，在巴尔胡特的护栏上³⁵，但是那儿总是着意表现苦行者(ascetics)、文人雅士(brahmins)、隐士(hermits)或者至

少是呈沉思状的凡人,从未表现药叉。

这些早期的苦行者人物,我们对其以臃肿之法表现交叉的双腿留下印象。我们向下看,它好像是双腿的顶。在最古老的佛陀雕像中,例如卡特拉的佛陀像,雕刻家对此问题完全掌握,在此,我们甚至没有感觉到处理它有任何困难。像卡特拉雕像,显然是以整个发展作为先导的。虽然我们从经验上断定在卡特拉雕像产生以前佛陀雕像已经在流行,但是这种情况似乎是很可能的;不过我们肯定不能排除苦行者坐像的发展线索是在佛教之外。如果是这样,只有耆那教仍有可能,我们已在该宗教中看到其雕像甚至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就已经使用。

让我们再更准确地看一下那些最古老的耆那像(见图28):他们呈禅宗手印坐着,所坐的似乎是个垫子,放在一个中间较宽的支撑物的基座上,整个看起来像是个祭坛;人物头顶是一把阳伞,两串花环垂下。在这些人物后面,一朵莲花盛开^⑧。人物的双腿几乎和巴尔胡特苦行者的表现一样。这些 āyagapatas 属于这样的时代:信耆那教的人们开始倾向于用旧的已习以为常的象征和耆那圣人同时加以表现。例如我们在一个雕像中看到,在两个耆那人物旁边,一个在中间,一个在圆环的下方,在圆环边上是一棵菩提树和一个高高的、细长的卒塔婆。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耆那圣人是和以往象征他的象征物一起加以表现的。

有一个小雕像非常像小型耆那像,它可能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佛像之一,它被置于一个拱门横梁的中间^⑨(见图35)。该作品仍然是处于用象征性语言和用人表现佛陀的过渡期,这从横梁的两个两端可以看出^⑩,在这个横梁上我们看到几个象征符号,例如,法轮、一个带莲花的甕及一座建筑^⑪,而在横梁背后的中间是菩提庙,庙里有菩提树,一大群信徒在对此礼拜。在此,横梁中央坐着的人物即为佛陀,其余的人分别为:因陀罗在右侧(从他头上高高的僧帽可知),他和一些仙女及大象在一起;左侧是轮王(Pan-

casikha)及六个天仙。佛陀相当胖,坐在洞中,表现得很具印象主义特点,佛陀穿着件薄薄的、蜘蛛网的长袍,长袍斜横过右胸,使得右肩裸露。透过长袍可见其肚脐。衣服的边垂在小鹿身上。看起来皱褶的衣片似乎是从双腿下面出来的。罩过其左肩的衣料的卷边清晰可见。他的右手呈施无畏举着,另一只手放在臀部,手掌向下。头顶有顶结。

我们看到,使卡特拉型具民族性特点的佛陀像俱已在此,但是在迦腻色迦统治期间这种小的人物像并未成为圣徒,例如他的左手尚未放在左膝上即是明证。

我们认为该雕像大约是和 *āyāgapatas* 为同一时代,该雕像和 *āyāgapatas* 还有其他一些相似处,这使我们的观点更进一步得以说明;作为信徒而站在画面两侧的男女人物披着方巾,宽宽地系在颈项上,以出色的皱褶垂下,似乎微微飘离身体。正是同样的方巾,我们在稍晚时代的卡特拉佛陀上方看到飞翔的天人穿着,不过,方巾下方并没有同样飘动的皱褶。在出自秣菟罗的门楣中心格上的人物也穿着同样的衣服^④。此处这种典型的方巾也是下端向外飘拂。该雕刻中仍有代替佛陀的象征物,当属于一个很早的时代。*āyāgapatas* 之一即呈现出人物以环形带围着中间的图案,人物方巾飘拂的方式丝毫不差^⑤。还可列举更多的相似点,例如,在横梁两端神话人物翅膀的形式及装饰和虎爪饰的相类似^⑥,从绕其颈项的花环装饰判断它肯定和 *ayāgapatas* 同属一期,这种装饰在正门的 *āyāgapatas* 中的 *nandipada* 的象征上也曾使用过,经常使用镶珍珠框,而狮子整体上类似于作为左右柱头 *āyāgapatas* 上的那些。不过,对此我们就点到为止。

这种横梁属于用象征表现佛陀到用人形表现佛陀的过渡期,因 *āyāgapatas* 也用象征表现者那人物。

保存于秣菟罗博物馆的一个石雕纪念像柱上的一幅浮雕,和这个在拱门柱上非常早的佛陀人物有联系^⑦(见图 27)。在科恩

(Kern)研究所公布的照片上,该浮雕被描绘为“一尊耆那坐像,其座垫由两个狮子支撑,崇拜者侍于两侧。”正确地说,它当是个佛陀像。首先,座是带狮子的。其次,还在于这种事实:该人物呈现为施无畏印,耆那从未这样做;另一方面,佛陀只是后来才有所有耆那人物呈现的禅宗手印。头上的顶结可见,这也是一则我们后面要进一步证明的论据^④。第三,该人物穿件长袍,长袍的缝线横过胸脯,而耆那人物总是完全裸露,通常胸臆象征物在胸部。信徒肯定是4个世者(*lokapala*),每人手中握着一个僧钵的托钵僧,所以说该场景一定被辨认为献4个僧钵的托钵僧^⑤。除了柱基或座垫上过时的形式外,它和在 *ayagapatas* (类似祭坛的物件)上的耆那座非常类似;这种浮雕的世者人物过于苗条,我们在拱门及门楣中心上也见过;从这些过于苗条的人物上可知该浮雕很早。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福色尔在坎卡里-提拉山上发现的一件浮雕(见插图 10)。根据他的意见,这是一件表现耆那教的作品,为我们展现出 *Vardhamana* 正在和一个王进行一场虔诚的谈话。我们不能清楚理解福色尔是基于什么根据来辨识此浮雕的。就我们能够检查的,其论证的根据仅仅是出土地点这一证据。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一证据本身并不能充分证明该雕刻中的人物是耆那教人物。不仅因为一件类似的小雕刻极易从毗邻的布特萨尔(*Bhūtesar*)佛教地运来,而且还由于在坎卡里-提拉已经发现大量佛教雕刻,同时也发现许多耆那教残雕^⑥。库玛拉斯瓦米总是认为在开始的时候,不仅佛头上有顶结,而且耆那也有,所以目前我们不愿把此提出作为证据^⑦。另一点是,画面右侧的人物穿着那个时代的衣服,而就我们所知 *vardhamana* 总是被表现为裸体。其胸部的胸象征物失去了。最后,有个问题,即从大雄生活中复制画面场景是否是早期耆那的习惯。这对佛教徒来说已习以为常,甚至在很早的时候,在山奇表现佛陀生活的很多画面中已出现。这种习惯后来仍在继续,直到用人形取代象征物来表现佛陀时。不



插图 10 出自坎卡里·提拉的浮雕(耆那卒塔婆及秣菟罗其他占物)

过,早期表现大雄生活不为我们所知。在坎卡里-提拉发现的不是装饰性而是表现小场景的浮雕最具佛教性^⑧,或者他们表现进行施舍的俗人,这种情况也不必是耆那教的。所以,如果现在讨论的这件雕刻是耆那教的,那么,我们认为那是极大的例外。不过,目前把这件雕刻看作是佛教的更好些。这样的话,该画面可认为是表现佛陀和净饭王(King Suddhodana)相会的场景。我们认为,特别是把该画面中右侧的人识别为佛陀应该无异议,因为出土地点并不能否定这一点,同时还可提出几点明确的论据。

正如我们所见,佛陀和净饭王两人都穿着相似的长袍,而该种长袍正证明我们关于佛陀像起源的观点^⑨:一件多提(dhoti),衣服的卷边固定在腰际,其下端以密密的皱褶垂下。这是和我们看到

从拱门上面坐佛盘起来的双腿下露出的衣褶相同,那是较晚时代坐佛所具有的,没有迹象表明有腰带。罩过他左肩的是一件薄薄的、折得密密的披巾,披巾罩着他的脊背和前身,以环形垂罩着他的左手腕。这是巴尔胡特和山奇较古老的浮雕中所有凡人所常穿的长袍。君主穿得极富装饰,戴一条大头巾,因而得以和佛陀区别开来。他把右手放在胸前,态度谦卑。他的仆人在他的身后,穿着类似的长袍,只是头上没戴帽子,其中一人手呈母状手印,另一个人撑着阳伞。所有的人都肥胖;肚脐是个深洞,刚好在长袍上沿上方。该雕刻一流的质量使之和后来的区别开来。在具有秣菟罗民族性的佛陀类型上,深肚脐总是显著的特点之一。不过,以后不复存在的肥胖的确是公元前诸世纪古老的药叉雕像的一个特点,例如帕克哈姆(Parkham)^⑤、帕瓦亚(Pawaya)^⑥和帕特纳(Patana)^⑦的雕像。因此,库玛拉斯瓦米关于佛陀类型是从药叉形象演变而来的观点再次得以证实。

除了该人物的肥胖之外,还有个特点,表明这样的事实:我们在此见到最古老的佛陀雕像之一,即披巾像翻边一样裹着其双肩,俗人也穿得一模一样。在后来的雕像中,我们总是看到这种质地极薄的衣服,罩在衬衣、佛陀及俗人的胸脯外面。这种最早的借助擦线来表现罩着全身的半透明衣服的尝试是从出自鹿野苑^⑧佛陀上见到的。最后,以前的这种柱头在浮雕两侧的形式可能也表明其年代颇早。在虎爪饰上的带格子的部分只是向上高高倾斜,而我们在后来的时代里注意到它正对着横梁而成圆形。

在这样说明把该浮雕上的佛陀作为最古老佛陀雕像之一后,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叙述一下该雕像。人群似乎是从门里出来迎接佛陀。佛陀右手呈施无畏印举着。他的头后面是一个相当大的光环,似乎很平滑;我们尚未见到后来典型的环形边。在头的正面,佛陀带有肉髻,此处清楚表明是一个圆圈。头的其他部分光滑,仆人的也一样,给人的印象是戴着顶小帽。巴赫霍夫^⑨同意沃

格尔⁵⁵的观点,认为在卡特拉佛陀类型的佛陀头是剃光的。福色尔认为雕刻家故意用此种方法表现头发,其解释为这种剃光头发是那些忠实于教规的佛教信徒所为,目的是为和佛陀外表保持一致⁵⁶。库玛拉斯瓦米首先提出那些头是剃光的观点⁵⁷,后来他收回此说⁵⁸。至于所讨论的浮雕中的仆人,则清楚可见不是有意做成光头的。因为沿着额头线,我们可见到小擦痕,可能意味着是头发。也有佛陀雕像和浮雕中的佛像,沿额头发迹线的发痕仍可见到⁵⁹。但是这些擦痕总是省掉,主要是考虑到人们知道光滑的小帽表示头发。也可能它是通过颜料表示的。通过擦痕表示类似发式的男女雕像都有⁶⁰,有许多例样中男女头均十分光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剃光了头发⁶¹。我们此说的一个十分具有说明性的例子是巴赫霍夫书中第 151 页图 2 中所复制的人像。满头头发,而头的形式确实像卡帕町(Kapardin)型的帽子形状。

这里我们触及到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瑟尼沙(Usnīsa)的起源。在讨论前两个浮雕时,我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描述不需结论。不过,这次我们必须而且能够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

“肉髻”这个词作为“头盖骨上隆起的部分”的一般意义,主要是基于后来佛教教义。但是有几位学者认为该词在第一个佛陀像出现前就已经具有这种意义⁶²,在所讨论的浮雕中,佛陀发式呈现为我们在几个药叉人物中所发现的那种发式的逼真的再现。药叉在不戴长头巾时也有类似的发式,不会引起大惊小怪,因为,像库玛拉斯瓦米一样,如果我们推测佛陀类型是从药叉型复制而来,我们会“特别”认为药叉或者其他神肯定有着和佛陀相同的发式。的确大多数佛陀戴着一条大头巾,但是,这可以由这样的事实解释:从源头上讲,此头巾在印度是典型的尊贵的标志,有时为一顶王冠所代替,只是这是很晚的事了。因为药叉像在我们看来其先前并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用以表现国王形象的。街市俗人想象的支配人类的那些天国统治者,在他们看来天国之人的形象很大程

度上类似于尘世间的统治者。所以,如果某个药叉王被绘制出来,不戴长方巾,就会留着当时印度君主的发式。不仅众王如此,就是苦行者也习惯把头发在头上盘成结。在浮雕像上,我们有表现最后一种人的作品,他们的顶结经常无法和肉髻区分开来^⑤。遗憾的是只有极少儿件王室人不带头巾的作品(梵天除外,因为他实质上是位苦行者),那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头饰总是用于户外的。实际上,这些极少数的浮雕均有顶结,有几种情况顶结是系在头上的,显然很类似于肉髻。摹仿现实中的君王,药叉形象及其他诸神都把头发系成了结^⑥。而下一阶段,这些神的形象又用作佛陀形象的范样。福色尔就犍陀罗佛陀肉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⑦。我们愿意补充说不仅佛陀,而且诸神也有此肉髻^⑧,所以我们认为在佛陀形象产生的第一个世纪,犍陀罗也好、秣菟罗也罢,无疑都倾向于在头顶复制此发结。有几个例子可举,人物的肉髻显然表示头发^⑨。只是到了相当晚的时候以后,人们才明白那是代表头盖骨隆起的^⑩。福色尔^⑪之后,库玛拉斯瓦米明白无误地证明肉髻这个词从其源头讲意思并不是“头盖骨的隆起”,而只是“方头巾”^⑫。威尔逊(Wilson)则认为这个词有两个意思^⑬。根据库玛拉斯瓦米的意见,肉髻相这个词在较早时候肯定要译为“相,其意指一个‘注定要戴方头巾’的人”^⑭;肉髻相(unhīsasīso)不是被译为“头上有个隆起处”^⑮,而是“有一个像头巾般的头”^⑯。词肉髻也被用作表明围绕卒塔婆及其圣物护拦的墙帽。特别在罩头时,它变成了“方头巾”。结果,荷兰词“装饰”(bedecking)像这个梵语词一样也能用来表示“头饰”,且正确地表达了其意义。

我们完全同意福色尔和库玛拉斯瓦米的观点,即肉髻就其词源来说意思并不是指“头盖骨的隆起”。库玛拉斯瓦米把该词译为“注定要戴方头巾”,或者把肉髻相译作“有一个像头巾般的头”,我们认为似乎牵强附会。在 Cukravartin 或摩诃沙富罗特点中,肉髻相被提及^⑰,我们更愿意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它:即其特点之一是

一条方头巾,所以词肉髻相的翻译该为“戴一条方头巾的头。”这是对我们已经提出多次的事实的惟一确证,即在古代印度,方头巾是高贵的原则性标志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看到药叉及其他超自然的人和带有相的王室人员都戴着方头巾。当佛陀像得以以人的形象表现时,雕刻家们遇到了困难,人们都知道佛陀已抛弃王位,成为一个行乞的修道士。因此,所有药叉形象的那些王族特点,诸如饰品和方头巾均不能复制。所以,佛陀形象是一位药叉,或者更是位君主,只是没有王位。手镯、项链和其他饰品全都省掉;头也没戴什么,只是有发式。这种情况在药叉或君王不戴方头巾时也是如此;就是说,佛陀被表现为带有一个头发顶结,所谓的劫婆吒。这是那时代的发式,它不但出现于当时表现一位君主或者一些其他没有方巾的几件浮雕的雕像中,而且,犍陀罗没戴头饰的菩萨形象也如此。这些人物就其外表可以追溯到当时君主的形象,他们头上仍有顶结。就是说其发卷似乎实质上是个方头巾^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缠绕住的话,那么一长束东西就能够很容易地折叠在头上。在萨塔维德斯(Satavids)时代所用的方头巾上的别针也有此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肉髻首先意指一个发结。当最后这些已知的系列相开始也被用于佛陀人物时,当然就不可能在“戴头巾”意义上解释肉髻相。虽然从语法上讲,此时人们可能已开始把相理解为库玛拉斯瓦米所认为的“注定戴一条方头巾”仍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肉髻这个词似乎更可能接受了没有戴方头巾的头上顶结的涵义,所谓没有戴方头巾的头是源于翻译“有个适合方头巾的头”。考虑到后面我们还要讨论此问题,我们先补充一点,即肉髻这个词作为佛陀头上的隆起部分的概念,直到秣菟罗雕刻家们开始在某些方面摹仿出自印度西北部佛陀雕像时才出现。

据根库玛拉斯瓦米,耆那像在其初期时也有肉髻。就其发式而言,耆那像不可能走过和佛陀像同样的发展道路。

至此,可见耆那像和佛陀像之间实质性的差别是,前者全裸,而后者穿着那个时代的长袍,这我们在药叉和俗人的像中已经看到。总是呈禅宗手的耆那座像实际上和药叉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耆那像边缘则大不一样,并非因其裸体,而是由其双臀的姿势,沿身体放得严格。佛陀像则相反,衣服和姿态和君主及诸神的一样:双腿微微分开,右手呈施无畏印,左拳放在臀部。在我们看来,施无畏印是王室姿态的发展,这在库玛拉斯瓦米于迦噶亚毗塔(Jagayyapeta)和阿玛拉瓦提(Amaravatī)所发掘的一些浮雕像上已经表明^⑦。我们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佛陀像和药叉像非常相似,更不用说耆那像。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则论据说明最初耆那也有肉髻,因为“在 Ayāgapatas 最古老的耆那像似乎没有肉髻”,贵霜时期耆那像也没有,而这些耆那则是通过我们所能追溯的铭文证实的。所以在相反的情况得以证实前,我们愿把它接受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在笈多王朝以前,肉髻也是佛陀区别于耆那的特点之一。如果此假定正确,那么图 27 及插图 10 中复制的那些人物的肉髻则成为额外的证据,证明他们是佛陀。

特别和最古老的耆那人物相似,佛陀肥胖的事实(穿着的长袍尚未悬罩胸部,在巴拉佛陀像上也见不到束着内衣的腰带),使人有理由推测插图 10 中的雕像是源于基督纪元开始之时,但是甚至可能早于此。我们还能够列举更多非常早的佛陀像,例如,表现因陀罗拜访佛陀的浮雕被刻在一个横梁上^⑧。上面的佛陀仍然是异乎寻常的,肢体相当光滑,整个设计和制作使我们强烈地想到山奇艺术中的某一个^⑨。不过我们就此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盖恩高利(Gangoly)曾调查在文献中佛陀从以象征物表现到以人的形象表现的变化有多大^⑩。我们认为,他正确地强调了较早期的象征无论如何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雕塑无能或者禁止肖像的结果,而是由于人们相信神圣的佛陀不能简单地用语言或形状来描述,相信在他身体腐朽后不论是神或者是人都不能

再见到他。作者用很具说服力的引述支持他的观点^⑧。他说明了这个过程是缓慢变化的,越来越倾向于以可视形象表现佛陀,最后把造像当作一项值得高度称赞的工作加以鼓励。盖恩高利从中引述的几个文本的年代大约可以确定。他最后的观点是:“有理由认为,这些认可并推荐造像的文本中最早的很可能写于基督纪元前一个世纪早期某个时候(大约公元前1年~公元前50年)。在公元前50年^⑨某时雕刻或绘制出第一个佛陀像实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该论述总体上引证出色,以基于使用塞琉西斯纪元的假设来推测犍陀罗艺术的时代结束(这种推测也可见于别处),有些遗憾。不过,可能文学资料的价值仍在,我们看到就最古老的佛陀像制作的时间上,它仍为我们的观点提供证据。

至此,根据几则关于秣菟罗最早的佛陀雕像时代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得确证一下我们在第二章中整理出的几个要点。这些要点是:

1. 实际上在莫俄斯钱币上并没有绘制佛陀像的事实;
2. 在西尔开普,该镇是在丘就却后毁灭的,在此并没有发现佛陀像的事实;
3. 比玛兰的圣骨箱可能要晚于迄今为止人们的普遍推测。
4. 印度西北部风格的佛陀像之一是在迦腻色迦圣骨箱上发现的事实。

当我们根据上面讨论的要旨来概述这些资料时,我们就得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秣菟罗的佛陀像至少要比犍陀罗佛陀像早半个世纪,如果不是一个世纪的话。我们认为这也证明了哈维尔(Havell)和库玛拉斯瓦米(尽管他们常常是直观的和感情用事的)所坚持的佛陀像源于印度本土,为满足印度需要而孕育出的观点。虽然人们总是把赞誉给予上面提到的两位持此说的学者,但是维克多·高洛柏(Victor Golobew)^⑩于1923首次提出此论,他理当受到

赞誉^⑧。

当库玛拉斯瓦米为他所坚持的秣菟罗首先创作佛陀像的观点辩护时,他特别提出当时非常突出巴克提 - 崇拜(Bhakti - cult)可能要求具体的佛陀形象,科诺完全同意此说^⑨。相当早的时候,高伯莱特·德阿尔维拉(Goblet D'Alviella)已经认为印度偶像崇拜源于西方的形象是无法令人接受的^⑩。科诺后来进行了同样的辩护^⑪,针对卡宁汉姆^⑫、斯密思^⑬和柏罗赫(Bloch)^⑭所说的偶像崇拜是从西方输入印度的说法,他指出大量神像属于一个无疑受西方影响的时期,对此我们同意,但这无论如何不能否定在犍陀罗也发现对佛陀富有特点的表现,并且这种表现一直在努力奋斗着;不过我绝对不认为这种印度西北部的形式是秣菟罗雕刻家的样板,福色尔也努力证明这一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为许多其他考古学家所接受,甚至连巴赫霍夫也如此^⑮。

公元1世纪前半叶,以人的形象而不再是以象征表现佛陀的习惯已经在秣菟罗发展壮大(有几位雕刻家实际上使用这两种表现佛陀的方法)^⑯,在此期的发展中,佛陀的表现是由传统所决定的。像现藏于拉克诺博物馆的坐佛像(见图33)偏离发展轨道的更罕见,并且在公元1世纪中期后我们或许可谈及规范而定形的佛陀雕像。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⑰,鹿野苑的站佛及卡特拉的坐佛也许能从这种较古老的规范型的雕像中看出。

上面已经描述了站佛的一些特点^⑱。我们现在对此进行些补充:常常表明是发结的肉髻,刚好被放在头盖骨的前面。双眼突出,在外眼角处有一条很明显的短线(见插图26)。耳垂并没被拉得很长。双乳突出。在年代很早的雕像中尚无腰带,而在规范的雕像中总是可见,腰带的两头系在一起并垂至右腿处。在其两腿间,我们可见一尊小坐狮(可能暗指佛陀的姓释迦牟尼),或者一小丛莲花。他的右掌心朝前,多少有些倾斜,掌背则由一个垫状凸出物支撑,手指通常指向外。大姆指压着其他手指。双肘远离身体,

并没有放在臀部。手指总的来说要比前面讨论的最古老佛陀像的手指细得多。

至于规范的坐佛(见图 31 和 32),我们只需补充以下内容:把这种类型看成是高浮雕而不是肖像更合适。背面通常是叶饰。他的左手放在左膝上,常常紧握拳头。双腿呈坐式(Padmasana)交叉;在其上翻的脚底上可见法轮和三宝。在佛陀的左右两侧各站一个信徒。佛陀坐在一只高垫上,上面饰着逐渐向后缩削的脊状线,这和早期小耆那及佛陀的祭坛般的座垫相似(可比较图 27 和图 28)。在较早的雕刻中,上缘总是由三个小狮子支撑着,两个“侧面”狮在角上,一个“正面”狮在中央。这个座因此被恰当地叫做狮子座(simhāsan)”。在下巴下面,狮鬃下垂至一处。中央的小动物有时被一个神圣的象征物取代。后来,雕像的捐献者也被表现在此象征物两侧^⑤。

现在,让我们更为详细地考虑一下这些出现在各种坐佛雕像中的次要人物。为此目的,有相当大一批雕像可供我们使用,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几个损坏,有时刚好是我们要研究的部分失掉。这样我们只有 5 个其中次要人物大部分可见的雕刻(其中 3 个见图 31、32 和 33)。在这些雕刻中我们见到这两个人穿着皇室服装:项链、耳环、手镯和方头巾。因此他们是地位高贵的人。根据库玛拉斯瓦米的观点,他们是药叉,是佛教徒从流行的信仰中借来的,正如爱尔兰古老的诸神并不是立即受到第一个基督徒的排斥一样^⑥。阿格拉瓦拉把他们解释为“拿着拂尘的侍者。”^⑦沃格尔是这样描述这些浮雕中的“仆从”的:“在每一侧都有一个穿宽大服装的弟子,手持一柄拂尘——侍服在佛陀身后的菩萨的原型”^⑧。实际在有些雕像上,其中两个崇拜者正拿着一柄蝇掸,所以两个难以区别。不过,我们发现有几个浮雕,上面两个人物差异明显。藏于波士顿(见图 32)的两个浮雕,右侧的那个人物拿着一杆卡马拉木(camara),但是左侧的这个人手中拿着个金刚,放在臀部附近^⑨。

而且,后者穿着很短的短裤,脖子上系着什么东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很象狮子皮,这种皮是所谓的“带有尼米亚狮子的海格立斯(Hercules)”穿的^⑩,因为下端也可见小爪子,很明显,这种奇怪的成分已迁就某种熟悉的东西。出自麦拉(Maira)的一个雕像上,Vr̥ṣṇis的 pancavīra 之一^⑪,是绕在脖子上的一条装饰链,正面打的是平结,在该例中则是由一个扣形装饰品所覆盖,但是这种打结方式在腰际清楚可见。该服饰清楚表明,保存在波士顿人物的这种情况表现出人物的健壮,而且该人物和拿金刚的人极为一致。不过该雕像不是惟一的例子。图 33 中高浮雕里的佛陀右侧有一个侍僧,拿着一个金刚。而且由约翰斯坦(Johnston)和霍夫曼(Hoffman)所拍的一张卡特拉佛陀照片(见图 31)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在此处左侧的信徒手中并没拿像沃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卡马拉木,而是拿着一个金刚。所以研究它是否如照片所表现的那样“在原来的位置”是可取的。最后,图 51 浮雕中从左侧数第 4 人,处在佛陀右侧,似乎也拿着一个金刚,和秣菟罗^⑫石雕纪念像柱上部浮雕中的一样。所提到的这两件浮雕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一个拿金刚的信徒经常站在佛陀的身旁。至于其他 3 件雕刻,为保险起见,我们先把它们放在一边,直到有较好的合适的复制品为止。

我们认为这个拿金刚的人是因陀罗,他是创造金刚的神,而且他的姓之一是金刚^⑬。辨识出这些人物中一个是因陀罗,所以另一个拿卡马拉木的侍僧是梵天就很可能了。作为苦行者,蝇掸总是他的典型特征之一。

根据库玛拉斯瓦米,拿金刚的人物可能是一个尚未知的药叉金刚,他和因陀罗没什么关系,但是菩萨金刚后来则由他产生^⑭。遗憾的是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另一个侍僧是谁。为说明拿着一个金刚的侍僧是因陀罗,在拉克诺博物馆^⑮的一件佛陀残像上有个确定性的证据(见图 34)。坐垫上的铭文提及该雕像是个菩萨^⑯。不幸的是该雕像上的年代本身也损毁,

但是古字体,坐垫上两个人物臃肿的表现法,及左手侧人物的披巾,以及和尚长袍飘过佛陀左腿的雅姿,所有这些都表明其年代很早,可能在迦腻色迦以前,班纳吉当时是这样描述该雕像的:

“根据格罗斯(Growse),该残像是在秣菟罗环形路附近的一座建筑的装饰线脚上发现的。语言是多讹误的梵文,文字整齐,且雕刻良好。它们是贵霜早期的。关于该铭文的重要一点是,该雕像人物为菩萨像,而不是像格罗斯所说的佛像^④。在坐垫的上缘该铭文有一单条残线……”

“该坐垫是秣菟罗雕刻派所制作的最好雕刻之一。它表现两个地位高的人坐在一溜台阶上,显然在相互交谈。两个人的头稍微受损,但工艺很好。铭文的最初几个字母损坏,主要人物也失去,这都极令人可惜,因为它们对印度雕刻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⑤”

坐垫右侧的那个人肯定只能是因陀罗神,他戴着高高的僧帽,在出自犍陀罗和秣菟罗的雕刻中只有他戴此种帽。他用双手举着金刚。像他左侧的人一样,他呈 *lalitāsana* 姿态坐着,该种姿态,只有君主或神才有。左侧这个人披着披巾,和早期 *āyāgapatas* 上的人物一样有着同样宽的垂环^⑥。他呈母状手印,即,像因陀罗一样,特胖。头发呈圈状,没什么使我们不认为此人物是印度教中的另一个伟大的神梵天。此雕刻中佛陀坐的坐垫太小,而不能使两个侍僧立于其两侧,因此在佛座前面给他们留下了空位,同时这极适合于虔诚的崇拜者。

和此相联系,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一样^⑦,更重要的是,一对人物总在佛陀两侧(见图 25),也呈现着犍陀罗梵天的因陀罗的形式。在我们看来,这要追溯到很古老的印度造像传统。因为即使在佛陀仍以—个象征物表现的时候,我们仍可见在菩提树^⑧下一个空位的两侧有两个伟大的神呈崇拜状。在笈多和帕拉斯艺术中,我们又发现两个神侍立在佛陀身旁;梵天可通过其 4 个头辨识

出来,因陀罗则通过其金刚辨别出来^⑩。”

所有这些表明这样的结论,虽然一些高浮雕上可见两个侍僧举着一个蝇幡,因此显然不具备因陀罗和梵天的特征。但是仍有几个浮雕,在这些浮雕中这种表现无疑是事实(根据这些特征,有时甚至根据服饰如头饰),以致有理由认为这些浮雕所要表现的意图,是这两个印度教中最高的神崇拜佛陀。经常是一种古老宗教的主要神起初对新的教义并不友好,但总是被后者同化,在新的宗教中它们则成了保护神或者崇拜者^⑪。可能现在讨论中的这两个次要人物的身份逐渐在后来的时代里失去。不过,和耆那一起,因陀罗和梵天这两个侍僧的名字一直保存至今^⑫。佛教甚至把这两个人物远播日本^⑬,因为一些学者认为它们和被称作 Kongo - Yasha (金刚 - 药叉)的 Ni - ō 一致。我们认为这种识别是不会出错的,德·维萨(De Visser)也这样认为。我们相信,所有这些似乎是额外的证据,证明在最早的雕刻中已习惯把因陀罗和梵天描绘成佛陀两侧的崇拜者。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福色尔建议把佛陀站在因陀罗和梵天中间的场景辨识为从忉利天宫降临,并且如果佛陀是坐在一个王座上,那时按要求在进行说法。我们认为福色尔在此走得有点太远,特别是当他说从比玛兰圣骨箱使人想到“从天上降临”,以及沙 - 吉 - 柯德里的圣骨箱“由于圣像组中的一个传奇场景所需的特点,使人想起‘舍卫城伟大的奇迹’”^⑭。

如果我们把该体系用于秣菟罗高浮雕中,我们应该认为邀请说法被表现在秣菟罗这些三合一的雕刻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秣菟罗雕刻家反复表现这种场景,而不是佛本生中许多其他事件之一。我们因此认为福色尔建议的表现因陀罗和梵天的印度西北部浮雕的解释在秣菟罗则并非如此,这两个神被刻板地制作在此,仅起崇拜者的作用,像我们在第二章中见的那样,还有更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福色尔在许多情况里所识别的似

乎不正确。

这几个正在讨论中的雕像还有另一个我们要面对的特点。巴赫霍夫描述如下：“出自3年的站佛和出自卡特拉的作品一样是令人惊奇的，雕像的形象及佛陀所显示的标志和菩萨的一样。在此方面，有出自安亚(Anyor)的一件雕像，当佛陀的肖像作记号后，遗憾的是其头和右臂全失掉了。在坐像旁边，佛陀和菩萨同样没作区别；但是，这对站佛同样有效，因为在此，通过带电性佛陀特征人物替代了菩萨^⑩”。

沃格尔已经观察到此坐佛的这一特点：“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至少在坐佛上，贵霜早期的秣菟罗雕刻家在乔达摩菩萨和乔达摩佛陀之间没作区别^⑪”。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班纳吉和格罗斯之间观点的差别是源于同一件事。今天我们赋予词“菩萨”的意思，更大部分上溯到大乘佛教对它的使用；在不久的将来得道的人被称为菩萨。当他获得菩提时，那么他就变成佛陀，一个悟道的人。所以这两种称呼间的转折点在于获得最高智慧。

我们不愿解释上文所讨论的命名为菩萨的不正常，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表现佛陀的肖像，表明秣菟罗的雕刻家没有对悟道前后的乔达摩进行区别。在我们看来，认为像谢尔盖所坚持的，所有这些佛陀像表现的是抛弃世俗生活后及悟道前的佛陀，似乎也不可能^⑫。在我们看来最可能的解答是菩萨这个词的意思已经改变，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词比其原初意思要更为有限，菩萨这个词的字面翻译是，“实质(或客体)是完美的知识的人”，该命名决不会限于悟道前的生物。从语法上讲，此命名本身并不悖于把菩萨的称呼也用于获得菩提后的生物。实际上，从某些巴利语注释来看，该词的词意以往比现在用得更为广泛。布达哈高萨(Buddha-ghosa)在他的 *Sumangalavilāsini*, II, 第427页^⑬对该词有专门的解释；出自《*Theragatha*》中的一段也就该词进行了说明^⑭。

菩萨的称呼显然可用于以下范畴：“buddhap acceka buddha buddhasāvaka, 即佛陀、辟支佛(Pratyekabuddhas)和佛陀的学生。”

从长远的观点看,可能在关于菩萨教义的影响下,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菩萨这个术语仅限于那些还没有悟道的生灵。这从出自菩提-伽耶笈多时代 64 年的一尊佛像的铭文上可见^⑭,在这则铭文上该雕像被称作菩萨。我们能够认定,菩萨意思的变窄是在公元 4 世纪后才开始流行的。巴赫霍夫在他的《早期印度雕刻》中讨论该雕像时认为,其年代指的是迦腻色迦时代。根据该雕像头决定性的笈多特征及铭文的笈多字,我们认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巴赫霍夫说,“人们可以把此符号错误地解释为”菩萨。^⑮这种声明似乎是危险的,我们不愿苟同此说。当我们看到铭文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菩萨这个称谓除了我们现在的意思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时,我们就越发不能同意。

我们已讨论了很多和佛像相关的重要问题,例如卡特拉的菩萨。在秣菟罗和印度北部艺术中,正是这一类型在迦腻色迦登基时已成为规范的佛陀像。按福色尔和库玛拉斯瓦米的观点,在壳型发结之后,为和后来的其他佛像区别开来,我们把这种类型称为卡帕町型,因为这也是其特点之一。当这位伟大的皇帝登基时,此种类型已经流行多久尚不能确定。可能从国王或者药叉雕像发展而来需要一个世纪,我们在迦腻色迦统治之初的雕像上发现了最初的年代,即在拘弥(Kausāmbī)^⑯发现的迦尼色迦 2 年的一尊雕像,另一尊是在鹿野苑^⑰发现的迦尼色迦 3 年的雕像。正如出自鹿野苑的那个一样,第三个也是由托钵僧巴拉所献,该雕像发现于舍卫城^⑱。

有相当大一批雕像,其年代早在迦腻色迦统治之初,良好的风格表明了雕刻家们对这种制作已经习以为常;人们推测一段时间内这些雕像都是以这种方式制作的,现在证实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后来要看到的那样,这种卡帕町类型直到大约公元 130 年为止,

仍是惟一流行的一种。我们了解其中许多样品,根据其年代,它们都源于迦腻色迦及紧随其后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在 Vāsiska 统治时期,卡帕町类型基本上就很少变化。不过,一定要提到的是,从长远来看,把捐献者表现在佛陀座垫正面的中央,两边的角上是狮子,这种表现方法已成习惯。这些捐献者几乎总是拿着捐献物,要么是一束鲜花,或者一只花环,要么二者都有。

但是,在胡韦斯迦统治期间,秣菟罗风格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犍陀罗影响的大量进入而引起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所导致:犍陀罗的艺术水平此时已经达到一个如此的高度,以致其产品越过国界,引起了印度其他部分的注意。这一结果清晰可见,例如在秣菟罗的佛陀像上便是如此。

早在 1909 年时,沃格尔注意到这些雕像中的一些已背离了来自犍陀罗的强大影响^④。在我们看来,该组佛陀的特点受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影响,其受影响之处主要是以下方面:长袍表现出宽褶,身体完全为该长袍所罩,以致双肩(坐像连同双脚)被罩住,以及抬起的左手的姿势(左手拢起部分长袍)。所有这些品质表明这些雕像自成一组,可以和直到当时尚流行的大量卡帕町型佛陀像相比。它们外形奇怪,显而易见,它们把源自印度西北部的佛陀像用作模型。

在对这种新的类型的佛像讨论前,应该着重指出古文字学给我们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两种佛陀像类型在短期内并存。我们不知道年代在迦腻色迦时代 60 年后的卡帕町类型佛陀像^⑤,也不知道已背离出自犍陀罗的年代在迦腻色迦时代 50 年以前的佛陀像^⑥。惟一的卡帕町类型雕像,其年代晚于公元 140 年,是由阿格拉瓦拉(Agrawala)公布的所谓“菩萨”^⑦。在离该雕像相当近的地方,发现一则铭文,我们释读如下:

“sa 90 2 he 1 di 5 asya pū(r)vveye
vi(or kha)ndavihare vasthavyā bhiksusa grāha -

dāsikasa sthuva prasthāpāyati sa -
rva sav(v)anam hitasukhaye.”

我们和阿格拉瓦拉释读的最重要的不同处是 bhiksusa 而不是 bhiksasa。其他的不同是次要的。阿格拉瓦拉把这则铭文翻译如下：

“在 92 年, Hemanta 的第一个月, 第 5 天, 在这个日子, 于 Bhikshu Grahadāsika 卒塔婆内, Khanda Vihāra 寺庙内的一位居民为所有有知觉的人的福祉和幸福而捐建^②”。

阿格拉瓦拉的结论是“在该铭文中所捐建的东西不具体, 这是很不走运的一部分。很明显, 该铭文指的是菩萨在一座寺院里捐献, 但是没有提出有利于此结论的具体证据……”。阿格拉瓦拉讨论了前面雕像, 不过他想当然地认为它的年代是属于 92 年^②。

首先,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其风格表明是迦腻色迦时代第一个世纪中期以前某个时候的。但是, 该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铭文本身。不寻常的是这则奉献铭文省去了描述被奉献的客体(该例中是根据阿格拉瓦拉的雕像)。其次, 不可理解的是的为什么和尚 Grāhadāsika 要在卒塔婆内树立一尊雕像。雕像可能是在卒塔婆内发现的, 但是, 这样它总是涉及到由于其神圣而被埋起来的雕像, 这种神圣是使其古老的缘故。在此我们就涉及到一尊在被埋起来时仍很新的雕像。最后捐献者仅仅在奉献铭文中间接地表达出其名字, 这是非常不一般的。这三种不可能性使我们再次检查该铭文, 结果我们得出另一种译文, 这和我们发现的适用于其他类似铭文的规则更一致。

“在 92 年, 冬天第一个(月), 在第 5 天, 在这个指定日里, Vin-da 寺院的居民为 Grāhadāsika 和尚建立了一个卒塔婆。祈祝所有的人幸福快乐。”

现在很清楚, 在该寺院里建一个卒塔婆, 在整个亚洲佛教界里, 这一活动是极为值得称赞的, 并且相当正常。因此该铭文和菩

萨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把它归于迦腻色迦时代第 1 世纪中期前某个时候就没什么约束了。

在讨论那些背离印度西北部影响的佛像以前,我们还须论及一点:我们会看到这组雕像的特点之一是双肩由和尚的长袍覆盖,而长袍是以宽褶形式从双肩垂下。这些衣褶肯定受犍陀罗影响,但是覆盖双肩的主意则可能源于秣菟罗本身,或是正是这最初的征兆使我们得以藉此在秣菟罗艺术中辨别出印度西北部的影响,因为有几则古老的民族类型的佛像,上述和尚在雕像基座上,双肩罩着,穿着给人印象是格状的长袍。这种上身穿有僧袍罩衣的穿法并不仅限于和尚,在《1934 年印度考古年度目录》第 9 卷图版 4 中有一个佛像就是如此着装的。该佛陀双肩从各方面看都清清楚楚地属于卡帕町类型,双肩罩着格状长袍,只是还没见到那种受犍陀罗清晰影响的佛陀类型的宽褶。由于该问题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主题,我们先讨论到此,希望不久能在单独一篇文章中再讨论。

在我们看来,这组受犍陀罗影响的雕像中最早的是图 33 和图 36 中的佛陀像。第一尊是个佛陀^⑩,长袍裹身,罩着双肩及双脚;因此我们知道该类型佛陀是出自犍陀罗。现在该人物连同其细节已完全被替代,它被放在了卡帕町类型佛陀的背景上。如果我们把该件雕刻和卡特拉的佛陀相比较(见图 31),许多相似处立即就引起我们注意。佛陀左右两侧是两位侍僧;在佛陀右侧的那个很显然拿着一个金刚,其坐垫也和迄今为止仍在流行的极相似。就此磨损的雕像所许可的范围,我们仍能在两个角上看见一头小坐狮的轮廓,狮头向外。在雕像中央,我们相信仍有一头正面小坐狮。有两条后腿在身体两侧伸出,后腿非常清楚。所以该座基呈现出的装饰我们在卡特拉佛陀像上也见到了。

至此,让我们看一下在试图摹仿印度西北部佛像时,秣菟罗雕刻家自己的艺术成份由哪些得以保存下来,而秣菟罗流派中哪些具体品质却失去了。

为进行此种了解,让我们首先更密切地关注外套的打褶情况。根据犍陀罗的风俗,和尚长袍必须通身是衣褶,虽然有的地方褶得更密,但是毕竟表现的是一种厚厚的羊毛外套。这可是秣菟罗雕刻家尚不知道的事。他们生产这种网状织品很在行,这种织品就是所说的迦尸(Kasi)织物,它的名字表明了它的起源;这种薄织品据说是如此之薄,以致几码长的布料能从一个指环中拉过。这种材料的特点是,绕着双肩抛下,拢在臂部处;它垂下的方式紧随当时的时尚,许多小褶皱密集在一起。此时秣菟罗的雕刻家及早期印度的其他佛教艺术中心都非常善于生产这种织物。这两处因为这种织物的透明性,使得雕像的身体显得很透;当衣服拢起时,它就垂成许多皱褶。在许多药叉及佛陀雕像中,厚厚的卷边拢在左臂处,在左手腕或臂膀处再次垂下;这种厚厚的卷边,实际不是由于技艺的笨拙;极薄的织物实际上也形成类似的皱褶,这种极薄的织物被非常忠实地摹仿出来了^④。雕刻家做此事都很精确,在一块厚石头上,凿出小而窄的凹槽,衣褶方向上彼此平行,使得衣褶比石头表面其他部分要高。

突然间,雕刻家们接到命令,要像在犍陀罗一样,制作的佛陀穿着一件有衣褶的长外衣,罩着整个身体。所以只有当要表示肩膀或臀部的衣褶时,此时技巧要运用比实施雕刻整件长外衣更多逻辑性的东西。这在图 32 中的佛陀上可以清楚看出,非常细而窄的凹槽被凿成平行状,布满整个衣服。在交叉处,其情况如插图 11。



插图 11 图 33 和图 36 衣褶的交叉部分

衣褶从双肩处开始,接着垂下并形成半个半环形,最后稍微向上,然后停了下来;一条凹槽交替地从左肩绕到右肩。这种从左肩

绕到右肩的交替的衣褶程式当然是用来防止大量凹槽集中在双肩上,那样的话肩上的凹槽就得凿得非常密。

在此,又出现了和卡帕町类型不同的佛陀雕像,即,虽然在雕塑皱褶上使用相同的技术,但是通过这种处理宽褶的方法来暗示厚厚的木质长袍;另一方面,无意识中又深受其突出乳房艺术流派传统的影响,所以质感厚重的印象减弱。在此顺便说一下,正是这种使身体透的潮流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占了上风,并且逐渐以薄而透的绢纱取代了厚重的木质材料。那些我们刚才提到突出的乳房正是习惯用这种民族流派雕制的雕像的特点。而现在不用深入的思考,雕刻家制作半身像时好像胸脯仍部分裸露似的。所以在此后我们又在卡帕町类型中获得一种成分,并且这种成分持续到那些后来受犍陀罗影响的雕像中。

而且,这位雕刻家在该雕像中处理拢在左手里长袍的垂褶值得我们注意。这片材料细浪般轻流至座位上,四面垂下。我们也注意到尖 V - 型,绕着脖子的长袍由此处折进去。

不幸的是该雕像的头和光圈已经全部失去。很可能后者表现为有名的扇形边。右手呈施无畏印,这是卡帕町型佛陀的正规姿态,他的这只手举得如此之高,以致于右肘接触不到其大腿。虽然该只手部分损毁,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大拇指按着其他手指,手掌半向前开,卡帕町型的雕像正是如此。该只手及拢着垂褶的左手仍紧靠着身体,像卡帕町的一样,由于石头易碎,更重要的是雕刻家缺乏胆量的结果。

在我们看来,第二个雕像^⑧属于受印度西北部影响的雕像组的第二阶段,该雕像为站佛,见图画 36,除了脚受损外整个雕像很完整。前面提到的特点在该雕像中比在前一个佛像中看得更清楚。在此,窄线刻得也相当分离;和前一个雕像中的一样,凹槽交替地从左肩转到右肩,而且在正面向上弯曲。长袍清楚地显示出身体的形状,乳头、肚脐及阴部,正如卡帕町类型中的站佛一样。

他的右手呈施无畏印举着,并放在垫状的支垫上,该支垫饰有刻线,我们在卡帕町类型的几件佛像手的后面看到和这完全一样的支垫。而且,手掌半转向前,大拇指压靠在其他手指上。该雕像的头和光环均未遭毁,这一事实很重要,它向我们表明在这方面雕刻家们也还是忠于他们自己流派传统的。头发制作得非常光滑;在头冠的顶上制作得同样光滑的肉髻。眉间白毛(urna)清楚地被表现为小螺旋形,眼睛外角被表现为颇具特点的小凹槽。光环也和秣菟罗传统流派一样,带有著名的下垂边。

概括起来,在这些雕像的下列品质中,我们看到了在卡帕町佛像中发现的特点:带有侍僧的设计,光环的形式和装饰,带有小狮子的基座,衣褶凹槽的形式,身体透过长袍清楚可见,如乳头、肚脐等均可看见,修饰光滑的头发,右手高举着,只是半斜着向前转,靠在坐垫般的支垫上,结果紧贴着身体,不过,最后大拇指仍是压靠在其他手指上。

另一方面,仅有两个特点是我们不能追溯到卡帕町类型佛像上的,但是它表明受犍陀罗的影响,即外套垂罩着双肩和双脚,衣服的垂片拢在其左手中。关于这些雕像,我们还不能说它们就是印度西北部雕像的复制品,因为它们仍然植根于秣菟罗古老流派很深。在此,它至多受了印度西北部轻微的影响。

在图 39^⑩和图 40^⑪的雕像中,我们可以见到秣菟罗受犍陀罗影响的这组雕像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看看秣菟罗雕刻家们如何从摹仿犍陀罗佛像中解脱出来是值得注意的,看看当他们以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传统转换雕刻的结果是什么,也是重要的。

那两个刚才提到的雕像要比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雕像晚,这从佛陀外套的处理法代表一个后来阶段的事实可以看出,即,雕刻家以更大努力来表现印度西北部更为厚重的外套的厚圆的打褶法,借助使佛陀衣褶完美以获得一种肋骨效果。其交叉处如插图 12 中的一样。我们在提到的这两个佛像和安亚及波斯顿的佛像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阶段。

插图 12 图 39 和图 40 衣褶的交叉部分

这些雕像还和前面的那两个雕像不一样,因为衣褶不再交替地从右肩或者左肩垂下,不过所有的衣褶在正面弯曲后分别上行到双肩。还有一点明显,就是外套不怎么透,这样外套给人的印象是厚且重,这显然是雕刻家的意图,就是说如果他想正确摹仿犍陀罗佛像类型的话。下垂的肩线也值得注意,它使这两个佛像的外貌显得结实。还有一个特点是脖子两侧衣褶所形成的三角形(见插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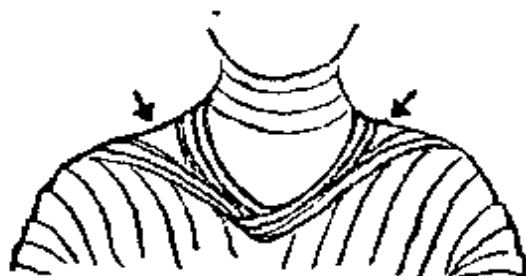


插图 13 脖子周围的衣褶

这些雕像晚于刚才讨论的那两个雕像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左手拢着的衣服下垂得笨拙而僵硬,没有一点皱褶。这就是我们在转变期一再见到的潮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此复制期秣菟罗雕刻出现了某种僵硬和笨拙。

这些佛陀举着衣服的左手仍按着胸膛。他们的右手呈施无畏手印举着,而手掌直接翻转向前,这不是卡帕町类型中的那种情况。不过,手指仍稍微指向左边。

最明显的是图 33 和图 36 中的佛陀的手举得要比图 33 和图 36 中的低。后者的手举过其乳头,而波斯顿佛像中的手则刚好举与乳头齐。双肘则放在大腿上。这在卡帕町类型及图 33 和图 36 中的佛陀和现在正在讨论并且仍要讨论的那些佛陀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这一事实加上已经提到的其他特点,表明图 33 和图 36 中的佛陀和卡帕町类型中的那些佛陀关系非常大;而图 39 和图 40 的这两个佛像则表明受到犍陀罗对秣菟罗日益增强的影响。现在讨论的这两个佛像区别于图 33 和图 36 中佛像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是传统的两个侍僧不见了,除了光环外(遗憾的是已经损毁),该佛

像没有其他背景。

基座也起了变化,这部分是由于受到日益增强的犍陀罗的影响。巴赫霍夫指出“正面”表现基座上的这些小狮子在秣菟罗是一种新奇的事物,可能是从犍陀罗引进的^⑳。这些动物部分保留着卡帕町佛像基座动物的外貌。所以,狮鬃垂至胸前的一点,头上的毛在两只耳朵间的前额上形成一个三角形,其中一个尖向下。这种图形第一次出现在安亚佛陀基座右侧的狮子上^㉑,第二次出现在收藏在波士顿的佛陀左侧的狮子上。很明显,这两个雕像上的狮子雕刻得笨拙而且毫无样子,特别是它们的腿雕得太短了。另一方面,卡帕町类型佛像基座上的侧面坐狮则雕刻得颇具水准。或许是当时秣菟罗雕刻家习惯于雕刻坐狮,而让他们雕刻站狮则显得困难。我们认为最后所说的这一点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在狮子的两侧再见不到突出的腿骨,而在卡帕町类型佛陀基座的中间的坐狮上则可见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动物便是畸形的怪物,它证明无论如何还没有完全掌握对它们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是想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坐垫,见图 42 中的照片。它是单个的坐垫,意味着只能放一尊佛陀像。显然雕像和坐垫并不总是制作在同一块材料上。因此我们不能冒险认同沃格尔评论:“礼拜场景中的坐垫并非是此种画面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属品。”^㉒他提到的山奇的雕像因没有基垫可能也像图 37 中的这个一样,单独有个座基。顶部的厚板是由两头小狮子支撑着。两头狮子的耳朵,及左边狮子凸出的左眼显然可见。我们见到一排小三角形而不是两条腿,三角形的尖向下。我们想对此作出的解释是雕刻家试图摹仿某个犍陀罗的样品,因为我们在该座基下极常见到普通的椅子腿^㉓。这些一再呈现的狮子脚掌的形状^㉔,其爪子按惯例成小三角形^㉕,颇像出自秣菟罗坐在小凳子上的那些狮子。在繁荣期及其后,腿的上端经常有个狮子头^㉖。很可能这些类型的腿出自某个西罗马的模型,而反过来它们又被用

作秣菟罗此类雕刻的样品^⑭。该作品的雕刻家有意复制出自印度西北部的座基,这不仅从雕像腿上表现出来,而且从一个用坐垫和是吉祥草的覆盖物上显现出来。该雕刻家通过用一种多排垂悬的毛边相互迭加的平行线来表现这一点。这种座基的覆盖物不是秣菟罗雕刻家首创的,因为我们在几件很早的印度西北部的浮雕中已发现过,毫无疑问这位来自秣菟罗的雕刻家对来自犍陀罗的许多其他事情都加以复制。在印度西北部发现有几件类似该坐垫覆盖物的样品,例如西克里卒塔婆上就有^⑮(也见图9和17)。



插图 14 图 42 的浮雕

说明该坐垫是从印度西北部复制来的最后一个论据是此小座凳腿之间的场景(见插图 14)。因为在画面中央,我们可见一个人物坐在一个台子上。该人物左右两侧仍是两组人物的痕迹,分别是三个较小的呈禅宗手印人物。座位的左侧还有一个无法辨识的物体;在座的前面有两个动物的模糊轮廓,它们面对面蹲着,很可能这是表现的鹿野苑佛陀初次说法。这 5 个小的形象是佛陀前期的 5 个弟子,而旁边无法辨识的物体可能是他初转的法轮。不幸的是佛陀右臂毁损,所以无法确定他是否呈施无畏印举着,或者是把手伸向法轮。如今,很显然秣菟罗的雕刻几乎总是把捐献者的形象雕刻在垫座上,后来也是如此,尽管有些情况下是雕刻在佛陀

或菩萨的两侧,而以前两侧则是神圣的象征物。不过,这在犍陀罗则是例外,因为佛传中的某个场景被表现在垫座上。这使得我们把该座位前的画面作为有利于我们观点的一则论据提出,即该雕刻是一件印度西北部垫座的复制品^④。

因为前面已叙述过,分析图 39 和图 40 中垫座上小狮子臃肿的渊源颇为有趣,它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秣菟罗只是复制类似印度西北部带狮子腿的凳子,而没有进行恰当理解,以致于尝试着把狮子腿柱表现为正常动物的形式。在该事上我们不敢妄作决定,尽管所提及的这些要点似乎的确可以接受。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上来,图 39 和图 40 垫座的中央坐着佛陀,两侧是两个崇拜者,这一事实似乎是我们观点的另一则论据,即我们认为这两尊雕像代表着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可能是由于犍陀罗的影响日甚一日。就我们所能够查证的范围所及,卡帕町类型的垫座从未有一尊佛陀或一尊菩萨居于画面中央,两侧是两个崇拜者;而是一头“正面”狮子,或者诸如权轮或者三宝这样的宗教象征物。第三种可能性,画面的中央是空白,而几个角上是狮子,狮子之间的地方只是一些捐献者。就我们所知,这种可能性限于一个例子,这种情况似乎是在这件特别雕刻中缺乏地方所致。在卡帕町类型中,其基座上人物的数量经常和题献的铭文中列举的那些雕像的虔诚捐献者的人数一致,因此我们正好也可认为这些崇拜者的雕像是表现那些制作这些雕像的委托人,或者是捐献者及其家人。至少,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⑤,在犍陀罗人们已习惯在佛像基座上制作一幅画面,其场景内容来自佛陀生活。我们因此认为在图 39 和图 40 中的这种成份可能由于犍陀罗的影响。

不过还有更多的。与我们所知的早期雕刻截然不同,这两个雕刻中仅有两个崇拜者在座位上。此外,佛陀坐在垫座上,而因陀罗和梵天不再侍立于佛陀两侧。这和卡帕町类型一样普通。或许

这两个侍僧不再站在佛陀身旁,如今作为小佛陀像的崇拜者而被绘在座位的前面。我们在卡帕町类型雕像中经常见到表现梵天和因陀罗的崇拜,此时则作为整体被移到了基座上。这在我们看来颇为有趣,因为在犍陀罗,这两个伟大的神作为崇拜者总是侍立在佛陀两侧。在安亚佛陀的坐垫上,我们看到那个人物似乎戴着方头巾,而左侧的那个人光着头⁹⁹。这能够确定我们的假设,因为头饰成为在犍陀罗把这两个神区别开来的手段。不过,由于图 39 和图 40 基座上的浮雕毁损严重,遗憾的是无法有把握地辨识佛座前的崇拜者。

如果从长期的发展看,在秣菟罗,此时似乎梵天和因陀罗的确被表现成一个坐在垫座上的小佛陀形象的侍僧¹⁰⁰,那么我们现在能够说明出自印度西北部雕刻中所采用的那种习惯并没持续太久,实际上只是在犍陀罗那些复制品中存在。不久,秣菟罗这种同化过程开始,在此过程中,那些来自犍陀罗的影响得以修正或者甚至被抛弃,卡帕町类型的特点重新出现。这些古老的地方类型特点之一是捐献者被表现在基座上,事实上,在稍晚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捐献者又被制作在佛座的正面。

而且,出自安亚雕像基座上的佛陀人呈禅宗手印,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在秣菟罗流派中是非常不一般的,我们在调查中已经注意到秣菟罗的佛陀几乎总是被表现为呈施无畏印;而这种禅宗手印在耆那雕像中则是习以为常的。这种新的手印可能也是受印度西北部的影响,在那儿各种手印,诸如 *vāramudra*、禅宗手印和土触手印经常使用。出自安亚雕像的基座上有一个呈禅宗手印的佛陀(我们认为该佛陀大约制作于公元 130 年,或者稍早一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新手印大约同时出现在秣菟罗艺术中,而且也受到来自犍陀罗的其他影响。

出自安亚,现收藏在波士顿的那尊雕像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是,雕像的头发像卡帕町类型的佛像及受犍陀罗影响的那组雕

像中最古老的那些雕像那样,不再被表现成光滑的。如今的头发用半圆形的卷结表明,一排排地罩着头^⑤(图 58 和图 69)。显然这些雕刻家意在摹仿出自犍陀罗佛陀头发的卷圈状。迄今为止在秣菟罗艺术中尚未见,而且现在所用的这种方法的确极为笨拙,并不令人怎么满意^⑥。秣菟罗雕刻家确实不知道卷圈头发,他们表现此发式是用蜗牛壳状的圆螺旋圈布满整个脑袋。此种发式常为矮神和药叉使用。不过我们后面还要论及此点,在这儿已经充分说明了复制犍陀罗的略呈波浪式的佛陀头发是不很成功的。

图 39 和图 40 中的雕像与图 33 和图 36 中雕像相比,还有最后一点不同,陈述如下。在图 40 中的雕像上(图 39 中的大致也如此),我们看到光环开始出现变化。这种光环仍是沿边带有扇贝形图案,这在秣菟罗民族流派的雕像上已成惯例,但是如今处于一个更为发展的阶段,因为光环表面不再是光滑的,圆形的中央显得更深,因此,翻转式的扇贝图案在光环上便突出出来了(见插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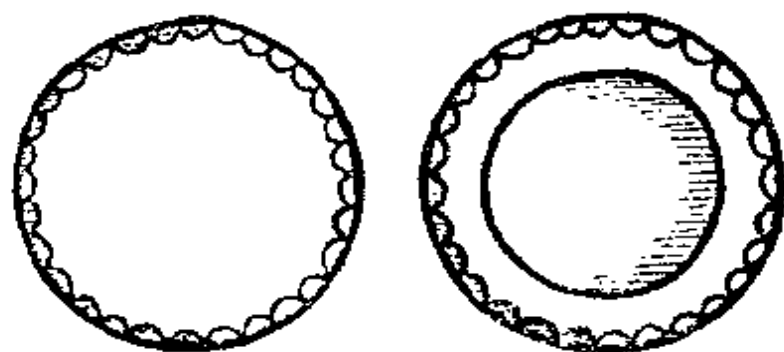


插图 15 a) 早期贵霜艺术中的光轮 b) 图 40 中的光轮

现在把出自安亚的佛陀年代确定在 51 年,从文字书写形式及雕像的风格发展来判断,51 年无疑是指迦腻色迦纪元。这给我们了一个固定点,所以我们粗略地认为,

那些风格发展阶段比出自安亚佛雕水平要低的雕像,其年代肯定在公元 129 年前,它们表明一个后来发展较迟的阶段。收藏在波士顿的佛陀像大约该是同一时间,因为从整体上看两个雕像非常像,例如,膝盖及其周围的皱褶(见插图 18),带短腿的小狮子形状,崇拜者的轮廓,在脖子两侧衣褶形成两个小三角形的方式(见插图 13),从编年学上讲,所有这些强烈地表明这两尊佛像关系

密切。

有两点是与图 40 所不同的。首先,基座中心有个雕像,从其轮廓判断,使人想到卡帕町类型中的轮廓,但是也可能是个菩萨。他右手呈施无畏印举起,似与肩齐,这不是此发展阶段中受犍陀罗影响的那种情况;相反,这正是秣菟罗较古老流派中佛陀所特有的姿态。而且,他的左手靠在左膝上,这也是卡帕町类型佛陀和菩萨的典型姿态。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决定该人物是佛陀还是菩萨。

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是,图 40 中雕像的制作者在安排雕像正面的衣褶上有困难。衣褶不太适合,所以他用一些线条形成一个三角形,以填充余下的空间。该雕刻家显然还没有掌握较新的表现衣褶的方法,能够把衣褶凿得更密,以便形成我们已讨论过的肋骨状效果。不过,安亚雕刻家在并没有恢复到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和丑陋的情况下解决了此困难。两个雕像间这种细微差别的原因不必是编年上的不同,而是由于技术能力的问题。

在比较图 33 和图 36 中的雕像和刚才讨论的这两个雕像时,前者显然较早,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了源于卡帕町类型雕像的特点。

图 39 和图 40 中佛陀赖以表现的是品质,和前面的两个不同,表明它们受犍陀罗影响很大,把它们称为复制品似乎并不夸张。

至于图 37 中的佛陀^⑨,我们认为大约和安亚佛陀的发展同时代。遗憾的是头和光环已经失掉,显然座是单独制作的,所以我们对它不能做出任何结论。脖子周围的衣褶仍有一个 V 形,两侧各形成一个三角形,但是总的说来衣褶的形状已经开始变化。衣褶互相叠加,给人以百叶窗的印象,这是随图 39 和图 40 雕像“肋骨效果”后走向僵化的过程。不过,仔细审视这一点,我们注意到从肩膀到肘处的衣褶是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的:下面衣褶总是罩着上面的。在肘的下面,情况明显变化,因为从其前臂上我们看到上层衣褶总是罩着下层。所以在靠近肘的某处衣褶的方向变了。关于

此雕像的制作之事,我们还不明白它是如何产生的,但是,在一件较晚的雕像上,可见它是如何制成的,可能现在讨论的这个雕像也是用此法所做。我们还记得在山奇发现的那尊佛陀像^④。在肘处,有一个盒形褶,我们认为这也是属于图 37 中佛陀长袍的那种情况。对此奇怪衣褶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凿子从上向下比从其他方向更易凿动石头,因此在肘上面的褶子是从下面向上叠加的。胳膊在肘处弯曲的地方,向着自己方向凿石头很困难,而从自其他方向向外凿石头更易行凿,因此,在小臂上的衣褶从上向下叠加(见插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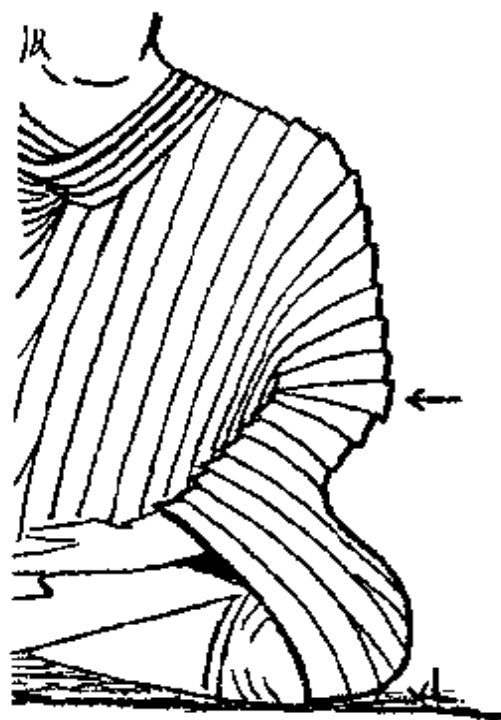


插图 16 肘处的箱形褶缝

虽然乳头处仍凸出,人物本身似乎也有些厚重,但他已经失去苗条,这可是卡帕町佛陀像的特点。这种厚重外表的原因主要是肩线沿着上臂下垂得很厉害,双膝外凸的距离超过双肩,甚至超过了肘;或者简单地说,该人物下部比上部更宽,逐渐上收。由于这些事实,该雕像能够放入的空处呈三角形(见插图 17)。

另外一点明显的进步是手上,其右手可能呈施无畏印举着,而左手则举



插图 17 图 37 中的构图空间

起衣服的垂片。两手离胸部相当远,因为它们被毁,但是在胸部及上臂处见不到连接的痕迹。衣服的垂片向下,衣褶僵硬,更显习俗化。

不过,其他成分并没表现出进步,而只是使人想起图 33 中的

佛陀,例如正面衣褶的曲线:从每个肩膀处有一个衣褶凹槽交替向下,和图 33 和图 36 中的极像;而且膝盖及其周围衣褶凹槽使我们想起图 33 中的佛陀。在图 39 和图 40 中的佛陀像上,在膝盖顶上的这些凹槽形成了向上倾斜至雕像中线的斜线;在膝盖下方,形成了向下倾斜至雕像中线的斜线(见插图 19)。



插图 18 图 39 和图 40
中人物膝盖处的褶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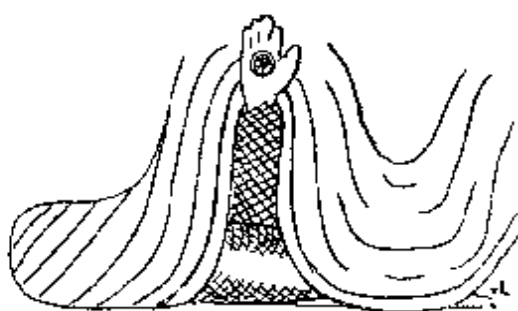


插图 19 图 33 和图
37 人物膝盖处的褶皱

在柱基前面有一则铭文,拉玛普拉萨德·卡恩达(Ramarasad Chanda)就此说道:

“贵霜时期另一尊坐佛是犍陀罗造型,是制作极次且毫无生机的复制品,其基座上还愿性铭文严重损毁……(ha)rajasa Deva……在开头处清楚,年代部分字母磨损,我冒险地把它恢复为 sava 30 gri di。胡韦斯迦于 29 年开始其统治,如果不是从 28 年末开始统治的话,这是所知的 Vasishka 最后的年代。因此该雕像也属于胡韦斯迦统治期的^⑧”。

所以,根据拉玛普萨达·卡恩达,该雕像应是迦腻色迦纪元 30 年的。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其艺术风格清楚地表明该雕刻一定是迦腻色迦纪元 51 年的。巴赫霍夫也反对卡恩达的说法。他就此说道:

“但是,就能够辨认出的画而言,无论如何我觉得似乎无可指责。只是辨识‘di’不成问题,而辨识‘gri’则涉及到无法确信的符

号,并且,使其他符号的辨识也变动了^④”。

遗憾的是,应该题写日期的地方已无法再辨识。我们认为该铭文第一行也许可读为:“(Ma)harajasa Deva(putrsa)……sa sa …… he 2 di 10 9……^⑤”。其间留有如此大的余地,以致年代的数字可以用词表达,实际上我们在达雅·拉姆·萨尼(Daya Ram Sahnai)拓本上能辨别出三个 aksaras。第一个字母很像其上方带有一个 anusvara 的 pa,第二个可能是 ca,而第三个可能是 sa,因此其年代是 pancas(e),即在第 50 年。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只是最后 akasara sa 保留着该君主的名字,证据不充足,这是个所有格的结尾,在该铭文中此处需要一个君主的名字。因为词 Deva(putrsa) 最后三个词 Aksaras 不再清楚可读,此处间隙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要弄清楚此处题写的是哪个君王的名字是不容易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所留空间很小,所以胡韦斯迦的名字比韦苏提婆的名字更适合于此处,后者比前者长一个 aksara。这也和所提到的 50 年的推测更好地一致起来。因为所知胡韦斯迦的最后一年是 60,而韦苏提婆铭文始于 62 年,并持续到迦腻色迦时代的 98 年。就风格批评的理由而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认为所讨论中的该雕像大约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50 年,即约公元 128 年,对此该铭文提供了进一步的确证,尽管并不很强有力。

接下来的时期单个的佛像决不是很多,很长时间后出现了第二种佛像:秣菟罗流派中一种新型的佛陀。初看起来它和先前的佛像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事实:双腿下部未被长袍罩着,和尚长袍的衣褶不再从双肩垂下,而是部分从左肩垂下,部分折向右边,接着又上披至右臂及右肩,结果长袍呈现出扇形衣褶。所知的这种较晚期类型最古老的单个雕像是萨赫斯 - 玛赫斯(Sahēth - Mahēth)佛雕(见图 43)及希塔拉 - 噶提佛陀^⑥(见图 44)。前者是由约翰·马歇尔爵士所发现,当时正在发掘前舍卫城遗址。同年,一件卡帕町型的佛陀残片也得以发现,其上有则铭文,这对马歇尔

来说是结论性的证据^⑧。他认为卡宁汉姆的确在萨赫斯 - 马赫斯再次发现了古老的舍卫城^⑨。在关于发掘的报告中,他就该雕像谈道:

“头后面有个环形光环,每侧有一个小残片,饰着盛开的莲花图案;而在光环背后有一个同样的图案,只是尺寸更大。佛陀的长袍罩在双肩上,并垂至背后,其座上狮子之间有一个表现坐着的菩萨的浮雕,两个侍者拿着花环,站在两侧,在这些人物下方的基座上,有一则以贵霜后期文字写成的短铭文。它是 *Sihadēvasya Pr(ā)var(i)kasaya Sākētakasya dēyadha(r)ma*, 或可译为:“*Sihadēva* 虔诚的天才,一个 *Sākēta(Ayōdhyā)* 的 *Prāvarika*”^⑩。

虽然和其他年代得以确定的雕刻相比,该雕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年代,我们可以据此总结说此铭文肯定属于韦苏提婆较晚的年代,韦苏提婆是在迦腻色迦时代的 62 ~ 98 年在位(即公元 140 ~ 176 年)。特别是字 *ya sa ha ka* 的形式及连音线 *sya* 能支持此说。不过,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明显的所谓的“箱形头(*box-head*)”的明显出现,字母上端变厚,呈现为一个厚钉头的形状,这是贵霜王朝最后的特点。沃格尔也相信该字形式较晚^⑪。

该结论完全适合该雕像风格发展阶段,因为百叶窗式的衣褶在此已达其僵化顶点。在肘处,我们又见到箱形衣褶。不过脖子处的衣褶为尖点在下的 V 形,趋向于变得更圆,意在变得更自然。图 37、图 39 和图 40 雕像的脖子两侧由衣褶形成的小三角形,现在已经消失。被举起的垂片已完全程式化为一个三角形(见图 44),其中一种新出现的凹槽边曲曲弯弯^⑫。我们从出自甘尼什拉(*Ganeshra*)的菩萨像中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此种成份,这些菩萨像现收藏在秣菟罗的寇松博物馆(*Curzon Museum*),编号是 A.45^⑬,它不像此处讨论的这两个佛陀那样损毁得那么严重。

萨赫斯 - 玛赫斯及希塔拉 - 噶提佛陀的手雕凿时没受身体的影响,因为胸脯上没看到痕迹。有一个新特点是指尖几乎是直指

上方的,而图 39 和 40 中佛陀手指偏左一点。脚底相当平,没有卡帕町类型所显示的细节上的雕刻,两个脚掌相对着放在一个平面上。

从风格上看,小狮子的姿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小狮子更向内转,它们雕刻得显然要比图 39 和图 40 中的好。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这些动物的雕刻已从浅浮雕转到高浮雕,显而易见它们拱起的胸脯已变得多么凸出。鬃毛不再垂至一点,而是呈圆形,且非常长;而且,它们的头高出顶板,舌头突出。它们始终起着支撑作用,顶板即由它们支撑着。而该雕刻中显然已经由狮背而不再是狮头支撑顶板。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吉祥草已被表现在佛陀座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这可能是由于犍陀罗的影响^⑤。

在此转变过程中,根据印度西北部佛像进行复制,起初,不加批评地接受;后来吸收并同化进了民族艺术中。在表现佛陀上,民族化潮流的若干变化出现了。在讨论图 39 和图 40 中那些制作在佛陀座基上的雕刻时我们已经提到。双腿的下部仍是没有被衣服罩着,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见该种倾向的显著特点。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萨赫斯-马赫斯和希塔拉-噶提佛陀特点归结到民族艺术传统的新的兴起,这种传统一度曾被强大的犍陀罗影响淹没。

我们把这同一过程看作是下面变化的原因:当把萨赫斯-马赫斯及希塔拉-噶提佛雕外表和安亚、波士顿收藏的及图 37 中的佛雕外表进行比较时,我们看到这些雕像身材总体上已经变化。我们在最初受犍陀罗影响的雕像中见到的卡帕町类型佛陀高身材的特点,在图 37、图 39 和图 40 的佛像中已经消失,代之出现的是体格结实的外表,这主要是由下垂的肩线引起的,这有些立体的感觉。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由于人物本身躯干相当短,而且主要是由于双肩线的改变。这种肩线不再是从脖子处下行,在肩部弯曲处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和上臂汇合,因此实际上没有了肩部弯曲部;相反,此雕像中肩线倾斜只是很模糊,几乎是水平式的,接着在肩

部弯曲处形成一个近于 90 度的相对直角,然后几乎垂下向下(比较图 44 和图 37)。在此,我们认为这种接近水平的肩线是卡帕町佛陀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萨赫斯 - 马赫斯和希塔拉 - 噶提新特点作为其民族化进程诸方面之一,这一进程此时正出现在受犍陀罗影响的佛像上。

所以下垂的双肩消失了,身体的上部变得更结实。结果,想象中的人物雕刻空间不再为三角形(见插图 17),而成了极接近于长方形的等边梯形。头为圆形(见插图 17)。如果我们想把人物的头也列入此雕刻空间之内,如在图 37 中讨论的那个佛像一样,那么该处呈抛物线形(见插图 21)。但是,无论如何,在萨赫斯 - 马赫斯的佛雕和图 37、图 39 及图 40 中的雕像的决定性区别点在于此,这是显而易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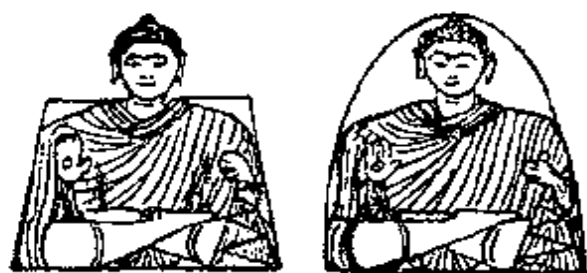


插图 20 和 21 图 39 和图 40 的构图空间

佛像民族化第二个显著的地方是借助于蜗牛壳般的圆圈来表现头发。这种把头发表现成圆圈状的方法在印度艺术中存在已久^④,不过它现在也用于佛像中^⑤。注释 152 中已经列出这种表示头发的例子,在此我们

只是补充这样的事实:这种头发通常是像药叉的人物所有,这可能是让雕刻家们把它也用于佛陀头上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大众心目中佛陀接近于药叉的概念,至于最早的佛陀像几乎完全摹仿业已存在的药叉像,而药叉和君主颇像。更不用说,当秣菟罗的雕刻家们经过一度奴隶般地摹仿犍陀罗作品后,已经成功地脱离了这种复制,又开始根据他们古老的传统来表现佛陀,他们在佛像的几个特殊部分中恢复使用自己古老的技巧或传统。同样,当这些雕刻家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寻找表现波浪形头发时(也许因为从长远看,这种一排排半圆线的技巧令人不满意),他们便又重操他们所

熟知的表现波浪形头发的方法。

论及这种变化,库玛拉斯瓦米认为:瑟尼沙相(usnīsalaksana)可以被译为“注定要戴方头巾的”。他认为如果假定在较晚的时代,即公元2世纪中期的话,肉髻这个词是由“方头巾”变化为“头盖骨上隆起部分”就能得以解释。他是这样认为的:“……为了试验当时佛陀表现是否得当,那些古书当已被翻遍,自然关于lakkhanas的段落会首先被查阅到,因为它们组成了当时适合该主题的惟一的“Śilpasāstra”。据认为,被认为是幼年期的lakkhanas,现在肯定仍为幼年期,所以 unhīso - siso 一定要被译为身体的外貌。结果瑟尼沙(unīsa)和 unhīsa 便被表现为隆起部分。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剪发被重新解释为导致了短圆发圈平头的出现,而不是简单的发卷产生^⑧。因此,根据库玛拉斯瓦米的观点,表现头发的方法的变化是肉髻这个词意义从“方头巾”变为“隆起部分”的结果,它们大致是同时发生的。

在大多数浮雕中,我们可见到佛陀把头发抓成一束,并用剑割下,通过这个事实库玛拉斯瓦米试图说明佛陀头上由一个大圆发圈,突然变成布满全头的无数较小的发卷。库玛拉斯瓦米认为这种削发方法不可能使佛陀头上的头发一样长。不过 Nidanahatha 声明,“头发变为两英寸长,均呈发卷状,从右侧紧贴着头,仍保持着和他活着时的头发一样的长度^⑨”。由此,库玛拉斯瓦米得出结论说,“人们肯定会相信,其头发不是一下子就剪成的,而是多次剪成的,使得满头的头发一样长,如果要和文学传统一致,而且方头巾和头发要一起去掉的话,那么这种发式的处理方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表现许多发卷似乎使该程式和文学传统相对应得更密切。但是还不止于此,我们不能说为什么只是在造型表现上出现这种变化,特别是实际的秃头(削发)继续是也总是被表现为剪去一束头发。不过,不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不管它首先出现在何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文学传统和造型传统共同

为佛陀头发要么表现为一个发圈,要么为许多发卷提供了理性的和充分的说明^⑨。”

以上就是库玛拉斯瓦米关于佛陀头顶布满蜗牛壳状发卷来源的解释,虽然他承认说不能确切知道为什么在造型表现方面引进此变化。科诺所持的头盖骨隆起应该追溯到崇信出生身体带有“胎膜”的说法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⑩。这两种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在我们试图就此棘手的问题系统地阐述我们观点的要点前,让我们首先总结一下福色尔的观点。

在前面提到的库玛拉斯瓦米的文章中,他把该观点总结如下:

“犍陀罗雕刻家制作最初的佛陀形象,以传统的发束表现头发,而这些发束又拢成印度式的发结,考虑到审美原因而避免表现成隆起部分。印度摹仿者不满于和既成事实如此明确分离,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菩萨理发,把犍陀罗式发髻解释为覆盖隆起的头盖骨,认为这种隆起部分就是词语 Mahapādāna (sic) Suttade Unhisō - siso 所指的东西;它们用短发卷代替长发(多少和 Nidanakathā 保存的传统一致),使头盖骨隆起部分非常明显。在此情况下,犍陀罗雕刻家显然接受他们印度兄弟的更正,因为带有隆起头盖骨型的佛像不久即在这两个地区居支配地位^⑪。

让我们看一下福色尔在他的《希腊型佛教艺术》第2卷第297页所谈的:

“而且,实际上,犍陀罗的陈规刚刚创造出了肉髻的全部——在接受佛教及瑟尼沙之后。至于那些创造典范的人们,他们在此图案的奇异变化中什么也没有做。这或许是他们受谴责的过错之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领会到人们以一种希腊式的 *crôbyle* 掩盖畸形的肉髻是对他们的恭维,而他们并没有提出问题。^⑫”

库玛拉斯瓦米对福色尔的理论错误理解为,印度那些摹仿其西北部佛像的人们(即秣菟罗流派)用短发卷罩着头,以对付拘于书本的虔诚的信徒们的反对^⑬。福色尔显然意指那些在犍陀罗本

地发展中出现的追随者们,也指这样的事实:只是根据那些出自犍陀罗雕刻样品,他陈述了这种头发的缓慢变化^⑩。

而且,库玛拉斯瓦米并没理解福色尔的如下观点:当犍陀罗制作第一尊雕像时,肉髻这个词还并不是意指“头盖骨的隆起部分,而且这个词的意思发生变化也只是后来的事,当时信徒们劝勉雕刻家们表现佛陀时要更合于传统。瓦尔德施米特认为以此来说明相的名单中的古代性是不可能的^⑪。不过,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这其中有一个相不可能在意义上有这种变化,即使承认在此前很久它已并于相的名单中。但是,除此之外,很清楚肉髻相只是后来被佛教徒们添加到该名单中的,因为在摩诃沙富罗(Mahāpurusa)的其他名单上并未出现此种情况^⑫。

我们非常同意福色尔“预先”所说的犍陀罗佛陀发式并不意味着头盖骨中的隆起部分。相反,考德林顿则认为这种自然的波浪形发式意味着试图掩藏瑟尼沙^⑬。印度西北部艺术家们只是表现一个发圈,而且大量佛陀头像所呈现的绕着顶结(有时是表示正面的一块宝石的插口)的带子并没有强调什么,这种事实意味着要把头发拢在一起(见图7和图41)。这清楚地表明在起初时瑟尼沙尚没有“头盖骨隆起的部分”的意义。我们已经试图表明秣菟罗也有同样的情况,请读者参考本章前部分所述。这些虔诚的信徒对这些头发呈发圈式的佛陀表现法感到震惊是非常不可能的。相的名单不也提到佛陀头上的“瑟尼沙”(发圈的含义)了吗?而最后声明右边的发卷(这和库玛拉斯瓦米所认为的头上许多发卷不必相称)可能也指的是劫婆吒^⑭。总的说来,这种摩诃沙富罗身体特点的描述不止一种解释或翻译,这就是为什么谈及此就会有如此多的观点。我们的确同意福色尔所说的头盖骨隆起的源头肯定和表现头发的变化有关。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所发生的地方是秣菟罗而不是犍陀罗。

我们相信库玛拉斯瓦米的错误在于他把发生这种变化的次序

弄颠倒了,因此,在他看来,Nidnakathā 的传统及其他经文应该预先决定佛陀像的外貌。此外,库玛拉玛斯瓦米和福色尔并没有注意这一事实:在已经提到的表现头发的两种方法之间,还插入了一种方法,即用小的半环形线表示波浪形头发^⑩。

在我们看来,这一进程的线路可能如下:只要该头发表现得光滑,头顶有缠绕的发卷,那么显然是在秣菟罗,瑟尼沙是一簇头发,而不是一个隆起的头盖骨。此后,又是一个阶段,在头发光滑的表面刻上卷曲线。遗憾的是,这种表示头发的技巧肯定被当作秣菟罗雕刻家们摹仿犍陀罗佛像波浪形头发的尝试,同样,也有表现头顶发卷的尝试。当时毫无疑问,仍知道头顶升起的部分表现的还是一个波浪形的结,而不是头盖骨的隆起部分^⑪。经过一段短一段时间后,这种使用小的半环形线的技巧因某种原因不再令人满意,取而代之的是蜗牛壳状弯曲的技巧,也可能是由于此种表现卷曲头发的方法更为人们所知,并且比其他方法对秣菟罗人民更具吸引力;而且如我们所见,药叉成分在早期佛陀像上更为突出,这种事实可能也起作用^⑫。

在那些小半圆环形线表现覆盖头的长发之时,仍可知道头上的隆起部分是个发结。这已为班纳吉所复制的那尊佛陀头像所证明,该像的头就是已为半环形线所覆盖,不过瑟尼沙仍被表示为卡帕叮型的缠绕着的发顶结^⑬。这在犍陀罗的一尊头像上还出现过,该头像现藏于慕尼黑人类学博物馆(见图 411),它也呈现为小的中环形线,可能是反过来又摹仿秣菟罗,因为在犍陀罗这种头发表现法是例外,而在秣菟罗一段时间内则非常普及。该头像有一个带子绕着发结,把头发束在一起,正面有一个宝石插口(现在已经消失),这种蜗牛壳状的发卷的确能够产生短卷发的效果,不过当在秣菟罗这种头发开始在同样的头形上出现的时候,发结的印象最终失去了,所以人们认为那表示的是隆起的头盖骨而不是发结。这样的结果,词的意义再次发生了变化,此时从“发卷”变为

“头盖骨的隆起部分^⑧”，因此，我们认为，词意的变化相对于造型变化是次要的，并非像库玛拉斯瓦米所认为的是主要的。福色尔认为造型变化首先发生于犍陀罗，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我们不赞成他所说的发生原因：“是由于……信徒们信仰通过过于显著的矛盾冲撞而完成，这种冲撞是发生在内涵丰富的发髻与佛祖教义及关于秃顶上的条文之间^⑨。”虽然我们承认瑟尼沙（被理解为发卷）从开始时被列入佛陀相中，然而我们不同意瑟尼沙（被理解为隆起部分）总是被当作相之一，我们更认为该观念只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出现的（当然最早是在迦腻色迦时代第 1 个世纪末），其原因是由于受印度西北部雕刻的间接影响。

我们认为瑟尼沙最初并不是按规范固定的，因此并非所有相预先得以决定。此观点由另一个相的例样所证实，该相直到较晚的时候，即网相（Jalakasana）时候才得以固定下来，我们该把此网状物和佛陀手指相联系。根据福色尔^⑩和班纳吉^⑪的观点，该相起初是指双手的手掌线，以及脚底线。福色尔认为最后它有了“手指间的网络”之意思。班纳吉反对此说。他认为这种手指间的联系仅仅是现在，因为手指需要支撑以免破损。这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雕像上的手指并不是单独的，因此并不需要这种手指间的网状物来进行什么支撑^⑫。因此，此网状物实际上成了该佛陀的生理特征。

这情况的另一个证明是中亚的壁画。其中手指肯定不需要支撑，然而也有格子状的网络^⑬。班纳吉不可能解释这是技术上的需要。随着其发展，我们看到这些手指的表现是如何总和秣菟罗流派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图 39 和图 40 的佛像中，大拇指开始和其他手指相分离，但仍有个联系，这一点我们在较晚的雕像中一再发现。由此，我们认为它是佛陀手指间的一个网络之说是可以接受的，而最初它只是雕刻家们的一个预防性措施。

斯塔特赫姆（Stutterheim）相信^⑭网相指的是，当合着的双手逆

光放着时手指间粉红色的光。库玛拉斯瓦米较大程度上同意此观点^⑩。最后科诺认为手指间的网络可追溯到一种普遍的信仰^⑪。从长远的观点看,网相毫无疑问并没有保持斯塔特赫姆所赋予它的意思。在我们看来,从中亚的佛陀画像手指间的网络的绘制上,甚至从犍陀罗较晚期佛陀像手指间的网络绘制上,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⑫。早在公元 2 世纪,它已经被看作是佛陀身体的一个特征,证明在萨赫斯 - 马赫斯佛陀手指间的联系格子,肯定有某种原因(见图 43)。一方面,这种格子和中亚壁画上佛陀手指间的各自结构的网络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我们还记得使用词 *jāla* 表示格状窗子。

· 如果要选择网相的原始意思是“手掌上的线条”或者是“透过合在一起的手指的粉红色的光亮”的话,那么前者对我们来说似乎更可能,因为词 *jāla* 的意义等于网或格状网。因误解和生搬硬套,一种雕刻家的技巧最终被理解成业已存在的佛陀的相,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我们推测秣菟罗的瑟尼沙相是被创造出的:起初,它被理解为发结,因为佛陀不可能戴王族的方头巾,后来由于受印度西北部的影响,再后来生搬硬套,以及作为隆起的头盖骨的拙劣制作,至其演变的最后阶段,人们努力通过适当改变某个业已存在的相意思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议题上,参考图 37、图 39 和图 40 中的佛像,即饰有光环的佛像来讨论萨赫斯 - 马赫斯佛像和希塔拉 - 噶提佛像之间区别的最后一个要点。后者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除了下垂的衣边外,内面似乎全部饰有装饰性镶边,中央是花瓣。由于该光环大部分毁掉,遗憾的是这不能恰当地得以确证,但是在雕绘于基座正面的菩萨像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辨别这些镶边,而萨赫斯 - 马赫斯的佛陀在其光环中央仍是花瓣。此期或稍晚的几个耆那头像的光环保存较好,例如,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

Tirthankara 头像,该头像于 1901 年由枢密院的印度大臣赠送的,年代被错误地确定在公元 6 世纪(见图 57)^⑧。

在印度艺术的很早时期,我们经常发现从一朵花中出现一个头像。扶栏的最古老装饰,就是由玫瑰花饰组成^⑨,这些花儿盛开,被分成石雕纪念像柱。当使用更多的装饰时,就要添加些神话中的动物,如带翅的公牛,一只法轮等,这些都被置于玫瑰花饰中^⑩。可能是在较晚的发展阶段中,人头雕像被置于类似的玫瑰花饰中。我们发现在巴尔胡特艺术中以此法表现人头相当有规律^⑪。在开始时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秣菟罗耆那教的雕像里,āyāgapatas 在耆那头后面显出一朵盛开的莲花^⑫。很可能这个主意是早期在玫瑰花饰中央表现头像的习惯。

在较古老的秣菟罗佛雕中,我们多数情况下发现光环只是个简单、光滑的圆盘,带着著名的扇贝边^⑬,我们或许解释这种扇贝是表现环绕头的光线的最自然的方法。无论如何,很显然,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光环要求类似的形式,例如,在较晚的东爪哇艺术中^⑭,以及在巴厘人(Balinese)艺术中^⑮,天神发出的光柱(所谓的 Hajapahit 光环)有着类似的扇贝边。随着时间的流逝,秣菟罗雕刻家对光环越来越进行装饰,最后,他们开始在光滑的圆盘上表现花环的镶边,用装饰性的饰物把这些镶边间的空地方完全填满。在中央放着一朵盛开的花儿,圣人的头即出现在其中,和萨赫斯-马赫斯的佛陀一样。辐射开的花瓣饰极为出色地摹仿一个光环的光柱。这种表现使我们想起巴尔胡特的栏杆,这些栏杆早在若干世纪前就已经开始用花饰环绕头像。或许自从巴尔胡特后,这种环绕被崇拜者头像的花饰就已经保存下来了。在一个早期的 āyāgapata^⑯上,耆那人物后面的莲花或许可以支持此说。在出自秣菟罗流派中较古老的雕像的光滑的光环上,可能已经绘制花饰,因为在印度艺术中,由泥水工或者画师对佛像进行最后的细节修饰。在较晚的时代里,雕刻家们肯定又回到用凿子雕刻光环装饰的习

惯之上。

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两个佛陀,它们是如此相似,以致于我们可谈到一种类型。其他几个雕像有着极为相同的特点,它们均属于此类型,例如,保存在柏林人种博物馆里的那尊佛像^⑨。该雕像基座上有一则铭文,其文字肯定是贵霜晚期的。遗憾的是,在年代上的这种十进位制已经损毁。我们不知道这则铭文是否已经刊布,因此我们列举如下,这是我们从瓦尔德施米特文章中复制的雕像中识读出的:“…… 5 asya prūvāya bhayavato sak(y) amunisya pratimā pratist(h)āpita Devila……”。

可能此种类型的另一尊雕像是秣菟罗博物馆中第 A.22 号雕像。不过,沃格尔的描述是非常简短的^⑩,可是因为他指的希塔拉-噶提雕像,似乎存在一种相似性。

山奇的一尊佛像显示出此发展的一个稍后阶段^⑪,其蜗牛壳状发卷变得较小。这是我们知道的呈禅宗手印的最古老的单个雕像(不算犍陀罗)。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说明我们年代确定得正确的证据,所讨论的这类佛像要比图 39、图 40 中大约为迦腻迦时代 51 年的要晚,(从萨赫斯-马赫斯佛像上铭文的字来判断)它们实际上大约属于公元 150 年到公元 185 年之间的,而且当把这两个佛像和安亚的那尊佛像以及图 37、图 40 中的佛像相比较时,其区别是很大的。鉴于此,我们更倾向于它们是属于上面所列年代末的。而且,大量这样的区别表明,在公元 2 世纪下半叶,秣菟罗出现了一个变化过程,由于受犍陀罗的影响,一些成分被当地的古老成分逐出并被取而代之;其他一些成分则又被重新改造并被融入秣菟罗艺术中。

可否有可能通过这中间的雕刻,消除图 17、图 39 及图 40 中佛像和出自的萨赫斯-马赫斯及希塔拉-噶提障碍,以便更精确地确定其年代呢?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处于上面提到的两类雕像之

间的惟一一件雕刻的复制品,即 Kāman74 年的那件雕像^⑧的复制品。

不过,有另外一种粗略调查处于这两个时期之间这段时间的办法,即借助于出自该时期耆那教这段时间的办法。我们有 7 张 Tirthankara 雕像的照片,其中 6 个字迹清楚。其中一个(图 45)提到 80 年^⑨作为奉献这尊雕像的日期;另两个提到 83 年^⑩(见图 46);还有两个提到 84 年^⑪(见图 47 和图 48)。最后,我收到一幅耆那像的照片,其年代是 98 年,该照片是通过拉克诺省博物馆^⑫馆长纳盖先生的善意帮助获得的(见图 49)。由于所处环境糟糕,所有 6 尊雕像的头和光环均失去了,而且,有两个基座也损毁严重,遗憾的是不可能从这些细节上得出什么结论。就这些雕像而言,仅有一个非常脆弱的线索可以追循,因为它们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尽管如此,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联系(这联接起了佛像发展线索上的中断处),藉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当然,也有不利处,就是对其衣饰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因为 Tirthankara 雕像是全裸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 6 尊耆那雕像,它们极强的一致点立即给我们以深刻印象,这种一致处当然是由于它们几乎是同时制作的原因了。很显然,它们的手总是呈禅宗手印平放着,请注意它们的大拇指尖互相触及。所以我们认为是耆那像的普通一个。所有迄今讨论过的佛陀像都是呈施无畏印举着双手,浮雕中的人物则是例外;它们显然是盲目摹仿犍陀罗雕像的结果,可能是对佛陀生活中著名场景的陈腐表现。

从这 6 尊雕像中之一,即图 48 中标有 84 年雕像可知,其左上臂及肩膀后面的一小片光环仍保留着。我们从中仍能发现著名的扇贝边,它是刚好在镶边的内侧,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更为精致的光环装饰阶段在迦膩色迦时代 84 年(等于公元 162 年)就已经开始。这些基座还提供了另一个比较点,小狮子的头都突出到顶板之上。图 45 和图 48 中的耆那有两个狮子,狮头转向内侧。图 47 中的雕

像也有狮子,狮头几乎直对向正面。图 46 中的耆那基座不幸损毁到如此程度,以致对狮子头的姿态不可能再加以说明。最后,和所有前面的狮子相比它们肯定是高浮雕。而且它们的胸膛明显外凸,身体微微内倾。所有这些特点均和雕刻进一步发展阶段相背离,并且该耆那雕像和图 43 和图 44 中的佛陀相关联。

在所有这些仍可辨识的狮子中,狮鬃不再是呈三角形,且其中一个角在正面垂下,像安亚佛陀像中的那样,狮鬃在下方呈圆形轮廓,也下垂得颇低,实际上已到胸膛中部;不过图 45 中 80 年的最早的雕像例外,该雕像中的狮鬃并没达到胸部中间。图 47 中狮头上的毛发(狮子直对正面)仍然有我们在图 40 中所见到的三角形。而且,所有可辨识的狮子舌头外凸,他们的身体略微内倾。这是在图 49 中的耆那像上及萨赫斯 - 马赫斯佛陀中最终可见的一种果断的表情。在所有狮子中,强烈外凸的眼睛非常值得注意。我们在图 43 和图 44 中再次见到这些眼睛。

在两头狮子之间空白的中央总是雕绘一个小场景,在一个带着权轮象征物的小柱子两侧有许多信徒,而不象在迦腻色迦时代 51 年后的佛教雕像中众多的崇拜者崇拜一个人物。以上这种事实使我们相信这是耆那雕像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在此点上,他们仍固守着崇拜一个象征物,而不是崇拜一尊雕像,这种情况是过去的一个特点。总的说来,耆那教更固守传统。形成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没有像佛教那样受到那么多外来的、奇怪的影响,佛教在早期受来自印度西北部思想和传统的影响,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并最终形成了佛教。佛教藉其极强的适应性及其传教的推动,极易吸收并同化在其周围传播的宗教思想。佛教得以发展成一种世界性宗教——一种在扩张冲动和吸收力之间永远持续的循环。和此相对照,耆那教并没有受如此多奇异的影响,更具保守性,因此,它并没有获得能使其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外国信徒——一种反向的恶性循环。耆那教就这样仍维持一

种典型的印度宗教,它保持了一些佛教所缺乏的古代特点。

让我们再回到带有铭文的 6 尊耆那雕像上,我们能够最后总结如下:他们的脚底都相当平,且处于同一平面上。因为只是最初的 5 个基座有着非常低的浮雕,因此我们刚好也称之为浅浮雕。而且,从其年代上,即 80 年所确定的各种对比要点来判断,图 45 中的雕像在发展进程上显然要稍早一点。首先,狮鬃并没有垂过胸膛。其短腿上胸膛的形式特别使我们回到我们在安亚佛像上所见到的狮子形式,是结实的小怪兽,只是尚缺乏身体结构。另一方面,狮子已把头向内转,结果使得狮子身体也有点向内转,该雕像的这一特点也清楚地和 82 年及 84 年的一系列雕像相关联。在刚提到的雕像中,狮子的腿已经变得较长,这使得狮子看起来较高,这出现在图 49 中耆那雕像上的狮子发展方向之前,也出现在萨赫斯 - 马赫斯及希塔拉 - 噶提佛陀像上狮子的发展方向之前。

这 6 个雕像本身的身材清楚地延续着秣菟罗古老民族流派的传统,卡帕町佛陀也属此派。因为这一点,这些雕像也类似于萨赫斯 - 马赫斯佛陀,因为这些已经再次假定这种身材在秣菟罗古老流派中是很平常的;腰窄,双肩并不下垂而是倾向于变成近似方形,例如当我们和图 37 中的佛陀比较时,这一点非常明显。最后,和刚才提到的呈三角形的构图空间相比,这些雕像的构图空间接近四边形。

概括一下,光环装饰,狮子头突出到顶板之上,鬃毛的形状及其头上毛的形状,外凸的舌头,内转的身体,整体而言浮雕略深,耆那方形的肩膀,以及作为结果,形成的四边形的构图形式,所有这些特点表明这样的事实:这些耆那像大约属于迦腻色迦时代 51 年的雕像及萨赫斯 - 马赫斯和希塔拉 - 噶提雕像之间某个时期。姑且不说图 49,这些耆那雕像(特别是 4 个较晚的)和最初提到的那组雕像间的区别要大于这些耆那雕像和最后提到的那组之间的差别,因为在所比较的 8 点中仅有 2 点(狮子头的形状及此浮雕的稍

深的深度)较第二组更类似于第一组;另一方面,其他6点则和萨赫斯-马赫斯及希塔拉-噶提的佛像更为类似。我们的结论是,从编年学上讲,这些耆那雕像更接近于后一组佛像,而不是前一组。这样,在图39和图40这组较古老的佛像的年代和耆那教的雕佛之间有一个30到35年的空档。假设,在这些耆那雕像和较晚那组佛陀像之间的时间是20年,那么,我们就得出一个大约是迦腻色迦时代100到105年的年代,或者大约为公元180年,或者更粗略地说希塔拉-噶提和萨赫斯-马赫斯的雕像是公元2世纪最后25年。这样,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借助于耆那雕像来填补覆盖公元130年至180年间一系列佛像的空缺处,能够寻出经由耆那偶像到98年的耆那(图49)以及大约是迦腻色迦时代第二世纪初的萨赫斯-马赫斯及希塔拉-噶提佛陀的模糊线索。

我们正在排列的这个时期的浮雕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填补此空档的方法。在此,要先假定在某个过渡期内,秣菟罗的雕刻家们喜欢复制某些印度西北部的场景,由于无尽的重复,这种复制在那儿变成了老陈套。这些已成陈规的复制品在秣菟罗艺术中很容易被认出来(见插图1)。不过要为他们确定年代通常是困难的,因为秣菟罗雕刻家显然也尽可能忠实地摹仿表现鞞陀罗罩着双脚的坐佛。在秣菟罗,这种场景如此陈腐,例如,佛陀总是要使双脚及双肩罩着,长袍衣褶成对称性;因此很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此陈腐的场景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时段里,其时秣菟罗艺术本身已经抛弃了这种雕塑长袍的阶段。

现收藏在秣菟罗寇松博物馆的一尊浮雕,也是毫无疑问属于刚才描述的这组复制品中的^⑩。它以前是表现佛陀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一尊雕刻的一部分。在此残片的左侧,我们看到佛陀圆寂(Parinirāvna),在此残片左侧则是法轮在转动,或者是在鹿野苑初次说法。不过,光环的装饰比图36中佛陀的更为精致;而且,在我们看来,头发尚未表现出蜗牛壳状发卷,而是小半环形线,这种事

实意味着其年代当在公元 130 年和公元 180 年之间。

一个现收藏于拉克诺省博物馆^⑧的残片提供了另一例这种复制品。由于损毁严重,遗憾地不能确定它先前为何种雕刻的一部分。不过,该残片显然是某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从伸向左上方和右上方厚厚的缠绕的绳子或者花环可以看出。也许它形成了一尊菩萨像的头饰一部分。秣菟罗寇松博物馆有一残片即和此件相似^⑨。佛陀坐在一朵莲花上,侍僧分别在两侧(可能是因陀罗和梵天),也是各坐一朵莲花。秣菟罗民族流派的佛陀也总是在左右两侧各有一位侍僧倒是事实,只是无论佛陀还是侍者并没有站在或者坐在莲花上。这件带有三个坐在莲花上人物的雕像的整体构图和处理方法给人一种强烈的印度西北部的印象。而且,呈禅宗手印坐着的佛陀人物确定了该件出自犍陀罗的作品是复制的。因为,很显然这种卡帕町型的佛像只是呈施无畏印,从没有呈印度西北部非常流行的其他手印。

由于损坏,遗憾的是,还不清楚发式的原样。对称性的衣褶表明该组雕像大约属于公元 130 年,受犍陀罗的影响。光环也只是对垂边的古老而简单的装饰,所以我们倾向于把这件雕刻确定在公元 130 年左右,但是我们再次涉及到我们对那些给人以复制印度西北部艺术作品印象的雕刻确定年代的评论。

对这些浮雕定年代困难较小,它们表现的是秣菟罗流派各个发展阶段的佛陀人物,其间雕刻家们反映的是当代风格。图 50 中的就是这样一件雕刻^⑩。它可能表现一排佛陀,其中我们有几件是出自犍陀罗和秣陀罗。总的来说,乔达摩连同其 6 个前身及弥勒佛一起加以表现。在图 50 中的残片上正面右边,三个佛陀及弥勒佛仍保留着。显然在该浮雕最左边可见一个卡帕町型佛陀。由此可得出结论是:卡帕町型雕像和摹仿印度西北部佛像的一种新型佛像继续并存了一段时间,该种新型佛像是我们在大约公元 130 年左右的秣菟罗艺术中发现的。让我们更为仔细地研究一下

该佛陀人物：他的左肩由长袍覆盖，他的左臂显示出颇具特点的衣褶，他的左手握成拳头，放在膝上，而其右手以通常的卡帕町型姿态举起，即以施无畏印型举与肩齐。在该浮雕中，我们同时遇到两种类型的佛陀的雕像，藉此良机，我们可以观察每个佛陀手举的高度的不同。我们也相信左边佛陀的手多少更向内一点，而其他人物的手掌直直地举到前面。所有列举的这些特点完全和我们所习惯的卡帕町类型佛陀像的表现法一致。但是，从头发的处理来看，秣陀罗雕刻家并不是完全没受犍陀罗的影响，因为，用制作光滑的肉髻代替了光滑的头发，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整个头上有着著名的半圆线，以水平的方式排列三排或者更多，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传统型佛像上发生了某种变化。该浮雕（指受犍陀罗影响的那类佛雕）中的其他佛像总的方面表明其年代属于安亚佛陀后及萨赫斯—马赫斯佛陀前的某个时候。虽然佛陀的脚和腿仍全部被外套罩着；衣褶不再呈对称状，而是直直地从他们左肩垂下，像一面扇子样伸开到右肩。头发的处理是呈半圆线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光环的装饰比图 39 和 40 中的有进一步的发展。双手直转向前面，手指垂直向上，和乳头齐高。最后，脖子处的衣褶并没有呈尖 V 形。所简单总结的这 7 个特点，证明这些佛像就其风格发展而言属于公元 130 年到公元 180 年之间的这个时期，因为它们的品质和第一次提到的那一年的佛像及第二次提到的那一年的佛像一样。因此，该浮雕肯定属于过渡期的，该过渡期是在佛陀双脚被罩着及外套衣褶从双肩上对称性垂下（如图 37、图 39 和 40 中的佛像），这个时期和流行扇形衣褶（即使双肩仍旧罩着）、双脚及腿的下面部分裸露（像在萨赫斯—马赫斯佛像中的）这个时期之间。

还有两个佛雕要加以考虑。第一个见图 51，可能又是表现带弥勒佛的一部分^⑨。在此，像图 50 中的浮雕一样，弥勒佛坐在该残片的最右端，4 个佛陀则在其左侧。我们有案可查，发现两类佛陀像同在一起，所不同的是，摹仿犍陀罗的佛像（左起第二和第四

个)现在也是裸露双腿,其长袍的衣褶呈扇形。不过,头发仍是由水平状的数排小半圆线表示。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该雕像也是属于公元 130 年到公元 180 年之间的过渡期,像前一个浮雕一样,它和大约为第一年的那些佛像及大约为第二年的佛像有着共同的特点。不过,由于这些受印度西北部影响的佛陀也呈现出裸腿,该浮雕在发展上要比前面讨论过的那件要稍晚一些。

要考虑的第二件浮雕是图 53 中的那件⁴⁰。像前一件一样,该件雕刻是个过梁。它分为两层。上层表现的是佛传中的三个场景。由于这些场景都是老一套,秣菟罗雕刻家们经常机械地从印度西北部艺术中复制,该部分浮雕里的三个佛雕中的两个衣服罩着双脚及腿,这一事实是它们大约属于公元 130 年的一个不必要的说明,这已为该浮雕的较低的部分证明。这一排著名的佛陀可能又被表现在此(只有两个清楚可辨,第三个只有部分可见),另外,该残片右边还有两个菩萨,其中最右边的一个可能是弥勒佛。在最左边,有个人物的局部仍可看到,从其左膝上紧握的双拳判断,可能是一个卡帕町类型的佛陀。在这两个可见的佛陀中,左边的一个双肩罩着一件扇形褶的长袍,赤脚,裸腿,头发被表现成小的半圆形线。简而言之,这是我们在前一件属于公元 130 年至 180 年过渡期浮雕上也已经发现的类型(根据该裸露的腿看,可能要更详细地讨论该佛像。)

右侧的佛像也是裸腿,光脚,头发被表现成水平排列的半圆线,不过,从他手(呈施无畏印)举的高度及可看到乳头来判断,他的双肩裸露,所以,这是我们迄今习惯从受犍陀罗影响的佛雕中看到的。和在前面讨论过的那个佛雕中的垂片是该件雕刻中的一个次要的成分,该种出自受犍陀罗影响的类型显然也为卡帕町类型所复制。因此,我们看到由于源自印度西北部成分的注入,卡帕町类型佛像变化越来越大,把该浮雕确定在公元 130 年到公元 180 年更多的原因就在于此。另外,这种受犍陀罗影响的佛像类型,在

秣菟罗由于印度西北部成分的引入而马上起了些轻微的变化(因为秣菟罗雕刻家并不能正确地复制所有细节),最终复制了卡帕町类型佛陀的所有类型:双腿的下半部分及双脚开始出现,头发以民族的形式加以表现。因此,在该过渡期内,我们看到这两种类型的佛陀是怎样相互融合的。它们最终存在的惟一差别是裸露的双肩,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几乎被表现得完全一样。在印度,直到佛教艺术结束,右肩覆盖或裸露的这两种佛像类型一直同时存在。当判断在前面所讨论的浮雕时,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头发借助小半圆型线表示肯定要比用蜗牛壳卷表示更古老。这是正确的,该观点为以下事实证明:诸如图 39 和 40 中的雕像(从风格批评及铭文根据上看肯定较为古老)表明呈半圆形线技巧的发式。而像图 43 和图 44 中呈现有犍陀罗影响的雕刻中,我们在下列几种雕像上都发现了这些半圆形线:双腿及双脚覆盖的、衣褶呈对称性的雕像,衣褶呈扇形、双脚覆盖的雕像,以及双腿裸露、衣褶呈扇形的雕像,头发呈蜗牛壳状、双脚及双腿覆盖的雕像,外套衣褶对称或呈扇形、双肩罩着的雕像。不过,这种佛像的存在仍是可能的,因为刊布的秣菟罗雕像的数量仍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表现头发从半圆形线技巧到蜗牛壳状发卷的变化,发生在从对称性衣褶外套到扇形衣褶变化之后。我们也能够说这种最后的变化发生在裸腿创新引入到受犍陀罗影响的类型之前,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双腿裸露及长袍衣褶呈对称性的佛雕像,只知道双腿罩着及长袍呈扇形衣褶的雕像。

因此,按编年学次序讲,在从公元 130 年到公元 180 年左右的转变期里我们可见到佛像上的三个变化:

1. 从对称性衣褶外套到扇形衣褶;
2. 从双腿及双脚覆盖到裸露着;
3. 从用半圆形线技巧表示头发到用蜗牛壳状发卷表示头发。

在整个过渡时期,借助于一排排水平的半圆线来表示头发的

方法仍在时尚中,仍能够探寻到某些变化。例如,我们发现额头线呈水平状的头;正如卡帕町类型雕像的那种情况一样,尽管这些头上把头发表现得很光滑。大英博物馆(见图 58)中的耆那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认为把它定在公元 6 世纪是不正确的,而该是公元 130 年左右到公元 180 年左右。这类雕刻的额头线从一只耳朵顶端横到另一只耳朵的顶端,在头侧面几乎没有附加任何半圆形线条(见图 69)。例如,这和图 70 中的佛陀头及其他一些佛陀头是不同的^⑩。在此,佛陀额头及头发间的分界线在额头上呈现为强有力的弓形,两头落在双耳之前,以致于它似乎成了连鬓胡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双耳旁发现了 4 条或更多的半圆形水平线。在雕刻家开始借助于蜗牛壳状发卷表现长发后,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排排发卷几乎呈水平状横过额头,在发卷最低一排的下方,左右两边各有两排短短的水平发卷,刚好处在双耳的前面,这使额头线呈现出弯曲的形状。例如,可参照萨赫斯-马赫斯佛陀(见图 43)和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耆那像(见图 57)。由于这一特点和较晚期的佛像及耆那像相符,所以我们认为,从风格发展来看,头上带有一条强有力的额头线的头像,比那些额头上带着几乎为水平线的头像要晚。

还不能准确说明在转变期这 50 来年里,上面所讨论的这种变化中每一种占多长时间。总有些雕刻家要么迟于要么早于总的发展阶段。更不要说下面所要叙述的发展阶段缓慢地相互融合。很可能在更晚的时代,当秣菟罗流派已经把复制犍陀罗雕像转变为一种双腿裸露的雕像类型时,但仍还有复制印度西北部雕像的。粗略考虑一下,那么从公元 130 年左右到公元 180 年左右这段转变期的发展纲要或许可以总结如下:

公元 130 年 左右的情况	第一个 转变期	第二个 转变期	公元 180 年 左右的情况
对称性衣褶 →	扇形衣褶	扇形衣褶	扇形衣褶
双腿覆罩	双腿覆罩 →	双腿裸露	双腿裸露
头发呈一排 排的半圆线	头发呈一排 排的半圆线	头发呈一排 排的半圆线	头发呈蜗牛 壳状发卷

最后,我们愿把所讨论的浮雕置于上述纲要中。从扇状衣褶的外套、罩着的双腿、用一排排的水平状小半圆线表示头发等来判断,图 50 中的雕像属于第一个转变期的。图 51 中的浮雕属于第二个转变期的,这是从扇状衣褶的外套、裸露的双腿和双脚、以及用半圆线表示头发来判断的。最后,图 53 中的佛像如上一个一样也是属于第二个转变期的,因为佛陀像具有相同的特点。不过,如果在雕像发展系统上把该雕像放得比前一个稍晚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做是由于卡帕町类型的佛陀不仅双腿裸露、头发表现为布满头的半圆线——图 51 中浮雕上的卡帕町类型佛像也如此——而且还由于佛陀用手提起外套的垂片。

注 释:

① 麦喀斯泰恩斯:《印度》,50,13,比较 56,13。

② E. W. 霍普金斯:《印度伟大的时代——它的特点和起源》,伦敦,1901 年,第 95 页,注 1。可能由拉克哈尔·戴斯·班纳吉在它的著作中公布的这个词 *pāmcāliye* 是对此点的确证,见班纳吉的《斯基泰时期的新婆罗迷铭文》,载《印度铭文》,第 10 卷,1909 - 1910 年,第 106 - 121 页,特别是第 107 - 108 页。同一作者以 R. D. 班蒂尧帕蒂亚亚的化名刊布于《斯基泰时代七则年代新定的记录发现记》,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新系列,第 5 卷,1909 年,第 271 - 277 页,特别是第 271 - 272 页。遗憾的是,正如路德斯在它的文章《关于拉克诺省博物馆中的一些婆罗迷铭文》中所说明的那样,这些铭文的出处不确定,该文载《大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12 年,第 153 - 179 页,特别是第 175 - 176 页。

③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载《亚洲艺术》,第 15 卷,巴黎,1930 年,图版 502

和 503(a),另两个雕像出自秣菟罗附近,见 V.S. 阿格拉瓦拉的《秣菟罗的前贵霜艺术》,载《省际联合历史学会学刊》,第 6 卷,1933 年,第 81-120 页,特别是图 1-3,6,9-10。

④ 普陶莱米:《Γεωγραφικὴ ὁρογραφία》第 7 卷,1,50,由 L·瑞诺编辑,巴黎,1925 年,第 23 页。

⑤ 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 年。第 251-253 页。

⑥ 温森特·史密斯:《耆那卒塔婆及秣菟罗其他古迹》,载《新帝国系列》,第 20 卷,阿拉哈巴德,1901 年。

⑦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第 2 卷,图版 74 及其叙述。

⑧ R. 皮瑟尔:《普拉克里特语语法》,斯特拉斯堡,1900 年。

⑨ R.D. 班纳吉《出自柯萨姆(Kosam)的一些雕刻》,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13-1914 年)》,第 262-264 页。在该手迹中字母 ī 和 ō 写法上的差别是很小的。

⑩ 关于年代的详细情况请见本书第一章的附录。

⑪ 从路德斯表第 47 可知,此卒塔婆被叫做 Vodva 卒塔婆,据说是由众神所建。在公元 14 世纪的上半叶仍是最为著名的耆那神龛之一,表明吉那坡拉哈的 Tirthakalpa,有叫做 Rajaprasada,见 G. 布勒的《秣菟罗耆那卒塔婆的传说》,载《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维也纳,1897 年,第 137 卷,第 2,维也纳,1898 年。

⑫ A.K.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 72;《佛像之起源》,图 41;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图版 91;J. Ph. 沃格尔的《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5, b, 图版 6, a, 图版 54, b。

⑬ 玄奘:《大唐西域记》,S. 比尔英译,伦敦,1906 年,第 1 卷,第 180 页;S. 朱理恩,巴黎,1857-1858 年,第 1 卷,第 208 页。

⑭ S. 科诺:《印度铭文汇编》,第 30-50 页,特别是第 49 页和 50 页。

⑮ R.B.R. 查恩达:在《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23-1924 年,第 4 部分,《博物馆》,第 101 页和图版 35,图 1;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13。

⑯ 在路德斯提到的出自秣菟罗的 132 件铭文中,其中 84 件是耆那教的,15 件是没有特殊信仰的,33 件是佛教的。

⑰ Kalpanāmanditkā by Kumāralata,由鸠摩罗什翻译。同样的故事在由鸠摩罗什翻译的汉语版《马鸣的大壮严经》中,S. 列维的《关于印度-塞种人的札记》,载《亚洲学刊》,系列 9,第 8 卷,1896 年,第 457-463 页(英译版),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 2 卷,1903 年,第 385 页,及 E. 霍博的法文版,巴黎,1908 年,第 158-163 页。

⑱ K.G. 高斯瓦米:《迦膩色迦(统治时)的柯萨姆铭文:2 年》,载《印度的铭文》,第 24 卷,1938 年,第 24 卷,第 210-212 页,附图版。

①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28(a)。

②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28(b)。

③ 例如, J. Ph. 沃格尔:《秣菟罗考古博物馆目录》,阿拉哈巴德,1910年,第 49 页;及《秣菟罗雕刻》,第 6 页。

④ 见前一页。

⑤ 甚至在宗教思想和风俗上两派也使用。

⑥ A. K.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 4-27。

⑦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17-19; B. 巴鲁瓦的《巴尔胡特》,第 3 卷,《生活和艺术面面观》,载《印度研究所出版物——美术系列》第 3,加尔各答,1937 年,图版 113-115。

⑧ 甚至这些符号并不是典型佛教的。

⑨ J. 马歇尔:《山奇指南》,第 3 版,德里,1936 年,第 83-84 页。

⑩ A. K.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第 36 页。

⑪ G. 布勒:《秣菟罗耆那雕刻样品》,载《印度的铭文》,第 2 卷,1894 年,第 311-323 页,特别是第 322 页。

⑫ B. 罗福:《Das Citralakshana nach dem Tibetischen Tanjur herausgegeben und ubersetzt》,载《印度文化文献》,第 1 册,莱比锡,1913 年,第 17-18 页。

⑬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

⑭ 事实上,佛陀的衣服和那些富裕的俗人们的衣服并没有什么不同,富人们也同样穿薄薄的长袍,长袍从左肩横过,左手拢着,此种情况可见现藏于秣菟罗博物馆的佛像座基上(年代为 7 年)的俗人崇拜者(附录第 635)。也可见于 J. Ph. 沃格尔的《秣菟罗的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8-1910 年)》,图版 24(c)。

⑮ J. Ph. 沃格尔:《古代秣菟罗的蛇神崇拜》,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8-1909 年)》,第 159-163 页,图版 54, a。

⑯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图 49。

⑰ 库马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图 25 和图 27。

⑱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107(b)。

⑲ 秣菟罗博物馆,第 M3。

⑳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7。

㉑ 我们推测此时已经是卒塔婆得到强有力的发展阶段。我们知道迦腻色迦的卒塔婆都是很高的建筑。所以,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此类纪念建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此建筑是用于表示涅槃的象征。两个崇拜者的谦恭姿态也表明了这一点。在一个石雕纪念像柱和门楣中心上有类似的圆形顶的

高建筑,见沃格爾的《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23(c)及图 105(b)。不过,这些更可能是一个佛像的神龛。这种可能性是源于以下的事实:出自德魯夫-提拉(Dhruv Tila)的卒塔婆鼓形石块显示出一个坐在类似建筑中的佛陀人物。这样该浮雕可能表现佛陀坐在香室里,而且,图版 23(c)和 55(b)上的门并不怎么适合卒塔婆,因此我们更愿意把这些建筑解释为神龛,或许是香室。

④①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55(b)。

④②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54(b)。

④③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25。

④④ 秣菟羅博物館,第 H12。

④⑤ 见本章此页后。

④⑥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55 和 57。在此书完成后,我们发现对我们观点的确证,事实上沃格爾已经对此场景做过同样的辨识,见沃格爾的《秣菟羅的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1910年)》,第 71 页。V. S. 阿格拉瓦拉也曾讨论过该浮雕,见他的《秣菟羅的前贵霜艺术》,载《省际历史学会会刊》,第 6 卷,第 81-120 页,特别是第 108 页。

④⑦ 至少对这些雕刻的辨识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在此检查。见 V. 斯密斯的《秣菟羅的耆那卒塔婆及其他的古迹》。我们于 1943 年从拉瑪查恩德拉恩的《考古调查》中得到友善的信息,就是在坎卡里-提拉发现大量的佛教佛雕。

④⑧ 不过见本章此页后。

④⑨ 例如,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52(b)。

④⑩ 见本章此页前。

④⑪ 见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502。

④⑫ 见《印度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 63。

④⑬ 见《印度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 67。

④⑭ 见 J. Ph. 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 28(b)。

④⑮ 见 J. Ph. 沃格爾:《秣菟羅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1910年)》,第 62 页;载《秣菟羅考古博物馆目录》,第 35 页;《秣菟羅的雕刻》,第 6 页。

④⑯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第 104 页。

④⑰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696 页和 700 页。

④⑱ 见《印度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第 57 页。

④⑲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首罗(Coda)、头发、肉髻和王冠》,载《大不列颠及皇家亚洲学会学刊》,1928 年,第 57 页。

④⑳ 例如藏于柏林的佛陀头像,见 E. 瓦尔德史密特的《印度佛教建筑发展史》,载

《东方杂志》，新系列，第6卷，柏林1930年，图版36(b)；J.Ph.沃格爾的《秣菟羅的雕刻》，图版20(a)，及拉克諾博物館的一個石雕刻紀念像柱，舊編號可能是第B82，現在的編號是第H32。在科恩研究所(秣菟羅代表作)中有此雕像的照片。

⑤ J.Ph.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11(a)，图版12，沒有刻痕的图版16(下方的矮人)，图版57和与图版59(a)；載《印度及印度尼西亞藝術史》，图67、图68和图74。

⑥ 見J.N.班納吉得《印度早期佛像中的肉髻 - siraskata(a mahapurusa - 相)》，載《印度歷史季刊》，第7卷，1931年，第499 - 514頁，作者在該書中表達的觀點和我們的完全一樣，即秣菟羅佛陀的頭並不是剃得干干淨淨的。很高興在此問題上並不只是我們持此觀點，如果加以更為詳盡的闡述，那麼班納吉的論證和我們的一樣。

⑦ 例如，瓦戴爾認為肉髻源於蛇冠，後來在阿育王時代它變為頭蓋骨上的隆起部分；和此相聯系，他提出了極富幻想的理論，見瓦戴爾的《佛陀的王冠或者“肉髻”：它的起源、實質和作用》，《佛教起源的研究》，載《東方雜誌》，第3卷，1914 - 1915年，第131 - 168頁。一些學者堅持認為肉髻只是源於某地的頭蓋骨上的隆起部分，例如，巴赫霍夫所認為的秣菟羅，見《早期印度的雕刻》，第111頁；考德林頓所認為的犍陀羅，見《古代印度》，第55頁，又見注68。

⑧ J.Ph.沃格爾：《秣菟羅的雕刻》，图版8(d)，和图版16(a)；《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藝術史》，图47；《佛像的起源》，图27和图29；藏於拉克諾博物館的一個石雕刻紀念像柱，可能是第H34，圖片見藏於科恩研究所(秣菟羅代表作)的藏品中。在出自犍陀羅的苦行者肖像畫中頭上也可以見到頂結，例如，A.福色爾的《犍陀羅的雕刻》，第1卷第375頁图189和第2卷第253頁图435。還可見J.巴特霍克斯的《哈達的調查》、《雕像和小雕像》，載《法國考古隊阿富汗論文集》，第3卷，巴黎，1930年，图版62(a)和(b)；J.麥伍尼的《Shotorak》，載《法國考古隊阿富汗論文集》，第10卷，巴黎，1942年，图版19和20；L.巴赫霍夫《菩提 - 伽耶的柱形雕像》，載《亞洲藝術年鑒》，第2卷，萊比錫，1925年，第73 - 76頁和图版69。

⑨ V.S.阿格拉瓦拉：《秣菟羅的前賈霜藝術》，載《省際歷史學會學刊》，第6卷，1933年，第81 - 120頁，特別是第87頁，和图1 - 3；《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藝術史》，图版68；《佛像的起源》，图24。

⑩ A.福色爾：《犍陀羅佛教藝術》，第2卷，第294頁和297頁的图447，及第1卷，第465 - 469頁的图234 - 237。

⑪ 例如，E.瓦爾德史密特著作中提及的諸神，見《犍陀羅、庫車和吐魯番》，图版14。而且，梵天的各種雕像上的頭上都帶有頂結。

⑫ 例如，喀特拉(Katra)的佛陀，見慕尼黑民間文化博物館中的雕像；見L.謝爾曼《慕尼黑民間文化博物館的古代佛陀雕像》，載《慕尼黑建築藝術年鑒》，第5卷，1928

年,第 71 和 73 页的图 9 和 11。

⑥⑧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第 111 页。

⑥⑨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289 页以后。

⑦⑩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首罗、头发、肉髻和王冠》,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28 年,第 815 - 841 页,特别是第 833 - 834 页。

⑦⑪ H. H. 维尔森:《梵文 - 英文词典——由当地学者为福特·威廉学院编纂而成的原版翻译、修订和扩充而成》,加尔各答,1819 年,第 129 页。

⑦⑫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首罗、头发、肉髻和王冠》,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28 年,第 815 - 841 页,特别是第 830 页。

⑦⑬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首罗、头发、肉髻和王冠》,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28 年,第 835 页。

⑦⑭ A. K. 库马拉斯瓦米:《一件早期的印度佛雕的头像》,载《底特律艺术研究所简报》,第 8 卷,第 6,1927 年,第 65 - 66 页。

⑦⑮ 这些相表可见 E. 伯诺夫《Le Lotus de la bonne Loi》,巴黎,1852 年,附录 8,第 553 - 647 页;E. 森纳特《佛陀及其源头和特点的传说文集》,第 2 版,巴黎,1882 年,第 88 - 160 页,特别是第 124 页以后。

⑦⑯ 印度锡克教徒总是戴着头巾,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取掉,他们头上还有头发圈。见 P. 塔尔鲍特《德里:一个新自治领地的首府》,载《国家地理杂志》,1947 年,第 42 卷,第 597 - 630 页,特别是第 629 页。

⑦⑰ A. K. 库马拉斯瓦米:《一种皇室姿势和一些其他的花边》,Feestbundel uitgegeven door het Koninklijk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bij gelegenheid van zijn 150 - jarig bestaan, 1778 - 1928, Weltevreden, 1929 年,第 1 卷,第 57 - 61 页。

⑦⑱ 见 J. P.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53(b)。

⑦⑲ 见本章注 199。

⑦⑳ O. C. 甘高里:《佛像的古代:佛陀的崇拜》,载《东亚杂志》,新系列,第 14 卷,1938 年 3 月 2 号刊,第 41 - 53 页。

㉑ 《梵网经》,1,3,73(Dīgha Nikāya)及布达高萨的《Sumangalavillasinī》第 1 卷,第 128 页;不过,伊瓦萨基·马苏密说 Jūjuritsu 暗示禁止表现佛陀。

㉒ O. C. 甘高里:《佛像的古代:佛陀的崇拜》,载《东方杂志》,新系列,第 14 卷,1938 年,第 56 页。

㉓ V. C. 高娄别:《评 A. 福色尔的〈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远东学报公告》,第 23 卷,河内,1924 年,第 438 - 454 页,特别是第 451 页。

㉔ I. 马苏密在 1920 年已经暗示了这种印度佛陀类型;不过我们怀疑高娄别已经

看过这篇文章；I. C. 马苏密的《评 A. 福色尔的〈佛教艺术的起源〉》，载《Kokka》，第 30 卷，1920 年 5 月，第 432 - 439 页。以前，C. 格拉瑟已经指出印度在阿育王时代就制作佛像，但是它没有指出任何实例，也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C. 格拉瑟的《东方亚洲雕刻中长袍表现的发展》，载《东亚杂志》，第 3 卷，1914 - 1915 年，第 393 - 423 页，及第 4 卷，1915 - 1916 年，第 67 - 87 页，特别是第 401 页。

⑧ S. 科诺：《关于佛教建筑史的一篇文稿》，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第 29 卷，第 65 - 574 页。

⑨ G. 达尔维拉：《印度的古希腊钱币》，载《印度文明中的古典影响》，巴黎，1897 年，第 114 - 121 页；第 2 版，巴黎，1926 年，第 152 - 161 页。

⑩ S. 科诺：《关于古代印度对偶像的使用》，载《印度考古工作者》，第 38 卷，1909 年，第 145 - 149 页。

⑪ A. 卡宁汉姆：《巴尔胡特的卒塔婆》，伦敦，1879 年，第 107 页，以及《摩诃菩提会或者佛 - 伽耶的大佛庙》，伦敦，1892 年，第 52 页。

⑫ V. 斯密斯：《希腊 - 罗马对古代印度的影响》，载《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第 58 卷，第 1 部分，1889 年，第 107 - 201 页，特别是第 193 页。

⑬ T. 伯罗赫：《关于古代印度神像的几种建筑性表现》，载《德国东方学会学刊》，第 62 卷，1908 年，第 648 - 656 页。

⑭ L. 巴赫霍夫：《早期的印度雕刻》，第 73 页和第 97 页。

⑮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56(a) 和 (b)。

⑯ 见本章前半部分。

⑰ 见本章前半部分。

⑱ 就我们所知这一规则的惟一例外是年代标明为 7 年的一件佛雕的基座，藏于秣菟罗博物馆，附件第 635；该基座上的两尊狮子之间是两个男子、两个女子和两个儿童，但是没有神圣的象征物。见 J. Ph. 沃格尔的《健陀罗的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 - 1910 年)》，图版 24(c)。图 34 中的座可能属于佛陀尚未严格地列为圣徒时候的。有几个原因说明该雕像不可能属于早期的，见后面两页。

⑲ 《佛像的起源》，第 13 - 14 页和第 18 页；载《印度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第 46 页。

⑳ V. A. 阿格拉瓦拉：《秣菟罗寇松博物馆的雕刻手册》，阿拉巴哈德，1939 年，第 34 页。

㉑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第 36 页。

㉒ 请把该姿势和因陀罗的相比，见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38(b)，或者《秣菟罗的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 - 1910 年)》，图版 28(b)。

⑩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507(b)。

⑪ J.P.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503(b)。

⑫ 见科恩研究所收藏的照片(秣菟罗代表作)。大概是秣菟罗或者拉克诺博物馆的第 742。

⑬ 《Sadvimsa Brahmana》5.3。《摩诃婆罗多》,加尔各答编, I, 5771。

⑭ 库玛拉斯瓦米:《佛像之起源》,第 18 页。

⑮ 拉克诺博物馆,第 B18。

⑯ 此问题见此后 5 页。

⑰ 不过,在我们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格罗斯也是正确的。

⑱ R.D. 班纳吉:《斯基泰时代的新婆罗迷铭文》,载《印度的铭文》,第 10 卷,1909 - 1910 年,第 109 页。

⑲ 见本章前半部分。

⑳ 见本章前半部分。

㉑ 例如,秣菟罗的一个编号为 663 的佛栏柱,塔原出自马哈阪(Manhaban),见 V.S. 阿格拉瓦拉的《秣菟罗寇松博物馆的雕刻手册》,第 29 页。

㉒ 例如比哈尔(Bihar)的佛像,其照片在科恩研究所,J. 安德森在《印度博物馆考古藏品目录和手册》,第 2 部分,《笈多和铭文陈列品》,加尔各答,1883 年,第 5 页, DGA, cat, 第 5 页。

㉓ 见本章注 96。

㉔ H. 范·格拉瑟那普:《耆那教:一种印度的解脱宗教》,柏林,1925 年,第 361 - 362 页;I. 伯格斯《禅体派耆那肖像画法》,载《印度文物工作者》,第 32 卷,1903 年,第 459 - 464 页,特别是第 462 页。

㉕ M.W. 德·费瑟尔:《Buddha's in Leer het Verre Oosten》,阿姆斯特丹,1930 年,第 67 页。

㉖ 见第二章后半部分。

㉗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雕刻》,第 103 页。

㉘ J.Ph. 沃格尔:《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 40 页。

㉙ L. 谢尔曼:《慕尼黑民间文化博物馆古代佛陀雕刻》,载《慕尼黑建筑艺术年鉴》,1929 年,第 6 卷,第 151 页。

㉚ 高恩达教授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段,这段话为:“Bodhisatto ti panditasatto bujjhanakasatto; bodhisankhātesu va catasu maggesu āsatto laggamānaso ti Bodhisatto.”

㉛ 《Theragatha》, 534, 该段为:“Buddhassa mātā pana Māyānā yā bodhisattam parihariya kucchinā”。又见《Manorthpurani, an Anguttara Commentary on the Digha Nikaya》, 第 1 卷,

435。

⑫ 路德斯表,第 949。

⑬ L. 巴恩霍夫:《早期印度雕刻》,第 109 页,注 3,图版 89。

⑭ K.G. 高斯瓦米:《迦腻色迦 2 年(统治)的柯萨姆铭文》,载《印度铭文》,第 24 卷,1938 年,第 210-212 页,及其图版。

⑮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28(a)。

⑯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第 35 页。

⑰ J.Ph. 沃格尔:《秣菟罗雕刻的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1910 年)》,第 66 页,和说道:“……不过,秣菟罗产生过另一类雕刻,它可能和希腊-佛教雕刻直接相联系。”

⑱ 我们极愿看路德斯表第 51 中的一幅照片,很可能该雕刻已经显出受犍陀罗影响的迹象。路德斯表第 12 中的出自 74 年的雕像无疑是一种新类型。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它的复制品。拉克诺省图书馆馆长纳盖先生惠寄我们一幅路德斯表第 52 中的一幅照片,不过该残片仅显出该站佛双腿及基座的一部分,由此判断它是否受印度西北部的影响是困难的。

⑲ E. 瓦尔德史密特曾经在其著作中提及迦腻色迦纪元 22 年的那件受犍陀罗影响的雕像,他的著作作为《印度佛教发展史》,载《东亚杂志》,新系列,第 6 卷,第 273 页。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将会看到,这比 L. 谢尔曼推测的要晚一个世纪,见其著作《慕尼黑民间文化博物馆的古代佛像》,载《慕尼黑建筑艺术年鉴》,1929 年,第 6 卷,第 2 册,第 151 页,图 22,和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第 8 页。

⑳ V.S. 阿格拉瓦拉:《出自秣菟罗的新雕刻》,载《省际历史学会学刊》,第 11 卷,第 2 部分,1938 年,第 66-76 页。

㉑ V.S. 阿格拉瓦拉:《出自秣菟罗的新雕刻》,载《省际历史学会学刊》,第 11 卷,第 2 部分,1938 年,第 75 页。

㉒ V.S. 阿格拉瓦拉:《出自秣菟罗的新雕刻》,载《省际历史学会学刊》,第 11 卷,第 2 部分,1938 年,第 69 页。

㉓ 拉克诺博物馆,第 B14,或者 B.1.28(?)

㉔ 例如,见鹿野苑巴拉(Bala)比丘的“菩萨”,J.Ph. 沃格尔曾复制过,见其《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28(a)。

㉕ 秣菟罗博物馆,第 A2;见 J.Ph. 沃格尔的《秣菟罗博物馆的目录》,第 49 页,图版 15(a);L. 巴赫霍夫的《早期印度的雕刻》,图版 86(y);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第 755 页的图 584。

㉖ 秣菟罗博物馆,第 A65;J.Ph. 沃格尔的《秣菟罗博物馆的目录》,图版 63;在安亚

发现。

⑬ 波恩美术博物馆,第 27448;照片第 B3886。

⑭ I.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的雕刻》,第 1 卷,第 108 页。虽然在一个基座角上的“正面”小狮子并不是不为人知,证明它是阎膏珍时代雕像的基座,见 J.Ph. 沃格爾的《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2。但是该基座也可能是迦膩色迦从中亚带来的。

⑮ 它在另一幅照片上看的更清楚,见科恩研究所收藏品中的秣菟罗代表作(第 27)的照片。

⑯ 见 J.Ph. 沃格爾的《秣菟罗的雕刻》,第 38 页。

⑰ 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图 245,第 491 页;第 2 卷,图 482,第 501 页。

⑱ 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图 130,第 251 页;第 2 卷,图 479,第 493 页。

⑲ E. 瓦尔德史密斯:《印度佛教建筑发展史》,载《东方杂志》,新系列,第 6 卷,图版 35(c)。

⑳ L. 亚当:《佛雕》,图版 4;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2 卷,图 423,第 231 页;图 424,第 233 页。

㉑ 在此时代以前,印度可能已经知道带有动物腿的基座,见 A.K. 库马拉斯瓦米的《出自纳噶迦膩孔达(Nagarjunikonda)和阿玛拉瓦提》,载《Rupam》,第 38-39 号,加尔各答,1939 年,第 70-76 页,特别是第 72 页和图 3。

㉒ A. 福色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第 1 卷,图 210、212、242、252、254,特别是第 417、421、481、509、513,或者《(犍陀罗)西克里卒塔婆的浅浮雕》,载《亚洲学刊》,系列 10,第 2 卷,1903 年,图版 1、图版 4、图版 6、图版 7 和图版 8。

㉓ 有一件类似的复制品,其上的浮雕也缺少地方,使得佛陀的弟子一层叠一层地雕刻着,见图 53 的上部;还可见 J.Ph. 沃格爾的《秣菟罗的雕刻》,图版 53c 和图版 51a。在这两个雕刻中,鹿都被省去了。有一件出自犍陀罗的雕刻和所讨论的这件非常相似,H. 哈格利韦斯在其著作中有复制品,见其《石头上的佛陀故事》,加尔各答,1914 年,图版 22,第 29 页。

㉔ 见此前两页。

㉕ 这一点在该雕像的另一幅照片上看得更清楚,见科恩研究所收藏品(秣菟罗代表作,27)。

㉖ 我们不要把这类作品和图 33 上的那一个混淆,因为有两个神显然对基座上的那个大佛陀表示崇敬,在梵天和因陀罗之间没有小的佛陀人物。

㉗ 就头发表示方法所经历的发展请参考图 68-72。

⑬ 关于这种最后的表示头发的方法的例样在 L. 巴赫霍夫的作品中可以找到, 见其著作《早期印度的雕刻》, 图版 22; J. Ph. 沃格爾的《秣菟羅的雕刻》, 图版 16, 图版 18 (e), 图版 504(e), 图版 509(b), 图版 59(b); A. K. 库马拉斯瓦米的《普提 - 伽耶的雕刻》, 载《亚洲资料实录》, 第 18 卷, 巴黎, 1933 年, 图版 39、图版 500 和图版 58; L. 巴赫霍夫的《出自普提 - 伽耶的柱形雕像》, 载《亚洲艺术年鉴》, 第 2 卷, 莱比锡, 1925 年, 第 73 - 76 页; 以及大英博物馆中的一件浮雕, 见路德斯的《早期婆罗迷铭文》第 239 页的图版, 载《印度铭文》中有复制品, 第 9 卷, 1907 - 1908 年。

⑭ 印度博物馆, 见 R. 查恩达的《秣菟羅的键陀罗流派》, 载《印度考古年度报告 (1922 - 1923 年)》, 图版 39(e); 《监督人考古调查的年度项目报告》, 《印度和佛教纪念物》, 1917 年, 第 9 页。

⑮ 有复制品, 见《印度考古年度报告 (1912 - 1913 年)》, 第 1 部分, 图版 8(d), 及 M. M. 哈密德, 学者 R. C. 卡科和 R. 查恩达《山奇考古博物馆目录》, 载《博帕尔邦》, 加尔各答 1922 年, 图版 2, 第 19。

⑯ 见 R. 查恩达的《秣菟羅的键陀罗流派》, 载《印度考古年度报告 (1922 - 1923)》, 第 164 - 170 页, 特别是 168 页。

⑰ L. 巴赫霍夫:《早期印度的雕刻》, 第 1 卷, 第 106 页, 注 5。

⑱ 有拓本, 见 D. R. 萨尼《出自秣菟羅的 7 则铭文》, 载《印度铭文》, 第 19 卷, 1927 - 1928 年, 第 65 - 69 页, 特别是第 66 页, 第 3。萨尼释读最初的词几乎是一样的。

⑲ 秣菟羅博物馆, 第 A21。

⑳ 进一步的详情见 J. 马歇尔的《关于印度考古 (1908 - 1909 年) 的说明》, 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 1911 年, 第 1053 - 1085 页, 特别是 1065 页。

㉑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调查报告》, 第 1 卷, 西姆拉, 1871 年, 第 330 - 348 页。

㉒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调查报告》, 第 1 卷, 西姆拉, 1871 年, 第 330 - 348 页。

㉓ 见 J. Ph. 沃格爾的《秣菟羅的雕刻》, 第 38 页。

㉔ 这种最初在贵霜时期末的雕像上发现的特点, 在笈多雕像上也发现有, 例如 J. Ph. 沃格爾在其著作中有复制品, 见他的《秣菟羅的雕刻》, 图版 31(a); 拉克诺省博物馆第 B. 2; R. D. 班纳吉的《拉克诺省博物馆的三件雕刻》, 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 (1909 - 1910 年)》, 图版 54(a); R. 查恩达在其著作中有复制品, 见他的《秣菟羅的雕刻流派》, 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 (1922 - 1923 年)》, 图版 9(d), 还有一件雕像, 其照片在科恩研究所收藏品 (秣菟羅代表作, 第 14) (秣菟羅博物馆, 第 437)。

㉕ J. Ph. 沃格爾在其著作中有复制品, 见他的著作《秣菟羅博物馆目录》, 图版 10, 及《秣菟羅的雕刻》, 图版 33(a); 又见 L. 巴赫霍夫的《早期印度雕刻》, 图版 85, 图 2。

㉖ 见本章前几页。

⑩ 萨尼说这是在笈多艺术中首次出现,见 D. R. 萨尼的《鹿野苑考古博物馆目录》,加尔各答,1914年,第3页,注8;但是,因为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雕像中发现,它发生得相当早。不过,在该目录的第75页,萨尼似乎已经认识到这种变化发生得较早,但是他又回到犍陀罗和秣菟罗之间的序列上,并且说秣菟罗复制犍陀罗的发卷。

⑪ L. 巴赫霍夫在其《早期印度的雕刻》第13页提到一件迦腻色迦5年的耆那像,把它作为一件蜗牛壳状的早期样品;不过这是不正确的;这件雕像的年代当在公元193年,见第4章,第241-244页。

⑫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首罗、头发、肉髻和王冠》,见《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28年,第815-841页,特别是第833-834页。

⑬ Nidanakatha, ed. FAUSBOLL, 第一卷,第64页。

⑭ Nidanakatha, ed. FAUSBOLL, 第一卷,第64页。

⑮ S. 科诺《关于佛陀网相》,载《东方资料实录》,第10卷,1932年,第298-301页,特别是第299页。

⑯ A. 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首罗、头发、肉髻和王冠》,见《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学会学刊》,1928年,第832页。

⑰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97页。

⑱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95页。

⑲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701页。

⑳ E. 瓦尔德史密特:《印度佛教建筑发展史》,载《东方杂志》,新系列,第6卷,第6册,1930年,第265-277页,特别是271页和275页。

㉑ E. 森纳特:《佛传论集:它的源头和特点》,第2卷,巴黎,1882年,第125-126页。

㉒ K. De. B. 考德林顿:《古代印度》,第55页。

㉓ 例如在《Nidanakatha》中。

㉔ 至于其他,瓦尔德史密特和巴赫霍夫认为,在第一件佛像创造以前,这一系列相已经决定了肉髻是作为隆起的头盖骨;另一方面,他们正确地评价了福色尔和库马拉斯瓦米所提出的两种表现方法,第三种方法存在着。根据瓦尔德史密特,人们致力于“使绘画表现和相规范的要求相一致。”见 E. 瓦尔德史密特《印度佛像发展史》,载《东方学刊》,新系列,第6卷,1930年,第274页。巴赫霍夫在其《早期印度雕刻》第113页中对此也有论述。

㉕ 巴赫霍夫是另一个观点,他认为:“……在秣菟罗,肉髻的概念一直是从头盖骨上的肉瘤的思想来理解的”。见《早期印度雕刻》,第111页。

㉖ 头发表示法的这种发展见图68-72。

⑩ J.N. 班纳吉:《印度早期佛像中的肉髻 - Siraskara(大丈夫 - 相)》,载《印度历史季刊》,第7卷,1931年,第499-514页,特别是第507页图2。

⑪ 在《方广大壮严经》的藏文版中这一点是清楚的。见E. 布尔诺尔的《神戒(法的莲花)》,巴黎,1852年,第58页。

⑫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295页。

⑬ A. 福色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第302-312页。

⑭ J.N. 班纳吉:《佛陀的网络状的手指》,载《印度历史季刊》,第6卷,1930年,第717-727页。

⑮ 例如瓦尔德史密特在其著作中的佛陀复制品,见《印度佛陀建筑发展史》,在《东亚杂志》,新系列,第6卷,1930年,图版3。

⑯ A. 范·勒柯克:《新象征作品》,载《中亚佛教的晚期》,第3卷,柏林,1933年,图版3。

⑰ W.F. 斯图特海姆:《佛陀雕像中的网相》,载《东方资料实录》,第7卷,1929年,第232-237页。

⑱ A.K. 库马拉斯瓦米:《佛陀的网络状的手指》,载《印度历史季刊》,第7卷,1931年,第365-366页。

⑲ S. 柯诺:《关于佛陀的网相》,载《东方资料实录》,第10卷,1932年,第298-301页。

⑳ 例如,瓦尔特使密特所复制的雕像,载《东亚杂志》,新系列,第6卷,图35(c)。

㉑ 见第4章开头。

㉒ B. 巴鲁瓦:《巴尔胡特》,第3卷,载《生活和艺术面面观》,图版9;J.Ph. 沃格尔的《秣菟罗的雕刻》,图13和图16(a)。

㉓ A.K. 库马拉斯瓦米:《菩提 - 伽耶的雕刻》,载《亚洲艺术》,第118卷,图版7、图版9-13、图版15、图版16、图版37、图版51,图49。进一步见J.Ph. 沃格尔的《秣菟罗的雕刻》,图版14(b)。

㉔ B. 巴鲁瓦:《巴尔胡特》,第3卷,图版1;又见《犍陀罗佛教艺术》,图49。

㉕ 见本章中部。

㉖ 非常古老的浮雕像都有一个光环,它没有扇贝边,相当光滑,例如J.Ph. 沃格尔载其著作中所表现的那个浮雕,见《秣菟罗的雕刻》,图版53(b)。该复制品不很清楚,但是去年在伯灵顿举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展览期间,我们有机会亲自核实我们的印象,剩下的圆环相当光滑。

㉗ 例如,N.J. 柯罗姆:《荷兰及爪哇博物馆的爪哇艺术》,载《亚洲艺术》,第8卷,巴黎,1926年,图版38和40;又见K. 韦斯的《爪哇》;《出自爪哇婆罗门、佛教和 eigenlebige

建筑和雕刻》，《亚洲的精神、艺术和生活》，第1卷，Hagen I, W. 1920年，图版150, 151。

⑩ Th. P. 噶勒斯町：《Eenige Balishe Illustraties bij het Oudjavaansche Gedicht Smaradhana, Cultureel Indie》，第5卷，莱顿，1943年，第76-87页，特别是第85页，图1，图2和图5；又见同一作者《Tantri Illustraties opeen Balish doek》，《印度文化》，第1卷，1939年，第129-136页，特别是图7。

⑪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54。

⑫ E. 瓦尔德史密斯：《印度佛教象征的发展史》，载《东亚杂志》，新系列，第6卷，1930年，图版36(b)。

⑬ 见《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54页。

⑭ M. M. 哈密德，学者 R. C. 卡柯及 R. 查恩达：《山奇考古博物馆目录》，载《博帕尔邦》，加尔各答，1922年，图版2，图19，及《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12-1913年)》，第1部分，图版8(d)。

⑮ 路德斯表第12。

⑯ 路德斯表第66。发现于坎卡力·提拉(Kankali Tila)，现藏于拉克诺博物馆。其拓本见《印度铭文》，第1卷，第392页，第24；R. D. 班纳吉的《斯基泰时代的新婆罗迷铭文》，载《印度铭文》，第10卷，第106-121页，特别是第116页，图7卷。

⑰ 秣菟罗博物馆，第B3及B2；J. Ph. 沃格尔的《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66页。路德斯表第69和第68，分别发现于杰尔·孟德(Jail Mound)和坎卡力·提拉。

⑱ 秣菟罗博物馆，附录第490。《考古调查年度项目报告》载《北部族群，印度和佛教纪念碑(1916-1917年)》，第10页，第4。秣菟罗博物馆，第B.4；J. Ph. 沃格尔的《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67页，图版1；路德斯表第69(a)；L. 巴恩霍夫《早期印度的雕刻》，图版101，发现于巴拉博哈德拉·昆德(Balabhadra Kund)。

⑲ 路德斯表第77。

⑳ 在 J. Ph. 沃格尔的著作中有复制品，见《秣菟罗雕刻》，图版53(c)和《秣菟罗的雕刻流派》，见《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6-1907年)》，第137-160页，特别是第153页，图版54(a)；J. Ph. 沃格尔的《秣菟罗的雕刻目录》，第128页；秣菟罗博物馆，第H7。其发现地点不明。

㉑ 在福色尔的著作中有复制品，见其《键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图552；L. 巴恩霍夫的《早期印度的雕刻》，图版86，图2；拉克诺博物馆第B23。

㉒ 在福色尔的著作中有复制品，见其《键陀罗佛教艺术》，第2卷，图552；L. 巴恩霍夫的《早期印度的雕刻》，图版86，图2；拉克诺博物馆第B23。

㉓ 拉克诺博物馆，第B182，发现地点不明；J. Ph. 沃格尔的《秣菟罗的雕刻》，图版36(c)，第44页和《秣菟罗的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1910年)》，

第 68 页,图版 3;L. 巴赫霍夫的《慕尼黑民间文化博物馆的古代佛雕》,载《慕尼黑艺术年鉴》,1929 年,第 6 卷,第 2 册,第 147 - 166 页,图 23。

⑳ 秣菟罗博物馆,第 I. 7;J. Ph. 沃格爾的《秣菟罗的雕刻目录》第 135 页;发现地点不明。

㉑ 秣菟罗博物馆,第 I. 7;J. Ph. 沃格爾的《秣菟罗的雕刻目录》第 135 页;发现地点不明。

㉒ 拉克诺博物馆,第 B 208;J. Ph. 沃格爾的《秣菟罗的雕刻流派》,载《印度考古调查报告(1909 - 1910 年)》,图版 25(b)。

㉓ 例如,该头像在 V. A. 斯密斯的《耆那教的卒塔婆和秣菟罗的其他古迹》,图版 CI,图 4;进一步可见拉克诺省博物馆第 J. 220,其中一张照片见科恩研究所藏品(秣菟罗代表作,耆那部分,第 30)。

第四章 秣菟罗的后贵霜艺术

由于缺乏佛像,为使我们能对接下来的那一时代艺术发展的线条有所了解,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来自那个过渡时期的耆那像和佛像。现在我们返回起点:萨赫斯·马赫斯与西塔拉·迦提的佛像都源自公元 178 年左右,甚至更晚。正如我们将要进一步看到的,除了已提到的证据外,这一年代的其他证据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所提到的大多数贵霜某个王统治期间的雕像,在它们的铭文中都提到了统治者的名字。而在萨赫斯·马赫斯雕像的铭文中君主的年代和名字都未提及,因此这一雕像就有可能成于韦苏提婆死后的某一时期,即迦腻色迦纪元 98 年后的某一时期,因为我们拥有那一年韦苏提婆的最后一件铭文,所以他可能死于同一年或是稍晚一些。

为跟上秣菟罗流派的发展,在查看了可以利用的资料后,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不知道任何带有韦苏提婆之后年代的铭文的佛像。耆那像同样也使我们在这儿突然遭到挫折,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风格的比较去努力推想此后艺术的发展。

与萨赫斯·马赫斯和西塔拉·迦提的雕像相比,由于与它们极为相像,那么首先被考虑的雕像就是佛陀,复制于图 54 中。^①

这个雕像中的好几种要素处于进一步的发展阶段,这并没有错误,但按年代顺序来讲,其整个设计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雕像相距不会超过 10 ~ 20 年。这一时期托着长袍垂片的手被保存了下来,我们看到了有名的带有呈 Z 字形褶边的衣褶。不过他的右手,可能正如萨赫斯·马赫斯的雕像一样呈施无畏印,在这儿

折断了。我们注意到袍子的褶边有所发展。前面的衣褶略呈起伏状下垂,而在萨赫斯·马赫斯的佛陀中相应的衣褶依然下垂得很僵硬。呈百叶状的衣褶特征,在于从肩到肘向下彼此的折处,到了肘下却猛地折向上面,像萨赫斯·马赫斯的佛陀中一样保持不变。

它的坐垫与佛陀的也极为相似,表现在图 43 和图 44 中。佛陀又坐在了姑奢草(吉祥草)上。与萨赫斯·马赫斯和西塔拉·迦提的雕像一样,两个狮子间有一个空间,中间由菩萨占据,佛像的捐助人如崇拜者一样位于两边。现在狮子略向内转,如同刚提到的两个佛像的狮子,明显为高浮雕。舌头外伸。小爪子稳固地叉开。在萨赫斯·马赫斯佛像的坐垫上,这两种狮子以及它们的两个同类间惟一可以观察到的区别是,其胸部变得更呈球形,而其头部仅到低垂的姑奢草(吉祥草),但其余的与图 43 和图 44 中复原的狮子一模一样。除去衣袍上更呈起伏的褶缝和狮子更呈球形的胸部,图 54 中复原的狮子与萨赫斯·马赫斯和西塔拉·迦提的佛像是如此一致,以至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认为讨论中的雕像是那两种佛像的稍进一步的发展,也许是二十年以后,如果那样,那么就是迦腻色迦纪元 2 世纪前半叶中期左右。

然而,事实上还有一个阻碍,即基座上的铭文,我们解读如下:

“Siddham sa(m) 20^② gra^② di 30 asyām pūrvvāyam pravārikavihāre buddhapratimā pratiṣṭ(h)āpitā”。

其译意为:

“成功! 22 年夏季第二(月),第三十天,在指定的这个场合,(这尊)佛像被建在了普拉瓦利卡(Pravarika)寺院。”

因此这件确定为 22 年。达雅·拉姆·萨赫尼在那时刊印了这则铭文,在其序言中称:“确定为 22 年的第 1 号一定建于迦腻色迦统治时期。”^③

对此我们并不同意。在所有的细节中雕像明显仅比萨赫斯·马赫斯的佛像种类的发展略微有所进步,^④不可能比那种突然要

晚 80 年。因此以风格的鉴定为理由,对我们来说似乎正在讨论的佛像不可能源自于迦膩色迦时期。此外字符的形式显示出比迦膩色迦时期的其他铭文中已知的字符要晚许多,例如, *prāvārika* 中的 *ka* 𑀓 和 *pūrvāyam* 中的 *ya* 𑀛 就呈一种明显晚于迦膩色迦时期很多的形式。在 *pūrvāyam* 中的随韵 (*anusvāra*) 明显是一横,而非迦膩色迦时期的是一个点。也许会在 *pratimā* 中发现甚至更晚的 *ma* 的形式,但不幸的是这个字符是非常模糊的 𑀕。此外,不同字符顶部的所谓箱形头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决定性的,因此必须把这件铭文以及雕像自身确定得要晚于迦膩色迦时期很多。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出于风格的鉴定以及古文字学的理由,这个雕像与萨赫斯·马赫斯和西塔拉·迦提的佛像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铭文被确定为 22 年。我们在这儿遇到了一个新纪元吗?原则上也有可能是在韦苏提婆死后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不过,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⑤

作为对这件碑铭之谜的解决,我们更愿说明如下:一旦到了迦膩色迦纪元 100 年,即使是在韦苏提婆死后,人们仍继续纪年,但在纪年时省略了百位数,就像我们自己现在经常做的一样,'40 真正的意思是 1940。这样一种纪年方式在印度并非是未知的,从这个事实中显示出在世俗 (*Laukika*) 纪元中年代中的千和百就经常以相同的方式被省略掉。^⑥同样,在一些确定为超日纪元的铭文中百位数也被省略了。^⑦科诺总是否认有省略百位数纪元的可能性,主要是因为弗里特反对这种观点。但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纪年法似乎是对另外产生的碑铭、古文字以及风格上的难点的惟一解决方法。德·拉·瓦利-波森 (*De La Vallee - Poussin*) 论述了科诺和福色尔(他支持省掉百位数的一种孔雀王朝的纪元)间的争论,称:“毫无疑问存在有取消百位数的可能,因为推断年代方法的使用在中世纪的东方已得到了证明。”^⑧

最后,我们最伟大的梵语碑铭学家海因里希·路德斯(Heinrich Luders)似乎也不反对这个观点。1947年我们在奥斯陆与科诺教授和摩尔根斯坦(Morgenstierne)教授就我们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研究的好几种观点进行了探讨,后者是如此地友好,查阅了他1915年在柏林听路德斯演讲时所作的笔记。关于路德斯表中的第70篇铭文(对它我们将进一步进行处理,它是支持我们假设的第一个最有力的论据),他指出其中可能省略掉了百位数。假如一个有着路德斯名望的学者认为在一件铭文中百位数被省略是可能的,那么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假设来说最严重的障碍,即不存在有省掉百位数的纪年法,就被消除了。

接下来看一下路德斯表中的梵语铭文,^⑨确实,在迦腻色迦纪元99年之后明显没有提到更大的数目,^⑩而且刚好是在新世纪前的十年大量的编年铭文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可能会引起一种假设,可以想象在99年后也应该是具有相当多数量的铭文的。

现在我们如果以风格的鉴定和古文字学为根据来假定正在讨论的佛像的年代省略了百位数,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雕像的年代为迦腻色迦纪元122年,这正好在我们已经以风格的鉴定为依据为雕像所确定的范围之内。

在这儿确实提到了一个年代,但并没有统治者的名字,就像迦腻色迦或他的继承者之一统治期间制成的铭文中经常发生的,这个事实可能是将讨论中的铭文指定为在韦苏提婆死后的一种附加迹象,但如果有人不想看到对此的确认(不过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明白它几乎总是这种情形),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改变不了在这几年代中省略了百位数的观点。

如果韦苏提婆死后开始了一个新纪元的假设是正确的,而我们因为在本书第六章中讨论过,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那么谈论中的雕像的年代仅仅改变了几年,因为韦苏提婆最晚的铭文源于98年。

为支持我们的在迦腻色迦纪年中经常习惯于省略百位数的观点,如果略掉那个数字,我们将依次提出下面的一系列论据。

首先,在基座上有一个带有铭文的耆那像,由拉卡尔·达斯·班纳吉刊布(见图 56)^⑩。在所有的细节中,这个雕像至少与萨赫斯·马赫斯的佛像以及正在讨论的 22 年的那个佛像极为相像。无疑它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100 ~ 125 年时的时代风格。我们认为基座上的铭文原文如下:

1. “sa(m) 10 2 va 4 di 10 (1) etasya purvāyā(m) koḷiyāto^⑪ (ga) nāto ba(m)bha(d)ās(i)yāto kulato uc(ena)

2. garito (śākh)āto gani(s)ya ayya pusi(lasya) śisini d(e)v(i) paṇatihārī nan(d)isya bhaginiye ni(rva?) -

3. rtana sāvikānam va(r) ddhakininam jinadāsi rudradevadattā gopā rudrade(va)sāmini rudrad……tra gahamitr(ā)

4. kumārasirī vamaḍāsi hasti(s)enā grahasirī rud(r)adatā jayadāsi mit(r)asrī……

内容中陈述了是许多妇女捐赠了这个正在讨论的雕像,实际上原文如下:

“在 12 年雨季第四(月)的第十一天,在指定的这个场合,在帕那提德哈里·德维(?),^⑫南(迪)的妹妹,克里亚·迦那,巴(姆)哈达(西)亚·库拉以及乌(森)那迦里·萨(卡)的受人尊敬的迦尼·普西(拉)的女学生的请求下,(这个雕像)由木匠中的(女)世俗听者(她们属于特权阶层):吉那达西,鲁德拉德瓦达塔,戈帕,鲁德拉德(瓦)萨米尼,鲁德拉德……特拉,迦哈密特(拉)……库玛拉西里,瓦玛达西,哈提(森)那,格拉哈西里,鲁德(拉)达塔,加亚达西,米特(尔)西里……(建造)。”^⑬

我们对这件铭文的特殊兴趣在于它的年代,按照它的第一行,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的 12 年。因此在这儿也是一个没有统治君主名字的年代。字符的种类也明显与迦腻色迦国王统治期间 12 年

的日期不一致。我们仅提一下诸如字符 da 𑀓, u 𑀕 和 yya 𑀚 的形式。第一行的 kulāto 中的字符 ku 𑀓 值得特别提到。Ka 底部的 u 不再是横线,而是向下的一条曲线,这是一种已与笈多形式相似的形式。基座上小狮子的发展阶段也显示出是 112 年而非 12 年。

作为确证,我们更愿提出耆那自身的雕像。头发呈美丽整齐的卷完全覆于头上,就像蜗牛壳一样。考虑到迄今谈论中的所有耆那像的头部都不幸地遗失,因此可以提出,也许有关的雕像源自于迦膩色迦纪元的 12 年,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那时并没有修饰头发的耆那像。所以由于头发的修饰将这个雕像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之初是不会有障碍的。

不过在我们看来,很可能还有一种阻碍。首先,我们知道最初在耆那像上,就像佛像上一样,头发被整理得很平整,我们有好几个它们的样本,与佛像是不会混淆的(有时它们极其相似),因为它们大多带有一种特殊的特征,^⑮而且早期的佛像头部与肉髻(uṣṇiṣa)是有区别的。^⑯所以即使秣菟罗的雕刻家确实了解卷发的技巧,但也不能假定他们从制作耆那像的时候就开始将这种技巧应用到了耆那的头部。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佛教受到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影响前,作为两种宗教在其艺术中所使用资料来源一致的结果,^⑰佛像和耆那像的表现手法几乎是并肩发展的。但佛教在受到来自犍陀罗的强烈影响后也是表面上的,两种流派的表现手法彼此仍旧非常相像,除了佛像的僧袍外,几乎表现在了所有的细节中:带有小狮子的基座,光环等。最终耆那像紧随着佛像所经历的表现手法的更替,其头像的头发覆满了整个头部,表现为一排排的半环线,层层叠叠,例如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头像(见图 58)。^⑱

这一时期的印度艺术肯定不分宗派,而且在佛教受到印度西北部艺术影响之前耆那与佛像的表现手法几乎是并肩发展的,此

后耆那像与佛像也极为相似,对于这一事实,似乎不能过早假定在头部的半环线覆盖物的技巧应用在了耆那头部之后,蜗牛壳状卷发的手法也是严格地模仿于佛像,或甚至是同时传入的。那意味着在迦膩色迦纪元 100 年左右,耆那像也第一次表现出了覆以蜗牛壳状卷发的头部。

现在从整体上再来比较一下正在讨论中的雕像与英国博物馆的耆那半身像(见图 57),假如我们先把英国博物馆的雕像的光环暂时消除,那么我们会立即注意到这种极端逼真的相似。英国博物馆的权威们将这个耆那半身像确定为公元 6 世纪左右,考虑到它与正在讨论中的雕像的极为相像,无疑它要晚许多。形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事实,也是出于光环的修饰,耆那确实使我们联想到了笈多的风格,那时仅出现在了“最初的雕像(statu nascendi)”中。笈多艺术中的好几种要素已经处于酝酿之中,在所有的细节中最重要的是其明显的规律性,在笈多艺术中它被强调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外还有光环的修饰以及对卷发的处理。因此,笈多艺术中的一些特征基本上已经在这个雕像中被发现,我们更愿把它称为后贵霜艺术。

我们认为英国博物馆的耆那像所表现出的与 12 年的耆那的相似,以及头发的表现手法,对于我们的观点一定是明确的,后面的雕像宁可确定为贵霜王朝与笈多王朝期间,而非像拉卡尔·达斯·班纳吉假设的(通过铭文中提到的年代数进行判断)贵霜时期之初,即迦膩色迦王统治时的 12 年。根据风格的比较及古文字的资料,因此我们认为 12 年的耆那像必须被正确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的 112 年,这样在这个雕像中又省略了百位数。

我们要提出的第三件雕塑是罗克诺博物馆的一个耆那像,它出自秣菟罗(见插图 22)。¹⁹雕塑的四周各有一个僵立的正面裸体耆那人像,手臂沿身体舒展。铭文中这样的雕像被称为“pratinā sarvvatobhadrikā”。尽管在史密斯的书中线条不是太清晰,但幸好

还能清楚地看到在图画中三个可看到的耆那像中的两个,其头部完全覆以了成束的蜗牛壳状的卷发。这本身就意味着像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是一个更晚的年代。但还不止这些。这个雕像带有下列铭文:

A. 1. “sa(m) 10 5 gra 3 di 1
asya pūrvvaya(或 e?)

B. 1. (me) hikato kulato ayya
jayabhuti -

C. 1. sya śisīnaṃ ayya
sangamīkaye śisīni

D. 1. ayya vasulaya (或 e?)
nirvarttanam.....

A. 2. lasya dhī(tu) ...i.....
(va)dhu veni -

B. 2. (sya) śreṣṭ(h)is(ya)
dharmapat(n)īye bhātṭisenasya

C. 2. mātu kumaramitayo (或
ai?) danam bhagavato (prati) -

D. 2. ma(或 ā) sa(r) vvatob-
hadrika.”

翻译如下^②:

“在 15 年夏天第三(月)的第一天,在所指的这个场所,在尊敬的瓦苏拉,尊敬的桑加米卡的女学生,(梅)依卡库拉的受人尊敬的加亚布提的一个女学生的请求下,(君主)的(这个)四重雕像(作为)库马拉米塔,……la 的女



插图 22 库玛拉米塔(Kumaramita)奉献的耆那像,确定为 15 年。《耆那教的卒塔婆与秣菟罗的其他古物》

儿, ...i... 的儿媳妇, 行会首领的第一个妻子, 巴提森纳母亲的礼物(建了起来)。”

罗克诺的另一个出自秣菟罗^①的耆那像也带有一篇铭文, 我们解读如下:

1. “sam 80 6 he 1 di 10 2 dasasya dhiṭu pr(i) yasya k(u) tubiniye.....”

2.to kulato aya sa(nga)mi(ka)ya śisīniya aya vasula(ye) nivatana.”

意思是:

“在 86 年冬天的第一(月)第十二天, 应尊敬的瓦苏拉, 尊敬的桑加米卡的学生, ……库拉之请, (奉献了) 达萨的女儿, 普里亚的妻子, ……的(这件礼物)。”

比较这些铭文, 显然在二者中提到了同一个人, 即阿亚·瓦苏拉(Aryya Vasula), 阿亚·桑加米卡(Aryya Sangamika)的女学生。她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占居着突出的地位, 如果我们可以依靠这些她要求俗人们建立起的这个耆那雕像的铭文, 那么她就是一个传教士。在耆那教雕像的铭文中这样一个女传教士重复出现, 它们恰好让我们稍稍了解了一点那时印度妇女所处的地位。看看两个铭文的年代, 它显示出这个阿亚·瓦苏拉在 15 年时就已任职, 但 71 年后, 在 86 年, 她依旧担任着职务。这是极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那样, 那么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有着非常显著的地位, 而且她一定活到了非常老的程度, 至少是 90 ~ 100 岁, 不仅如此, 根据推测, 她直到临终都担任着职务。^②

当我们假设第一篇铭文的百位数被省略时, 这种不可能的情形突然变得很清晰, 这样这尊雕像就真的源自于迦腻色迦纪元 115 年。假如在铭文中真的提到一个统治于那时的贵霜君主的名字的话, 那么这就将与这种假设相矛盾。然而并非如此, 没有什么能妨碍我们把这尊雕像确定为源自 115 年。那样, 如果我们在一

件迦膩色迦纪元 86 年的铭文中碰到阿亚·瓦苏拉的话就不必惊奇了,她在 29 年后的 115 年还活着并担任着职务,正如在另一件铭文中所出现的。毕竟与 71 年相比,一个人在 29 年这样一个时期中更容易担任同样的职务。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分析,还有进一步的迹象表明,这通常是在迦膩色迦统治的初期,它不可能是一个早期的年代。我们只在 B. 1 行中的 kulato 和 jayabhuti 中提到了字符 ku 𑀓 和 bhū,或是在 C. 1 行 śisīnam 的字符上作为横的随韵(anusvāra)的展现,这样,对照复制于插图 22 中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 15 年的耆那像,除了年代顺序和碑铭学的依据外,现在我们能称还有风格鉴定和古文字的理由,而另一方面,一切都支持将这个雕像确定为只在 100 年之后,即迦膩色迦纪元 115 年,即公元 193 年。

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 100 年之后,我们假定的省略百位数的第四点证据就是来自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像,现藏于秣菟罗博物馆,第 B. 71。^②

根据卡宁汉姆^②糟糕的图画,我们把这件铭文^③解读如下:

1. “sam 5 he 4 di 20 asya purvāye ko(ḷiya)
2. (gaṇa) to ucena(ga) tito sākḥāto bramhadā(s) i(kāto) (kulāto aryya?)
3. m(i) hila tasya śiṣyo aryyo (kṣe) rako ta(sya nirvartana?).....”

翻译过来是:

“在 5 年冬天的第四(月)第二十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在尊敬的(克)拉卡,……的学生(请求下),(尊敬的?)(米)依拉,克里亚·迦那,乌森那迦里·萨卡,波拉姆哈达西卡·库拉(贡献了这个雕像)。”

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雕像的照片,尽管卡宁汉姆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雕像是一个“pratimā sarvvatobhadrikā”

的印象,然而关于其风格以及从中可能得出的结论,我们仍什么也无法假设。

不过在另一个耆那教雕塑^②上有一篇铭文,我们解读如下^③:

A. 1. “siddha ko(li)yato ganato u-
cena -

2. garito śakhato bamhadāsiato

3. kulato śirigrihato sambhokato

4. a(r)yya jeṣṭhastisya śisyo a
(ryya) mihi(lo)

B. 1. ttasya śisy(o) aryya kṣera -

2. ko vācako tasya ni(r)vata -

3. na vara(ṇa)hasthis(ya)

C. 1. (ca) devila ca dhita ja(ya) -

2. devasya vadhu moṣiiniye

3. vadhu kuṭhasya ku(或 tu?)
suthasya -

D. 1. dhamrapa(ti)ha sthiraye

2. dana śavadobhadrika





3. sarvrasatvanam hitasukhaye.”

“成功! 这个传教士, 尊敬的克拉克, (他是) 尊敬的米依拉的学生, 而(米依拉是) 克里亚·迦那, 乌森那迦里·萨卡, 巴姆哈达西亚·库拉的受人尊敬的杰斯塔哈斯提的学生, 在他的(即克拉克)的请求下, (这个) 四重的(雕像作为) 瓦拉(纳) 哈斯



插图 23 斯提拉(Sthira)奉献的耆那像,与插图 22 大约来自同一时期。《耆那教的卒塔婆与秣菟罗的其他古物》

提和代维的女儿,加(亚)提婆和默西尼的儿媳妇(及)库塔·库(或图)苏塔的第一个妻子斯提拉的礼物,为了一切生灵的幸福与快乐(而奉献)。”

这篇铭文的古文字自身已经指出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个源自后贵霜时代初期的雕像。如 A.3 行 *kulato* 及 C.3 行 *kutḥasya* 中的 *ku*  与我们将要看到的源自迦膩色迦纪元 125 和 135(或 139)年的铭文中的 *ku* 是一样的(见附表三)。如 A.1 行 *siddha* 中的 *sa*  在左下角有一个明显的环。A.1 行 *ganato* 中的 *na*  呈弧形,这是较古的 **I** 形的发展。A.1 行 *ucena* 中的 *u*  也呈一种在贵霜时期尚未出现的形式,它属于后贵霜时期的前半期。但除了古文字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论据。

在史密斯的《耆那卒塔婆和秣菟罗的其他古物》中可以发现这个雕像的线条凸版(见插图 23)。②似乎这件又是一个“*pratima sarvatobhadrika*”,它表现出了与复制于插图 22 的 115 年的那件的明显相似。而且,四个耆那中的两个在其头部展现出了蜗牛壳状的卷发,在就此主题争论的观点中,我们确定了这个雕塑源自迦膩色迦纪元 100 年左右。

最终,在前面的我们确定为 5 年的铭文中发现的克里亚·迦那,乌森那迦里·萨卡,巴姆哈达西亚·库拉的学生阿亚·克拉卡的名字又出现在了谈论中的铭文中。显然这指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在上述的秣菟罗博物馆中第 B.71 雕像的铭文中提到的生活在迦膩色迦纪元 5 年尊敬的克拉卡就不可能在 100 年左右还活着。因此在确定这个雕像的年代时,我们必须假定在这儿又省略了百位数,这件正确地应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 105 年,即公元 183 年。

支持我们假设的第五点证据是一个出自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人像,③现在在罗克诺博物馆。就我们所能辨认的,这个雕像底座上的铭文如下④:

A. 1. "siddha(m) sa(m) 50(?) (gri 3) di (10) 7 etasya pūrvvāy
(a) kolīy(a) to ganāto brahmasāsiyāto kulāto uccenā(gari) to śākhāto
(śrī)gṛhāto saṃbhogāto brham̐(ta) vacaka ca gaṇina ca d(e)vami(t)
rasya (śiṣyasya?)

A. 2. aryya (jasu)kasya śiṣya (g)añisyā aryya pālasya śraddhacaro
v(ā) cakasya aryya dattasya śiṣyo v(ā) cako aryya sīho (ta) sya
nirvartanā (dva) tṭamittasya mānikarasya dhitu jayabha(tṭa)... dhitu
.....sya

B. 1. lohavaṇiyasya vadhu ru(ddaye?) vadhū hāggū(de)sya dhar-
mmapatniye mittrāye dā(nam).....(sa)rvvasat(vānam) hitasukhāy(e)
kaka(he).....(ku)...




2. vāja(ṭa?)laraja.....”

这篇铭文的译文是：

“成功！在 50(?) 年夏天第三(月)第十七(?) 天，在指定的这个场合，尊敬的传教士西哈，他是尊敬的传教士达塔——(他是)迦尼的斯拉德哈卡拉——和尊敬的帕拉——(他是)伟大(?) 的传教士和克里亚·迦那，巴姆哈达西亚·库拉，乌森那迦里·萨卡，波拉姆哈达西卡·库拉，(斯里)格尔哈·桑波霍迦的迦尼的(提)婆米(特)拉(的学生)——的学生。在他的(即西哈)请求下，为了所有人类的幸福与快乐……(作为)哈古提婆的第一个妻子，铁器商的儿媳妇……鲁达(?) 的儿媳妇，…加亚巴塔的女儿和(德瓦)塔米塔的女儿，米塔的(礼物而贡献)。”

尽管比累尔怀疑我们在这篇铭文中是否真的应该解读为阿亚·达塔西斯·西斯约(aryya dattasys śiṣyo)，但我们认为，这个名字是非常明确的。不过这篇铭文的年代并不完全确定，它可能指的是 20 年，也可能是 50 年，但从古文字来看，50 年更为可能，因为在 A. 1 行 kulāto 中，也可能是 在 B. 1 行结尾处的字符 ku 𑀓 的形式与

笈多时代 ku 的形式极为相似。这种形式不仅未在贵霜时期出现过,甚至在后贵霜初期也未出现过。因此这件的年代可能是 50 年。

除了字符 ku 外,在 A.1 行 grhāto 和 B.1 行中的 ha  以及 A.1 行 uccenā(gari)to 中的字符 u  的形式也表明是一个后贵霜时期的年代。字符 u 的横线接近线下,这是后贵霜时期的特征。在迦膩色迦纪元 48 年的一篇铭文中 u 仍是 90 度的直角。da 的尖角也值得注意,因为在 A.1 行 di 和 B.1 行 da(nam)中这是另一个晚期的特征 .

在这个雕塑的铭文中提到的尊敬的达塔的学生,传教士西哈的名字与秣菟罗博物馆的来自于坎卡里·提拉的第 B.14 的耆那教上的铭文中提到的名字完全一样。^①底座上的铭文内容如下^②:

“siddha(m) vācakasya dattasiṣyasya sīhaaya ni(vartanā?).”

翻译为:

“成功! 在达塔的学生,传教士西哈的请求下。”根据格罗斯(Growse)在一篇文章和书中所提供的这个基座的淡淡的小素描(见插图 24),我们只能得到一种较为模糊的印象,即这个基座看起来像什么。小狮子们与谈论中的复制于图 54 中,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 122 年的佛像以及复制于图 56 中,确定为迦膩色迦纪元 112 年的耆那中的那些也极为相像。遗憾的是正在讨论的这个雕像的铭文并未注明年代,但其风格表明是迦膩色迦纪元 2 世纪前半期的一个年代。字符的形式也表明是那一时期。当沃格尔在其秣



插图 24 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像

蒐罗博物馆的目录中提到它时,他对年代作了评论:“考虑到它的古文字,这个雕塑应归于贵霜时代晚期。”^③

因此根据风格的鉴定以及古文字的理由我们明白,这个雕像必须被确定为迦腻色迦纪元 122 年左右。

由于极有可能讨论中的两个雕像的铭文提到了同一个人,那么它们一定是同时代的。不过,不可能那个人在 50 年以及 122 年前后担任相同的职务,因此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篇铭文显示出与迦腻色迦纪元 122 年的一篇极为相似的风格,而另一篇铭文根据古文字的理由更可能属于后贵霜时代,大概确定为 50 年时,那么我们认为显然在第二个雕像中,我们处理的这篇铭文的年代中省略了百位数,因此它属于后贵霜时期,约在迦腻色迦纪元 122 年前后,而非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如果这个数字必须被解读为 50,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个年代将是迦腻色迦年表中的 150 年。

罗克诺博物馆有一个耆那像,^④乍一看,尤其是假如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其脸部特征时,它给予我们的是源自于笈多时代或是更晚时期的印象(见图 60)。不过在进一步考虑后,我们认为这并不正确。将这个雕像的坐垫与萨赫斯·马赫斯佛像,22 年的西塔拉·迦提佛像(见图 54)以及 12 年的耆那(见图 56)中的进行比较,我们必须立即承认所有这三个,尤其是后两个显示出了与罗克诺博物馆的那个极为相似,因此它源自于那一时代,而非笈多时期。我们又看到了在小狮子位于两侧空白处的中间,熟悉的柱子上装着权轮。柱子的每边是四个崇拜者和一两个儿童,通常是男左女右。坐垫周围的狮子把头伸在坐垫浮雕的上脊之上。脊部有不同的凹凸造型,除了里边的耳朵紧贴狮头外,最上面的边很随意地贴在了狮头的左边。至于其余部分,头部就与其他坐垫上的狮头完全一致。

不过我们注意到,在鬃毛上有轻微的变化,在这儿它更丰满地披在胸上,稍低的末端处也不再能看得见,而在其他狮子的情况

中,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其胸下的毛发分缝处。而且在这儿讨论的耆那狮子中的特性强调了胸部的圆球状。

这些狮子与其他狮子间的第二个区别是这些动物的腿竖得更高,因此就给人以一种稍高的印象。观察到的这两种区别指出了就所选的用以比较的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而言,这些狮子处于了进一步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的结论一定是,与源自迦膩色迦纪元 110~120 年的那类相比,这个雕像要晚一些。

现在正被讨论的耆那像带有一篇铭文,在字符的形式上与笈多时期的极不相似。^⑤我们解读如下:

A. 1. “(siddham) sa(m) 30 (5) va 3 di 10 asy(am) pūrvvāyāṃ
koḷiyāto ganato sth(āni)yāto k(u).....



B. 1. va - i - rāto śākh(ā)to śirikāto sa(m)bhokāto aryya baladi-
nasya śisīni kumarami(tra?).....


B. 2. tasya putro kum(a)rabhaṭi gaṃdhiko tas(ya) (dā) nam
pratīnā vardhamānasya saśita makhita (bo)dhita




C. 1. a(ryya) C. 2. kumāra - C. 3. mitrā - C. 4. ye
(ni) -

D. 1. rvva - D. 2. (ta)na.”

“成功! 在 3(5)年雨季的第三(月)的第十天,在指定的这个场合,在敏锐、文雅、和觉悟的尊敬的库马拉米特拉请求下,瓦德哈马纳(这个)雕像作为香料商人,库马拉米特拉的儿子,克里亚·迦那,斯(塔)尼亚·库拉,瓦依拉·萨卡,西里卡·萨(姆)波霍迦的尊敬的巴拉狄纳的女学生,库马拉巴提的礼物(而贡献)。”

在笈多写本的法中表明的最显著的特征通过 B. 1 行 Kumarami(tra), B. 2 行 Kum(ā)rabhati, C. 2 行 Kumāra 中的字符 ku 表现了出来。下面的 u 不再是向右的一条直线 , 而是向下的一条曲线 , 这是一种已与笈多时代极为相似的形式,那时这个曲线发

展成为了一个半圆 。Ka 自身也经历了一种变化。字母顶部的箱形头发展成了延伸得很长的横线。这在其他几个字母中也发现了,如 va, ta, ra 和 na。Ka 的横线不再水平,而是稍有点儿弯,这在早期贵霜铭文中尚未出现过。

其他显示出晚期形式的字母是 A. 1 行的 *koliyāto* 和 *sth(āni)yato*, B. 1 行的 *aryya* 和 C. 4 行的 *ye* 中的 *ya*, 它中部的竖线是斜的, 左竖线发展为一个环  , 这在晚期的铭文中也出现了。而且, 作为连字 *sya* 和 *yya* 的第二个字母, *ya* 表现出了更晚时期的一种非常特有的特征, 即高高拖起的尾部  , 它几乎就要触及 *s* 或 *y* 的上线, 特别是在 A. 1 行的 *asy(ām)*, B. 1 行的 *aryya*, B. 2 行的 *tasya*, *vardhamānasya* 中。此外, 我们提到了字符 *na*, 在 A. 1 行的 *ganato* 中, 它采用了圆形 。最后, 在 B. 2 行的 *(dā)nam* 中的随韵 (*anusvāra*) 是一个横而非一个点。

考虑到字符种类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发展阶段的事实存在于贵霜时期与笈多时代的字符种类间, 也考虑到在风格上坐垫显然与我们所展示的确定为迦腻色迦纪年体系 112 和 122 年的那些部分有联系, 我们对 35 年的这件也必须假定它省略了百位数, 因此, 这一雕像实际上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35 年。

相对躯体来说, 这个雕像的头部比例有些偏大, 这给了我们以极深的印象, 但还并非仅仅如此; 其风格与雕像的其他部分不符, 倒是与笈多艺术黄金时代的头部较为相符。在一次细致的研究之后, 我们注意到了在笈多雕像中也遇到过的下列特征, 如雅萨迪那 (*Yasadinna*) 的佛像^⑥等。首先是小小的嘴巴, 接着是长长的杏眼, (见插图 25), 而且它还是半闭的; 在这儿还值得注意上眼皮在眼球上画为一条直直的水平线, 而下眼皮微弯, 没有画到眼球之上。眉毛非常细直, 高高地弯在眼窝上。耳朵拉得很长, 脖子(它非常长)上的三个幸运折被着重强调, 极为明显。此外, 成绾的头发明

显分向左边。我们在笈多时期的其他耆那像上也发现了这些特征。^⑤沿鬓角处,卷发被整理为一排,穿过前额到了头部的另一边(见图 72)。最后,头部有一个细微的肿块,它使人想起了佛的肉髻。就我们所知,这也是一个从未在早期耆那像上出现的特征。

我们在寻求一个与正在讨论中的雕像风格极为一致的雕像时,除了 112 年的耆那外,我们在耆那中又发现了两个,复制于图 61 和图 62 中。这些雕像在肩膀,细腰,凸出的宽肘,非常肥的上臂,细细的腿上都展示出



插图 25 图版 60 的眼睛

了相同的躯体宽度,上面带有不同凸起物的坐垫仅有最上面的没被狮子头部覆盖。可惜,图 61 中的小动物被毁坏了,至今人们仍能看到它们面向里面,而且右边的一个露出了凸起的胸脯。简而言之,这些雕像很像“三个”豌豆。幸运的是,在图 61 与图 62 的雕像中,头部和一部分背景与光轮被保存了下来。后两个部分是这些雕像属于后贵霜时期的特别的证据。光轮的修饰,以及两个立在耆那两边稍高层的侍僧的事实使得它们不可能源自贵霜时期。

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雕像的头部与 135 年雕像的相比,那么下列区别就一目了然。首先是嘴巴更宽,嘴角处急剧向内拖去,这样面部就呈一种笑的神情,这是一种秣菟罗流派的特征,我们可以命之为原始(古老)的笑。眼睛(见插图 26)相当圆,没有拉伸,在眼角处表现出了熟悉的向外的水平线。两个眼睑呈球状高高居于眼球之上,而眼睛明显不是半闭,而是睁着的。眉毛很浓,距上眼皮很近,沿着上眼皮边向外延伸。耳朵拉得稍有点儿长,但由于头部被置于一个很短的脖子上,就使整个雕像呈一种矮胖的印象,耳朵下垂得不怎么厉害,因此就没有在 135 年的耆那像头上拉得那么长。此外没有像肉髻那样的肿块,^⑥脖子上的幸运折极不明显,最后,发辮布于头的四周,太阳穴上的卷发被整理为两或三行(见

图 71)。

因此在这儿,头部之间有很多明显的区别,它表明了 135 年雕像的头部并不属于后贵霜时期,相反,一切在这儿都显示出我们关注的这件出自于笈多时代(或是佛陀的或是耆那的,但由于卷发向左,可能会是后者),这在 19 世纪被错误地强加到了更早的无头雕像上。在插图中脖子上的两个残像连接在一起的裂缝还可以清晰地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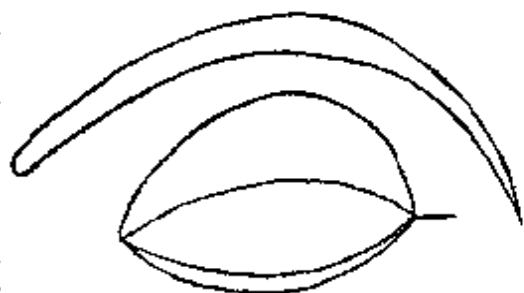


插图 26 贵霜风格的眼睛

作为我们假设这些雕塑源自后贵霜时期的最后一件证据,我们最后将探讨一下秣菟罗博物馆的一个耆那像,标号为 B.15,复制于图 55。^④其头部与光轮的上部像背景的右边部分一样折断了。幸好左边与光轮的一个断片保存在了一起。我们在这儿看到耆那的右边立着一个侍僧。他的右手双手合十,通过脑后蛇状的头巾显示出了那迦蛇神的特性;不过大蛇头折断了。在耆那的左边立着一个侍僧,因为它显示出腿部仍可看到。其余部分折断了。两个侍僧站立在比耆那所坐的更高的一层上。这些抬高的部分在顶部有一个非常宽,稍显凸出的隆起物。这个光轮的外缘饰以了扇形饰边,这在整个秣菟罗艺术中非常独特,但内部的表面并未覆盖以装饰的边与花瓣,而显示出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星星,它实际上强调了一个模拟光线的圆盘的作用。在坐垫中部有一个顶部带有权轮的柱子,与耆那雕塑相似,两边有三个成年人和一个儿童位于侧面。侧翼的两边以前有面向前的两个狮子,但它们毁坏了;不过轮廓还很清楚,例如我们能看到其胸部像桶一样圆。

这个雕像带有一则铭文残像,我们解读为^⑤:

1. "samvatsare saptapantcāse 50 7 hemant̥hu(?) (tri)ū(ye?)...."
2. "... (se) divase traodasaisya(或 ām?) pūrvvāyam....."

翻译为：

“在 57 年，冬天的第三(月)，第十三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中……”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即注明的年代，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那么根据它，所以这个雕像源自于迦腻色迦纪元 57 年。

迦腻色迦纪元 57 年的佛像(图 39)与约为同时期的图 40 中的一个佛像带有小狮子，其头部并未抬高到盖板那么高。在第一个雕像中，这些小狮子确实凸起在了石板之上，这是一个 80 年的耆那像(图 45)。因此，坐垫提供了细微的迹象，图 55 中的雕像可能不是源于迦腻色迦纪元 57 年。幸而有一些其他的细节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年代中省略了百位数，事实上，这些是与侍僧一起被保存的基座上的背景以及圆盘的断片。这些部分与复制于图 61 和图 62 中的耆那像惊人地相似。这儿也立着两个双手合十的侍僧，其中之一，左边的人像，正如确定为 57 年的雕像一样，显示出是一个那迦蛇神。在所有三个雕像中，小雕像立在耆那所坐的那层之上的高度上，这个高度有着同样宽的，稍显凸起的上脊。圆盘也显示出强烈的相像，只有在复制于图 61 和图 62 中的耆那人像中，在扇形饰边内部有珍珠边沿，而在 57 年的雕像中却没有。由于这种珍珠边沿我们总是在笈多雕像中发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风格上说，57 年的耆那可能要早于图 61 和图 62 中所描绘的。

除了这些事实，这些圆盘在发展中彼此相连，侍僧间也明显相似，在所有的例子中都立在稍高之处，坐垫也彼此极为相像。复制于图 61 和图 62 中的耆那还非常清晰地显示出面向前的两个狮子，位于雕像的侧翼，它们的头部凸起在石头上脊之上。在中间有一个破旧的浮雕，在两个例子中又明显表现为顶部带有权轮的柱子，而左右立着捐助人。


考虑到所有这些相似之处，我们确实必须认为，这些雕像彼此在时间距离上不会相距太远，如果根据圆盘的修饰，那么 57 年的






耆那可能要早一些。现在假如我们仅仅了解图 61 和图 62 中所描绘的耆那的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能从中确定 57 年的耆那的确切年代。尽管第二个耆那有一篇铭文,但这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进一步的支持,因为在史密斯的线条凸版中,铭文字迹模糊,作者只提到它开始于“南无(namo,意指皈依,献身信奉)”,要在路德斯表中找到它这并非充足的资料。从线条凸版中我们惟一可以辨明的是它的书写是斜体的,因此它源自一个更晚的时期。此外从雕像的风格也可大概推断出其年代。

这个雕像的背景展示出圆盘之上及其旁边有叶子,而在右上角则是一个翱翔的天体。在左边的其他角落无疑有另一个这样的雕像,现在折断了。我们在笈多时代雕像的背景中遇到了类似的装饰。⁴⁵现在我们决不能称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耆那像就一定要被确定为笈多艺术的黄金时代。因为圆盘的装饰尚不够精致,但我们能够假定——因为圆盘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处于笈多圆盘的早期阶段,而装饰以叶子和翱翔天体的背景则显示出了同笈多雕像中同样事物的极为相似——这一雕像源自笈多时代开始前的那个世纪。

因此,由于 57 年的耆那像与提到的耆那像的相似,我们得出的下面的结论就一定是它决不能被确定为胡毗色迦统治期间的迦腻色迦纪元 57 年,一定要被认为是属于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那组雕像,这样正确的年代就肯定是迦腻色迦纪元 157 年。

我们也可指出讨论中的雕像与迦腻色迦纪元 135 年或公元 213 年的那个雕像之间的惊人相似,但这样我们将脱离开有关的风格鉴定的论据。

现在支持我们观点的古文字的论据是:确实,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1 行 hemanthu 中字母 ma 所显示的形式 , 因为我们从笈多时代晚期的铭文中了解到,在秣菟罗它只是在公元 200 年左右才开

始使用。^③1行 *sapta*, 2行 *divase* 和 *dasaisya*(或 *am*)中的 *sa* 在左下方显示出快要发展为环  的一种趋势,而这种形式在笈多时代前的那个世纪流行为 。2行 *trayodasa* 和 *pūrvāyam* 中的 *ya*  的左边有一个环,中部的直线向右斜,这个字符的两种特性在贵霜时代早期出现得很少,但在后贵霜时期就经常出现了。此外,1行 *hemanthu* 中的字母 *ha*  可以视为晚期字符种类的一个例子,即字符的右边拉得极长,且向下拖,这在早期字母  的字符形式中并未被特殊强调。最后,在 1 行 *(tri)ū(ye)* 中,字符之上还有写在下面的呈卷曲状的 *ī* 的形式。我们可以补充说,适宜的字符都有一个得到极大发展的箱形头,它甚至在各处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横线,就像在那扎利(*Nāgarī*)写本中一样。

种种理由显示出在书写的形式中,我们发现了更为接近我们观点的证据,这个雕像也属于年代中省去百位数的那类。沃格尔在《秣菟罗博物馆目录》中在描述有关这件雕像的年代理由时认为:“路德斯教授将年代归于贵霜时代;但根据字符,我倾向于将之归于笈多时代,如果那样它将相当于公元 376~377 年。”^④乔治·比累尔将这件铭文与其他的一些进行了公布,他也持这种观点:“我认为,标号第 38-40 的以下三则铭文属于笈多时代……,如果我的推测被接受,那么它的年代”(即讨论中的雕像)“57 年就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笈多年代。”^⑤因为在路德斯看来,他把这件铭文包括在了其他几个源自贵霜时代的铭文目录之中,^⑥这个学者似乎更倾向于将 57 年与迦腻色迦纪元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同时指出百位数被省略了,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对的。

存在的关于这个年代所归纪元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当然被字符拥有符合两个时代特征的事实所解释,它依赖于其极为突出的特征。我们认为这种有关纪元的论据是我们涉及的这件铭文处于贵霜和笈多时期之间的一个证据。我们认为,通过这个雕像与那些

源自贵霜时代末期的诸如来自于西塔拉·迦提和萨赫斯·马赫斯的雕像以及 112 年尤其是 135 年的那个耆那的强烈相似来判断,这个雕像不可能源自于笈多时代看上去是非常清楚的。无论如何沃格尔认为这种写体的形式显示出了要晚于在迦腻色迦纪元 57 年可能会发现的形式,作为对这种难点的解决,他提出将这年归为笈多时代。不过我们认为,考虑到上述的有关风格的论据,我们的解决是更令人满意的。那么,就明白了并没有出现有记述贵霜统治皇室名字的障碍,同时古文字与风格鉴定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观点,正如我们所说过的,我们更愿把这个雕像也归到年代中百位数被省略的那一类。

概括一下,那么我们提出了下列观点,作为我们假设的在迦腻色迦纪元 100 年后的年代中经常省略百位数的文献证据:

- 1— 确定为 22 年的佛像。
- 2— 确定为 12 年的耆那像。
- 3— 确定为 15 年的耆那像。
- 4— 确定为 5 年的耆那像。
- 5— 可能确定为 50 年的耆那像。

6— 可能用一个笈多时代的头加以丰富的耆那像,错误地确定为 35 年。


- 7— 确定为 57 年的耆那像。

对于这些风格鉴定学,古文字学,碑铭学以及年代学性质的证据,我们还能补充一些因素,也可以作为论据支持我们的假设。

第一,知道有从 1 到包括 99 年在内的铭文,尤其是已知有许多确定为迦腻色迦纪元 80 和 90 年的铭文,而在 99 年之后却一个都没有。铭文之潮流中这个突然的中断只能在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被接受时才可以被解释,而不能说是在韦苏提婆死后所有的艺术和文字资料突然终止了。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进一步看到的,迦

腻色迦王朝延续了下来。^④此外,好几个作者^⑤注意到在贵霜时期的铭文中不同的字符种类是同时出现的,其中的一些显示出是一种非常过时的形式,相反,其他的明显显示出是一种非常晚的形式。如比累尔^⑥就这么认为。班纳吉^⑦也说:“事实上,在贵霜时期与笈多时代的耆那铭文间而非贵霜时期的佛教铭文间进行区分是很困难的。这其中的惟一根据是秣菟罗的耆那铭文的手写体甚至远远地处于这一时代通用的手写体之前……假如我们将耆那铭文排除,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一时期的其他铭文的字符没有显示出与笈多时代铭文的那些字符任何显著的相似。贵霜时代的耆那教的记录形成了印度碑铭学的单独一个系列,显示出了非常先进的字符形式,而在印度却并未发现与它一样的东西。”^⑧手写体中的这种异常通过我们的假设,如同已出现的以及进一步仍将会出现的,解释为这种雕像的字符种类总呈一种晚期的形式,属于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那类。作为对此的解释,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手写体经历了在后贵霜时期的发展。我们以两种可以清楚观察到变化的字符作为例子:ku 和 u。对此我们参考一下附表三和附表四。在附表三中首先看到,从上到下字符 ku 的形式,如同它在铭文中所出现的,由于在铭文的开头提到了统治者的名字,我们完全肯定它源自 7,58,59,60,77(2x) 和 86 年。继续向下,我们看到如同在铭文中出现的字符形式,由于在另一个地方所提供的不同的理由,我们认为它们源自后贵霜时期。现在如果我们从上到下追随字符的发展,我们看到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迦腻色迦时代,ka 的横线(cross-bar)还非常平,而增补的点下右边的 u 的横却略微向上。它极为迅速地发展成为水平线,在 77 年左右它呈现出另一种趋势,在最右边向下弯了一点,此外,ka 的横线到这时明显发展成为了圆形。这时箱形头也清楚地看到是一条直线,而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浓点。

世纪变迁之后,我们注意到箱形头发展成为指甲盖状(nail -

head),或甚至是一条宽的直线,在最右边笔划 u 不再是弧形,而变为非常圆的半圆拱形;此外,最右边在线下还继续向下,最终甚至变成了一个完全圆的钩子。这在更晚的阶段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下加符(cedilla),在 152 年甚至成为了一个优雅的下加符 。假如我们从上到下观察这个发展过程,那么每个人都会清楚它呈现出一种稳定的运动,并将其自身完全展现在了整个例子的顺序之中,而迦膩色迦 9 年的(解读为 109 年)路德斯的第 22a 与迦膩色迦 7 年的路德斯第 21 完全不可能是同时代的;或者我们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54 年(解读为 154 年)的路德斯第 54 与胡毗色迦 59^①和 60 年的路德斯第 34 和 56 可能是同时代的,或 89 年(解读为 189 年)的路德斯第 71 与韦苏提婆统治时期的路德斯第 70 可能是同时代的。因此逃避从第 8 一直向下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很遗憾,就像字符 ku 一样,我们并没有发现多少 u 的例子,但我们还是以相同的形式为字符 u 造了附表四。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开始于 90 度直角的 u 的发展线条;后来在胡毗色迦统治 48 年时它展现为一个弱箱形头。98 年最右边显示出向下弯了一点。这种发展以箱形头的逐渐增厚而进行,在左下角变得更尖锐,而右边的水平线不断向下弯曲。在最后阶段,我们在路德斯第 29 和第 71 中看到左下角渐呈尖锐,获得了对弯曲的横线趋势的优势,因为 50 和 89 年(解读为 150 和 189 年)的两个 u 的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左边的尖角。细思这种发展,每个人都很清楚假定 u 的形式出现在胡毗色迦 48 年的路德斯表第 46 号中是不可能的,50 年(解读为 150 年)的路德斯表第 29 号可能约为同时代,甚至也不太可能,而 89 年(解读为 189 年)的路德斯表第 71 号中的 u 的形式像韦苏提婆统治时 98 年的路德斯表第 77 号一样源自同一时代。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同样也确认了在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我们的观点;就附表四中的 u 来说是从第 5 向下一直到底。

整个来说,我们认为在页 259 到 262 中概括的论据的顺序一定可以消除掉所有的怀疑,现在我们确实能认为我们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是一个评论:在迦腻色迦及他直接的继承人时期的铭文中同时出现的晚期或早期时的字符形式的错误观点,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与笈多时代字符相似的这些晚期的字符被用作将迦腻色迦的年代确定得更接近于笈多时代的一个论据,也就是公元 125 年,140 年,或者甚至更晚。^②

注 释:

① J. 马歇尔,《印度考古总监年鉴》,《印度考古调查年报(1919-1920年)》,图版 17, a, 载于 41 页。

② 虽然有人认为 *gri* 是热月 (*grīṣma*) 的缩写,但这种连字必须辨为 *gra*。不过在其他地方,显然其字符下面的笔划必须被辨为手写的辅音字母 *r*。而且,还有几个铭文在连字 *gra* 的上端仍有 *i*, 因此, *gri* 是 *grīṣma* 的缩写形式在那些地方是正确的。也许连字 *gra* 是 *gri* 缩写形式的替换。

③ 达雅·拉姆·萨赫尼,《来自秣菟罗的七件铭文》,《印度铭文》,卷 19, 1927-1928 年,第 65-69 页,尤其是 65 页,图版 1。

④ 沃格尔也认为确认为 22 年的这个佛像要晚于西塔拉·迦提的佛像。正如我们一样他看到了所发生的进展,但他以字体的鉴定为理由,并没有努力去探明西塔拉迦提佛像的年代,他像萨赫尼一样认为其他的佛像都源自于迦腻色迦纪元 22 年,按他来说,西塔拉·迦提的佛像源自迦腻色迦统治初期;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塑》,第 38 页。

⑤ 主要以事实为依据,在韦苏提婆之后这个王朝仍继续存在,见第六章。

⑥ 应用这种纪元的铭文见 J. Ph. 沃格尔,《昌巴 (Chamba) 邦的铭文》,《印度考古调查年报》,1902-1903 年,第 239-271 页,尤其是 245 页。这一纪元在几个写本中也被应用。我们必须感谢冈达 (Gonda) 教授友好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 G. 比累尔,《寻求成于迦湿弥罗、拉遮普塔纳 (Rajputana) 和中印度婆罗迷写本之旅的详细报告》,孟买,1877 年,第 59 页以后。

⑦ 见 J. F. 弗里特,《迦腻色迦纪元》,《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983 页,注 2。

⑧ 瓦利-波森,《孔雀王朝与蛮族,希腊、斯基泰,帕提亚及月氏时期的印度》,《世界史》,卷6,巴黎,1930年,第359页。

⑨ H. 路德斯,《阿育王铭文之外的最古时期到公元400年左右的婆罗迷铭文》,《印度碑铭附录与印度考古局的记录》,卷10,加尔各答,1912年。

⑩ 除了299年的一件铭文,不过它指的是旧的纪元,详见第一章。

⑪ R. D. 班纳吉,《斯基泰时代的新婆罗迷铭文》,《印度铭文》,卷10,1909-1910年,第106-121页,尤其是第110-111页,图版1,第4。在路德斯表中这个雕像为第23a。

⑫ 正是H. 路德斯认为第二个字符必须被辨认为la:《北婆罗迷写本中的语言ca》,《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1年,第1081-1089页。

⑬ Panatidhari 的重要性尚不清楚;见H. 路德斯,《罗克诺省博物馆的一些婆罗迷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2年,第153-179页,尤其是第170页,注1。

⑭ 耆那的宗教部分见G. 比累尔(Bühler),《耆那的印度教派》,布尔格斯(J. Burgess)英译版,伦敦,1903年,尤其是第58页以后。

⑮ 如胸部上的胸臆象征(srivatsa-symbol)就是耆那的一种特征。如果那也不再有区别,那么有时其他的特征可以予以帮助。如帕斯瓦那塔在其头后总是披着蛇状围巾,例如见A. K. 库马拉斯瓦米(Coornaraswamy),载《印度及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86,以及科恩研究所搜集品中的一幅照片,秣菟罗卷,耆那部分,第9。

⑯ 见第三章。

⑰ 见第三章。

⑱ 此外:罗克诺博物馆的第J.220,科恩研究所的照片,秣菟罗卷,耆那部分,左边第30,以及V. A. 史密斯,《耆那教的卒塔婆和秣菟罗的其他古物》,图版CI,图4。

⑲ V. A. 史密斯,《耆那教的卒塔婆和秣菟罗的其他古物》,图版XC,图1,这个雕像在路德斯表中被记为第24。

⑳ 《印度铭文》拓本,卷1,1892年,第2。

㉑ 这个雕像在路德斯表中为第70。《印度铭文》拓本,卷1,第12。

㉒ 我们1947年向科诺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为86年的这件铭文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纪元,开始于公元一世纪中期,见第一章。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改变了观点,称:“15与86两个年代间的差距,我只能假设是两个不同的纪年来对其进行解释,15年属于超日纪元,而86年是帕提卡铜盘(Patika plate)纪元”,《印度铭文纪元注释》,《印度考古》,莱登,1947年,第197页。这种几乎是同时同地运用两种纪元的解释,我们认为极不可能的。

⑳ 路德斯表,第 20。

㉑ A. 卡宁汉姆,《考古调查报告》,卷 3,图版 13,第 3。

㉒ 也见于:A.M. 波叶尔《迦腻色迦时代》,《亚洲学刊》,第一辑,第 15 卷,1900 年,第 573 页之后。

㉓ 路德斯表,第 20。

㉔ 《印度铭文》拓本,第 2 卷,1894 年,第 37。

㉕ V.A. 史密斯,《耆那卒塔婆和秣菟罗的其他古物》,图版 XC,图 2。

㉖ 路德斯表,第 29。

㉗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4。

㉘ 路德斯表,第 123。

㉙ 格罗斯拓本,《秣菟罗铭文》,《印度文物工作者》,卷 6,1877 年,第 216-219 页,图版 2,图 8,以及格罗斯,《秣菟罗,一个地区的论文集(Maithurā, A District Memoir)》,第二版,西北诸省与奥都政府出版社,1880 年,第 108 页。

㉚ J.Ph. 沃格尔,《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 69 页。

㉛ 路德斯表,第 39。罗克诺博物馆,第 J.16(?)。

㉜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7。

㉝ 复制于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塑》,图版 32。此外还有三个在慕尼黑“人种学博物馆”的佛像头部,复制于 L. 舍尔曼(Scherman),《慕尼黑人种学博物馆的古代佛陀录》,《慕尼黑艺术造型年鉴》,卷 VI,1929 年,第 2 辑,第 274-290 页,图 29-32b,在那儿雅萨迪纳的佛像图 33 一样也被复制。

㉞ 如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塑》,图版 37,a,以及科恩研究所搜集品中的一张照片,秣菟罗卷,耆那部分,第 1。

㉟ 见第三章。

㊱ 路德斯表,第 55。

㊲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2 年,第 38。

㊳ 例如 V.A. 史密斯,《耆那教的卒塔婆和秣菟罗的其他古物》,图版 XCIII;或 J.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塑》,图版 37,b。

㊴ 见第六章。

㊵ J.Ph. 沃格尔,《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 70 页。

㊶ G. 比累尔,《更多的来自秣菟罗的耆那铭文》,《印度铭文》,卷 2,1894 年,第 195-212 页,尤其是第 198 页。

㊷ 路德斯表,11 页,第 55。

㊸ 见第六章。

⑭ 如：A. M. 波叶尔，《迦赋色迦时期》，《亚洲学刊》，第九辑，卷 XV，1900 年，第 526 - 579 页，尤其是第 571 页之后。

⑮ G. 比累尔，《印度古文字学》，斯特拉斯堡，1896 年，卷 19B，第 41 页。

⑯ R. D. 班纳吉，《印度历史的斯基泰时代》，《印度文物工作者》，卷 37，1908 年，第 52 页。

⑰ 也见查特吉 (G. S. Chatterji)，《来自柯萨姆的两件铭文，庆祝卷》，浦那，1937 年，第 101 - 114 页，尤其是第 107 - 108 页。

⑱ 比累尔将这个年代解读为 29；我们认为这个十进位数看起来更像是 50，但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一地方的铭文并不明显，见《印度铭文》，卷 1，1892 年，第 6，385 页。

⑲ V. 史密斯，《印度历史的贵霜或印度 - 斯基泰时代 (公元前 165 年 ~ 公元 320 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3 年，第 1 - 64 页，尤其是第 35 - 36 页。

第五章 后贵霜时代的婆罗迷文 铭文

直到迦腻色迦纪元 157 年,或许甚至是在此以后,在所给的年代中省略了百位数,因此在 1 到 57 年间的所有的年代既可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的前半期,又可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2 世纪的前半期,这种理解迫使我们在那一时期的所有年代都要格外小心。所以在我们对一个年代下结论前,我们首先应清楚这个年代是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还是 2 世纪,除非在铭文中重点阐释了这一雕像的奉献发生在迦腻色迦王朝的这个还是那个王的统治之下,但即使那样,我们仍必须非常谨慎,就如在本书第六章中将要出现的。

在大多数我们对年代怀有疑虑的例子中,我们认为如果将这种雕像的插图与有确定年代的雕像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弄清楚这种雕像是确定于贵霜时代还是其后,即百位数是否被省略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适当插图。

在不同的铭文均被分类的路德斯表中,并没有提供带有那些铭文的雕像的描写或是插图,但确实提供了文献参照,其中谈论到了这些铭文。在公布了大部分铭文的《印度铭文》和《印度文物工作者》的文章中,实际上几乎不曾发现任何雕刻有这些铭文的雕像的插图,大多数只有铭文自身的拓片以及在佛像或是耆那像上发现的资料,这当然完全不够,因此,对于秣菟罗的铭文,我们几乎总要依靠沃格尔在他的《秣菟罗博物馆目录》中所提供的非常简单的

说明,其中那些对风格鉴定的比较极为重要的细节从未被探讨过,在罗克诺的雕像则没有说明,而在那儿发现了大多数带有铭文的雕像。

当我们希望得出某种关于风格的结论时,除了我们掌握的这种极端缺乏的资料外,我们还拥有自己控制的相当广泛和附有精美图解的碑铭资料。现在的事实是,每次我们都必须决定一个部分有一百年与否,我们从这数百年风格经历的发展中得到了比从同期字符形式的变化中更多的支持,因为字符比艺术更为保守,艺术更易受风格与审美观点的影响。

我们且不管由我们掌握的的材料方面的这些困难,现在我们将努力在极为匮乏的资料的帮助下,通过指出一些我们认为应确定为 100 年后的雕像而在路德斯表中作出大量暂时的修正。我们只是有保留地去做这个,如果将来有可能拥有更多更好的插图,那么根据对风格考虑的解释就不得不做出改变。如果我们希望彻底系统去进行这项探索,那么我们为此目的必须检查所有的未强调过这些雕像是成于贵霜王统治期间的铭文。

按顺序来讲,路德斯表中的铭文记载的第 16 是最早被检查的。这个雕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在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表现的是一个耆那坐像。这段铭文^①没有提到任何王的名字,因此“一开始”并没有迫切的理由将之确定为贵霜时期。

内容解读为:

1. “siddham sa 4 gri 1 di 20 vāraṇāto gaṇāto aryahāḷakīyāto kulato vajrana(或 ka?)garita vaca(ko?)



2. puśyamitrasya śisīni sathisihāye śisīni sihamitrasya sachacari (解读为 sadhacari)

3. dāti sahā grahacēṭena grahadāsena.”

译为:

“成功! 在 4 年夏季的第一(月),第二十天,西哈米特拉的女

皈依者的……,萨西斯哈的女学生,(传教士)普斯亚米特拉,瓦拉那·迦那……的女学生,阿亚哈拉基亚,瓦江迦里·萨卡,……礼物……与格拉哈塞塔(和)格拉哈达萨一起。”

从古文字的迹象来看,这件铭文并非不可能源自于贵霜时代,这样它就不是如铭文中所称的源自4年,而是104年。看上去似乎1行arya中的ya  有了一种稍晚的形式,在不同字符之上的箱形头变成了横线。总是很明显的字符ku也在这段铭文中出现,但并不清楚u是一条直线还是已经向下略微弯曲的。只要没有这个雕像的照片,我们就不能根据风格给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在4年之后置一个疑问符号来满足我们自己。

接下来的有关我们抱有怀疑的雕像“*pratimā savvatobhadrika*”是路德斯表的第19,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在藏在秣菟罗博物馆,编号为B.70。根据沃格爾的描述,^②三个耆那像有光环,第四个则在其头后有一个七头蛇状的围巾,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这后一个雕像显然表现的是巴湿伐那陀像(*Pārśvanātha*)。根据同一描述,所有四个雕像在胸部中央都有一个符号,我们假定它为胸臆象征(*śrīvatsa - symbol*),通常属于耆那像。“在基座的四角”,我们引用沃格爾的话,“是面向两方的信徒的小雕像。在石顶上有一个圆的榫孔。底座已经断裂。”尚不清楚这儿是否有崇拜者,每个有两个头,还是有八个崇拜者,因为这个残片的每边都有两个,因此每个耆那有两个,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鉴于我们已经处理的好几个雕塑中所展示的这四个耆那像的每边都有一个侍祭的事实,我们认为在这儿最可能是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与那些复制于插图22,23的极为相似的雕像,其中也有一个雕像被认为是巴湿伐那陀像,每个耆那都有自己的两个侍祭。遗憾的是沃格爾未提到在不同的雕像上头发是如何修饰的,因此只要我们没有这种雕像的照片,就不可能提出这种雕像的年代是后贵霜时期。

这个雕像所带的铭文^③为:

- A. 1. “siddham (sam 30) 5 he 1 di 10 2 asya purvāye Koḷi -
 A. 2. ji(解读为 yā?) to Brahmaḍāsikāto Ucenakarito
 B. 1. Śr(i)grihāto.
 B. 2. sani(da).
 D. 1. bodhi - labhāe vāsudevā prati -
 D. 2. sarva - sat(tvā?) nam hita - sukhay(e).”

译为:

“成功! (在 3)5 年冬天的第一(月)第十二天, 在指定的这个场合, (在)克里雅·(迦那), 布拉马达西卡·库拉, 乌塞那卡里·(萨克哈), 斯里格里哈·(桑波里哈)的……的请求下, 为达到教化的作用而建起了(这个)韦苏提婆的雕像^④……为了所有生灵的幸福与快乐。”

根据路德斯与卡宁汉姆, 这个年数也可被解读为 5 来替代 35。如果是那样, 就不可排除百位数被省略的可能性, 因为在铭文中没有提及统治王室。遗憾的是卡宁汉姆对铭文的描述是如此的糟糕, 以至对于它的古文字我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目前我们知道没有能够确定是源自迦腻色迦或是他直接的继承人统治时的四重耆那像。只要没有对我们指出有这样一个样本, 以及我们不拥有任何路德斯表中的第 19 号的画像, 而它根据风格鉴定的理由表明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源自于贵霜时代初期的雕像时, 我们就将冒昧地在年代后加上一个问号。

路德斯表中的第 20 也是一个“pratima sarvvatobhadrika”, 我们已经使人接受了它源自于 105 年。^⑤

第 24 又是一个“pratimā sarvvatobhadrika”, 并不源自于 15 年, 而是 115 年, 正如我们上面所探讨的。^⑥

路德斯表中的第 25 又恰好是这样—一个雕塑的四边部分, 发现于坎卡里·提拉, 现藏于秣菟罗博物馆。底座上的铭文^⑦如下:

- A. “sa 10 8 gr 4 di asyā pu. . (ye) yāto gaṇa(to).

B. sambhogāto vacchaliyato kulāto gani.

D.1. vas(u?) jayasya ma(tu) vā(或 ma) sigiye(?) dānaṃ
sarvvat(o) bhad(r)i. . . .

D.2. . . . (sa) rvasavānaṃ sukhāy(e) bhavatu.”

译为：

“18年夏天的第四(月)第三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这个)四重的(雕像),韦苏提婆的母亲,瓦西吉(?)的礼物……(在)……(克里)亚·迦那……的迦尼……,……桑波霍迦,瓦茨哈里亚·库拉的请求下。它可能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在这里又一次没有提到统治的贵霜王室,因此就存在有将年代确定为一个世纪之后的可能性。另外,在铭文中的字符的晚期形式给出了明确的迹象,例如 B 行 kulāto 中的 ku 𑀓 就显示出一种仅在迦腻色迦纪元 98 年后才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形式;而且,字符 gr 在 A 行中也显示出一种晚期的形式 𑀧, ya 的左边带环,如 B 行 vacchaliyāto, 最后还有 ma 𑀢, 如果我们至少在 D 行中正确解读 ma(tu) 这个词的话,那么它显示出是一种非常晚的形式;而且我们认为,在我们也增加了明确的得到充分发展的箱形头时,我们就拥有了充足的证据假定第 25 的年代确实是迦腻色迦纪元 118 年,而非 18 年。

路德斯表中的第 26 看上去属于有疑问的情形,但难于得出结论。不过,感谢秣菟罗寇松博物馆的馆长巴帕依(Bajpai)先生的友好的中介,最近我们收到了这个雕像的照片(见图 63),它坚定我们的推测,确实这个雕塑的年代一定省略了百位数。

这是一个耆那的阿利湿达内弥(Aristanemi)的立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在柱脚的两边有小的壁柱,就如我们在来自犍陀罗的柱脚上经常遇到的一样。

底座上的铭文^⑧如下：

1. "...ṣa 10 8 va 2 di 10 1

2. dhitu mita(Śi)riye bhagavat(o) arisṭanimisya (vi)varta(ṇa?)
(可能是:nivartana?).”

译为:

“在 18 年雨季的第二(月)第十一天……米塔(西)里的(礼物),……的女儿……阿里斯塔尼米王的(一尊雕像)。”

这段铭文没有提供任何贵霜统治者的名字。而且古文字的迹象使人相信这段铭文一定是一个晚期的年代。确实值得注意的是 8 S 的形式。在贵霜时代总是一个 ha;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符号呈一个四分之一的圆, 就如同在一些晚期铭文中的一样。^⑨ 底座每边的壁柱表现出了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强烈影响, 这表明是一个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中期之后的年代。而且, 光环的修饰显示出与大英博物馆中耆那的光环极为相像(见图 57), 证明对于这个雕像来说其年代甚至不可能是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的后半期, 成于这一纪元的 2 世纪。其头发仍表现为小的半环线形的事实可能表明是一个 2 世纪最初的年代,^⑩ 当我们假定这种雕像的年代也省略了百位数时, 那么这个雕像便制于迦腻色迦纪元 118 年, 这正是所要达到的结果。

路德斯表中的第 27 当然属于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那种。这又是一个四头耆那雕像, 发现于坎卡里·提拉, 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

其底座上的铭文^⑪原文如下:

A. 1. "siddham | saṃ 10 9 va 4 di 10 asyaṃ pu -

A. 2 rvāyaṃ vācakasya aryya bala -

A. 3. dinadya śiṣyo vācako aryya mā -

A. 4. tr(或 tra?)dina | tasya nirvvarṭta(n)ā

B. 1. k(o)ḷi(yāto gaṇāto ṭhā)niyāt(o)

B. 2. k(u)l(āto śrigri)hā(to saṅ)bh(o)g(ā)to

B. 3. aryaveri śakhāto suci -

C. l(i)sya dharmmapatniye le.....

D. dānaṃ bhagavato sa(ṅti)....(pra)timā...




A. 5. nā(sa 或 ga)....e.....tanam

B. 4. ... (r)ā (na)mo arattatanaṃ sarvvalokutta(mānaṃ).”

译为：

“成功！19年雨季第四(月)，第十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传教士的学生，尊敬的巴拉迪那，尊敬的传教士马特尔(或特拉)；在他的请求下(奉献)了桑(提)……王的(这尊雕像)，苏西里的第一个妻子勒……，克里亚·迦那，塔尼亚·库拉，斯里格里哈·桑波霍迦，阿亚-维里·萨卡^②的礼物……对全世界最崇高的阿罗汉的崇拜。”

在这里又没有提到贵霜的统治者。此外，根据不同字符的晚期形式，古文字提供了一些非常确定的资料。

首先，字符 ku 在 B. 2 行中非常模糊，但在 B. 4 行 lokutta (mānaṃ) 中很清晰，以一种明显晚期的形式  写成。u 的横不再是水平的。此外增补的 ya (A. 1 行的 asyam; A. 2 行的 vacākasya 和 aryya; A. 3 行的 baladinasya, śiṣyo 和 aryya; A. 4 行的 tasya, B. 3 行的 aryya 和 C 行的 sucilisyā) 总是向上拉得非常长，仅结束于其他字符顶行的高度 ，这是一种在迦腻色迦统治期间没有出现过的特征，仅仅出现在笈多时期，而在这个王统治时，这种连字甚至经常出现在古体的形式  中，其中增补的 ya 仍有三个直立物。在所有适于箱形头的字符中，它显得极为突出。整个来说，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个残片确定为迦腻色迦 119 年，而非 19 年。

路德斯表中的第 28，根据铭文内容，表现的是一个筏驮摩那 (Vardhamana) 的立像。这个雕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也许我们

能从比累尔文章中的拓片^⑩得出结论,在主像的左右各有一个侍祭立在独立的高度上,而主像则坐在凸起的坛上。

底座上裁剪下的铭文写着:

A. 1. “siddha sa (20?) gr(i)mā 2 di 10 5 koliyāto gaṇato (tha) niyāto kulato verito śakhato śikikāto

B. 1. (sa)... gāto vācakasya arya sanghasihasya nirtva(或 rvva) rttanā dātilasyamati -

B. 2. lasya kuthubiniye jayavālasya devadāsasya nāgadinasya ca nagadinaya ca matu

C. 1. śravikāye di -


C. 2. (na)ye dānam

C. 3. varddhamānapra -

C. 4. tima—.”

我们将其翻译为:

“成功! 在 20(?)年夏天的第二(月)第十五天,在克里亚·迦那,塔尼亚·库拉,维里·萨卡,斯里卡·桑波霍迦的尊敬的桑加西哈的请求下,瓦达哈马那的(这尊)雕像,女俗家听众迪那的礼物,达提拉的……马提拉的主妇,加亚瓦拉,提婆达萨,那加迪那与那加迪那的母亲。”

乍一看这段铭文给人以一种晚期的印象,由于涂写的字符的原因,它甚至到处趋为斜体。在更周密详细的审查下,这种印象通过不同字符的形式而得以确认,如字符 ku ,在 A. 1 行的 kulato 中就很明显,而在 B. 2 行的 kuthubiniye 中则不清楚,这表现出是一种迦腻色迦纪元 100 年后的形式。看上去将路德斯表中的第 28 确定为迦腻色迦纪元 100 年后并不轻率,如果这个年代正确地解读为 20 的话,那么就恰好是那一纪元的 120 年。不过,也存在数字更高(如 50)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确定。

属于路德斯表的第 29 的柱脚已经探讨过了,^⑭我们认为已经使人能够接受它无疑是属于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那种。

路德斯表的第 30 是一个耆那坐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在底座的铭文中,必须先从下面读起,然后才是上面,因为可以从比累尔拓片仍能显示出的小圆盘中推断出来;^⑮因为这个圆盘无疑一定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权轮,在许多崇拜者中安放着一个小的柱子。

内容如下:

1. “siddha(m) | sava 20 2 gri 1 di . . (a)sya purvvāyaṃ vācakasya aryya mātridinasya ni(vartanā?)”

2. sarttavāhiniye dharmmasomāye dānaṃ : namo arahantāna(m).”

译为:

“成功! 在 22 年夏天第一(月)第……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在尊敬的传教士马特里迪那的请求下,萨塔瓦西尼(或一个商队头人?)的妻子,达尔玛索马的礼物。对阿罗汉的崇拜。”

在比累尔文章中复制的拓片的形式显示出在这件的基座每边可能都有两个狮子。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证明这个的照片。铭文的顶线(根据内容第二行)在左右都留下了一个空白地方,那里看上去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放置更多的字符。这可能是由于这儿两个狮子的头部突出在底座上脊的事实而引起的。按风格的鉴定而言,这表明是 80 年后的一个年代,而这与铭文所指的年代是矛盾的。但古文字也表明了这个残片属晚期的一个年代。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不仅是箱形头极为强调,而且字符本身的形式也是晚期的。如增补的 ya 屡屡地向上拖得像其他字符的顶线那么高,而 ya 在左边显示出是一个环线。此外,铭文的内容告知我们这个雕像是传教士,尊敬的马特里迪那的请求下建立的。同一个人在路德斯表的第 27 号铭文中也被提到,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⑯那么我们看到有足够的论据假定那段铭文属于后贵霜时代,源自于



迦膩色迦纪元 119 年。现在在第 27 与第 30 中同一个人被提到的事实表明它们源自同一时代,这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第 30 也属于比迄今假设的还要晚 100 年的那种,它源自于 122 年而非 22 年。





路德斯表中的第 31 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实例。这是个耆那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底座上刻着下列铭文。^⑩

“siddham sam 20(r) 2 gri 2 di 7 vardhmānasya pratimā vāraṇato ganato pet(i)vāmika.”

铭文的第二行不见了,第一行翻译如下:

“成功! 在 22(?) 年夏天第二(月)第七天,瓦达马那的(这尊)雕像(被奉献)……瓦拉那·迦那,婆提瓦米卡·(库拉)的……”

年代的十进位符号看起来像 , 这与平常的数字 20 是不同的,它通常并不太圆,而是拉得更长一些。不过笈多铭文中的圆形与讨论中的铭文相似,确实以  的形式出现。

由于铭文没有提及一个贵霜统治君主,因此它在这里并未提供明显的因素。在研究了字符的形式之后确实给以支持的惟一的其他观点是字符 na, 它显然是晚期的形式,由于它在左下边显示出是一条环线(这是长期速写这个字符的结果),其形状就被刻在石上的字符  所替代。这是在晚期贵霜时期的  形之间弥补空白的一种形式,而在笈多时代和后贵霜时代晚期的铭文中的 na 显示为从  到 。

同时这是惟一能承认是迦膩色迦纪元 100 年后和后贵霜时期的一个年代的迹象。因此从风格鉴定的观点去研究这个雕像的复制品是可取的,以从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得出明确的结论;但现在我们并没有自己掌握的照片。

路德斯表的第 32 是在一个耆那像上的一段铭文^⑪,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在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内容原文如下:

A.1. “savatsare pa(m)cavise hemaṁtama(se) tritiye divase vīś(e)
asya ksune

B.1. koḷiyato gaṇato bra(hma)dāsikato kulato ucenāgarito śākhato
arya balatratasya śiṣo sadhi -

B.2. sya śiṣini graha.....ivatana (naṁ)disya (dh)ita jasu(ka)
sya vadhu jaya(bha)ṭṭasya kuṁtūbiniya(或 e) rayaginiye (dhu 或 vu)
suya(?) .”





译为:

“在 25 年冬天第三(月)第二十天,此刻,(这个 dhu - 或
vusuya?),由(那姆)迪的女儿,加苏(卡)的儿媳妇,加亚(巴)塔的妻
子拉亚吉尼奉献,在格拉哈……萨迪的女学生,克里亚·迦那的尊
敬的巴拉特拉塔的学生,布拉(赫马)达西卡·库拉,乌塞那迦里·萨
卡的请求下。”

单词 ksune 使人想到了 ksane,但在对拓片的更周密的审查之
后,这个连字明确显示出是增补的 u 的迹象。这并非惟一的展示
这种特征的铭文。在路德斯表中我们在以下编号中也发现了它:
12,32,34,36,53,71,77,86,87。这个词在佉卢文铭文中也经常遇
到,因此不能排除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影响。科诺教授告诉
我们在 saka 中 a 发音为 u。在此期间,这种特有的词并非对年代
断定的支持,因为我们在 59 年(按路德斯来说这件源自 29 年,但
我们认为那只能是 30 年之后的)的一段铭文中也发现了这个词,^⑩
也在一段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89 年^⑪(我们认为它不能确定
为 87 年,而是 89 年)的铭文中,因为这件年代的百位数也省
略了。^⑫

但尽管单词 ksune 并非区分第 32 号铭文与必须在年代中正
确地加上 100 的那些例子的理由,却仍保持着手写体形式提供给我
们的迹象。“乍一看”它这显示出是非常晚的一种形式;首先它
呈一种变斜的趋势;而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它都极为强调箱形头,

甚至在各处都发展成一条横线。

ka 的横杠并不是水平而是弯的。此外字符 ku 也值得注意。增补的 u 的标记,即在 B.1 行中的 kulato 和 B.2 行中的 kumtūbiniya,由两划组成,一划接近水平,另一划呈曲线状向下斜 。可能我们在这儿所关注的不是 u 而是 ū。然后是 A.1 行的 savatsare, divase 和 asya; B.1 行的 bra(hma) dāsikato, balatratasya 和 sadhisya, B.2 行的 jasu(ka)sya 中的 sa 在其左下角有一个环线 。增补的 ya 在 A.1 行的 asya; B.1 行的 balatrasya; B.2 行的 sadhisya, jasu(ka)sya 和 jaya(bha)ttasya 中将右边的尾部拖得非常高,几乎到了其他字母的顶线处。最后,na 在 A.1 行的 ksune 和 B.2 行的 ganato 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圆形 ,而 ha 的右端在 A.1 行的 hemamta 中向下拖得很远 ,而这行的其他两个下角相当明显。中间竖立的 ya 呈斜体,是一种晚期的形式,如在 B.2 行的 kumtūbiniya 和 rāyaginiye 中。

除此外,从拓片中可以得出在 B.2 行的 jaya(bha)ttasya 之后的铭文已到了基座的边上。在拓片中有一条由于基座角而形成的隔离线。看上去好像能在拓片中隐约分辨出狮爪在底座的右边。爪间的空间正好是底座下脊上的铭文长于上脊线的一半长度。结论是上脊上的线比下面的短这么多,因为狮子的头部突出在上脊顶上。这也表明这段铭文源自于后贵霜时代。不过,比累尔认为这段铭文雕刻在基座的边和背上,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如果比累尔没错,那么当然我们关于狮子头的证据就不算数了。

最终铭文中提到的这些人似乎也出现在了路德斯表的第 29 号铭文中,前面我们已证明它属于后贵霜时代。两者都属于克里亚·迦那,布拉马达西卡·库拉,乌塞那迦里·萨卡,指的是加苏卡(Jasuka)和加亚波哈塔(Jayabhata)。

所有这些列举出的特征表明是一个晚期的年代,这样我们认

250

为,路德斯表的第 32 也属于迄今为止被确定为早了一个世纪的那一种,因此它正确地应源自迦膩色迦纪元 125 年。

路德斯表中值得进一步考虑的下一个雕像是第 36,一个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像,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这个雕像的底座上的铭文²⁰原文如下:

A. “sa 30 1 va 1 di 10 asma kṣuṇe”

B. 1. . . yāto ga(ṇa)to aryyaverato śakhato (ṭha)ṇiyāto kulāto maha (to) | kuṭumbiṇiye graha


B. 2. (arya) . . dāsaya nivarttanā buddisya dhitu devīlasya | śiriy(e) dāṇam

在 B.1 行的 maha(to)之后我们必须接到 B.2 行;然后继续,直到 devīlasya,此后看到 B.1 行的结尾,然后再到 B.2 行的结尾。也许拓片右边部分在这种情形中实际也是它的一个方面。

按这种顺序,其译意将是:

“在 31 年雨季第一(月)第十天,此时在伟大的……尊敬的……达萨,(克里)亚·迦那,阿亚-维拉·萨卡,塔尼亚·库拉的请求下,布迪的女儿,德维拉的妻子格拉哈西里所制。”

尽管我们不知道有关这个雕像的任何更多更好的特征,但单是这段铭文就足以使我们证明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涉及的是一个百位数被省略的年代。确实,接下来的字符形式是明确的:首先 B.1 行中的字符 ku 在单词 kulāto 和 kuṭumbiṇiye 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晚期的形式,增补的 u 在这儿甚至发展成为了一个下加符 **𑀓**。此外,当时在左下角带有一个环线的 sa 的形式,在 B.2 行的 dasasya, buddhisya, devīlasya 中就很显著,尤其是在它与增补的 ya 结合起来时,因为在 A 行中的 sa 和 asma, B.2 行的 dāsasya 中 sa 并未显示这个小环。其次是 A 行的 kṣuṇe, B.1 行的 (ṭha)ṇiyāto 以及 kuṭumbiṇiye, B.2 行的 dāṇam 中 ṇa 的圆形。此外在 B.1 行的 yāto,

aeyya, (tha)niyāto 和 kutumbiniye, B.2 行的 siriya(e) 中 ya 在左边展示了一个环,有时中间的竖立呈向左拖的趋势。最后 ha 的右端在 B.1 行的 graha 中向下拖得很远 。

这种手写体呈一种普遍变斜的倾向,极为强调箱形头,有时甚至发展成为一条横线。我们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它大概是源自于迦腻色迦纪元 131 年。

接下来的第 37 雕像也是一个四边形的耆那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

底座上的铭文^②如下:

A. 1. “siddham sa(m)vatsare 30 2 hemantamāse 4 divase 2 vāraṇato ganāto. yāto ku -

A. 2.

B. 1. (ga?)ṇi arya nandikasya nirvarttanā jitamitraya ru (dra?) nandisya dhātu buddhisya kuṭumbiniye prā(bhā?) -






B. 2. rikasya. . nī. . . i(s) ya mātu gandhikasya arahantapratimā sarvvatobhadrikā.”

译为:

“成功! 在 32 年冬天第四月第二天,在(迦尼?),尊敬的南迪卡,……瓦拉那·迦那,……亚·库拉的请求下,鲁(德拉)南迪的女儿,布迪的妻子,普拉(巴)里卡和香料商…尼…的母亲,吉塔米特拉奉献了这个阿罗汉的四重雕像。”

尽管尚未证实同样的四边形雕像在早期贵霜时代已不存在,然而多半它们属于后贵霜时期,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四重雕像能够确定为源自早期贵霜时代,而另一方面,我们能指出好几个能使人接受它们是源自后贵霜时期的例子。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称属于路德斯表中第 37 的四边形雕像的这段铭文中没有记述贵霜的统治国王。这种书写给予我们这一部

分源自后贵霜时期的推测以完全的证明。首先,书写普遍呈斜体趋势。此外,箱形头在各处都发展成为一条横线。字符 ku 总是一种明显的因素,在这儿展示为一种晚期的形式,例如在 A.1 行最后的字符 ku 和 B.1 行的 kuṭumbiniye 中。在这个例子中增补的 u 与字符  以这样一种方式相结合,垂直线在下面就变成了一个卷。而且,在 A.1 行的 vāraṇato 和 gaṇāto, B.1 行的第一个字符 ni 中,na 呈一种明显的圆形。Na 在一个地方向我们显示出它展现的已经是一种开始与晚期笈多时代 na 相像的形式 ,即在 B.2 行的 rikasya...ni 中,在那儿我们认为字符左边的一个小环是看得见的 。sya 在 B.1 行的 ru(dra?)nandisya 中的奇怪形式值得注意。这儿增补的 ya 没有与 sa 右边的垂物而是与左边的竖体相连结 。最后在 A.1 行的 divase 和 hemanta 中 da 和 ha 仍为有角的形式 。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列举的晚期书写的特征足以使人信服地得出最终的结论,这个雕像不可能制于胡毗色迦王统治下的迦腻色迦纪元 32 年。因此我们认为路德斯表的第 37 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32 年。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路德斯表的第 39 并非制于 35 年,而应是 135 年。^②

在若干铭文的标题中确实记述了统治的贵霜君王名字的编号,而在路德斯表的第 44 中并没有这一部分。它是个耆那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底座上的铭文^③原文如下:

“siddham saṃ 40 5 va (2 或 3) di 10 (7) etasya purv(ā)
yā.....yaye buddhisya vadhuye dharmavṛddhisya....”

译为:

“成功！在 45 年雨季的(二或三月)第十七(?)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由布迪的儿媳妇,达马沃尔迪的……”

字符的形状大体上没有给人以很晚的印象,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也并不是特别古老。它们雕刻得非常小而细致,没有那种标志是后贵霜时期的字符的疏忽与斜体。不过 ya 在一些例子中显示出左边有环,而这在晚期的铭文中就变得正常。在这儿只有一张这个雕像的照片是明显的,但迄今字符的形式给人以一种印象,我们涉及的是一件来自后贵霜时期的铭文。现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③对于有关阿摩西尼(Amohini)雕像年代的字符是 40 还是 70 存在有一场争论,对此拉普森和路德斯依次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路德斯的观点更有可能正确。我们努力通过论据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证实,因此讨论中的铭文似乎被确定为了迦腻色迦纪元 45 年。

此后接着是路德斯表中的第 45,一个也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像,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底座上的铭文^④原文如下:

1. “sa 40 7 gra di 20 etadya purvayam varane gane petivamika kule vācakasya dehanadisya śisasya senasya nivatanā savakasya

2. pusasya vadhuye giha.... k(u?) tibi(n)i..... (puṣa) dina (sya) (mātu).”

译为:

“在 47 年夏天的第二(月)第二十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在瓦拉那迦那,婆提瓦米卡·库拉的一个传教士德哈那达的学生塞纳的请求下,俗家听众普萨的儿媳妇,吉哈的主妇(?)……(普萨)迪那的母亲……的(这个礼物)。”

考虑到我们刚好谈到了关于 40 和 70 的符号,也许这件的年代是 47 年。

据这件铭文说这个雕像的建立是在德哈那迪的学生塞纳的请求下发生的。现在,德哈那迪的学生塞纳这个完全相同的名字在

一个耆那像中也被提到,它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②尽管这段铭文非常零碎,^③仍能辨清铭文开头之处的单词 maharajasya rajatirajasya。

1. “siddam mahārājasya rājātirājasya.....”

2. dehanandisya śiṣyeṇa sen.....”

译为:

“成功!(在...年...)伟大的王,王中之王的……由德哈那迪的学生塞纳……”

众所周知,这些称号是贵霜王朝国王特有的,因此我们能接受这件是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00 年之前或左右的事实。

现在假定路德斯表的第 45 号铭文中百位数确实被省略是事实,因此这个雕像正确地应确定为 147 年,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 147 年提到的传教士塞纳在贵霜王朝期间就已经任职。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相似性并不强烈,路德斯表的第 81 刚好制于 100 年左右,这个雕像制得越早,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塞纳的任期假设得越长。此外,还必须增补乍一看由于书写而导致的大体的印象。字符在石头上雕刻得小而仔细。它们缺少后贵霜时代铭文中的疏忽与斜体。后贵霜时期的许多字符总是展现出一种强调的箱形头,而这儿则几乎没有给予这种特征。

考虑到所有的事情,我们并不认为正被讨论中的第 45 雕像更可能属于年代中省略百位数的那种。

路德斯表的第 47 是一个阿罗汉的南迪亚瓦(Nandiavarta)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目前藏在罗克诺省博物馆,^④确实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49 年(见图 66)。比累尔把年代解读为 79,^⑤拉普森^⑥与沃格尔^⑦也如此。即使在保存的残像中没有提及统治者的名字,对我们的观点而言,小狮子位于底座两侧的事实便是显著的证据,这在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的前半期是惯有的。

路德斯表的第 48 也是一个“pratimā sarvvatabhadrikā”,通过拓



片进行判断,侍祭立在四边的雕像的左右。

这个雕塑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底座周围的铭文^③原文如下:

- A.1. “.....(6?)..he..di 10
B.1. etasya pūrvvāya varanato ga(ṇa) -
C.1. to āryyahālak(ī)yato kulato
D.1. vajanagarit(o) ś(ā)kh(ā)t(o) śi(ri)yat(o)
A.2.(ga)to dat(i)sya śisīniye
B.2. mahanandisya sadhacariye
C.2. bakava(r)maye nandaye ca śisīniye
D.2. aka(或 ā)maye nirvarttanā.....
A.3. ..(sya) dh(ī)tu gramiko jayadevasya vadhūye
B.3. (gra)miko jayanāgasa dharm(m)apatniye sihadata(sya?)
C.3. (matu??)...pā(或 lā?)ye danam.”

译为:

“成功! 在 6(?)年)冬天第……(月)第十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在南达和巴拉瓦尔马的女学生阿卡马,马哈南迪的萨达卡里,达提的女学生,瓦拉那·迦那,阿亚-哈拉基亚·鲁拉,瓦加那迦里·萨卡和西(里)亚·桑波霍迦的请求下,(奉献了)西哈达塔的……帕(或拉)(母亲?),村子头人加雅那迦的第一个妻子,村子头人加雅提婆的儿媳妇,……的女儿的这个礼物。”

这段铭文未提到统治王的名字,因此这个雕塑就存在有源自后贵霜时代的可能性。年代中的数字呈一种特殊的形状 , 根据比累尔,它解读为 40,但我们认为它看上去不太像平常的 40 的符号,^④尽管可能数字被毁坏了,所以有些畸形。像它现在这个样子,类似于非常晚的 6 ,但我们并不敢下结论。此外,其书写给人以非常不讲究的印象,书写得相当斜,所以由于诸如左边带环的

ya 的形式的细节,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书写源自贵霜最晚的时期,或甚至是后贵霜时代。在 C.1 行的 kulato 的字符 ku 𑀓 中增补的 u 略向下斜,它以这种特征出现在迦膩色迦纪元 70 ~ 120 年间。这段铭文的书写体值得注意还有一点是因为显著的连体字 nda, 在 B.2 行的 nandisya 和 C.2 行的 nandaye 中,增补的 da 与增补的 ya 𑀓 是极为相像的。

对于这个对象是一个 pratima sarvvatobhadrika 的事实补充的种种事情表明,极有可能第 48 属于后贵霜时代初期。同时只要没有可以利用的这个雕像的复制品,我们就能在 106 年后放上一个问号,假定它可能是第 48 号的一个年代。


现在我们继续进行,来到路德斯表的第 50。这个瓦达马那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底座上的铭文^⑤原文如下:

1. “.....(7?) he 2 di 1 asya purvvayā varanato ganato ayya nyis-takulato (sa).....
2. .. khato śirigrihato sabhogato bahavo vacak(o) ca ganino ca samadi..
3. .. casya dinarasya śisīni ayya jinadasi paṇatidhari taya śisīni a (yya?)
4. ghakarabapaṇatiharama (或 ā) sopavasini bubusya dhita rajyava-susya dhama.....
5. d(e) vilasya matu visnubhavasya pidamahika vijīayasīriye dana vadha.....
6.”






翻译如下:



“.....(7?), 冬天第二(月)第一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布卜的女儿,拉兹亚瓦苏的第一个妻子,德维拉的母亲,维斯努巴瓦的祖

母,维加亚西里的礼物,瓦达(马纳)(的这个雕像被建起),她斋戒了一个月,阿(亚)...的 panatidhari...迦卡拉巴的潘那提哈拉(她是)尊敬的吉纳达西的女学生,迪那拉的女学生,伟大的(?)传教士,瓦拉那·迦那,阿亚尼斯塔(?)·库拉,桑(迦西亚)·萨卡和西里格里哈·桑波霍迦……的 gani 和 samadi(?)。”

年代是不可辨认的 。它可能是数字 50。在 7 的例子中存在一个十进位位于其前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年代可以说并不确定。

书写的一般印象是它写的并不很斜而不讲究,但好几个字符表明它是晚期的一种形式,指出了是贵霜时代最后十年中的一个时间,或是接下来的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此外,箱形头是现在的,但尚未发展成为出现在后贵霜时代晚期那样的一条横线。

在 1 行 kulato 中的字符 ku  中,ka 的水平横杠不再单纯是水平的,而是相当弯,下面的 u 又由两条线组成,上面的是水平的,下面的则向下弯。这种相同的特征我们已在迦膩色迦纪元 25 年(解读为 125 年)的路德斯表的第 32 号铭文中发现。5 行的 matu  和 viṣṇubhavasya  中增补的 u 表现为曲线,尽管在其上看不见第二条横线。在 1 行的 asya; 4 行的 bubusya, rajyavasusya; 3 行的 vasya, dinarasya, ayya; 5 行的 d(e)vilasya 和 visṇubhavasya 中增补的 ya 把右边的竖体拖得非常高,甚至已到了其他字符的顶线 。我们在贵霜时代末期和以后的铭文中遇到过这种特征。Ha 右边的笔划在 1 行的 he; 2 行的 śirigrihato; 4 行的 panatihara; 5 行的 pidamahika 中几乎向下到了字符的最底端 ; 此外下面的角也非常明显。ṇa 在 1 行的 varanato 和 ganato; 2 行的 ganino; 3 行的 panatidhari; 4 行的 panatihara; 5 行的 viṣṇubhavasya 中呈一种非常圆的形状。而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 ya 左边都有一个小环,但中间的直线并不总向左斜,如在 1 行的 purvayā 和 ayya; 3 行的 ayya 和

paṇatidhari;5 行的 vijayasiriye 中。最后,让我们提一下 da 的形状,它在左边显示为一个明显的角,斜向右下 ,就如在 3 行的 dinarasya, jinadasi;5 行的 d(e)vilasya, pidamahika 和 dana 中一样。在相常多的例子中,na 与 ta 极为相似,如在 5 行的 dana 中,这种特征甚至在晚期书写体中更为明确 。

我们总结的所有特征证明了虽然这种书写体并没有这样晚,但在许多的情形中它并非源自于贵霜时代初期,而更应属于那一时代的最后十年,甚至更像是后贵霜时代的初期。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表明这是后贵霜时期的一个年代。在铭文中瓦达马纳像的捐助人更明确地指为是德维拉的母亲和维斯努巴瓦父亲的祖母。现在路德斯表的第 36 号铭文使我们知道了在迦腻色迦纪元 31 年(解读为 131 年),^④带有那段铭文的雕像由某个格拉哈西里,德维拉的妻子奉献。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确定是否维加亚西依的这个儿子与格拉哈西里的丈夫是同一个人,因为格拉哈西里自己没有说她是维斯努巴瓦的母亲,也是德维拉的妻子。那样就将没有任何疑问。如果两个德维拉是同一人,那么在格拉哈西里奉献路德斯表的第 36 时她可能还没有儿子,但她在她的婆婆捐助路德斯表的第 50 号雕像期间生下了一个儿子维斯努巴瓦。根据这个论据那么第 50 号雕像将比第 36 号雕像更晚,因此必须被确定为晚于迦腻色迦纪元 131 年。也可能格拉哈西里在 131 年已经是德维拉的母亲,但由于缺乏空间它不能被雕到石头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部分铭文又雕在了雕像边上就利于辨明这个事实。

接下来是路德斯表的第 53 和 54。我们先来解决 54,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己掌握的这个雕像的复制品(见图 59)。这个雕像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它表现为蹲姿而卧的女神萨拉斯瓦提(Sarasvati)。她左手捧着一本书,右手则紧握一串








念珠,经调查还可以看到四个念珠。手的其余部分也像头部一样毁坏了。女神坐在位于底座之上的坛上的石头背景之前。坛每边都立着一个崇拜者。她左边的雕像双手合十,另一个雕像手中的布上则携有一个壶,或是罐子,大概是为了装圣水,这是崇拜者经常展现的一种姿势。再来看这个雕塑的安排:崇拜的人像在坛上坐或站立,重叠于刻有题词的底座上,而在两边崇拜者则立在底座自身上,这是后贵霜时代艺术的一种特有的特征,如见于路德斯表的第24(见插图22),25^②,27^③,48^④和122(见插图23)的耆那像,根据复制品的拓片它显示出类似的安排。




坛和柱脚上的铭文^⑤原文如下:

1. “(sid)dham sava 50 4 hemaṃtamāse catu(r)th(e) 4 divas(e)
10 a -
2. sya purvvaṃ koḷeyato ganato sṭhaniyāto kulāto
3. vairāto śakhāto śrīgrh(ā)to saṃbhogāto vācakasyāryya
4. (gha)sta(或 u?)hastisya śimṃyo gaṇisya ayya māghahastisya
śraddhacaro vācakasya a -
5. ryya devasya nirvarttana govasya sīhaputrasya lohikakarakasya
dānaṃ
6. sarvvasatv(ā)n(ā)m hitasukhā ekasarasvatī praṭiṣṭjāvitā sta-
vatale(na) dānavato
7. dha(r)m(e?).”

译文如下:

“成功! 在54年冬天第四月第十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在传教士,尊敬的德瓦,迦尼的斯拉德哈卡罗,尊敬的马加哈斯提,传教士,尊敬的(格拉)斯塔(或图)哈斯提,克里亚·迦那的学生,斯塔尼亚·库拉,瓦依拉·萨卡,斯里格拉·桑波霍加的请求下建立起了西哈儿子史密斯·格瓦的礼物——一个斯拉斯瓦提像”。

在书写中可以观察到各种特征。通常箱形头涂得很明显。2行中的 *kulato* 的 *ku* 在笈多铭文中显示为完全一样的形式, 因为增补的 *u* 在这个字符下变成了一个逗号 。此外 3 行的 *śrigr̥h(a)to* 的 *r* 也如笈多时代铭文中有着同样的形状, 即向右转的一个下加符号 。在贵霜时期和后贵霜时代早期的铭文中, *r* 很少出现, 大多数由 *ri* 替代。上面所写的 *o* 呈连号的形式, 如大多数晚期北印度字母中所显示的, 古代的 *v* 形完全丧失了:  代替了 ; 例如见 2 行的 4 个 *o*, 3 行的 4 个 *o*。多数 *sa* 仍显示为古代的形状, 但 1 行 *divas(e)* 中的 *sa* 看上去显示的是在左下角增加了一个环的晚期的形状, 就如在笈多时代最为习惯的 。此外, *ha* 和 *la* 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底角, 例如在 1 行的 *hemanta*; 3 行的 *śrigr̥h(ā)to*; 4 行的 *(gha)sta* (或 *u?*) *hastisya, māghahastisya*; 5 行的 *sihaputrasya*, 6 行的 *hi-ta* 中: ; 以及 2 行的 *kulato*, 5 行的 *lohikakarakasya*, 6 行的 *stavatale (na)* 中: 。

我们必须提到在原始的照片中 1 行中的字符 *ku* 比拓片中的更为明显(见图 59)。我们来区分一下 *ta* 底部的明显的小拱 , 这也是一个更近的特征, 因为我们已经在涉及字符 *ku* 时提到过。在更古一些的铭文中 *tu* 频频重复为带有一条横线 。*Ya* 在左边展示有一条环, 而中间的竖线几乎总是向左倾斜, 如 2 行的 *purvāyāṃ, koḷiyāto, sthāniyāto*; 3 行的 *āryya*; 4 行的 *aryya*; 5 行的 *aryya*。可能最终字符 *ra* 在 4 行的 *śraddhacaro* 和 5 行的 *lohikakarakasya* 中由于垂直笔划的向上弯曲而展示为一种晚期的形式 , 也可能由于这一事实随韵 (*anusvara*) 在 5 行的 *danam* 似乎是一条横线。

所有这些风格与字符形式的特征表明, 这段铭文一定晚于迦赋色迦纪元制度下的 54 年。由于内容中没有提到统治君王, 我们

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没有了异议,路德斯表的第 53 的萨拉斯瓦提雕像一定是在 100 年之后,确实是迦腻色迦纪元 154 年,也就是公元 232 年。

现在根据这段铭文,这个萨拉斯瓦提雕像是在阿亚·马迦哈提的伴侣,克里亚·迦那,斯塔尼亚·库拉,瓦依拉·萨卡,斯里格哈·桑波霍迦的传教士阿亚·哈提哈提的学生,传教士阿亚·德瓦的坚持下制作的。同一个人在路德斯表的第 53 号雕像上的铭文中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雕像,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底座上的铭文^②原文如下:

1. “siddha samvatsar(e) dvapana 50 2 hemantu(mā)sa pratha(ma) divasa pa(m)cavīsa 20 5 asma kṣun(e) k(o)ḷiy(ā)to gaṇāto

2. verato śakhato ṣṭanikiy(ā)to kulat(o) śrīgrhato sambhogato vācakasyaryya ghaṣṭuhastisya

3. śisyo gaṇisyāryya ma(m)guhastisya śadhacaro vācako aryya dev(o) tasya nirvartanā śurasya śrama -

4. ṇakaputrasya goḷikasya lohikākarakasya dānaṃ sarvasatvānaṃ hitasukhāyāstu —”

译为:

“成功! 在 52 年冬天的第一月第二十五天,那时,在传教士,尊敬的德瓦,迦尼的斯拉达卡拉,尊敬的马古哈提,克里亚·迦那,维拉·萨卡,斯塔尼吉亚·库拉,斯里格拉·桑波霍迦的尊敬的传教士加斯图哈提的学生的请求下,(奉献)了斯拉马那卡的儿子,铁匠格里卡,苏拉的(这件)礼物。可能它是为了所有生灵的幸福与快乐!”

因此路德斯表的第 53 也是在传教士,尊敬的德瓦,尊敬的马古哈提等等的坚持下而制的,我们认为对于那两个人的一致是不会有疑问的。这样迄今为止路德斯表的第 53 就极有可能同样被确定得很早,可能正确地应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152 年。

关于古文字的细节,我们在 2 行的 kulato 中首先发现了字符 ku 的非常晚的形式³。下加符号在这儿非常大,向左拖得很远,这是一种与笈多时代形式非常相像的形式。上面所写的 o 在 2 行的 verāto, śakhato 和 sambhogāto 中像在路德斯表的第 54 中一样又有着同样的形式⁴。字符 ha 和 la 有着明显的底角,如在 2 行的 śnigṛhato, ghaṣṭuḥastisya; 3 行的 ma (ṁ) guḥastisya; 4 行的 lohikakarākasya, hita 中:⁵以及 2 行的 kulat(o); 4 行的 lohikākārākasya 中⁶。Na 经常呈明显的圆形⁷,如在 1 行的 ksnu(e); 3 行的 gaṇisya; 4 行的 śraṇanaka 中。随韵趋于变为一条横线,如在 2 行的 sambhogāto 和 4 行的 danam 与 satvānam 中。最后,r 在 2 行的 gṛhato 中又很显著⁸。总之,这种书写给人以斜体的印象,箱形头在适合它的字符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所有列举出的特点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观点,第 53 的年代中百位数被省略了,这样它真正应源自 152 年。

接下来的雕像路德斯表的第 55 已经讨论过了,⁹这个雕像被证明不应确定为 57 年,而是 157 年。

路德斯表的第 57(见图 52)耆那立像的柱脚被切割了开来,它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雕像本身是破裂的,保存下来可看到的只有一只脚。它们立在一个坛上,其底座装饰以一些弓形的线。1887 年比累尔解读这段铭文如下¹⁰:

1. "namo arahamtānam, namo siddhāna sam 60, 2
2. gra 3 di 5 etāye purvāye rārakasya arya kakasaghastasya
3. śiṣyā ātapiko gahabaryasya nirartana caturvarṇasya samḥasya
4. yā. . dinnā paṭibhā(bho?)ga 1(?)|(?) vaihikāye datti"

1904 年,比累尔¹¹将 rārakasya 修改为 vācakasya, gahabaryasya 修改为 grahabalo tasya。最后,1909 年,¹²拉卡尔·达斯·邦迪奥帕迪亚雅(Rakhal Das Bandyopadhyaya)再次改变了这种解读,就我们所知,

他是最后一个写作这一底座上铭文的著者。根据他原文如下：

1. “namo arahamtanam namo siddhana(m) sam 60 2
2. gr 3, di 5, etaye purvaye rarakasya arya kaka maghastisya
3. sisya atapiko gahabayasya nivartana caturvanisya samghasya
4. yatha dinnam patibhagam, aihikaye det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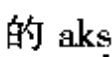
他翻译为：

“崇拜阿罗汉，崇拜西达斯，62年夏季的第三(月)第五天，在阿亚·卡卡玛迦斯提的女学生，一个拉刺本地人阿塔皮卡·迦哈巴亚的请求下，在上述的日子，(它得以完成)。(因为接受了)这个社会包括四个阶层。为了这个世界的目的，所被给予的每一份都被给予了。”

班纳吉的解读是：maghastisya 替代了 saghastasya；detti 替代了 datti，就如他在4行中把 ya 补充为 yatha 一样，他常解读为 a，而比累尔在那儿则解读为 ā。我们对此完全同意，但从个人角度来讲，更情愿将 rarakasya 解读为 rarakasya。照片和拓片^⑦清楚地显示出对 ra 来说，两个 aksaras 完全一样。不过，可能雕刻家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真正应写为 vācakasya，就像路德斯所主张的，因为那才是我们在 arya 前的地方期待发现的词。不过，这个字符明显不是 va。班纳吉的从 śisya 到 sisya 的变化一定是基于一种误解，因为第一个 s 是 śa 而非 sa。比累尔解读为 śisya，但他没有确定那指的是一个女学生，他的翻译证明：“在阿塔皮克·格拉哈巴拉，传教士的学生，尊敬的卡卡萨迦斯塔的请求下。”不过，R. D. 班纳吉采纳了这个 ā，在他看来，它与阴性的 gahabayās 有关，他把这段话翻译为：“迦哈巴亚，传教士的女学生，尊敬的卡卡萨迦斯塔。”不过，这个拓片显示的是 śisyo，而并非 śisya。从语法上讲，这种形式也更加符合其后的 atapiko，两个主语都是阳性。如果这个雕刻家确实期望表明阿塔皮卡·迦哈巴亚是尊敬的卡卡·马迦斯提的一个女学生，那么他当然用 śisini 这个词。在我们所检查的提及女学生的十二

个铭文中, *śisini* 用了十次, 或是用略为不同的方式写成。⁴³ *antevāsikini*⁴⁴ 用了两次。在指出是一个女学生时频频使用 *śisini* 这个词, 使其甚至更可能应真正解读为 *śisyo* 而非 *sisyā*。

对于比累尔, 路德斯和班纳吉间对于紧接着 *śisyo* 的这个词的第四个字符, 即 *gahaba...* 等的争论, 我们并不敢表达任何非常肯定的言论。

1891年, 比累尔改变了其想法, 更倾向于解读为 *la*。⁴⁵ 此外在这段铭文中并没有其他的 *la*, 我们可以将谈论中的字符与其相比较。有好几个 *ya*, 如在4行开头的, 呈比上述字符更为圆的形状 , 而其他的, 如2行的  则要更方一些, 但明显不像谈论中的 *akṣara*  那样显著, 而对比出现在这件中的所有其他 *ya*, 这个字符的三条竖线间的空间看上去划分得很不均匀, 这样将这个字符解读为 *ya* 就有异议, 另一方面, 并非必须要将其解读为 *la*, 除非指出另一件铭文中提到了某个 *atapika Grahabala*, 而其名字确实与谈论中的铭文极为相似。⁴⁶ 比累尔和路德斯指出了这种相似, 我们推断这就是为何他们将谈论中的这段铭文的有争论的字符解读为 *la* 的一个原因。此外, 班纳吉在这个名字中解读为是一个 *ā*。

不过依照我们, *gahaba... asya* 中的 *a* 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元音字母总显示为一条横线, 并多在右角, 而在这种情形中一条线明显垂直向上, 这也许是石头上的一个裂缝, 但肯定不是 *ā*, 至多是个写在上面的 *r* 和附属的 *i* 或只是一个残缺的 *i*。不过我们认为在所有的可能中, 相关的完整字符最多可能是个 *la*。这个字符左直线上的横笔仍能在照片上看到, 是 *la* 的一种特征。右角下面的太长的线可以解释为是雕刻家的手误。

很明显, 尤其是这段铭文的最后一部分极为背离通常在这些奉献的铭文中所发现的。如果我们把这篇原文与几乎是同一年的其他铭文相比, 即迦腻色迦纪元 60, 74 和 80 年, 区别是明显的。我们不必考虑对阿罗汉的祈祷, 因为我们在其他的铭文中也碰到

过。不过有关这段铭文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路德斯,比累尔和班纳吉的转写中,显然并未提到捐助人的名字。在一个奉献的铭文中顺序通常如下:在迦膩色迦王朝的范例中,首先是以所有格的形式提到统治者的名字,然后是迦膩色迦纪元的年,月,日;此后,通常是 *etaye purvāye*(或一种稍类似的形式),有时也是 *etasmin ksune*(或一种类似的形式)。然后命名导致奉献雕像的发动者,并借此明确声明他或她的老师(男性或女性)。有时还提到宗教指导者的领袖,有时也是一个那样的老师,这样与我们有联系的就是完整的宗教老师的阶层,同时我们获悉他们属于迦那,库拉,桑波霍迦和萨卡。这种说明之后捐助人名字以所有格出现。然后接下来是礼物的说明,紧随着是 *dānam* 或 *deti*,即“这是……的礼物”。翻译这些铭文的一个难处是其特征并不像它们所属的单词那样被置于同样的情形中的事实而形成的。




考虑到刚提到的顺序,我们愿意把这段铭文与所有隐藏的解读翻译如下:

1. “*namo arahantanaṃ namo siddhana(m) saṃ 60 2*
2. *gra 3 di 5 etaye purvaye rarakasya arya kakama(m)ghastisya*
3. *śiṣyo ātapiko gahabalasya ni(r)vartana caturvanisya saṃghasya*
4. *yathadinna paṭibhāga—vaihi(k)āye detti—.*”

译为:

“崇拜阿罗汉,崇拜西达斯。在 62 年夏天第三(月)第五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一份荣誉的礼物^②由瓦依西(卡)^③在(传教士?)的学生,尊敬的卡拉·马(姆)迦斯提,阿塔皮卡·迦哈巴拉的请求下以如同前面场合(盛会)中所给予的相同方式^④献给了这个四重的社会。”

古文字值得注意,通常这些字符比那些在 60,74 和 80 年已经提到的铭文的形式更晚。如在 1 行中随韵作为横线替代点出现了两次。因此柱脚显然不是源自 62 年,而是 162 年。我们认为字符

ma 是明确的。我们所拥有的照片与班纳吉文章中的拓片在三个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了这种字符,两次在 1 行的 namo,一次在 2 行的 ma(m)ghastisya。不过路德斯在这儿解读为 saghasta,但争论的字符在我们看来更像 ma 而非 sa。在前两个例子中 akṣara 看起来像 , 这样单独的 ma 是 。第三次 ma 采取了  的形式,就像在好几个笈多铭文中其曲线从左边的竖线处消失了。

根据比累尔,⁵³这两种彼此极为相似的形式并没有出现在源自公元 70 到公元 250 年的铭文中。这说得就非常广了,因为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ma 已经以这种晚期的形式⁵⁴较早地出现了,即公元 190 年左右,因此我们断定这件源自于贵霜和笈多时期之间,从公元 190 年后的 ma 的形式判断,或者,如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年代放到迦腻色迦纪元期间,那么就是 162 年,即公元 240 年。

这一次我们并未看到这个雕像,而只是基于古文字的原因得以作出了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自我想象这个雕像最初看起来像什么。也许它是个外形只得到稍稍发展的裸体的耆那立像,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 105 和 115 年的那些。另一方面,这个雕像不是源自笈多时代,那已由升高的带有奇怪拱线的基座的显著的形状所证实,我们在笈多艺术同样的外形中尚未遇到过。

不过在贵霜艺术中有一种相似的柱脚,确定为 9 年,⁵⁵由班纳吉公布⁵⁶(见图 64)。这也表现的是一尊裸体的耆那立像。在主像的右边立着两个小的男崇拜者,背靠背,左边则立着一个女崇拜者。雕塑的每边是一个细长的带柱头的柱子。这件的背部表现的是一棵带叶、枝、花丛的大树。树右边立着一个右手携花环的小妇人像,一个小孩站在她的前面。

基座上的铭文如下:

1. “siddham sam 9 he 3 di 10 | graham (i) trasya dhitu sukhasirisya⁵⁷ vadhu ekadalasya

2. koḷiyāto ganāto | (a)rya taraka(s)ya | kuṭu(m)biniye

3. ṭhānīyato kulāto vair(ā)to (śākha)to | (ni)va(r)tanā |
grahapalāye dati.”

在雕像的脚之间有两行非常短的铭文,写着:1.“Arya pragha – 2.masya śisīni”,即“尊敬的普拉迦玛的女学生”,根据班纳吉(而且他解读为阿迦马斯亚),它与雕像的捐助人有关。对此我们不能同意。在这些铭文中“某某的学生”是男或女传教士名字中常有的附加物,在他的鼓动下制作了这个雕像,因此这种例子可能也是这种情形。





对这段铭文进行思索之后,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词的奇怪顺序。在《印度铭文》第10卷109页对面的这段铭文的复制品中,我们看到这段铭文在前面和左边被切割开了。我们认为在我们首先将这段铭文的那部分写在雕像的边上时,我们获得了这些词的重要和合理的顺序,然后进行前面的,先是脚间的两行,接着是左边的“莲花瓣”,此后是上线的右手部分,最后是右手边的“莲花瓣”。为清楚起见,我们在本页转写的不同部分之间放入一条垂线。那么按照上面的顺序解读,这段铭文如下:

“siddham saṃ 9 he 3 di 10 koḷiyāto ganāto ṭhānīyato kulāto vair(ā)to (śākha)to aṛya praghāmasya śisīni (a)rya taraka(s)ya (ni)va(r)tanā graham(i)trasya dhita sukhāśirīsyā (s)ya Vadhū ekaḍaḷasya kuṭu(m)biniye grahapalāye dati.”

按照这种顺序,这段铭文翻译为:

“成功! 在9年冬季第三(月)第十天:依卡达卡的妻子,苏克萨依里的儿媳妇,格拉哈米特拉的女儿,格拉哈帕拉的礼物,在尊敬的塔拉卡,克里亚·迦那,塔尼亚·库拉,瓦依拉·萨卡的尊敬普拉迦玛的女学生请求下。”

根据这段铭文,这件确定为9年,而班纳吉甚至还称:“……在贵霜纪元9年,可能一定是指迦赋色迦皇帝的统治。”^⑥很抱歉我

们对此并不能同意。乍一看这段铭文给人以一个晚期年代的印象。字符被切割得非常粗心,这不能归于是石头的磨损。连字 gra 晚于迦腻色迦 9 年,在 1 行的 *sukhasirasya* 和 *ekadalasya* 中能够清晰地看到 ya 右边的笔划仍极为向上。在所有的例子中 ya 都有一个小环,如 2 行的 *koliyato* 和 *kuṭu(m) biniye*; 3 行的 *ṭhanyato* 和 *grahapalaye* 。连字 sya 中的 s 在 1 行的 *graham(i) trasya* 和 *ekadalasya* 中似乎在左下角展示为一个小环 。字符 ku 在 3 行的 *kulato* 中表现出明显的晚期形式 , 我们通常发现于后贵霜时期。最后可能提到的在适合它的字符中的箱形头极为强调,有时呈大钉子头的形状。这段铭文是晚期的这种印象的一个确证是脚间 2 行中的字母 ma 的形式 。我们认为 ma 的这种形式肯定未出现于迦腻色迦纪元 9 年,正如讨论过的铭文,更像是笈多时期字母中 ma 的原形。因此我们认为自己证明了将这个雕像确定为迦腻色迦纪元 109 年。

由于基座被切割掉拱线或是曲线的这两个雕像在时间上彼此相距并不太远,即 109 年和 162 年,基座上这样的修饰在后贵霜时代显然并不罕见,这样将路德斯表的第 57 归于笈多时代就是草率的。(它们)与后贵霜时代的雕像和铭文有着很多的肖像、古文字、碑铭和风格上的相像。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在路德斯表的第 57 上停留这么长。其原因是前面提到的事实,路德斯相信在这段铭文以及第 58 中提到了同一个人,即阿塔皮卡·加加拉哈巴不得德,传教士阿亚·卡卡马(姆)迦斯提的学生,后者与路德斯表的第 58 铭文中提到的传教士阿亚卡库哈斯塔(或提)可能是同一个人。

路德斯表的第 58 铭文^⑥刻在一尊耆那坐像的基座上,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写着:

1. “siddha(m) sa 60 2 va 2 di 5 etasya puvaya vācakasya


āyalakuhastha(或 i?)s(y)a

2. vāranaganīyasa śiṣ(y)o grahabalo ātapiko tasa nivartanā.”

译为：

“成功！在^②年雨季第二(月)第五天，在所指的这个场合，在尊敬的传教士瓦拉那·迦那的卡库·哈斯塔(或提?)的学生阿塔皮卡·格拉哈巴拉的请求下.”

如果它像路德斯相信得那样正确，在第 57 和 58 的铭文中提到了同一个人，那么就证实了这两件都源自同一时期的结论，既然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可使人接受第 57 源自于 162 年，那么第 58 一定也属于同一年。解读后一个铭文的名字时，阿塔皮卡·格拉哈巴拉的名字非常明显。他老师的名字路德斯解读为卡尔库哈斯塔(Karkuhastha)，依此，我们也正好可以解读为卡库哈斯塔(或提)，因为其字符非常接近铭文的上面的边缘。因此写在字母 ka 上的 r 非常模糊，可能在那儿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这也可能是 i 在连字 stha 之上的情形。尽管在提到的两个铭文中的名字不是太一样，即使我们在解读第 58 时是 kakuhastisya，但它们还是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相像。在两个例子中，一个人被提到其名字开始于格拉哈巴(Grahaba) . . . 或迦哈巴(Gahaba) . . . (这在梵语和普拉克里特语中是一样的)。两个人都带有绰号阿塔皮卡，就我们所能查到的，这在其他的这种铭文中从未用过。两个人都是一个名字以卡卡(kaka)或卡库(kaku)开始，以哈斯塔(hasti)或哈斯特依(hasthi)结束的人的学生，这种偏差在这些铭文中显得很有规律。

此外，两个铭文的年代彼此相距不是太远，因此极有可能在两个铭文中提到的是同一个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在铭文中碰到的 kakuhastha(或 i)s(y)a 中的 ku 是一种仅在迦腻色迦纪元 115 年之后才用的形式 ，在 varanaganīyasa 中的 na 呈明显的圆形，最后是突出的箱形头，我们认为这件看起来更像是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62 年。而且，在第 57 和 58 中提到的是同一人的事实并不像上面

所提到的古文字的论据自身就是充足的证据那样,是确切的因素。







在对路德斯表第 57 和表第 58 进行充分讨论之后,接下来是第 71,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它是个发现于坎卡里·提拉的耆那像,现藏于罗克诺省博物馆。其年代以前比累尔解读为 87,62 但他对此并不十分确定。很遗憾我们没有自己掌握的这个雕像的复制品,可是我们认为这件可以给人以属于笈多时代的印象。但为什么呢?

铭文写着:

“(saṃ 80) 9 gr 1 di (20?) a (smi) kṣuṇe uccenāgarasyaryya kumāranandīśyasya mittasya.”


译为:


“在(89?)年夏天第一(月)第二十(?)天,此时,(在)乌森那迦拉·(萨卡)的尊敬的库玛拉南迪的学生米特拉(的请求下?).....”


关于这种书写:所有的字符都有一个明确的箱形头,它呈钉子头形状,甚至不时呈三角状。不同的字符展示了我们在笈多书写体中也遇到过的特征。首先是单词 kumāranandi 中的字符 ku 。增补的 u 是字符下的一个非常大的卷,而 ku 的横线则极为弯曲。此外字符 gr ,其增补的 r 是个勾形符号,就像在笈多书写体和今天的那扎利中一样。而且 kṣuṇe 中的 ṇa 呈明显的圆形。也许 kumaranandi 中的 ma  已经显示出是晚期的形式 ,但那并不显著,也可能是古老的形式 。最后,uccenāgara 中的 u  是非常晚的,这种单独的字符大概已经明确了。总而言之,所以我們可能有论据推断路德斯表的第 71 的铭文源自迦膩色迦纪元 2 世纪,而并非像比累尔认为的 1 世纪。




在总结中我们简短地提一下路德斯表中的好几个编号,根据其字符或内容的形式,尽管年代未被确定,但可以划归到后贵霜




时代。

首先是第 84,⁶³ 由于字符 *na* 的形式非常晚 , 因此它必须放到这一种中。

然后接着是第 113。⁶⁴ 在这儿字符 *ku* 的形式  指出是迦腻色迦纪元 120 年后的一个时间。

第 118⁶⁵ 也属于一个晚期的时代, 又证明了字符 *ku* 的斜体形式 , 它显示出是一种更斜的发展阶段。

第 119 提到了阿亚·巴拉特拉塔的学生阿亚·桑迪,⁶⁶ 他在路德斯表的第 32 中也被提到过。我们确信后一部分⁶⁷ 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25 年, 因此第 119 一定也属于那一时代。也许我们甚至能更精确地说明这个年代, 因为在第 32 中提到了阿亚·桑迪的一个学生, 因此我们可能是在一个比第 119 所属时代稍晚的时期, 这样也许路德斯表的第 119 制于 125 年前。除了与第 32 的一致外, 第 119 的古文字也表明是迦腻色迦纪元 100 年后的一个年代, 如 3 行 *na* 的形式  和 1 行的 *tu*  及 *u*  的形式。

第 121⁶⁸ 和接下来的 122⁶⁹ 又是一个“*pratimā sarvvatobhadrikā*”, 也属于后贵霜时期。两者都提到了阿亚·杰斯塔哈斯提的学生阿亚·米西拉, 他在路德斯表的第 20 中也提到过。⁷⁰ 我们认为我们有力地证明了后一个提到的铭文源自于 105 年, 这样我们就能接受第 121 与 122 均源自那一时期的说法。两个铭文的古文字都表明了这点, 即使仅靠第 122 中几个连字  中的字符 *u* , *ku*  和 *sa* 的形式来进行判断。

路德斯表的第 123 的铭文写着⁷¹: “*siddha (m) vācakasya dattaśiṣyasya śihasya ni(vartanā?)*”, 即“成功! 在达塔的学生传教士西哈的请求下。”这段铭文和路德斯表的第 29 一样都提到了同一个人, 即达塔的学生西哈。⁷² 我们已经使人接受这后一个铭文源自

于后贵霜时代,因此我们断定路德斯表的第 123 属于同一时期,大概是迦膩色迦纪元 150 年左右。这种斜体非常符合这个年代。最后狮子的形状(见插图 24)与我们碰到的后贵霜时代的极为相似。

注 释:

① 《印度铭文》拓本,第 2 卷,1894 年,第 11。

② J.Ph. 沃格尔,《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 79 页。

③ A. 卡宁汉姆:《印度考古报告》第 3 卷,图版 13,第 2。

④ 韦苏提婆,总共几个,是耆那所崇拜的人的阶层。见古里诺特(A. Guerinot),《耆那教》,巴黎,1926 年,第 112 页,175 页;苏波林(W. Schubring),《古代原始资料中的耆那教》,《印度-斯基泰人语文与古代文化概论》,卷 3,第 7 期,柏林-莱比锡,1935 年,第 18 页以后。根据卡宁汉姆对沃格尔解释的粗略的描述进行判断:除了那时将要出现的肖像学的难点,我们认为不可能是韦苏提婆。(J.Ph. 沃格尔,《秣菟罗博物馆目录》,第 79 页。)

⑤ 见第四章。

⑥ 见第四章。

⑦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13。

⑧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14。

⑨ 见第六章。

⑩ 不过,这种表现头发的方式被耆那还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提尔塔姆卡拉斯(Tirthankaras)像上保持使用,在所有佛像上被半环线形技巧所取代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提尔塔姆卡拉斯表现出不同的修饰头发的方式。

⑪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3。

⑫ 在这种情形中进一步的迹象是惊人的:“克里亚·迦那,塔尼亚·库拉,斯里格里哈·桑波霍迦,阿亚-维里·萨卡”似乎属于这一雕像的虔诚的捐助者;见第 293 页中这些铭文中一般的次序。

⑬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28。

⑭ 见第四章。

⑮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29。

⑯ 见本章注 12 到 13 之间。

⑰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20。

⑱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5。

①⑨ 路德斯表,第 34;也见第四章,注 51。

②⑩ 路德斯表,第 71。

③⑪ 见本章注 62 - 67 之间。

④⑫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15。

⑤⑬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16。

⑥⑭ 见第四章。

⑦⑮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第 10。

⑧⑯ 见第一章的附录。

⑨⑰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30。

⑩⑱ 路德斯表,第 81。

⑪⑲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27。

⑫⑳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20。

⑬㉑ G. 比累尔,《更多的来自秣菟罗的耆那铭文》,《印度铭文》,卷 2,1894 年,第 195 - 212 页,尤其是第 XX,204 页,以及《来自秣菟罗的耆那雕塑的样本》,《印度铭文》,卷 2,1894 年,第 311 - 323 页,尤其是第 321 页。

⑭㉒ E. J. 拉普森,《秣菟罗的阿摩西尼供碑的年代》,《纪念查尔斯·罗克维尔·朗曼的印度研究》,51 页,以及《萨迦与贵霜时代期间秣菟罗铭文中的数字 40》,《东方资料实录》,卷 XI,1933 年,263 页。

⑮㉓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塑》。

⑯㉔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11。

⑰㉕ 也见《三件早期的婆罗迷铭文》中路德斯观点,《印度铭文》,卷 9,1907 - 1908 年,第 239 - 248 页,尤其是第 244 页。

⑱㉖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36。

⑲㉗ 见本章注 22 - 23 之间。

⑳㉘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13。

㉑㉙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3。

㉒㉚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11。

㉓㉛ 《印度铭文》拓本,卷 1,1892 年,第 21。

㉔㉜ 《印度铭文》拓本,卷 2,1894 年,第 18。

㉕㉝ 见本书第四章。

㉖㉞ G. 比累尔,《耆那传统的真实件》,《维也纳东方文化会刊》,卷 1,1887 年,第 165 - 180 页,尤其是第 172 页。

㉗㉟ H. 路德斯,《碑铭注释》,第 19,《萨姆 62 的秣菟罗耆那像铭文》,《印度文物》.L 作

者》，卷 33, 1904 年, 第 105 页。

④⑤ 邦迪奥帕迪亚雅 (Rakhal Das Bandyopādhyaya) (即班纳吉), 《印度博物馆的秣菟罗铭文》, 《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 卷 5, 1909 年, 第 237 - 244 页, 尤其是第 239 页。

④⑦ 邦迪奥帕迪亚雅, 图版 X, III。

④⑧ 即路德斯表的编号: 16, 18, 24, 32, 48, 50, 70, 75, 86 和 117。

④⑨ 路德斯表的第 38, 67。

④⑩ G. 比累尔, 《秣菟罗的新出土文物》, 《维也纳东方文化会刊》, 卷 5, 1891 年, 第 59 - 63 页, 尤其是第 63 页。他将 *gahabaryasa* 变为 *grānabaryasa*。

④⑪ 即路德斯表, 第 58。

④⑫ 在梵语中 *paṭibhaga* = *pratibhaga*, 相比较库路卡 (Kullūka) 在他对《摩奴》8, 307 的注释中 = *phalakusumās akṣatī mādyupāyanam pratidinagrahyam* (因此将每日的光荣礼物等献予了国 [])。我们将此归于冈达教授。

④⑬ 比较本章注 57 - 59 之间的 *grahapalāye*。

④⑭ 如在一个誓约中; 在梵语中 *yathadinna* = *yathadatta* (如在 *Rāmāyana* 中), 相比较: *yathākhyāta* = 如同昔日所告知的; *yathagata* = 如同人们以前习惯去的。

④⑮ G. 比累尔, 《印度古文字学》, 表三。

④⑯ 见本书第六章。

④⑰ 路德斯表, 第 22a。

④⑱ 班纳吉, 《新的斯基泰时代的婆罗迷铭文》, 《印度铭文》, 卷 10, 1909 - 1910 年, 第 106 - 121 页, 尤其是第 109 - 110 页, 第 3。

④⑲ 前两个 *akṣaras* 也可能解读为 *ava*。

④⑳ 班纳吉, 《新的斯基泰时代的婆罗迷铭文》, 《印度铭文》, 卷 10, 1909 - 1910 年, 第 109 - 110 页。

⑤① 《印度铭文》拓本, 卷 2, 1894 年, 第 19。

⑤② 《印度铭文》拓本, 卷 1, 1892 年, 第 13。

⑤③ 《印度铭文》拓本, 卷 1, 1892 年, 第 15。

⑤④ 《印度铭文》拓本, 卷 1, 1892 年, 第 23。

⑤⑤ 《印度铭文》拓本, 卷 2, 1894 年, 第 33。

⑤⑥ 《印度铭文》拓本, 卷 2, 1894 年, 第 34。

⑤⑦ 见本章注 18 - 22 之间。

⑤⑧ 《印度铭文》拓本, 卷 1, 1892 年, 第 14。

⑤⑨ 《印度铭文》拓本, 卷 2, 1894 年, 第 37。

⑤⑩ 见第四章。

① Gros,《秣菟罗铭文》拓本,《印度考古工作者》,卷 6,1877 年,第 216 - 219 页,尤其是 219 页,图版 2,图 8,或《秣菟罗,一个地区的研究报告》,第二版,西北诸省与奥得政府出版社,1880 年,108 页对面的图版。

② 见第四章。

第六章 后贵霜时代的历史

迄今为止,我们拥有路德斯表中列举的一些使人能够似是而非地认为它们是源自于后贵霜时代的铭文,我们也并不否认可能还会有一些样本,但目前我们尚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另一件铭文,我们将努力证明它属于后贵霜时代。

1927年,在秣菟罗发现了一个底座上带有铭文的雕像残片(见图67)。这件铭文由达雅·拉姆·萨尼公布^①。他认为在这件残片中,铭文的书写体是贵霜时期的。也许他更多的是基于铭文所陈述的内容而非书写体本身的形式,因为我们解读了底座上的铭文:

1. mahārājadevaputrasya kaṇiṣkasya saṃvatsare 10 4 pauṣamāsa -
divase 10 asmim divase pra(或 ā)varika - hasth(is)ya

2. bha (或 ā) ryyā saṃghilā bhagavato pitāmahasya
saṃmyasambuddhasya svamatasya devasya pūjārtham pratima (或 ā) m
pratiṣṭhā

3. payati sarvva - dukkha - prahānārtham.

译为:

“迦腻色迦大王 - 天子 14 年仲冬月(Pausa, 印度历之第十月——译者)第十天,在这一天,普拉瓦里迦·哈斯的妻子桑吉拉由于崇拜她所喜欢的神巴迦瓦特(Bhagavat),皮塔阿马拉(Pitāmaha)^②(即乔达摩(Gautama)佛),为了所有痛苦的终止,而建了(这个)雕像。”

因此达雅·拉姆·萨尼认为这一残片源自于迦腻色迦王的统治是正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目前的铭文明显地被确定为那个国王的 14 年。”^③不过，就如我们将要进一步看到的，其书写体根本就未显示出是贵霜时代的形式。当然达雅·拉姆·萨尼也发现字符 ma, ha 和 m 明显展现的是一种有偏差的形式，但他并未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他非常相信自己对铭文年代的确定。在本书前一章的讨论之后，显然现在所提到的铭文要归入到后贵霜时代而非贵霜时代，因此这一残片正确地应确定为迦腻色迦纪元 114 年，即公元 192 年。

这个年代被明确地显示为“迦腻色迦大王 - 天子”的事实成为了一个难点。不过根据字符的形式，完全不可能将这个残片归于迦腻色迦的统治时期。以下两种解释可能是由于上述的特征而提出的。

第一，自迦腻色迦以来，明确地将他的名字作为这一纪元的开创者被认为是必要的，这在当时也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那样，我们必须将原文翻译如下：“在迦腻色迦大王 - 天子 14 年”，即迦腻色迦大王 - 天子的（即由谁创立）纪元 14 年。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其他的应以这种方式理解的铭文^④。晚期常在年代中增补一个从句以同其他纪元进行区别，这是真实的，而在同期的印度这也是合乎习俗的，如“śakanṛpakālātītasamvacchara”^⑤或“śakanṛpatirājyābhiṣekasamvatsareṣvatikrānteṣu”^⑥。早期的泰(Tai)铭文也增加了这种区别，即“在玛哈萨迦拉依(Mahasakaray)纪元”^⑦。

后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塞种纪元标志着萨迦统治的终结；我们在布拉玛笈多(Brahmagupta)(公元 628 年)之前遇到过这种观点，波叶尔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推测是婆多婆诃(Śalavāhana, 即引正王——译者)导致了萨迦的毁灭，但在人们心目中传统却并未消逝，这致使它最后与塞种纪元的制度相结合了起来^⑧。不过我们认为对这种错误的最好解释是将超日纪元制度的起源错误地归到了塞

种纪元的起源中。即我们所知的超日纪元之起源应归于从萨迦失败后的那年开始计年的事实^⑤。加雅斯瓦尔(Jayaswal)认为传统是正确的,公元78年同时是塞种纪元的开始,也是萨迦在西印度婆多婆河手中的第二次失败,他事实上是萨迦的第一个征服者乔达弥普特罗悉达卡尔尼王(Gautamīputra Śatakarni)的后裔^⑥。

但是返回到我们的主题中,极不可能在萨迦统治一个世纪以后就已经忘记了这个国王,因此还是有必要另外明确提到他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在晚得多的原始材料中仍出现过他的名字,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他为佛教做了很多^⑦。中国的朝圣者在他们的游记中^⑧,以及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⑨也提到了迦腻色迦的伟大及他的宗教热情,很明显他们在犍陀罗当地听到了各种细节,这样我们就必须认为,直到中世纪早期,迦腻色迦在西北印度的一些地方仍被人们了解。

在上述铭文中提到了迦腻色迦名字的第二种解释是,除了已知的迦腻色迦纪元的创建者著名的迦腻色迦王外,还存在有另一个同名的王。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在41年的阿拉铭文中似乎也提到了一个迦腻色迦王^⑩,他与伟大的迦腻色迦王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通过所加的“Vajheska-putrasa”^⑪,即婆什色迦之子^⑫就可清楚地把他与后者予以区别,这样这个迦腻色迦二世就可能是迦腻色迦一世的孙子^⑬。阿拉铭文中的这个迦腻色迦二世与上述的后贵霜时期的铭文中所提到的迦腻色迦是一个人的可能性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因为提到了他的父亲是婆什色迦,他统治于迦腻色迦纪元24~28年,即公元102~106年^⑭。所以如果我们提出可能存在有一个迄今无人知道的迦腻色迦王,我们将不得不认为在后贵霜时期存在有一个迦腻色迦三世。这本身并非一个哗众取宠的事实,因为这是一个常出现的现象,后代们总喜欢带上他们朝代著名的祖先的名字。

如果在这两种可能间进行选择,我们认为后者更能让人接受,

因为可利用的古钱币资料也表明存在有一个迦腻色迦三世。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巴赫霍夫(Bachhofer)在迦腻色迦三世和韦苏提婆一世与二世的钱币间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分^①。在他之前，R.D. 班纳吉^②已经区分了上述国王加上一个婆藪(Vasu)或韦苏提婆三世的钱币^③。这似乎逃离了巴赫霍夫的注意(他的功绩是指出了钱币中的一种明确的发展)，至少他没有提到班纳吉的文章。不过，文森特·史密斯^④，怀特海德^⑤和卡宁汉姆^⑥也认为存在更多的以迦腻色迦和韦苏提婆命名的国王^⑦。因此存在有一个迦腻色迦三世和韦苏提婆二世的观点确实没有什么新意，这种观点在古钱币学领域也是存在的。现在，上述的铭文再次强调了这种观点。

这个事实，即迦腻色迦的贵霜王朝在韦苏提婆一世后的继续存在是支持我们假设的一种非常有力的论据，这个王朝继续使用了迦腻色迦纪元^⑧，这样就省略了百位数。

更为仔细地观察这个雕像的残像，有两种特征我们必须注意，即碑铭及风格的鉴定。

首先是风格鉴定的特征：现在的这个雕像左边仅有脚和踝骨，通过雕像左边的东西和铭文的内容来判断，这一定是个佛陀立像。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穿着一件过肩长袍的佛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雕像大概是源自于迦腻色迦纪元114年，我们知道在那以前很长时间双肩均被捂住的佛像比仅捂住一个肩膀的佛像更为流行。

我们所知的为数不多的双肩均被捂住的早期佛陀立像都属于整个贵霜时代，如复制于图36的雕像，纽文坎普(Nieuwenkamp)搜集品中的一个浮雕^⑨，以及一些其他的浮雕^⑩。此外，迄今我们知道在后贵霜时代佛像的复制品中没有一个佛陀立像。也许这纯属偶然，但也可能是对坐像更为偏好而引起的。最后，我们知道许多立姿佛像属于笈多时代。所有这些都使得难于在后贵霜时代和讨论中的残像的风格间进行比较，而且由于它的残缺，它并不能提供

足够的证据。

在 14 年佛像的左右,雕像是竖立的,如果它们保持完整,将不到中央雕像膝部的一半。服装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不管它们是小佛像与否,俗人们也穿着以这种方式在左髋部上的左手边打折的长袍^②。而且,小佛像或菩萨被置于中央雕像一边的时间极为遥远^③。因此我们认为在这儿更可能指的是两个崇拜者,也许是雕像的虔诚的捐助人和她的丈夫一起。对于这个观点来说最终明确的是这个事实,我们认为我们能辨别出右边人像手执的花环的下端似乎是这个人像的右腿。长袍的褶突然在那儿终止,然后清楚地看到带有斜痕的管状物体,在下端束在一起后显示出是一个流苏。乍一看,这个管状物体通过它的外表给人以一个细长腿的印象,与其他浮雕进行比较,这个物体——有关擦痕与流苏二者——完全符合崇拜者立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或一个崇拜的物体旁时手中所执的花环,这种描绘不止一次。那些花环在早期贵霜艺术中常描绘得很优雅^④(见图 66),而在后贵霜时代大多却变成了僵硬的卷状物^⑤(见图 60 和 63)。

注意到了这个,我们认为右边的第二尊人像极有可能是一个崇拜者,而非佛像或菩萨。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左边的第二尊人像看起来也有一个花环紧贴在他的右边,因此我们能确定在佛像的每一边都有一个崇拜者。

贵霜时期坐像的捐助者或崇拜者几乎总是位于基座之前。正如刚提到的,我们没有什么新类型的立像的例子:复制于图 36 的佛像的底座遗失了;迦腻色迦纪元 51 年的一个基座残像^⑥当然并不属于佛像的新类型,因此这不是一个可靠的比较对象。在我们左边跪着一个男性崇拜者,手中捧着花,通过双脚进行判断,在我们右边立着另一个人像。我们拥有更多的用作基座比较的卡帕叮(kapardin)类型的立像样本^⑦。它们中几乎没有显示出在底座上有崇拜的俗人,只有穆特拉(Mutra)的寇松博物馆^⑧中的佛像清楚地

显示出在两边跪立有小的崇拜者。后贵霜时代的耆那立像经常在大像的两边有一个小的崇拜者,大部分位于稍低的一层。因此也许中央主像两边的俗人的安排似乎在贵霜时期也不时出现;在后贵霜时期它更是频繁地被发现,而在笈多时代我们拥有相当大数量的展示有小崇拜者像的雕像,经常崇拜地跪在中央主像的左右^⑧。

返回到讨论中的残片,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央佛像的脚踝明显很粗,而脚踝上的右腿膨胀得极为迅速。将这些并不优雅的踝与腿与那些卡帕町类型的立像进行比较,我们看到那些人像也并未显示出优雅的踝部,但其腿部在其踝部之上则膨胀得非常缓慢。我们愿意对这种差别作出解释,讨论中的雕像的长袍摺边可能比其他种类的雕像拉得更低,因此自然看上去这个雕像的腿很细长,而并非是雕塑家夸大了长袍之下可看得到的腿部的膨胀。当长袍的摺边降低时,腿肚子最粗的部分也向下移,这样就给人以极不优雅的效果,并通过“迦膩色迦大王天子”14年的雕像表现了出来。

由于缺少后贵霜时期的对比资料,在早期笈多时代的两个雕像,即罗克诺的大佛像^⑨和一尊来自迦特拉(Katrā),目前藏于罗克诺博物馆的雕像中^⑩,我们发现了符合观察到的特征的相似之物。二者在垂得非常低的摺边下都显示出了粗脚踝和突然膨胀的粗壮的腿部。

我们必须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央人像脚间的物体。很遗憾这部分损坏得非常严重,但我们认为看起来它是一束莲卷,这在各种佛像底座上都发现过。几乎所有卡帕町类型的雕像都显示出脚间有某种东西;有时是一个小狮子,但更为常见的是一束莲花。在一些雕像中这种莲状植物呈一种特殊的形式(见插图 27),也许这指的是一个卷成筒状的花环,它在贵霜时期的两个浮雕中曾出现过^⑪。这种花环大部分束成一束止于顶部。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从下

面断裂的部分来看(见插图 28),上述的残像中央人像脚间的物体看上去与筒状的献花是相像的。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后贵霜时期的站立佛像,因此我们并没有那一时代的可以利用的比较材料。我们拥有许多来自笈多黄金时代的佛像,但佛陀脚间几乎不曾



插图 27 佛像脚间的花环

发现有莲花。仅有一尊据一些学者认为是源自笈多时代的佛像,即罗克诺的巨像显示出有这种特征,在佛陀脚间有一尊非常小的弥勒佛(Maitreya)像,倚在莲花背景之中^④。鉴于好几种理由,这尊佛像可被确定为笈多艺术的最早时期,也许是此前的某一时期,这是肯定能被接受的,而沃格尔甚至认为是公元 3 世纪^⑤。因此我们必须确定,极可能前贵霜时期最古老的佛像到了笈多时代早期时脚尖莲花的因素风行了起来。

考虑了不同的细节之后,我们不得不确定在上述雕像的残像中,风格鉴定的好几点理由都表明了它与贵霜艺术的一种关系;而另一方面,其他几点也表明了早期笈多艺术的一种趋势。




插图 28
图版 67 中的花环的下面部分断裂了

在讨论这个残像的古文字的特征前,我们先要注意山奇博物馆第 A. 83 的一个残像,它显示出有好几种明显的相似之处^⑥。这尊雕像也断裂于脚踝处。一个崇拜者的右边部分得以保存,它正好显示出与左髋部上的左手同样的姿势,此外,他右手所执的花环的末端仍可看见。我们曾简单地提过这个残像,现在能确定我们假定的 14 年的残像中一个崇拜者手中执有花环是正确的。在山奇残像的情形中脚间的莲状物也断裂了,但这次不是上半部,而是下面被保存了下来。因此在这儿我们的推测也是正确的。这个山奇残像底座下面的边缘显示出有一篇铭文,与其他残像相比,它饰以一个菩萨的浮雕,菩萨左

右有男女崇拜者。这篇铭文通过下列语句提到了上述的佛像建立的年代：“...rājño vaskuṣāṇasya sa 20 2 va 2 di 10...”⁴³”。

在这儿提到的这个 22 年时统治的国王是谁呢？山奇博物馆目录的作者称瓦斯努萨那(Vasnuśāna)可能是个外国人。由于我们将这个名字改成了瓦克苏萨那(Vakusāna)，我们更愿把这个君王想象成是一个贵霜人，但似乎不大可能将他鉴定为是任何一个确定的贵霜人，尤其更不可能是迦腻色迦，他至少统治到了 23 年夏季的第一个月⁴⁴。也许同期还有另一个统治者？当我们看到迦腻色迦是如此独裁地统治着庞大的领土时，这看上去是极不可能的。针对这种困难，我们提出下面的解决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与 14 年雕像风格鉴定的一致，指出属于后贵霜时代。我们还应附加一点，在雕像的底座下并没有榫子，而我们注意到直到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中期，它在贵霜时代的站立雕像上还是常见的。而且，虽然在讨论中的雕像的情形中一尊菩萨像被许多崇拜者崇拜于基座前，但早期的站立佛像从未在它们的底座上显示有浮雕，这也是迦腻色迦纪元 51 年后秣菟罗艺术的一种特征。而且，两边的壁柱也同浮雕上而的齿状装饰一样表明是迦腻色迦纪元 1 世纪末或 2 世纪初的一个发展阶段（比较插图 1 的德鲁乌·提拉(Dhruv Tilā)卒塔婆的浮雕）。

最终古文字也给予了我们一些提示：sa 明显呈环形，na 非常圆，而 na 也呈明显的晚期形式 。


所有这些观点都显示出这个残像必须被确定为是接近 14 年即后贵霜时代初期的那个雕像，因此我们可能就不不得不把 22 年理解为 122 年。以这种方式来解决也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现在就能认为瓦斯库萨那(Vaskuśāna)是韦苏提婆一世的一个继承人，可能是迦腻色迦三世的继承者（贵霜人韦苏(提婆)二世），除非国土分成了好几个部分，每一部分由独立的一个王统治。






让我们现在转向 14 年那个雕像底座上的铭文。还记得这件

铭文在年代中提到了月(Pausa)。达雅·拉姆·萨尼评论这篇铭文最为重要是基于两点理由：“这篇铭文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是贵霜时期第一个婆罗迷文体的铭文，它引用的年代中的月来自于印度的太阳名字，而非季节的名字，这是这一时期其他婆罗迷文体铭文常见的情形。当然这种评论不适用于佉卢文文体的铭文，因为它们中的好几个都含有月的太阳名字。这篇铭文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另一个原因。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掌握有任何确定为明显处于迦腻色迦统治时的贵霜纪元 11 年和 22 年之间的铭文。目前的铭文清楚地源自那个国王的 14 年。”^④

我们并不同意第二种观点。不过，我们应多注意一下第一种观点。月中的印度名字在秣菟罗的后贵霜铭文中并不常见。它经常出现在印度西北部的贵霜铭文中是不错的，这表现在了佉卢文的书写体中。当月的印度名字呈普遍趋势时，也许讨论中的这篇铭文的特征就应归于来自印度那一部分的影响，或是对笈多君主统治期间的习惯的一种预料。

在几个后贵霜铭文中也发现了铭文的语言与其极为相似。与典型的梵文的偏差在数量上非常少，确实它们书写的方式稍有差异，或是对山奇规则的错误运用。实际上一个明显的偏差只是：saṃmyasaṃbuddhasya 替代了 samyaksambuddhasya；除此之外铭文以纯梵文写作。拼写中更为轻微的差异是：bha(或 ā)ry 替代了 bhāryā；bhagavato 替代了 bhagavatah，sarvva 替代了 sarva，dukkha 替代了 dukkha，但并不怎么重要。在写本和铭文中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⑤。

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残像时，我们发现这种书写与早期的书写偏离很多，因此不能属于迦腻色迦纪元 14 年。经过更为细致的调查研究，各种字符显示出了值得考虑的特征，因为它们强烈地表现出笈多书写体的趋势。2 行 samghila 中的字符 la 的形式是 。




此外,1 行中的 mahārāja 是 , 或 1 行的 māsa, asmim 和 2 行的 pitāmahasya 和 sammyasambuddhasya ; 或 2 行的 svamatasya 和 pratima(或 ā)m 是 。第三种改变的字符是 ha; 在 1 行的 maharaja 和 pra(或 ā)varikahasth(is)ya; 2 行的 pitāmahasya 及 3 行的 prahānārttham 中,现在它呈一个四分之一的环状,显示出是我们的数字 5 的形式: 。Sa 在左边的竖线处常有一个环: 。最后, anusvāra 好几次被表示为横,而非点。这五个例子应当足够了。几乎所有提到的这些特征也发现于几个笈多时代的铭文和柯萨姆的一类中,确定为是一个未知的纪元。



我们完成这项研究之后, F·W·托马斯发表了一篇关于 14 年铭文的文章^⑧。他也注意到了有差异的字符,尤其是 ma, sa 和 ha。Ha 形式的偏差出现在公元 250 ~ 450 年铭文中的秣菟罗 - 山奇 - 柯萨姆的范围。在西郡太守的铭文中它已经较早地,即第一次出现了,仍与在路德拉森那(Rudrasena)126 或 127 年即自公元 205 年以来的萨迦铭文中,以及早已在自路德拉达曼(Rudradaman)以来即自约公元 150 年以来的这些国王的钱币上出现的 ha 的古老形式相结合。Ma 的形式直到达马迦达 - 斯里(Damajada - śrī)和路德拉森那时,就是公元 200 年左右才出现在这些钱币上。“总体上毫无疑问,这些铭文在采用字母的变形方面落在了钱币之后……也许 h 和 m 的特殊形式首先在西印度得到发展,它们用于碑铭开始于路德拉森那时,即公元 200 年左右。这种用法可能在公元 3 世纪前半期传播到了秣菟罗。”^⑨

因此,根据托马斯,在公元 200 年稍后的秣菟罗就可能有这些晚期的铭文,而确实我们在处理路德斯表的第 55 和 57 时发现了晚期的 ma, 分别源自公元 235 和 240 年^⑩。不过,我们认为迦腻色迦纪元 109 年的铭文^⑪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即源自迦腻色迦纪元 114 年或是公元 192 年的这件一样颇为古老。因此就存在有

可能,秣菟罗荣幸地展示了 ma 新形式的最早范例。

最后,我们在这件铭文中看到了同样的趋势(语法,语言和古文字),就像在残像中的风格,即各种因素导致了对笈多时代极强烈的回忆。

托马斯认为“似乎不大可能是一篇源自迦腻色迦大王天子年代的铭文,尤其是刻于贵霜在印度统治早期时的总部秣菟罗的铭文决不应指为贵霜纪元”,他给出了下面的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在这儿,14年的铭文清楚地显示出是晚期字符的形式,即从3世纪到4世纪:“对照片的检查立即揭示出尽管‘14’年中的十位数在石头上损坏了,但与完整标准的这个的日期的数字‘10’是极为不同的。这些例子中的非常小的分歧,并不值得我们小心谨慎:例子可见于.....这些区别并未在‘迦腻色迦 14’的两种形式——年  与月  间进行比较。”^⑤根据托马斯,因此第一个符号将是除10之外的别的什么,最可能是100或200^⑥。托马斯从大量的100和200的数字符号中最终在迦德哈(Gadhā)铭文中选择了数字100 。因为与14年铭文中的数字极为相似。他最终推断出上述的数字指的是100或200,因此这个年代就是104或204:“如果不晚于公元3世纪末,那么甚至也可能是迦腻色迦204年。”^⑦

很遗憾我们与托马斯不能达成一致,这个读者会理解的。本书四、五章中的资料与他的观点是矛盾的。此外,就我们所能看到的,铭文中的十位数完全未被损坏,显示出完全是另一种形式,即 ,而非托马斯所认为他看到的 。抛开先前的注释,我们请了各种不存偏见的人画下他们认为在照片中所看到的;小圆圈在底部总是封着的。就此而论,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只是不同于同一铭文中的日期数,而最后一个在右边清楚地有一个开着的环。不过,这种书写中的变化极为常见。因此我们认为解读为十位数10是完全正当的,年代14也是如此。

对于后贵霜时代的历史,我们看到巴茨佛尔明确赞成迦膩色迦三世继承了韦苏提婆一世。将我们铭文中的这个迦膩色迦与从公元2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钱币中所知道的同名的君主看成是一个人,这是极有吸引力的。那么将他的继承者韦苏提婆二世看作波调,即韦苏提婆是没有异议的,他在公元230年向中国朝廷派去了一个使者^⑤,他与科雷那(Khorene)的穆瓦兹(Moise)给我们讲述过一些事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哥什曼在下面的话语中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科雷那的穆瓦兹描述在阿尔德什尔(Ardéshir)战胜了阿尔塔班(Artaban)之后,国王克斯罗埃斯(Khosroès)一世与亚美尼亚人建立了一个同盟,来反抗阿尔德什尔,复兴帕提亚。他在战争期间向贵霜国王请求帮助。后者的名字辨认为维萨德坚(Vehsadjan)或维萨德金(Vehsadjen),按照前面的词婆藪(Vahu或Vasu)及第二个旃檀(Tchan-t'an或Tchen-tan),这样就接近西尔维安·列维所理解的名字西那斯坦纳(Cinastana),而y在M.伯希和的注释中被放弃了,以agissait的称号来代替“国王”。维萨德坚在227年帮助进行了反抗阿尔德什尔的斗争,但是二者(在229年)后放弃了。”^⑥

这个韦苏提婆大概与塔巴里(Tabari)告诉我们的在224年后与阿尔德什尔一世进行接触的那个人是同一人:“贵霜王与吐兰(Tūrānyu)和玛库兰(Makurān)国王派特使去表明他们的忠诚。”^⑦根据塔巴里,也许这个贵霜王与在241年到250年间被阿尔德什尔一世剥夺大夏王的那个人是同一人^⑧。

不过很遗憾,我们既不能同意哥什曼断定的公元240年的这个韦苏提婆与迦膩色迦纪元62~99年期间统治的那个人是同一人,也不能同意他基于第一个结论之上的第二个结论,即最终迦膩色迦在公元143~152年间即位^⑨。因为尽管哥什曼在贝格拉姆发现了最新的韦苏提婆一世时的贵霜钱币,但没有一点证据说明这个城市的毁灭者就是阿尔德什尔一世。另一个被哥什曼归于这个

国王的战争的功绩,即白沙瓦的征服,被克拉莫斯(Kramers)所怀疑,他并不相信 Pškbvr = Peshāwar^⑤。

鉴于上述观点,最大的可能性是讨论中的残像源自于公元 192 年。然而在残像中有一些特征表明它是笈多时代。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已经不断被前面的所有章节所证实,即在韦苏提婆一世之后所有的文化活动并未突然中断,也未随着笈多时代的到来而非常突然地开始。两个伟大的王朝间约一个半世纪的这个黑暗的中间时期通常被尽可能地忽略了,只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对它几乎什么都不了解。这种历史的空白而后又被解释为^⑥庞大的贵霜领土在韦苏提婆一世后瓦解成为了许多小的独立邦,最初基本上由外来家族的王朝所统治:“三世纪的事件逃离了历史学家的注意;我们很难了解贵霜帝国。这样的历史在 318 ~ 319 年并未继续,那时的确在古老的玛迦达(Magadha)国家时期有一个当地人的新王朝,它恢复了孔雀王朝的传统。”^⑦

一些学者,“尤其是”哥什曼^⑧提出了支持在韦苏提婆一世后贵霜领土立即瓦解的观点的证据之一,是路德斯表的第 78 铭文,根据这些学者,它源自于旧纪元的 299 年。它将证明从我们拥有的韦苏提婆一世最后一件铭文的那年之后,旧纪元又开始使用,这也意味着贵霜王朝在那年灭亡了^⑨。不过,我们看到路德斯表的第 78 号铭文从古文字的角度说不可能是写于韦苏提婆一世之后,它真正应源自 199 年,因此迦腻色迦纪元 98 年贵霜王朝瓦解的证据就被反驳了。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这种连续性不仅是在政治方面,也是在文化生活方面,尤其是后一种延续是支持第一种情形的证据。

这种连续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由艺术中的完整顺序组成。这后一种延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坐像的底座中发现。我们可以从贵霜时代早期开始追随它们的发展,那时角落的狮子是面朝外的(见图 30, 32, 尤其是 66),经过晚期贵霜时代后狮子转向前面

(这是受印度西北影响的结果,见图 39,40,43,44,45,47,48,49),后贵霜时代(见图 54,55,56,60,61,62),到笈多时代((见图 65)^⑥)。在贵霜晚期与后贵霜时代连续的底座系列的这些例子间,我们能够发现的惟一区别是狮子的胸部逐渐变得更似球形。最后,后贵霜时代与笈多艺术中底座间的惟一区别是在笈多时代,神变得更短,狮子的头部也不再突出在底座的厚顶之上。此外,整个布局非常一致:狮子在角落面向参观者,腿宽宽地分开,中间是一个神圣的象征(多数是在圣坛上的一个圆盘),两边则是崇拜者。

从前面的几章和后面这些记录来看,很明显文明的表现——例如艺术——的突然中断是毫无疑问的。至多,这个 150 年的时期构成了韦苏提婆一世和笈多王朝间的过渡,这在政治领域中是相当模糊的。我们认为根据艺术史、古文字和碑铭,已足以清楚地证明了这种延续,于是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发现了这两个伟大繁荣的时代间失去的联系。

为给这个过渡时期命名,我们称其为后贵霜时代。我们也可以称它前笈多时代。不过,我们认为第一种称呼似乎更好一些,因为就我们所能从不同的文化方面:语言,书写体,雕塑和宗教进行判断,整个时期是牢固地建立在贵霜时代的基础上,形成了它必然的延续,至于两个时代间的间断则一种迹象也没有。两时代间可能存在的惟一区别是,在后贵霜时代我们彻底再没有听说贵霜王朝。我们认为“后贵霜时代”这个术语很好地强调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未中断的延续,而“前笈多时代”的术语随着韦苏提婆一世的统治用了一段时期,随即让人想起一种完全新的事物,暗示了一种明显的间隔,而这确实并不存在。

因此后贵霜时代形成了在贵霜与笈多盛世间缺少的这种衔接,一方面它在所有方面都形成了前者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将伟大兴旺的萌芽带给了笈多帝国,是一个艺术家们努力表达他们理想的过渡时期。从受这一时期影响的雕塑来看,我们看到了他们是

如何发展其技巧,其思维是如何达到越来越高的。惟一遗憾的是恰恰源自后贵霜时代后半部分的佛像很少被保存下来。无疑这一定是政治的扰乱没有给予艺术表达自身机会的事实而导致的结果。经济形式是如此得糟糕,几乎没有给予什么委托,但这很少的雕塑残片从后贵霜的后半时期遗留了下来,给人以某种美好的希望。令人满意的境况—被笈多王朝之表象所创造,后贵霜后半时期的希望就被恢复了;而那一时期的蓓蕾就完全打开,艺术之花在繁荣与和平关爱的阳光下绽开了。

注 释:

① 达雅·拉姆·萨尼,《贵霜 14 年的秣菟罗基座铭文》,《印度铭文》,卷 19,1927 - 1928 年,第 96 - 97 页。

② 在出现这个词的两件铭文的 N.C. 马嘉姆达的版本中,他并未翻译这个词,《维普拉斯里米塔(Vipulasrimita)的那些陀铭文》,《印度铭文》,卷 21,1931 - 1932 年,第 97 - 101 页,以及《107 年维斯拉瓦纳大王统治时的柯萨姆铭文》,《印度铭文》,卷 24,1937 年,第 146 - 148 页。在后面这篇文章第 148 页的注 4 中马扎姆达尔称 14 年的这件铭文的字符展示的是笈多形式。

③ 达雅·拉姆·萨尼,《贵霜 14 年的秣菟罗基座铭文》,《印度铭文》,卷 19,1927 - 1928 年,第 97 页。

④ 除非我们假定阿拉铭文不是由迦腻色迦二世发布的,而只是指出其发布于迦腻色迦一世纪元 41 年。但如果那样就不清楚我们如何去解释单词婆什色迦之子(Vajheska-putrasa)。哥什曼认为由于在《罗阇塔兰吉尼》(Rajataranginī,即《克什米尔诸王记》)中提到的名字,那么迦腻色迦一世的父亲被称作婆什色迦(Vasiska),而他的祖父是胡毗色迦(Huviska)。按他来说,迦腻色迦一世的父亲会在阿拉铭文中提到。但首先,没有一点证据表明存在有两个婆什色迦(Vasiska)和两个胡毗色迦,其次没有理由认定《罗阇塔兰吉尼》会提到另外两个非常不出名的不重要的伽德菲塞斯(Kadphisea)王的封臣,却忽略了伟大的贵霜王迦腻色迦的继任者婆什色迦(Vasiska)和胡毗色迦。因此尽管非常别出心裁,哥什曼对阿拉铭文的处理在能够提出更多的确证之前是不能被接受的。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考古探查与历史》,第 141 页。

⑤ D.R. 邦达卡尔,《北印度铭文的一个目录》中的第 1078 以后,《印度铭文》,卷 19 - 20,1927 - 1928 年,1929 - 1930 年,附录第 145 页。

⑥ F. 基尔霍姆《南印度铭文目录》中的第 3,《印度铭文》,卷 7,1902 - 1903 年,附录第 2 页。

⑦ 见《伯灵顿杂志》中 R. 勒·梅((Le. May)的一封信,卷 86,1945 年 5 月,第 128 - 129 页。

⑧ A. M. 波叶尔,《那哈帕纳与塞种纪元》,《亚洲学刊》,第 9 辑,卷 X,1897 年,第 120 - 151 页,尤其是第 146 - 151 页。

⑨ 见第七章。

⑩ K. P. 加雅斯瓦尔,《Problem of Saka - Satavahana History》,《比哈尔与奥里萨研究学会会刊》,卷 XVI,1930 年,第 227 - 316 页,尤其是第 295 - 300 页。

⑪ 迦罗那,《罗阇塔兰吉尼》,卷 1,第 168 - 170 行;斯坦因(M. A. Stein),《迦罗那的〈罗阇塔兰吉尼〉,一部迦湿弥尔的诸王编年纪》,韦斯特明斯特(Westmngst),1900 年,30 - 31 页;兰古特·西特拉姆·潘迪特(Ranjit Sitaram Pandit),《罗阇塔兰吉尼(sic!)》,迦湿弥罗诸王时的萨迦,阿拉哈巴德(Allahabad),1935 年,第 23 页。

⑫ 吉尔斯(H. A. Giles),《法显游记(公元 399 - 414 年)》,或《佛国记》,重译本,剑桥,1923 年,第 13 页;S. 比尔,《西域记,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伦敦,1906 年,卷 1。

⑬ 萨绍(E. C. Sachau),《阿尔比鲁尼的印度》Alberuni's India. 英文版,伦敦,1910 年,卷 2,第 11 - 13 页。

⑭ H. 路德斯,《碑铭的贡献,II:来自阿拉的铭文》,《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12 年,卷 2,第 824 - 831 页。在《印度文物工作者》中翻译得也一样,卷 42,1913 年,第 132 - 137 页。

⑮ 弗里特在《迦腻色迦问题》中对这个词在阿拉铭文中的译文抱有疑问,《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95 - 107 页,尤其是第 98 页以后,同样弗里特假定 Vajheska 不是 Vāsiska 的错误对我们来说已被科诺满意地证实,《印度铭文汇编》,页 LXXX - LXXXI,以及《阿拉铭文中提到的统治者的名字和称号》,《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会刊》,新专辑,卷 1,孟买,1925 年,第 1 - 12 页,及《迦腻色迦二世时的阿拉铭文:41 年》,《印度铭文》,卷 14,1917 - 1918 年,第 130 - 143 页。

⑯ 这个父亲的名字的相类似的附加从未伴随其他贵霜君主的名字出现,这儿清楚地给出是为了将迦腻色迦二世与另一个同名的统治者,即迦腻色迦一世相区别。

⑰ 我们在这儿省略了对迦腻色迦与胡毗色迦间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的考虑。

⑱ 除非我们假定在迦腻色迦二世纪初期另一个婆什色迦(Vāsiska)曾统治过,而他的儿子是迦腻色迦二世,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不需假定阿拉铭文源自塞种纪元 14 年,因此在佉卢文体的铭文中迦腻色迦纪元也在 99 年之后,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在印度西北旧的纪元又被开始使用。而且,仍未提到婆什色迦

二世在迦膩色迦纪元2世纪的存在,也未提到是迦膩色迦一世的父亲,正如哥什曼提出的,《贝格拉姆,贵霜的考古探查与历史》,第141页。

⑲ L. 巴赫霍夫,《晚期贵霜的统治者与钱币》,《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卷56,1936年,第429-439页。

⑳ R. D. 班纳吉,《印度-斯基泰货币注释》,《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新专辑,卷4,1908年,第81-93页。

㉑ 班纳吉仍把迦膩色迦三世称为迦膩色迦二世,因为他把阿拉铭文中的迦膩色迦当成与迦膩色迦一世是一个人,见《印度历史的斯基泰时代》,《印度文物工作者》,卷37,1908年,第25-75页,尤其是第58-59页。

㉒ 文森特·史密斯,《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钱币目录》,卷1,牛津,1906年,第87-88页。

㉓ R. B. 怀特海德,《拉合尔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卷1.印度-希腊钱币,牛津,1914年,第211-212页。

㉔ A. 卡宁汉姆,《晚期印度-斯基泰》,《钱币编年》,第三辑,卷13,1893年,第93-128页,第166-202页,以及1894年,第242-293页,尤其是第176页。

㉕ 韦苏提婆似乎曾是大夏吐火罗王中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名字,因为甚至在公元7世纪,同名的一个国王还在东突厥斯坦被提到过,见S. 科诺,《一种新的萨迦语言》,《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1935年,第772-823页,尤其是第803页。

㉖ 也见288页托马斯的引文,他持相同的观点。

㉗ 复制于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LII, c。纽文坎普认为这个浮雕表现的是佛用他庄严的服装与一个猎人交换的情景,在沃格尔和我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佛已穿上了一件僧袍,我们更愿提出对这个浮雕的另一种解释,即佛遇到一个除草者的情景,他给他一束草去换取他在菩提树下的座位。讨论中的浮雕与西克里(Sikri)卒塔婆的一尊表现同样事件的浮雕有着惊人的相似。A. 福塞尔,《西克里(犍陀罗)卒塔婆的浅浮雕》,《亚洲学刊》,第10辑,卷2,第185-330页,尤其是图版VII(见我们的图4)。

㉘ 如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图版XX, a。

㉙ 见我们的注释,第三章,注32。

㉚ 即在帕拉(Pala)和摩那(Sena)艺术中。

㉛ 如雕像残片,复制于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流派》,《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09-1910年,图版XXIV, c。

㉜ 如西塔拉·迦提的浮雕,由拉德哈·克里斯那(Radha Krishna)发现,现在由梅斯尔斯(Messrs)拥有。完整的照片在科恩研究所的搜集品中,秣菟罗部,第12。

③ 路德斯表的第 52, 在《印度铭文》中讨论过, 卷 10, 113 页, 照片在科恩研究所搜集品中, 秣菟罗部, 第 39。

④ 复制于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中, 图版 XXVIII, a 和 b; 阿格拉瓦拉 (V. S. Agrawala), 《秣菟罗的一个新的迦叶佛雕像》, 《省际历史学会会刊》, 卷 10, 1937 年, 35 - 38 页, 图版 1; 阿格拉瓦拉, 《秣菟罗的新雕塑》, 《省际历史学会会刊》, 卷 11, 第二部分, 1938 年, 66 - 76 页, 图版 I; 波劳茨 (T. Bloch), 《佛像上的两件铭文, A. 迦腻色迦或胡毗色迦时期的塞特 - 马赫特 (Set - Mahet) 像铭文》, 《印度铭文》, 卷 8, 1905 - 1906 年, 179 - 182 页, 尤其是图版 1。坎伽·格宾达·格斯瓦米 (Kunja Gobinda Goswami), 《迦腻色迦 (统治时的) 柯萨姆铭文: 2 年》, 《印度铭文》, 卷 24, 210 - 212 页, 以及插图。阿拉哈巴德博物馆的一尊雕像, 复制于《1934 年印度考古年度目录》, 卷 9, 莱登, 1936 年, 图版 II, c。我们所知的其他这种立像的基座丢失了。

⑤ 见 V. A. 史密斯, 《印度与锡兰美术史》, 1911 年, 图 94, 第 2 版, 图版 20, c。我们在 1948 年伯灵顿宫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艺术展中有机会对这个雕像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史密斯书中的图没有像这样清楚地展现出崇拜者。

⑥ 如发现于加马尔普尔·孟得 (Jamalpur Mound) 的佛像, 复制于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 图版 XXIX, XXXI, b 和 XXXII。

⑦ J. Ph. 沃格尔, 《秣菟罗的雕刻》, 图版 XXIX。

⑧ 同上, 图版 XXXI, a。

⑨ 同上, 图版 XVI, c; J. E. 范·路易詹 - 德·李乌 (J. E. Van Lohuizen - De Leeuw), 《有关秣菟罗雕塑的两点注释》, 《印度考古》, 莱登, 1947, 第 231 - 235 页, 图版 XVII, d。

⑩ J. Ph. 沃格尔, 《秣菟罗的雕刻》, 图版 XXIX。复制于 J. Ph. 沃格尔《秣菟罗的雕刻》, 图版 XXXI, a 的雕像脚间的物体不可辨认。

⑪ 同上, 图版 XXIX 及第 37 页和第 108 页。

⑫ 复制于 M. M. 哈密德 (M. M. Hamid), 潘迪特 . R. C. 卡克 (Pandit R. C. Kak) 和拉玛普拉萨德·甘达 (Ramaprasao Chanda) 的《柏帕尔 (Bhopal) 邦山奇考古博物馆目录》, 加尔各答, 1922 年, 图版 XII, 第 30 - 31 页。

⑬ 《山奇考古博物馆目录》在 30 页给出了“Vasusānasya”的解读。不过, 第二个 ak-sara 我们认为是 sku, 也许这已经被纠正了, 但我们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它的文章。

另一个我们想在铭文的解读中纠正的细节是结尾。根据目录的作者, 它写的是: “... sarvasattana ca su”。就我们所能在图版 XII 的复制品中看到的, 它写着: “... sarvasatvana(m) ca hita...” (这儿跟着一些难认的 akṣaras, 可能是 sukhāye)。这种解读也使它翻译成为“为了捐助人的父母及所有的生灵的幸福(与快乐)”。

⑭ 达雅·拉姆·萨尼, 《贵霜王朝的三个秣菟罗铭文及它们的意义》, 《大不列颠及爱

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24年，第399-406页，尤其是第404页。

④ 达雅·拉姆·萨尼，《贵霜14年的秣菟罗基座铭文》，《印度铭文》，卷19，1927-1928年，第97页。

⑤ L. 雷诺(L. Renou)，《梵语语法(Grammaire sanscrite)》，巴黎，1930年，卷I，第7页。




⑥ F. W. 托马斯，《迦腻色迦14年》，《印度考古》，莱登，1947年，第296-303页。





⑦ 同上，第299-300页。

⑧ 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

⑨ 见本书第五章。

⑩ F. W. 托马斯，《迦腻色迦14年》，《印度考古》，第300页。

⑪ 作为论据，托马斯提出了一篇达雅·拉姆·萨尼在《来自秣菟罗的七件铭文》中公布的铭文，《印度铭文》，卷19，1927-1928年，第65-69页，第7。他提出将“(va)ṛṣaṇā 90 l kaṛṇika”替代为“(va)ṛṣa 100(或200) 90 l kaṛṇika”，这是鉴于90年前的这个字符不会是ṛa的事实上，因为它不同于kaṛṇika中的ṛa。这是正确的。不过，kaṛṇika中的字符ṛa看起来像。我们在2行的 sāṅghikāna 词中发现了这个与ṛa相同的字符。这是ṛa的一般特征，只是稍稍强调箱形头(box-head)。尽管连音需要在r后有个ṛa，但这在铭文中是个经常出现的偏差。此外，在91年，ṛa早已将它早期的形状变为。如果这篇铭文还要晚于91年，就像托马斯提出的191年，这个当然就是这种情形。

因此kaṛṇika这个词必须被变为kaṛṇika，90年前的字符必须解读为ṛa。最后，第一个字符(va)只是一种假设，因为ṛsa前的石头破损了，也可能有另一个字符。此外，数字91指的不一定是年代，因为如果那样，就立即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的月 and 日被省略掉了。可能是提到了大量的钱财或是货物？我们并未看到托马斯在刚讨论的铭文中的与迦腻色迦14年铭文中的 (事实上是)间所看到的重要的相似之处。重新开始，我们认为上述的这段铭文如下：“ṛṣaṇā 90 l kaṛṇika”。结果是这篇铭文似乎并非是支持托马斯假设的一个论据。

⑫ F. W. 托马斯，《迦腻色迦14年》，《印度考古》，第303页。

⑬ 《三国志(魏志部分，卷3.3页)》。此外E.H. 帕克，《中国与宗教》，伦敦，1905年，第75页；F.J. 沙畹，《中国的资料来源对认识中亚突厥人种和斯基泰的贡献》，柏林，1904年，《通报》，第二辑，卷5，1904年，第487-490页。

⑭ R. 哥什曼，《贝格拉姆(阿富汗斯坦)的发掘》，《亚洲学刊》，卷234，1943-1945年，第59-71页，尤其是第64页。

⑮ E. 赫兹菲尔德，《萨珊帝国早期历史的 Paikuli, 纪念碑与铭文》，《伊斯兰艺术研

究》，卷3，柏林，1924年，第36-37页；也见于诺尔德克(Th. Nöldeke)，《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与阿拉伯史学》，莱登，1879年，第17-18页。

⑩ 《塔巴里》，H. 佐坦伯格(H. Zotenberg)译本，卷2，巴黎，1869年，第73页。

⑪ R. 哥什曼，《贝格拉姆(阿富汗斯坦)的发掘》，《亚洲学刊》，卷234，1943-1945年，第59-71页，尤其是第63-65页。巴塔依莱(C. Bataille)断定为是公元120年左右的一个年代，《贵霜与贵霜-沙赫萨珊王朝时期的古钱币注释》，Arethuse，卷5，巴黎，1928年，19-35页，尤其是第25-27页。

⑫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考古探查与历史》，第99-100页和第161页。克拉莫斯(Krames)教授是如此的友善，让我们看了他将在下期《1940-1947年印度考古学年度书目》中发表的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

⑬ V. A. 史密斯，《印度早期历史》，第一版，第241页；第二版，第256页；第三版，第275页；第四版，第291页。

⑭ P. 马森-乌尔塞尔(P. Masson - Oursel)，《古代印度与印花棉布文明》，《人类的进化》，巴黎，1933年，第58页。

⑮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考古探查与历史》，第163页。

⑯ 哥什曼在页163中认为韦苏提婆一世的继任者们自我表现为好象是“迦腻色迦世系的继承人”，虽然他们并不是。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迦腻色迦的亲属。

⑰ 如另一个见于马努库瓦尔(Manukuwar)佛陀的笈多例子，复制于《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艺术史》，图162。我们的图65是一个笈多底座，这由上面边缘的铭文所证实，我们解读如下：“(sam)vva 90(??) varṣama 1 koleya gaṇa vaira śakha pratiṣṭhāpita”。这些字符，如sa, ga, pa的圆形，ma与na典型的笈多形式清楚地显示出这个底座源自笈多纪元的9(??)年。年代的另一个迹象是崇拜者头发修饰为笈多风格。

第七章 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印度北部的历史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努力证明了来自于中国和西方的资料完全符合伟大的远征导致了大夏的征服。科诺紧随拉普森的观点，提出了侵入印度的原因一定是萨迦人在锡斯坦所采取的行动，在密特拉得斯二世统治后，他们使自己脱离了极其脆弱的帕提亚。“就在公元前 88 年，密特拉得斯二世死后不久，锡斯坦的萨迦人脱离了帕提亚，开始了征服的历程，这使他们到达了印度河流域的国家。其中的一个事件通过塞种纪元在公元前 84 年左右的开始建立予以纪念，我将在下面努力去对此加以证明。”^①所引用的暗示 *ayasa* 这个词是(错误的)意见的后一个句子，在 1932 年被提出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显然它只是范·威克的天文计算^②，这促使科诺后来以那一纪元的开始来纪念对印度的侵略，他首先没有仔细考虑是哪一件事符合这个纪元的开端，然后再来决定那个事件的年代。我们将简单地谈一下来自锡斯坦侵略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了^③阿尔达班努斯一世在一次反抗斯基泰人，吐火罗人与萨迦人的战争中被杀，密特拉得斯二世在他之后继承了王位，统治于公元前 124 ~ 前 88 年。我们认为在斯特拉波的一段文章涉及到了他：(他)战胜了斯基泰人，夺取了大夏的一部分，就像欧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当年所为^④。

从《加斯蒂纳斯》那里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国王^⑤，而在它对这个国王反抗亚美尼亚战争的叙述中明显地混淆了密特拉得斯

二世和三世的人称。

我们从这篇描述中获得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好斗的国王,显然我们必须将他与斯特拉波的作品联系起来,因为《加斯蒂纳斯》明确提到了密特拉得斯二世在东方成功地战胜了斯基泰人,而在它涉及密特拉得斯一世的部分中,根本没有谈及在东方与斯基泰人的斗争。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并非是帕提亚王国的软弱,而只是密特拉得斯二世反抗斯基泰人的战争导致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再次去寻找一片新的国土。而且,确实一定有某种紧迫的需要迫使他们离开了当时最为肥沃的大夏,我们相信正如匈奴是一部分月氏人离开敦煌前往上伊犁河的原因,乌孙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进一步来到西方的原因一样,那么现在帕提亚则是斯基泰人分裂及迁往印度的原因。就在密特拉得斯二世长期统治期间(前 122 ~ 前 84 年),那时所发生的这种大批的迁移是不能被记载下来的。我们发现印度外来的第一个侵略者的年代是在旧纪元 58 年,即公元前 71 年的一件铭文中,发现于坦叉始罗南部旁遮普麦拉的一口井中,从那年起直到旧纪元 200 年,也就是公元 71 年,涌现出了 20 多件注明日期的铭文。

正如我们所说,科诺^⑥同意拉普森^⑦认为的侵入印度的外来部落来自于锡斯坦,不久以后,考德林顿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观点中去^⑧。塔恩则假设公元前 155 年在锡斯坦建立的萨迦王国形成了这一纪元的开端,并应用在了印度西北部早期的铭文当中,他也同意这种观点^⑨。

根据《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进行判断,后来在印度河西边有一个斯基泰王国,它稍后处于帕提亚人的统治之下。塔恩认为这个王国兴盛于公元前 110 ~ 前 80 年间,大约在前 80 年左右,毛迦统治下的萨迦人在帕提亚人的压制下向北征服了旁遮普,因为他认为发现于 78 年的坦叉始罗铜盘上的铭文一定源自于 $155 - 78 =$

公元前 77 年,所以毛迦在那年一定带领他的萨迦人去了北方^⑩。

我们认为来自坦叉始罗的铜盘不仅应被确定为 129 - 78 = 公元前 51 年,而且塔恩还并未考虑到麦拉(Maira)铭文,其年代卡宁汉姆解读为 59 年,这被科诺所认可。根据塔恩的推论,萨迦在公元前 97 年就应该已经在北旁遮普了,而这并不符合他的在毛迦领导下向北远征的观点。这同样适用于沙铎尔(Shahdaur)、玛恩瑟拉(Mānsehrā)和法特扬(Fatehjang)铭文。塔恩对事件的介绍应归于他认为旧纪元开始的年代以及在锡斯坦这种纪元使用者的起源是在公元前 155 年;这可能要依赖于锡斯坦这个名字确实指的是萨迦斯坦。尽管也许萨迦早期从锡斯坦侵略了印度,但仍存在印度西北部早期的佉卢文铭文的创造者并非是从西部而是从北部侵略了印度的可能性^⑪,他们不只是萨迦人,而是吐火罗人,萨迦人与其他人的混合群体。

除麦拉铭文外,接下来反对塔恩的观点可以补充到这儿。根据托勒密(Ptolemy),它清楚地显示出我们不可以认为斯基泰人像我们从《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中所知的那样完全限制到了南方,即印度河三角洲地带,就如考德林顿^⑫所认为的,因为托勒密在概括印度—斯基泰的城镇与它们的地理条件时,城镇也包括在了远离北方的地方,即在旁遮普^⑬。此外《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也认为:“...除了关于北方的记载外,它提到了斯基泰人的沿海地区...”^⑭塔恩接受了密特拉得斯国王二世使萨迦人定居在了锡斯坦的观点,而其他许多的观点被托马斯以非常可靠的论据所驳倒^⑮,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流士已经在他的岩石铭文中提到了在锡斯坦的萨迦就等于萨迦斯坦。虽然仍存有有可能在大量的迁移期间又有新的塞种人群体去了锡斯坦,又在那里去了印度,但假定那部分居住在乌浒河(Oxus)与药杀水(Jaxartes)间的塞种人在越过兴都库什去旁遮普的庞大的移民流中被冲散更为合理,而且,也许他们是那群移民中的先行者。《前汉书》中的中国资料与此相符,其中

下列句子非常明显地提到了塞种的这次迁徙：“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此处英文原文为‘大月氏西去，臣服大夏，但塞王南去，臣服了罽宾’——译者）”。^⑬根据沙畹^⑭，罽宾就是迦湿弥罗，他们到达这个地方的路线就是悬关县度，即博劳山口（Bolor - pass）。而拉普森、赫兹菲尔德和塔恩则认为^⑮一个游牧部落是不可能走这个山口的。塔恩对把罽宾确认为迦湿弥罗予以了正确的怀疑，他根据不同的证据，相信这指的是喀布尔，确实，这是极其可能的。在晚期，罽宾这个名字更广泛地用在了斯基泰人所占领的兴都库什南部地区。因此我们就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在月氏从大夏分散前，塞王在早些年已经进军到了印度西北部，也许是逃离后来所提到的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压力，而推进到了大夏。作为后来到达喀布尔以及吐火罗的旁遮普人自身与萨迦人强烈混合的结果，很难于在印度的不同组成部分间进行区分，或，正如考德林顿在他最近的杰出报告中将其置于了中亚地理史上：“……很少能探究出基本的民族单位。”^⑯印度人称这个混合体通常为“塞种”，因为那是印度西北边疆民族所知的最古老的名字，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文学中也出现了“覩货罗（Tusāras, Tukhāras）”这样的名字^⑰。

除已提到的一连串的证据外，从铭文自身还可得到一些迹象，指出了这些铭文的制造者属于来自西北游牧部落大侵略的事实。科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坦叉始罗的铜盘铭文中提到的殖民地总督李亚迦·库苏路迦（Liaka Kusuluka）在其名字中带有“库苏路迦”的单位^⑱。托马斯^⑲和拉普森^⑳认为应将此看作是一个头衔。我们认为，显然斯基泰人习惯于加上另一个也被其父亲或另一个近亲所用的名字。对此给予说明的例子是：库朱拉·伽德菲塞斯（Kujula Kadphises）- 威玛·伽德菲塞斯（Wima Kadphises）；库苏路阿·帕提迦（Kusulua Patika）- 李亚迦·库苏路迦（与第一个伽德菲塞斯王所用的库朱拉一样）；阿亚西亚·伽姆亚（Ayasia Kamula）-

伽拉奥斯塔·伽姆亚(Kharaosta Kamūla)。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重复的成分是姓,第二——如同约翰·逊一样它源于父名。我们认为在两种情形中都有一种家族关系,因此对我们而言“库苏路迦”极不可能是一个头衔,因为如果那样,库朱拉·伽德菲塞斯中的“库朱拉”也可被他的儿子所用,但相反他只重复伽德菲塞斯这个名字^④。科诺把“库苏路迦”当作是一个姓,他从伽德菲塞斯国王西北侵略印度的事实得出结论,证明:“……那个李亚迦是罽宾的古代萨迦统治者的后裔,他的家族并非是从锡斯坦来到的印度。”^⑤除李亚迦之外,科诺又进一步排除了伽拉奥斯塔是他的祖先。他提出了伽姆亚=伽姆波亚迦(Kāmbojaka),充分地证明了它们是相等的,这从语言学角度已经被认可,因此与他其他的同胞相比,伽拉奥斯塔如同李亚迦一样源自西北。在某些人的情形中这些例外听起来是奇怪的,我们更愿作出最明显的推论,所提到的事实只是指出了这些铭文的制造者来自西北而非锡斯坦。

也许从旧纪元 58 年,即公元前 71 年,最多是 60 年,即公元前 69 年起,在印度西北部发现了注明时间的铭文,因此这是此时在印度存在有斯基泰人的一个证据。这样,根据《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一个斯基泰王国延伸到了印度河。

Kālakācāryakathānaka^⑥,梵语与普拉克里特语中的一种原始资料,通过一个耆那老师伽拉迦(Kālaka)的故事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来自于锡斯坦的侵略,他的妹妹是一个修女,被乌贾因王伽尔达波希拉(Gardabhilla)所诱拐,此后伽拉迦从萨迦人萨迦库(Sagakūla)那里寻求到了帮助。他们的封臣被称为“萨喜(Sāhi)”,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是“萨罗努·萨喜(Sāhanu Sāhi)”——“王中之王”。在与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并不受大王的喜欢,伽拉迦与 96 个萨喜离开了,跨过印度河到了卡提阿瓦(Kathiawār),然后到了乌贾因(Ujjain),这两个国家都被萨迦所征服,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王朝。(也许布玛卡(Bhūmaka)和那哈帕纳(Nahapāna)正

是属于这些萨迦人。这被加雅斯瓦尔提出的好几种耆那文学中的章节所证实^②)一段时间后,超日王驱逐走了这个萨迦王朝,作为纪念,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纪元。

接自上文,与不信仰者相反,我们完全同意科诺所说的,那就是并不存在我们不应相信这种传统的理由。内在的证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印度河的斯基泰王国的记述被《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和托勒密^③所传了下来,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被记述为“萨罗努·萨喜”(一个晚期斯基泰君主的真正特殊的称号),在我们看来,历史的基础处于这种记述之下的这种事实是不需有任何疑问的。

科诺从长期以来已知的耆那文学中^④提出了一种原始资料^⑤,其中萨迦人在乌贾因呆了四年,并认为他们在那儿统治于公元前 61 ~ 前 57 年。加雅斯瓦尔巧妙地将这一章节与其他的一些一起进行了论述,这些原始资料所给予我们的事件与年代彼此极为相符,与我们从钱币和铭文中所知的历史事实及诸如《往世书(Purāṇas, 印度教圣经)》,《故事海(Kathasaritsāgara, 短篇韵文故事集)》等等也是相符的。所有这些都极为一致。《往世书》, Paṭṭavali Gāthās 中所提供的年代与吉纳塞纳(Jinasena)所提供的年代彼此符合,这样不仅清楚了事件的正确过程,而且我们一方面能将这一时代的历史与孔雀王朝(Mauryas)和巽迦王朝(Śungas)相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又能同笈多时代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写一部这一时代连续的历史。萨迦人在公元前 1 世纪的前半期在那哈帕纳的统治下控制了印度西部的一部分^⑥。而且加雅斯瓦尔证实神话中的超日王并不是传说,而是著名的乔达弥普特罗悉达卡尔尼王(Gautamīputra Śatakarni),他后来接受了 biruda 超日王,与后来也击败了萨迦人的悉达卡尔尼王昆塔拉(Kuntala)相类似,这在《故事海》和其他作品中被提到过^⑦。也许是在乔达弥普特罗悉达卡尔尼王统治下的一个联盟,印度人击败了那哈帕纳,这个事实不仅由瓦西克(Vāsik)的乔达弥普特罗铭文,而且也由源自公元前 1 世纪

302 · ———

的马拉瓦的钱币所传了下来以纪念这次胜利。对那哈帕纳来说这种早期年代的建立消除了直到那时仍存在的认为那哈帕纳的年代在公元 2 世纪的西郡太守之间的所有难点^⑤。此外,古文字与这个早期年代也极为相符,因此我们认为以好几种方式给我们传下来的传说正确地陈述了斯基泰人在公元前 57 年被印度击败,而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则形成了所谓的超日纪元的开端。不过通过 72 年,即公元前 57 年的阿莫西尼(*Āmohinī*)铭文进行判断,在那以前斯基泰的总督征服了秣菟罗,因为索达萨(*Śodāsa*)在这个铭文中被称为摩诃(*mahā*,大)太守,而在秣菟罗狮柱的铭文中他的父亲罗朱拉(*Rajula*)仍拥有那个称号,他自己则只是太守。因此在这两件铭文间一定过去了一段时间,这样秣菟罗的征服与从乌贾因的被逐就不可能重合。

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想法集中在刚提到的狮柱上,我们认为它属于印度早期的佉卢文体铭文。尽管对此已有很多撰述^⑥,但铭文中仍留下了大量的不明之处。铭文中最使人迷惑的问题是提到的亲属关系。根据科诺,阿亚西亚·伽姆亚是伽拉奥斯塔(*Kharaosta*)的女儿,阿尔塔(*Arta*)的孙女^⑦,她正是建立狮柱的那个人。如果我们冷静地去看这篇铭文,我们所获得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女建立者并不是阿亚西亚·伽姆亚,而是那达·迪亚卡(*Nada Diaka*)。科诺反对的理由是那达·迪亚卡在铭文中所处的位置距离 *agramahesh(r)i* 太远,这是没有证据的,因为在出自秣菟罗的铭文中,女建立者经常将她们自己的名字放在末尾,在先列举的她们的其他亲戚、父亲、母亲、配偶之父母、丈夫和孩子之后。这样就说服了我们将那达·迪亚卡作为狮柱的女建立者,而非阿罗西亚·伽姆亚。因而她并不是伽拉奥斯塔·伽姆亚的女儿,而是阿罗西亚·伽姆亚的女儿,伽拉奥斯塔和索达萨的母亲。

根据科诺,伽拉奥斯塔与穆克王(*H. M. Muki*)——他与 78 年的铜盘中的毛迦王是同一个人^⑧,狮柱的女建立者为他举行了庄

严的仪式——是侄儿与叔叔的关系。而穆克死时应该没有孩子，否则伽拉奥斯塔的尤瓦拉遮(yuvarāja)称号将无法理解。

不过这种推测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科诺所认为的，狮柱的女建立者没有为她的叔父穆克举行庄严的仪式，而穆克是她的一個近亲。值得注意的是狮柱的女建立者确实提到了她的祖母，但没有提到她的祖父，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她举行的这个仪式就是为了她的表面上并未提到的祖父。那么伽拉奥斯塔的尤瓦拉遮称号就容易被他的父亲是摩诃太守的事实所解释。现在这个狮柱确实比 72 年的秣菟罗铭文古老，其中索达萨被记载为摩诃太守，而在狮柱中他仅被称为太守。而且，在秣菟罗佉卢文体的使用也表明了狮柱的年代更为古老。这是事件的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秣菟罗的新统治者首先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字体，佉卢文，后来在 72 年的铭文中，过渡到了使用婆罗迷文字，这在他们新的领土中颇为流行。一种将使狮柱晚于 72 年铭文的颠倒的顺序是不能被接受的。狮柱的外表也表明了这种年代的顺序。这个纪念碑确实是一个皇家建筑，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疑选择了最好的雕刻师。柱头仍显粗陋，而通过雕刻有 72 年铭文的 āyāgapata 进行判断，索达萨的艺术要更好一些，因此无疑也要晚一些。

因此，这个狮柱建在 72 年前^⑦，因而属于斯基泰人在印度最早的铭文，可能源自于公元前 80 ~ 60 年左右。例如罗闍乌拉(Rājūvula)的钱币仿制于斯特拉波一世和二世的事实就与此相符，这样这些钱币首先可能铸造于公元前 1 世纪中期以前^⑧。如果穆克确实是狮柱女建立者的祖父，那么他就根本不可能是中国人提到的公元前 101 年的大宛国王毋寡(Mu - Kua)^⑨。

托马斯推测在狮柱上雕刻有两篇单独的题献，他认为阿拉西亚·伽姆亚(我们认为是那达·迪亚卡)的题献是稍晚的一篇^⑩。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这篇铭文雕刻在了提供给它们的最好的两个地方，即光滑的方形物的背面与顶部。另一篇铭文则遍布整

个狮子的躯体,有四十多行,最为杂乱无章。狮柱女建立者的铭文一定更晚,因为它雕刻在看不见的部分,这种论据同样适用于第二篇铭文,正如其 1-4 行所提的那样,而且,当我们看到现存的许多长期争论的观点,就是关于哪一行应先读时,甚至都没有考虑到它能否从底部读起的问题,我们很想知道在建立起这个柱头时这篇铭文是否能以正确的顺序阅读。在我们看来,这篇铭文并不能被视为与读者的一种交流,而要作为某种礼物的强大的固定形式,对后代来说它并不具有可读题献的新增含义,就像我们的纪念碑一样。大多数古波斯的岩刻铭文从底部是不可读的。

铭文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来自两个人:摩诃太守库苏路迦·帕提迦和太守莫瓦吉·米依迦(Mevaki Miyika)。我们从其中的一篇铭文中得知,为纪念他们而设立了基金会。最好的假设就是他们把其高职位归于自己同后来的统治者或是与其前任的亲密关系。

在秣菟罗的某一时期一定有个稳定的太守政府。我们从钱币上知道了太守哈迦玛萨(Hagāmaṣa)和哈迦那(Hagāna)的名字,他们可能统治于罗阇乌拉之前。此外还发现了阿尔塔和伽拉奥斯塔的儿子(可能是同一个人?)的钱币,也有索达萨的父亲罗阇乌拉的。因此他的职位是相当独立的。斯基泰人在秣菟罗的最后的证据是索达萨统治下的 72 年,即公元前 57 年的铭文,其中并未提到最高统治者。从索达萨此时是摩诃太守的事实中可以推测罗阇乌拉死了。来自秣菟罗附近的另一篇铭文提到了摩诃太守罗阇乌拉的一个儿子,大概就指的是索达萨^④。好几种钱币都是由索达萨铸造的^⑤。

我们并不清楚在索达萨之后这个太守家族怎么样了。完全缺乏索达萨之后秣菟罗的编年铭文让人产生假设,在某一时刻萨迦人在秣菟罗的统治结束了。旧纪元 72 年即公元前 57 年之后我们也只有一篇来自秣菟罗的 199 年即公元 70 年的注明时间的铭文。

属于索达萨之后时代的称为高密特拉(Gomitra)和威斯努密特拉(Viṣṇumitra)的印度王的钱币,显示出在秣菟罗发生过一次印度的复兴。此外有一篇高密特拉国王的某个大臣的铭文以及一篇一个女人称其丈夫为高迦普特拉(Gotiputra)“萨迦人中的黑蛇”的铭文^④。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拥有的索达萨时期的最后一篇铭文的年代与萨迦被击败是同一年。有两种可能的力量导致了斯基泰人的分裂:一方面是来自东部的印度人,另一方面是来自西方的帕提亚人。他们被驱逐出了乌贾因和秣菟罗,最后还有来自于信德的力量,但尚不清楚这些灾难是否是同时降临到斯基泰人身上的。根据许多发现于旁遮普的铭文,那些地方保留了他们固定的住所。在这儿的公元前57年,我们发现了上述的毛迦的名字,塔恩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征服了秣菟罗,并发生了向旁遮普北部的远征^⑤。而我们已经看到根据78年之前的铭文,按年代顺序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通过钱币判断,在公元前1世纪,一定有一个莫俄斯或毛阿君主进行过统治,因为它们与泰勒普胡斯(Telephus)的钱币极为相似,塔恩认为他一定生活在公元前60年左右或是甚至更早的时候^⑥。对此我们完全同意,而且还要补充一种添加的证据,莫俄斯钱币并未显示有方“O”的形状。这种“O”的形状最先见于帕提亚的欧洛狄斯(Orodes)二世的钱币,他统治于公元前57~前37年。拉普森^⑦认为莫俄斯钱币一定源自公元前120年那么早,对此并没必要去进行反驳,因为尽管史密斯^⑧最先对此表示同意,但前者后来提出的证据显示出莫俄斯不可能在公元前88年就进行统治,在莫俄斯早期的钱币上,他仍带着“莫俄斯大王”的称号。而他后来的钱币展示的则是“王中之王,大王莫俄斯”的称号,明显是帕提亚人称号萨罗努·萨喜的翻译。拉普森指出这个称号是这个“斯基泰”国王从第一个在帕提亚带有这种皇帝称号的密特拉得斯二世那里所接收的,这样莫俄斯就不可能统治于公元前88年

前⁴⁸。这个莫俄斯国王与 78 年铭文中的毛迦是同一个人已经被普遍接受⁴⁹。另一种经常作出的假设是他是个斯基泰人⁵⁰。我们想知道是为什么,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遥远时代的历史事件中许多叙述缺乏充足的证据却被明确接受,而且经常是因为除前人所提出的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理由了。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允许从这儿返回到事件的根源,去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莫俄斯-毛迦被认为是斯基泰人呢?”毛迦统治期间的 78 年的一篇铭文被确定为是斯基泰人使用的纪元,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并非充足的理由,因为这种纪元在帕提亚君主冈多法内斯统治时同样被使用。

能够启发我们的有关莫俄斯-毛迦的惟一资料是钱币,上面提到了君主莫俄斯或毛迦。这些钱币在不同方面显示出与阿泽斯钱币的强烈相像⁵¹,而与其他帕提亚人的统治者,诸如乌奴你思,斯帕拉霍拉(Spalahora)和冈多法内斯时的钱币相似程度则要略轻。莫俄斯和阿泽斯通常不仅铸造相同类型的钱币,例如“波塞冬(Poseidon)立像”,“马背上的国王”以及“胜利女神”,而且还有多种多样的钱币铭刻,即“伟大的王中之王”,就阿泽斯的早期钱币来说,这种情形是刚好一样的。怀特海德看来也注意到了这种钱币的相似,至少他说:“……他们(即莫俄斯和毛迦)与乌奴你思的萨迦王朝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⁵²就我们所知的,除了怀特海德外,几乎没有人怀疑乌奴你思王朝是帕提亚的⁵³,但对我们来说这儿要紧的是在莫俄斯的钱币与帕提亚人国王的钱币尤其是阿泽斯钱币间有着明显的相似。这两个国王间的钱币还有另一共同点,这两种钱币主要发现于旁遮普,很少在阿富汗斯坦发现⁵⁴,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这种特征我们是不会在一个从西北侵略印度的斯基泰君主身上发现的,而更应出现在一个来自帕提亚,从西边向印度推进的君主身上。

但莫俄斯钱币不仅显示出与阿泽斯钱币的强烈相似,而且

在大体上与阿尔萨西斯的钱币也极为类似,正如冯·沙勒特(Von Sallet)已经注意到的⁶⁵,我们认为,尤其是与乌奴你思的帕提亚王朝的钱币相似,这也是怀特海德的观点。因此我们也许会认为这种“马背上的国王”(马并不腾跃)的类型是帕提亚人王朝的一种特征,开始于莫俄斯⁶⁶。同样这也适用于“站立的胜利女神”的类型⁶⁷,它同样被所有后来的帕提亚人模仿。史密斯对此予以了证实,他说“……莫俄斯的造币居于印度-斯基泰系列的前列”。⁶⁸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莫俄斯的造币与我们肯定了解的由斯基泰人铸造的钱币如罗阁乌拉的钱币⁶⁹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将立即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区别。莫俄斯的钱币不仅更好看,而且钱币的类型完全不同。

最终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莫俄斯模仿了帕提亚人的称号大王·王中之王,对一个斯基泰国王来说,这总是显得有些奇怪,但从另一种观点看,我们可以假设那时莫俄斯自己就是一个帕提亚人。通过文森特·史密斯的表达进行判断,他表面上也观察到了我们所注意到的莫俄斯钱币的好几种特征,“……没有证据或真正的理由去假设莫俄斯是个萨迦人……”⁷⁰。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在莫俄斯的造币中有许多迹象显示出了他是一个帕提亚人。

因此存在有两种可能:或者莫俄斯和毛迦是同一个人,是帕提亚人,或者莫俄斯和毛迦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仍存有后者是斯基泰人的可能⁷¹。就我们所知,惟一一个早已对将莫俄斯鉴定为毛迦产生怀疑的人是弗利特⁷²,他将莫俄斯的钱币确定为公元前120年左右,而认为78年的毛迦铭文为超日纪元。而且他指出毛迦=毛阿=莫俄斯的语言学上的鉴定是不能被证实的,因为“消除两个元音间的单独的辅音”的观点并非固定规则。弗利特进一步主张:“如果毛迦与莫俄斯不是同一人,那么我们就没有毛迦的钱币,也没有莫俄斯的铭文”,这种推论并不一定就是毛迦是莫俄斯的一种证据。我们完全同意弗利特的这种观点,但即使如此,仍不

能证实毛迦与莫俄斯不是一个人。这在我们明确说明毛迦是斯基泰人时才有可能,就此而论,那么无论如何莫俄斯就是帕提亚人。目前前者是不可能的,因为毛迦在一篇由斯基泰人发布的铭文中被提到的事实并非他自己就是斯基泰人的证据。冈多法内斯,我们肯定他是一个帕提亚人,也在斯基泰人的铭文中被提到过。此外,根据《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历史上也记载了很大部分领土在早期是由斯基泰人统治的,后来被帕提亚人所征服^⑤。因此我们并不敢确定毛迦与莫俄斯是否是一个人。

关于莫俄斯,我们愿接触一下塔恩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根据他,在安提阿尔西达(Antialcidas)与莫俄斯(即毛迦)间一定有五个统治的君主^⑥。根据塔恩,第一个提到的最迟在公元前130年开始统治,与派遣迪恩(Dion)的儿子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os)作为使节前往吠舍离(Vaisali),现在是贝斯那迦尔(Besnagar)的某个巴迦巴陀罗(Bhāgabhadra)王的朝廷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现在塔恩否认这个巴迦巴陀罗就是在《往世书》中提到的统治于公元前90年左右的巴迦(Bhāga),因为根据拉普森^⑦,那时在安提阿尔西达与莫俄斯——毛迦间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给这五个提到的国王进行统治,而根据塔恩,莫俄斯——毛迦生活在公元前77年。我们认为,首先,根本就没有必要认为上述的五个国王是一个接一个地统治。因为在暴乱时期,许多篡位者可以在国家的不同部分同时很好地进行统治。而且,根据拉普森^⑧,巽伽(Śunga)国王的王朝名录结束于公元前72年。因此巴迦应该统治于公元前114~前82年,所以我们可以推算出上述的这五个国王统治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前51年间并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并不愿“一开始”将贝斯那迦尔柱子上提到的巴迦巴陀罗的身份确定为《往世书》上提到的巴迦,除非能提出更多认真的异议。

从《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中显示出帕提亚人与斯基泰人间并不存在有友好的关系,而有人几乎将他们当作是完全一样的,或至

少像弗兰克^⑦、拉普森^⑧、德拜瓦斯^⑨与考德林顿^⑩那样认为是难以区分的,科诺则认为两者间的关系并非这种性质,我们对此完全同意。帕提亚人的扩张欲还不能确定开始于什么时候。不过,就此而论,这个事实是值得提的,卡宁汉姆认为他能辨别出大约是公元前 71 年时的麦拉的一篇铭文中的名字毛阿。由于这篇铭文现在极难辨认,我们很遗憾不能利用这个事实作为一个证据的基础。在帕提亚自身,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欧洛狄斯二世从公元前 57 年统治到公元前 37 年;他甚至在公元前 53 年于卡尔哈(Carrhae)附近挫败克拉苏使罗马人遭到了失败^⑪。这个国王的长期统治对帕提亚人的扩张来说一定是个有利的时期,并发展到了欧洛狄斯的继承人弗拉特四世的统治时期(前 37 ~ 前 2 年)。而后一个统治者的统治很混乱。根据《加斯蒂纳斯》,他由于残暴而被帕提亚人驱逐走^⑫。提里达特斯(Tiridates)替代他成为了国王,不过,在公元前 30 年左右被强迫引退^⑬,根据《加斯蒂纳斯》是在公元前 25 年,因此弗拉特四世的统治一定伴随着连续的骚动,可能这是他把他的意图过度集中在罗马人身上的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最终他被其儿子弗拉特塞斯(Phraataces)(公元前 2 年 ~ 公元 4 年)谋杀了,而弗拉特塞斯也被贵族们放逐,他们拥欧洛狄斯三世(公元 4 ~ 6 年)为王,但他很快也被谋杀。经历一年内战与骚乱时期后,弗拉特四世的最小的儿子乌奴你思一世在公元 8 年登基,但他不久被阿尔达班努斯三世的叛乱驱逐走。

当我们回顾上述的从弗拉特四世统治起的帕提亚历史时期时,那么显然距公元前 1 世纪末不远的骚乱时期对贵霜人来说一定是钻帕提亚人力量薄弱空子的大好时期,因而我们确实必须将丘就却的行动确定为公元前 1 世纪的最后 25 年。这是符合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得出的结果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其将试图进一步给出一些增补的证据。此外,中国的资料也告诉我们丘就却击败了安息,并征服了喀布尔^⑭。在中国的著作中帕提亚总被称

为安息,但由于阿尔萨西斯(Arsacidian)的王国那时并未向东扩充得那么远,无疑安息一定指的是统治印度的帕提亚诸王。帕提亚自身的骚乱形势对它的国王来说是不可能赶去援助他们的同族的。进而我们将返回到丘就却开始统治的时候,在这儿我们只能宣称随着他的即位,帕提亚开始了在印度的衰落。

从大量的钱币和一些铭文中我们获知了好几个国王的名字,他们统治于帕提亚统治期间,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和后半期达到了鼎盛,例如讨论得很多的名字:乌奴你思、冈多法内斯、阿泽斯和阿泽里塞斯,现在莫俄斯的名字必须要补充进去,就像我们刚看到的。

在乌奴你思钱币的反面,他提到了斯帕拉霍拉和他的儿子斯帕拉迦达玛(Spalagadama):“王中之王,伟大的斯帕拉霍拉”或“斯帕拉霍拉之子,伟大的斯帕拉迦达玛”。赫兹菲尔德认为^⑥斯帕拉霍拉在他的钱币上将他自己说明为阿泽斯的兄弟,而不是乌奴你思的,因为托马斯^⑦和卡宁汉姆^⑧描述了一枚乌奴你思的钱币,在其背面提到了阿泽斯。不过史密斯很久以前已经指出这并不正确,这枚钱币其实是莫俄斯的^⑨。但赫兹菲尔德依靠卡宁汉姆,给出了下面的家族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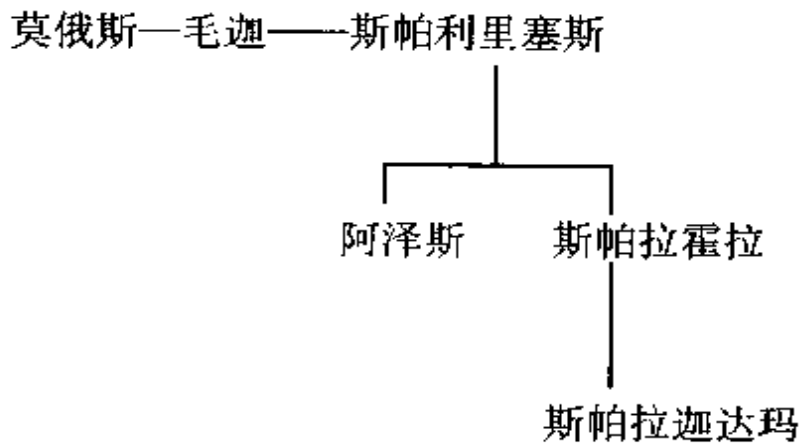
阿泽斯——斯帕拉霍拉



斯帕拉迦达玛

现在还有一组斯帕利里塞斯(Spalirises)的钱币,在一些钱币上他称自己为“王中之王,伟大的斯帕利里塞斯”,反面是“国王之兄弟斯帕利里塞斯”。这个斯帕利里塞斯的其他钱币将他指为“伟大的斯帕利里塞斯王”,反面是“大王,伟大的阿泽斯”或“王中之王,伟

大的斯帕利里塞斯”和“大王,伟大的斯帕利里塞斯”。赫兹菲尔德认为所有提到的人都是斯基泰人,这个斯帕利里塞斯是毛迦的一个兄弟,别名莫俄斯。而且,“国王的兄弟”这个称号属于皇储的父亲^⑨,因此通过女家长制斯帕利里塞斯的儿子阿泽斯在莫俄斯统治期间就是未来的国王。这样家族世系图将是如下:



反对赫兹菲尔德对事件描述的最后一点论据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事实,根据赫兹菲尔德,斯帕利里塞斯重铸了他儿子斯帕拉霍拉的钱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重铸钱币的国王总是统治于他重铸钱币的国王之后。除托马斯与卡宁汉姆的错误外,赫兹菲尔德也将他的结论建立在拉普森(他认为斯帕拉霍拉、斯帕利里塞斯与乌奴你思是兄弟)所称的基础上,即,斯帕拉霍拉、斯帕利里塞斯与他们的儿子斯帕拉迦达玛和阿泽斯拥有斯基泰名字,相反,他们的兄弟和叔叔乌奴你思是帕提亚人名字^⑩。赫兹菲尔德依靠民族的区别解决了这种不大可能的事情,但他将乌奴你思与其他人分开,拒绝了这种家族关系。

乌奴你思,斯帕拉霍拉和斯帕利里塞斯钱币都来自于坎大哈(Kandahār,即阿拉克西亚(Arachosia))、伽兹尼(Ghazni)和锡斯坦(德兰吉亚那(Drangiana))^⑪。相反阿泽斯钱币则大量地发现于

旁遮普,而非加拉拉巴德(Jalalabad)西部。

对于赫兹菲尔德认为的莫俄斯和阿泽斯是斯基泰人的观点的异议比对我们提出的证明莫俄斯是帕提亚人观点的异议还要多一些,在其他的当中,阿泽斯看起来也是个帕提亚人,因为后一个人在他的钱币上就像冈多法内斯一样提到了阿斯帕瓦尔玛(Aspavarma)。那么,就如通常所做的,不大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毫无疑问是个帕提亚人的冈多法内斯从萨迦人阿泽斯那儿雇用了印度的阿斯帕瓦尔玛作为他的战略顾问^②。我们认为这种假设在这两个敌对民族间是极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只有接受阿泽斯与冈多法内斯都是帕提亚人这个事实,而冈多法内斯直接继承了阿泽斯,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们雇用了同一个将军。此外,我们希望注意到这个阿斯帕瓦尔玛可能并不是印度人,这已被普遍接受^③。他的名字明显是伊朗的;如果他是印度人,他的名字就应是阿斯瓦瓦尔玛(Aśvavarma)。

整个来说,我们认为顽固地坚持赫兹菲尔德的斯基泰家族方案会有太多的异议,其成员会是:莫俄斯、斯帕拉霍拉、斯帕利里塞斯和阿泽斯,而另一方面则是帕提亚人:乌奴你思、俄塔格涅斯(Orthagnes)与冈多法内斯。正如我们认为的不大可能相信斯帕利里塞斯是斯帕拉霍拉的父亲,而斯帕拉霍拉又是阿泽斯的兄弟一样。拉普森^④和怀特海德^⑤认为斯帕拉霍拉和斯帕利里塞斯是乌奴你思的兄弟,而斯帕拉迦达玛和阿泽斯是他的侄子。而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的话,科诺仍将其辨为另一个人,斯帕利里斯(Spalyris)^⑥。关于这三个人,斯帕拉霍拉、斯帕利里塞斯和斯帕利里斯,其中两个被认为是乌奴你思的兄弟,或是阿泽斯的父亲和兄弟,我们更愿作出下面的注释:首先,显然在许多钱币上作为独立统治者而提到的斯帕拉霍拉和斯帕利里斯是同一个人。这在三个钱币的铭刻中是明显的:

第一个 正而:王中之王,伟大的乌奴你思

反面:王中之王,伟大的斯帕拉霍拉

第二个 正面:王中之王,伟大的乌奴你思

反面:斯帕拉霍拉之子,伟大的斯帕拉迦达玛

第三个 正面:国王的合法兄弟斯帕利里斯

反面:斯帕拉霍拉之子,伟大的斯帕拉迦达玛

第三个钱币中的铭刻是前两个提到的钱币反面铭刻的结合。因此名字的主格语是斯帕利里斯或斯帕拉霍拉。

除斯帕拉霍拉,别名斯帕利里斯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统治者的名字,斯帕利里塞斯,他独立铸造了自己的钱币。他重铸了斯帕拉霍拉,别名斯帕利里斯的钱币,它原先带有下列铭刻:

正面:王中之王,伟大的乌奴你思

反面:王中之王,伟大的斯帕拉霍拉

因此斯帕利里塞斯位于斯帕拉霍拉之后,而且也许相距并不远。在普拉克里特语中斯帕利里斯乌的所有格的对应词在钱币中读为“斯帕利里沙萨(*Śpalirīśasa*)”;因此主格语就是“斯帕利里沙(*Śpalirīśa*)”,与斯帕利里塞斯相对应。而在我们看来,这个“斯帕利里沙(*Śpalirīśa*, *Śpalirīśa*)”只是斯帕利里斯的印度化的形式。我们认为将 *v* 写作 *i* 并没有异议^⑧。因此斯帕利里斯、斯帕利里塞斯、斯帕拉霍拉与斯帕利里沙只是同一个人名字的不同写法方式。现在为什么“斯帕利里塞斯”重铸了“斯帕拉霍拉”的钱币也就变得清楚了;他由“国王的兄弟”的地位成为了独立的统治者,并将在乌奴你思统治期间发行的钱币改变成了他自己的其他钱币。

也许我们应假设那时的形势大概是这样:当莫俄斯在旁遮普是国王时,乌奴你思作为至高无上的王在坎大哈统治。在他的统治之下他的兄弟斯帕拉霍拉(别名斯帕利里斯、斯帕利里塞斯或斯帕利里沙)作为总督与他的儿子斯帕拉迦达玛进行着统治。斯帕拉霍拉首先铸造了钱币,正面是乌奴你思,在反面则把他自己称为他的兄弟。然后他又以斯帕利里斯和斯帕利里沙的名义铸造了钱

币,仍旧称自己为乌奴你思的兄弟。在这期间背面提到的他的儿子斯帕拉迦达玛消失了,现在在他的地方完全独立了的斯帕拉霍拉又在背面提到了阿泽斯或他自己。两人钱币上铭刻的相似也辨明了斯帕拉霍拉与斯帕利里塞斯的一致:“大王,伟大的斯帕拉霍拉”与“大王,伟大的斯帕利里沙”。当我们看到在这些时期的钱币铭刻中的变化是多么巨大时,就更有说服力了。

乌奴你思与斯帕拉霍拉一起发行了钱币,他又与阿泽斯一起发行了钱币。后来阿泽斯独立铸造了钱币,与前面提到的相比,这些钱币主要发现于旁遮普。考古发现显示阿泽斯在那儿继承了莫俄斯:这并不能认为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有一种家庭关系。也许阿泽斯是斯帕拉霍拉的同族。史密斯猜想他是斯帕利里塞斯的儿子^⑧。很明显阿泽斯变得独立了,并铸造了非常多的钱币,这样多的以及如此不同的品质,包括马歇尔^⑨和拉普森^⑩(尽管第一个还未完全证实)在内的好几个学者认为他们应当接受有阿泽斯一世和二世的可能,两者之间是阿泽里塞斯,另外尤其是因为在莫俄斯与冈多法内斯——按照大多数学者,他在公元19年才开始统治——之间的太大距离不能被解释。不过我们必须与科诺和赫兹菲尔德一起确定在阿泽斯一世,阿泽斯二世和阿泽里塞斯间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认为爱称阿泽里塞斯来自名字阿泽斯可以与诸如弗拉特塞斯(Phraataces)来自弗拉特,斯帕利里塞斯来自斯帕利里斯的形式一样相比较。同样的爱称在帕提亚经常出现^⑪。假如阿泽斯与阿泽里塞斯是两个不同的人,那么就无法理解在他们一起发行钱币时为什么同时会平等地带有高级称号。这样我们就拥有带有下列铭刻的钱币^⑫:

正面:王中之王,伟大的阿泽里塞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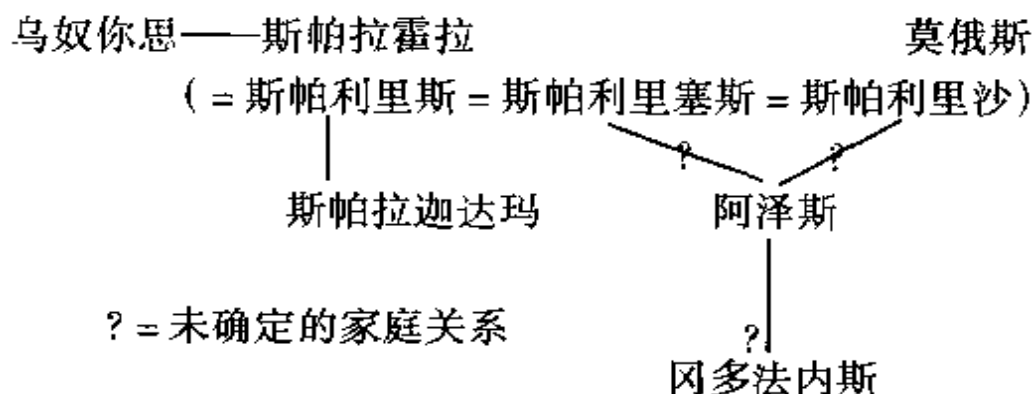
反面: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的阿泽斯

正面:王中之王,伟大的阿泽斯

反面: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的阿泽里塞斯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除了因为冈多法内斯在公元 19 ~ 45 年并未统治以外,就像拉普森所认为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需要用阿泽里塞斯和阿泽斯二世去填充阿泽斯——根据拉普森,他在公元前 58 年就已经即位^⑧——与冈多法内斯间的空白。此外,古钱币领域一个最大的权威怀特海德尽管对阿泽里塞斯与阿泽斯间的钱币进行了区别,但对于拉普森的观点,他称存在有阿泽斯一世和二世:“由于地点的单独,阿泽斯丰富的发行物间种类与风格的区别可以适当地解释为是长期的统治所产生的。”^⑨

概括来讲,我们提出了下面的国王顺序:



通过我们在上面所见的第一次在公元前 57 ~ 前 37 年遇到,却并未在莫俄斯钱币上发现方“O”的事实,因此后一个王一定生存在公元前 57 年左右,那么阿泽斯的纪元就有几分接近这个事实,因此阿泽斯一定统治于公元前 1 世纪的第三个四分之一时。这与获自坦叉始罗地层的信息是符合的,从中约翰·马歇尔爵士不仅推断出阿泽斯钱币直接紧随莫俄斯钱币,而且它们开始于公元前 1 世纪的第三个四分之一时^⑩。因此阿泽斯一定与欧洛狄斯几乎统治于同一时期或是稍晚一些,如公元前 50 ~ 前 30 年左右。碰巧,刚好在阿泽斯的一些钱币上出现了方“O”,这与提出的年代极为相符。另一个论据是斯帕利里塞斯钱币(这样看来它是斯帕

拉霍拉最晚的钱币)上面也出现了方“O”,显示出了与喀布尔最晚的一个希腊王赫尔玛尤斯(Hermaeus)钱币的极大相似。根据塔恩,这个赫尔玛尤斯统治于公元前50~前30年:“……同样确定赫尔玛尤斯并未活到公元25年或其附近……”^⑥，“……他不会在公元前50年后即位,或是死于公元前30年前。”^⑦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阿泽斯一定统治于那一时期,如公元前50~前30年。对此,仅有兴趣指出科诺认为他能在沙铎尔的铭文中(其第一行中的“Ayasa”可被解读)分辨出年代102,但仍有某些地方分辨不清,或许是80,或许是90,又是一个辨认不出的个体,这样一来这篇铭文就源自旧纪元的80~102年的时期。这种计算提供给我们的是公元前49~前27年,因此就同由于其他理由而在上面提出的时代是一致的。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阿泽斯的这个年代是否符合其他的资料。我们已经注意到通过钱币来判断,与阿泽斯部分同时代的斯帕拉霍拉的钱币确实是模仿于公元前50~前30年赫尔玛尤斯的一种。按照家系,乌奴你思一定统治得稍早一些。这也完全符合获自他的货币中的信息,因为它们惟一显示出了圆“O”,这样我们就能确定乌奴你思的统治年代是公元前60~前50年间的某时。当拉普森宣布他的有关出现方“O”时期的高兴发现时,对于乌奴你思的钱币他却将其看作是这种规则的一种例外:“……他显示出这种碑铭学的检验并不能适用于这种特殊的例子,因为与这种类型有关的方形似乎直到很晚时才出现。”^⑧科诺对此的一种看法是有关方“O”的规则是毫无意义的^⑨。乌奴你思铸造的两种类型的钱币是德米特里(Demetrius)的“赫拉克莱斯(Heracles)立像”和赫里奥克莱斯(Heliocles)的“宙斯立像”的类型。在第一种类型中我们注意到方“O”仅仅出现在与丘就却一起发行的赫尔玛尤斯钱币上。而在第二种类型中方“O”与“宙斯立像”出现在冈多法内斯的各种钱币上,但并没有出现在他的前任发行的这种类型的钱币

当中。

拉普森将有关方“O”的规则视为例外,因为他认为冈多法内斯仅仅统治于公元 19 ~ 45 年^⑩,而继承他的丘就却则统治于公元 1 世纪中期^⑪。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以及进一步将要看到的,这些国王在公元 1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已经开始统治,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关方“O”出现的规则不适用于乌奴你思所用的钱币类型当中,这样我们就可能接受公元前 50 年左右为乌奴你思“开始统治的最晚时期”。因此有些事情是符合我们提出的阿泽斯,斯帕拉霍拉和乌奴你思国王的年代的。此外,有关方“O”的规则也由此显示出在每一点上都得到了证实。

阿泽斯之后冈多法内斯即位,他直接追随着阿泽斯,因为在他的军队中有着同一个将军因德拉瓦尔玛(Indravarma)的儿子阿斯帕瓦尔玛(Aspavarma)^⑫,这出现在了钱币之上。考古地层也表明是一种直接的顺序。也许他们是亲戚,我们可以把公元前 30 ~ 前 15 年左右假设为冈多法内斯的大概年代。惟一可以利用的提到他的铭文是 103 年,即公元前 26 年的塔克提 - 依 - 巴喜^⑬铭文,这正好与我们刚表达的有关他的时代的假设是相符的。

铭文中提到的 26 年可能指的是冈多法内斯王朝的年代,那样莫俄斯或乌奴你思就可能在 77 年,即公元前 52 年开始统治。这个残片中的主要年代是 103,我们认为,这可能获自于这个事实,即月和日写在它之后,而非 26 之后。而且“年”在这儿表示为 sambatsara,而这总是这一时期古佉卢文体铭文的习惯,而年代 26 之后写的是瓶子(vase),它显然与另一种年代是有区别的。

最终,关于冈多法内斯政府,我们能从他的钱币中看出他不仅统治着阿泽斯的领土,而且也统治着乌奴你思的领土,即旁遮普与阿拉克西亚^⑭。我们不知他是否仅靠征服将这个伟大的王国置于了他的统治之下的。不过整个说来,显然冈多法内斯是这个帕提亚王朝的最强有力的国王。与此一致的是这个事实,他的名字正

好在公元 1 世纪显示出为遥远的西方所了解^⑨。

现在,我们仍拥有一种对我们假设的冈多法内斯的统治比通常所认可的要早得多的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追随了拉普森的观点,这个国王从公元 19 年一直统治到 45 年左右。他们形成这种观点完全是基于一篇资料,即圣·托马斯的伪《使徒行传》,其价值我们应进一步周密地进行考虑。赫兹菲尔德认为冈多法内斯是公元 20~65 年的至高无上的王。“他至少统治了 40 年”。^⑩他相信他的名字在西方的一种资料中也被提到了,即斐劳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的《罗曼语》中有关提亚纳(Tyana)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的生活^⑪,其中叙述了阿波罗尼奥斯的时代,在公元 1 世纪中期,在坦叉始罗是一个给北方的野蛮人进贡的弗拉奥提斯在进行统治。赫兹菲尔德称“弗拉奥提斯”这个名字可能与单词无碍(apratihata)是一样的,这在冈多法内斯的钱币上出现过,因此在斐劳斯特拉图斯的《罗曼语》中弗拉奥提斯与冈多法内斯是同一个人。虽然塔恩支持它^⑫,但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从语言学角度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弗拉奥提斯”与“无碍”的身份,更有可能“弗拉奥提斯”与两个极常出现的帕提亚人名字弗拉特(即弗拉哈特(Frahāta))或弗拉奥特斯(Phraórtes)(即弗拉瓦蒂(Frawarti))中的一个是同一人^⑬。也许我们从阿波罗尼奥斯的信息中能够得出的惟一结论是公元 45 年左右,半独立的国王仍居住在坦叉始罗。

不过,另一件西方的原始资料 the excerpta Latina Barbari 看来保留了冈多法内斯的名字,即伽萨斯帕(Gathaspar 或 Gathaspa)^⑭,也就是印度语中的伽斯帕(Gaspar, Caspar),是圣诞故事中的三个国王之一^⑮。不过我们并不敢用这种论据去确定冈多法内斯的年代在基督诞生时期左右。据此唯一可确定的事情是冈多法内斯的名字明显融入了早期基督信徒的近东(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它提供了早期教会的神父与遥远的印度间的一种联系。

我们认为其他的早期基督信徒的原始资料,圣·托马斯的传

说,源于公元3世纪的叙利亚的原著并没有多少历史价值;雷因纳德^⑩,而非卡宁汉姆^⑪,是第一个在1849年就已经认识到钱币中的“冈多法内斯”名字的,他一向是这样认为的^⑫,圣·托马斯以印度国王冈多法内斯^⑬的名义进入了他的部队。我们对这种身份的准确性并没有任何的怀疑;然而由于这样的一种传说的信息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后才被翻译为书面作品,我们认为因此而得出的历史结论,冈多法内斯一定生活在公元1世纪40年代是说过去的^⑭。此外唯一可确定的事是冈多法内斯的名字在公元3世纪已经为西方所知,而印度人与他名字的联系是他与圣·托马斯铭刻联系起来的原因。也许不同时代铭刻中的人变为同时代的现象再次在这里突然出现了。

从圣·托马斯的《使徒行传》中得出的冈多法内斯一定生活在公元40年左右的(错误)结论是他与阿泽斯间产生巨大间隔的原因,学者们试图通过接受一个阿泽斯一世,阿泽里塞斯和阿泽斯二世去填充它,但现在显示出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显然,那时的早期考古学家们努力地想使提到冈多法内斯的塔克提-依-巴喜铭文中的103年与冈多法内斯统治的(错误)时间达成一致,而这由于圣·托马斯的《使徒行传》,已经被人们接受。那么这种应用在塔克提-依-巴喜铭文中的纪元一定开始于公元前57年左右,因此结论明显是,这种纪元与刚好开始于那年的超日纪元是一回事。这种推论总是将旧纪元辨为超日纪元的最重要的支持论据^⑮。铭文中提到的26年表明的是冈多法内斯已经统治了26年,这样就包括了公元19年到45年的一段时期^⑯。

我们从事件的过程中看到,由于从圣·托马斯的伪《使徒行传》中得出的错误结论,那么帕提亚国王对超日纪元的使用就是这样推想出来的。毕竟,对于斯基泰统治者对这种纪元的使用,我们曾说过不必要给其添加任何关于帕提亚国王的東西。我们认为塔克提-依-巴喜铭文中的纪元对于这种规则来说并非例外,因此其

中所使用的纪元是旧的纪元,这样我们就认为这篇铭文源自于公元前 26 年。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关冈多法内斯早期年代的论据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在冈多法内斯的钱币铭刻上,即在圆“O”的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个方“O”^⑩。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我们必须将这个国王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 40 年后不久,因为尽管方“O”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 57 ~ 前 37 年的帕提亚的欧洛狄斯二世的钱币中,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观点是这种风气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丘就却的钱币仍表现为两种“O”的形式,但在阎膏珍的钱币上,就我们所能找出的,方“O”已经不再使用,而完全是圆的形式,因此在丘就却时期,公元前 25 年左右到公元 35 年左右,方“O”一定已经开始废弃。因此方“O”使用了很有限的一段时间,确实只是从公元前 40 年左右约到我们纪元的开始。我们将把在冈多法内斯最晚的钱币上出现的方“O”作为另一种论据来反对把他确定在公元 40 年左右,或甚至像赫兹菲尔德所主张的公元 60 年左右。此外,当我们与科诺假设是阎膏珍开始了公元 78 年的塞种纪元时,尚不清楚在冈多法内斯之后统治的帕提亚国王是如何仍能适合公元 40 年或甚至公元 60 年左右的时间表,以及与丘就却是同时代或甚至在其之前的。

此外,在冈多法内斯的钱币上他的一个称号是 ΑΥΤΟΚΡΑΤΩΡ 的事实可能表明它是这个国王的一个非常早的年代,因为沃劳斯说过这个称号只是在公元前 1 世纪统治者的钱币上出现过^⑪。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支持我们的有关冈多法内斯年代的论据,同时也是圣·托马斯的《使徒行传》不可靠的一个论据:在冈多法内斯之后是阿布达迦塞斯在统治,在冈多法内斯与他一起发行的钱币上,明显地指出阿布达迦塞斯是他的侄儿^⑫。卡宁汉姆在 1890 年^⑬已经考虑到将这个阿布达迦塞斯与在塔西陀的《编年史》第六卷 36 中提到的阿布达迦伊塞斯,一个名字几乎相同的人联系

起来,那里叙述了公元 35 年的一个事件,而阿布达迦伊塞斯和他的儿子辛纳凯斯(Sinnaces)参与了其中。卡宁汉姆将这些资料与以这样一种方式传播信息的印度钱币结合了起来,他把塔西陀作品中的阿布达迦伊塞斯的儿子辛纳凯斯当作了钱币上的阿布达迦伊塞斯的父亲,这样一来他就同时又是冈多法内斯的一个兄弟。赫兹菲尔德同意后面的说法,但认为阿布达迦伊塞斯是古达纳的儿子,他相信阿布达迦伊塞斯在冈多法内斯的钱币上被提到过,而且他认为他是冈多法内斯的姊妹的丈夫⁴³。瓦斯认为伽德(Gad)或古达纳是冈多法内斯的兄弟⁴⁴。科诺依靠弗里特的一种观点,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这个“古达纳”是“古达(Guda)”衍生出的一个形容词,就像“贵霜”衍生自“贵萨(Kusa)”一样,这样我们就必须把“古达纳”作为“贵霜”类型中的冈多法内斯的家系指示⁴⁵。此外,在一些俄塔格涅斯钱币上提到古达纳而非冈多法内斯的事实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观点的又一证据,我们将在讨论俄塔格涅斯钱币时进一步看到⁴⁶。因而赫兹菲尔德推测的最后一点,即冈多法内斯有一个姐夫或妹夫古达纳并未得到证实。而且,并不清楚卡宁汉姆和赫兹菲尔德是凭什么将辛纳凯斯作为冈多法内斯的兄弟,以及假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有两个叫阿布达迦伊塞斯的人的。对塔西陀原文中的这种奇怪的想象解释如下:发现于圣·托马斯的铭刻上的冈多法内斯的年代与罗马的原始资料不相符合,因此就增补了另一个阿布达迦伊塞斯。不过如果我们必须选择是圣·托马斯的《使徒行传》可靠还是塔西陀更可靠的话,我们认为应优先选择后者,这是更为明智的,因为这个作者拥有自己掌握的极为可信的原始资料,而且塔西陀的作品已被认识到相对可靠一些。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以及我们依靠它能够聚集起这一时期历史的资料如下:

根据塔西陀,公元 35 年生活着一个阿布达迦伊塞斯,他有一个成年的儿子辛纳凯斯。我们拥有冈多法内斯在印度的钱币,他与他的侄子阿布达迦伊塞斯一起发行了一部分钱币,他也独立地铸

造了刻有“冈多法内斯之侄子,大王,伟大的阿布达迦塞斯”和“大王,王中之王,冈多法内斯之侄子阿布达迦塞斯”的钱币。我们认为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最明显的结论是塔西陀的阿布达迦伊塞斯与钱币中的人一定是同一个人。如果阿布达迦伊塞斯在公元 35 年是个老人,那么他在冈多法内斯统治末期作为一个相当年轻的总督参政的时间一定是公元前 10 年左右。因而冈多法内斯的统治一定在公元前 30 ~ 前 10 年左右,对此我们已经出于其他原因而提了出来。有了这些论据,冈多法内斯的统治就要早于通常所推想的,现在我们就离开这个主题了。

不过关于这个国王我们仍有一点要谈。我们发现了许多“奈基(Nike,希腊宗教中的胜利女神)立像”类型的钱币,如冈多法内斯所使用的,但带有下列铭刻:

正面:王中之王,伟大的俄塔格涅斯

反面: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的冈多法内斯·古达纳

根据赫兹菲尔德^⑧,这个俄塔格涅斯(其名字相当于维里塔拉格那(Verethragna)),一定是塔西陀在《编年史》十三章 7 中提到的那个无名的人;在公元 55 ~ 58 年,哇尔达尼斯(Vardanes)的一个儿子起义反抗伏罗迦塞斯(Vologases)一世。那么这个无名的“哇尔达尼斯的后裔”一定与俄塔格涅斯是同一人^⑨,根据赫兹菲尔德,冈多法内斯在他的统治下作为总督铸造了钱币。我们并未见到任何这种假设的根据。首先,原文在这儿可能是不可靠的。尼波迪-安得雷森(Nipperdey - Andresen)怀疑它一定是“哇尔达尼斯后裔”,那么事实上上述的这个人确实有名字^⑩。正如赫兹菲尔德自己评论的:“俄塔格涅斯的钱币与继承了帕克雷斯的冈多法内斯的钱币是如此的相似,钱币背面除铭文外其他部分都不可辨别,俄塔格涅斯钱币无疑也源于冈多法内斯的晚期。”^⑪如果赫兹菲尔德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伟大的王冈多法内斯在他统治的末期就是另一个帕提亚国王俄塔格涅斯的一个总督。拉普森相信冈多

法内斯继承自俄塔格涅斯^⑮，而朱斯逊(Justi)^⑯，奥托(Otto)^⑰和苏尔(Schur)^⑱则相信他们是兄弟。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是极不可能的。如果像赫兹菲尔德提出的一件耻辱的事发生在冈多法内斯身上，那么就更可能是来自于贵霜而非帕提亚一边。此外，的确很奇怪在钱币的两面俄塔格涅斯与冈多法内斯拥有相同的高级称号。这也是阿泽斯与阿泽里塞斯的情形，使我们确信大概在这儿我们又拥有的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的名字。这次这两个名字不像阿泽斯与阿泽里塞斯的情形那样相像，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假设“俄塔格涅斯”是“冈多法内斯”的姓或称号来对此进行解释^⑲。我们认为我们对此更能接受。“冈多法内斯”与波斯语“文达法尔纳(Vindapharna)”相对应，指的是“庄严光荣的胜利者”^⑳。“俄塔格涅斯”是波斯语“维里塔拉格那(Verethragna)”的希腊化形式，意指“胜利的”，这样在我们看来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方面，而冈多法内斯钱币上的奈基像可能是这个姓的一种象征性的强调。如此相似的人名出现在了大印度文化的整个领域之中^㉑。

我们肯定了这种观点，同时这又与前述的观点有关，而且对于无碍(apratihata)我们更愿提出(赫兹菲尔德把他与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发现于坦叉始罗的约公元前1世纪的国王“弗拉奥提斯”等同起来)它是冈多法内斯称号“俄塔格涅斯”的梵语对应词：“无碍”指的是“不可抗拒的”，“不可击败的”，“胜利的”。这种 ornans 的称号早已用在了钱币上，“首先”被李西亚斯(Lysias)应用(他在反面写了 ANIKHTOS 作为对应)，后来又被罗阁乌拉应用于复合词无碍灼羯罗(apratihatacakra，意为不可击败的金刚——译者)中^㉒，这显然证明了赫兹菲尔德有关这个词的观点是错误的。维里塔拉格那的称号在萨珊(Sasanian)朝廷中作为不同国王的加冕名字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我们认为提到的冈多法内斯把自己称为俄塔格涅斯的钱币一定铸造于他统治的末期。正如赫兹菲尔德所注意到的，不仅是因为它们与冈多法内斯的继任者帕库萨

(Pakusa)的钱币惊人地相似,而且也是因为出现在它们之上的“Σ”的圆形C代表了这种字符经历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见插图29)。

重新开始,因此我们就理解了我们并不需将冈多法内斯假设为一个未知的俄塔格涅斯总督这样的一种混乱形势。这再次支持了我们的信念,古达纳是一种家系指示,因为我们看到正面有俄塔格涅斯的钱币在反面提到了古达纳。

如果阿布达迦塞斯在冈多法内斯的印度领土上继承了他,那么这也并不很长,因为他的钱币很稀少。另一个帕提亚国王帕库拉(Pakura,帕库里斯),就像冈多法内斯一样与阿斯帕瓦尔纳的一个亲戚萨沙(Sasa)将军一起发行了钱币^⑧,因此他可能直接继承了冈多法内斯,成为了独立的国王。阿布达迦塞斯也许被帕库拉驱逐到了西方,在那里塔西陀对他作了记载。

也许我们已经发现了贵霜人在旁遮普处于冈多法内斯的统治之下,因为根据科诺,丘就却似乎在103年即公元前26年的塔克提-依-巴喜铭文中被记载为迦帕王子(Kapa erjhuna),这样他就是一个年轻的王子。在122年,即公元前7年,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们发现他是旁遮塔尔(Panjtar)的领主和主人,显然贵霜接管了帕提亚到印度河西部的领土,这可能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136年或公元7年,我们发现丘就却也在坦叉始罗,在印度河的另一边,因为他出现在了那里发现的那一年的银册名册之中。后来我们只在187年,即公元58年的卡拉特斯(Khalatse)铭文中又听说了贵霜人,其中提到了阎膏珍。极有可能在中期时贵霜人对这些印度北部的领土仅有名义上的权力,尤其是在印度河的东边。《后汉书》极为强调地谈到了在阎膏珍统治时征服了天竺;它所指的印度领土在这儿并不要紧。因此似乎贵霜政权在此以前曾发生过一次衰败,根据斐劳斯特拉图斯的《罗曼语》中的资料,这是公元1世纪中期左右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在坦叉始罗还遇到了一个帕提亚国王弗拉奥提斯,他被迫向北方的野蛮人进贡。马歇尔也

推测贵霜政权有过一次暂时的衰落^④。

也许逼迫这个帕提亚国王进贡的人就是阎膏珍。帕提亚国王萨波达纳(Sapedana)和萨塔瓦斯特拉(Satavastra)的钱币发现于咀叉始罗,根据这些钱币来判断,他们在帕库拉统治期间以及前述的弗拉奥提斯之前在那个城市进行着统治。正是《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的记录提到了强有力的国王冈多法内斯(其中由于尚不清楚其余的帕提亚国王,因此通过他们的钱币我们听说得也并不相同)之后帕提亚政权衰落的这一时期:“越过腹地之南,是斯基泰的都城明那迦尔(Minnagar)由帕提亚人统治,不断驱赶着其他人”^⑤。

我们看到由于不同的原因,丘就却似乎在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就已就职。还有好几种其他的论据也提倡这一观点。首先是丘就却与赫尔玛尤斯一起铸造钱币的事实。在对这个论据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们也明白在下结论时应多么谨慎。科诺从范晔似乎只记述了公元25年后事件的事实以及他的关于迦腻色迦统治开始的推测着手,因此认为丘就却最早也只可能在公元25年后就职,并宣称丘就却与赫尔玛尤斯一起发行了钱币,因此断定赫尔玛尤斯一直统治到了公元30年左右^⑥。不过拉普森则认为赫尔玛尤斯统治到了公元前40年左右^⑦。塔恩则根据他有关的希腊国王的资料也推测出赫尔玛尤斯的年代为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30年左右^⑧。塔恩从这点出发,相信科诺的有关丘就却仅从公元25年才开始统治的推测,确定赫尔玛尤斯与丘就却的“联合发行”是不可能的,仅有丘就却铸造了钱币,因为他是赫尔玛尤斯的一个亲戚,同时希望居住在他的国家的希腊人站在他一边反对帕提亚人。我们认为这点理由似乎比其他的更为荒谬^⑨;由于在“联合发行”的情况下总是认可篡位或联合统治,这就更是如此了。但对此必须视为例外,由于这样一种牵强的原因,所以就必须假设那时丘就却仿造了一个至少在他之前55年统治的希腊国王的钱币。通过塔恩最后的言词判断,他自己也明显感觉到了他的论据的缺点:

“这些钱币是赫尔玛尤斯与伽德菲塞斯一世联合发行的陈旧的信条最终被普遍放弃了，因为人们认识到有一段相当大的时间间隔隔离开了这两个国王；但它并未被别的任何事物所取代。”^⑩的确没有任何事物能克服 55 年或更多年的间距，我们认为现在猛烈攻击明显的“联合发行”仅有一次是不明智的。塔恩根据他的大夏和印度的希腊国王的其他资料对赫尔玛尤斯的年代进行了计算，而科诺对于丘就却就职的开始，则将其与他的整个有关迦腻色迦统治开始的假设相联系了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在塔恩的计算与科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我们认为，无疑我们一定会选择前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出了充足的证据来反对科诺的假设，而就涉及希腊国王的塔恩的计算而言，几乎总是很好地与我们有关斯基泰人历史的轮廓相适合，除非象这种情形一样他又从科诺那里寻找到了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丘就却的统治直接与赫尔玛尤斯相衔接，我们相信赫尔玛尤斯的统治结束于公元前 25 年。因而丘就却就职于公元前 1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初期（而这证实了科诺的观点，他在 103 年即公元前 26 年的塔克提 - 依 - 巴喜铭文中被记述为一个年轻王子）。而且在坦叉始罗发现的证据确定了丘就却与冈多法内斯部分是同时代的，又部分晚于他，并在那个地方继承了他^⑪。由于丘就却在他即位之初可能并未征服坦叉始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国王就职于在公元前 25 年左右的某个时期。

对于刚讨论过的丘就却与赫尔玛尤斯联合发行钱币的情况，现在我们必须提出下面的事情。马歇尔在他的一篇报告^⑫中注意到了在他的发掘物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坦叉始罗他发现了许多赫尔玛尤斯与丘就却的钱币样品，与联合发行的类型相同，在地层上处于冈多法内斯之后，也是处于“公元前 1 世纪前半期”的地层。（无疑后者一定是印错的“公元前”代替了“公元后”，因为在文章中的其他地方赫尔玛尤斯与丘就却的钱币被记述

为“公元 1 世纪的前半期”)。对马歇尔来说,同时处于冈多法内斯之后的公元 1 世纪前半期赫尔玛尤斯与丘就却钱币上表面的费解与荒谬,对将冈多法内斯断定为公元前 1 世纪末期的我们来说只是对我们观点的一种辩护。

但古钱币还提供了更多的论据。在印度发现了许多的罗马金币是一个普遍所知的事实。它们是来自于西方的商人的法定货币,他们利用季风期前来购买印度的香料和其他值钱的商品。这些罗马钱币大部分源自尤利亚-克劳迪(Julian - Claudian)王朝时期。此后的钱币系列突然中断了,因此这些钱币主要源自奥古斯都统治时,直到尼禄(Nero)时期(包括尼禄时期),即公元前 27 年到公元 68 年。这种现象使苏尔注意到尤利亚的钱币在印度似乎有很高的价值^⑨。希尔(Thiel)灵活地通过尼禄统治下的货币的贬值来解释这种罗马钱币流行的突然中断^⑩。银币减低了成色,而金子的重量减少了。

现在我们拥有许多阎膏珍以及他之后的那些国王的金币。金本位模仿自奥古斯都制定的罗马奥里斯。肯尼迪以前怀疑印度钱币的标准是否真的是奥古斯都的^⑪。不过他的论据根本没有说服力,非常不可靠,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批驳。显然在阎膏珍统治时铸造金币的动机一定要追溯为公元前 27 年到公元 68 年间罗马钱币的大量涌入。丘就却的带有这个国王头部画像的一枚铜币^⑫证明了在这个国王统治时已经有一股罗马金币之流开始涌入。根据怀特海德的描述,这种钱币是“……一种早期罗马帝国的明显的仿制品”^⑬,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奥古斯都的。在丘就却统治下贵霜王国尚未向南扩充得这么远,因此还没有对金币的需求。阎膏珍则在南方和东南方极大地扩展了这个王国,这样就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海岸边富饶的港口与罗马帝国进行的贸易而接触了罗马金币。因此也许对贸易的考虑促使他铸造了罗马金本位的钱币:如果如科诺认为的阎膏珍在公元 78 年才开始统治,或是如哥什曼认

为的是公元 95 年左右,那么就不太容易将上述的事实彼此达成一致^⑧,因为那将无法解释为什么阎膏珍仿造了奥古斯都和他的直接继承人的罗马奥里斯(aureus)标准,而同时却又被尼禄所贬值。如果那样阎膏珍的标准将不再适合西方商人的标准,这是极不切实际的。

对错综复杂的斯基泰的事务有着非常深远见解的哈楼恩(Haloun)提出将特罗古斯·庞培(Trogus Pompeius)的卷 XLII 的序言中的“阿色尼(Asiani)”解读为“库萨尼(Cusani)”^⑨,如果这种假设是对的——哈楼恩在这些问题中的高度的权威给予了他的假设以极大的可能——那么我们对丘就却的早期年代就将拥有另一件重要的论据。如果用“库萨尼”替代“阿色尼”,我们将发现一件在《特罗古斯》中没人会怀疑的事实的证据,即贵霜是吐火罗的统治王朝。现在就有一定的可能来确定这些库萨尼成为吐火罗国王的时期,如同所看到的,其结果是萨(迦)诺卡伊被消灭了。由于在特罗古斯历史中的章节彼此按年代顺序相随,那么他在第 XLII 章中所讨论的事实就可被确定,即公元前 27 ~ 前 26 年弗拉特四世对提里达特斯的胜利,以及公元前 20 年弗拉特四世向奥古斯都归还战争的勋章和俘虏。因而贵霜对皇权的夺取一定发生在公元前 1 世纪下半期的中期左右。

哥什曼提出将黑刺斯(Heraus)看作丘就却的父亲,虽然这是一个我们并不会“一开始”就否认的令人满意的假设,但也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它^⑩。关于在《特罗古斯》中提到的段落,他提出将皇权的担任与这个著者所传下来的萨(迦)诺卡伊的消灭归于黑刺斯。不过,我们认为显然特罗古斯的第一种解释只是《后汉书》所告知我们的西方的一种描述,即“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对哥什曼的观点,还有其他两点异议。第一,黑刺斯似乎不大可能能够消灭萨(迦)诺卡伊^⑪,因为他的地位还很危险,其他四个翕侯并未承认他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正如哥

什曼提出的,根据他也许是为了解释存在于《特罗古斯》的陈述与中国编年史间的矛盾。第二,把两个几乎相同的资料假设为属于两个不同的人,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中国的编年史明确陈述了谈论中的国王的名字是丘就却,那么这个事件看来就是确定的。同时,看上去就不可避免地防止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根据特罗古斯,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1世纪四分之三时。对于“interitusque Saraucarum”这一章节,我们可以假设有两种解释:1、丘就却成为至高无上的王以后所作的第一件事是灭掉了萨(迦)诺卡伊。如果詹治^⑧假设奥罗休斯(Orosius)的一节(I,2,43)指出萨迦诺卡伊人居住在兴都库什附近的北印度没有错误的话,那么《特罗古斯》的那一节甚至就是对月氏在丘就却的统治下侵入印度的第一次袭击的描述;2、萨迦诺卡伊是五翕侯统治下的五个部落之一;但所有这些对于丘就却的年代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

此外,关于丘就却年代的另一件证据是:如果这些伽德非塞斯王确实生活得比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要晚,那么就极其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允许西郡太守们使用除他们自己所用的那个纪元外的另一个不同的纪元^⑨,在那种情形下这些西郡太守们一定是他们在乌贾因的封臣。这与即使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封臣也应表示出对他的封建领主的服从是相矛盾的。

此外有一个不赞成丘就却在公元1世纪初就已开始其统治的事实的论据,对于这一事件,它们表明是公元前1世纪末的一个年代。科诺基于他的迦腻色迦在120~140年间统治的观点(由于在阎膏珍之后迦腻色迦几乎是其直接继承人,他被迫将丘就却的年代确定得比我们的要晚得多),他将此确定为半个世纪以后,这种论据也在于范晔所说的事实,范晔仅提到了那些公元25~55年间以及此后那段时期的事情,而这些论据与前面所提的时代是不一样的。显然贵霜王国的兴起在权利的分配上带来了极为明显的变化,范晔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现在不同的资料显示出尤其正

是阎膏珍扩张了这个王国,因此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值得记述的。丘就却可能拥有印度西北部,但他的统治只是暂时的,或后来仅仅只是有名无实的。目睹了中国的资料,远到秣菟罗的钱币的发现,以及作为第一个铸造金币的人这样的事实,那么这种巨大的扩张就发生在阎膏珍的统治之下。我们认为范晔在讲述有关这种西部权力的巨大变化时,指出了先前的历史开始于丘就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甚至即使它并非这样,而是阎膏珍实行了巨大扩张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难以批驳的,即使那时范晔在涉及到有关公元 25 ~ 55 年的一段时期时也只是在提醒我们丘就却的经历,因为他在那一时期也统治过部分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并不需要去适应范晔的论述,他仅记述了不同于公元前 25 年前那些事件的事实,对其我们必须非常严格地加以补充。因为范晔在叙述发生在那一时期前后很久的事实,即月氏被匈奴击败,去大夏的长途跋涉,对其的征服等等时,他自己也是直接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正如托马斯指出的^⑩,他叙述了公元 159 ~ 161 年的事实,这样显然他并未保持自己的陈述,因此看上去范晔很自然地向我们讲述了月氏的迁徙与丘就却的兴起。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点是列维^⑪和弗兰克^⑫引用的编年史《魏书》中的一节,它提到了公元前 2 年大月氏的一个王。这清楚地证明了丘就却在那时已经统一了五翕侯。

另一点重要的迹象是在《前汉书》^⑬中讲述的关于罽宾的故事。这个国家的国王阴末赴(Yin - mo - fu)杀害了 70 名中国使团的随从人员,但中国皇帝没有惩罚凶犯,这看起来极不寻常。后来在公元前 25 年左右,罽宾派使团去请求宽恕,可能是被来自另一边的危险所驱使,但中国并未予以救援。列维得出了明显的结论,正是月氏威胁到了罽宾,而他们的势力促使中国拒绝予以援助^⑭。我们更愿对此予以补充,也许是印度 - 帕提亚使得中国人没有惩罚罽宾的国王。正如哥什曼指出的,也许在这一时期的其中一段

时间,赫尔玛尤斯还是一个印度-帕提亚的封臣^⑧,然而后来被丘就却严酷压迫的赫尔玛尤斯在公元前 25 年左右开始寻求与中国人间的一种平衡力量。

紧接这些观点的还有两件哈里·查兰·戈什注意到的奇怪的事^⑨,即尽管班固给予了罽宾很长的描述,将其称为“一个伟大的王国”,而范曄对这个国家却一个字也未谈过。从此可以得出的惟一结论是在公元 25 年罽宾已经被合并入月氏王国。其他有趣的问题是班固与范曄都提到了大月氏王国的一个首都。因此丘就却无疑在公元 25 年前已经征服了其他四个翕侯。

也许我们还可以解释得更为精确,是哪种理由促使丘就却夺取了其他四个翕侯的权力。《加斯蒂纳斯》记述了公元前 27 年在帕提亚的下列有关事件:“这次胜利使傲慢的弗拉哈特斯(Phra-hates)投降了,并惩罚了凶残的执政官。这样很快就逼近了斯基泰,最后一次斯基泰的国家得以恢复”^⑩。

丘就却趁斯基泰军队及其统帅不在之机为自己谋取权力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后汉书》的消息中:“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⑪对安息即帕提亚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冈多法内斯和他的继任者们的帕提亚王国,而非阿尔萨西德斯(Arsacides)的帕提亚,而且,我们听说了高附,即喀布尔的征服。钱币再次确认了中国资料的准确,因为在赫尔玛尤斯钱币的反面,最后的喀布尔的希腊化的王展现的是丘就却的头像,这证明了后记述的这个王接管了权力。对濮达所处的位置还存有一场争论。马考特,弗兰克^⑫和科诺^⑬认为是阿拉克西亚(Arachosia);而沙畹并不同意他们。对罽宾的鉴定也是争论很多的一个目标。列维认为它是迦毕试(Kapisa)^⑭。沙畹认为在这些时代罽宾被中国人用来指迦湿弥罗^⑮。史密斯提出是犍陀罗与迦湿弥罗的联合^⑯。伯希和驳斥了将罽宾辨为迦毕试的观点^⑰。

最后,塔恩提出将罽宾看作是喀布尔的古称 Kophen 的音译^⑧。后一种假设与《前汉书》^⑨在对公元前 2 世纪末萨迦人流浪的描述中对罽宾的使用是有关的,这种假设似乎是最可被接受的,但如果称是丘就却占领了高附即喀布尔,并吞并了罽宾,那么这在刚引用的《后汉书》的那节中也就重复了。也许在这篇原文中罽宾在斯基泰人占有的兴都库什南部地区,其名字已经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含义。可能正是这次对罽宾的攻击促使它的国王在公元前 32 ~ 前 7 年向中国求援^⑩。如果我们接受塔恩将这个王的名字阴末赴辨为赫尔玛尤斯,那么中国的记载甚至对我们的丘就却的年代是一种论据。不过我们并不接受塔恩基于这篇记载基础上的观点^⑪。在罽宾被丘就却吞并期间或吞并后,对咀叉始罗的征服更可能发生,这在 136 年咀叉始罗银册名册上的铭文中也表现了出来。

丘就却死后,其子继其位,他在《后汉书》中被称为阎膏珍:“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⑫征服天竺的信息表明贵霜政府直到那时还只是名义上的,也许正如同在咀叉始罗的情形。根据中国对这个国家及其风俗的描写来判断,天竺并非印度西北部,而是印度一个更为温暖的部分,即信都(Sindhu),印度河流域。中国的资料认为阎膏珍统治下对领土的扩张是完全可靠的,这在一个确定为 187 年即公元 58 年,发现于小西藏的卡拉特斯的这个国王的铭文中也显示了出来。

托马斯最近证明了《汉书》记录记述的也是对印度中部的征服^⑬。也许在索达萨之后斯基泰失去的秣菟罗更有可能被包括进去。我们认为托马斯的观点被大量的发现于秣菟罗的阎膏珍的钱币以及发现在那儿的 199 年的铭文所证实,其中提到了一个可能是与阎膏珍或他的一个继任者一起记述的大王·王中之王。

我们认为像拉普森认为的存在有一个第三贵霜国王库朱拉·伽拉·伽德菲塞斯(Kujula Kara Kadphises)^⑭是极不可能的。我们愿

意加入到科诺对此提出的反对的论据中去^⑧。正如加德纳认为的^⑨迦德非塞斯一世看上去最可能是另一个人迦德非塞斯(Kadaphes)。

我们对每一个伽德非塞斯国王的统治都所知甚少。科诺提出西尔迦普被丘就却毁于公元 65 年,他将旁遮塔尔铭文归到了这一年^⑩。不过由于在西尔迦普发现了大量丘就却的钱币,因此我们认为逃避在他统治期间这个城市仍被人居住这样的结论是不可能的。约翰·马歇尔爵士的坦义始罗是被贵霜洗劫的观点是基于吉霍尼迦(Jihonika)的鸭嘴花瓶的,他认为它的年代是公元 1 世纪中期^⑪。根据他来说,在西尔迦普发现的钱币“直到”阎膏珍,却并没有发现索特·美格斯,迦腻色迦,胡维色迦或韦苏提婆的钱币^⑫。这种解释清楚地显示出在丘就却统治期间西尔迦普仍被人居住,正如科诺认为的,它并非是由丘就却所破坏,最早也是在丘就却之后才遭到破坏。

马歇尔长期以来并不敢确定阎膏珍的钱币是否是发现于西尔迦普的。1915 年他仍相信西尔迦普的阎膏珍的钱币是偶遇的^⑬。后来科诺对此表示怀疑,提出在西尔迦普发现的带有“大王王中之王贵霜翕侯”铭刻的阎膏珍钱币,由于称号是“翕侯(Yavuga)”而应归于他的父亲^⑭。相反,拉普森确信这些钱币的确属于阎膏珍^⑮。

那时,巴赫霍夫(Bachhofer)确实论证了记述有某个索特·美格斯的钱币铸造于阎膏珍统治期间^⑯。他的阎膏珍与索特·美格斯是一个人的结论对我们是没有说服力的。一方面不能够提出一个有根据的论据来反对科诺的观点^⑰,即在《后汉书》^⑱中提到索特·美格斯是阎膏珍在印度的总督。而另一方面也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它,所以最好让这个问题待定。由于索特·美格斯的钱币明显不是发现于西尔迦普,那么西尔迦普被遗弃就很可能是在丘就却之后,阎膏珍之前。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假设正是阎膏珍在他征服领土——其中的一部分以前可能是其父亲所占有的——期间毁了这

座城市。西尔苏克(Sirsukh)城也许建于阎膏珍统治期间,因为尽管许多丘就却的钱币也发现于西尔苏克,那并非是他建立了这座城市的证明,因为总的来说,早期国王的钱币在很久以后还在保持流通。一枚钱币的存在从来就不能证明发现的地方会像钱币自身那么老或晚。如果晚期的钱币或是作为献礼,或是作为埋藏的财宝被置于地层中,那么幸好地层会稍晚一些,也只能更老一些。在一个发现了一连串钱币的地方,某种钱币的缺乏表明在那种特殊的钱币开始使用时这个地方被遗弃了。

我们认为阎膏珍毁灭了西尔迦普的事实被约翰·马歇尔爵士在西尔迦普发现的窖藏的包括冈多法内斯,普库拉与丘就却在内的钱币所证实。在阎膏珍的攻击下,人们藏起了他们的钱币,包括那时最后三个伟大国王的钱币。拉普森^⑧相信除了刚提到的窖外,丘就却的钱币属于阎膏珍,正如马歇尔自己首先认为的,但一窖包括三个继任统治者的钱币更可能是冈多法内斯,普库拉与阎膏珍的一组钱币,因为如果那样,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丘就却的那些钱币一起消失了。因此同时这个窖可作为上述的科诺关于那些丘就却或阎膏珍钱币观点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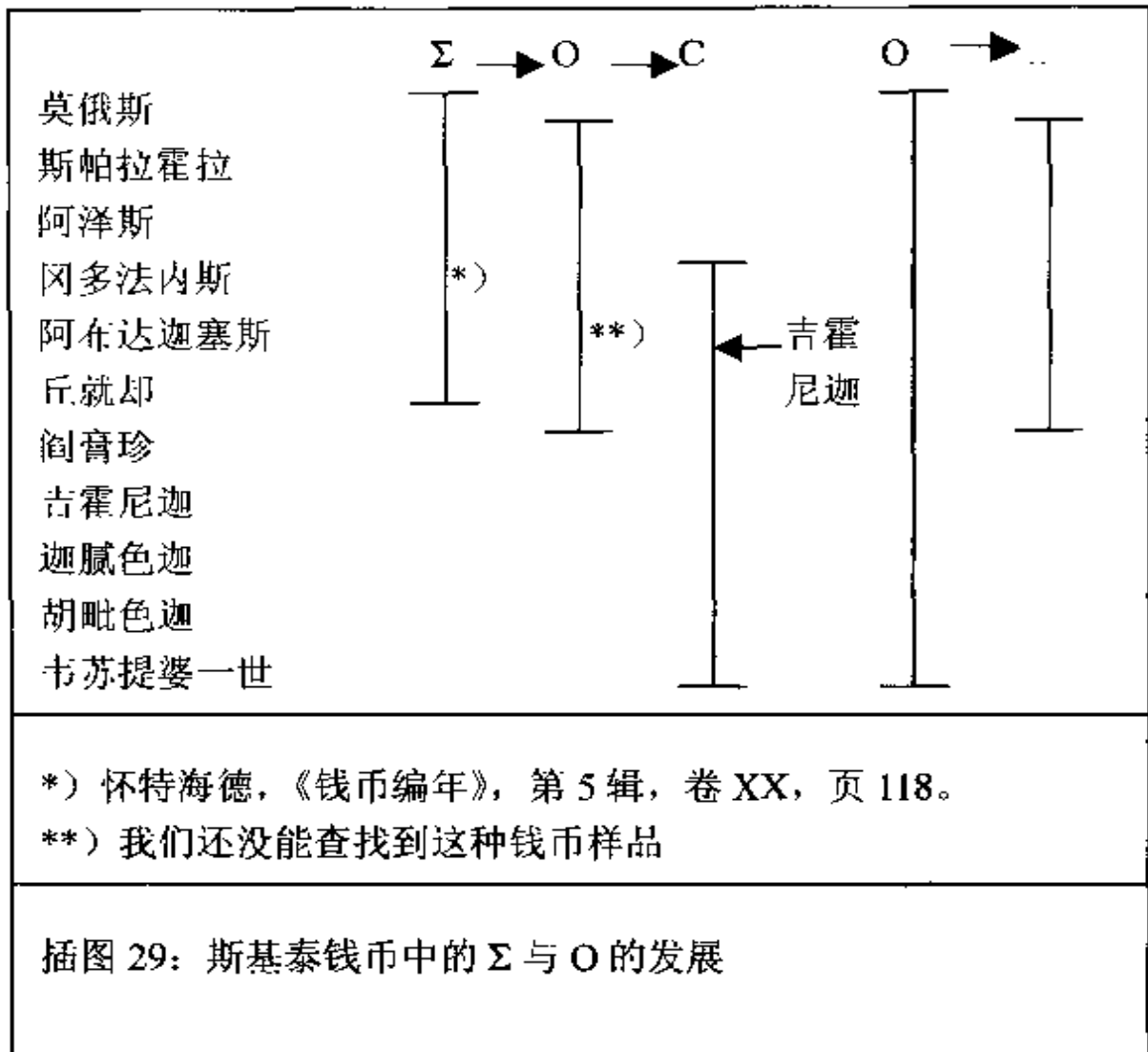
从这些钱币进行判断,西尔迦普在后来又被居住,但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已经转到了西尔苏克。由于它靠近通往印度的通道,无疑这个城市也经历了骚乱时期。不久后迦膩色迦伟大的征服扫荡了西尔苏克,但我们不清楚那时这个城市毁灭与否。也许这次远征是吉霍尼迦瓶子被埋藏的原因。一种异议是这个瓶子发现于西尔迦普,而西尔迦普已经被阎膏珍破坏。对此进行反驳,我们首先将指出还根本不能确定西尔迦普是否被完全遗弃,其次,吉霍尼迦瓶子上铭文的所有格无疑指出这个瓶子是吉霍尼迦给一些圣堂的献礼。很多与吉霍尼迦铭文极为相似的铭文在石头,井边,圣物箱,以及在祭祀物如筛,勺,盘子,罐子,灯等等之上被发现。这些铭文经常提到达玛(dama)或达纳姆迦(danamukha)这个词,根据

它,它们明显是献礼铭文,但这些词经常被省略掉^⑧。因此从铭文中显示出这个瓶子是吉霍尼迦奉献的,而且,通过术语进行判断,这个统治者不是吉霍尼迦,正如哥什曼所认为的^⑨,而是一个大王,王中之王。结论是,我们更愿指出铭文中的所有格并未表明吉霍尼迦在 191 年统治,就如科诺认为的,而是他是这个瓶子的捐赠人。

现在极有可能吉霍尼迦捐赠银瓶的圣殿或庙宇在西尔迦普被遗弃之后并未转移到西尔苏克,而是保留在了西尔迦普原来的范围,或者即使它被毁坏了,但又重建在了那儿。这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圣地的地理位置范围极为固定,很少迁移,除非人们的疏散具有大量移民的特征;甚至一个继任的国家接管其前任的祭祀中心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例如我们想起了特尔斐,亚当峰和建在印度河流域庙宇废墟上的许多清真寺的读物。但还有更多的可以提到的例子,所有都是圣地持久特征的一种证据。因此我们认为可能吉霍尼迦瓶与其他献礼一起被埋藏在了迦膩色迦军队的路途中,又被重新发现。

虽然科诺在 1929 年仍假定吉霍尼迦与阎膏珍是同时代的,但他在 1932 年改变了他的观点,关于银瓶他称:“吉霍尼迦统治期间带有萨迦^⑩ 191 年铭文的银瓶发现于西尔迦普,因此它属于前贵霜时代。”^⑪因此科诺将吉霍尼迦确定为秣菟罗的太守时期的太守,根据他,例如索达萨就生活在公元前 14 年。而怀特海德则认为吉霍尼迦属于冈多法内斯王朝,因此他是一个帕提亚人^⑫。正如我们看到的,西尔迦普并未被丘就却毁坏,因此吉霍尼迦一定不属于前贵霜时期。此外,在贵霜时期一个太守并非是不寻常的。如我们在迦膩色迦统治 3 年时萨尔纳塔(Sarnāth)的一份铭文中发现了太守卡拉帕拉纳(Kharapallāna)和瓦纳斯帕拉(Vanaspara)。最后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我们追溯了彼此继承的十一个国王的钱币中“Σ”与“O”的变化。结果在插图 29 中可以发现。根据科诺和怀特

海德,我们指出吉霍尼迦应按顺序插入其中。



不过由于吉霍尼迦的钱币只展现了圆形的“ Σ ”与“ O ”,似乎不可能把吉霍尼迦插入到阎膏珍之前,我们被迫将他确定得更晚一些。我们认为将吉霍尼迦当作贵霜时代的一个太守是没有异议的。在我们看来,在以前所有流传的当中,显然 191 年的铭文并未使用它自己的纪元,而是属于完全保留的一类,因此必须认定是属于旧纪元,这样 191 年就相当于公元 62 年;马尼古拉(Manigula)的儿子,大王,王中之王的兄弟吉霍尼迦可能是阎膏珍的侄子和假定的继承人。他叔叔的称号“大王,王中之王”使人深深想起在旧纪

元 122 和 136 年铭文以及在《费里希塔》的历史序言中有关贵霜国王一节中的一个传统的贵霜称号,其中可能提到吉霍尼迦作为侄子继承了他的叔叔摩诃罗阇王(阎膏珍)^⑧。而且通过第二部分进行判断,马尼古拉的名字可能是一个斯基泰名字,我们在诸如阿布霍拉(Abuhola),罗朱拉(Rajula),库朱拉(Kujūla)和米喜罗古拉(Mihiragula)中也发现了。吉霍尼迦的年代直接或几乎直接在阎膏珍之后,为此而辩护的最后的证据是他与丘就却两个人用同样的铸模铸造了钱币^⑨。

除了钱币与铭文外,还有一件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的阎膏珍的实物,即刻在石头上的他的身份,发现于麦特(Mat)的天祠(devakula)。塑像上的铭文将他的名字记述为“大王、王中之王、天子、贵霜萨喜、维玛塔克萨玛”。沃格尔解读为“瓦玛塔克萨玛(Vamataksama)”^⑩,认为从此他能推测出存在有一个贵霜王瓦玛塔克萨玛,迄今这已被好几个学者所接受^⑪。我们认为加雅斯瓦尔提出的支持将塑像辨认为 vema = vima = wima 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⑫。不过,他解释这篇铭文记述的是迦腻色迦纪元 6 年的事情,这并未被我们证实。也许在阎膏珍的统治与迦腻色迦即位间有一段短的间隔,可能是在吉霍尼迦统治期间,因为虽然仍只是一个“大太守(mahāksadrāpa)”,他已经作为“大王之侄子(maharajabhhrataputra)”独立铸造了钱币。另一种可能是《前汉书》记载的吉霍尼迦是印度的统治者。在麦特的天祠也发现了迦腻色迦的一个塑像的事实表明在这两个国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存在有好几种可能,一种是阎膏珍领土的印度部分瓦解了,而迦腻色迦恢复了这个斯基泰王国。另一种可能是迦腻色迦进攻了阎膏珍的继任者,宣称他对王位有更多的权力。如果是这样,斯基泰的侵入又一次横扫了印度北部,标志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它至少持续了一百年。

为确定迦腻色迦纪元的开始,科诺使用了两条发现于其王朝铭文中的天文学资料。11 年的泽达(Zeda)铭文将未来的翼宿

(nakṣatra Uttaraphālgunī)与阿娑荼(Āsādha, 仲夏)中的第二十天联系了起来,而61年的乌恩德(Und)记录则将未来的箕宿(nakṣatra Pūrvāsādha)与制怛罗(Caitra, 仲春)中的第八天联系了起来。根据Sūryasiddhānta, 威克为科诺计算了争斗时(Kaliyuga)的哪一年会更符合这些条件。这样就产生了好几种可能,即公元79年,117年和134年。根据Aryasiddhānta来计算,他发现公元117年似乎是惟一合适的一个^⑧。科诺从所有这些可能中选择一个对他似乎是最为合适的,即公元134年,因为他确信迦膩色迦不可能在公元125年前就开始统治^⑨。

最后的这个假设根本就不确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尽管范晔提到了在写作后汉王朝历史涉及到西方边疆时,主要依据白班勇的记录,(这意味着范晔仅记述了公元125年为止的事情,因为班勇只提供了到公元125年左右的消息),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确实还记述了发生在那一时期后的事情^⑩,因此迦膩色迦不可能最晚在公元125年才即位。相反,因为迦膩色迦可能继承了阎膏珍(也许仅仅只是在可能是吉霍尼迦统治的短暂间歇之后),他绝不能在丘就却就职之后100多年才即位,因此可能是在公元1世纪末左右。此外,在制定铭文的年表时,我们注意到在以旧纪元纪年的铭文群中有100年左右的间隔,开始于200年后,即公元71年,它刚好可以被覆盖了一个世纪的迦膩色迦王朝的铭文群所填充;所有这些都表明迦膩色迦的统治开始于公元71年后不久。

如果泽达和乌恩德铭文中所提供的资料被用作开端的话,那么我们更应注意到其中明显的相像,威克发现79年是迦膩色迦时代纪元开始的三种可能之一。如果这些年代如同在许多的编年体系,尤其是印度北部的编年体系中被认为消逝了,那么这意味着这一年被威克^⑪作为了迦膩色迦纪元的开端,正好是塞种纪元的1年^⑫。

哈里·加兰·戈什指出,由于婆什色迦在山奇的一件迦膩色迦

纪元 28 年的铭文中被提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对迦腻色迦的权势而言,它不可能是一个像公元 125 年那么晚或是比这更晚的年代,而众所周知,鲁陀罗达曼(Rudradāman)在公元 150 年左右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这与婆什色迦同时在那儿统治的观点是冲突的;因此迦腻色迦即位于公元 125 年前^④。

我们已经指出,使用塞种纪元而且是迦腻色迦及其继任者们封臣的西郡太守,使用了一种他们的封建领主并不使用的另一种纪元,这是极不能接受的。就像我们看到的,科诺试图通过称他们是阎膏珍的封臣来对此予以解释,但这并不能维持下去,近来又被托马斯^⑤批驳。此外,阎膏珍自己甚至都好像没有使用这种塞种纪元(科诺则认为这是他制定的),而是使用了旧的纪元。

不断提出的支持迦腻色迦不是塞种纪元建立者观点的证据之一是,在公元 90 年这个无名的国王从印度向北方派去一支在将军谢(Sie)统率下的远征军去防御中国人,但他被迫撤退^⑥,而这个国王不可能是著名的迦腻色迦^⑦。至于其他的,弗兰克错误地将迦腻色迦确定在伽德菲塞斯国王们之前^⑧,但他正确地指出,如果这个无名的王是丘就却或阎膏珍,那么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记载了这个事件的班超将军忽略了记述这个王的名字,因为他极为了解丘就却和阎膏珍的名字,正如在他的叙述中的其他部分中所出现的^⑨。此外,这个派其总督与中国作战的无名的印度月氏王不可能是阎膏珍,因为后者并不居住在印度,相反在印度任命了一个将军作为总督,而且我们并未明白即使迦腻色迦出于对佛教的热爱而被赞美,为什么就不可能不能承受一次政治挫折呢。此外中国的胜利并不是非常显赫,因为 107 年中国朝廷从西域撤回了它的将领,一直到公元 119 年^⑩。

另一件被提出的反对迦腻色迦是塞种纪元建立者的论据是这种纪元并不是一种北方的纪元^⑪。这是错误的。塞种纪元仅被笈多纪元短暂替代过,在那个王朝覆没后塞种纪元很快又被使用。

塞种纪元在印度北部是第一次获得青睐的假设是错误的。

还可以提出其他的论据。列维从中国的原始资料《付法藏因缘经》(Fu fa ts'ang yin yüan ch'uan)中叙述了一段记载,其中提到了在迦腻色迦被杀期间一支远征军到了北方^⑩。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也讲述了同样的传说^⑪。这个战役更可能与班超记载的是同一次,我们认为它显示出即使在佛教的传统中将迦腻色迦赞美到了如此的程度,他的失败也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如果不是迦腻色迦被击败,那么我们就将与科诺假设先是阎膏珍(或与哥什曼假设是丘就却)被击败了,以后迦腻色迦也被击败,而这与月氏权力的膨胀是不一致的。

我们并不愿将列维提出的在《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中迦腻色迦被记述为珊达尼斯(Sandanes)^⑫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论据,因为《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中的年代还不确定,一些学者认为必须将它确定在公元80年前。不过,这并不包含有我们否认列维的在中国原文中“甄陀”是迦腻色迦的一个称号,相当于“旃檀(Candana)”。另一方面由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印度的材料,我们并不敢去确定《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的年代,就如哥什曼所做的一样^⑬。

哈里·加兰·戈什注意到了一些由马伯乐翻译的12部中国原文的内容^⑭,从中我们得知明帝是如何在梦中看到一尊佛,此后为获得佛道法,他派使臣出使了印度。比较不同的原文,它们属于月氏在印度的领土似乎并没有多少疑虑。中国的使团一定是在公元61~75年之间。戈什对此称:“那时的大月氏王肯定不是迦腻色迦。有训导意义的佛教教义是从不会错过把伟大国王尊贵的名字与佛教在中国的正式传入联系起来的机会的。”^⑮

此外我们认为在同样的原文中,天竺,即印度,显然在公元61~75年间,已经被月氏所占领,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这是阎膏珍之所为。因此这个君主一定统治于那一时期或之前。

我们认为中国原文与传统给我们提供的进一步的证据是可信

的,迦膩色迦的热情极大地发展了佛教。这样将迦膩色迦确定为公元 2 世纪中期某时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向佛教信仰的转化和对佛教的保护就是在公元 2 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或甚至更晚。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从中国的正文中得知佛教在公元 1 世纪末在中亚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我们认为补充第一章论据的这长长的一系列论据一定足以接受迦膩色迦是建立萨迦纪元的事实。因此《Kālakācāryakathānaka》就非常可信,它讲:

“to sūri - pajjuvāsyā -

Sāhiṃ rāyāhirayam aha kāuṃ

Bhūṃjanti rajja - sukkham

Sāmaṃta - paṭṭhiya sesaṃ.

Sagakūlāo jenaṃ

Samāgayā, tena te Saga jayā;

Evam Saga - rāṇam

Eso vaṃso samuppanno.

.....

kāl'antaṃkena

uppāditā Saganā taṃ vaṃsam

jao Mālava - rāyā

nāmenaṃ Vikkamāicco.

.....

tassa vi vaṃsam uppa

diṭṭha jāo puṇo vi Sagarāyā

Ujjeni - pura - varie

paya - paṃkaya - paṇaya - sāmanto

panatise vāsa - sae

Vikkama - samvaccharassa volāne
 Parivattīma t'havio
 Jenam samvaccharo niyao.
 Saga - kala - jānaṇ' - atthaṇ
 eyaṇ pāsamgiyaṇ samakkhāyaṇ
 mūla - kahā - sambaddhaṇ
 pagayaṇ ciya bhannaē iṇhiṇ.”²⁸
 雅克比的译文是：

“此后，他们指示萨喜们要效忠于最高王，尊重他们的权力，不能反叛自己的封建领主。因为他们来自萨迦库拉，所以称他们为萨迦人。这样他们的王朝就是萨迦王之王朝。……中期以后，超日王从玛拉瓦而来，萨迦王朝。……王朝被推翻，新萨迦（即迦腻色迦或他在乌吉衍那的臣属）处于庄严的乌吉衍那王的统治下。

超日纪元 135 年过去了，进入了他自己的纪元。

对塞种纪元的了解来自于这个故事的一个事件。现在所说的事情已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²⁹

因此迦腻色迦从公元 78 年至少一直统治到了公元 101 年；看来他的儿子婆什色迦在 102 年继承了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 106 年。而我们还拥有塞种纪元 33 ~ 60 年，即公元 111 ~ 138 年的铭文，以及塞种纪元 74 ~ 98 年，即公元 152 ~ 176 年的韦苏提婆的铭文。

在本书第六章中我们看到甚至在韦苏提婆之后，贵霜人还在末睇提舍 (Madhyadesa, 即中印度) 统治，坚持使用他们的祖先迦腻色迦所制定的纪元，此后也同样是如此，在我们不再听说贵霜统治者在印度的那一部分时，塞种纪元仍保持使用，直到它被笈多纪元暂时替代，而在那个王朝衰败后它又开始使用。塞种纪元进一步在印度南部经由西郡太守自我确立；从那以后成功地传播遍了整个东南亚，在那里以“塞种纪元”或是“萨迦大王制定的纪元”的名

义保持使用了许多世纪。到那时,迦膩色迦的名字已经被长期遗忘;即使在印度本土它也只是在好几个世纪后通过铭文与钱币的发掘而被重新记起,但对努力从各种证据中将历史拼合在一起的我们来说,所谓的萨迦大王的纪元就是同它“一样卓越”的萨迦君王的纪元,他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伟大繁荣的斯基泰王国;与丘就却和阎膏珍相比,他第一个通过采取在印度永久性定居开始了同化和吸收的过程;通过他的保护,他推进了文化的所有分枝:宗教,艺术,文学等等;即使他没有在反对中国人的那次远征中取得胜利,但他仍然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王中之王迦膩色迦。

注 释:

① 《印度铭文汇编》,第 36 页。

② W. E. 范·威克,《印度佉卢文铭文的纪元》,《东方资料实录》,卷三,莱登,1925 年,第 52 - 91 页,尤其是第 76 页。

③ 见本书第一章。

④ 斯特拉波,11.9.2. 或 C.515。

⑤ Justinus, XIII. 2. 3. 6。

⑥ 《印度铭文汇编》,第页 31。

⑦ E. J.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570 页。

⑧ K. 德·B. 考德林顿,《中亚史的一篇地理序言》,《地理辑刊》,卷 CIV,伦敦,1944 年,第 27 - 40 页及第 73 - 91 页,尤其是第 36 页。

⑨ 塔恩,第 320 页。

⑩ 塔恩,第 321 页。

⑪ 德贝瓦斯(Debevoise)与班纳吉-萨斯特里(Banerji - Sastri)也认为两条路线都被利用过,德贝瓦斯,《帕提亚政治史》,芝加哥,1938,第 58 - 59 页。班纳吉-萨斯特里,《一、二世纪的萨迦与贵霜》,《印度历史季刊》,卷 13,1937 年,第 199 - 217 页,尤其是第 209 页。也见于 A·赫尔曼(Herrmann),《古典考古学百科全书》,第 2 辑,1,第 1770 - 1806 页,尤其是第 1802 页。

⑫ 考德林顿,《中亚史的一篇地理序言》,《地理辑刊》,卷 CIV,伦敦,1944,第 27 - 40 页和第 73 - 91 页,尤其是第 37 页,在那儿他说:“因此正是《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的作者把印度河口著名的巴布依空港的国家称为斯基泰……”。

⑬ 托勒密,《地理》,VII,1,卷55—卷62,雷诺编,《托勒密的地理,印度(VII,1-4)》,原文经露易斯·雷诺确定,巴黎,1925年,第25-28页。

⑭ 《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卷38,哈亚马尔·弗里斯克编,Göteborgs Högskolas Arsskrift,卷33,哥德堡,1927年,第12页。

⑮ F.W. 托马斯,《萨迦斯坦,那儿住着大流士和希罗多德命名的塞人吗?》,《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6年,第181-200页;《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6年,第460-464页的补充部分。

⑯ 《前汉书》,第96章A,A. 沃耶利,《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刊》,卷10,伦敦,1881,第34页。

⑰ E. 沙畹,《魏书中的西方国家》,第二辑,卷6,第529页,第四行。

⑱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63-564页;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报告》,卷4,柏林,1932年,第20页;塔恩,第277-278页。第372页中有更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

⑲ 考德林顿,《中亚史的一篇地理序言》,《地理学辑刊》,卷CIV,第35页。

⑳ 见本书第一章。

㉑ 《印度铭文汇编》,第33页。

㉒ 托马斯,《秣菟罗狮柱上的铭文》,《印度铭文》,卷9,1907-1908年,第135-144页,尤其是第140页。

㉓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83页。

㉔ 我们愿作出的另一种评论是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的名字中出现了好几次。

㉕ 《印度铭文汇编》,第33页及第36页。

㉖ H. 雅克比, Das Kālakācārya - Kathānakam, 《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34,莱比锡,1880年,第247-318页,尤其是第262-267页;布豪·达吉(Bhāu Dāji),《斯基泰对印度的攻击,及 Kālakācārya 的故事》,《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会刊》,卷9,1867-1870年,孟买,1872年,第139-146页。

㉗ K.P. 加雅斯瓦尔, Problem of Saga - Satavahana History, 《比哈尔与奥里萨研究学会会刊》,卷16,1930年,尤其是第233-242页。

㉘ 《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页38;托勒密, VII, 1, 第55页。

㉙ G. 比累尔,《是普什帕米特拉还是普什亚米特拉》Pushpamitra or Pushyamitra?, 《印度文物工作者》,卷2,1873年,第362-363页;H. 雅克比, The Kalpasūtra of Bhadrabahu,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普拉克里特语-梵语词汇集注》,莱比锡,1879年,《东方学论文集》,卷7,莱比锡,1881年,序言7页;雅克比, Das Kālakācārya - Kathānakam, 《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34,莱比锡,1880年,253页;J. 查潘提尔(J. Charpentier), 《大雄的年代》,

《印度文物工作者》，卷 43，1914 年，第 118 - 133 页和第 167 - 178 页，尤其是第 120 页；S. 科诺，《卡罗毗拉铭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东方资料实录》，卷 1，1923 年，第 12 - 42 页，尤其是第 33 页。

⑳ 《印度铭文汇编》，第 28 页。

㉑ 加雅斯瓦尔，*Problem of Saga - Satavahana History*，《比哈尔与奥里萨研究学会会刊》，卷 16，1930 年，尤其是第 233 - 255 页。

㉒ 同上，第 295 - 300 页。

㉓ R. D. 班纳吉，《那哈帕纳与塞种纪元》，《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7 年，第 273 - 289 页。

㉔ 如见《印度铭文汇编》中第 31 页的文献。

㉕ 见家系，《印度铭文汇编》，第 47 页。不过托马斯在他对《印度铭文汇编》的评论中提出，考虑到刻有“……拉奥斯塔之子”钱币的存在，阿尔塔是伽拉奥斯塔的儿子，并不是相反，正如科诺所认为的。我们认为这种铭刻本身就是充足的证据，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钱币是阿尔塔还是伽拉奥斯塔的另一个儿子铸造的。总的来说，托马斯的主张还是比科诺的更可能正确。见托马斯，《评〈印度铭文汇编〉》，卷 2，*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 jrg. 193, 1931 年，第 1 - 15 页，尤其是第 11 - 12 页。

㉖ 《印度铭文汇编》，第 36 页。

㉗ 狮子竖头是否也比咀叉始罗铜盘铭文古老看上去很难决定，除非有人像科诺和哥什曼做的那样假设出一个单独的纪元，科诺，《印度铭文中的纪元注解》，《印度文物》，莱登，1947 年，第 193 - 197 页，尤其是第 196 页；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考古探查与历史》，第 105 - 106 页。

㉘ 也见塔恩，第 325 页，尽管出于其他原因他也接受了罗阇乌拉 (*Ra(ā)j(ūv)ula*) 的年代，就像 J. 艾兰在《大英博物馆印度钱币目录：古代印度钱币》中那样，伦敦，1936 年，CXI - CXVI 页，第 183 - 184。

㉙ F. 赫斯，《张骞——西亚的中国先驱者的故事》，《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37，1917 年，第 89 - 152 页，尤其是第 112 页。

㉚ 托马斯，《评〈印度铭文汇编〉》，*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 jrg. 193, 1931 年，第 1 - 15 页。

㉛ 路德斯表，第 14。

㉜ E. J. 拉普森，《印度钱币与印章注解》，第五部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3 年，第 285 - 312 页，尤其是第 288 - 289 页。

㉝ 《印度铭文》拓本，卷 1，第 33。

㉞ 见本章第 300 - 301 页。

⑮ 塔恩,第 497 页以后。

⑯ 拉普森,《印度钱币》,斯特拉斯堡,1898 年,卷 29,第 7 页。

⑰ 文森特·史密斯,《公元前 120 年左右到公元 100 年左右的印度 - 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60,1906 年,第 53 - 57 页。

⑱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67 页以后。詹治(Junge)认为毛乌斯在公元前 160 年就已开始统治;J. 詹治,《塞种研究,古典时期遥远的东北地区的世界观》,附录 41,续编附录 28,莱比锡,1939 年,第 99 页。

⑲ A·卡宁汉姆,《来自咀叉始罗的巴克特拉 - 巴厘(Bactra - Pali)铭文评论》,《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卷 32,1863 年,第 139 - 151 页,尤其是第 141 页;《来自秣菟罗的耆那铭文》,《学会》,4 月 25 日,1891 年,第 397 - 398 页;拉普森,《印度钱币》,斯特拉斯堡,1898 年,卷 29,《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70 页;班达卡尔(D. R. Bhandarkar),《一件贵霜石刻铭文与塞种纪元起源的问题》,《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会刊》,卷 20,孟买,1902 年,第 269 - 302 页,尤其是第 283 页;史密斯,《印度历史中的贵霜或印度 - 斯基泰时代,公元前 165 - 公元 320 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3 年,第 46 页;《早期印度历史,从公元前 600 年到穆罕默德的征服,包括亚历山大的侵略》,牛津,1904 年,第 202 页。第二版,第 215 页,第三版,第 228 页,第四版,第 242 页;《公元前 120 年左右到公元 100 年左右的印度 - 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60,1906 年,第 69 页;H. G. 罗林逊(H. G. Rawlinson),《大夏,一个被遗忘王国的历史》,伦敦,1912 年,第 106 页;塔恩,第 321 页;N. C. 德波瓦斯,《帕提亚政治史》,芝加哥,1938 年,第 60 页。

⑳ A·卡宁汉姆,《印度 - 斯基泰钱币》,《钱币编年》,第三辑,卷 8,1888 年,第 199 - 248 页,尤其是第 240 页以后;P. 加德纳,《大英博物馆印度、大夏的希腊与斯基泰国王的钱币》,伦敦,1886 年,第 33 页;拉普森,《印度钱币》,卷 29,第 7 页;《印度铭文汇编》,第 29 页;塔恩,第 321 页;德波瓦斯,《帕提亚政治史》,第 60 页;考德林顿,《中亚史的一篇地理序言》,《地理学辑刊》,卷 CIV,第 82 页。

㉑ 我们将在后面证明阿泽斯是一个帕提亚人。

㉒ R. B. 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钱币目录》,拉合尔,卷 1,印度 - 希腊钱币,第 92 页。

㉓ 我们所知的惟一与怀特海德持相同观点的学者是班达卡尔在《一件贵霜石刻铭文与塞种纪元起源的问题》,《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会刊》,卷 20,1902 年,第 292 页。

㉔ R. B. 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钱币目录》,拉合尔,卷 1,第 91 页。

㉕ A. 冯·沙勒特,《大夏和印度的大量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柏林,1879 年,第 140 页。

㉖ 见加德纳,《大英博物馆印度、大夏的希腊与斯基泰国王的钱币》,伦敦,图版

⑤ 见拉普森的目录,《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92 页。

⑥ V. 史密斯,《印度 - 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60,1906 年,第 33 页。也见他的《印度早期历史》的四个版本,依次为第 202 页,第 215 页,第 228 页和第 242 页。不久前怀特海德指出阿尔萨西斯·泰奥斯钱币中的好几种要素可以追溯到毛乌斯的钱币,R. B. 怀特海德,《印度 - 希腊注解》,《钱币编年》,第五辑,卷 20,1940 年,第 89 - 122 页。

⑦ 加德纳,《大英博物馆印度、大夏的希腊与斯基泰国王的钱币》,p. XV, 11 和 12。

⑧ V. 史密斯,《印度 - 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60,1906 年,第 53 页。

⑨ 我们认为戈温德·派假设毛迦根本就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他在咀叉始罗铭文中将 *māgasa* 解读为 *mogasa*, 将其解释为闰摩迦月 (*māgha*, 季月, 星月, 印度历中的第十一月——译者); 他所达到的结果是旧的塞种纪元开始于公元前 155 - 前 154 年; 戈温德·派,《塞种, 帕赫拉瓦斯与贵霜编年》,《印度历史杂志》,卷 16, 1935 年, 玛德拉斯, 1936 年, 第 309 - 342 页。

⑩ J. E. 弗里特,《毛迦, 毛乌斯与乌奴你思》,《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7 年,第 1013 - 1040 页,尤其是第 1024 页; 拉普森对《远古时期到公元一世纪的古代印度》评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 年,第 795 - 799 页,尤其是第 797 页;《136 年的咀叉始罗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 年,第 992 - 999 页,尤其是第 994 页。

⑪ 《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卷 38。

⑫ 塔恩,第 313 页以后。

⑬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21 页。

⑭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18 页。

⑮ O. 弗兰克,《中国的资料来源对认识中亚突厥人种和斯基泰的贡献》,1904 年,第 75 页。

⑯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68 页,第 573 - 574 页。

⑰ 德波瓦斯,《帕提亚政治史》,第 61 页。

⑱ 考德林顿,《中亚史的一篇地理序言》,《地理学辑刊》,卷 CIV,第 36 页,第 79 - 81 页,讨论了“萨迦 - 帕提亚的共同侵略”。

⑲ A. 冯·古斯米德 (A. Von. Gutschmid),《从亚历山大大帝到阿尔萨西斯王朝灭亡时的伊朗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图宾根,1888 年,第 85 页以后。

⑳ 《加斯蒂纳斯》,XLII. 5。

㉑ 迪奥·卡休斯 (Dio Cassius), LI. 18. 3; E. 卡利编辑,《迪奥罗马史》,卷 6,伦敦,

1917年,第51页。

⑭《后汉书》,卷118,E.沙畹,《后汉书中的西方国家》,《通报》,第二辑,卷8,1907年,第149-234页,尤其是第187-192页。

⑮ E.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报告》,卷4,柏林,1932,第95页。

⑯ 托马斯, *Catalogue of the coins in the Cabinet of the Late Col. Stacy, with the estimated prices attached*,《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卷27,1858年。

⑰ A.卡宁汉姆,《萨迦的钱币,B类,萨迦人或萨迦-斯基泰人的钱币》,《钱币编年》,第三辑,卷10,1890年,第107页,注4。

⑱ 史密斯,《印度-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60,1906年,第49-72页,尤其是第61页,注2。

⑲ E.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报告》,卷4,第94页以后。

⑳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73-574页,也见冯·威森丹克(O. G. Von Wessendonk), *Kūsān, Chioniten und Hephthaliten*, *Klio*, 卷26,莱比锡,1933年,第336-346页。

㉑ A.卡宁汉姆,《萨迦的钱币,B类,萨迦人或萨迦-斯基泰人的钱币》,《钱币编年》,第三辑,卷10,1890年,第106页。

㉒ R. B.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1,第94页。

㉓ 同上;V.史密斯,《印度-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60,1906年,67-69页;A.冯·古斯米德,《从亚历山大大帝到阿尔萨西斯王朝灭亡时的伊朗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图宾根,1888年,第107页。

㉔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73-574页。

㉕ R. B.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1,第92页。

㉖《印度铭文汇编》,XLIII页。

㉗ 如见 E.斯沃耶泽尔(E. Schwyzer),《希腊语法》,卷1,慕尼黑,1939年,第183页。

㉘ V.史密斯,《印度-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60,1906年,第61页。

㉙ 马歇尔,《迦腻色迦的年代》,《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年,第973-986页,尤其是第979页。

㉚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72页。

㉛ F.朱斯逊,《伊朗语词典》,马尔伯格,1895年,IX页。

㉜ R. B.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1,第132页。

㉝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72页和第577页。

㉞ R. B.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1,第93页。

㉟ 马歇尔,《迦腻色迦的年代》,《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年,第973-986页,尤其是第977页。

⑤ 塔恩,第 338 页。

⑥ 塔恩,第 497 页。

⑦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73 页。

⑧ 《印度铭文汇编》,XLII 页。

⑨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76-577 页。

⑩ 同上,第 562 页。

⑪ 有关这个家族的细节见 R. B. 怀特海德,《阿斯帕瓦尔玛将军王朝》,《钱币编年》,第 6 辑,卷 4,伦敦,1944 年,第 99-104 页。

⑫ 《印度铭文汇编》,第 57-62 页。

⑬ V. 史密斯,《印度-帕提亚王朝》,《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60,1906 年,第 65 页。

⑭ 见本章第 321-322 页。

⑮ E. 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学报告》,卷 4,柏林,1932 年,第 104 页,也见第 105 页。

⑯ 2.26;78. 斐劳斯特拉图斯,《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的生活》,冈比尔(F. C. Conybeare)英译本,卷 1,伦敦,1927 年,第 183 页以后。

⑰ E. 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学报告》,卷 4,柏林,1932 年,101 页,注 1;塔恩,第 341 页。

⑱ 见 W. 帕普(Pape),《希腊专有名词词典》,《希腊语词典手册》卷 3,布劳恩斯威格(Braunschweig),1850 年,第 2 版,第 411 页;F. 朱斯逊,《伊朗语词典》,马尔伯格,1895 年,第 101-103 页和第 105 页。

⑲ A. 斯霍恩(Schoene)编,《欧塞比耶编年》附录 4,柏林,1875 年,卷 1,第 228 页;J. J. 斯加里戈尔(Scaliger),Thesaurus Temporum. 第 1 版,莱登,1606 年,第 67 页;第 2 版,阿姆斯特丹,第 81 页。

⑳ 见冯·古斯米德,《伪〈使徒行传〉中的王名》,《莱茵语言学博物馆》,续编,卷 XIX,法兰克福,1864 年,第 161-183 页与第 380-401 页;也见《小字母》,卷 2,莱比锡,1890 年,第 332-394 页(弗兰茨·鲁尔(Franz Rühl)编);F. 朱斯逊,《伊朗名人录》,《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49,1895 年,第 681-691 页,尤其是第 688 页。

㉑ 雷诺德(J. T. Reinaud),《印度的地理,历史与科学的学术论文》,《国家科学院铭文与文学学术论文》,卷 XVIII,第二部分,巴黎,1849 年,第 95 页。

㉒ A. 卡宁汉姆,《带有希腊铭文的印度佛教徒总督们的钱币》,《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卷 23,1854 年,第 679-714 页。

㉓ S. 列维,《印度-斯基泰注解》,III. 圣·托马斯《冈多法内斯与马兹迪奥》,《亚洲学刊》,1897 年,第 9 辑,卷 IX,第 27-42 页,尤其是第 27 页;H. 科雷尔(H. Kehrer),《文

学与艺术中的三个圣明的国土》，莱比锡，1908 - 1909 年，卷 1，第 69 页。

⑱ 《新约外传的补充抄本》，卷 1，《托马斯使徒行传》，M. 波耐特 (M. Bonnet) 编，莱比锡，1883，第 2 页，第 3 页，第 14 页，第 19 页。

⑲ 加尔伯 (Carbe) 持同样的观点，《印度与基督教》，图宾根，1914 年，第 135 页，第 143 页。关于这一主题见第 128 - 159 页。L. 德·拉·瓦利 - 波森 (L. De La Vallée - Poussin)，《印度的孔雀王朝时期与巴比伦，斯基泰，帕提亚和月氏》，巴黎，1930，第 280 页。也见 P. 皮特 (Peeter) 对达尔曼 (J. Dahlmann) 的评论，《托马斯铭刻》，《波朗迪亚纳选集》，卷 XXXII，布鲁塞尔，1913 年，第 75 - 77 页。这两个耶稣会教士，J. 达尔曼与 A. 瓦斯 (A. V? 由) 努力证明了圣·托马斯的《使徒行传》从历史角度来说是相当可靠的，J. 达尔曼，《从基督时期到早期奥斯腾时期的托马斯铭刻与古代历史的关系》，弗莱堡，1912 年；A. 瓦斯，《印度教徒托马斯，托马斯铭刻的历史价值的研究报告》，亚琛，1925 年。

⑳ J. E. 弗利特，《圣托马斯与冈多法内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5 年，第 223 - 236 页；同一作者的《塔克提 - 依 - 巴喜铭文的年代》，《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6 年，第 706 - 711 页；拉普森，《印度钱币》，卷 62，第 15 页。

㉑ 如见 J.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76 - 577 页。

㉒ 拉普森，《印度钱币与印章注》，第五部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3 年，第 285 - 312 页，尤其是第 285 页。

㉓ W. 沃罗斯，《大英博物馆希腊钱币目录》，《帕提亚钱币目录》，伦敦，1903 年，XXX 页。

㉔ P. 加德纳，《大英博物馆的大夏与印度的希腊和斯基泰诸王的钱币》，第 107 页。

㉕ A. 卡宁汉姆，《萨迦钱币，B 类：萨迦人或萨迦 - 斯基泰人的钱币》，《钱币编年》，第 3 辑，卷 X，1890 年，第 119 页。

㉖ 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学报告》，卷 4，第 79 - 80 页。

㉗ A. 瓦斯，《印度教徒托马斯，托马斯铭刻的历史价值的研究报告》，第 29 页和第 77 页。

㉘ 《印度铭文汇编》，XLVI 页。

㉙ 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 1，第 155 页。

㉚ 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学报告》，卷 4，第 102 - 104 页。

㉛ 同上，第 103 页。

㉜ 尼波迪 - 安德雷森 (Nipperdey - Andersen)，第 2 版，柏林，1855 年，第 75 页。苏尔 (W. Schur) 认为原文是正确的，Die Orientpolitik des Kaiser Nero, Klio, Beiträge zur alten Geschichte, 附录 XV (续编，第二期莱比锡) 1923, p. 73。

⑬ 赫兹菲尔德,《萨迦斯坦》,《伊朗考古学报告》,卷4,第103页。


⑭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78页。

⑮ F. 朱斯逊,《从古典时期到萨珊三朝灭亡时的伊朗史》,《伊朗语言学概论》,W. 盖尔格尔与 E. 库恩发行,卷2,斯特拉斯堡,1896-1904年,第395-550页,尤其是第507页。

⑯ W. OTTO, s. v. Hyndopherres, Pauly - Wissoma, Real - Encyc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Vol. IX, Stuttgart, , 1916, pp. 183 - 191, esp. p. 191.

⑰ W. SCHUR, Die Orientpolitik des Kaiser Nero, Klio, Beitr? ge zur alten Geschichte, Beiheft XV (Neue Folge, Heft II), Leipzig 1923, p. 77.

⑱ 在这种描述之后,我们发现科诺也认为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人。

⑲ 卡宁汉姆将“冈多法内斯”这个名字解释为“冈德-法尔”,即“甘蔗-粉碎器”很值得注意,因为这太古怪了。卡宁汉姆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即榨糖的茎汁槽以如同冈多法内斯专论的相同形式被砍凿,才形成了这和奇怪的观点。见卡宁汉姆,《印度佛教徒总督们的钱币》,《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卷23,1854年,第679-714页,尤其是第712页。

⑳ 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不同的名字对此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威克拉马迪特亚,阿吉塔威克拉马,威克拉曼卡,辛哈威克拉马,辛哈坎德拉,提婆笈多,提婆斯里,提婆拉亚,见 L. 德·拉·瓦利-婆森,《迦腻色迦以来的印度王朝与历史》,巴黎,1935年,第47页。我们注意到了冈达教授的这个目录。另一个例子是新迦萨里(Singasari)的克尔塔那迦拉(Krtanagara)王的祭献名字:兹纳那西瓦巴兹拉,兹纳那巴兹雷斯瓦拉和兹纳内斯瓦拉巴兹拉,见 N. J. 科罗姆,《印度-爪哇的历史》,第二版,丹哈格,1931年,第341页。

㉑ P. 加德纳,《大英博物馆大夏与印度的希腊和斯基泰诸王的钱币》,第29页和第67页。

㉒ 怀特海德,《阿斯帕瓦纳将军王朝》,《钱币编年》,第6辑,卷4,1944年,第99-104页。

㉓ 马歇尔,《坦叉始罗的出土文物》,《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29-1930年,55-97页,尤其是57页。

㉔ 《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哈亚玛尔·弗利斯克(Hjalmar Frisk)编, Göteborgs Högskolas Årsskrift, Vol. XXXIII, 哥德堡,1927年,卷38,第13页。

㉕ 《印度铭文汇编》,XLII页。

㉖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1,第562页。

㉗ 塔恩,第326页和第497页。

⑭ 塔恩,第 339 页,第 343 页和附录 17。甚至 E. 巴辛·福色尔(E. Bazin - Foucher)通常也极为赞成塔恩的观点。《评〈大夏与印度的希腊人〉》,《亚洲学刊》,卷 230,1938 年,第 501 - 528 页。

⑮ 塔恩,338 - 339 页。我们加了斜线。

⑯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62 页。

⑰ 马歇尔,《毗叉始罗的出土文物》,《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29 - 1930 年,第 55 - 97 页,尤其是第 56 页。

⑱ W. SCHUR, Die Orientpolitik des Kaiser Nero, Klio, Beiheft XV (Neue Folge, Heft II), Leipzig 1923, p. 57.

⑲ J. H. 希尔, Eudoxus van Cyzicus, 续编, 卷 2, 第 8, 阿姆斯特丹, 1939 年, 第 266 页。

⑳ J. 肯尼迪,《迦腻色迦的秘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2 年,第 665 - 688 页和第 981 - 1019 页,尤其是第 996 - 1001 页;同一作者的《迦腻色迦的希腊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121 - 124 页;《迦腻色迦拾零》,《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369 - 378 页;《对迦腻色迦的新观点》,《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664 - 669 页;《迦腻色迦的年代》,《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920 - 939 页。弗里特同意肯尼迪在《迦腻色迦的年代》中的观点,《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 年,第 913 - 920 页,尤其是第 916 页。

㉑ 见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 1,图版 XVII, 24。

㉒ 同上,第 173 页。

㉓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 131 页。哥什曼对在贵霜帝国的季风期贸易的观察报告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值得特别的注意。不过,似乎他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总是正确的。如发现的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与印度的季风期贸易就是错误的(第 123 页)。希尔有力地证明了这种重要的发现要早一个世纪(J. H. 希尔, Eudoxus van Cyzicus, 续编, 卷 2, 第 8, 尤其是附录 2, 第 63 - 82 页(249 - 268), 也见塔恩, 第 369 页)。而且阿丹的占领并不是发生在尼禄统治时(第 125 页), 而要更早一些, 可能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希尔, 同上, 第 72 页; 查尔斯沃斯(M. P. Charlesworth), 《玛丽斯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的一些注解》, 《古典季刊》, 卷 XXII, 1928 年, 第 92 - 100 页, 尤其是第 98 - 99 页; 华明顿(E. J. Warmington), 《罗马帝国与印度间的商业》, 剑桥, 1928 年, 第 15 - 16 页。)

㉔ G. 哈楼恩, Zur Ā - ts'i Frage, 《德国东方学会会刊》, 卷 91, 第 253 页, 注 4。

㉕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 116 页。

㉖ 为支持这个事实,哥什曼提出了一枚重铸有“sakarou”的钱币。这并不一定要解

释为黑刺斯对萨迦诺卡伊的一次胜利,它只能解释为萨迦诺卡伊的重铸,也许是在萨迦诺卡伊对黑刺斯的一次胜利之后。重铸的人总是要晚于他做重铸的那个人。也许后来萨迦诺卡伊的覆没是丘就却在为他的亲戚(父亲?)报仇?

⑩ J. 詹治,《塞种研究,古典时期遥远的东北地区的世界观》,附录 41,续编,附录 28,莱比锡,1939 年,第 102 页。

⑪ 这也就是科诺和哥什曼一定要得出的结论,见本书第一章注 223 和 224。

⑫ T. W. THOMAS, Sandanes, Nahapana, Castana and Kaniska; Tung - Li, P' an - Ch' i and Chinese Turkestan, New Indian Antiquary, VOL. 7, N°5 - 6, Bombay, 1944,

⑬ S. 列维,《印度 - 斯基泰诠释, II: 历史文献》,《亚洲学刊》,第 9 辑,卷 IX, 1897, 第 14 页。

⑭ O. 弗兰克,《中国的资料来源对认识中亚突厥人种和斯基泰的贡献》,柏林, 1904 年,第 91 - 92 页。

⑮ 《前汉书》,第 96 章 A, A. 威利译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刊》,卷 X, 1881 年,第 36 页。

⑯ S. 列维,《印度 - 斯基泰诠释, II: 历史文献》,《亚洲学刊》,第 9 辑,卷 IX, 1897 年,第 22 页。

⑰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 120 - 121 页。

⑱ 哈里·查兰·戈什,《迦腻色迦的年代》,《印度历史季刊》,卷 5, 1929 年,第 49 - 80 页,尤其是第 64 页。

⑲ 《加斯蒂纳斯》,XLII. 5. 4-5。

⑳ 《后汉书》,第 118 章, E. 沙畹,《后汉书中的西方国家》,《通报》,第 2 辑,卷 8, 1907 年,第 187 页以后。

㉑ O. 弗兰克,《中国的资料来源对认识中亚突厥人种和斯基泰的贡献》,柏林, 1904 年,第 99 页。

㉒ S. 科诺, W. E. 威克,《印度佉卢文体铭文中的纪元》,《东方资料实录》,卷 3, 1925 年,第 52 - 91 页,尤其是第 64 页。

㉓ S. 列维, Note rectificative sur le Ki - Pin, 《亚洲学刊》,第 9 辑,卷 7, 1896 年,第 161 - 162 页。

㉔ 见本章注 18(第 538 页,注 4)。

㉕ V. 史密斯,《印度北部的萨迦人》,《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 61, 1907 年,403 - 421 页,尤其是第 419 页。

㉖ P. 伯希和,《吐火罗与贵霜》,《亚洲学刊》,卷 224, 1934 年,第 23 - 106 页,尤其是第 38 页,注 1。

⑬ 塔恩,附录 9,第 469 - 473 页。

⑭ 《前汉书》,第 96 章 A, A. 威利译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刊》,卷 X,1881 年,第 34 页。

⑮ 《前汉书》,第 96 章 A, A. 威利译本,《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刊》,卷 X,1881 年,第 36 页。

⑯ 塔恩,第 339 - 350 页。

⑰ 见本章注 169。

⑱ T. W. THOMAS, Sandanes, Nahapāna, Caṣṭana and Kaniṣka: Tung - Li, P' an - Ch' i and Chinese Turkestan, New Indian Antiquary, VOL. 7, N° 5 - 6, Bombay, 1944。

⑲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第卷 1,582 页。

⑳ 《印度铭文汇编》,LXIV - LXV 页。

㉑ P. 加德纳,《大英博物馆大夏与印度的希腊和斯基泰钱币》,XLIX 页。

㉒ S. 科诺,《134 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32 年,第 957 页。

㉓ J. 马歇尔,《咀叉始罗指南》,第三版,第 97 页。

㉔ J. 马歇尔,《咀叉始罗的出土文物》,《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12 - 1913 年,第 42 - 45 页,尤其是第 44 页。

㉕ J. 马歇尔,《迦膩色迦的年代》,《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5 年,191 - 196 页,尤其是第 196 页,因此哥什曼推断出西尔迦普一直被人居住到了迦膩色迦的就职。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 140 页,注 2 及第 176 页。

㉖ 《印度铭文汇编》,LXIV 页以后。

㉗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81 页。

㉘ L. 巴赫霍夫,《迦膩色迦纪元》,《东方学刊》,续编,卷 4,1927 - 1928 年,第 21 - 43 页,尤其是第 32 - 33 页。

㉙ S. 科诺, W. E. 威克,《印度佉卢文铭文中的纪元》,《东方资料实录》,卷 3,1925 年,第 52 - 91 页,尤其是第 65 页;《印度铭文汇编》,LXIX 页。

㉚ 见本章注 169。

㉛ 拉普森,《剑桥印度史》,卷 1,第 580 - 581 页。

㉜ 例如,在来自西尔迦普的两个银杯上的铭文中,《印度铭文汇编》,第 97 - 98 页;在一个三足银盘中,《印度铭文汇编》,第 98 页;在一个罐子上,《印度铭文汇编》,第 122 页;在一个浅浮雕上,《印度铭文汇编》,第 134 页;在一个来自玛尼加拉的银桌上,《印度铭文汇编》,第 151 页。

⑨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 140 页。

⑩ 对于这个(萨)迦,科诺好几次都改变了他的观点。1929 年他认为:“迦明显是记录的第一个 akshara”,《印度铭文汇编》,第 82 页。1932 年他认为他能解读(萨)迦,见《印度-斯基泰编年注释》,《印度历史杂志》,卷 XII,1933 年,第 3 页,及《134 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32 年,第 954 页。1948 年他又重新认为在迦前没有任何字符,《303 年的查尔萨达婆罗米铭文》,《东方资料实录》,卷 XX,1948 年,第 115 页。

⑪ S. 科诺,《134 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32 年,第 957 页。

⑫ R. B. 怀特海德,《旁遮普博物馆的钱币目录》,拉合尔,卷 1,第 95 页。

⑬ 见本书第一章。

⑭ 《印度铭文汇编》,第 77 页。

⑮ J. Ph. 沃格尔,《秣菟罗考察》,《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1911-1912 年,第 120-133 页,尤其是第 124-125 页。

⑯ 特别是科诺,《134 年的卡拉万铜盘铭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32 年,第 963 页;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 140 页。

⑰ K. P. 加雅斯瓦尔,《阎膏珍的雕像与贵霜编年》,《比哈尔与奥里萨研究学会会刊》,卷 6,1920 年,第 12-22 页。

⑱ W. E. 冯·威克,《印度佉卢文铭文中的纪元》,《佉卢文年代的计算》,《东方资料实录》,卷 3,1925 年,第 79-91 页。

⑲ S. 科诺与 W. E. 冯·威克,《印度佉卢文铭文中的纪元》,《东方资料实录》,卷 3,1925 年,第 78 页。

⑳ 见本章第 333-334 页。

㉑ 多年以后,冯·威克重新考虑了他的观点,见《东方资料实录》,卷 3,第 79-91 页;见《迦腻色迦纪元中的年代》,《东方资料实录》,卷 5,1927 年,第 168-170 页。

㉒ 1928 年哈里·查兰·戈什在相反的方向进行了调查,看如果指出为塞种纪元,来自泽达铭文的这一信息是否也吻合,它确实是这种情形,《迦腻色迦的年代》,《印度历史季刊》,卷 4,1928 年,第 760-764 页。

㉓ 同上,卷 5,1929 年,第 49-80 页,尤其是第 80 页。

㉔ T. W. THOMAS, *Sandaoes, Nahapāna, Castana and Kaniska: Tung - Li, P' an - Ch' i and Chinese Turkestan*, *New Indian Antiquary*, VOL. 7, N°5 - 6, Bombay, 1944.

㉕ J. A. M. 德·莫艾里亚克·德·迈拉(J. A. M. De Moyriac De Mailla),《中国的将军传记,或帝国年表》,译自《通鉴纲目》,巴黎,1777 年,卷 3,第 393-394 页。

⑮ S. 列维,《印度-斯基泰诠释,II:历史文献》,《亚洲学刊》,第9辑,卷IX,1897年,第5-26页,尤其是26页;A.M.波叶尔,《迦腻色迦时期》,《亚洲学刊》,第9辑,卷XV,1900年,第526-579页,尤其是第549页。

⑯ O. 弗兰克,《中国的资料来源对认识中亚突厥人种和斯基泰的贡献》,1904年,第94页。

⑰ 同上,72页。

⑱ 德·莫艾里亚克·德·迈拉(J. A. M. De Moyriac De Mailla),《中国的将军传记、或帝国年表》,译自《通鉴纲目》,卷3,第403页。

⑲ A.M.波叶尔,《那哈帕纳与塞种纪元》,《亚洲学刊》,第9辑,卷X,1897年,第120-151页,尤其是第144-145页。

⑳ S. 列维,《印度-斯基泰诠释,I:传说》,《亚洲学刊》,第9辑,卷8,1896年,第444-484页,尤其是第482-483页。

㉑ S. 比尔(S. Beal),《西域记,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伦敦,1906年,卷1,第56页以后;瓦特斯(Th. walters),《公元629-645年玄奘在印度的旅行》,里斯·戴维斯(T. W. Rhys Davids)编,东方翻译基金,新专辑,卷XIV,伦敦,1904年,第124页。

㉒ S. 列维,《迦腻色迦与宝行王》,《亚洲学刊》,1936年,第61-121页。也见A. 班纳吉-萨斯特里,《迦腻色迦年代辨》,《比哈尔与奥里萨研究学会会刊》,卷23,1937年,第113-117页。

㉓ R. 哥什曼,《贝格拉姆,贵霜的探查考古与历史》,第125页。

㉔ H. 马伯乐,《明帝之梦与使团》,《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河内,1910年,第95-130页。

㉕ 哈里·查兰·戈什,《迦腻色迦的年代》,《印度历史季刊》,卷5,1929年,第71页。

㉖ 诗行62,63,65,69,70和71。

㉗ H. 雅克比,《Das Kālakācārya - Kathānakam》,《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34,1880年,第247-318页,尤其是第266-267页与286页。

附表一 “斯基泰”时代的 诸统治者

乌贾因与 秣菟罗的 斯基泰人	布马迦 那哈帕纳 罗阎拉 (迦拉奥斯塔) 索达萨 ? 毛迦 ? 毛乌斯 乌奴你思	公元前 1 世纪初 公元前 70 年左右 公元前 65 ~ 57 年左右 公元前 51 年? 公元前 60 年左右 ~ 前 50 年左右 公元前 60 年左右 ~ 前 50 年左右
印度— 帕提亚人	斯帕拉霍拉 阿泽斯 冈德法内斯 阿巴达迦西斯 帕克雷斯 萨婆达那 萨塔瓦斯特拉 弗拉奥特斯	公元前 60 年左右 ~ 前 45 年左右 公元前 50 年左右 ~ 前 30 年左右 公元前 30 年左右 ~ 前 15 年左右 公元前 20 年左右 ~ 前 15 年左右 公元前 15 年左右 ~ 前 10 年左右 公元前 15 年左右 ~ 前 10 年左右 公元前 15 年左右 ~ 前 10 年左右 公元 1 世纪前半期
贵霜人	丘就却 阎膏珍	公元前 25 年左右 ~ 公元 35 年左右 公元 35 年左右 ~ 62 年左右或更晚

吉霍尼迦	公元 70 年左右
迦膩色迦	公元 78 ~ 101 年
婆什色迦	公元 102 ~ 106 年
胡毗色迦	公元 111 ~ 138 年
迦膩色迦二世	公元 119 年
韦苏提婆一世	公元 152 ~ 176 年
迦膩色迦三世	公元 192 年
? 瓦斯库珊那	公元 200 年
? 韦苏提婆二世	公元 3 世纪初期

附表二 “斯基泰”时代的铭文

基督纪元	古塞种纪元	印度西北部的佉卢文铭文	秣菟罗的婆罗迷铭文	乌贾因的婆罗迷铭文
公元前 129 年	1			
	20			
公元 100 年				
	40			
		58 麦拉		
	60	60? 沙铎尔		
		68 曼色赫拉, 法特扬		
		78 咀叉始罗铜盘		
	80			
		81 穆差		
		83 喀布尔		
	100	100? 卡拉桑		
		102 蒙特法庭班遮		
		103 塔克提 - 依 - 巴喜		
		104 萨多		
		111 帕拉		
		113 卡尔达拉		

	117? 玛尔古斯		
	120		
	122 旁遮塔		
公元 1 年	134 卡拉万		
	136 咀叉始罗银册		
	140		
	160		
	168 白沙瓦博物馆		
	180		
	187 卡拉特斯		
	191 吉霍尼迦瓶		
		199 秣菟罗	
		(路德斯表第 78)	
	200 德瓦依		
		迦腻色迦圣物	西郡太守
	220 (迦腻色迦	秣	
公元 100 年	纪元的迦腻		从
	240 色迦王朝的	菟	
	260 佉卢文铭文)		
	280	罗	
	89 玛曼 德里		1
	300	的	
	303 查萨达		
	318 罗里延·唐盖	婆	到
	320		
公元 200 年		罗	
	340		312

	359 加马尔迦里	送	
	360		
	380		
		文	的
	384 哈斯特那迦尔		
	399 斯卡拉赫·德里		
		铭	
	400		钱
	420	文	
公元 300 年			
	440	?	币
	460	?	
	480		铭
	500		
	520		
	公元 400 年		文

附表三 婆罗迷铭文 中的字符 KU

路德斯表	迦赋色迦年	路德斯表	迦赋色迦年
第 21	7	第 24	15
42	58	25	18
34	59	27	19
56	60	32	25
62	77	36	31
63	77	37	32
70	86	39	35 或 39
		29	50
16	4	53	52
48	6	54	54
22a	9	58	62
23a	12	71	89

附表四 婆罗迷写本中的字符 U

路德斯表	迦膩色迦年
第 110	非常早
93	非常早
46	48
77	98
23a	12
122	10 ~ 20
119	25
29	50
71	89

图版说明

1. 比玛仁圣骨箱
2. 出自沙—吉—柯·德里的圣骨箱
3. 西克里卒塔婆浮雕,表现因陀罗拜访佛陀
4. 西克里卒塔婆浮雕,表现佛陀见刈草者
5. 出自坦叉始罗 L 建筑的浮雕
6. 出自坦叉始罗 L 建筑的浮雕
7. 出自贝格拉姆的浮雕
8. 保存在柏林的浮雕
9. 出自玛梅恩·德里,题有 89 年的浮雕
10. 出自罗里延·唐盖的佛陀
11. 出自哈什特纳噶尔的佛陀
12. 出自罗里延·唐盖佛陀的基座
13. 出自哈什特纳噶尔的佛陀的基座
14. 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站佛,柏林博物馆
15. 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站佛
16. 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坐佛,柏林博物馆
17. 出自萨尔—伊—巴霍罗尔的坐佛
18. 出自萨尔—伊—巴霍罗尔的站立菩萨
19. 出自斯卡拉·德里的鬼子母
20. 出自坦叉始罗 N 教堂的拉灰泥佛陀
21. 莫拉·莫杜拉寺院的拉灰泥雕像
22. 拉合尔博物馆的浮雕

23. 坐佛,柏林博物馆
24. 坐佛,拉合尔博物馆
25. 白沙瓦博物馆的浮雕
26. 出自萨尔—伊—巴霍罗尔的坐佛
27. 一件 stambha 上的浮雕,秣菟罗寇松博物馆
28. 一个 ayagapata 的细节
29. 有 Amohini 所献的 ayagapata
30. 卡帕町型的站佛,吉美博物馆
31. 出自卡特拉的卡帕町型坐佛,秣菟罗寇松博物馆
32. 卡帕町型坐佛,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33. 出自秣菟罗的浮雕,拉克诺省博物馆
34. 拉克诺省博物馆的残雕
35. 一件 torana 横梁,秣菟罗寇松博物馆
36. 秣菟罗站佛
37. 坐佛,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38. 出自秣菟罗的带钱袋的药叉站像
39. 出自安亚的佛陀,秣菟罗寇松博物馆
40. 波士顿博物馆中的佛陀
41. 出自犍陀罗的佛陀头像,慕尼黑人种学博物馆
42. 出自秣菟罗的基座
43. 出自萨赫斯—马赫斯的坐佛
44. 出自西塔拉·迦提的坐佛
45. 题有 80 年的耆那雕像
46. 题有 83 年的两座耆那像
47. 一件题有 84 年的耆那残像
48. 题有 84 年的耆那坐像
49. 题有 98 年的耆那坐像
50. 出自秣菟罗门楣上的残雕

51. 出自秣菟罗门楣上的残雕
52. 题有 62 年的耆那残雕
53. 出自秣菟罗门楣上的残雕
54. 题有 22 年的坐佛
55. 题有 57 年的耆那坐雕
56. 题有 12 年的耆那坐雕
57. 公元 3 世纪的耆那残雕
58. 公元 2 世纪的耆那头雕
59. 题有 54 年的舍卫城雕像
60. 题有 5 年或者 39 年的耆那雕像
61. 公元 3 世纪的耆那坐像
62. 公元 3 世纪的耆那坐像
63. 题有 18 年的 Aristanemi 雕像
64. 题有 9 年的耆那站像
65. 可能题有 97 年的基多残座
66. 题有迦膩色迦 97 年的贵霜残座
67. 题有 14 年的佛雕残像
68. 卡帕町型雕像, 头发几乎为光滑的
69. 受犍陀罗影响的第一阶段的雕像
70. 受犍陀罗影响的第二阶段的雕像
71. 新的民族风格的雕像
72. 笈多风格

译名对照表

Abdagaeses	阿布达迦伊塞斯
Abdagases	阿布达迦塞斯
abhayamudrā	施无畏印
Abuhola	阿布霍拉
Achaemendid time	阿赫门德时代
Adam's Peak	亚当峰
Aden	阿登
Afhānistān	阿富汗
Ahin Posh	阿印·珀什
Airāvata	伊罗婆那
Ajanṭā	阿旃陀
al - Bīrūnī	阿尔 - 比鲁尼
Alexander	亚历山大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Allahābād	阿拉哈巴德
Amarāvati	阿摩罗婆提
Āmohinī	阿莫西尼
Amū - Daryā	阿姆河
Andrew's cross, St.	圣安德鲁十字架
An - hsi	安息
añjalimudrā	手印

Antialcidas 安提尔希达斯
Antioch 安条克
Anyor 安亚
Apollo 阿波罗
Apollodorus 阿波罗多鲁斯
Apollonius of Tyana 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apratihata 无碍
apratihatacakra 无碍灼羯罗,不可击败的金刚
Ārā inscription 阿拉铭文
Arachosia 阿罗克西亚
Ardashir 阿尔德什尔
Arhats 阿罗汉
Aristanemi 阿利湿达内弥
Armenia 亚美尼亚人
Arrianus 阿里安纳斯
Arsaces I 阿尔萨息斯一世
Arsacids 阿尔萨息斯王朝
Artabanus I 阿尔达班努斯一世
Artabanus III 阿尔达班努斯三世
Artabanus V 阿尔达班努斯五世
Aryans 雅利安人
Āśādha 阿娑荼,仲夏
Asiani 阿色尼
Asii 阿希
Asoka 阿育王
Āspavarma 阿斯帕瓦纳
Assyrian source 亚述人史料
Āśvaghōṣa 印度佛教诗人马鸣

Āsvavarma 阿斯瓦瓦尔玛
aureole 光环
Avalokiteśvara 阿婆卢吉低舍婆罗
Ayama 阎膏珍
Ayasia Kamula 阿亚西亚·卡姆亚
Ayodhyā 阿瑜陀
Azes 阿泽斯
Azes II 阿泽斯二世
Azilises 阿泽里西斯
Bactria 巴克特利亚(大夏)
Bagh caves 巴格洞窟
Bala 巴拉
Balasami 巴拉萨米
Balasvāmin 巴拉斯瓦米恩
Balat(t)rata 巴拉特拉塔
Balinese art 巴厘岛艺术
Bāmiyān 巴米扬
Baroda 巴罗达
Begram 贝格拉姆
Berlin 柏林
Besnagar 贝斯那迦尔
Bhajā 帕贾
Bhakti 净信, 正信, 信解
Bharhut 巴尔胡特
Bhilsā 比尔萨
Bhūtesar 布特萨尔
Bihar, Buddha of 比哈尔佛陀
Bīmarān 比玛兰

Bodh - Gayā 菩提 - 伽耶
Bodhi 菩提
Bodhi temple 菩提庙
Bodhi tree 菩提树
Bodhsattva 菩萨
Bolor - pass 博劳山口
Boston 波士顿
Bower MS. 鲍尔写本
box - head 箱形头
Brahmā 梵天
Brahmāgupta 梵天笈多
Brahmanical temple 婆罗门教庙
Brahmanism 婆罗门教
Brāhmī epigraphist 闪族后裔的印度古代语碑铭家
Brāhmī inscription 闪族后裔的印度古代语铭文
Brahmin ascetic 婆罗门苦行者
Buddha 佛陀
Buddhaghosa 佛音
Buddhamitā 佛陀密多
Buddhism 佛教
Buddhist 佛教徒
Caesarean era 恺撒纪元
Caitra 制怛罗
Caitya 塔院, 见卒塔婆
cakra 权轮
Calcutta 加尔各答
Cambridge 剑桥
Candana 旃檀

Candragupta Maurya 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
Candragupta II 旃陀罗笈多二世
Caṣṭana 总督
Central Asia 中亚
Central India 中印度
Ch'ang Ch'en 张骞
Chang - shih 长史
Chan - t'an 旃檀
Charsadda 查萨达
Ch'ien han shu 前汉书
Ch'i - lien - shan 祁连山
Chi - pin 罽宾
Ch'iu - chiu - ch'io 丘就却
Chü 楚河
C'i - lien 祁连
Cinastana 西那斯坦那
Crassus 克拉苏
Darius 大流士
Datta 达塔
Dehanadi 德哈那迪
Delhi 德里
Demetrius 德米特里
Deva 提婆
Devagupta 提婆笈多
devakula 天祠
Devarāja 德瓦拉迦
Devas'ri 德瓦斯里
Devira 德维拉

Dewaj 德瓦伊
 dharmacakra 法轮
 dharmacakramudrā 法轮手印
 Dharmarājikā 达摩罗吉可诃
 dhotī 多提
 Dhruv Tīla 德鲁夫提拉
 Drangīāna 德兰吉亚那
 Dutchmen 荷兰人
 early Indian art 早期印度艺术
 East Javanese art 东爪哇艺术
 Erythraean Sea 厄里特里亚海
 Eucraties 欧克拉提德斯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Fa - hsien 法显
 Fan Yeh 范晔
 Fatehjang 法特扬
 Frahāta 弗拉哈塔
 Frawarti 弗拉瓦提
 Fu fa ts'ang yin yüan ch'uan 《付法藏因缘经》
 Gad 迦德
 Gadhā 迦达
 Gandhakutī 健陀俱胝
 Gandhāra 犍陀罗
 Ganges 恒河
 Gaspar 迦斯帕
 Ghataspa 迦塔斯帕
 Gautama 乔达摩
 Gautamīputra Śātakarni 乔达摩之子 萨塔卡尔尼

Gayā 伽耶
 Ghasta(or u)hasti 迦斯塔(或图)哈斯提
 Ghazni 迦兹尼
 Gobi 戈壁
 Gomitra 格米特拉
 Gondophemes 冈德法内斯
 Graeco - Buddhist art 希腊佛教艺术
 Grahabalā 格拉哈巴拉
 Grahapala 格拉哈帕拉
 Greek 希腊
 Guḍa 古达
 Guḍāna 古达那
 Gudaphara, Guduphara 见冈德法内斯
 Gudaphara inscription 见塔克提 - 依 - 巴喜铭文
 Gudapharr 见冈德法内斯
 Goptas 笈多
 Hadda art 哈达艺术
 Hadda inscription 哈达铭文
 Hagāmaṣa 哈迦马萨
 Hagāna 哈迦那
 Han 汉族
 Harpocrates 哈尔波克拉提斯
 Hashtnagar 什特纳噶尔
 Heliocles 赫里奥克莱斯
 Heliodorus 赫里奥多罗斯
 Hellenism 希腊文化
 Hephtalites 哒哒
 Heraus 黑刺斯

Hercules 格拉斯
 Heracles 赫拉克莱斯
 Hermaeus 赫尔玛尤斯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indu - Kush 兴都库什
 Hinduism 印度教
 Hiu - Sün 休循
 Hollanders 荷兰人
 Hoti Mardan 霍提·马尔丹
 Hou han shu 《后汉书》
 His - hou 翕侯
 Hsiu - mi 休密
 Hsüing - nu 匈奴
 His - yü 西域
 Hsiu - tun 胯顿
 Hsüan Tsang 玄奘
 Huns 匈奴人
 Huviska 胡毗色迦
 Hyndophernes 冈多法内斯
 Ili 伊犁
 India 印度
 Indianisation 印度化
 Indians 印度人
 Indo - Afghan school 印度 - 阿富汗流派
 Indo - Bactrian kings 印度 - 巴克特利亚王
 Indo - Bactrian times 印度 - 巴克特利亚时代
 Indo - Parthians 印度 - 帕提亚人
 Indo - Roman school 印度 - 罗马流派

Indo - Sassanian kings 印度 - 萨珊王
Indra 因陀罗
Indravarma 因德拉瓦尔玛
Indus 印度河
Iranian people 伊朗人
Ireland 爱尔兰
ivories 象牙
Jainas 耆那信徒
Jainism 耆那教
Jainism inscription 耆那教铭文
Jainism stūpa 耆那教卒塔婆
Jalālabād 加拉拉巴德
Japan 日本
Laukika 世俗
Jaulian 乔里安
Java 爪哇
Jaxartes 药杀水
Jetavana 祇园寺派
Jihonika 吉霍尼迦
Jina 耆那教的圣人
Julian coins 尤里安钱币
Julian - Claudian dynasty 尤里安 - 克劳迪王朝
Kābul 喀布尔
Kadaphes 迦德菲斯
Kadpheses kings 迦德菲塞斯王
Kalawan 卡拉万
Kaliyuga 争斗时,相当于四十三万二千年
Kamula 卡姆亚

Kandahār 坎大哈
Kaniska 迦膩色迦
Kaniṣka II 迦膩色迦二世
Kaniṣka III 迦膩色迦三世
Kankalī Tīlā 坎卡里·提拉
Kan - su 甘肃
Kan - fu 高附
kapardin type 卡帕町型
Kapisa 迦毕试
Kāsmīr 迦湿弥罗
Kasyapa 迦叶
Katrā 卡特拉
Kausāmbī 拘睢弥国
Khalamasa 卡拉玛萨
Khalatse 卡拉特斯
Kharaosta kamua 迦拉奥斯塔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佉卢文铭文
King Mahārāj 摩诃罗阇大王
Kistrā 吉斯特那河
Kizil 克孜尔
Kopen 罽宾
Kosam 柯萨姆村
Kṛṣṇa 黑天神
Kuei - shuang 贵霜
Kujūla Kadphises 丘就却
Kujūla Kala Kadphises 库朱拉·卡拉·迦德菲塞斯
Kūmarajīva 鸠摩罗什
Kumbha 瓶

K'un - mo 昆莫
Kuṣa 贵萨
Kuśa - grass 姑奢草, 幸运草
Kuśāṇas 贵霜人
Kusulua Patika 库苏鲁阿·帕提卡
Lahore 拉合尔
lakṣaṇa 相
Lalitavistara 普曜经
Lao - shang 老上
Leyden 莱登
Lion Capital 狮柱
Little Yüeh - chih 小月氏
Loriyān Tangai 罗里延·唐盖
lotus 莲花
Lo - yang 洛阳
Lucknow 罗可诺
Lysias 李西亚斯
Madhyadesā 末睇提舍
Māgha 摩迦, 星月
mahā 摩诃
mahapurasa 摩诃啥富罗
Mahavila 大雄
Mahāyāna Buddhism 大乘佛教
Maira 麦拉
Maitreya 弥勒
Majjhima Nikāya 中部(南传巴利文经藏五部之一)
makara 摩竭
Mālava 马拉尔瓦人

Mālwā 玛尔瓦
Mamāne Dherī 玛梅恩·德里
Manorathapūranī 满足希求论
Mānsehrā 玛恩瑟拉
Mao - tun 冒顿
Māra 魔罗
Mardān 马尔丹
Mārkaṇḍeya Purāna 玛鲁肯底亚富兰那
Māt 麦特
Mathurā 秣菟罗
Maues 莫俄斯
Maurya era 孔雀王朝纪元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Megasthenes 美加苏得尼斯
Menander 弥兰陀
Mihila 弥佉罗, 迷企罗
Mihiragula 米希拉克拉
Ming 明帝
Minnagar 明纳迦尔
Mira 米拉
Mithradates I 密特拉德斯一世
Mithradates II 密特拉德斯二世
Mithradates III 密特拉德斯三世
Moa 毛阿
Moga 毛迦
Mohrā Morādu 莫拉·莫拉杜
Molse of Khorene 科雷那的穆瓦兹
Muchai 穆差

Muki 穆克
Mu - kua 毋寡
Munich 慕尼黑
Muttra 穆特拉
Nada Diaka 那达·迪亚迦
Nāga 那迦
Nāgarī script 那扎利体
Nahapāna 那哈帕纳
Nālandā 那烂陀
Nāsik 那西克
Nepalese manuscript 尼泊尔手稿
Nero 尼禄
Netherlands 荷兰人
New York 纽约
Nikè 奈基
Nimbus 光轮
Nineveh 尼尼韦人
Nirvāna 涅槃
North India 印度北部
North - west India 印度西北部
North - west India art 印度西北部艺术
Oblong 椭圆
Orodes II 欧洛狄斯二世
Orodes III 欧洛狄斯三世
Orosius 奥罗休斯
Orthagnes 俄塔格涅斯
Oslo 奥斯陆
Oxus 乌浒河

Paja 波罗
 Pakistan 巴基斯坦
 Pakula 帕库拉
 Pāla art 波罗艺术
 Pan Ch' ao 班超
 Pan Ku 班固
 Pan Yung 班勇
 Panjtār 旁遮塔
 Paris 巴黎
 Parsvanātha 巴湿伐那陀像
 Parthia 帕提亚(安息)
 Parthians 帕提亚人(安息人)
 Patika 帕提卡
 Patna 巴特那
 Paṭṭāvali Gāthās 帕塔瓦里·迦塔斯
 Pauṣa 仲冬月
 Periplus 《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
 Persia 波斯
 Persian name 波斯名字
 Persian rock - inscription 波斯岩石铭文
 Peshāwar a 白沙瓦
 philhellenism 亲希腊
 Philostratus 菲劳斯特拉图斯
 Phraātes 弗拉特
 Phraates II 弗拉特二世
 Phraates IV 弗拉特四世
 Phraataces 弗拉特塞斯
 Phraótes 弗拉奥提斯

pilaster 壁柱
 Pliny 普林尼
 Poseidon 波塞冬
 Post - Kuṣāna period 后贵霜时期
 Po - t'iao 波调
 Prakrit 普拉克里特语
 Pravāra monastery 普拉瓦里拉庙
 Pre - Gupta period 前笈多时期
 Pre - Kuṣāna period 前贵霜时期
 Pškvr 白沙瓦
 Ptolemy 托勒密
 Puṇdra 奔那
 Punjab 旁遮普
 Purānas 《往世书》
 Pūrvāsādhā 箕宿
 P' u - ta 濮达
 railing 栏杆
 Rajataranginī 《罗阇塔兰吉尼》(《诸王记》)
 Rajula 罗朱拉
 Rājūvula 罗阇乌拉
 Richthofen range 李希霍芬山
 Roman art 罗马艺术
 Romans 罗马人
 Rudradaman 鲁德拉达曼
 Rudrasena 鲁德拉塞纳
 Russia 俄国
 Sacaraucae 萨迦诺卡依
 Sahēth - Mahēth 萨赫斯·马赫斯

Sahr - I - Bahlol 萨尔 - 伊 - 巴霍尔
 Sai 塞
 Sai - wang 塞王
 Sakā Haumavargā 塞种豪玛瓦尔格
 Saga language 塞语
 Saka - Parthian invasion 塞种 - 帕提亚人入侵
 Sakā Tigrakauda 塞种提格拉豪达
 Śakas 塞种人
 Dynasty 萨迦王朝
 Era 塞种纪元
 Era, old 旧塞种纪元
 Invasion 萨迦的侵略
 Mastery 塞种控制
 Rulers 萨迦统治者
 Śakastana 萨迦斯坦纳
 Śakra(Sakka) 帝释天
 Śākya faith 释迦信仰
 Śālavāhana 婆多婆诃,引正王
 Sanchi 山奇
 Sandnes 桑德内斯
 Sanskrit 梵文
 Sapedana 萨婆达那
 Saraucae 萨诺卡依
 Sārnāth 秣菟罗
 Sarnath 萨那特
 Sasa 萨沙
 Sassanian court 萨珊朝廷
 Satākamī king 萨塔卡尼王

Satavastra 萨塔瓦斯特拉
Seythia 西徐亚(斯基泰)
Seythians 西徐亚人(斯基泰人)
Seistān 锡斯坦
Seleucidian era 塞琉斯纪元
Sena art 摩那艺术
Shāhbāz - Garhī 沙巴兹 - 噶里
Shahdaur 沙铎尔
Shah - jī - kī Dheri 沙 - 吉 - 柯 德里
Shapur I 沙普尔一世
Shan - yü 单于
Shevaki 什瓦吉
Shih - chi 《史记》
Shuang - mi 双靡
Shu - le 疏勒
Siddhāntas 悉昙多
Siha 西哈
Sikri 西克里
Sind 信德
Sindhu 信都
Sinnaces 辛那塞斯
Sirkap 西尔迦普
Sirsukh 西尔苏克
Sītala Ghāṭī 西塔拉·迦提
Si - yu - ki 《西域记》
Skārah Dherī 斯卡拉·德里
Śodāsa 索达萨
Sogdia 粟特

Sogdians 粟特人
 Soter Megas 索特·美格斯
 South - East Asia 东南亚
 South India 印度南部
 Spalagadama 斯帕拉迦达马
 Spalahofa 斯帕拉霍拉
 Spalirisa 斯帕利里萨
 Śpalirīsa 斯帕利里萨
 Spalirises 斯帕利里塞斯
 Spalyris 斯帕利里斯
 Sravana 舍卫
 Srāvastī image 舍卫城雕像
 Srāvastī miracle 舍卫城现大神变
 śrīvatsa - symbol 胸臆象征
 Ssū - ma Ch' ien 司马迁
 Strabo 斯特拉波
 Stūpa 卒塔婆
 Śuddhodana 净饭王
 Śuṅga art 巽迦艺术
 Śuṅgas 巽迦
 Swāt valley 斯瓦特山谷
 Syria 叙利亚
 Syrian text 叙利亚资料
 Tabarī 塔巴里
 Tacitus 塔西陀
 Ta - hsia 大夏
 Tai inscription 泰铭文
 Takht - i - Bahi image 塔克提 - 依 - 巴喜雕像

Takht - i - Bāhī inscription 塔克提 - 依 - 巴喜铭文
 Ta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
 Taxila 呾叉始罗
 Ta - yüan 大宛
 Ta - yüeh - chih 大月氏
 Telephus 泰勒普胡斯
 Thomas 托马斯
 thunderbolt 霹雳
 Tibet 西藏
 T'ien - chu 天竺
 T'ien shan 天山
 Tilidates 提里达特斯
 Tirthankara image 提尔塔姆卡拉斯雕像
 Tochari 吐火罗
 Tong - kien - kang - mou 《通鉴纲目》
 torana 乌居门
 Trayastrimsa Heaven 仞利天宫
 Trogus Pompejus 特罗古斯·庞培
 Tukhārā 覩货罗
 Tun - huang 敦煌
 Tūrān 吐兰
 Turkestan 突厥斯坦
 Tuṣāra 覩货罗
 Ujjain 乌贾因
 Ujjayinī 乌吉衍那
 Uṇḍ 乌恩德
 Urasaka 乌拉萨卡
 unḥisa 肉髻

unhāsasīso 肉髻相
Uṣṇīṣa 肉髻
Utkala 乌特卡拉
Uttaraphalgunī 翼宿
uvimakavthisa 阎膏珍
Vaiśali 吠舍离
Vajheska 婆什色迦
Vajra 霹靂
Vajrapani 犍陀罗金刚
Valabhī kings 瓦拉比王
Vanaspara 瓦纳斯帕拉
Vanga 梵迦
Vardanes 哇尔达尼斯
Vardhamāna 筏驮摩那
Vāsiska 婆什色迦
Vasiska II 婆什色迦二世
Vaskusāna 瓦斯库萨那
Vasu, Vāsu 婆藪
Vāsudeva 韦苏提婆(波调)
Vāsudeva II 韦苏提婆二世
Vasudeva III 韦苏提婆三世
Vasulā 瓦苏拉
Vedic time 吠陀时代
Vehsadjan 维萨德坚 Vehsadjen 维萨德金
Verethragna 维里塔拉格那
Victory 胜利之神, 见奈基
Vidīśa 韦蒂萨
Vikrama era 超日纪元

- Vikramāditya 超日王, 乔达弥普特罗悉达卡尔尼的姓, 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姓
- Vindapharna 文达法尔纳
- Viṣṇumitra 威斯努密特拉
- Vodva stūpa 沃得瓦卒塔婆
- Vologases I 伏罗迦塞斯一世
- Vonones 乌奴你思
- Vonones I 乌奴你思一世
- Wei annals 《魏书》
- Wei - river 妫水
- Wen hsien t'ung k'ao 文献通考
- Western India 西印度
- Western Ksatrapas 西郡太守
- Wheel of Low 法轮
- White Huns 白匈奴
- Wima Kadphises 阎膏珍
- Wu - sun 乌孙
- YakṣaYakkha 夜叉
- Yasadinna 雅萨迪那
- Yavanas 耶槃那人
- Yen - kao - chen 阎膏珍
- Yin - mo - fu 阴末赴
- Yüen - chih 月氏
- Zeda 泽达
- Zeionises 奇奥尼塞思
- Zeus 宙斯
- Zoilus 卓依鲁斯



1. 比玛仁圣骨箱



2. 出自沙-吉-柯-德里的圣骨箱



3. 西克里卒塔婆浮雕,表现因陀罗拜访佛陀



4. 西克里卒塔婆浮雕,表现佛陀见刈草者



5. 出自坦叉始罗 L 建筑的浮雕



6. 出自坦叉始罗 L 建筑的浮雕



7. 出自贝格拉姆的浮雕



8. 保存在柏林的浮彫



9. 出自玛梅恩·德里, 题有 89 年的浮雕



10. 出自罗里延·唐盖的佛陀



11. 出自哈什特纳喀尔的佛陀



12. 出自罗里延·唐盖佛陀的基座



13. 出自喀什特纳喀尔的佛陀的基座



14. 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
站佛, 柏林博物馆



15. 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站佛



16. 出自塔克提-伊-巴喜的坐佛, 柏林博物馆



17. 出自萨尔-伊-巴霍罗尔的坐佛



18. 出自萨尔-伊-巴霍罗尔的
站立菩萨



19. 出自斯卡拉·德里的鬼子母



20. 出自坦叉始罗 N 教堂的拉友泥佛陀



21. 莫拉·莫杜拉寺院的拉灰泥雕像



22. 拉合尔博物馆的浮雕



23. 坐佛, 柏林博物馆



24. 坐佛, 拉合尔博物馆



25. 白沙瓦博物馆的浮雕



26. 出自萨尔-伊-巴霍罗尔的坐佛



27. 一件 stambha 上的浮雕, 秣菟罗寇松博物馆



28. 一个 ayagapata 的细节



29. 有 Amohini 所獻的 ayagapata



30. 卡帕町型的站佛,古美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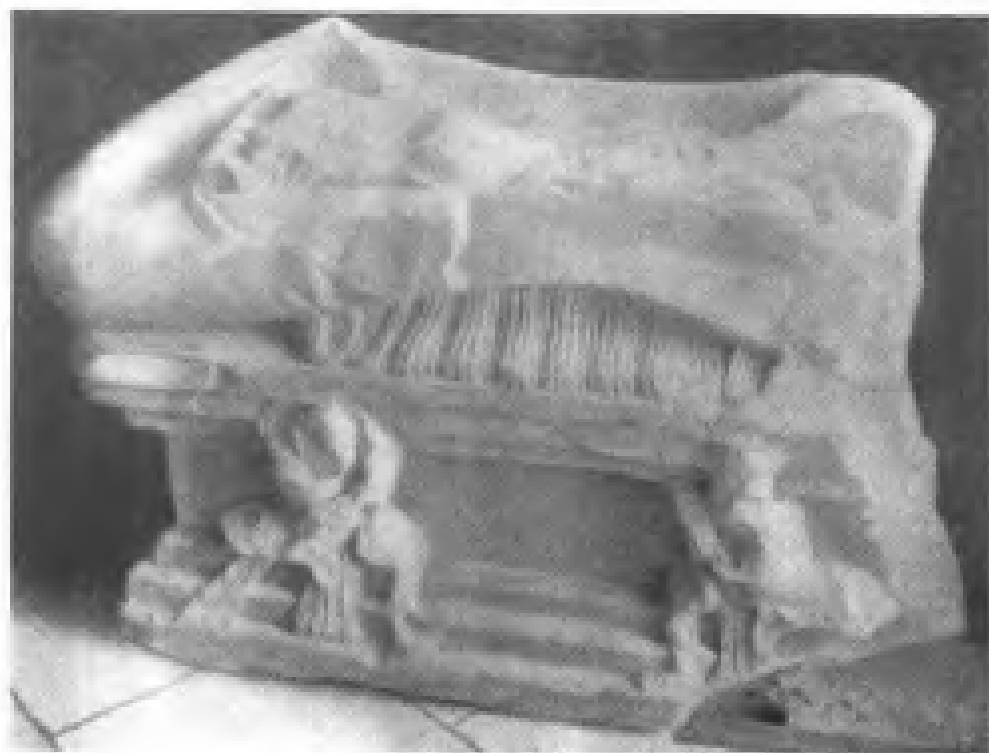
31. 出自卡特拉的卡帕町型坐佛，殊莪罗寇松博物馆



32. 卡帕町型坐佛,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33. 出自林莫罗的浮雕,拉克诺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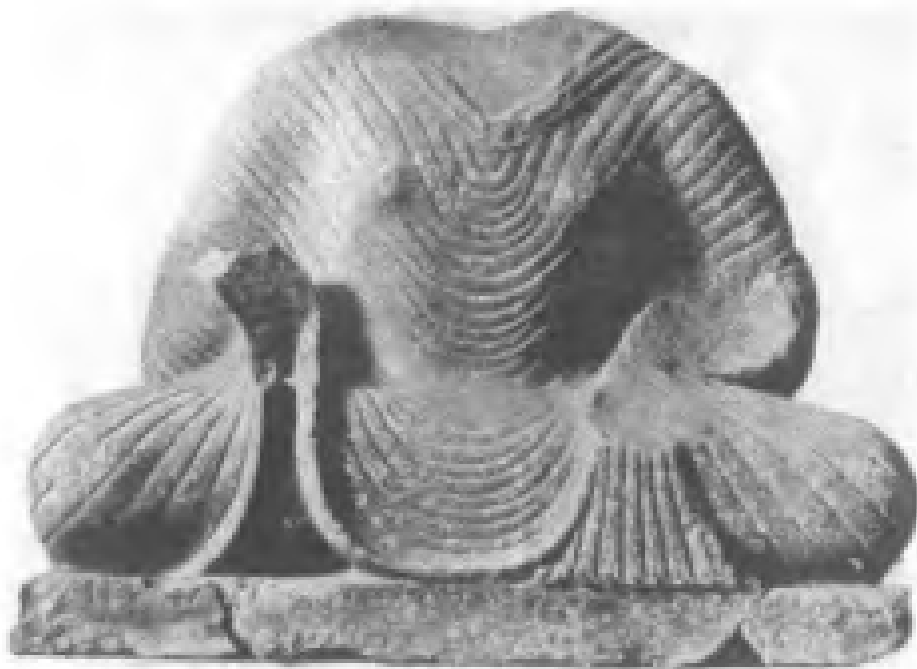
34. 拉克诺省博物馆的残雕



35. 一件 torana 横梁, 秣菟罗 迦松博物馆



36. 秣菟罗 站佛



37. 坐佛,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38. 出自秣菟罗的带钱袋的药叉站像



39. 出自安亚的佛陀, 林莫罗瓦松博物馆



40. 波士顿博物馆中的佛陀



41. 出自犍陀罗的佛陀头像, 慕尼黑人类学博物馆



42. 出自秣菟罗的基座



43. 出自萨赫斯-马赫斯的坐佛



44. 出自西塔拉·迦提的坐佛



45. 題有 80 年的耆那雕像



46. 題有 83 年的兩座耆那像



47. 一件題有 84 年的書那殘像



48. 題有 84 年的書那坐像



49. 題有 98 年的書那坐像



50. 出自秣菟罗门楣上的残雕



51. 出自秣菟罗门楣上的残雕



52. 題有 62 年的書那殘雕



53. 出自秣菟羅門楣上的殘雕



54. 題有 22 年的坐佛



55. 題有 57 年的耆那坐雕



56. 題有 12 年的耆那坐雕



57. 公元 3 世纪的耆那残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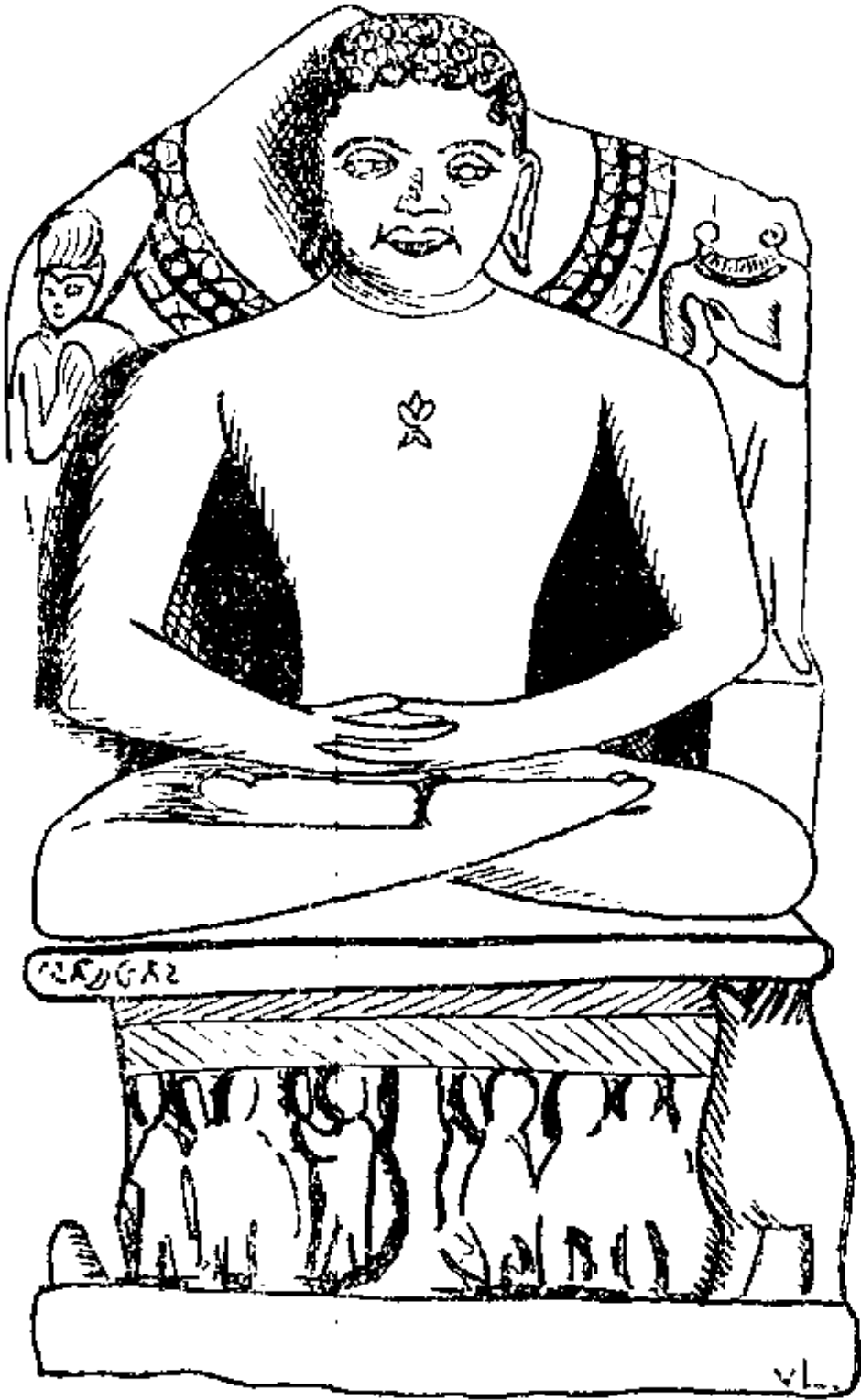
58. 公元 2 世纪的耆那头雕



59. 題有 54 年的舍卫城雕像



60. 題有 5 年或者 39 年的書那摩像



61. 公元 3 世纪的耆那坐像



62. 公元 3 世纪的耆那坐像



63. 題有 18 年的 Aristanemi 雕像



64. 題有 9 年的書那站像



65. 可能題有 97 年的基多殘座



66. 題有基賦色迦 97 年的貴霜殘座



67. 题有 14 年的佛雕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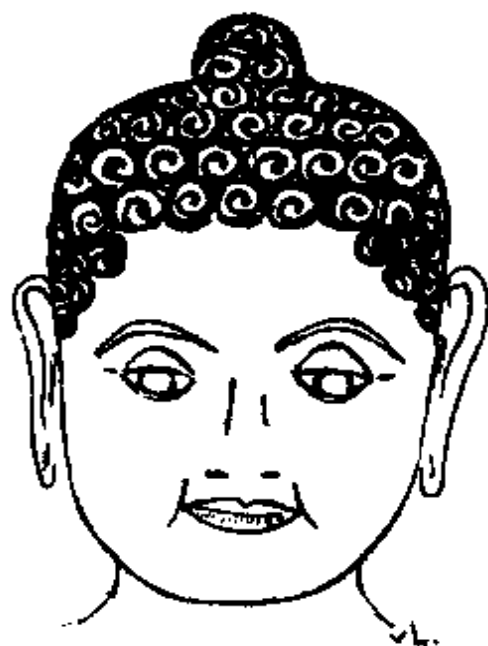
68. 卡帕町型雕像, 头发几乎为光滑的



69. 受键陀罗影响的第一阶段的雕像



70. 受犍陀罗影响的第二阶段的雕像



71. 新的民族风格雕像



72. 笈多风格